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Early Church to the Dawn of the Reformation

基督教史

初期教会到宗教改革前夕

胡斯托·L.冈萨雷斯（Justo L. González）◎著

赵城艺 ◎译

|上卷|

上海三联书店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Early Church to the Dawn of the Reformation

基督教史



初期教会到宗教改革前夕

胡斯托·L.冈萨雷斯（Justo L. González）◎著

赵城艺 ◎译

| 上卷 |

上海三联书店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by Justo L. González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ume I
The Early Church to the Reformation. Revised and Updat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献给凯瑟琳

前　言

胡斯托·冈萨雷斯(Justo L. González, 1937－　)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原籍古巴。他在古巴从事神学教育多年;后定居美国,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了历史神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多年来,在亚特兰大埃默利大学坎特拉神学院(Candler School of Theology, Emory University)教授基督教思想史,现在是一位独立学者和作家。他在基督教神学和历史方面的专著已超过二十多种。其中著名的三卷本《基督教思想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作于1970年至1975年间,英译本在美国由艾宾顿出版社(Abingdon Press)出版,已经重印超过二十次,被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多所大学和神学院采用,作为教科书或主要的参考书。中译本由金陵协和神学院组织翻译,于2002年出版(三卷合订本),作为金陵协和神学院建校五十周年的庆典献礼,已为我国和周边汉语地区及国家的大学和神学院作为教材或参考书使用。第二版(分三卷印刷)已由译林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

作为《基督教思想史》的"姐妹篇",冈萨雷斯的另一部成名之作是两卷本的《基督教史》(*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作于1984至1985年间。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从第1世纪到16世纪初宗教改革前夕;下卷从16世纪宗教改革开始到20世纪。这部书二十多年来被美国许多神学院用作教会史的课本。冈萨雷斯的夫人凯瑟琳·G.冈萨雷斯(Catherine Gunsalus González)在亚特兰大哥伦比亚神学院担任教会

史教授,用的也是这部书。金陵协和神学院研究科几年来也用这部书作教会史课程的教材。

三年前,作者对本书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补充;于2011年作为第二版在美国出版发行。我认真地比较了这先后相隔二十五年的两个版本,尤其是下卷的最后几章,发现其中的确有许多很重要的补充,在组织和编排上也作了相应的改动。在这二十多年间,世界基督教的确又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和变化,对此,本书都作了及时而适当的补充叙述。可以说,本书是当前最新、最"及时"的基督教会史:它叙述的事件和人物的时限延伸到21世纪初的当代十年。这都是一般"经典的"教会史书所来不及讲述的。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普世主义(ecumenism)精神。这包含两重意义:首先,它摆脱了以前许多基督教史偏重以欧美基督教为中心的倾向。以前许多"标准的"教会史都免不了着重叙述欧美基督教而忽略了"第三世界"的教会,如菲利普·沙夫(Philip Schaff)的八卷本《基督教史》(*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和威利斯顿·华尔克(Williston Walker)的《基督教会史》(*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三次修订,三种汉译本。事实上,19世纪以前的基督教世界的确是以欧美教会为中心。可是自20世纪以来,随着宣教运动的展开,基督教正在向"第三世界"、尤其是向南半球转移发展。相对而言,基督教的"老根据地"欧美教会正在走向衰落,而富有生气的南半球教会正逐步成为世界基督教的重心。冈萨雷斯的这部教会史及时地、生动地反映了这一重要的"重心转移"动向。其次,本书的"普世性"还包括它在神学上的"中立性",它避开了某些现代著作倾向于对近代"福音派"发展的叙述而忽略了对历史上基督教整体的、客观的回顾。这一方面的特点可以通过对几部现代基督教历史著作的比较中看出来。例如,布鲁斯·雪莱(Bruce L. Shelley)的《基督教会史》(*Church*

History in Plain Language)和罗杰·奥尔森(Roger Olson)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史》(*The 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前者的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后者分别由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2002年)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这两部书的作者都是美国当代较明显倾向于"现代福音派"的学者。建议有兴趣和时间的读者不妨对这几部历史书进行对比,作出自己的判断。

最近,赵城艺同工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和授权,将《基督教史》全书上下两卷译成中文,现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对我国学术界和神学院校在基督教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将是一项重大的贡献。我在此郑重推荐:把冈萨雷斯的这两部有关基督教历史的专著作为我国神学院的基本教材;并大胆地建议,将这部《基督教史》作为金陵协和神学院建校六十周年的校庆献礼!

陈泽民(九十五岁)
于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
2012年5月

译者序

2009年初，我开始了这部《基督教史》的翻译。现在回想起来，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得到冈萨雷斯教授授权翻译此书时的狂喜与兴奋，以及即将一人担起这项浩大工程所带来的压力与畏惧，何况我当时还只是一个几乎没有受过任何神学教育的学生。

大约在三年半之前，当我就读于金陵协和神学院时，对于我这个刚刚接触神学不久的门外汉来说，神学是个既陌生又熟悉的领域。我感觉，它每天都在陪伴着我，又深知它似乎总是遥不可及。究其原因，是因为我难以找到一部出色的中文神学入门著作，领我翱翔在神学这片广阔的知识天空。幸运的是，我在不久之后就读到了冈萨雷斯教授的《基督教史》。它引领我穿越时空，从两千多年前的耶路撒冷出发，携手基督教的各色人物，一同见证了基督教的兴衰与荣辱。这是一段惊险奇妙的旅程。它让我深知，教会的历史对于今天与未来的教会是多么重要。

然而，缺乏优秀的神学入门著作并不是我翻译这部《基督教史》的唯一原因。历史会让每一个认真反思历史的人更好地应对现在，思考未来，避免在未来重犯历史中的错误。当我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仔细端详自己时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在历史这面"镜子"中仿佛看到了我们的"前世"与"来生"。历史与现在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们刚刚走过的道路仿佛前人已经走过，前人所站的十字路口仿佛就是我们在脚

下即将决定踏上的道路。正如爱德华·吉本曾经说过的:"我只有一盏引领我脚步的明灯,那盏明灯就是经验。我知道,除了过去,再没有可以判断未来的方法。"

基督教史是令人着迷、引人入胜的历史,也是发人深省的历史。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当曾经毫无权势、坚守耶稣之道的基督徒或主教被前所未有的权力与财富包围时,他们会作何反应?曾经敬虔的基督徒还会为他们的主舍命,成为英勇的殉道士吗?他们还会像以往那样安贫乐道、坚守信仰、一心跟随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吗?数次十字军东征对穆斯林犯下了滔天罪行,当穆罕默德的子孙在耶稣的"敬虔"追随者的铁骑下倒在血泊中时,耶稣的这群追随者还有资格呼求作为全人类救主的耶稣基督吗?一千多年之后,发生在美国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事件会让人们想起中世纪的十字军战士及其所杀害的无辜穆斯林吗?当希尔德布兰德将教宗利奥九世的决罚谕放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高高的圣坛上时,他是正统信仰的所谓斗士,还是一位毫无宽容、难以耐心聆听他人意见的宗教狂热分子?当宗教改革前夕的腐败教宗为了满足私欲而兜售赎罪券榨取劳苦大众的血汗钱时,他们还是耶稣基督在世的代表吗?当路德对德国农民起义前后不一的矛盾态度导致德国贵族大肆血腥镇压德国的农民起义时,他还是那个胆敢对抗腐败的教宗、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勇敢地站在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面前的修道士吗?当异端裁判所的熊熊烈火残酷烧死所谓的"异端"时,当殖民新大陆的伪善基督徒奴役并杀害印第安人与非洲人时,他们还是满有怜悯与慈爱的耶稣的门徒吗?当一场场宗教战争导致人民生灵涂炭时,这还在多大程度上与基督教的信仰密切相关?在这个世俗化进程加速、基督教与其他信仰逐渐被边缘化的时代,基督徒还会找到应对所有这一切的智慧吗?信仰将如何做出回应?信仰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坚信,基督教所面临的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挑

战与回应不仅会启发基督徒,也会令每一位没有基督信仰的严肃读者陷入沉思。

胡斯托·冈萨雷斯教授是耶鲁大学最年轻的历史神学博士,也是当今最具权威的教会历史学家之一。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他致力于拉丁美洲神学与说西班牙语之人的神学教育,并获得了四个荣誉博士学位。他的这部《基督教史》被美国、加拿大和南美洲许多国家的大学与神学院用作教材,甚至在遥远的非洲也被神学生所熟知,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基督教史入门著作。冈萨雷斯教授的这部《基督教史》最早出版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现在已经被译成了韩文、俄文和日文。他根据近年来最新发现的史料与教会史领域中最新的研究成果更新了自己的著作。在去年年底,他的新一版《基督教史》在美国出版问世。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这部《基督教史》是最新的教会史权威著作。

在这部彻底修订与更新的《基督教史》中,备受称赞的著名基督教历史学家胡斯托·冈萨雷斯以简洁生动的笔触讲述了基督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从诞生之初脆弱的基督教到在中世纪取得了世俗与属灵统治地位乃至在宗教改革前夕几乎遍布整个世界的基督教,从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充满了血雨腥风的基督教到其后确立了自己的所谓“正统”并在理性时代备受质疑的基督教,从处于转变的世界局势中的基督教到深受新思潮冲击的基督教,从在取得了巨大的宣教成功之后就陷入了危机的“基督教传统中心地区”的基督教到迸发出新的活力与创造力的曾经作为“基督教边缘地区”的基督教。在追溯基督教两千多年来多变的历史过程中,冈萨雷斯教授巧妙地编排了基督教的史料,生动鲜活地讲述了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各色各样的鲜活的历史人物,形成了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神学争辩,以及深刻影响到教会生活与理念的革命性思想。从耶稣的忠实门徒到早期的伟大教父,从中世纪早期入侵罗马帝国并归信了基督教的“野蛮人”到对基督教

真正构成威胁的穆斯林，从中世纪不可一世的教宗到生活在法国庇护之下的软弱教宗，从为了改变腐败的教会而被其烧死的早期改教家约翰·胡斯到胆敢对抗腐败教宗的修道士马丁·路德，从质疑了所谓“正统信仰”的理性主义者、灵性主义者和敬虔主义者到回应了近现代新知识的新教、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神学家，从否定与谴责现代性的教宗到积极地回应现代新思潮的教宗，从宣教与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中的杰出领袖到今天的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基督徒所取得的惊人进展与不断展现出的活力。

在讲述基督教这些历史的同时，冈萨雷斯教授还结合了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令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到初期基督教的社团生活。在这些考古新发现中，有新发现的诺斯替主义作家的原文著作。这些文献向我们揭示了公元1世纪“各种基督教”丰富的多样性。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一些重要的研究表明了女基督徒在整个基督教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她们对基督教史做出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冈萨雷斯教授还讲述了基督教在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并讨论了21世纪的基督教发生的变化和基督教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此外，这部《基督教史》还囊括了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事件，如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东正教的复兴、女权主义者的神学、美国黑人的神学与第三世界的神学、在教宗本笃十六世任期之内爆发的丑闻与争辩，以及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最后，冈萨雷斯教授富有创见地展望了当今基督教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争辩，以此结束了他的整部《基督教史》。

翻译并不是一个轻省的工作，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其间一定会需要许多人的帮助。借此机会，我要感谢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前任院长陈泽民老教授，他帮助我联系到本书的作者冈萨雷斯教授。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定要经历更多的周折才能联系到本书的作者。正是因为陈老教授的帮助，才令我翻译这部《基督教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完稿之际，我再次拜访了陈老教授，希望他可以为我的拙译撰写一篇序言。令我兴奋与感激的是，已经决定不再为他人撰写序言的陈老教授慷慨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在此，我要再次表达对陈泽民老院长的感激与敬意。感谢本书的作者冈萨雷斯教授授权我翻译此书，也感谢他在我翻译此书的过程中给予我的宝贵鼓励与帮助。每当他称呼我为"基督里的弟兄"时，我就会感到信仰带给我的巨大力量。若是没有他的帮助与鼓励，我会更加辛劳。感谢我的同学严迎，她阅读了我的绝大部分译稿，并提出了极具价值的宝贵意见。同样，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恐怕拙译现在还难以与读者见面。在一本书出版的过程中，编辑的贡献同样是难以估量的。在此，衷心感谢责任编辑邱红女士及其先生徐志跃给予我的巨大帮助，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以及特约编辑李鹿渴的帮助！最后，由于本人的能力与精力有限，难免会在翻译的过程中犯下一些错误，恳请我的前辈与读者批评指正。

今年，金陵协和神学院将举行六十周年校庆，希望这部《基督教史》配算一份礼物，感谢母校三年来对我的栽培与造就。正如冈萨雷斯教授在他的书中所希望的那样，会有他的读者承担起研究基督教史的工作，我也衷心地期盼，会有他的中国读者承担起这份工作。与此同时，我也急切地盼望，会有更多受过神学教育的同道从事翻译的工作，将国外更多、更优秀的神学著作介绍给中国广大的神学生、牧师、基督徒以及对基督教信仰感兴趣的学者与读者。

最后，谨以此中译本献给许灵晓！

赵城艺

2012年4月2日于南京

中文版序

很荣幸，我的这部《基督教史》能被翻译成中文。借此机会，我要感谢《基督教史》译者所付出的辛劳！

作为历史学家，我知道基督教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信仰中的英雄。与此同时，如何在中国这样悠久与优秀的文化中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向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基督徒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基督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鉴于中国在历史上传扬福音的经验，中国的基督教完全可以为基督教在未来的发展、基督教的神学以及宣教方面的实践做出重要的贡献。

然而，令我感到荣幸与欣喜的还不只是这些。历史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可以指导我们的现在，并引领我们走向未来。正是从历史的经验中，我们积累了应对现在的智慧。历史告诉了我们应当避免哪些危险。历史向我们指明了通往未来的道路。如果不了解历史，人类的任何社会团体，无论是教会、国家还是公司企业，都注定要在难以预料的挑战中挣扎前行，并最终失败。今天，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基督徒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在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之前的基督徒也曾应对过类似的挑战。当机遇来临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历史上的基督徒如何利用了类似的机遇。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牢记这两点同样重要。在现实的每一次变迁中，历史都给了我们应对的方法与智慧。

可是，历史也给了我们身份感。这就是国家想要确保孩子学习自己民族历史的原因。如果不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民族身份感往往会逐渐淡化，甚至最终消失。同样，教会中对基督徒的教育必须主要着眼于将我们的历史传授给新一代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基于我们所认为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尤其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生平、死亡和复活。当我们教授并传讲这些事件时，也是在教授和传讲历史。

此外，我们并不是直接了解到基督教的历史。我们了解基督教史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通过一系列从未间断的见证，如人物、著作和历史遗址等。正是这些见证，让我们了解到基督教最早期的历史事件。这就是路加在《使徒行传》中非常在意提阿非罗必须知晓福音是从耶路撒冷沿路传到提阿非罗本人的原因。同样，当今天的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传讲历史上的某些事件，也是在传讲自己通过基督徒们——圣经作者、殉道士、传道人、修道士、宣教士和教师——的漫长历史而了解到的某些东西。也正是通过这些见证人，我们才知道了基督教一些最早的事件。

今天，作为教会的牧师、领袖或教师，我们有责任重新讲述基督教的历史。我们必须讲述那些公元1世纪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初期的历史，也必须讲述那段历史是如何通过圣灵的大能被今天的我们所知晓。因此，今天聆听我们讲述基督教史的基督徒就会知道，他们继承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他们也会自豪地继承这份宝贵遗产，并依之行事为人。

如今，担任教会的领袖并不容易。信仰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有反对我们的运动，也有不断出现的物质诱惑与思潮。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历史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盟友，因为历史教导了我们，我们信仰的先祖也曾面临艰难的挑战，他们找到了应对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仍可能引导今天的我们。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得益于

先祖的信仰和圣灵的大能，即使是他们已经离世，他们仍已得胜。

在信仰上，愿我们与信仰先祖一样坚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在复活的基督里得胜！

胡斯托·L.冈萨雷斯
2012年3月19日

第二版序言

或许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历史需要得到重访、修订和重写；而历史尚在继续。之所以如此，乃因为历史从来就不单单是如其实际发生的赤裸往昔；历史是我们通过现存史料所读出的过去，是由无数代历史学家删选过的往昔，并且是从我们自身的现在与我们所希望的未来予以解释的过去。因此，当我现在再次阅读自己在大约二十五年前写成的《基督教史》时，我发现许多内容值得再次肯定，也有许多内容需要重新修改。本书第一版面世几年后，苏联解体。后来，伊斯兰教复兴，伊斯兰世界之外的人们开始发现，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在世界各地密谋和实施了恐怖主义行动。在基督教内部，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ism）和其他几个类似运动，同时在传统的基督教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发展壮大，并占据了中心舞台。在许多这样的地区，新的宗教兴起，其中有许多是受到基督教启发、并从基督教吸收了一些因素。最终，可能爆发的生态灾难引起各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重视。世界经济秩序的可持续性遭到强烈质疑，而质疑不仅来自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子，也来自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通讯技术也获得迅猛发展。这些进展——还有更多的进展——已经塑造了我们看待过去与未来的方式。因此，对本

书作出修订是十分必要的。

出版这样一部修订版还有另一个难以抗拒的理由，就是我希望把初版后这些年间所收集到的许多意见与建议融合进这部《基督教史》，其中有一些是由阅读和使用英文版《基督教史》的同事提出的，另一些则是源于本书的诸多译本进入了差异性很大的文化——因为翻译过程中暴露了一些在原文中未被直接注意到的含混之处。阅读这部《基督教史》的学生和同事来自广为不同的文化——如日本的、巴西的、俄罗斯的和韩国的，他们拓宽了我就本书应该包含的内容范围。但是，我在这个修订版中并没有融入他们的所有建议（就某个主题而言，有的人希望着墨多些，有的人则希望着墨少些，要同时满足这两拨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深深地感激所有这些人，尤其是那些学生，他们告诉我，我对某个主题的讲述还不够清晰，或某个主题对他们极具启发。在提出宝贵建议的同事中，我必须再次感谢我的妻子凯瑟琳，因为她无比耐心地阅读和重读了我的手稿，并向我提出了明智的建议。我也要特别感谢圣迭哥的伯特利神学院（Bethel Seminary San Diego）教授詹姆斯·史密斯三世（James D. Smith III），因为他的许多详细的建议极大地改进了本书的品质。

在新版面世之际，我也强烈地意识到，它还需要继续修订；随着一代代人成为过去，历史也必须一次次修订。因此，我也衷心希望，当其他的人进入现在与过去之间的精彩对话时，这一修订版会激励他们去进一步修正观点，因为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对话正是历史的本质：在其中，过去向我们说话——针对我们现在的问题来说。

第一版序言

当读者意识到,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这部《基督教史》视为自传性著作时,读者也许会感到诧异。我之所以会如此,首先是因为,正如何塞·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所说,每一代人都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上,就如排列在一个巨大叠罗汉中的杂技演员。因此,讲述我们祖先的历史就是在为我们自己的历史书写一篇长长的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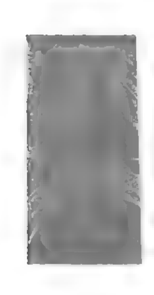
可是,就我将这部《基督教史》视为自传性著作而言,我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因为它涉及和我一起度过三十年光阴的朋友和同道。自从我最初结识爱任纽、阿塔纳修和其他先辈以来,当我研读他们的著作、思索他们的思想与事迹时,他们伴着我一同度过了生活中的风风雨雨。与我同时代的朋友一样,他们有时令我快乐,有时令我困惑,甚至是恼怒。但是,他们仍然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当我为他们著述时,我也意识到,我正在与他们一起书写我的生活。

按照惯例,作者应当在序言中感谢为一部著作的成书做出贡献的人。然而,我发现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不得不列出一个长长的学者名单,其中既有在世的,也有过世的:奥利金、优西比乌、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哈纳克,以及许许多多

抄写和重新抄写手稿的无名修士。

但是，在我的同时代人当中，有两位是我必须提到的。第一位是我的妻子，佐治亚州迪凯特市哥伦比亚神学院的教会史教授凯瑟琳·G. 冈萨雷斯（Catherine G. González）。在过去十年中，她陪伴我与古圣先贤一同走完这段旅程，她对我书稿的阅读和评论是非常宝贵的。对第二位的提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神迹，因为它是我这六年来的住家全职秘书：文字处理器，我靠它制作本书稿。的确，通常在序言中给予打字员的许多赞美之词，也可以献给我的文字处理器：耐心、认真、毫无怨言、始终乐于服务。这位"秘书"一遍遍打出我的手稿，除了偶尔的滴滴声，它的确毫无怨言。但是，就在我即将完稿之际，一场电力故障迫使我再次提笔写作。这就令我想到，我们有时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离奥利金和优西比乌的时代那么遥远！

我将此著公之于世，希望读者享受阅读过程，就如我享受本书的写作。



目录

第一章

导言

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

——《路加福音》2:1

从一开始，基督教的信息就与人类的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基督徒历代以来宣讲的福音是，为了拯救我们，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入了人类历史。历史不仅对理解耶稣的生平至关重要，也是理解圣经全部信息的关键。旧约的大量篇幅是在叙述历史，整本圣经就是讲述上帝在他子民的生活与历史中启示自己的历史。如果没有这段历史，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上帝的启示。

新约的作者十分清楚这一点。《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生于凯撒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路2:2）。就在前几节经文中，《路加福音》将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放在巴勒斯坦历史背景下，记载耶稣基督降生在"犹太王希律的时候"（路1:5）。《马太福音》以耶稣的家谱开篇，将耶稣置于以色列人的历史与盼望之中，随后记载了耶稣的降生日期是"当希律王的时候"（太2:1）。《马可福音》所给出的历史细节较少，但仍然明确肯定，耶稣是在"那时"开始传道，即施洗约翰的年代（可1:9）。作为第四福音书的《约翰福音》，则希望清楚地说明这些事件的永恒意义。因此，《约翰福音》开篇就宣告，在人类历史中

成为肉身的道(约1:14),就是"太初与上帝同在"的道(约1:2)。最后,我们可以在《约翰一书》中读到类似的经文。《约翰一书》开篇几节经文就宣讲,"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的,亲手摸过的"(约一1:1)。

写完《路加福音》之后,路加在《使徒行传》中继续讲述基督教的历史。他这样做并不只是出于古文物研究者般的好奇,而是因为一些重要的神学原因。根据《路加福音》和整部新约的记载,上帝与我们同在并没有因为耶稣升天就告一段落。相反,耶稣亲自应许自己的门徒,他不会撇弃他们,而是另外赐给他们一位保惠师(约14:16—26)。《使徒行传》1章记载,耶稣在即将升天之时告诉门徒,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作耶稣的见证,"直到地极"(徒1:8)。随后所记载的五旬节的一些事件,标志着教会见证生活的开始。因此,通常被称为"使徒行传"的这卷书的主题并不是使徒的事迹,而是借着使徒——和其他基督徒——的事迹来讲述圣灵的事迹。路加留给我们两卷书,一卷记载了耶稣的事迹,另一卷记载了圣灵的事迹。

然而,路加的《使徒行传》似乎并没有结束。在《使徒行传》的末尾,保罗仍在罗马讲道,该卷书并没有告诉我们保罗和其他教会领袖后来的情况。路加这样做是出于神学上的原因,因为路加认为,在全部历史终结之前,自己正在讲述的历史不会结束。

对于同路加有着同样信仰的基督徒来说,这就意味着展现出人类历史全部特征的教会史并不只是某群特殊人物或某场运动的历史,而是一部圣灵的事迹史。在这部圣灵的事迹史中,圣灵借着以往在信仰中逝去的所有基督徒展现出自己的作为。

在教会史展开过程中,也有这样一些片段,我们难以在其中看到圣灵的作为。随着我们的讲述,我们将会看到,一些基督徒利用教会的信仰,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和个人权力;一些基督徒忘记和曲解了爱的诫命,以报复心来逼迫自己的仇敌,那是不配耶稣之名的。有时我们也会看到,教

会背弃了圣经中的信仰，一些基督徒甚至怀疑，这样的教会是否可以被称为真正的“基督”的教会。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最好要牢记两点：

首先，虽然我们是在讲述圣灵的事迹史，但是，圣灵的事迹史是借着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展开的，是我们这些罪人的历史。早在新约时代，这一点就显而易见。在新约中，彼得、保罗和其他一些基督徒既被描述为有信仰的人，也被描述为罪人。如果这样的例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再去看看保罗写下的《哥林多前书》中的那些“圣徒”！

其次，通过罪人和教会——也只能通过他们——我们得知了圣经中的信息。即使是在教会生活最黑暗的年代，也有热爱、研习、保存与抄写圣经的基督徒，正是他们将圣经传承给了我们。

3

但是，早期基督徒留给我们的并不只有圣经，还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历史——在最多变的环境中竭力为信仰作出忠实见证的历史。在遭受逼迫的年代，一些基督徒以血的代价为信仰作出了见证，另一些基督徒用自己的著作见证了信仰，还有一些基督徒以爱心接纳了那些曾一度软弱、随后又悔改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强大的时代，一些基督徒试图利用教会的权势见证信仰，另一些基督徒则对此提出质疑。在充满侵略、战乱和饥荒的年代，一些基督徒试图恢复秩序，以便无家可归的人可以找到避难所，饥饿的人可以得享食物，因为他们希望以此来为主作见证。还有那些在欧洲的基督徒，在得知当时还不为人知的广阔大陆之后，他们涌向那里，传讲自己的信仰。历代以来，有的基督徒以口传笔授为主作见证，有的基督徒以祷告和退离俗世为主作见证，还有的基督徒以不惧武力和宗教裁判所的熊熊烈火为主作见证。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就是这群形形色色、甚至相互矛盾的见证人的后嗣。他们的某些行为可能令我们厌恶，某些行为可能令我们振奋。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论是令我们敬佩的，还是遭我们唾弃的——都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并共同把我们带到了今天。

如果不理解历史，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因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仍活

在我们之中，仍在影响今天的我们，以及我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例如，当我们读到“义人必因信得生”时，马丁·路德正在我们耳边低语，告诉我们该如何解释这句话——即使是对从未听说过路德的人也是如此。当我们听到“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时候，坎特伯雷的安瑟伦正与我们一同坐在教堂的长椅上，即使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安瑟伦是谁。当我们在教堂中站立、安坐或俯伏跪下时，当我们唱起赞美诗，背诵抑或拒绝背诵某个信经时，当我们建造教堂或讲道时，某段我们可能并不知晓的历史正是影响我们当下这些举动的因素之一。有一种观念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像早期基督徒那样阅读新约，传统并不会影响我们对圣经的解释——这样的观念只是一个幻想，也是一个危险的幻想，因为它往往将我们对圣经的解释绝对化，把我们的解经与上帝的道混为一谈。

避免这种危险的一个方法就是去认识那左右我们眼光的往昔，只有意识到有色眼镜的存在，戴着有色眼镜的人才不会认为整个世界被涂上了颜色。同样，如果想要摆脱传统的过度束缚，我们必须先理解这传统是怎样的，我们是如何走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历史中的一些独特因素如何影响到我们对现在的看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自由地选择，有哪些历史上的和现代的因素是我们希望否定的，又有哪些是要肯定的。

4

反之亦然。不仅我们现在的观点受到历史的影响，现在以及我们所预想的未来也会影响我们的历史观。如果将这部《基督教史》与之前的一些教会史著作做一番比较，读者会立即发现一些明显的差异。首先，这部《基督教史》希望确认女性在历代教会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而以前的大多数教会史著作某种程度上都没有这么做。这并不是由于我拥有什么其他人所没有的独到见解，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越来越认识到，女性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对教会的生活。同样，我在此讲述基督教史的方式也显然不同，本书并没有将北大西洋的教会作为这一历史的顶峰。这同样不是因为我拥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只是因为在过去两百年间所发生的一些惊人事件——基督教先是成为一个

真正的普世宗教,后又成为一个越来越不再受北大西洋主宰的宗教。这是任何见到过去几十年相关资料的人都可以轻易得出的明显的结论,正如我们会在这部《基督教史》第二卷中所看到的那样。在一个以前的“宣教区”比“母会”拥有更多基督徒的年代,我们必须站在全球的高度来讲述基督教的历史。在前人看来,这是不必要的,或许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基督教的历史中,今天我们看来似乎是最重要的一些因素,对五十年前的教会历史学家来说或许是次要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研究历史与创造历史合而为一。当研究与解释前人的生活与工作时,我们就是在研究历史。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以现代人的眼光解读历史,而后人将同样会把我们的时代作为历史来解读。从这种意义上讲,无论愿意与否,我们正在以我们的作为与不作为创造历史。这既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机遇,也是一份艰巨可畏的责任,它要求我们为了能够更加忠实地创造历史而去研究历史。教会的每一次复兴和教会史上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是建立在重新解读历史的基础之上。在我们跨入21世纪之后,情况也是如此。

同以往每一个时代一样,基督徒在这个新的世纪也面临着新的、意想不到的挑战。在努力顺服地回应时代挑战时,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因为历史上的基督徒也面临过类似的挑战。早期教会经常受到冷遇,甚至是蔑视。早期教会应对这种文化的经验可以被西方的一些教会借鉴,因为这些教会所处的社会盛行着类似的文化。公元4世纪和5世纪时教会应对各种民族移民的方法可以为今天的我们带来启发,教会我们如何解释与回应自己时代的人口变迁。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家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改教家的敬虔能够激励正在成长中的学者和神学家。19世纪的宣教史也会很好地提醒我们,让我们认清跨文化与跨社会宣教可能面临的陷阱。就这一切而言,过去的历史将照亮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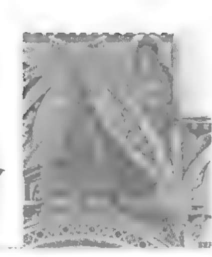
反之亦然,当我们回顾历史与历史事件时,我们总是透过所处时代有着自身关切和盼望的镜片。历史并不是纯粹的过去;历史是从历史学家

的现在来解释的过去。因此，我们对早期殉道士和异端的理解，对古代的修士、牧师、十字军战士和学者的理解，对过去基督徒日常生活的理解，无不被我们现时的镜片印上标记并予以充实。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这一对话吧！

第一部分

初期教会



编年表

罗马帝国皇帝	罗马主教[1]	作家与文献[2]	历史事件
奥古斯都(27BCE-14CE)		(斐洛)	耶稣
提比略(14-37)			
卡里古拉(37-41)			
克劳狄(41-54)		保罗书信 (弗拉维乌·约瑟夫)	犹太人被逐出罗马
尼禄(54-68)	利奴(?)	《马可福音》	逼迫基督徒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逃到培拉(66)
加尔巴(68-69)			
奥托(69)			
维特里乌斯(69)			
苇斯巴芗(69-79)		《马太福音》(?)	耶路撒冷陷落(70)
	阿纳克里图(?)	《路加福音》-《使徒行传》(?)	
提图斯(79-81)			
图密善(81-96)		《约翰福音》(?)	
	克莱门一世	《启示录》	逼迫基督徒
内尔瓦(96-98)			
图拉真(98-117)			
	埃瓦里斯图 亚历山大一世 西克斯图斯一世	伊格纳修	逼迫基督徒
哈德良(117-138)		夸德拉图斯 亚里斯蒂德	逼迫基督徒
	泰莱斯福鲁斯	帕皮亚	
		爱比克泰德	诺斯替主义兴起
		《十二使徒遗训》(?)	

① ※表示不被罗马天主教承认的主教。
② 小括号内的作家为非基督教作家。

罗马帝国皇帝	罗马主教	作家与文献	历史事件
		《希伯来福音》	马西昂来到罗马
	希基努斯	《伪巴拿巴书信》(?)	
安东尼·庇护 (138–161)	庇护一世	巴西里德斯	
		培拉的阿里斯托(130)	
		《黑马牧人书》(约150)	
		波利卡普殉道	
		罗马信仰标志	
		瓦伦廷	
	雅尼塞图斯	《彼得福音》	
		《穆拉多利残篇》(160)	
			孟他努主义
		色塔的弗龙托	
		佩克托里乌斯碑文(?)	
		以赛亚升天(?)	
		《所罗门颂歌》(?)	
马可·奥勒留 (161–180)	查士丁(165)		逼迫基督徒
卢西乌斯与维鲁斯共治(161–169)	索特	赫格西普斯 (154–166)	
		撒摩撒他的卢奇安	
		塔提安	
		《以诺二书》(?)	
	埃莱乌泰里乌斯 (? –189)	阿萨纳戈拉斯	高卢的基督徒殉道 (177)
科莫都斯	安提阿的提阿非罗 (塞卢斯)		
		爱任纽(约180)	
		潘代努斯	西拉诸殉道士
	维克托一世 (189–199)	萨迪斯的美利托 (189)	复活节日期之争
佩尔提纳科斯(193)		德尔图良(195–220)	
狄迪乌斯·朱利安 (193)			

罗马帝国皇帝	罗马主教	作家与文献	历史事件
塞普蒂默·塞维鲁		米努齐乌斯·菲利克斯(?)	
	泽弗里努斯(199－217)		
		阿伯西乌斯碑文	逼迫基督徒
		佩尔培图阿和菲里西塔斯	信仰调和主义政策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200－215)	德尔图良成为孟他努主义者(207)
卡拉卡拉(211－217)			
		奥利金(215－253)	
马克里努斯(217－218)	卡里克斯图一世(217－222)	(普罗提诺)	
埃拉加巴卢斯(218－222)			
亚历山大·塞维鲁(222－235)	乌尔班一世(222－230)	《伪克莱门书信》(?)	
	※希波里图斯(222－235)		罗马出现两位主教
	庞提安(230－235)		奥利金到巴勒斯坦
马克西米努(235－238)	安特罗斯(235－236)		
	法比昂(236－250)		
戈尔迪安一世(238)			
戈尔迪安二世(238)			
普皮耶努斯(238)	塞克斯都·尤里乌斯·阿非利加努斯		
巴尔比努斯(238)			
戈尔迪安三世(238－244)		《多马福音书》(?)	摩尼教诞生
	美多迪乌		
阿拉伯人腓力(244－249)	赫拉克拉斯		
德西乌斯(249－251)		西普里安	逼迫基督徒
霍斯提利安(251)			
加鲁斯(251－253)	柯尔内留斯(251－253)		罗马出现两位主教

罗马帝国皇帝	罗马主教	作家与文献	历史事件
	※诺瓦替安(251－258?)		
埃米利安(253)	卢修斯(253－254)	宗徒规诫(?)	
瓦莱里安(253－259)	司提反一世(254－257)		
	西克斯图斯二世(257－258)		
加列努斯(259－268)			
	迪奥尼修斯(260－268)	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	卢奇安的保罗安提阿主教
		安提阿的卢西安	
	菲利克斯(269－274)	行神迹者格列高利	
		凯撒利亚的费米利安	
克劳狄二世(268－270)		狄奥格诺斯托斯	
昆提卢斯(270)		诺斯替莎草纸文献(?)	
奥勒利安(270－275)		《巴多罗买福音书》	
塔西图斯(275－276)	欧提其安(275－283)		
弗洛里安(276)			
普罗布斯(276－282)			
卡鲁斯(282－283)	卡尤斯(283－296)		
努梅里安(283－284)		阿诺比乌斯	
卡里努斯(283－285)			
戴克里先(284－305)			
马克西米安(285－305)	马尔切利努斯(296－304)		
君士坦提乌一世·克洛卢斯(292－306)		耶里乌斯	大逼迫
加勒里乌(292－311)			《宽容敕令》(311)
马克西米努·达伊亚(305－313)	马塞卢斯一世(308－309)		
君士坦丁一世(306－337)	优西比乌(309－310)		

罗马帝国皇帝	罗马主教	作家与文献	历史事件
塞维鲁(306 – 307)			
马克森狄(306 – 312)	米尔提阿德(311 – 314)		米尔汶桥战役
李锡尼(307 – 323)			《米兰敕令》(313)
	西尔维斯特一世(314—335)		

第二章

时机成熟

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加拉太书》4:4

早期的基督徒并不相信耶稣降生的时间和地点是偶然的。相反，他们认为，在耶稣降生之前的所有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历史环境中，上帝为耶稣的降生做好了准备。教会的诞生也是如此，它源于耶稣的事工。上帝预备了道路，因此，使徒们在得着圣灵的能力之后，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耶稣的见证（徒1:8）。

因此，教会从未脱离它所处的世界。最早的基督徒是公元1世纪的犹太人，他们作为犹太人听到并接受了基督教的信息。后来，基督教信仰被传开，先是在其他犹太人中，后是在罗马帝国内外的外邦人中。若要理解基督教最初几百年的历史，我们必须先来看看基督教得以形成的那个世界。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长久以来，基督教的诞生地巴勒斯坦始终是一片充满了战争与苦难的土地。在古代，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巴勒斯坦所处的地理位置：巴勒斯坦位于连接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与阿拉伯半岛的通商要道的

交界处。如果我们读过旧约就会知道，巴勒斯坦历来被各大帝国所占据，统治者们都对这片狭长的土地垂涎三尺。因此，巴勒斯坦居民经常遭受入侵、奴役和流亡。公元前4世纪，一个新的竞争者进入历史舞台。亚历山大（Alexander）和他的马其顿军队加入了对巴勒斯坦的争夺。在击败波斯人之后，他成为巴勒斯坦新的主人。但是，随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他的庞大帝国也随之分裂成两个王朝：一个在埃及，一个在叙利亚。为了争夺巴勒斯坦，这两个王朝进行了漫长的战争，结果又是一段动荡不安的岁月。

14

同大多数帝国征服者一样，亚历山大也希望为自己的征服寻求意识形态的基础。他并不只想征服世界，也希望通过传播希腊文明来统一和丰富这个世界。希腊文明中的某些元素与被征服文明中的另一些元素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方式融合起来，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希腊化文明（Hellenism）。虽然希腊化文明的确切性质因地而异，但是，它的确为东地中海盆地带来了统一。统一先为罗马人的征服开辟了道路，后为福音的传播扫清了障碍。

然而，许多犹太人并不认为希腊化文明是一种祝福。希腊化文明的部分意识形态是将不同国家的神祇等同和混合起来，因此犹太人认为这会威胁到对以色列独一上帝的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讲，巴勒斯坦从亚历山大征服到耶路撒冷于公元70年被毁这段历史，可以被视为一部持续不断的斗争史：一方面是希腊化的重压，一方面是犹太人忠于自己的上帝和传统。

15

这场斗争的高潮是马加比家族（Maccabees）于公元前2世纪领导了犹太人起义。马加比家族曾一度获得宗教与政治独立。但是，马加比家族的继任者最终屈服在继亚历山大之后统治叙利亚的塞琉西王朝（Seleucids）的希腊化重压之下。当一些更加顽固的犹太人奋起抵抗时，他们遭受到逼迫。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犹太人的抵抗，罗马最终进行了干涉。公元前63年，庞培（Pompey）征服了巴勒斯坦，废黜了马加比家族最后一位统治者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Aristobulus II）。

同之前的亚历山大一样，罗马人也借助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帝国征服行为辩护。他们的口号是教化自己周围的世界——在罗马人看来就是按照罗马的样式建造和美化城市，将它们全部置于罗马人的统治与引导之下。请注意，从语源学上讲，"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可以理解为"城市化"（citification）。在没有城市的地方，罗马人就建造城市。而在古老的城市，罗马人就按照罗马的风格来装饰城市，修建罗马式的公共建筑。

总的来说，罗马人对被征服者的宗教与习俗所采取的政策是相当宽容的。在罗马帝国征服巴勒斯坦之后不久，罗马政府就给予马加比家族后裔一定的权力，并利用他们统治巴勒斯坦，将他们分封为大祭司和总督。公元前40年，大希律（Herod the Great）被罗马人任命为犹大的分封王，他可以说是马加比家族的一个远亲，因为他的妻子是马加比家族的直系后代。

但是，罗马人的宽容并未能调和犹太人的顽固。他们坚持崇拜自己的独一上帝，只要他们的信仰受到一丝威胁，就可能爆发起义。希律服从了罗马帝国的通行政策，建造了用来纪念帝国皇帝的都城凯撒利亚，还在撒玛利亚建造了用来崇拜罗马与奥古斯都的神殿。然而，当他贸然将一只罗马雄鹰放在耶路撒冷圣殿门前时，一场起义爆发了，但随后被他暴力镇压下去。他的继任者们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他们兴建城市，鼓励外邦人移民。

16

这就导致了几乎持续不断的起义。当耶稣幼年时，就爆发了一场反对希律的儿子亚基老（Archelaus）的起义，亚基老被迫请来罗马帝国军队。随后，罗马人摧毁了拿撒勒附近的一座加利利城市，并钉死了两千名犹太人。在《使徒行传》5:36，迦玛列所列举的无益的反抗就是指这次起义。尽管有着如此残酷的镇压——也许正是因为罗马帝国的残酷镇压——激进派或奋锐党却毫不示弱，顽强地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并在公元66年爆发的大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罗马军团再次被请来，于公元70年夺取了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几年后，犹太人抵抗罗马军团的最后一个要塞马萨达（Massada）古堡陷落了，犹太人在英勇地防御之后被

征服。

在这样的苦难与变故中，犹太人的宗教发展出不同的形式，一些犹太教派出现了。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利赛派，这不仅是因为福音书经常提到他们，也是因为后来的犹太教是从这个教派发展而来。他们是普通的百姓，并没有享受到罗马统治和希腊化文明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遵行律法，因此，他们研究并讨论如何在各种可能想到的环境中应用律法。这就导致他们被指责为律法主义者。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可能是事实。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他们正是通过对律法的强调，试图将以色列的信仰与日常生活、与在罗马人的统治和希腊化威胁之下的新环境联系起来。此外，较为保守的犹太人认为，法利赛派的一些教义纯粹是一种发明，如末日的复活和天使的存在。

较为保守的犹太人即撒都该派。总的来说，他们属于犹太贵族，在政治和宗教上都非常保守。就宗教问题而言，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圣殿。在罗马人的支持下，他们牢牢地把持着圣殿，罗马人非常喜欢撒都该派的保守政治观。他们否认法利赛派的许多教义，认为它们都是毫无根据的创新。

这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谨慎，不要夸大耶稣和早期基督徒对法利赛派的反对。基督徒与法利赛派之间的许多冲突是因为他们观点的相似，而不是他们的分歧。比起与撒都该派的接触，游走于普通百姓中的耶稣和他的门徒与法利赛派接触的机会更多。

17 在公元1世纪的犹太教中，还有其他许多教派和团体。我们已经讲过奋锐党。另一个重要教派是艾赛尼派，这是一个禁欲的教派。许多人认为，死海古卷就是他们的杰作。艾赛尼派——也许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教派——试图通过退离俗世来遵行律法。他们通常有着强烈的末世盼望。

另一方面，思想、教派和党派的多样性都不能掩盖所有犹太人的两个基本教义：犹太民族的一神论和他们盼望末世。民族一神论意味着，只存

在一位上帝，正如这位上帝要求人类必须对他进行正确的崇拜一样，他也要求人类彼此之间建立合宜的关系。各教派有可能就这种关系的具体形式产生分歧，但他们却一致认为人在一生中必须崇拜一位上帝。

末世盼望是以色列人信仰中另一个共同的基本教义。大多数犹太人都持有对弥赛亚的盼望，并且坚信上帝最终会帮助以色列复兴，实现和平与公义之国的应许。有的犹太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武力加速这一天的到来。有的犹太人相信，上帝完全掌管着这一切。但是，所有犹太人都在盼望上帝的应许将在未来实现。

在所有这些犹太教派中，唯有最为训练有素的法利赛派在圣殿被毁之后存活下来。他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时期，当时，他们无法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因此，他们的信仰生活必然以律法为中心。公元1世纪数百万背井离乡的犹太人即是这样。他们并不能经常来到圣殿崇拜上帝，因此，他们发展出会堂。在会堂中，犹太人学习以色列的律法和传统，散居各地的犹太人经历到群体生活，增强了自己在流散地仍能作为上帝的忠实子民来生活的决心。圣殿于公元70年被毁之后，撒都该派遭到致命的打击，而法利赛派的神学传统却延续下来，且开花结果，最终发展成现代的犹太教。

散居的犹太人

耶稣降生之前数百年间，生活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从旧约时代起，大量的犹太人生活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他们甚至在公元前7世纪时在埃及建造了一座圣殿，五百年之后又建造了一座。到了耶稣的时代，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都出现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犹太社区。这些犹太人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地，但他们对自己祖先的那片土地怀有强烈的感情，并在信仰上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被称为“散居的犹太人”。

对于基督教的历史来说，散居的犹太人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是新信仰 18

传遍罗马帝国的主要途径。此外，他们无意中也为教会提供了最有效的宣教工具：旧约的希腊文译本。

散居的犹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当中许多人忘记了自己祖先的语言。因此，他们有必要将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自己能看懂的语言——散居在罗马帝国东部的犹太人使用的亚兰语，和散居在罗马帝国西部的犹太人使用的希腊语。在亚历山大征服地中海沿岸地区之后，希腊语成为这片地区绝大多数人的共同语言。埃及人、犹太人、塞浦路斯人，甚至是罗马人，都使用希腊语进行交流。因此，当散居的犹太人开始遗忘希伯来语时，他们自然会将圣经翻译成希腊文。

这部在埃及的主要城市亚历山大开始翻译的圣经被称为"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通常被简称为"七十士译本"。这个名字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一群犹太学者被委派翻译圣经，他们各自进行翻译，但他们最后发现，各自的译本竟然完全相同。这个传说显然是为了证明七十士译本是上帝所默示的。

总之，七十士译本对早期教会非常重要。它被大多数新约作者所引用，并对早期基督教语词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基督"这个名字——七十士译本中"基督"这个名字是从"受膏者"或"弥赛亚"翻译过来的。当早期的基督徒开始宣教时，七十士译本是他们的现成工具，他们用它与那些不接受他们教义的较为传统的犹太人进行辩论，它也成为他们向外邦人传授自己信仰的一个工具。由于宣教和其他一些原因，犹太人也翻译出一些不同于基督徒使用的圣经译本，它们实际上令教会只能使用七十士译本。

19

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被迫接受了希腊化文明，而留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却可以依然持守自己的信仰。在犹太人中，尤其是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中，出现了一场运动，试图证明犹太人的古老信仰与最好的希腊化文化并不矛盾。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有犹太学者尝试以公认的希腊记史方法来重述以色列的历史。但是，这整个传统的顶峰是亚历山大的斐洛

(Philo of Alexandria)所做的工作。他与耶稣是同代人。他试图证明，最好的异教哲学与希伯来圣经并不矛盾。他声称，既然希伯来先知要早于希腊哲学家，那么希腊哲学家的智慧就一定是取自于他们。他认为，这样的吻合之处有很多，因为哲学家的学说在根本上与圣经中的教导一致，差别只在于圣经是用比喻来说话。这反而意味着，必须要用寓意解经的方法来理解圣经。斐洛试图用寓意解经法证明，圣经中的上帝就是哲学家的“太一”(the One)，从本质上讲，希伯来人的道德教导与希腊哲学家最好的道德教导也是一致的。在早期基督徒努力向异教世界证明自己的信仰之可信性时，上述论证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装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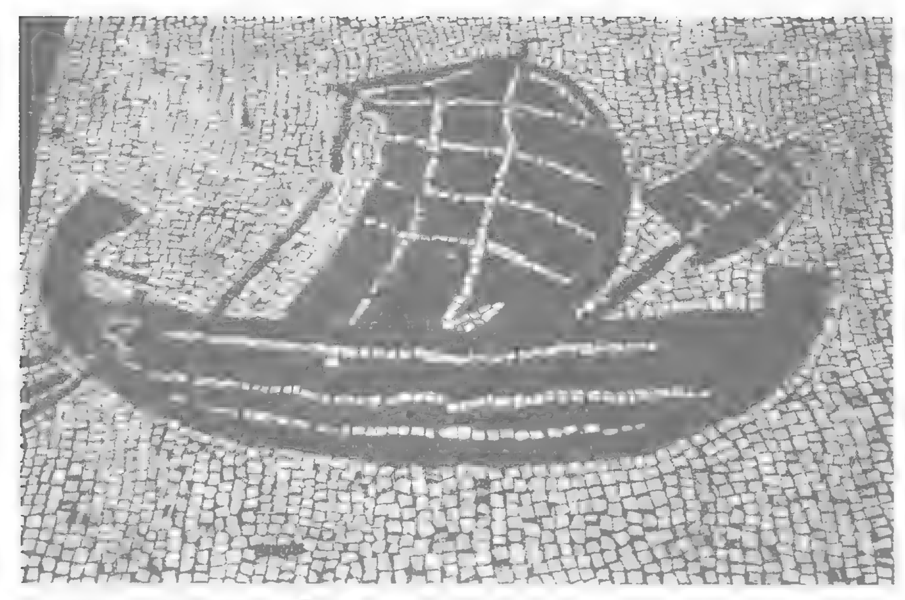
希腊罗马世界

罗马帝国为地中海盆地带来史无前例的政治统一。虽然每一个地区都保留着自己的一些古老法律与习俗，但是，罗马帝国的普遍政策是，尽可能在不动武的情况下促进统一。在这方面，罗马帝国效法了亚历山大的榜样。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因此，早期教会是在罗马法律与希腊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

罗马帝国所带来的政治统一令早期的基督徒可以前往罗马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而不必担心会遇到强盗或局部的战争。当我们读到保罗的宣教行程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对航海的一大威胁是恶劣的天气。但几十年前，更加令人担心的是遇到海盗，而不是风暴。公元1世纪，平坦宽敞且戒备森严的道路已延绵至罗马帝国最远的行省——即使当时大部分贸易和旅行还是通过水路进行的。人们因为繁荣的贸易而频繁出行；因此，基督教经常流传到新的地区，这并不是通过宣教士或传道人，而是通过出行的商人、奴隶和其他一些人。从这种意义上讲，政治环境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

20

然而，这种宽松政治环境的其他一些方面，却对早期的基督徒构成了威胁和挑战。为了取得更大程度的统一，罗马帝国试图通过遵行两条路



罗马帝国的陆路交通系统闻名于世，但大部分远距离的贸易和出行仍是走水路，使用的就是图中这样的船只。这幅镶嵌画是在古罗马港城奥斯蒂亚废墟中发现的。

线来寻求宗教统一：宗教调和主义（*syncretism*）——随意融合各种宗教的不同元素——和皇帝崇拜。

罗马帝国让境内不同地区的臣民相信，虽然帝国的神祇有着不同的名字，但它们终究都是同样的神祇。罗马帝国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帝国各地的众多神祇被搬进了罗马万神殿。有着各种传统与信仰的人穿梭往来于便于基督教传播的同一条陆路和海路。各种传统与信仰在城市的广场和集市混杂同处，以至于人们几乎难以辨清它们的本来面目。宗教调和主义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在这样的氛围中，犹太人和基督徒被视为顽固的狂热分子，因为他们坚持只崇拜自己的上帝。他们被视作一个外来的毒瘤，为了社会的益处必须将他们铲除。

21

当时的宗教调和主义也可以在今天的历史学家所说的"神秘宗教"（mystery religion）中看到。"神秘宗教"并不是基于古代的奥林匹亚神祇，而是以与个人更加密切的神祇为基础。在此之前，人们普遍信奉自己出生地的宗教。但是现在，在被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征服之后，人们可以自

由选择自己想要信奉的神祇。因此，人们并不是因出生地而信奉某个神秘宗教，而是举行仪式加入某个神秘宗教。大多数神秘宗教都基于有关世界的起源、生命的维系和神祇的生活的神话。埃及传来依希斯（Isis）和俄塞里斯（Osiris），他们解释了尼罗河的富饶和繁育力。希腊贡献出从远古时代就在雅典附近举行的祭式。起源于印度和伊朗的密特拉（Mithras）崇拜在军队中十分流行。还有人崇拜起源于闪米特人的众神之母。由于奉行宗教调和主义，这一切很快融合在一起，以至于今天的历史学家很难确定，在哪种背景下形成了哪种教义和习俗。神秘宗教的神祇并不具有犹太人与基督徒的上帝所具有的排他性，因此，加入神秘宗教的许多人得以调和各自宗教中的许多元素。

22 但是，罗马宗教中的另一个因素最终成为逼迫基督徒的肇因，这就是崇拜掌权的皇帝。罗马当局将崇拜皇帝视为维系国家统一与查验臣民是否忠诚的一种手段。拒绝在皇帝像前焚香就表示叛国，至少是对皇帝不忠。当基督徒拒绝在皇帝像前焚香时，他们是在见证自己的信仰；可是，罗马当局却据此判定他们对皇帝不忠与煽动叛乱。

为了能够在希腊化文明中传播自己的信仰，基督徒发现有两个哲学传统极具吸引力，极其有效，那就是柏拉图哲学与斯多葛哲学。

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以腐蚀青年与亵渎神祇的罪名被处死。柏拉图写下为苏格拉底辩护的对话录，公元1世纪时，苏格拉底被视为古代最伟大的哲人之一。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其他许多哲学家批评古代的神祇，并讨论一位完美与永恒的神。此外，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相信灵魂不朽。柏拉图断言，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之上，存在一个更高的永恒真理的世界。早期的基督徒发现，当他们努力回应说他们无知与没有信仰的指控时，所有这些思想都极具吸引力，也都非常有用。虽然这些哲学传统最初被基督徒用来向异教徒解释自己的信仰，但是不久它们就开始影响基督徒自身对信仰的理解——这最终导致了激烈的神学争辩。

23 斯多葛哲学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个哲学流派稍晚于柏拉图哲学，

他们坚持极高的道德标准。早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公元前3世纪的斯多葛派哲学家——是相信万物由火构成的唯物论者。他们也是决定论者,因为他们相信,人类只能训练自己接受那无情地支配着宇宙万物的自然律。但是,到了基督教登上历史舞台时,斯多葛哲学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宗教意义的哲学体系,一些斯多葛派哲学家谈到用自己的智慧去支配事物的进程。不管怎样,所有斯多葛主义者都相信,哲学的目的就是理解、遵守和适应自然律。智者并不是知识丰富的人,而是心灵与宇宙律达到一致以至于受理性支配的人。如果哲学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激情就会消退,他们就会接近理想的情感淡漠(*apatheia*)——没有激情的生活。人类必须培养四种德行:道德洞察力、勇气、自制和公义。这四种德行是智慧生活的不同方面,因此一败俱败。斯多葛主义者也批判当时的宗教,因为在许多斯多葛主义者看来,当时的宗教是那些神祇的崇拜者利用神祇为他们自己欲望开脱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在呼吁培养德行。他们拒斥早期希腊文化所固有的狭隘性,坚持认为理性具有普遍性,并自称是世界公民。

所有这些思想都对基督徒极具吸引力,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宗教与道德的批评很少受到欢迎。教会被许多基督徒称为"新种族",因为教会吸引了各个民族的人,是全人类合一的鲜活见证。很快,斯多葛哲学的自然律是智慧向导的观念就被基督教的护教士和伦理学家所接受,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的生活符合这个规律。当基督徒面对偏见、嘲笑甚至是殉道时,斯多葛哲学的情感淡漠的理想要求他们坚定不移。现在,基督徒也开始采用斯多葛派哲学家曾经用来驳斥诸神的论点。

这就是基督教诞生在其中的世界。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以及罗马帝国制度和希腊化文明,都为新信仰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但是,它们也带来了障碍,甚至是危险。我们将在随后的几章中讲述早期基督徒是如何走上这些道路,克服这些障碍,并应对这些危险的。

第三章

耶路撒冷的教会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

——《使徒行传》4:33

《使徒行传》证实，耶路撒冷最初就有一间强大的教会。但是，这卷书随后开始记载其他一些事件，很少再去讲述这间基督教会后来的历史。新约的其他书卷又提供了一些零散的信息。可是，这些信息主要是关于罗马帝国其他地区的教会生活。然而，若将新约所提供的这些信息与从其他作家那里得来的信息拼凑在一起，我们还是可以大致了解这间最早的基督教会的生活以及它后来的历史。

统一与多样

这间最早的基督教会经常被理想化。彼得在五旬节的坚定与雄辩，往往掩盖了他就如何处理希望加入教会的外邦人这一问题所表现出的犹豫。虽然凡物公用可能值得赞扬，但是它却没有完全消除各个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徒 6:1）。

这节经文并不是指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冲突，因为《使徒行传》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当时的教会中还没有外邦人。这节经文记载的是两群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一群犹太人想要保留自己祖先的习俗与语言，另一群

犹太人更愿意接受希腊化。在《使徒行传》中，第一群犹太人被称为“希伯来人”，第二群犹太人被称为“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为了解决这场危机，十二使徒召开了一次会议，任命了七位执事来“管理这事”。我们并不完全清楚“管理这事”的确切含义，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七位执事将承担起管理教会的工作，而十二使徒将继续讲道和教导。不管怎样，这七位[26]执事似乎都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因为他们都有着希腊人的名字。因此，任命七位执事是尝试给“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在教会事务中更多的发言权，而全部是“希伯来人”的十二使徒仍是主要的教师与传道人。

《使徒行传》7 章讲述了七位执事之一司提反的故事。该章的一处经文暗示，司提反对圣殿的态度并不完全是正面的（徒 7:47—48）。但不管怎样，反希腊化的犹太人所组成的犹太公会拒绝听司提反的话，最终将他判处死刑。这与同一个犹太公会对彼得和约翰的处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在被打之后就被释放了，只是被告诫要停止讲道（徒 5:40）。此外，当逼迫最终爆发，基督徒不得不逃离耶路撒冷时，十二使徒却可以留下。当扫罗去大马士革搜查在那里避难的基督徒时，十二使徒仍在耶路撒冷，扫罗似乎对他们视而不见。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表明，最早的逼迫主要是针对所谓的“希腊化”基督徒，而“希伯来人”的处境要好得多。后来，我们在《使徒行传》12 章中得知，是希律（不是犹太公会）下令处死雅各，逮捕彼得。

就在司提反殉道之后，《使徒行传》开始讲述七位执事中的另外一位：在撒玛利亚建立了一间教会的腓利。后来，彼得和约翰受差遣去监督[27]这个新生教会的生活。就这样，一间教会在犹大境外诞生了。虽然这教会并非由使徒创建，但是它仍然承认使徒的权柄。在新地区建立起来的新教会通常都是采用这种模式。

到了 9 章，《使徒行传》开始更多关注保罗，耶路撒冷教会的信息越来越少了。当时的情况是，希腊化犹太基督徒正在成为一座通往外邦世界的桥梁，大量的外邦人正在加入教会，以至于他们的数量很快就超过了

之前的犹太基督徒。因此,我们这里所讲述的主要是外邦人的基督教,然而我们仍然不应当忘记只是断断续续提到过的最早的耶路撒冷教会。

信仰生活

最早的基督徒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宗教的信徒。他们以前是犹太人,现在仍是犹太人。十二使徒是这样,七位执事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他们的信仰并没有否定犹太教,而是相信弥赛亚的时代已经最终到来。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称自己遭受逼迫的原因是为了"以色列人的指望"(徒 28:20)——即弥赛亚的到来。最早的基督徒并不否定犹太教,而是相信自己的信仰将结束犹太人历代以来对弥赛亚的长久期盼。

因此,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仍在守安息日,仍在圣殿中崇拜。此外,他们还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天聚会擘饼,庆祝耶稣的复活。这就是早期的圣餐礼拜。早期圣餐礼拜的中心并不是耶稣的受难,而是耶稣的得胜,耶稣的得胜已经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几百年以后,基督徒崇拜的中心才转向耶稣的受难。为了庆祝耶稣复活,早期基督徒在圣餐中"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擘饼(徒 2:46)——"诚实"(generous)一词也许是指分享食物。

早期基督徒的确为忏悔自己的罪留出了时间,尤其是每周两天的禁食。这是教会所沿用的犹太人的习俗。但是,至少有一部分早期的基督徒开始在星期三和星期五禁食,而不是像犹太人那样在星期一和星期四禁食。这种改变可能是为了纪念耶稣被卖与被钉十字架。

在早期的教会中,权力主要集中在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教会在稍晚一些才开始强调使徒的权力,这只是努力加强教会内部权力体制的一部分)。在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中,彼得和约翰似乎一直是最重要的,因为《使徒行传》对此有过一些暗示,他们也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教会的两块"柱石"(加 2:9)。 28

可是,教会的第三块"柱石"并不是十二使徒之一。他是主的兄弟雅各。据保罗说,复活的耶稣曾经向雅各显现(林前 15:7)。不管是因为与

耶稣有着血缘关系，还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雅各很快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后来，当教会领袖被一致赋予主教头衔时，据说雅各是耶路撒冷的第一位主教。虽然被冠以主教头衔明显是讹传，但他可能的确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犹太教会的没落

对基督徒的逼迫很快就愈演愈烈，也愈来愈普遍。大希律的孙子希律亚基帕（Herod Agrippa）下令处死约翰的兄弟雅各——不要将他与耶稣的兄弟、教会领袖雅各混淆。亚基帕的这一举动深受自己臣民的欢迎。后来，他又逮捕了彼得，但彼得逃脱了。公元 62 年，另一个雅各——耶稣的兄弟——被大祭司杀害，尽管这并不是某些法利赛派所希望的，也有悖于他们的忠告。

此后不久，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决定迁到培拉（Pella）。培拉位于约旦河以北，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外邦人。这一举动似乎不仅是因为犹太人对耶路撒冷基督徒的逼迫，也是因为罗马人开始怀疑这个新教派的真正性质。当时，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极点。公元 66 年爆发了一场起义，这场起义导致罗马军队在四年之后摧毁了耶路撒冷。基督徒声称自己追随的是大卫的子孙，而大卫的这个子孙却因为自称是犹太人的王而被罗马帝国的官员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初，基督徒由被钉死的耶稣的兄弟雅各领导。雅各去世之后，耶稣的另一个亲戚西门成为他们的领袖。为了消除这一切所引起的怀疑，耶路撒冷的教会决定迁到培拉。但是，对基督徒的怀疑仍然存在。最终，西门也被罗马人杀害，尽管我们并不清楚他是死于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还是死于他自称是大卫的后裔。但不管怎样，这一切的后果是，被犹太人与外邦人双双弃绝的古代犹太教会越来越孤立。到了公元 135 年，尽管许多犹太基督徒回到了耶路撒冷，但他们几乎与其他基督徒没有任何往来，教会的领导权也被迫交给外邦基督徒。

在约旦以北荒无人烟的地区，犹太基督教接触到同样遗弃了正统犹

太教的其他各种犹太教派。由于缺少与其他教会的联系，这些犹太基督徒自行发展，经常受到自己周围许多教派的影响。几百年后，当外邦基督徒屈尊为这个已经被遗忘的犹太教会表达一点看法时，他们只是提到这些犹太基督徒的异端邪说与古怪习俗，几乎没有对其做任何积极的评价。公元5世纪时犹太教会逐渐淡出历史。爱任纽（Irenaeus）在公元2世纪写到的伊便尼派（Ebionites），指的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些犹太基督徒。爱任纽写道：

> 他们行割礼，仍然遵守律法的规定，他们深受犹太教的影响，以至于他们仍将耶路撒冷作为上帝的居所崇拜。[①]

30

与此同时，教会——现在由外邦人所主导——仍在吸引着全罗马帝国的犹太人。教会仍在宣讲自己的信仰成全了犹太教，因此，犹太人应当信奉基督教。与此同时，一些犹太基督徒——甚至是一些外邦基督徒——总是想要以教会领袖难以赞同的方式追根溯源。此外，当时的一些犹太教派也希望在外邦人中赢得信徒，因此就直接与教会展开了竞争。结果，在教会基本上成为外邦人的教会很久以后，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辩论还在继续。许多基督徒撰写论文与讲章驳斥犹太人，其中有许多并不是直接驳斥犹太人，而是针对可能被犹太教所诱惑的基督徒。然而，这些论文和讲章确实在基督徒中激发了反犹太人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将在以后导致罪恶的后果。

① *Against Heresies*, 1.26.2.

第四章

向外邦人宣教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罗马书》1:16

在《使徒行传》中,被称为"希腊人"的基督徒仍是犹太人,他们对希腊文化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他们是在耶路撒冷最早受到逼迫的基督徒,也是最早散居在耶路撒冷附近城镇的基督徒,因此,他们也是最早将基督教信息传到这些地区的基督徒。

宣教的范围

根据《使徒行传》8:1 记载,这些基督徒"分散在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各处"。该卷书 9:32—42 讲到彼得访问了吕大、沙仑、约帕和犹大全地的基督教会。8 章还讲述了腓利在撒玛利亚的宣教、西门玛古斯的悔改信主,以及彼得与约翰对撒玛利亚教会的访问。同时,早在《使徒行传》9 章我们就已得知,一些躲避逼迫的基督徒到了大马士革,这远远超出了犹大地。该卷书 11:19 又告诉我们:"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开始向外邦人宣教,因为《使徒行传》中解释说,他们去那些地方"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

腓利在撒玛利亚的宣教和埃塞俄比亚太监的信主，可能是教会愿意接纳非犹太人的最初迹象。但在《使徒行传》10章所记载的彼得与哥尼流的事件中，这个问题终于摆在面前，这最终令耶路撒冷教会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徒11:18）。我们随后得知，安提阿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结果是耶路撒冷教会派巴拿巴去调查此事，"他到了那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徒11:23）。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这些不同的事件表明，基督教的最早扩张主要是由于那些受希腊思想影响且被迫逃离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作出的见证，同时母会也认可他们在希腊化犹太人和外邦人中所开展的工作。

32

当然，这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有一个问题始终存在：归信基督教的外邦人是否必须遵守犹太人的律法。耶路撒冷的教会在犹豫过后接纳了他们，并且宣告："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徒15:28—29）然而，这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保罗书信中有大量经文表明，有犹太基督徒一度坚持认为，外邦基督徒必须更加严格地遵守犹太人的律法。

33

此外，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大多数最早归信基督教的外邦人并非与犹太教完全格格不入。他们是犹太人所说的"敬畏上帝的人"——他们相信上帝和犹太人的道德教导，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们没有成为"从异教归信犹太教者"，加入犹太人的行列。在《使徒行传》中，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和哥尼流都是敬畏上帝的人。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保罗和巴拿巴受到了犹太人的热情接待，但后来犹太人认为他们太轻易接受"其他敬畏上帝的人"加入上帝子民的行列（徒13）。

保罗的工作

我们不必在此重述保罗的所有宣教旅程，因为《使徒行传》已经用大量篇幅作了记载。我们只需指出，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巴拿巴到大数去

寻找保罗，他们一同在安提阿生活了一年。正是在安提阿，耶稣的追随者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在随后的许多次航海宣教中，保罗先后与巴拿巴和其他基督徒一起将福音传到了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的一些城市以及希腊和罗马。根据一个难以证实的传说，保罗还可能将福音传到了西班牙。

然而，称保罗将福音传到这些地区并不意味着他是第一个将福音传到这些地区的基督徒。《罗马书》告诉我们，帝国首都在保罗到来之前就已经有了一间教会。此外，基督教也已经开始在意大利传播，因为当保罗抵达小港丢利时，那里已经有了基督徒。

因此，我们不应当夸大保罗对基督教早期传播的意义。虽然新约的大量篇幅记载了保罗和他的宣教旅程，但还有许多其他的基督徒在各地讲道。巴拿巴和马可去了塞浦路斯，亚历山大的犹太基督徒亚波罗则在以弗所和哥林多讲道。虽然保罗自己有过“宣讲基督或是出于嫉妒，或是出于敌意”的抱怨，但他还是高兴地看到，“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腓 1:18）。

保罗对早期基督教的形成所做的最大、最独特的贡献并不在于他实际建立了教会，而在于他所写的与建立教会有关的书信，因为他写的书信最终成为基督教圣经的一部分，对基督教会的生活与思想都产生了决定性的、持久的影响。

35 保罗和其他我们知道名字的基督徒在宣教，如巴拿巴和马可。但是，还有无数我们不知道名字的基督徒也在宣教。他们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将自己的信仰与见证带到所有他们去过的地方。有些无名基督徒受到信仰的驱使，像保罗那样旅行宣教。然而，大多数无名基督徒都是商人、奴隶和因为各种原因而需要远行的人，但他们的出行却为基督教信息的传播提供了良机。

最后，当我们说到保罗时，必须指出的重要一点是，虽然他得到了向外邦人宣教的呼召，但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他通常采取的宣教步骤

是:抵达一个新城市之后会先去犹太会堂和犹太社区。他仍然不认为自己是在传讲一个新宗教,而是相信自己正在传讲上帝对犹太人的应许实现了。他的信息并不是犹太人已经被上帝遗弃,而是弥赛亚的时代现在借着耶稣的复活已经到来,因此上帝为外邦人打开了一条成为上帝子民的道路。这一信息对"敬畏上帝的人"极具吸引力,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现在不用行割礼或遵行犹太人的饮食律法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

外邦人教会的增长带来许多变化,尤其是崇拜生活的变化。在基督徒被作为冒牌犹太人赶出犹太会堂之后,他们开始在私人家中聚会,至少会在星期天举行圣餐聚会。但是,他们更加频繁聚会的目的通常是讲道和彼此鼓励,完成一项越来越艰难的使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过基督徒生活。当大多数归信者还是犹太人和敬畏上帝的人时,教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基督教的大部分基本信仰与伦理:崇拜独一的上帝,这位上帝创造了万有,圣洁和诚实从他而来。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外邦人想要进入教会,教会在通过洗礼正式接纳他们之前,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更长时间的教导和培训。就这样,慕道期出现了。作为慕道期的一部分,崇拜被分成两个主要部分:"圣道崇拜"和"圣餐崇拜"。在圣道崇拜中,要阅读与解释大量经文,这既是为了教导已经接受洗礼的基督徒,也是为了教导初信者。随后,尚未接受洗礼的基督徒会被要求离开,留下来的信众继续进行圣餐崇拜。有一些迹象表明,这种崇拜很早就在进行,并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因此,在本书第十一章中,我们会更加详细地讲述早期基督徒的崇拜。

主的使徒:真相与传说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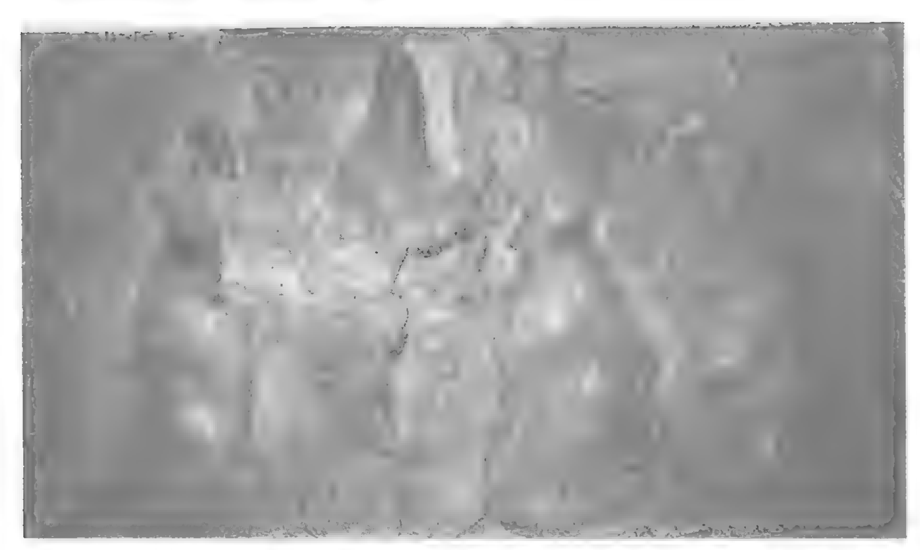
新约没有记载大多数使徒的侍奉生涯。《使徒行传》讲述了约翰的兄弟雅各的死。但在讲过保罗多年的侍奉生涯之后,《使徒行传》戛然而止,只告诉我们保罗还在罗马讲道,等候审判。保罗、彼得和其他使徒后来的情况又是如何?关于使徒的传说出现得很早:有的称这位或那位使

徒曾经在某个地方讲道，有的称某位使徒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殉道。其实大多数传说只是某个城市的某个教会的愿望，因为它们希望自己是由使徒所建立。另有一些传说显然更加可信。

在所有关于使徒的传说中，最可信的是彼得的传说。据说，彼得住在罗马，在尼禄逼迫基督徒期间在罗马殉道。公元 1 世纪和 2 世纪的一些基督教作家似乎都这么认为。我们还得知，彼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个版本说他是被倒着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似乎是《约翰福音》21:18，19 这两节经文所暗示的——否则这两节经文就非常难解。

保罗的情况要更加复杂。《使徒行传》只是告诉我们，他还在罗马讲道。古代的作家认为，他在尼禄统治时期死于罗马——可能是被斩首，因为这与他的罗马公民身份相称。但是，其他作家认为，保罗又进行了几次《使徒行传》所没有记载的旅行，其中就包括去西班牙的旅行。一些作家试图将这两个传说结合在一起。他们提出，保罗在《使徒行传》结束之后与尼禄开始逼迫基督徒之前这段时间去了西班牙。但是，这种解释遇到年代上的难题。我们最多只能说，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保罗在这段时间的情况。

重现约翰晚期的侍奉生涯也很复杂，因为约翰这个名字频繁出现在早期的文献中。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称，约翰在一个滚烫的油锅中被烫死。但是，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启示录》的记载是，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另有一个十分可信的传说称，约翰是以弗所的教师，于公元 100 年左右死于以弗所。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至少有两个基督徒叫约翰，而后来的传说将他们混淆了。公元 2 世纪的一位基督教作家希拉波利的帕皮亚（Papias of Hierapolis）证实，在早期的教会中的确有两个名叫约翰的人：一位是使徒约翰，一位是以弗所的长老，就是在拔摩岛得见异象的约翰。我们可以从他们使用希腊文的巨大差异中明显看出，撰写《启示录》的约翰并不是第四福音书，即普遍所说的《约翰福音》的作者。不管怎样，在公元 1 世纪末的以弗所，的确有一位名叫约翰的教师，他在小亚细亚的所有教会中都享有极大的权威。



关于使徒有许多传说，有称彼得派七位执事到西班牙传福音。图为阿维拉大教堂中的浮雕。

公元2世纪末出现了一种情况，极大地阻碍了希望弄清使徒晚期侍奉生涯的历史学家。当时的情况是：每一个重要城市的教会都开始声称，自己是由使徒所创立。在与罗马和安提阿教会对抗的过程中，亚历山大的教会认为，自己必须要有一位与使徒相关的创立者，于是，马可创建了亚历山大教会的传说便出现了。同样，在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帝国的首都之后，这里也需要一间由使徒创立的教会。因此，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宣称，腓利曾经在拜占庭——后来的君士坦丁堡——讲道。

此外还出现了有关使徒活动的其他传说。这些传说也值得关注，如果不是因为它们的真实性，至少是因为它们流传的程度，以及它们对后来历史的重要性。基督教在西班牙与印度兴起的传说尤其是这样。西班牙的基督徒声称，将福音传到西班牙的不只是保罗，还有雅各和彼得派来的七个特使。关于彼得向西班牙宣教的传说最早出现在公元5世纪，但这个传说并不如在三百年之后出现的雅各到过西班牙的传说那样具有影响力。根据雅各的传说，他曾在加利西亚（Galicia）和萨拉戈萨（Saragossa）传讲福音，但他的传道并不非常成功。在他返回耶路撒冷途中，圣母站在

一根柱子上向他显现，并对他说了鼓励的话。这就是西班牙传统中许多基督徒仍在敬仰的柱子圣母的由来。回到耶路撒冷后，雅各被希律斩首。38 后来，他的门徒将他的遗体带回西班牙的孔波斯特拉（Compostela）。据说，雅各今天还葬在那里。

这个传说对西班牙后来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圣雅各——西班牙文是圣地亚哥（*Santiago*）——成为西班牙的主保圣徒。在与摩尔人（Moors）的战争中，"圣地亚哥"这个名字经常会成为将各个小王国团结在一起的战斗口号。此外，在欧洲人的宗教敬虔和西班牙北方的统一中，到孔波斯特拉的圣雅各墓朝圣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圣雅各骑士团也在西班牙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虽然雅各极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去过西班牙，但雅各到过西班牙的传说仍在西班牙后来的历史中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多马到过印度的传说令基督教历史学家颇感困惑。这个传说最早出现在《多马行传》（*Acts of Thomas*）中，而《多马行传》可能早在公元 2 世纪就已经成书。但是，该书已经被添加了一些令人对整部书产生质疑的传奇故事。该书告诉我们，印度的一位国王冈多法勒斯（Gondophares）正在寻找一位修建宫殿的建筑师，并不是建筑师的多马主动请缨。当冈多法勒斯发现多马将拨给修建宫殿的款项用来救济穷人之后，他将多马关进了监狱。但是，冈多法勒斯的兄弟迦得（Gad）后来从死中复活。复活后的迦得向冈多法勒斯讲述了一座他所看到的华丽天宫，而这座天宫正是用多马救济穷人的钱建造的。后来，冈多法勒斯归信了基督教，接受了洗礼，而多马继续到印度的其他地区宣教，直到最后殉道。

历史学家认为，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令人怀疑，通常并不予以认可，认为整个故事都是虚构的，因为史书根本就没有记载冈多法勒斯这个人或这个故事的其他任何细节。但是，近年来发现的一些铸币证实，印度的确有一位名叫冈多法勒斯的统治者，他也有一个名叫迦得的兄弟。此外，古代印度的确有基督教，印度当时也与近东有着重要的贸易往来。所有这

些事实令历史学家更加难以完全否定多马去过印度的可能性，但这个故事在后来被添加了各种传奇性细节。不管怎样，重要的是，印度在相对较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教会，印度的教会也一直声称，多马是印度教会的创建者。

总而言之，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使徒，尤其是彼得、约翰和保罗，的确进行过旅行宣教，并监督过自己或其他使徒所建立的教会。其他使徒可能也这样做过，如多马。但是，关于使徒旅行宣教的大多数传说后来才出现，当时的基督徒相信，十二使徒一起商议划分了世界，每一个国家或城市的教会也都希望是由使徒所创立。实际上，大部分宣教工作并不是使徒所做的，而是由无数的无名基督徒所开展的，他们出于不同的原因——逼迫、贸易或宣教——带着福音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

39

第五章

与罗马帝国的最早冲突

我知道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

——《启示录》3:8

从一开始，基督教信仰就不是一件安逸的事。基督徒所服侍的主被作为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随后不久，司提反在犹太公会作见证之后被石头打死。后来，雅各被希律亚基帕下令处死。从那时直到今天，一直有基督徒不得不用自己的鲜血为主作见证。

然而，逼迫基督徒的原因和方式多种多样。早在教会生活的最初几十年，逼迫基督徒的原因和方式就有了一定的发展。

一个新的犹太教派

早期的基督徒并不认为，自己信仰的是一个新宗教。他们是犹太人，与其他犹太人的主要差别是：早期基督徒相信，弥赛亚已经到来，而其他犹太人仍在等待弥赛亚的到来。因此，基督徒给犹太人的信息并不是他们应当放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是弥赛亚的时代现在已经到来，他们将成为更加优秀的犹太人。同样，基督徒向外邦人传讲的信息并不是邀请他们信仰一个新生的宗教，而是分享上帝对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应许。外邦人被邀请凭借信仰，而不是借着出身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一邀请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自先知时代以来，犹太人一直相信，弥赛亚的到来

将令万国万邦都归向锡安。对于早期基督徒来说，犹太教并不是敌对基督教的宗教，而是同一个信仰，即使犹太教徒并没有看见或相信先知们的预言已经应验。

在否定基督教的犹太人看来，情况也大致相同。基督教并不是一个新宗教，而是犹太教内部的一个异端派系。我们已经讲过，公元1世纪的犹太教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宗教，而是掺杂着各种不同的派系与观点。因此，在基督教出现之后，犹太人只是将它视为犹太教内部又一个派系。

我们可以这样来更好地理解犹太人对基督教的态度：置身于犹太人的处境，从他们的角度将基督教视为一个新异端；基督徒从一个城镇来到另一个城镇，将好犹太人诱惑成异端。此外，许多犹太人还认为——这是有一定的圣经依据的——他们之所以丧失独立，成为罗马帝国的臣民，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忠于自己祖先的传统。他们担心，这些新异端会再次召来上帝对以色列的震怒。这激起了犹太人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因此，在新约的大部分记载中，正是犹太人在逼迫基督徒，基督徒反而是在罗马当局的保护之下寻求避难。例如，在哥林多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哥林多的一群犹太人将保罗告到方伯（总督）迦流那里，他们指控保罗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上帝。"而迦流回答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徒18:14—15）后来又爆发了一场骚乱，因为一些犹太人声称，保罗将一个外邦人带进了圣殿。一些犹太人想要杀死保罗，是罗马人救了他的命。

因此，罗马人、犹太人和基督徒一致认为，正在发生的是犹太人内部的冲突。只要冲突相对和平，罗马人更愿意置身事外。但是，如果爆发骚乱或是出现任何妨害治安的行为，罗马人就会出面维持秩序，有时还会惩处妨害治安的人。

这项政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ius）在公元51

年左右将犹太人逐出罗马。《使徒行传》18:2 提到了这次驱逐,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其中的原因。罗马的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说,犹太人被逐出罗马的原因是他们"因为克莱斯图斯"(Chrestus)而做出了妨害治安的行为。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克莱斯图斯"就是基督(*Christus*),罗马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基督徒的宣讲在犹太人中引起非常多的骚乱,以至于皇帝决定驱逐犹太人。当时,罗马人仍将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视为犹太教内部的事情。

然而,随着教会从外邦人中赢得的信徒越来越多,犹太人在教会中的比率逐渐下降,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差异也变得更加明显。还有一些迹象表明,随着犹太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最终导致了反抗罗马帝国的起义,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中的外邦人——试图尽可能远离犹太人和他们的起义。结果,罗马当局认识到,基督教是一个与犹太教极其不同的宗教。

43

这一新认识——基督教是一个独立宗教——是罗马帝国从尼禄到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这二百五十年间逼迫基督徒的根本原因。罗马当局与犹太人打过很多交道。当局知道,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说,拒绝崇拜皇帝或其他神祇并不是反叛既定政府,只有政府将自己的神祇强加给犹太人时,他们才会爆发起义。结果,罗马人通常并不期望犹太人会崇拜皇帝。因此,只要基督教还被视为犹太教的一个派系,基督徒通常就不会被要求崇拜皇帝,他们拒绝崇拜皇帝也不会被认为是反叛或反抗,而是宗教信仰上的问题。但是,一旦基督徒显然并不都是犹太人,并且这个新信仰正在帝国各地传播,罗马当局就会要求基督徒像帝国的其他臣民那样,以崇拜皇帝来表示他们的忠诚。

犹太人与基督徒在基督教初期的关系史导致了致命的后果。基督教作为犹太教内部的一个异端派系出现,而犹太教又试图镇压基督教,这可以在新约的不同书卷——还有犹太基督徒的著作——中看到。但是,从此以后,犹太人并没有处在可以逼迫基督徒的地位——实际上,情况恰恰

相反。在基督教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官方宗教之后，一些基督徒宣称，犹太人是被弃绝的民族，他们逼迫犹太人，甚至屠杀犹太人。他们的理由是新约所记载的犹太人对基督教的反对。可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情况。这种态度肯定是自称“因以色列的盼望”而遭受逼迫的保罗所厌恶的。

尼禄的逼迫

凭借自己母亲的阴谋，尼禄于公元 54 年 10 月登上罗马帝国的皇位。最初，他还是一位理智的统治者，并不是完全没有威信，而且他颁布的有利于穷人的法律深受罗马人民的欢迎。但是，他越来越骄奢淫逸，而他身边的朝臣争相满足他的每一个奇思怪想。在他登上皇位十年之后，他被百姓鄙视，诗人和艺术家也对自诩为诗人和艺术家的尼禄极其反感。很快，“尼禄疯了”的传言就不胫而走。

44

这就是公元 64 年 6 月 18 日夜罗马发生火灾的历史背景。当时，尼禄似乎还在几英里之外的安提乌姆(Antium)的宫殿里，他一得到消息，就匆匆赶回罗马组织灭火。他向无家可归的人开放了自己宫殿的花园与其他一些公共建筑。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怀疑正是尼禄——许多人相信他已经疯了——下令将罗马的某些城区付之一炬。大火烧了六天七夜，随后又断断续续烧了三天。罗马十四个城区中的十个城区被大火烧毁。苦难中的人民要求严惩纵火犯。传言很快就出现了——在许多史书中一直流传到今天：尼禄下令烧毁罗马，以便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重建罗马。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很可能在场。他记录下当时流行的一些传言，但他似乎更倾向于相信大火是在一间油仓中意外燃起的。

人们越来越怀疑尼禄。人们开始传说，他在火灾发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呆在帕拉廷宫(Palatine)的一个塔楼顶上，他扮成演员，弹着竖琴，歌唱特洛伊被毁的故事。后来的传言是，专横的诗人尼禄下令放火烧毁罗马，以便大火可以带给他灵感完成一部伟大的史诗。尼禄试图消除这些

45

猜疑，但很快就显而易见的是，他难以做到，除非他能够找到可以指控的人。在没有被大火烧毁的两个城区，住着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因此，皇帝决定嫁祸给基督徒。

塔西佗是这样说的：

> 尽管有人为的措施、皇帝的慷慨赐赠和各种平息神怒的献祭，但这些都不足以平息人们对尼禄的猜疑，也不足以摧毁尼禄下令放火的流言。因此，为了辟谣，尼禄便将罪名加给因为作恶多端而受到憎恶的基督徒，并用各种残酷至极的手段惩罚他们。他们的创始人基督在提比略（Tiberius）当政时期便被彭提乌斯·彼拉图斯（本丢·彼拉多）处死了。虽然这种有害的迷信曾一度受到抑制，但是，不仅在这一灾害的发源地犹太，也在帝国首都——世界上所有可怕的或可耻的事情都集中在这里，并且十分猖獗——它再度流行起来。起初，尼禄将那些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逮捕起来。根据他们的供述，又有许多人被定罪，但是，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纵火，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憎恨。[①]

塔西佗的这段话极具价值，因为它们是现存最早的表明异教徒如何看待基督徒的文字记录之一。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清楚地读出，塔西佗并不认为是基督徒在罗马纵火。此外，他也并不赞成尼禄的“残酷至极”。但是，这位优秀且有修养的罗马人仍然相信传言中基督徒的“作恶多端”与“对人类的憎恨”。塔西佗和当时的其他作家并没有详细地说明所谓的“作恶多端”是指什么。公元 2 世纪的作家则说得更加清楚。但不管怎样，塔西佗相信传言，并认为基督徒憎恨人类。当时的所有社会活动——戏剧、军队、古典文学和体育——都与异教崇拜交织在一起，而基督徒通

① *Annals* 15.44.

常认为必须避免这些活动。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对基督徒"憎恨人类"的指控。因此，在像塔西佗这样热爱自己的文化与社会的罗马人眼中，基督徒似乎就是"憎恨人类"的人。

塔西佗接着说：

> 在处死基督徒之前，尼禄还用他们来娱乐大众。一些基督徒被披上野兽的皮，然后被狗撕裂而死；或是把他们钉上十字架，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就被点燃当作黑夜照明的灯火。尼禄提供自己的花园作为游览之所，他还在自己的竞技场举行比赛，他自己则穿着驭者的服装混在人群中，或是站在自己的马车上。虽然基督徒的罪行完全当得起这种极其残酷的刑罚，但他们依旧引起人们的怜悯，因为人们觉得，他们并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被杀，而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残暴。[2]

46

在没有对基督徒表现出丝毫关爱的同时，这位异教历史学家再次表明，皇帝对基督徒的逼迫是不公平的，是他自己的奇思异想在作怪。这段文字也是少数存留下来的异教徒的证词，能够证明早期的殉道士所遭受的残酷逼迫。

我们难以知道尼禄逼迫基督徒的范围。公元1世纪末与2世纪初的基督教作家回忆了那段恐怖的岁月。彼得和保罗很可能也在尼禄的逼迫中殉道。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发生在罗马之外的逼迫。因此，尼禄对基督徒的逼迫虽然极为残酷，但很可能只局限于帝国的首都

虽然基督徒最初被指控纵火，但是，他们很快就只因身为基督徒——以及因与这个名字有关的一切所谓的"作恶多端"——而继续遭受逼迫。古代的作家告诉我们，尼禄颁发过敌对基督徒的法令。但是，即使真的有过这样一个法令，今天也散失了。

---

② *Annals* 15.44.

公元68年，尼禄被一场获得了罗马元老院支持的起义所废黜。他自杀了。逼迫停止了，但却没有人采取任何行动来废除尼禄所颁发的每一项敌对基督徒的法律。随后是一段政治动乱的年代，以至公元69年被称为“四帝之年”（Year of the Four Emperors）。苇斯巴芗（Vespasian）最终控制了政府，在他和他的儿子提图斯（Titus）统治期间，基督徒基本上没有受到政府的逼迫。

图密善的逼迫

图密善（Domitian）在提图斯之后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最初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基督徒。我们不清楚他最终敌对基督徒的原因。不过他敬重罗马的传统，并试图复兴它们。基督徒否定罗马的神祇与许多传统，他们妨碍了图密善的梦想，这可能是导致逼迫的原因之一。

图密善也给犹太人制造了麻烦。圣殿于公元70年被毁，因此，图密善决定，所有犹太人必须将本该每年送往耶路撒冷的供奉移交到帝国国库。一些犹太人拒绝服从命令，而另一些犹太人送去了奉献款，但同时表明，罗马不会取代耶路撒冷。图密善的回应是，针对犹太人颁布了严厉的法律，坚持以更加苛刻的条件索要奉献款。

47

当时，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差异在帝国官员的心中并不明显，因此，他们开始逼迫所有遵行“犹太习俗”的人。新逼迫就这样开始了，而这次逼迫似乎既是针对犹太人，也是针对基督徒。

同尼禄的逼迫一样，图密善逼迫基督徒的严重程度在罗马帝国各处也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只有当时爆发在罗马和小亚细亚的逼迫是可信的。

弗拉维乌·克勒蒙斯（Flavius Clemens）和他的妻子弗拉维娅·多米提拉（Flavia Domitilla）被处死，而他们可能是图密善的亲戚。他们受到的指控是“无神论”和“遵行犹太人的习俗”。基督徒崇拜一位无形的上帝，因此，异教徒经常控诉他们是无神论者。因此，弗拉维乌·克勒蒙斯和弗

拉维娅·多米提拉的死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是这次逼迫中仅有的我们知道名字的两位罗马殉道士。但是,一些古代的作家证实还有许多其他殉道士,罗马的教会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克莱门一书》(*First Clement*)中说:"持续不断与意想不到的罪恶已经临到了我们。"

在小亚细亚,这次逼迫促成了《启示录》的成书,因为它的作者被流放到拔摩岛。有迹象表明,许多基督徒惨遭杀害,此后,小亚细亚的好几代教会都还记得图密善统治时期的这次试炼。

同新约其他书卷相比,成书于逼迫时期的《启示录》对罗马表现出的态度更加消极。保罗曾经教导罗马的基督徒要顺服掌权者,称掌权者的权力是上帝所授予的。但是现在,拔摩岛的这位先知将罗马说成是"一个大淫妇……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启 17:1,6)。此外,《启示录》中所盼望的天国之城对应着现世的世俗之城;与罗马之城、"巴比伦大城"或"大淫妇"形成鲜明的对比,基督徒应当指望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因为上帝会在其中擦去基督徒的所有泪水。

幸运的是,当逼迫爆发时,图密善的统治行将结束。同尼禄一样,图密善越来越被认为是暴君。他的仇敌密谋反叛他,他在自己的宫中被谋杀。罗马元老院随后宣布,他的名字应当在所有铭文中被抹去,以消除人们对他存有的任何一丝记忆。在这一方面,他的仇敌成功了,因为史书长久以来将图密善描述成一个渴望权力与梦想成为神祇的疯子。基督教历史学家对此也做出了贡献,因为他们认为,所有逼迫基督徒的人一定都是暴君和疯子。今天,历史学家正在为图密善正名,认为他是一位相对较好的统治者。至于基督徒,在图密善倒台之后人们似乎并没有再注意他们,因此,他们过上了几年相对和平的生活。

第六章

公元2世纪的逼迫

现在，我开始成为一个门徒……让烈火与十字架临到我吧，让成群的野兽扑向我，折断我的骨头，肢解我吧……只要让我得到耶稣基督。

——安提阿的伊格纳修

自尼禄统治时起，罗马帝国就已经开始逼迫基督徒。但我们对公元1世纪时逼迫的细节知之甚少。到了公元2世纪，关于逼迫的记载多了起来，令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逼迫中的问题，以及基督徒对殉道的态度。在这些记载中，最为生动的是《殉道记》，它们讲述了各位殉道士的被捕、受审和殉道。其中一些记载了审判的许多可信的细节，似乎是从法庭的官方记录中摘取出来的——至少其中一部分是这样。我们有时得知，作者亲眼目睹了殉道士的受审与殉道，而历史学家也倾向于相信他们的确在场。另一方面，还有许多所谓的《殉道记》显然是在很久以后写成，并不足以为信。但不管怎样，内容属实的《殉道记》是早期基督教最为珍贵、最鼓舞人心的一些文献。其次，我们也通过其他基督徒的著作了解到早期基督徒对殉道的态度。在这些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也许是年迈的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修（Ignatius of Antioch）在殉道途中写下的七封书信。最后，公元2世纪又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罗马帝国对基督教这个新生信仰的态度。就这一点而言，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与图拉真（Trajan）的通信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小普林尼与图拉真的通信

公元111年，小普林尼被任命为今天土耳其北海岸的比希尼亚（Bithynia）的总督。从许多资料来看，小普林尼似乎是个公正的人，十分尊重罗马的法律与传统。但在比希尼亚，他不得不处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希尼亚有许多基督徒——实际上多得让小普林尼发现，异教神庙几乎已经荒废，出售献祭动物的卖家很难找到买家。当有人给这位新任总督送去一份基督徒名单时，他开始了调查，因为他知道，基督教是违法的宗教。

50

小普林尼开始审讯被带到自己面前的被告，从而得以了解基督徒的信仰与习俗。许多被告宣称，自己并不是基督徒，而另一些被告说，虽然曾经信仰基督教，但现在已经不信了。小普林尼要求他们向帝国的神祇祈祷、在皇帝像前焚香、咒骂基督——他听说这些是真基督徒绝对不会做的。一旦他们满足了这些要求，他就释放他们。

那些坚守信仰的基督徒又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小普林尼的惯例是：给他们三次放弃信仰的机会，同时威胁处死他们。如果他们拒绝，他就将他们处死，但并非因为他们是基督徒，而是因为他们顽固不化。如果他们是罗马公民，他就依法将他们送往罗马。

然而，小普林尼自认为是个公正的人，因而觉得必须查清基督徒除了顽固不化之外还犯了什么罪。可是，他只能查出，基督徒在黎明之前聚会，一起"像赞美一位神祇那样"唱歌赞美基督，他们共同宣誓不偷盗、不奸淫和不犯任何诸如此类的罪。他们还经常聚在一起进餐，但在罗马帝国明令禁止秘密聚会之后就停止了。小普林尼并不十分相信这就是全部真相，因而严刑拷问了两位女执事。但是，她们只是证实了他已经知道的事实。

那么，问题是，基督徒应当因为具体的罪行而受到惩罚，还是因为有了"基督徒"这个名字就应当被视为犯罪？小普林尼不知道该采取什么

政策,因此停止了审讯,写信向皇帝图拉真请求进一步指示

图拉真的答复非常简短。他认为对基督徒的惩罚,并没有适用于所有情况的通行法规。一方面,就基督徒的罪行性质而言,还不至于要让国家浪费时间去调查。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受到指控,并拒绝放弃信仰,他们就应当受到惩罚。愿意崇拜其他神祇的基督徒将被赦免,不再深究。最后,国家不予审理匿名的指控,因为这类指控是一种糟糕的法律先例,"与这个时代并不相称"。

大约一百年后,一位具有法律头脑的北非基督徒德尔图良(Tertullian)驳斥了这项当时仍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他对这项法令的不公正提出了质疑:

51

> 这判决必定令人费解!你们拒绝调查基督徒,仿佛他们是无罪的。你们又下令处罚基督徒,仿佛他们是有罪的。你们赦免了基督徒,但是,你们的赦免又是残酷的。你们既然赦免了基督徒,为什么又要惩罚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耍避开指控基督徒的把戏呢?如果你们想要定罪,为什么又不去调查?如果你们不去调查,为什么又不宣布基督徒无罪?[3]

然而,虽然图拉真的决定看似缺乏逻辑,但却不乏政治意义。他当然明白小普林尼说的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只是基督徒,并没有对社会或国家犯下任何罪行。因此,国家的资源不应当浪费在调查他们上面。但是,基督徒一旦受到指控,并被带到官员面前接受审讯,他们就不得不崇拜帝国的神祇,或者接受惩罚。否则,帝国法庭将丧失权威。换句话说,基督徒并不是因为犯下了被带来接受审讯的罪行而受到惩罚,而是因为他们看似藐视罗马法庭。公开拒绝崇拜帝国神祇与皇帝的基督徒必须受到惩

③ *Apology* 1.2.

罚，原因有两个：第一，这是法庭的尊严所要求的；第二，拒绝崇拜皇帝，似乎是在否定皇帝统治的权利。

图拉真在答复小普林尼时草拟的政策，在他去世很久以后还在比希尼亚及其以外的广大地区施行。在整个公元2世纪和3世纪的部分时间里，帝国的政策都是无需调查基督徒，但只要他们被指控、带到官员面前，他们就要受到惩罚。这种情况甚至早在小普林尼与图拉真的通信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可以从伊格纳修撰写七封书信的背景中看出。

上帝的信使：安提阿的伊格纳修

大约在公元107年，年迈的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修被罗马当局判处死刑。其时，罗马正在筹备一场庆祝军事胜利的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因此，伊格纳修被押往罗马，他的殉道被用来娱乐大众。他在殉道途中写下了七封书信，它们是我们了解早期基督教最有价值的一些文献。

伊格纳修可能生于公元30年或35年左右，殉道时已经七十多岁。他在书信中经常自称是“上帝的信使”，仿佛这就是他为人所知的称呼——这也表明，他在基督徒中极受尊敬。很久以后，通过对伊格纳修书信中的希腊文略做改动，人们开始称伊格纳修为“上帝所生的人”，从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传说：他是被耶稣抱起、带到自己门徒中的那个孩子。不管怎样，到了公元2世纪初，伊格纳修已经在所有教会中享有巨大的威望，因为他是最古老的教会之一安提阿教会的主教（使徒之后的第二任主教）。

52

关于伊格纳修的被捕和受审，我们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是谁控告了他。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信中清楚地看到，安提阿有一些派系斗争，这位年迈的主教坚决反对被他视为异端的那些人。但是我们并不清楚控告他的是异教徒，还是因信仰分歧而想要除掉他的基督徒。总而言之，伊格纳修因某种原因被捕、被审判，并被判处在罗马执行死刑。

在前往罗马的途中，伊格纳修和押送他的士兵路过了小亚细亚。小

亚细亚的许多基督徒前来探望他，而伊格纳修也可以接见他们，与他们谈话。他甚至可以让一个与他在一起的文书代写他口述的书信。伊格纳修可以接见那些显然与他受到同样罪行指控的基督徒，由此可见当时并没有在全帝国范围内对基督徒的普遍逼迫，而只有被带到法庭的基督徒才被定罪。

伊格纳修的七封书信就是这几次探视的结果。他接待了马格内西亚(Magnesia)教会的主教、两位长老和一位执事，特拉莱斯(Tralles)派来主教波利比乌斯(Polybius)、以弗所派来以主教阿尼西母(Onesimus)为首的代表团——这个阿尼西母很可能就是保罗在写给腓利门的书信中提到的那个阿尼西母。伊格纳修在士每拿(Smyrna)分别给这些教会写了书信。后来，他在特罗亚(Troas)又写了三封信：一封写给士每拿的教会，一封写给士每拿教会的主教波利卡普(Polycarp)，第三封写给非拉铁非的教会。但是，就帮助我们理解公元2世纪的逼迫与殉道的本质而言，最重要的是伊格纳修在士每拿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

53 伊格纳修不知怎么听说，罗马的基督徒正在想办法救他免于死亡。他并不赞成此举。他准备以血见证自己的信仰，罗马基督徒想要救他的任何举动都将成为他实现自己目标的障碍。因此，他写信给他们说：

> 我担心，你们的善意会对我有害。你们可能会实现自己的计划。但是，如果你们不顾及我的请求，我将很难到上帝那里去。[4]

伊格纳修接着说，他的目的是效法自己的上帝耶稣基督的受难。随着他面临最终殉道，伊格纳修相信，自己开始做门徒了；因此，他希望从罗马基督徒那里得到的，只是他们的祷告，而不是救他免死，而这样，他就可以拥有面对每一次试炼的力量：

---

④ Ignatius, *Romans* 1.2–2.1.

……因此，我不仅能被称为基督徒，也表现得像基督徒……我的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不再迷恋可朽坏的食物……而是渴望品尝上帝的粮，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渴望喝到他的血，那是永恒的酒……当我受苦时，我将在耶稣基督里得自由，与他一同在自由中复活……我是上帝的麦子，被野兽的利齿碾碎，因此，我可以被作为基督的纯洁之饼献上。[5]

伊格纳修之所以愿意如此勇敢地面对死亡，是因为他这样做可以成为主的见证：

如果你们对我保持沉默，我将成为上帝的话语。但是，如果你们让自己被对我肉体的爱掠去，我将仍只是一个人的声音。[6]

随后不久，士每拿的主教波利卡普写信给腓立比的基督徒，向他们询问伊格纳修的消息。虽然腓立比基督徒的回信已经遗失，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伊格纳修在抵达罗马不久之后就如愿以偿地殉道了。

波利卡普

尽管我们对伊格纳修的殉道知之甚少，但是，我们对波利卡普的殉道却了解很多。他是伊格纳修的朋友，比伊格纳修年轻，大约晚于伊格纳修五十年殉道。那是公元155年，图拉真为小普林尼草拟的政策还在施行：无需调查基督徒，只要他们受到指控，并拒绝崇拜帝国的神祇，他们就必须受到惩罚。 54

通过一位自称是见证人的作家，我们了解到当时发生在士每拿的一

⑤ Ignatius, *Romans* 1.2-2.1.
⑥ Ignatius, *Romans* 1.2-2.1.

此事情。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有一群基督徒被带到官员面前，他们拒绝崇拜神祇，在最为残暴的酷刑之下，仍然坚定信仰。我们得知，他们因为“信靠基督而轻看俗世的痛苦”。当一位年迈的基督徒格马尼库斯(Germanicus)被带来接受审讯时，他被告知应当考虑自己的高龄，放弃信仰，而不是接受酷刑与死亡。他回答说，他根本就不想活在这个刚刚亲眼目睹不公之事正在发生的世界。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他高呼让野兽扑向自己，杀死自己。这个英勇的举动进一步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他们开始高喊：“处死无神论者！”（指不信奉有形之神的人）“把波利卡普带来！”

当年迈的主教波利卡普得知政府正在搜查他时，他听从了自己所牧养的基督徒的建议，躲藏了几天。但是，在转移到另一个藏身地后，他还是被发现了。此时的波利卡普认定，自己的被捕是上帝的旨意。他决定不再逃跑，平静地等待着追捕他的人。

主持审讯波利卡普的总督试图说服他崇拜皇帝，并力劝他考虑自己的高龄。当他拒绝时，法官命令他高喊：“无神论者，滚开！”波利卡普指着自己周围的人群回答说：“是的。无神论者，滚开！”法官再次要求他喊出这句话，并许诺如果他以帝国皇帝的名义起誓和咒骂基督，他就会被释放。但是，波利卡普回答说：“我已经服侍了他八十六年，他从未亏待过我。我怎能咒骂拯救我的王？”

对峙还在继续。当法官威胁要活活烧死波利卡普时，他只是回答说，法官燃起的烈火不过转瞬即逝，而永恒之火将永不熄灭。我们最后得知，当波利卡普被绑到火刑柱上时，他仰头向主高声祈祷：

> 主啊，至高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视我配得这一刻，因此，与你的殉道士一起，我可以在基督的杯中有份……为此……我赞美你，荣耀你。阿们。[7]

---

⑦ *Martyrdom of Polycarp* 14.

许多年前，安提阿的伊格纳修曾就波利卡普的主教职责给这位年轻的主教提过建议，并劝告他必须坚守自己的信仰。现在，波利卡普向世人证明，自己完全听从了伊格纳修的建议，当之无愧地效法了他的榜样。

在全部记载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波利卡普在得知自己正被搜查时逃跑了，而且还藏了起来。我们在同一份文献中还得知，一个叫昆图斯(Quintus)的人主动去殉道，但在最后一刻他软弱了，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这对早期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相信，殉道并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上帝拣选某人去做的事情。被拣选者会得到与他们一起受苦的基督加添的力量，从而能够坚定不移。他们的坚定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作为，而是上帝的作为。另一方面，自告奋勇、主动殉道的基督徒——"自发的殉道士"——则是假殉道士，基督会遗弃他们。

55

然而，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赞同《波利卡普殉道记》(*Martyrdom of Polycarp*)的作者。在整个逼迫期间，偶尔仍会有自发的殉道士。而且，他们也坚定到最后，并赢得了许多人的赞扬。这可以在当时的另外一份文献、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the Martyr)的《护教篇》(*Apology*)中看出；我们在其中得知，在对某个基督徒的审讯中，另外两个基督徒主动为他辩护，结果三个基督徒全部殉道。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查士丁丝毫没有向我们暗示，两位自发殉道士的殉道不及最初受到指控的那位基督徒的有效。

马可·奥勒留的逼迫

公元161年，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是那个时代最开明人士之一。他不像尼禄和图密善那样迷恋权力与虚荣。相反，他是个儒雅的人，为后世留下一部《沉思录》(*Meditations*)。《沉思录》是奥勒留为自己而著，也是史上的文学名著之一。在《沉思录》中，他表达出自己统治庞大帝国的一些理想：

> 每时每刻都要坚定地思考，既要像一个罗马人，也要像一个人，

> 赋有完整而朴实的尊严，怀着友爱、自由和正义之情去做摆在你面前的事情。你要努力地忘记其他的一切。你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都要像它是最后的行为，排除对理性命令的各种冷漠态度和强烈厌恶，排除所有虚伪、自爱和对命运的那一份不满之情。[8]

在这样一位开明皇帝的统治之下，基督徒似乎有望过上一段相对和平的生活。可是，就是这样一位表达出如此崇高治国理想的皇帝也下令逼迫基督徒。在自己的《沉思录》中，奥勒留只有一次提到基督徒，他赞扬了这些愿意弃绝自己肉体的灵魂："在必须与自己肉体分离的时刻，他们随时准备这样去做，而不是苟且偷生。"但他接着又说，这种态度只有当它是出于理性——"而不是像基督徒那样，出于顽固不化"——时才值得赞扬。

此外，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这位开明的皇帝也是个迷信的人。他总是征求预言家的建议，在每次重大行动之前总是向神祇献祭。在他统治的初期，战争、洪水、瘟疫和其他各样灾难似乎永无休止。很快就有人做出了解释：基督徒是罪魁祸首，因为他们惹怒了神祇，导致神祇降怒于帝国。我们难以确定，奥勒留是否真的相信这种解释；但是，不管怎样，他完全支持逼迫基督徒与复兴古代宗教。他也许同小普林尼一样，最讨厌基督徒的顽固不化。

56

最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次逼迫的文献，讲述的是寡妇菲里西塔斯(Felicitas)和她七个儿子的殉道。菲里西塔斯是个委身教会的寡妇——即将自己的全部时间用来服务教会，及由教会供养的妇女。她的侍奉令一些异教祭司决定将她告到政府，以结束她的工作。罗马长官试图通过威逼利诱劝说她放弃信仰，但她回答说，他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我活着，我将战胜你；如果你杀死我，我更会以我的死战胜你"。随后，罗马长官又试图说服她的七个儿子。但是，她鼓励他们要坚定，不要在最可怕的威胁

⑧ *Meditations* 2.5.

面前退缩。最后,审讯记录被呈交给马可·奥勒留,而他下令在罗马的不同城区处死他们——也许是为了平息各位神祇的愤怒。

这次逼迫中的另一位殉道士是查士丁。他可能是当时最优秀的基督教学者,在罗马创立了一个学院,教授他所说的"真哲学"——基督教。在殉道前不久的一次公开辩论中,他驳倒了一位著名的异教哲学家,有迹象表明,就是这位哲学家控告了他。不管怎样,查士丁在罗马殉道——但关于他殉道的记载在很久以后才出现,因此,其中的细节受到了质疑。

高卢的里昂与维埃纳(Vienne)的教会写给弗里吉亚(Phrygia)和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的一封书信,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次逼迫。在里昂和维埃纳,基督徒最初似乎只是被禁止去公共场所。但是后来某一天,群众开始在街上尾随基督徒,向他们喊叫,投掷杂物。最后,一些基督徒被捕,被带到总督面前受审。有个叫伊帕戈苏斯(Epagathus)的人从人群中走出,主动为基督徒辩护。当被问到他是否也是基督徒时,他承认了,随即他也成为了被告。

这封书信的作者解释到,逼迫"就像一道闪电",突如其来,所以许多基督徒还没有做好准备。一些基督徒软弱了,"就像早夭儿离开了教会的子宫"。

然而,其他基督徒却坚定不移,这反而令总督和群众更加怒不可遏。总督下令严刑拷问他们。一个叫桑克图斯(Sanctus)的人在酷刑中只是回答说:"我是基督徒。"他越是被拷打,越是坚定地说:"我是基督徒。"许多这样的英勇之举感动了一些已经放弃信仰的基督徒,他们重新宣告信仰,为主殉道。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殉道,但这封书信告诉我们,关押基督徒的地方非常拥挤,以至于一些基督徒在刽子手带走他们之前就窒息而死。

57

这些只是在开明的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逼迫基督徒的几个例子。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基督徒殉道的文献被保存下来。我们可以确信,全罗马帝国实际上发生了许多逼迫,而现存的文献只是讲述了其中的一部分。

公元2世纪最后二十年

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去世,八年前开始与他共治的科莫都斯(Commodus)继承了帝位。虽然科莫都斯并没有颁发任何禁止逼迫的法令,但在他统治期间,这场逼迫风暴减弱了,殉道士的数量相对较低。在科莫都斯去世后爆发了一段时期的内战,基督徒因更加紧迫的问题而再次被忽视。公元193年,塞普蒂默·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主人。最初,基督徒在他的统治之下还可以平安无事。可是,他后来开始逼迫基督徒,成为了众多逼迫者之一。然而,这是公元3世纪初的事,我们将在另一处再来讲述。

总而言之,基督徒在整个公元2世纪的处境并不安全。他们并没有一直受到逼迫,有时只在罗马帝国的一些地区受到了逼迫。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通行政策仍是图拉真草拟的政策:不必调查基督徒,但如果他们受到指控,他们就必须放弃信仰或接受惩罚。因此,基督徒的邻舍的善意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有人相信关于他们的恶毒传言,他们就将受到指控,逼迫就会发生。因此,证明这些传言并不属实,让异教徒更好地理解与认可基督教,就变得异常重要。这就是护教士们的任务,我们马上就会讲到他们。

然而,在我们开始新一章的"故事"之前,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事情与我们经常被告知的不同,逼迫基督徒的不都是很差劲的皇帝,有时还是很贤明的皇帝。到了公元3世纪,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楚。这会揭露一个错误的观念:逼迫通常是出于腐败的官员,或是出于邪恶无能的统治者。因为许多原因——其中一些不无道理——帝国当局认为基督教是一场带有颠覆色彩的运动,从而试图镇压基督教,这并不是因为腐败或无知,而是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

58

第七章

护教

我们并不想奉承你们……而是请求你们，以准确彻底的调查为基础进行判决。

——殉道者查士丁

在整个公元2世纪和3世纪的一些年份，并没有爆发对基督徒有组织的逼迫。成为基督徒是违法的；但是，当局并不调查信奉这一新信仰的人。逼迫与殉道取决于地方的环境，尤其是邻舍们的善意。只要有人想陷害基督徒，他只需提出某项指控。查士丁的遭遇似乎就是这样，他很可能是受到了自己的敌人克雷申蒂乌斯（Crescentius）的指控。有时，关于基督徒的各种传言煽动了群众，他们要求逮捕与惩罚基督徒，就像在里昂与维埃纳所发生的那样。

考虑到这种情况，基督徒觉得必须驳斥对自己的信仰与习俗的传言和误解。即使他们的论证不足以说服他人相信基督教信仰的真理，但他们还是相信，如果消除了虚假的传言，就会取得一些切实的效果。这就是那些最具才能的基督教思想家与作家的任务。他们被称为"护教士"——辩护者。历代以来，他们的一些论证一直在被使用。

卑劣的传言与傲慢的批评

护教士努力消除的许多传言都是基于对基督教习俗与教义的误解。

例如，基督徒每周都聚在一起举行他们所说的爱宴。爱宴是秘密举行的，只有入会者（已经接受洗礼的人）才可以参加。此外，基督徒用“弟兄”或“姐妹”来称呼彼此，许多基督徒也用“弟兄”或“姐妹”称呼自己的配偶。结合这些鲜为人知的事实，非基督徒构想出一幅基督徒崇拜的画面：一场放荡的狂欢庆典，基督徒毫无节制地吃喝，他们将蜡烛熄灭，肆意发泄自己的肉欲，甚至还会乱伦。

60

圣餐也引起了传言。基督徒说自己被基督的身体与血喂养，还说基督是个小孩子。因此，一些异教徒认为，在入会仪式中，基督徒会将一个新生儿藏在一块饼中，然后命令新信徒将饼切开。在切开饼之后，他们将婴儿还温热的肉也一同吃掉。切开饼的新信徒无意中成为这桩罪行的主犯，从而必须保持沉默。这样的传言被传得神秘兮兮，活龙活现，因为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基督徒会收养弃婴，把发现的弃婴带回家中。

一些异教徒甚至还声称，基督徒崇拜驴。这是一个关于犹太教的古老传言，现在却被转嫁到基督徒身上，令他们成为嘲笑的对象。例如，人们发现了一幅粗糙的雕刻画，一个有着驴头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另一个人在崇拜地看着他。这幅画的题词是：“阿勒克萨梅诺斯崇拜上帝”（Alexamenos Worships God）。

这类观念——还有其他类似的观念——很容易就可以驳斥，因为只需证明，基督徒的行为准则并不符合那些疯狂的想象。但是，要想驳斥许多有文化的异教徒的批评则较为困难，因为他们潜心研究过基督教，并且声称基督教的信仰缺乏理性。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批评基督教，但他们的批评主要可以归结为一点：基督徒是一群无知的人，虽然他们在智慧的外衣下传讲自己的教义，但它们是愚蠢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这似乎是文化精英的共识，在他们看来，基督徒是一群可鄙的乌合之众。

在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就有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塞尔修斯（Celsus）写了一篇驳斥基督教的文章《真道》（*The True Word*）。他在其中表达了同他一样富有智慧与经验之人的情感：

在一些人的家中，我们找到了纺织工、织补工和修鞋匠，也就是最没有教养和最无知的一群人。她们在家主的面前不敢说一句话。但是，她们一旦能够将孩子或一些同样无知的妇女叫到一旁，她们就开始了奇谈怪论……如果你真的希望认识真理，就离开你的老师和父亲，与妇女和孩子一起到那些妇女的家里、修鞋匠的店铺或是制革厂，你将在那里学会完美的生活。就这样，这些基督徒找到了相信自己的人。[1]

61

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异教徒科内利乌·弗龙托（Cornelius Fronto）也撰写了一篇抨击基督徒的论文，但不幸遗失了。然而，基督教作家米努西乌·菲利克斯（Minucius Felix）有可能通过一位异教徒之口说出了弗龙托的话：

如果你们还有一点点智慧或羞耻，就不要再探索天国和宇宙的目的与奥秘。你们只需要留意脚下的路，尤其是像你们这样缺乏教养、粗鲁无知的人。[2]

因此，许多有文化的异教徒对基督教的敌意并不纯粹是知识性的问题，而是出于深深的阶级偏见。有文化、有经验的异教徒并不相信，基督教的乌合之众能够认识向他们隐藏的真理。他们反对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是一群野蛮人的宗教，他们的教义并不是源自希腊人或罗马人，而是得自原始的犹太人，而最优秀的犹太教师也从未达到希腊哲学家的水平。他们认为，如果可以在犹太人的圣经中找到什么好东西，那也是犹太人从希腊人那里抄袭来的。

---

① Origen, *Against Celsus* 3.55.

② *Octavius*, 12.

此外——论证还在继续——犹太人和基督教的上帝是可笑的。他们一方面声称上帝是全能的，高于一切受造物，另一方面又将上帝描述成好管闲事的人：他经常打听人间的事情，他钻进每一个人家里，去听听人们都在说些什么，甚至去检查人们都在做些什么饭菜。这纯粹是自相矛盾的胡言乱语。

不管怎样，崇拜这样一位上帝恰恰破坏了社会的本质，因为信仰这种宗教的人弃绝了大多数社会活动，并且声称，参与社会活动就等于崇拜假神。如果他们口中的神祇是假神，他们为什么要惧怕它们？就算不相信它们，他们为什么不与明智的人一同崇拜它们？实际上，基督徒在声称它们是假神的同时，仍像恐惧真神那样惧怕它们。

至于耶稣，我们不要忘记，他是被罗马帝国处死的一名罪犯。塞尔修斯甚至声称，耶稣是马利亚同一名罗马士兵生下的私生子。如果他真是上帝的儿子，他为什么会让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不杀死他的所有仇敌？即使基督徒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塞尔修斯还是在问：

> 上帝这样造访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来看看人间正在发生的事情吗？他不是无所不知吗？或者他可能知道，但却对罪恶无能为力，因为他本身就作恶？[3]

还有，基督徒宣讲——他们的确是这样相信的——自己将在死后复活。正是基于这种信仰，他们才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固去面对死亡。但是，为了一个最多只是不确切的来生而舍弃今生是毫无意义的。死后复活这个教义本身就说明，基督徒胡言乱语到了极点。对于被烈火烧死和被野兽或鱼吃掉的人来说，他们的身体又将怎样？上帝会在世界各地搜寻每一个身体的碎片吗？上帝将如何处理这些本不属于同一身体的碎

③ Origen, *Against Celsus* 4.3.

片？它们会被物归原主吗？这会在后来所有拥有复活身体的人身上留下缺陷吗？

对于诸如此类的论证，并不能只用否定来驳斥，而必须通过理由充分的论证予以驳斥。这就是护教士们的任务。

主要的护教士

对此类批评的驳斥产生了公元2世纪最出色的一些神学著作，而这一传统随后又延续了许多年。但是，我们现在只需讲述公元2世纪和3世纪初的护教士。

现存最早的护教文可能是《致丢格那妥书信》(*Letter to Diognetus*)，其作者不详，也许是古代历史学家所提到的某个叫夸德拉图斯(Quadratus)的人，他大约生活在公元2世纪初。随后不久，亚里斯蒂德(Aristides)在公元138年之前写了一篇护教文——最近才被人发现。但是，早期最著名的护教士是查士丁，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讲过他的殉道，他是最早记载基督徒崇拜——我们会在以后讲到——的基督教作家之一。查士丁曾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灵魂朝圣之旅，从一个学派来到另一个学派，直到在基督教中找到了他所说的“真哲学”。他有三部著作现存于世：两篇护教文和《与特里弗谈话录》(*Dialogue with Trypho*)。前者其实是一部著作的两个部分，后者是与一位犹太拉比的对话。查士丁的学生塔提安(Tatian)写了《致希腊人书》(*Address to the Greeks*)，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阿萨纳戈拉斯(Athenagoras)完成了《为基督徒辩》(*A Plea for the Christians*)和一篇论文《论死人复活》(*On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安提阿的主教提阿非罗(Theophilus)于公元2世纪末撰写了三卷《致奥托吕库斯》(*To Autolycus*)，分别论述了上帝、释经方法和基督徒的生活。公元2世纪的这些护教文和奥利金(Origen)于公元3世纪撰写的《驳塞尔修斯》(*Against Celsus*)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

最早用拉丁文写成的两篇护教文是米努西乌·菲利克斯的《奥克塔

63

维乌斯》(*Octavius*)和德尔图良的《护教篇》(*Apology*)。关于这两篇护教文的成文先后，直到今天学者们还在争论，但后完成的护教文显然受益于先写就的护教文。

通过阅读这些护教文，历史学家可以弄清异教徒反对基督教的主要方面，最有学识的基督徒驳斥异教徒的方法，以及基督教神学如何在驳斥异教徒批评的过程中发展起来。

基督教信仰与异教文化

基督徒被指控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因此，他们必须处理基督教信仰与异教文化的关系。所有基督徒都认为，必须弃绝神祇崇拜和与之相关的一切。这就是基督徒拒绝参加许多全民庆典的原因，因为人们在庆典中要向神祇献祭与宣誓。除此之外，和平主义信念也令许多基督徒相信，他们不能够参军，因为军人被要求要向皇帝与神祇献祭。同样，许多基督徒也反对学习古典文学，因为神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是各种罪恶的根源。作为基督徒必须崇拜独一的上帝，任何违背这一信仰的行为都是弃绝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也会在末日审判时弃绝这些否认他的背教者。

虽然所有基督徒都认为必须弃绝偶像崇拜，但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对古代的异教文化持有相同的态度。这就包括一些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与著作，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哲学家——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钦佩他们的智慧。否定这一切，就意味着抛弃了人类的理性所取得的一些最高成就；接受它，则将被视为是对异教文化的妥协与偶像崇拜侵入了教会。

因此，就古代文化的价值而言，基督徒采取了两条相反的路线。一些基督徒坚持认为，基督教信仰与异教文化完全对立。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是德尔图良，他的一句名言就可以概括这种态度："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雅典学院与教会有何相干？"④正是他的一个信念——即当时

---

④ *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 1.7.

流行的许多异端是尝试将异教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结合在一起的结果——促使他写下了这两句话。

然而，除了可能成为异端这个问题，在起源于"野蛮人"的基督教中，还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光芒可以与古代的文化与哲学相媲美。殉道者查士丁最著名的学生塔提安就是这样的基督徒，他的《致希腊人书》直接抨击了一切被希腊人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该书也在为"野蛮的"基督徒辩护。希腊人将所有不说希腊语的人都称为"野蛮人"，因此，塔提安开篇就向他们指出，他们自己也不能就如何说希腊语达成一致，因为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方言。此外，塔提安还指出，正是声称自己的语言是人类最伟大创造的希腊人发明了修辞学，而修辞学是一种将语言卖给出价最高之人来换取金币的艺术，因此它导致了人为谎言与不公作辩护。

64

塔提安说，希腊人所拥有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野蛮人那里学来的：他们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了天文学，从埃及人那里学来了几何学，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了写作。哲学与宗教也是如此，因为摩西的著作比柏拉图的、甚至是荷马的著作还要古老。因此，如果所谓的希腊文化与希伯来人和基督教野蛮人的宗教有什么一致的地方，那也是希腊人从野蛮人那里学来的智慧。更加糟糕的是，希腊人在解读野蛮人的智慧时产生误解，从而歪曲了希伯来人所认识的真理。结果，希腊人所谓的智慧只不过是对摩西所认识的和基督教所宣讲的真理所作的苍白反思和拙劣模仿。

如果这是塔提安对古代文化精华的评论，那么我们就不难想象，他会对异教神祇作何评价。荷马和其他希腊诗人曾描述过异教神祇的可耻行径，如通奸、乱伦和杀婴。我们怎能崇拜显然比我们自己还拙劣的神祇？塔提安最后补充说，我们不要忘记，异教徒所崇拜的许多雕像实际上表现的是被雕刻家用作模特的娼妓。因此，正是那些说基督徒属于社会底层的异教徒，他们实际上是崇拜地位卑下的人！

然而，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持有同样的立场。在作为一名基督徒的

同时，查士丁还是一位哲学家，他在研究“基督教哲学”，而在查士丁看来，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证明与解释基督教信仰与古代智慧的联系。因此，他并不像塔提安那样否定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愿意在信仰上妥协，或是他没有信仰，因为当需要他坚守信仰时，他勇敢地做到了，因而赢得了殉道者查士丁的美名。

查士丁声称，基督教信仰与异教哲学有一些“连结点”。例如，最优
65
秀的哲学家说到，一切其他的存在都源于一个至高的存在者（supreme being）。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肯定肉体死亡之后的生命；苏格拉底还用自己的生命为此做出了强有力的证明。柏拉图认识到，在现世的实在之外还有实在，因此假定了另一个永恒实在的世界。查士丁声称，哲学家的这些观念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并不总是能赞同哲学家理解这些观念的方式。例如，与哲学家不同的是，基督徒的盼望并不是基于灵魂不朽，而是基于身体复活。尽管存在这样的差异，查士丁还是坚持认为，哲学家瞥见了真理之光，而这并不能仅用巧合来解释。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的部分一致呢？对于查士丁来说，答案可以在逻各斯（Logos）的教义中找到。这个希腊词意为“道”（word）和“理性”。根据希腊哲学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人类的心灵可以理解实在，因为它分享了逻各斯或宇宙理性，而它们是一切实在的基础。例如，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二加二等于四，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灵和宇宙中，都存在一个逻各斯、一个理性或秩序，依照它们，二加二永远等于四。《约翰福音》肯定，逻各斯或道在耶稣里成为了肉身。因此，查士丁
66
认为，在上帝道成肉身中发生的事情是，支撑宇宙的理性、逻各斯或上帝的道以肉身来到了世界。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这个逻各斯是“照亮所有人的真光”。这就意味着，早在成为肉身之前，它就是一切真理的源头。保罗已经说过，古代希伯来人的信仰就是仰赖基督，而基督早在成为肉身之前就已经被启示给他们（林前 10:1—4）。现在，查士丁又补充说，也有异教徒认识这同

一个逻各斯，但他们的认识是模糊的。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所有真理都是上帝的逻各斯赠予他的，而这个逻各斯在耶稣里成为了肉身。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其他古代哲人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的智慧都源自基督。但这并不是说，上帝的道成肉身是多余的，因为古代的哲学家只是"片面地"认识到逻各斯，而在基督的道成肉身中认识他的人则是"完全地"认识了他。

查士丁为基督教开辟了一条道路，使基督教可以索取古代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即使它们是异教的。在查士丁的启发之下，很快就有其他基督徒试图再次在基督教信仰与古代文化之间架起桥梁。他们的工作及其固有的危险将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来讨论。

护教士的论点

查士丁使用逻各斯的教义为基督徒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他们可以在其中随意索取蕴藏在古代文化中的丰富宝藏。但是，基督徒仍需要驳斥针对基督教的各种批评。虽然我们不可能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所有反驳，但某一些例子却足以让我们大体上了解护教士论点的本质。

当因没有有形之神而被指控为无神论者时，护教士的回应是，就此而言，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家与诗人也是无神论者。为了支持这一论点，只需引用古代的作家，因为他们也肯定，神祇是人类的发明，它们的恶行比崇拜者的还要堕落。亚里斯蒂德指出，人类之所以发明这样的神祇，正是因为人类想利用它们来放纵自己的恶行。此外，护教士还有一个共同的论点就是，通常由金子与宝石制成的偶像必须受到保护，以防被小偷盗走。必须受到保护的神祇怎能为人提供保护？人手所造的神祇怎能高过人类？就这几点而言，正统的基督徒持守一神论与上帝创世的教义，这是他们从基督教的犹太背景中学来的。

就对末日复活的批评而言，护教士诉求于上帝的全能。如果上帝从无中创造了所有人，这同一位上帝为什么不可能在他们死亡、消散之后重

67

新创造他们?

对于基督徒缺乏道德的指控,护教士的驳斥是,这并不是事实,异教徒才是没有道德的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殉道者查士丁描述了早期基督徒的崇拜——这是最早描述基督徒崇拜的文献之一,我们以后会有机会引用。我们的行为准则要求我们连罪恶的思想都不能有,怎么还会有人相信,我们的崇拜充斥着狂欢与淫乱?是异教徒在讲述自己神祇的这些事,甚至在崇拜的掩饰之下进行这些勾当。我们抵制一切形式的流血,怎么还会有人相信,我们会吃掉小孩?是异教徒将自己不想要的孩子丢弃在外,任凭他们被冻死、被饿死。

最后,基督徒被指控为颠覆分子,因为他们拒绝崇拜皇帝,从而破坏了社会的本质。护教士的回答是,他们的确拒绝崇拜皇帝和其他一切受造物,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帝国的忠实臣民。他们认为,皇帝需要的并不是受敬拜,而是为他效力;而他最好的效力者,即是那些为他和帝国向独一真神上帝献上祈祷的人。

就基督徒被指控为颠覆分子而言,我觉得基督教护教士并没有完全理解像塞尔修斯这样的人批评基督教的深意。从塞尔修斯的角度来看,无论基督徒自认为对皇帝与帝国有多么忠诚,他们实际上破坏了社会的本质,因为他们拒绝履行社会所要求的主要的公民与宗教义务,从而表现得仿佛这些义务是无效的,甚至是邪恶的。此外,政府当时怀疑一切非官方的社团或聚会,但是,教会——尤其是通过教会的主教及其通信——却正在建立一个全帝国范围内的网络。基督教的教义与实践隐含着颠覆性的意义,而这正是公元 2 世纪和 3 世纪几位最具才能的皇帝持续逼迫基督徒的根本原因。这也解释了如下事实:随着罗马官员更加了解基督教,逼迫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猛烈了。

总而言之,护教士的著作见证了早期基督徒的生存所面临的矛盾。他们否定异教文化,但不得不应对一些有价值的异教文化。他们承认在哲学家这里可以得到真理,但又坚持基督教启示的优越性。他们拒绝崇

拜皇帝，甚至受到当局的逼迫，但他们继续为皇帝祈祷，仍然钦佩罗马帝国的伟大。这些矛盾在《致丢格那妥书信》中极好地表达出来： 68

> 基督徒根本就不是异类，他们的国籍、语言或习俗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祖国，但却像寄居者。他们履行了自己作为公民的所有义务，但却像外国人那样遭受苦难。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园，但他们的家园却不在任何一个地方……他们是血肉之躯，但并不按着情欲生活。他们生活在地上，却是天国的子民。他们遵守了所有的法律，但却按着比法律更高的标准在生活。他们爱所有的人，但所有的人都在逼迫他们。[5]

⑤ *To Diognetus* 5.1－11.

第八章

信仰传承

为了不被发现，谬误绝不会赤裸裸地展现自己。相反，它会装扮得优美儒雅，因此，粗心的人就会被迷惑，相信谬误比真理更真实。

——里昂的爱任纽

早期教会的许多归信者来自广泛而不同的背景。这种多样性丰富了教会，也见证了教会信仰的普世性。但是，这也导致了对教会信仰广泛而不同的解释。我们不应当惊讶于这些不同的解释，因为当时的基督教还是界限不清——以至于我们也许更应该说"各种基督教"。在基督教中，一定会有不同的观点与侧重点，这是新约的每一位读者都能够发现的；例如，我们可以将《马可福音》与《约翰福音》、《罗马书》和《启示录》比较一下。但是，当时的所有观点与解释都同样可靠或令人满意吗？在界限尚不明确的基督教中，难道没有一些解释会给基督教的整全性带来危险吗？当时的宗教调和主义增加了这种危险，因为调和主义并不单靠一套教义体系寻求真理，而是从各种体系中吸取零散的思想。结果，虽然许多人自称是基督徒，但其中一些人解释基督的方法却被其他人认为是模糊了、甚至否定了基督的核心信息。为了应对这些危险，所谓的正统基督教开始界定自身，重申其犹太遗产中的一些教义，如创世、受造世界的正面价值、上帝掌管着全部历史、上帝最终的统治即将来临，以及身体复活——从法利赛派那里学到的教义。为了重申这些教义，基督教发展出一系列的工

具：信经、圣经正典和使徒统绪。它们为正统设定了界限，将长期成为基督徒生活与教导中的核心主题。因此，即使是其观点最终被教会普遍否定的异端，也影响到教会与其对自身的理解。

诺斯替主义

在对基督教的所有不同解释中，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是最危险的、几近摧毁性的。它是一个与教会展开竞争的难以界定的团体；更确切地说，它是一场大规模的无组织运动，存在于基督教内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耶路撒冷沦陷与公元 70 年圣殿被毁，犹太教中一些犹太人接受了诺斯替主义，这就产生了"诺斯替犹太教"。诺斯替犹太教否定了犹太人的许多传统教义，尤其是上帝的创世与受造物的良善。同样，当诺斯替主义将基督这个名字与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另一些元素融入自己的多样体系时，基督徒认为，自己信仰中一些至关重要的元素被否定了。

数百年来，历史学家们实际上只能通过异教研究者（*heresiologists*）——驳斥诺斯替主义及其教条的基督教作家——的描述来研究基督教的诺斯替主义。少数现存的诺斯替派著作残篇并不足以纠正或评断异教研究者所告诉我们的。后来，一大批诺斯替派著作于 1945 年在埃及的拿哈马迪（Nag Hammadi）被发现。其中就包括相当早的《多马福音书》（*Gospel of Thomas*）和稍晚一些的瓦伦廷（Valentinus）的《真理福音书》（*Gospel of Truth*）。瓦伦廷是一位重要的诺斯替派人物，异教研究者描述过他的教义，但对它们有所曲解。出于多种原因，这批诺斯替派的著作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被公众与学者所知，人们才可以读到它们。它们与另一些发现——包括于 2006 年出版的《犹大福音书》（*Gospel of Judas*）——纠正并补充了异教研究者所告诉我们的内容。

诺斯替主义这个名字，源于意为"知识"的希腊词"诺斯"（*gnosis*）。诺斯替派认为，自己拥有一种专为拥有真知性之人而留的特别的、奥秘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开启通往得救之门的秘密钥匙。

异教研究者的著作给人的印象是，诺斯替主义主要是关于万物——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起源的无用思辨。但是，得救——不是思辨——也是诺斯替派主要关注的问题。他们从一些资料中得出结论，所有物质都是邪恶的，起码都是不真实的。人实际上是一个永恒的精神（或永恒精神的一部分），被以某种方式囚禁在肉体中。肉体是精神的监狱，令我们无法认清自己的真实本性，因此是邪恶的。所以，诺斯替派的最终目标是逃离肉体和这个我们被放逐至此的物质世界。对于诺斯替主义来说，"放逐"这个比喻至关重要。世界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家，而是我们精神得救的一个障碍——尽管正统基督教正式否定了这个观念，但常常受到它的影响。

71

如何解释世界与肉体的起源呢？诺斯替派认为，所有实在最初都是精神的。至高之神根本就无意创造一个物质世界，只想创造一个精神世界。因此，许多精神实在被造成了。这就是异教研究者所描述的在不同的诺斯替主义中都可以看到的"无穷的家谱"。关于精神实在的具体数目——在最初的精神"深渊"之前就已存在的以及现世的——诺斯替派教师并没有达成一致，有的提出有多达三百六十五个这样的精神实在，或称"伊涌"（eons）。然而，其中某个伊涌远离了至高之神，陷入了谬误，就这样创造了物质世界。例如，某种诺斯替主义认为，智慧——众伊涌之一——希望独自创造些什么，她所造出的"怪胎"就是世界。这就是诺斯替主义中的世界：一个精神的怪胎，而不是某位神祇的创造。

然而，既然这个世界是由一个精神实在所创造的，世界上就仍有精神的"火花"（sparks）或"碎片"（bits）。它们被禁锢在人的肉体之中，必须通过"诺斯"将它们释放出來。

若要精神的"火花"或"碎片"得以释放，必须有一位精神使者来到这个世界，将我们从梦中或精神的混沌中唤醒。我们的精神在肉体中沉睡，被肉体的本能与情欲驱使，必须有一位天上的使者唤醒我们，告诉我们自己的真实本性，要我们与禁锢我们的肉体作斗争。这位使者带来了诺斯，

72

它是得救所必需的启示与奥秘知识。在我们之上，是一层层天界，每一层天界都由一个邪恶的力量统治，它们的目的是阻止我们到达精神之国。为了达到精神的完满或丰盛，我们必须冲破每一层天界。成功的唯一方法就是得到那令通往精神国度之路畅通无阻的奥秘知识——它很像是一个精神密码。天上的使者正是被派来给予我们这奥秘知识，因为若没有它，我们就不会得救。

在基督教的诺斯替主义——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还有非基督教诺斯替主义——中，这位精神使者就是基督。基督来到世界的目的，就是提醒我们本是来自天上，并赐给我们奥秘的知识，因为若没有这知识，我们就不能重返精神之国。

基督是天上的使者，而肉体与物质又是邪恶的，因此，大多数基督教诺斯替派并不认为基督拥有我们这样的肉体。一些基督教诺斯替派声称，基督的肉体是一个幻象，一个幽灵，奇迹般地显现，如同真实的肉体一样。许多基督教诺斯替派将天上的"基督"与世上的"耶稣"区分开来，他们显然相信，世上的"耶稣"只是天上的"基督"用来显现的躯壳。有时，这又与另一种观念结合在一起：耶稣的确拥有一个肉体，但他的肉体是一种"灵性质料"，与我们的肉体并不相同。还有很多基督教诺斯替派否定耶稣的降生，因为这会令他受控于物质世界的力量。所有这些观念都是教会普遍所说的不同程度的幻影论（Docetism）——它得名于一个意为"像是"（to seem）的希腊词，因为所有幻影论都以某种方式暗示，耶稣的肉体看起来完全是人的肉体，但实际上却不是。

某些诺斯替派教师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灵，即精神。一些人完全是属乎肉体的。因此，当物质世界消亡时，他们必然灭亡。另一方面，被禁锢在诺斯替派所说的"属灵人"（the spiritual）之中的精神火花必然得救，重返精神国度。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学习由真正得到启示的人——即诺斯替派教师——所掌握的奥秘知识。

如何过这种生活呢？关于这个问题，异教研究者告诉我们，诺斯替派

73

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大多数诺斯替派宣称，肉体是精神的监狱，人必须控制肉体和肉体的情欲，从而削弱肉体束缚精神的力量；还有些诺斯替派声称，精神生来良善，并不能被毁灭，因此，我们应当放纵肉体，任凭肉体接受其情欲的牵引。所以，一些诺斯替派成为极端的禁欲主义者，而另一些却是行为放荡者。

我们很难重现诺斯替派社团或学派的社会构成或信仰生活。首先，大多数诺斯替派认为，他们的诺斯是秘传的，因此，甚至他们自己的著作也无法让历史学家明白，他们的崇拜与社团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甚至他们的社会构成也令人疑惑。大多数历史学家同意吉奥瓦尼·弗洛拉莫(Giovanni Filoramo)的估测：诺斯替派社团是"局限于知识分子的俱乐部"，代表了一种"具有经济扩张性与社会流动性的地方社团"。[1] 但是，拿哈马迪文献用科普特文写成这一事实似乎表明，诺斯替主义在社会底层人中也拥有大量信徒，因为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社会阶级划分极其分明，说科普特语的埃及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社会流动性也非常小。

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许多诺斯替派社团中，女性有着她们在社会上普遍没有的突出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既然重要的是精神而不是肉体，那么，人的肉体形态就与永恒实在没有多大关系。此外，在众多诺斯替派用来解释世界起源的伊涌谱系中，既有阳性伊涌，也有阴性伊涌。十分可能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应对诺斯替主义的这个特点，正统基督教才开始限制女性在教会中的职分。因为显而易见，到了公元2世纪，教会开始拒绝给予女性她们在公元1世纪所担任的教会职分。

在整个公元2世纪，诺斯替主义对基督教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教会的主要领袖坚决反对它，因为他们看到，它否定了基督教一些至关重要的教义，如创世、道成肉身、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及复活。因此，教会普

---

① Giovanni Filoramo, *A History of Gnosticism* (Oxford, U. K.: Basil Blackwell, 1900), p. 170.

遍想出了对抗诺斯替主义的方法。但是,在讲述这些方法之前,我们必须先停下来讲述另一位教师。他的教义与诺斯替主义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并被基督教视为一个特别的威胁。

马西昂

马西昂(Marcion)的父亲是黑海南海岸的锡诺普(Sinope)的主教,所以他很早就知道了基督教。但是,马西昂非常讨厌犹太教与物质世界。因此,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是反犹太教与反物质的。大约在公元144年,他来到罗马,并在罗马赢得了一群追随者。但是,教会最终普遍认为,他的教义与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相悖。后来,他建立了自己的教会。作为正统教会的对手,他的教会存在了数百年。

74

马西昂相信,世界是邪恶的,所以他认为,世界的创造者要么是邪恶的,要么是无知的,要么就是既邪恶又无知。但是,他并没有像诺斯替派那样假设许多精神实在,而是提出一个更加简单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耶稣的圣父上帝并不是旧约中的上帝雅威(Yahweh)。是雅威创造了这个世界,而圣父的目的是只有一个精神世界。但是,或是因为无知,或是出于恶意,雅威创造了这个世界,又在其中创造了人类——这是我们可以在许多诺斯替派著作中找到的主题。

这就意味着,希伯来圣经的确是一位神祇所默示的,但这位神祇是雅威,而不是至高的圣父。雅威是一位武断专横的神祇,他拣选一群人高过其他所有人。他也是一位记仇的神祇,对不顺服他的人耿耿于怀,并惩罚他们。简而言之,雅威是一位公义之神,但他的公义是武断专横的公义。

基督徒的圣父则完全不同于雅威,也远远高于雅威。这位上帝并不寻仇,而是充满了爱。这位上帝对我们没有任何要求,而是白白地赐予我们一切,其中就包括救恩。这位上帝并不希望被顺服,而是渴望被爱。正是出于对我们——雅威的受造物——的怜悯,这位至高的上帝才会差遣

自己的爱子拯救我们。但是，耶稣实际上并不是由马利亚所生，因为这样的事会令他受制于雅威。相反，他只是在提比略统治时期以一个成年男子的样子出现，他的身体并不是物质的肉体。当然，根本就没有末日的审判，因为至高的上帝是绝对的爱，会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所有这一切令马西昂抛弃了希伯来圣经。如果旧约是一位劣等神祇的话语，那么它就不应当在教会中诵读，也不应当用作基督教教导的基础。为了填补这个空白，马西昂编辑了一本自认为是真基督教圣经的书卷。他的"圣经"只有保罗的书信和《路加福音》，因为他认为，保罗是少数几位真正理解了耶稣信息的人，而路加始终是保罗的同工。其他所有古代的基督教书卷都被犹太人的观念污染了。至于路加与保罗从旧约引用的大量经文，马西昂的解释是"篡改"——是犹太化基督徒为了颠覆原始信息而亲手篡改的。

同诺斯替派相比，马西昂对教会构成了更大的威胁。他同诺斯替派一样否定或彻底重新解释了创世、道成肉身和复活的教义。但是，他比他们走得更远，因为他建立了拥有自己的主教与"圣经"的教会。曾经有许多年，这个敌对的教会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即使是在被明显击败之后，它仍继续残存了数百年。

75

回应：圣经正典、信经与使徒统绪

马西昂的"圣经"目录是编排"新约圣经"的第一次尝试。当早期基督徒提到"圣经"时，他们说的通常是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七十士译本（说叙利亚语的基督徒使用一个译成叙利亚文的类似译本）。教会通常诵读我们今天的四福音书中的一段或几段经文，还有使徒书信——尤其是保罗书信——中的经文。当时并没有公认的"圣经"书卷目录，因此不同的福音书会被不同的教会诵读，其他书卷也是如此。但是，马西昂的挑战需要回应；因此，教会普遍开始编辑基督教的圣书目录。这并不是以正式的方式进行的，如通过大公会议或特别会议。实际上，教会逐渐达成

一致。就新约正典的基本书卷而言，教会很快就达成了普遍的共识。但是，对于每一个次要的细节，教会却花了很长时间才完全统一了意见。

除了诺斯替派和马西昂派之外，基督徒一致认为，希伯来圣经是基督教正典的一部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证明上帝始终在为基督教的诞生预备道路，甚至可以依此来理解在耶稣基督里被启示出来的上帝的本性。基督教信仰实现了以色列人的盼望，它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幻影。

在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约"中，四福音书是最早获得普遍认可的。重要的一点是，早期基督徒决定将多部福音书收入他们的正典。显而易见，一些城市或地区的教会专门拥有与它们的历史与传统联系最为紧密的福音书。例如，在安提阿及其周边地区使用《路加福音》就是这样。随着教会之间往来的增多，他们开始分享他们的福音书抄本与传统。因此，认可与使用不同的福音书被视为教会合一的一个标志。后来，许多人指出四部福音书在细节上存在矛盾。早期的基督徒完全意识到这些差异，这正是他们坚持使用多部福音书的原因之一。他们这样做直接回应了马西昂和诺斯替主义的挑战。许多诺斯替派教师声称，天国的使者将自己的奥秘知识传给了某位特定的门徒，只有他才能正确地解释天国使者的奥秘知识。因此，每一个诺斯替派都拥有一部自称是记载了耶稣真正教导的书卷，如《多马福音书》和瓦伦廷派的《真理福音书》。马西昂使用的是《路加福音》，但他从中删掉了所有提及犹太教或希伯来圣经的经文。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教会普遍试图证明，自己的教义并不是基于某一位使徒或某一部福音书的所谓见证，而是基于整个使徒传统的一致见证。虽然四部福音书在细节上存在差异，但它们对生死攸关的基本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一事实令四部福音书一致的内容成为更具说服力的论据。为了驳斥马西昂删减过的《路加福音》，教会拿出了几部内容一致的福音书——有时是三部，有时是四部，因为《约翰福音》获得普遍认可的过程要更长一些。为了反驳基督教诺斯替派的秘密传统与秘密解释，教会诉诸所

76

有人都知道的公开传统和福音书中的多样见证。

我们应当知道，在基督教历史的最初四五百年，至少有几十部——也可能是几百部——关于马利亚与使徒事迹的福音书和著作。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这些著作并未试图成为正典，教会也没有查禁其中的一些。实际上，非正典福音书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诺斯替派福音书，其中一些主要成书于公元2世纪——《多马福音书》或许是个例外，它的一些材料可能出现得更早。每一部诺斯替派福音书都被某个诺斯替派视为经典，而他们同时又否定其他所有诺斯替派福音书，因此，他们根本就无意让自己的福音书成为新生的新约正典的一部分。正统基督教和基督教诺斯替派都从未将这些福音书视为正典的一部分，因为教会并不认可诺斯替派福音书，而诺斯替派则认为，只有一部上帝所默示的福音书。第二类非正典福音书主要成书于公元3世纪或更晚，其中包括有关耶稣的信仰故事。教会从未否定这些福音书，只是并没有将它们纳入新约正典——圣书目录。它们又被阅读了几百年，并且很少遭到反对。在中世纪的大教堂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雕刻与绘画，描述的就是这些福音书中的情节。《雅各第一福音书》(*Protoevangelium of James*)就是众多例子之一。它讲述了马利亚的父母——约阿希姆(Joachim)和亚拿(Anna)——的故事。这个故事被公认为基督教传统的一部分，且经常可以在中世纪的艺术与文学中看到。

紧接着四部福音书的《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也很早就获得了认可。因此，到了公元2世纪末，新约正典的核心书卷已经确定：四部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今天正典末尾几部较短的书卷在很久以后才获得普遍认可；但还存在小小的争议。到了公元3世纪，《启示录》才被教会普遍接受，但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又受到了质疑，因为它对当时的主流文化与罗马帝国的言词似乎过于激烈。究竟哪些书卷应该纳入新约正典，哪些书卷不应该纳入，教会直到公元4世纪下半叶才就这个问题完全达成一致。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新约正典的确定也并不是由

77

教会官方会议决定的，更不是某个决策机构的决定，而是一个被各教会一致认可的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很少有基督徒认为，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此外，在确定新约正典的整个过程中，主导教会的并不是抽象的神学，而是教会的崇拜生活，因为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教会在举行崇拜时要诵读这卷书吗？

教会回应异端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各种信经，尤其是在洗礼时。每一个城市的教会通常都有自己的信经，尽管它类似于周边城市教会的信经。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子会”使用自己从“母会”那里学到的信经，但会有一些改动。学者们以此为基础，将古代的信经分为不同的“类”。因此，信经的类别就可以被用来追溯不同教会之间的关系。

在这些信经中，一个较早与较短的信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有这样一个完全虚构的传说：耶稣的十二使徒在开始宣教与撰写信经之前聚在一起，他们每人写出一条，就这样写成了《使徒信经》。实际上，《使徒信经》的基本内容可能是公元150年左右在罗马收集整理的。由于是在罗马使用，所以学者们将古代的《使徒信经》称为“R”。[2] 不过，它当时被称为“信仰标志”(symbol of faith)。但标志一词在这里的含义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意思，而是一种“承认的方式”(means of recognition)，就像是一位将军交给信使的信物，以便收信人据此认出真的信使。同样，在罗马被收集整理的这个标志，被基督徒用来分辨真信徒与信仰当时各种异端的人，尤其是诺斯替主义与马西昂主义。任何认信这一信经的人既不是诺斯替派，也不是马西昂派。

这一标志主要用于在洗礼中以三个问题的方式提问准备接受洗礼的基督徒：

2 古代的《使徒信经》是在罗马使用，而罗马的英文为 Rome，因此，英语世界的学者们将古代在罗马使用的《使徒信经》简称为“R”。——译者注

你是否相信上帝全能的父？

你是否相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由圣灵和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审判活人和死人？

你是否相信圣灵、神圣的教会和身体复活？

78 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古罗马信仰标志"或"R"的核心内容。同大多数古代信经一样，这部信经显然是围绕着洗礼中使用的三位一体信条（Trinitarian formula）而建立起来的。准备接受洗礼的基督徒"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受洗，因此，所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是为了检验他们是否真的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

更加仔细的研究揭示出，这部早期的信经直接是针对马西昂与基督教诺斯替派。首先，通常被译成"全能"的希腊词 *pantokrator*，字面意义是"统治万有"。它在信经中的意思是，一切——当然也包括物质世界——都在上帝的统治之下。（其他古代信经说："一切可见与不可见之物的创造者。"）这就否定了服侍上帝的精神实在与不服侍上帝的物质实在的分别。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物质与物质实体都是上帝所统治的"万有"的一部分。强调上帝创造了世界，掌管着一切受造物和全部历史，是基督教得自犹太传统的众多教义之一，而基督徒仍然信仰这些教义，并将它们视为自己信仰的核心。

"R"最长的段落论述了圣子。这是因为马西昂与诺斯替派在基督论上与教会的分歧最大。首先，我们得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古代的其他版本也会称为"不变者的儿子"或"他的儿子"，就像我们今天的版本所说的。在此，重要的一点是，耶稣是统治这个世界与所有实在、作为万有创造者的上帝的儿子。"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并不主要是为了强调童贞女生子——尽管这显而易见，也得到了肯定——而是为了肯定耶稣降生的事实，以及耶稣并不像马西昂与其他人所声称的那样，只是世

界上的幻影。提到本丢·彼拉多，也不是要责怪这位罗马总督，而是为耶稣死亡这一事件注明日期，从而强调这是一个有着明确日期的历史事件。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的信仰宣告进一步否定了幻影论。最后，这段信经肯定了耶稣会再来"审判"——一个马西昂派绝对不会接受的观念。

"R"的第三条表现出同样的关注，但却表达得较为含蓄，因为当时的局势并不需要对此进行详细的阐述。神圣的教会之所以得到肯定，是因为基督徒开始强调教会的权威——这与诺斯替派及其众多派系和马西昂及其教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身体复活"最终否定了一切肉体都是邪恶的或毫无意义的观念。

虽然分析"R"有助于我们理解《使徒信经》的最初目的，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原始的《使徒信经》只是当时在洗礼中使用的众多信经之一。与罗马有着紧密联系的教会——如北非与高卢的教会——使用"R"的不同版本。但是，罗马帝国东部的教会——如叙利亚、埃及和小亚细亚等地的教会——则拥有自己的信经。因此，虽然"R"是《使徒信经》的底本，但凯撒利亚的洗礼信经或其他一些同类信经却是《尼西亚信经》的底本——我们将会讲到，于公元4世纪制定的《尼西亚信经》是最被普遍接受的古代信经。

79

尽管新约正典和各种信经是教会在与异端的斗争中所使用的有效武器，但是，教会的权威这一问题最终成为了争辩的对象。它之所以非常重要，不仅是因为必须要有人裁定谁对谁错，也是因为一个生死攸关的本质问题：所有基督徒都认为，耶稣的教导才是唯一的真理。诺斯替派声称，通过秘密教师的传承，他们得到了某种获得耶稣真正教导的秘密途径。马西昂认为，通过保罗与路加的著作——但他不得不删除他们著作中与他对旧约看法不一致的内容——他已经获得了耶稣的真正教导。与诺斯替派和马西昂截然不同的是，教会普遍宣称，自己拥有原始的福音与耶稣的真正教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问题是教会的权威与异端的

80

权威之争。

就这点而言，使徒统绪（Apostolic Succession）的观念十分重要。当时所争论的问题只不过是：如果耶稣有某些要传给自己门徒的秘密知识——实际上他没有——那么，他会将这些秘密教导传给他委派建立教会的使徒。如果这些使徒领受了这样的教导，他们会传给继他们之后领导各个教会的领袖。因此，如果真有这样的秘密教导，它们也应该被传给亲自跟随过使徒的门徒与这些门徒的继任者——主教。但是，当时——公元2世纪——的实际情况是，所有自称是直接继任使徒的主教都一致否认有这样的秘密教导。总而言之，并不存在诺斯替派所说的秘密传统，他们自称被传授过秘密传统的说法是假的。

为了令这种论据更具说服力，教会必须证明，当时的主教确实是使徒的继任者。这并不困难，因为一些最古老的教会都能拿出证明它们与使徒一脉相承的主教名单。罗马、安提阿、以弗所和其他一些城市或地区的教会都有这样的主教名单。今天的历史学家并不认为这样的主教名单绝对可信，因为有迹象表明，在某些教会——罗马教会就是其中之一，最初并没有作为地方教会唯一领袖的"主教"，而是有一个管理团，其成员有时被称为"主教"，有时被称为"长者"——长老。不管怎样，无论是通过真正的主教，还是通过教会的其他领袖，公元2世纪的正统教会其实都能够以马西昂与基督教诺斯替派所不能的方式，证明它们与使徒一脉相承。

这难道意味着，只有可以证明与使徒一脉相承的教会才是真正的使徒教会吗？并非如此，因为并不是每个教会都能证明自己是由使徒所建立，而是它们都信奉同一个信仰，可以共同证明这一信仰的确源自使徒。后来，使徒统绪的观念被进一步发展：只有由自称与使徒一脉相承的主教所按立的圣职才有效。在公元2世纪末最初形成时，使徒统绪的原则是包容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与诺斯替派教师的封闭与秘密的传统不同，使徒统绪呈现出一种开放与共享的传统，这种传统并不是以耶稣最喜爱

的某个使徒为基础，而是基于所有使徒及其建立的教会所共同作出的见证。

将主教联系在一起的网络进一步加强了教会的共同见证，并导致了高度的分权制。主教是由每一个城市的信徒选举产生的，因此，很快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在主教选举之后，那位未来的新主教将给附近的主教发去一份信仰声明，而他们随后会确认这位新主教的正统性。为此，附近的一些主教还会参加他们这位新同工的圣职就任仪式。

81

古代的大公教会

大公教会(Catholic Church)的原意是指主教的分权制以及相伴随的在几部正典福音书中为福音作出的多形式的见证。"大公"(catholic)一词的意思是"普世的"，但也意为"全体一致"。为了将自己与各种异端团体和教派区分开来，古代的教会开始自称为"大公教会"。这个称谓不仅强调了教会的普世性，也强调了教会建基其上的广泛见证。教会是"全体一致"的教会——根据所有使徒与福音书作者的共同见证建立起来的教会。各种诺斯替派的教会并没有这种广泛的基础，因此就不是大公教会。的确，就它们当中声称与使徒一脉相承的教会而言，它们如此声称的基础只是由一位使徒传承下来的一个假设的秘密传统。只有大公教会——"全体一致"的教会——才有权宣称拥有所有的使徒见证。这保证了教会的正统性，也是"大公"最终会成为正统或"正确教义"同义词的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经数百年的演变，围绕大公的真正意义而展开的争辩，逐渐集中到一位使徒的角色与权威上，他就是彼得。

第九章

教父

我们的教师是所有智慧的伟大教师，包括雅典与希腊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属于他。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

在教会生活的最初几十年，基督徒撰写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处理具体或特定的问题。例如，保罗的书信。保罗写每一封书信都是受到特定情况的驱使，他并未试图在任何一封书信中讨论基督教的所有教义。在使徒时代之后，基督教的著作一度也是如此。这个时代的各位基督教作家被共同称为使徒教父（Apostolic Fathers）。他们的著作被保存下来，其中每部都是处理非常具体的问题。安提阿的伊格纳修的书信就是这样——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同样，罗马的克莱门（Clement of Rome）于公元 1 世纪末写了《致哥林多人书》（*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而促使他写下这封书信的问题也类似于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所处理的问题。《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Teaching of the Twelve Apostles*）是指导基督徒生活与崇拜的纪律手册。但是，它实际上并不是十二使徒所著，而是一个我们并不知道姓名的基督徒所写，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它的成书时间与地点。《黑马牧人书》（*Shepherd of Hermas*）是罗马主教的一个兄弟于公元 2 世纪中期写的，主要是处理洗礼之后的赦罪问题。总而言之，所谓的“使徒教父”的所有著作都是处理单一的问题，并没有哪部试图详细地阐释基督教

的全部教义，查士丁与其他在公元2世纪下半叶著述的护教士也是如此。他们的大多数著作都与逼迫有关，并没有哪一部论述了基督教的全部教义。

然而，到了公元2世纪末，马西昂与诺斯替派的挑战需要一种不同的回应。异端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教义体系，对此，教会必须做出的回应是，让教会的一些教师对正统信仰做出同样令人信服的解释。正是因为异端在广阔的领域内进行了思索，基督教的教师也在同样广阔的领域内做出了回应。这就产生了第一批相当完整地阐释基督教真理的著作。它们就是爱任纽、亚历山大的克莱门、德尔图良和奥利金的著作。

84

里昂的爱任纽

爱任纽是小亚细亚人，可能于公元130年左右生于士每拿。他在士每拿时是波利卡普的学生，我们已经在早前的一章中讲过波利卡普的殉道。爱任纽一生都是波利卡普的狂热崇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他经常提到一位没有说出名字的“长者”或长老，而这位“长者”很可能就是波利卡普。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爱任纽移居到今天法国南部的里昂。在里昂，他成为了长老，并作为长老被派往罗马，给那里的主教送信。当他还在罗马时，里昂与附近的维埃纳爆发了逼迫——我们已经在第五章中讲过，主教弗提努斯(Photinus)殉道。一回到里昂，爱任纽就被选为里昂的主教。他一直担任里昂的主教，直到公元202年去世，可能是为主殉道。

首先，爱任纽是位牧者。他对哲学思辨与钻研尚未解开的奥秘并没有特别的兴趣，而是专注于指导他所牧养的基督徒的生活与信仰。因此，在自己的著作中，他并不想飞上思辨的高空，只想驳斥异端与教导信徒。他只有两部著作现存于世：《使徒宣道论证》(*Demonstration of Apostolic Faith*)和《驳斥所谓的真知》(*Refutation of the So-called Gnosis*)——也被称为《驳异端》(*Against Heresies*)。在《使徒宣道论证》中，他就一些教义对他所牧养的基督徒进行了教导。在《驳异端》中，他试图驳斥诺斯替主

义。他撰写这两部著作的目的是阐明他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信仰，而不是用自己的思辨为信仰增添光彩。因此，爱任纽的著作出色地见证了公元2世纪末的教会信仰。

爱任纽视自己为牧者，也将上帝视为众牧者之上的大牧者。上帝是一位充满爱的存在，他创造了世界和人类，但并不像诺斯替派所说是因为必需或错误，而是因为上帝有去爱与带领受造物的渴望，就像牧人爱与带领羊群。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历史表现为神圣的牧人带领受造物走向历史终极目标的过程。

人类是创造的顶峰，从最初就被造成是自由的，因此是有责任的。自由令我们越来越顺服上帝的旨意，越来越符合上帝的本性，因此也就越来越与我们的造物主共融。但是，另一方面，受造物人类并没有从最初就被造成其最完美的样式。上帝像一位真正的牧人，将第一对夫妇放进了伊甸园。他们并没有成熟，而是"像小孩子"，有着小孩子的完美。这就意味着，上帝的目的是，人类在与上帝的共融中成长，甚至最终会超越天使。

85

天使只是暂时高过我们。当上帝的目的在受造物人类中实现时，我们会高过天使；因为我们与上帝的共融比他们的更加紧密。天使的职责类似于指导王子起步的监护人的职责。虽然监护人暂时看管着王子，但王子最终会统治监护人。

人类不仅要接受天使的教导，还要接受上帝的"双手"——圣道与圣灵——的教导。在这双手的引领之下，人类接受教导，得以成长，其不变的目的是与上帝越来越紧密的共融。这个过程的目的就是爱任纽所说的神化（divinization）——上帝的目的是令我们越来越像上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在上帝中不知不觉失去自我，也不是我们会和上帝完全一样。相反，上帝是如此高于我们，无论我们成长得如何像他，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一位天使嫉妒上帝为人类所留的好命运，因此诱使亚当与夏娃犯罪。由于罪，受造物人类被逐出乐园，人类的成长受到了阻碍。从此以

后，历史就在罪的影响下展开了。

尽管历史的实际进程是罪的结果，但历史的存在这一事实却不是。历史的存在始终是上帝的目的。《创世记》所描述的乐园中的情形并不是创造的终点，而是创造的起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成为肉身不仅是回应了罪。相反，上帝的最初目的就包括与人类的合一。实际上，未来成为肉身的道就是上帝在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时所采用的模型。亚当和夏娃就是这样被造的，在经过成长与教育之后，他们可以长得像成了肉身的道。罪所造成的后果是，道成肉身有了一个附加的目的：赎罪与击败撒但。

早在道成肉身之前，从最初犯罪的那一刻起，上帝就一直在引领人类走向与他更加紧密的共融。因此，上帝诅咒了蛇与土地，却只惩罚了男人和女人。就在堕落的那一刻，上帝已经在为救赎人类而工作。

以色列人在救赎这幕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上帝的“双手”正是在他选民的历史中继续做工，为人类预备与上帝的共融。因此，旧约并不是一位与基督教信仰毫不相关的上帝的启示，而是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所认识的那同一位上帝实施救赎计划的历史。

86

在恰当的时候，也就是在人类得到了必需的预备之后，上帝的道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肉身。耶稣是“第二亚当”，因为新人类在他的生平、受死和复活中被造成了，耶稣以他的所有作为纠正了罪所歪曲的一切。此外，耶稣已经击败了撒但，这令我们能够生活在新的自由中。所有在洗礼中与他联合、在圣餐中被他的身体喂养的人也分享了他的胜利。实际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个身体通过崇拜——尤其是圣餐——得到喂养，也这样与它的头联合，因此已经得到了基督的胜利最先带来的益处。在他的复活中，最后的复活已经开始，他身上的所有肢体都将参与其中。

即使是在最后，当上帝的国度建立时，上帝的牧人工作也不会结束。相反，已被救赎的人类会向着与上帝更加紧密共融的方向继续成长，“圣

化”的过程将永远持续下去，令我们越来越接近上帝。

总而言之，我们在爱任纽这里看到了一幅宏大的历史远景，而上帝的计划通过它展开了。这一历史的焦点是道成肉身，这不仅是因为上帝的道凭借道成肉身纠正了人类被歪曲的历史，也是因为人类与上帝的合一从一开始就是历史的目的。上帝的目的是与受造物人类联合，这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实现了。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的生活和兴趣与爱任纽的截然不同。克莱门可能生于雅典，那个长久以来因其哲学家而闻名于世的城市。他的父母是异教徒；但年轻的克莱门因未知的原因归信了基督教，随后便开始广泛寻找能在基督教信仰上给他更深教导的老师。在四处游历之后，他在亚历山大找到一位可以满足他求知欲的老师。他就是潘代努斯（Pantaenus），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人。克莱门留在了亚历山大，并在他的老师去世之后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了亚历山大主要的基督教教师。公元 202 年，当塞普蒂默·塞维鲁成为皇帝时，逼迫开始了，克莱门被迫离开了亚历山大。后来，他游走于东地中海各地——尤其是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直到他于公元 215 年去世。

克莱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亚历山大度过的，而亚历山大是当时最活跃的知识中心。亚历山大博物馆（或缪斯神庙）和毗邻的图书馆类似于现代的大学，因为它是各个领域的学者聚会的地方。此外，亚历山大还是一个贸易中心，它不仅是学者与哲学家的聚会所，也聚集了骗子和冒险家。因此，当时的调和主义精神在尼罗河口的这座城市达到了顶峰。

87

这就是克莱门学习与教导的背景，因此，他的思想带有亚历山大的印记。与爱任纽不同，他并不是牧者，而是一位思想家与探索者；他的目标并不是阐释教会的传统信仰——尽管他持守这一信仰——而是帮助那些

探索更深奥真理的人，并说服异教知识分子相信，基督教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荒谬迷信。

在《劝勉异教徒》（*Exhortation to the Pagans*）中，克莱门利用了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的理论，这让我们看到他神学方法的要点。"我追求认识上帝，不只是上帝的作为。谁会帮助我探索？……哦，柏拉图，我们该怎样寻找上帝？"克莱门说这段话的目的是向异教读者表明，基督教的许多教义可以得到柏拉图哲学的支持。因此，异教徒可以探讨基督教，而不是像许多异教徒理所当然地认为的，基督教是无知者与迷信之人的宗教。

可是，克莱门利用柏拉图的原因不只是为了便于他的论证。他相信，只有一种真理，因此，在柏拉图这里找到的所有真理都是在耶稣基督与圣经中已经启示出来的真理。他认为，哲学被赐予希腊人，就像律法被赐予犹太人。它们的目的都是引人认识如今在基督里被启示出来的终极真理。古代的哲学家之于希腊人，就像是先知之于希伯来人。与犹太人，上帝立了律法之约；与希腊人，上帝立了哲学之约。

那么，我们如何看出圣经与哲学家的一致呢？骤看之下，两者似乎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克莱门相信，对圣经的仔细研读，会同样得出哲学家已经认识的真理。这是因为，圣经是以象征的手法写成的，或用克莱门的话说，是"用寓言"写成的。圣经并不只有一层意义，经文的字义不应当被抛在一边。但是，仅仅满足于经文字义的人，就像是满足于吃奶且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在经文的字义之上，还有真智者必须发现的其他意义。

信仰与理性关系密切，二者缺一不可。理性论证的基础是不能被证明、但可以凭借信仰接受的第一原则。对于真智者来说，信仰就是理性建基其上的第一原则与出发点。但是，满足于信仰、却不以理性建立信仰的基督徒，也同样像是那个永远只满足于吃奶的孩子。

88

克莱门对比了满足于初级信仰的基督徒与智者，或他所说的"真灵知者"（true Gnostic）。"真灵知者"超越了经文的字义。克莱门自认为他的工作并不是牧人带领羊群的工作，而是"真灵知者"带领其他具有类似兴

趣之人的工作。这自然会导致一种精英神学,克莱门经常因此受到批评。

在此,我们不必赘述克莱门神学的实际内容。虽然他自认为是圣经的解释者,但他的寓意解经却让他在经文中发现了一些其实是受到柏拉图哲学启发的思想与教义。上帝是一位不可言说者,我们只能用隐喻和否定的方式来论述。我们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但是,至于上帝是什么,人类的语言只能指向一个言语难以描述的实在。

这位不可名状者在"道"或"逻各斯"中被启示给我们,哲学家与先知又从"道"或"逻各斯"中获得了他们所认识的一切真理,而"道"或"逻各斯"在耶稣里成为了肉身。就这一点而言,克莱门遵循了查士丁之前制定的路线。他们的主要不同在于:查士丁用"逻各斯"的教义向异教徒证明基督教的真理,而克莱门则用"逻各斯"的教义呼吁基督徒接受哲学中的真理。

不管怎样,克莱门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理解某个教义的方法,而是在于他的思想代表着在亚历山大形成的整个氛围与传统,以及他的思想对随后的神学发展的巨大影响。我们稍后在本章中讲到奥利金时,会讲到这一神学传统的下一步发展。有趣的是,克莱门还是已知的最古老的赞美诗《良善牧人》的作者。1831 年,这首赞美诗被洛威尔·梅森(Lowell Mason)翻译成英文。现在,它还在广为传唱。它的开头是:"孩童良善牧人,求领我众归真。"

迦太基的德尔图良

德尔图良与克莱门极其不同。他似乎是北非的迦太基人。虽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迦太基度过的,但他是大约四十岁时在罗马归信基督教的。回到迦太基之后,他撰写了许多论文,有的是维护信仰,驳斥异教徒;有的是捍卫正统,驳斥异端。他的许多著作因不同的原因而非常重要。例如,他的论文《论洗礼》(*On Baptism*)是现存最早论述洗礼的论文,是我们了解早期洗礼惯例的重要文献。他的著作《致他的妻子》(*To

89

His Wife)让我们对公元2世纪的基督徒婚姻有了些许有趣的了解。

德尔图良是位律师,至少受过修辞学训练,他的全部著作都带有法律思想的印记。在早前的一章中,我们引用过他对图拉真的"不公判罚"所提出的抗议:图拉真下令,不必调查基督徒,如果被带到官员面前,他们就应当受到惩罚。德尔图良的抗议读起来像是在高等法院为一起案件辩护的律师所使用的辩词。在另一部著作《论灵魂的见证》(*On the Witness of the Soul*)中,德尔图良将人类的灵魂送上了证人席,他在审问灵魂之后得出结论,灵魂是"天生的基督徒",如果它坚持拒不接受基督教,这是因为顽固与愚昧。

在论文《剥夺异端权利》(*Prescription against the Heretics*)中,德尔图良的法律思想大放异彩。在当时法律用语中,剥夺权利(Prescription)至少有两个意思。它可以是在案件开始审理之前提交给法庭的法律论据,以证明审判不应该进行。在案件实际开始审理之前,如果案件的一方能证明另一方无权提出诉讼,或诉讼提出得并不合法,或法庭根本就没有司法审判权,审判就会被取消。但是,当我们说到"长期剥夺权利"时,这个词就有了不同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如果一方在一段时期内毫无争议地拥有一份财产,这一方就成为合法的物主,即使后来又有另一方对此提出要求。

德尔图良使用了"剥夺权利"的这两个意思,仿佛正统基督教在与异端进行一场诉讼案。他的目的不仅是证明异端是错误的,还要证明他们根本就无权与教会辩论。为此,他声称圣经属于教会。教会历代以来一直在使用圣经,而异端并没有对它的所有权提出异议。即使全部圣经最初并不归教会所有——因为它的许多书卷是犹太人所著,但它现在属于教会。因此,异端根本就无权使用圣经。他们是后来者,却想要改变与使用合法属于教会的东西。

为了证明圣经属于教会,只需看看古代的各个教会。自使徒时代以来,教会始终在一致地诵读与解释圣经。例如,罗马的教会可以证明,自

己现在的主教——公元2世纪末的主教——与使徒彼得和保罗一脉相承。安提阿的教会和其他一些教会也是如此。所有使徒教会对圣经的使用与解释都是一致的。此外，由于使徒著作的本源，使徒的著作也属于使徒的教会。

既然圣经属于使徒的继承人教会，异端就无权以圣经为基础进行论证。在此，德尔图良使用了剥夺权利的另一个意思。异端无权解释圣经，因此，与他们就解释圣经展开任何辩论，都是不合适的。教会是圣经的合法拥有者，只有教会才有权解释圣经。

90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驳斥异端的这个论证被不断用来驳斥各种持不同信仰者。它也是天主教徒于16世纪驳斥新教徒的主要论据之一。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德尔图良的论证是基于证明历代教会的正式传承与教义的延续性。教义的延续性正是在宗教改革时期所辩论的，因此，这个论证并不像它在德尔图良的时代那样有力。

然而，德尔图良的法律精神不只局限于这样的论证。他的法律思想也令他肯定，我们一旦发现了基督教的真理，就不应该再去寻找真理。在德尔图良看来，仍在寻找真理的基督徒并没有信仰。

> 你们要去寻找，直到你们找到，一旦你们找到，你们就要相信。从此以后，你们只需相信你们已经相信的。此外，你们还要相信，再没有什么可去相信的了，也再没有什么可去寻找的了。[①]

这就意味着，已被公认的基督教教义已经足够，任何在此之外对真理的探寻都是危险的。当然，德尔图良允许基督徒进一步钻研基督教的教义。但是，必须弃绝一切基督教以外以及有着其他来源的东西，尤其是异教徒的哲学，那是异端的源泉，也是无用的思辨。

① *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 8.

可怜的亚里士多德啊，你给了他们辩证法，你给了他们为折毁而建造的艺术，给了他们狡猾的演说与粗野的辩论……它们否定一切，却又解决不了什么。[2]

简而言之，德尔图良谴责一切思辨。例如，辩论上帝的全能可以做些什么，这是在浪费时间，也是一个危险的行当。我们要问的，并不是上帝能做什么，而是上帝做了什么。这正是教会所教导的，这也是在圣经中所找到的。其他一切都是无用与危险的好奇。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尔图良放弃使用逻辑来驳斥他的对手。相反，他的逻辑通常稳固，且势不可挡，正如他在《剥夺异端权利》中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采用修辞进行的论证比他使用逻辑进行的论证更加有力，这有时会令他讽刺对手。例如，在驳斥马西昂的著作中，他告诉对手，教会的上帝创造出整个世界与其中的所有奇妙之物，而马西昂的"上帝"连一棵蔬菜都没有造出。他接着问，马西昂的"上帝"在最后一次启示之前在做什么？马西昂吹捧的"上帝之爱"在最后一刻才能得到吗？德尔图良将尖刻的讽刺与稳固的逻辑独特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让他成为异端的灾难、正统的斗士。

91

然而，大约在公元207年，这位异端的劲敌与教会权威的不懈捍卫者却加入了孟他努运动。他这样做的原因成为教会史上众多谜团之一，因为他自己的著作和当时的其他文献都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动机。德尔图良为什么会成为孟他努派？我们对此不可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出，德尔图良的性格和神学与孟他努主义有着相似之处。

孟他努主义得名于它的创建者孟他努（Montanus）。他在公元155年归信基督教之前是一位异教司祭。后来，他开始说预言，宣称自己被圣灵充满。很快，两位名叫百基拉（Priscilla）和马克西米拉（Maximilla）的妇女

② *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 8,7.

也开始说预言。这本身并不新奇，因为女性在当时被允许讲道和说预言，至少在一些教会是这样的。令孟他努运动与众不同并引起极度不安的是，孟他努和他的追随者声称，他们的运动正在开创一个新时代，就如一个新时代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开始，一个更新的时代将在圣灵的降临中开始。这一新时代的特点是更加严格的道德生活，就如登山宝训本身就比旧约的律法要求更高。至少一些孟他努派肯定，这一更加严格的律法包括独身。

教会之所以反对孟他努派的教导，并不是因为他们说预言，而是因为他们宣称，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已经与他们一同到来。根据新约的记载，末世始于耶稣的降生、复活，以及圣灵在五旬节被赐下。随着岁月的流逝，对末世已到的强调逐渐被人们遗忘，而在21世纪，这种强调会令许多基督徒惊诧不已。但是，在公元2世纪，教会对末世的信念却极富生命力，即末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开始。因此，像孟他努派那样宣称末世始于圣灵被赐予孟他努和他的追随者，等于贬低新约事件的意义，使福音成为救赎史上的又一个阶段。这就是孟他努主义造成的后果，是教会难以接受的。

92

德尔图良似乎是被孟他努派的严格主义所吸引。他的法律思想令他追求一切合理有序的完美秩序。尽管教会普遍尽其所能地奉行上帝的旨意，但还是有太多不合德尔图良心意的缺陷。他认为解释基督徒不断犯罪的唯一方法，是将教会视为一个中间阶段，它将被圣灵的新时代所取代。当然，这样的梦想注定破灭，古代的一些作家告诉我们，晚年的德尔图良对孟他努主义大失所望，因此，他创建了自己的教派——被古代的作家称为德尔图良派。

即使在成为孟他努派之后，德尔图良仍在与教义上的错误进行斗争。在这一时期，他撰写的最重要著作可能是短论《驳帕克西亚》(*Against Praxeas*)。在《驳帕克西亚》中，德尔图良发明了信式(formula)，而信式将在后来的三位一体与基督论争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对帕克西亚(Praxeas)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有些学者认为,根本就没有帕克西亚这个人,"帕克西亚"是罗马主教卡里克斯图(Calixtus)的另一个名字,德尔图良更愿意用一个假名攻击他。不管帕克西亚是谁,他显然在罗马教会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试图解释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的关系,但他解释的方法是德尔图良难以接受的。帕克西亚认为,圣父、圣子和圣灵只是上帝显现的三种形态,因此,上帝有时是圣父,有时是圣子,有时是圣灵——这至少是可以从德尔图良的《驳帕克西亚》中得出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圣父受难论"(patripassianism)或"形态论"(Modalism)。圣父受难论认为,圣父在十字架上受难;形态论则相信,三位一体的不同位格是上帝显现的三种"形态"。

帕克西亚也试图降低孟他努派在罗马的影响,因此,德尔图良在《驳帕克西亚》的开篇就以他特有的刻薄说:

> 帕克西亚在罗马以两种方式服侍魔鬼:驱除预言与提倡异端,驱逐圣灵与钉死圣父。[3]

然后,德尔图良继续解释如何理解三位一体。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他提出了"一个本质,三个位格"的信式。同样,在论述耶稣基督如何同为神与人时,他提出了"一个位格"和"两个本质"或"两个本性"——神性和人性。他主要以"位格"与"本体"的法律用法来解释这两个术语。但是,后来的神学家却以形而上的方式解释它们。不管怎样,重要的是,德尔图良在三位一体与基督论争辩中发明的信式,最终成为了正统的标志。

因为这些原因,德尔图良成为基督教史上一个独特的人物。他是正统的狂热斗士,驳斥每一种异端,却在最后加入了一场被教会普遍视为异端的运动。即使这样,他撰写的著作与发明的神学信式,对正统神学未来

③ *Against Praxeas* 1.

的发展仍极具影响。此外，他还是第一位用罗马帝国西部语言拉丁文写作的基督教神学家，因此，他可以被视为西方神学的奠基人。

亚历山大的奥利金

克莱门最伟大的学生是奥利金，他是本章所讲述的四位基督教教师中的最后一位。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这不同于他的老师克莱门。他的父亲在塞普蒂默·塞维鲁的逼迫期间殉道——这次逼迫也迫使克莱门离开了亚历山大。当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奥利金希望为主殉道。但是，他的母亲将他的衣服藏了起来，他只能呆在家中。他在家里写了一篇论殉道的论文，寄给了在狱中的父亲。

随后不久，在奥利金还不到二十岁时，亚历山大的主教德米特里（Demetrius）委派奥利金培训慕道友——准备接受洗礼的新信徒。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拥有非凡天赋的奥利金很快就成名了。在教导慕道友多年之后，他将这份工作交给了他最优秀的一些学生，而他则去全心管理一所基督教哲学学校——非常像古代一些伟大的哲学家所创立的学校。他在自己的学校授课，听他讲课的不仅有远道而来的基督徒，还有慕名而来的开明的异教徒，其中就有皇帝的母亲与阿拉伯的总督。

因为许多原因——包括嫉妒——德米特里与奥利金产生了冲突。结果，奥利金被迫远走他乡，定居在凯撒利亚，在凯撒利亚又继续写作与教导了二十年。

在德西乌斯（Decius）的逼迫期间（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到），奥利金最终有机会证明自己信仰的力量。由于这次逼迫的性质，奥利金并没有被处死，而是受尽了折磨，以至于在被释放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他当时大约七十岁，是在推罗（Tyre）去世的。

奥利金撰写了大量著作。他注意到不同版本的圣经存在差异，因此，他编订了《六文本合参圣经》。这是六种文本对照的旧约，包括希伯来文本、希伯来文本的希腊音译本——这令不懂希伯来文这一古老语言的读

者至少可以对它的发音有所了解——以及四个不同的希腊文译本。此外,《六文本合参圣经》还附有一整套说明异文、省略与添加的符号。除了这项伟大的杰作之外,奥利金还为圣经的许多书卷撰写了注释,还有我们已经引用过的护教文《驳塞尔修斯》和一部系统神学巨著《论第一原理》(*On First Principles*)。他的这些著作很大一部分都是他口述的,据说,他有时可以同时向多位秘书口述七部著作。

奥利金的神学精神与他的老师克莱门非常相似。他试图将基督教信仰与亚历山大当时的哲学传统——柏拉图主义联系起来。他意识到,为哲学家的教导而抛弃基督教的教义是危险的,因此他宣称,"一切不符合使徒与教会传统的东西都不是真理"。首先,这一传统包括关于上帝的教义:只存在一位上帝,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从而否定了诺斯替派关于世界起源的思辨。其次,使徒们的教导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在一切受造物之前为上帝所生,他的道成肉身令他在成为人时仍是神。至于圣灵,奥利金认为,使徒传统的论述并不十分明确,只肯定了圣灵的荣耀与圣父、圣子的荣耀是一样的。最后,使徒教导我们,灵魂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根据今世的生活受到奖赏或惩罚,身体最终将会复活,且不会再朽坏。

然而,一旦肯定了这些教义,奥利金就可以自由地翱翔在思辨的广阔天空。例如,既然使徒与教会的传统并没有告诉我们世界被造的细节,那么,奥利金就相信,还有一个广阔的探索领域。在《创世记》的开篇几章中记载了两个创造故事,犹太学者早在奥利金的时代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与样式被造,"上帝将他们造成男人和女人"。我们从第二个故事中得知,上帝先造了亚当,后造了动物,然后才用亚当的肋骨造成了夏娃。在希腊文译本的第一个故事中,描述上帝创造的动词是"创造"(to create),而它在第二个故事中是"组成"(to form)或"塑造"(to shape)。这些差异是什么意思?现代的学者们会说,这是将不同的传统融合在一起的结果。可是,奥利金认为,既然有两个创造故事,其实就是有两次创造。

在奥利金看来，第一次创造完全是灵魂上的。上帝第一次创造的是没有身体的灵魂。这就是经文记载“造男造女”的原因——也就是根本没有性别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被告知，上帝是在“创造”，而不是在“塑造”。

95 上帝这样创造灵魂的目的是，灵魂可以专心默想上帝。但是，一些灵魂不再默想上帝，它们堕落了。就是在这时，上帝进行了第二次创造。第二次创造是物质的，是堕落灵魂的避难所或暂时的家。堕落最深的灵魂变成了魔鬼，而其他灵魂则成为人类的灵魂。为了这些人类的灵魂——堕落的先在灵魂，上帝创造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身体。上帝用土“塑造”了身体，将一些造成了男人，一些造成了女人。

这就意味着，在降生世界之前，人类的所有灵魂都是作为纯灵魂——或奥利金所说的“理智”(intellects)——而存在的，我们之所以会来到世界，是因为我们在纯灵魂的先在中犯罪了。奥利金声称，所有这一切都是依据圣经，但它们显然是源自柏拉图的哲学传统，因为柏拉图传统中的类似思想已经被教导了很久。

在现今的世界上，撒但和他的魔鬼俘虏了我们，因此，耶稣基督已来打破撒但的权势，指出那条我们所要走上的重返灵魂家园的道路。此外，撒但只不过是与我们一样的灵魂，且上帝是爱，那么，甚至撒但最终也会得救，一切受造物都将回归其最初纯灵魂的状态。但是，灵魂仍是自由的，从而就无以保证不会再有新的堕落、新的物质世界和新的历史，堕落、复原、堕落的循环将永远进行下去。

在评价这些思想时，我们开始一定会惊讶于奥利金思想的广度。因此，他在教会史上各个阶段都有狂热的崇拜者。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奥利金所提出的这一切并不是被普遍接受的真理，也不会取代教会的教义，而是他自身尝试性的思辨，不应当被视为教会的权威教义。

然而，一旦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记住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奥利金在很多方面更像是柏拉图主义者，而不像是基督徒。例如，奥利金在否定马西

昂与诺斯替派的世界是由一位劣等神祇所造这一教义的同时，他也认为，物质世界与历史的存在是罪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奥利金与爱任纽明显不同，在爱任纽看来，历史的存在是上帝永恒计划的一部分。奥利金关于灵魂先在和堕落与复原永恒循环的思想，无疑偏离了基督教的普遍教导。

当我们研究教会这些伟大教父的著作时，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不同的趋向或神学思想开始形成。首先，爱任纽所代表的神学将成为叙利亚与小亚细亚的主要神学。这种神学被上帝的作为所主导：上帝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它将救恩视为与已经战胜死亡的基督的联合——一种以洗礼建立、由圣餐喂养的联合。其次，另一种神学趋向也正在形成，尤其是在亚历山大。这种神学主要关注于证明基督教与古代哲学精华之间的联系，并以探索哲学与不变的真理为主旨。对于这种神学来说，救恩在于被上帝光照而得以重返精神的世界。最后，在说拉丁语的西方，德尔图良代表着一种深刻关注道德问题的神学——有时达到了律法主义的程度，这种神学认为，救恩可以通过纯净的道德获得。在随后的几百年中，这三种神学将继续发展。说拉丁语的西方受到在德尔图良影响下形成的神学观的主导，从而将要卷入如何保守教会纯洁的持续争论中，并将在很久以后——尤其是在16世纪——又围绕着善工在救恩中的作用展开争论。很快，说希腊语的东方也由于分歧而产生了分裂，这些分歧一方面反映出爱任纽所阐释的传统，另一方面反映出奥利金的哲学观。

96

第十章

公元3世纪的逼迫

此时，在当权者面前承认信仰，将更加光荣、更加可敬，因为争战升级了，痛苦更大了，进行争战的基督徒的荣耀也将随之增加。

——迦太基的西普里安

在公元2世纪最后几年，教会过上相对和平的生活。罗马帝国卷入内战，忙于保卫自己的边境，以免受到野蛮人的入侵，从而无暇顾及基督徒。图拉真的老政策仍在施行：如果基督徒拒绝崇拜皇帝与神祇，他们就将受到惩罚，但不必对他们进行调查。因此，所有逼迫都是地方性的、零星的。

到了公元3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图拉真的政策仍然有效，所以始终存在爆发地方性逼迫的危险。但除此之外，又有了深刻影响到教会生活的新政策。制定并实施新政策的皇帝即是塞普蒂默·塞维鲁和德西乌斯。

塞普蒂默·塞维鲁的逼迫

公元3世纪初，在位的皇帝塞普蒂默·塞维鲁结束了一系列使罗马帝国受到削弱的内战。但即使是这样，统治如此广阔、如此难以治理的领地也绝非易事。生活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以北的"野蛮人"始终是个威胁。在帝国境内，又有持不同政见的派系，始终存在着军队叛乱、另立新帝，从

而导致新内战突发的危险。面对这些难题，塞维鲁觉得，他的帝国需要宗教和谐，因此，他制定了促进调合主义的政策。他计划将自己的所有臣民都团结在不可征服的太阳（太阳神）崇拜之下，并将当时的各种宗教与哲学都纳入这一崇拜中。只要承认太阳神统治万有，一切神祇就都可以接受。

很快，这项政策就与两群拒不服从调合主义、看似顽固的人发生了抵触：他们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后来，塞普蒂默·塞维鲁决定阻止基督教与犹太教的传播，因此，他宣布所有归信这两种宗教的人都属违法，将被判处死刑——这两种宗教当时正在赢得大量信徒。除了图拉真那项仍在生效的法令之外，这项政策对基督徒又构成了新的威胁

98

最终的结果是，除了公元2世纪那种地方性逼迫有所增加之外，现在又多了直接针对新信徒及其教师的更加猛烈的逼迫。因此，塞普蒂默·塞维鲁颁布上述法令的公元202年成为逼迫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据说，爱任纽就是在这一年殉道的。也是在这一年，一群基督徒在亚历山大惨遭杀害，其中就有奥利金的父亲。克莱门是亚历山大著名的基督教教师，而皇帝的法令尤其针对寻求新信徒的基督教教师，因此，他被迫逃到更少有人知道他的地区。

当时，佩尔培图阿（Perpetua）和菲里西塔斯（Felicitas）的殉道是最著名的。她们可能是在公元203年殉道。佩尔培图阿和她的同伴可能是孟他努派，她们殉道的记载大概是出自德尔图良之手。不管怎样，殉道士是五个慕道友——正准备接受洗礼的新信徒。这符合塞普蒂默·塞维鲁所制定的政策。这五个慕道友——有的才十几岁——受到了指控，罪名并不是她们是基督徒，而是她们最近归信了基督教，因此违反了皇帝的法令。

《圣佩尔培图阿与圣菲里西塔斯殉道记》（*Martyrdom of Saints Perpetua and Felicitas*）的女主角是佩尔培图阿。她年轻富有，正在哺育自己的婴儿。她的同伴是奴隶菲里西塔斯和勒沃卡图斯（Revocatus），以及两个年

轻男子萨图尔努斯（Saturninus）和塞古杜鲁斯（Secundulus）。《圣佩尔培图阿与圣菲里西塔斯殉道记》的大部分内容是通过佩尔培图阿之口讲述的，而一些学者相信，她可能的确说过其中的大多数话。当佩尔培图阿和她的同伴被捕时，她的父亲试图说服她放弃信仰，以保全性命。她的回答是，万物都有一个名字，再为它们另取名字毫无意义，她已经有了基督徒这个名字，这不会改变。

法庭对她们的审判旷日持久，这显然是因为当局希望说服她们放弃信仰。被捕时就已经怀有身孕的菲里西塔斯担心她会因为怀孕而保住性命或拖延殉道，让她不能与同伴一起殉道。但是，《圣佩尔培图阿与圣菲里西塔斯殉道记》告诉我们，上帝垂听了她的祷告，她在怀孕八个月时生下了一个女孩，一个女基督徒收养了她的孩子。看着在分娩之痛中呻吟的菲里西塔斯，她的狱友问她怎能面对竞技场中的野兽。她的回答代表了基督徒当时对殉道的理解：我现在的痛苦只是我的痛苦。但是，当我面对野兽时，会有另一个人活在我的里面，为我担当痛苦，因为我将为他受苦。④

随后，《圣佩尔培图阿与圣菲里西塔斯殉道记》告诉我们，三个男殉道士被最先送进了竞技场。很快，萨图尔努斯和勒沃卡图斯就英勇殉道了。但是，根本就没有野兽攻击塞古杜鲁斯。有的野兽不愿意扑向他，有的野兽反而扑向了士兵。最后，塞古杜鲁斯自己大声喊有只豹子会杀死他。结果豹子真的杀死了他。

我们得知，佩尔培图阿和菲里西塔斯随后被送进了竞技场，要受到一头发狂的母牛攻击。在被这头野兽顶倒之后，佩尔培图阿要求重新扎好头发，因为蓬头垢面代表着悲伤，而这一天对她来说是喜乐的一天。最后，这两个鲜血淋淋的女基督徒站在竞技场中央吻别，随后被剑刺死。

不久之后，因为一些并不十分清楚的原因，逼迫减弱了。在罗马帝国

④ *Martyrdom of Saints Perpetua and Felicitas*, 5.3.

各地，虽然仍有一些孤立的逼迫事件，但塞普蒂默·塞维鲁的法令并没有被普遍执行。当卡拉卡拉(Caracalla)于公元211年继承塞普蒂默·塞维鲁成为皇帝时，爆发了短暂的逼迫；但这次逼迫仍没有持续多久，且主要局限在北非。

随后的两位皇帝埃拉加巴卢斯(Elagabalus, 218—222)和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 222—235)采取了类似于塞普蒂默·塞维鲁的调和主义政策。但是，他们并没有强迫犹太人和基督徒接受调和主义，或禁止他们寻求归信者。据说，亚历山大·塞维鲁将基督与亚伯拉罕的像伴随他的各位神祇一同摆在他的私人祭坛上。他的母亲尤莉娅(Julia)还去亚历山大听过奥利金讲课。

在皇帝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统治之下，罗马爆发了一场非常短暂的逼迫。当时，罗马的教会分裂了，两位敌对的主教庞提安(Pontianus)和希波律陀(Hippolytus)被流放到矿场服苦役。然而，逼迫的风暴再次过去，甚至有传言称——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从公元244年至249年统治罗马帝国的阿拉伯人腓力是基督徒。

简而言之，大约有半个世纪，逼迫很少发生，许多人归信了基督教。对于这一代基督徒来说，殉道士是十分值得敬佩的，但他们已经成为过去，那些邪恶的时代似乎一去不返了。贵族中的基督徒一天多似一天，普通群众也很少再相信基督徒没有道德的古老传言。逼迫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既充满了痛苦，又满载着荣耀。

后来，暴风雨再次来临。

德西乌斯的逼迫

100

公元249年，德西乌斯成为了皇帝。虽然基督教历史学家说他很残忍，但他其实只是一个传统的罗马人，他的主要目的是复兴古罗马的荣耀。多种因素造成了古罗马荣耀的衰落。边境之外的野蛮人越来越不安分，他们对帝国的侵扰越来越肆无忌惮。当时还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罗马帝国要求所有人都有证明向神祇献祭的凭证，图为其中一种。



与古罗马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古老传统基本上已被人们遗忘。

在像德西乌斯这样传统的罗马人看来，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显然是人们抛弃了古代的神祇。如果所有人都崇拜神祇，情况就会好转，罗马的荣耀与权力就会增长。由于对神祇置之不理，罗马已招来了神怒，已被神祇抛弃。因此，若要复兴古罗马的荣耀，也必须复兴古罗马的宗教。如果帝国的所有臣民都能崇拜神祇，神祇或许会再次眷顾帝国。

101

这就是德西乌斯宗教政策的基础。它不再是关于基督徒没有道德的传言，也不是惩罚拒不崇拜皇帝的基督徒的顽固，而完全是一场复兴祖先崇拜的宗教运动——而基督教在他看来尤其损害了古罗马的宗教。对于德西乌斯来说，罗马存亡生死攸关。实际上，拒绝崇拜神祇的人被视为犯下了叛国罪。

考虑到这些情况，德西乌斯的逼迫与之前的非常不同。他的目的并不是制造殉道士，而是制造背教者。德尔图良大约在五十年前说过，殉道士的鲜血就是一粒种子，播下的越多，长出的基督徒就越多。早期基督徒的殉道榜样感动了许多亲眼目睹殉道的人，因此，逼迫似乎更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如果不是强迫基督徒殉道，而是迫使他们放弃信仰，这会令基督教失去殉道士那英雄般的见证，这将是德西乌斯复兴异教这个目标的一次胜利。

尽管德西乌斯的法令已经遗失，但他的命令显然不是逼迫基督徒这类人，而是在全罗马帝国强制推行神祇崇拜。按照皇帝的法令，所有人都

必须向神祇献祭，在德西乌斯的像前焚香。服从命令的人会得到一份凭证，或称法案证据(*libellum*)，以证明他遵守了命令；没有得到凭证的人将被视为拒绝服从皇帝命令的罪犯。

皇帝的法令证明，基督徒并没有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当时，始终生存在逼迫威胁之下的那几代基督徒已经成为过去，新的几代基督徒还没有为殉道做好准备。一些基督徒跑去服从了皇帝的命令。一些基督徒买来了证明他们已向神祇献祭的假凭证——虽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还有一些基督徒曾一度坚守信仰，但当他们被带到官员面前时，就按照要求向神祇献上祭物。还有许多基督徒决心坚守信仰，拒绝服从法令。

如前所述，德西乌斯的目的是推广神祇崇拜，而不是杀害基督徒，因此，真正殉道的基督徒相对较少。当局只是逮捕基督徒，然后试图通过酷刑与威逼利诱迫使他们放弃信仰。正是在这一政策之下，奥利金被关进监狱，受尽了折磨。在整个罗马帝国，有数百起像奥利金这样的案例。这不再是零星的或地方性的逼迫，而是有组织的全国性逼迫。在罗马帝国一些相当偏远的地区，证明已向神祇献祭的凭证被保存下来，这可以表明当时皇帝的法令曾被普遍遵行。

这场逼迫的一个结果是，教会中出现了一个光荣的新称谓："认信者"(confessors)。在此之前，几乎所有被带到官员面前并坚守信仰的基督徒都成为了殉道士，而向神祇与皇帝献祭的基督徒则成为了背教者。由于德西乌斯所制定的政策，出现了甚至在酷刑中依然坚守信仰也未得殉道冠冕的基督徒。后来，在逼迫中承认信仰的基督徒被称为"认信者"，他们深受其他基督徒的尊敬。

德西乌斯的逼迫是短暂的。公元251年，加卢斯(Gallus)继承了他的皇位，废除了他的政策。六年之后，德西乌斯以前的一位同僚瓦莱里安(Valerian)开始了新的逼迫。但是，他被波斯人俘虏，成为阶下囚，于是教会又过了四十年相对和平的日子。

背教者问题：西普里安与诺瓦替安

德西乌斯的逼迫虽然是短暂的，但它对教会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这不仅是因为逼迫本身，也是因为教会在逼迫之后必须面对的问题。简而言之，教会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背教者"(lapsed)——在逼迫期间有这样或那样的软弱的基督徒。这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其中之一是，既不是所有基督徒都以同样的方式堕落，也不是所有基督徒堕落的程度都一样。背教者的实际情况也极为不同：有的基督徒在得知皇帝的法令之后就立即跑去献祭，有的基督徒购买了假凭证，还有的基督徒在逼迫中暂时软弱，但在逼迫尚未结束时就重新认信，并要求再次加入教会。

103

考虑到认信者的巨大威望，一些基督徒认为，认信者们有权决定教会应该重新接纳哪些背教者，以及如何重新接纳他们。一些认信者——尤其是北非的认信者——宣称，他们拥有这样的权威，并开始重新接纳背教者。这遭到许多主教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教会的主教团才有权重新接纳背教者，且必须以一致与公义的方式重新接纳他们。还有一些基督徒认为，认信者和主教都表现得过于仁慈，对待背教者应当更加严厉。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辩中，有两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就是西普里安(Cyprian)和诺瓦替安(Novatian)。

西普里安在大约四十岁时成为基督徒，并在随后不久被选为迦太基的主教。他最喜爱的神学家是德尔图良，并把他称为"大师"(master)。他同德尔图良一样，接受过修辞学训练，因而可以用自己的论证轻易驳倒对手。他的著作跻身基督教历代最优秀的著作。

在逼迫前不久成为主教的西普里安认为，他的职责是与教会其他领袖一起逃到安全的地方，并通过内容详尽的书信继续带领信徒。不出所料，许多基督徒将这一决定解释为怯懦。例如，罗马的教会在逼迫中失去了主教，罗马的神职人员写信给西普里安，质问他的决定。他坚持认为，自己逃跑是为了信徒的益处，而不是因为怯懦。实际上，当他在几年之后

殉道时，他的英勇与信仰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但是，在他自身的权威受到质疑时，许多基督徒声称，已经为信仰受过苦的迦太基认信者比他更有权威，尤其是在重新接纳背教者这个问题上。

有一些认信者认为，教会应当直接重新接纳背教者，除了要求他们悔罪之外，不必再提出其他任何要求。很快，因为其他某种原因而讨厌自己主教的一些长老也加入到认信者的行列。结果，迦太基及其周边地区的教会分裂了。后来，西普里安召开了一次教会会议——由地区主教参加的会议——此次会议决定，对于那些通过购买、或者以实际献祭以外的方式获得凭证的基督徒，教会应当直接接纳。而对于已经献祭的基督徒，则只在临终之际，或当一次新的逼迫到来时他们能够有机会证明自己是真心悔罪，才能被教会重新接纳。教会永远不会重新接纳已经献祭且拒不悔罪的基督徒。这些措施都是由主教，而不是认信者执行。这些决议结束了当时的争辩，尽管教会的分裂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104

西普里安坚持对教会重新接纳背教者做出规定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他自己对教会的理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将分享它的头——基督的胜利。因此，“教会之外无救恩”，“谁不以教会为母，谁就不以上帝为父”。他的这些言论并不代表基督徒必须与教会的主教团完全一致——他自己就与罗马的主教团产生了冲突。但是，他的确相信，教会的合一是最重要的。而认信者的行为威胁到教会的合一，因此，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否定那些行为，必须坚持召开教会会议，以决定对背教者的处置。

此外，作为德尔图良的崇拜者，西普里安刻苦研究过德尔图良的著作。德尔图良的严格主义影响了西普里安，因此，他反对过于简单地重新接纳背教者。教会应当是圣徒的团契，偶像崇拜者与背教者不能进入教会。

诺瓦替安比西普里安更加严格。他与罗马主教科内利乌(Cornelius)产生了冲突，因为他认为，科内利乌过于简单地重新接纳了背教者。就在几年之前，著名的神学家希波律陀与主教卡里克斯图在罗马发生过一场

类似的冲突，因为卡里克斯图愿意宽恕犯有通奸罪、但已悔罪的基督徒，但希波律陀坚持认为，他们不应当得到宽恕。这件事的结果造成了教会的分裂，以至于罗马出现了两位主教。诺瓦替安抗议的结果也是分裂。同其他带来分裂的许多情况一样，问题在于教会的主要标志是什么：是教会的纯洁，还是教会的赦罪之爱？希波律陀造成的分裂并没有持续多久，而诺瓦替安派导致的分裂却延续了好几代。

这些事件的意义在于，它们让我们看到，由于关注自身的纯洁，以及持“罪是向上帝所欠的债”这一理解，西方教会如何不断卷入争论：教会应当如何保持自身的纯洁，又不失为爱的团契。因此，重新接纳背教者这一问题，很早就成为了西方教会的主要关切之一。如何处理已经受洗却再次犯罪的基督徒，这个问题也一再分裂着西方教会。正是出于这样的关切，一套完整的补赎制度才得以发展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后来的新教改革正是对这套补赎制度的抗议。

第十一章

基督徒的生活

……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哥林多前书》1:26—27

当我们讲述基督教的历史时，一定要永远记着，资料本身并不能公正地再现所有的历史真实。现存的大部分文献都是关于教会领袖的工作与思想，或是记载那些逼迫，以及基督徒与罗马帝国的冲突，因此，我们总是忘记，这些文献只是描绘了一幅不完整的画卷，几乎没有说到普通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或他们的信仰实践。此外，当我们试图重绘这幅历史画卷余下的部分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几乎完全没有相关的材料，因此必须整合一些零散的信息。

早期基督徒的社会出身

我们之前引用过异教作家塞尔修斯的抱怨：基督徒是一群无知的民众，他们并不在学校或公共广场上教导，而是在厨房、店铺和皮革厂中说教。虽然像查士丁、克莱门和奥利金这些基督徒的工作看似驳斥了塞尔修斯的话，但事实上，塞尔修斯所说的基本属实。基督徒中的智慧学者是个例外，他们毕竟是少数。重要的是，奥利金在护教文《驳塞尔修斯》中并未驳斥塞尔修斯的那番话。在一些有文化的异教徒——如塔西佗、科

内利乌·弗龙托和马可·奥勒留看来,基督徒就是一群可鄙的乌合之众。

他们并没有完全说错,因为近年来的社会学研究表明,最初三百年间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来自社会底层,至少这些人没有很好地融入上层人群。根据四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大部分时间是与穷人、病人和受鄙视之人一同度过的。同大多数最早的使徒相比,保罗的社会地位更高,他的确说过,哥林多的大多数基督徒是无知的、无权势的和出身卑微的。最初三百年的教会生活也基本如此。尽管教会中也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基督徒,如佩尔培图阿和多米提拉——如果她真的是基督徒——但是,她们很可能只是少数几位,教会中更多的是成百上千社会地位更低下、更没有文化的基督徒。

正是在这些普通基督徒中,出现了与查士丁和其他基督教学者风格极为不同的传说和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些典外福音书(Apocryphal Gospels)和一些使徒与圣母的"行传",这包括《彼得行传》、《耶稣致国王阿伯加书信》、《马利亚与安提阿的伊格纳修的通信》、《巴多罗买福音书》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神迹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甚至达到荒谬的程度。例如,在一部典外福音书中,小耶稣自娱自乐的方法是:打碎自己玩伴的水罐,然后将碎片扔到井里,当他的玩伴失声痛哭,称他们的父母会因打破水罐而惩罚他们时,小耶稣会命令水再次回到破碎的水罐中,一切又完好无损。另一则故事是:当小耶稣想要爬上树尖时,他并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爬上去,而是命令树向他弯下来,然后他坐上去,再命令树恢复原状。[①]

然而,这样天真的轻信并不应当令我们因此小看那些普通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将普通基督徒的神学与更有学识的基督徒的神学作一番比较,结果并不总是有利于后者。例如,同亚历山大的克莱门那不可名状的、冷漠的上帝相比,许多典外著作所描述的那位活跃的、至高无上的、公义的

① *Armenian Gospel of the Infancy*, 23.2-3.

上帝，更接近于圣经中的上帝。此外，尽管一些伟大的护教士竭力向当局证明，他们的信仰与皇帝的政策并不矛盾，但仍有迹象表明，一些普通基督徒能够充分地意识到，罗马帝国的目标必然与上帝的计划产生冲突。我们得知，当某个普通基督徒被带到帝国官员面前时，他拒不承认皇帝的权威，并宣告基督是"我的主，是统治万国万王的皇帝"。最后，当一些更有学识的基督徒倾向于将基督徒的盼望灵性化时，在普通基督徒的信仰中，仍有上帝的国度与新耶路撒冷的异象：上帝的国度终将取代现世的国度，上帝将在新耶路撒冷擦去那些在罗马帝国社会制度下受苦之人的泪水。

基督徒的崇拜

崇拜是社会各阶层的基督徒所共有的一种经验。如果想要重现这一经验，我们所依据的主要是基督教领袖留下的文献。但是，普通基督徒也进行崇拜，因此，我们只能在此粗略地了解一下所有基督徒的崇拜生活。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早期教会从一开始就有个习俗：在每周的第一天举行擘饼聚会——圣餐（Eucharist）或主餐（Lord's Supper）。在每周第一天聚会的原因是，这一天是主复活的日子。因此，圣餐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呼吁基督徒悔罪或提醒他们罪孽深重，而是为了庆祝耶稣的复活及其确保的应许。这就是《使徒行传》将圣餐描述成欢乐聚会的原因："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徒2：46—47）早期的圣餐礼并不以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的事为中心，而是以复活节（Easter）的事为中心。一个新国度已经来临，基督徒聚在一起庆祝它的降临，并成为其中一员。

108

从此以后，在基督教的大部分历史中，基督教会就将圣餐视为它的正式崇拜与最高崇拜。只是在16世纪新教改革之后，甚至在更晚的一些情况下，许多新教教会才普遍将崇拜的中心从圣餐转向讲道。

除了新约对圣餐那段众所周知、但也较为有限的记载之外，我们还可

以通过整合现存大量文献中的零散信息来重现早期基督徒的崇拜。这些文献来自不同的年代和地区，因此就传递的信息而言存在着差异与矛盾，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勾勒出典型圣餐礼的大致轮廓。

早期圣餐礼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们是庆祝活动。圣餐的基调是喜乐和感恩，而不是痛苦与悔罪。起初，圣餐是完整一餐的一部分。信徒带来他们能够带来的食物，在共同进餐之后，便是为饼与杯的特别祷告。但是，到了公元2世纪初，共同进餐被取消了，这可能是因为对逼迫的恐惧，或是为了平息关于狂欢"爱宴"的传言，或只是因为信徒数量的不断增长导致共同进餐必须取消。但即使是这样，圣餐仍然保留着最初的喜乐气氛。

两份最早见证基督徒崇拜的文献，来自比希尼亚的总督小普林尼与殉道者查士丁——我们已经在讲述公元2世纪的逼迫时提到过他们。查士丁对崇拜的记载相当简短：

109

> 在通常被称为主日（星期天）的这一天，住在城市或乡间的那些人（信徒）都聚集到一个地方，依照时间所许，诵读《众使徒的回忆录》（*memoirs of the apostles*）或众先知的著作。诵读之后，主持聚会者宣讲并勉励会众仿照众使徒与众先知的美好榜样而行。此后，我们全体起立祈祷，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在祈祷完毕之后，我们搬出饼、酒和水，由主持聚会者依照自己的能力，照样向上帝献上祷告和感谢，全体会众以"阿们"回应。于是便将这些祝圣过的食物一一分给众人，并留下一部分给那些未能到会的人，由执事随后送去。信徒中的一些有钱人，如果愿意，就随自己的意思把部分财物施舍出去；这样收集的款项由主持聚会者来保存，用于救济孤儿、寡妇和那些因患病或其他原因而有需要的人，还有那些受捆绑在牢里的人和寄居在我们这里的异乡远客。总而言之，就是由主持聚会者分给所有需要的人。主日是我们全体聚会的日子，因为它是上帝作工、改变混沌、造出世界的第一天，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在这一天从死里

复活。[2]

我们可以从这些文献以及其他一些文献中得知，至少从公元2世纪起，圣餐礼就包括两个主要部分：首先是诵读经文与解释经文，同时伴有祷告和歌唱赞美诗。基督徒在当时几乎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圣经抄本，因此，圣餐礼的第一部分通常是信徒了解圣经的唯一途径，从而导致圣餐礼的这个部分相当长——有时会持续数个小时。随后便是圣餐礼的第二部分——圣餐，以亲吻礼开始。但在此之前，那些还没有接受洗礼的基督徒在祷告与祝福之后就会被要求离开。在亲吻问安之后，饼和酒被抬出，交给圣餐的主持者，他随后会为饼与酒祷告。为饼与酒所作的祷告经常会时间很长，在祷告中，上帝的救赎之工通常会被依次述说，会祈求圣灵的能力临到饼与酒。随后，饼被擘开，在信徒中分享，一杯酒也被信徒同享共饮。最后，圣餐以祝福结束。圣餐礼还是一次与穷人分享的机会，因为信徒在圣餐礼中会为他们奉献财物。查士丁还在他的护教文另外一处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我们都是凡物公用，与所需的人一同分享。"[3] 110

早期教会的另一个习俗是在基督徒的坟墓里举行圣餐，这就是地下墓穴的作用。一些作家将"地下墓穴教会"(church of catacombs)戏剧化，把它们描述成基督徒聚在一起反抗当局的秘密场所。这多是夸大之词。地下墓穴就是墓地，它们的存在是当局所熟知的，因为不只有基督徒将逝者埋葬在地下墓穴。虽然基督徒有时的确利用地下墓穴藏身，但是，他们在地下墓穴聚会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惧怕当局，而是另有两个原因。首先，教会不被政府承认，因而并不拥有自己的财产，但是，殡葬机构却没有被政府禁止，它们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在一些城市，基督徒自己建立起这样的殡葬机构，因此就可以在自己的公墓中聚会。但更重要的是，许多信

② *I Apology*, 67.3–6.
③ *I Apology*,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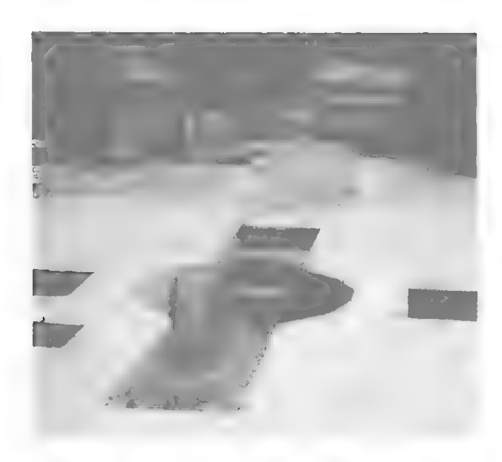
仰英雄安葬在那里，基督徒相信，圣餐不仅将他们彼此连合，将他们与耶稣基督连合，也将他们与自己的信仰先辈连合。

在殉道士坟墓举行圣餐尤其是这样。早在公元 2 世纪中期，基督徒就有这样一种习俗：在殉道士的殉道周年纪念日，他们在殉道士的坟墓聚会，举行圣餐。基督徒还相信，殉道士也是教会的一部分，圣餐会将活着的基督徒与死去的殉道士连合在同一个身体中。圣徒日就是源于这个习俗——圣徒日通常是庆祝圣徒的殉道日，而不是圣徒的生日。（收集殉道士遗物的习俗似乎开始得相当早。在公元 2 世纪中期，《波利卡普殉道记》告诉我们，波利卡普的遗骨“对于我们比珍珠还宝贵”。）

111

同在地下墓穴或墓地聚会相比，基督徒还更加频繁地在私人家中聚会。新约对此有过一些暗示。后来，随着会众的增长，一些屋子被专门用来崇拜上帝。因此，最古老的基督教堂在其成为教堂之前，似乎是一所私人住宅。它建于公元 256 年之前，是在考古挖掘杜拉-欧罗波斯（Dura-Europos）的过程中被发现的。

会众增长的另一个结果是，一个城市的所有基督徒很快就无法聚在一起崇拜了。然而，基督身体的合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一个城市出现若干会众群体时，教会似乎失去些什么。为了保护和象征教会合一的纽带，在一些地区兴起这样一种习俗：将在主教教会的圣餐礼中所使用的一块饼——圣饼片（*fragmentum*）——送到同一个城市的其他教会，并将其用到这些教会的圣餐饼中。此外，为了保护和象征全世界基督徒的合一，每个教会都有一份其他教会的主教名单，无论是远处的，还是近处的，这样就可以在举行圣餐时为其他教会的主教祷告。这些主教名单通常是记录在由合叶或绳子连接起来的两块写字板上，就像是当时常见的短笺和一些官方函件。这一套套写字板被称为“双连记事板”（diptych）。后来，将某位主教的名字从教会的双连记事板上删除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正如添加一个名字以确定合一的纽带，删除一个名字则意味着打破了这一纽带。



以弗所废墟中的公元5世纪的洗礼池。

起初，基督教的历法相当简单，基本上是以周为单位的。每个星期天都是一次复活节，都是喜乐的一天；每个星期五都是悔罪、禁食和痛苦的日子。不知是什么原因，星期三在很早时就成了禁食日。每年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星期日，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是基督徒最隆重的节日。遗憾的是，就何时庆祝这个重要的日子而言，基督徒并没有达成一致，一些基督徒认为这个日子应当根据犹太人的逾越节（Passover）而定，而另一些基督徒认为应当始终在星期日庆祝这个日子。到了公元2世纪，基督徒就这个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辩。直到今天，尽管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并不是所有教会都赞同确定复活节日期的方法。

复活节的一项活动是为新的归信者施行洗礼，接纳他们成为会众。查士丁告诉我们："我们给那些相信并赞成我们教导的人施行洗礼之后，便带他们到称为众弟兄聚集的地方，然后我们为自己，也为那些受了光照的人，为在世界各地的一切同道，恳切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完毕之后，便行亲吻礼，主礼人接过饼和杯……"随后祝谢圣餐。[4]



在预备这些通常在复活节举行的活动时，会有一段时间的禁食与悔罪。这就是我们今天大斋节（Lent）的由来。基督徒也从很早就开始庆祝

④ *I Apology*, 65.1–3.

圣灵降临节(Pentecost)[5],这是一个源于犹太人的节日。

与耶稣的降生相关的最早的节日是1月6日的主显节(Epiphany),即主显现的日子。主显节最初只是庆祝耶稣的降生。后来,12月25日开始取代主显节,尤其是在西方说拉丁语的一些地区。12月25日其实是异教的一个节日,在君士坦丁时代(公元4世纪)之后被圣诞节取而代之。

除了圣餐之外,洗礼是基督徒崇拜中另一项重大活动。我们已经讲过,只有已经接受洗礼的基督徒才可以参加圣餐。《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人们在归信基督教之后立即接受洗礼。这在早期的基督教会中是可行的,因为其中大多数归信者来自犹太教,或是受到犹太教影响的人,因而基本上了解基督徒的生活与宣讲。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外邦人加入教会,要求新信徒在接受洗礼之前进行一段时间的预备、试炼和学习是必要的,这就是“慕道期”。到了公元3世纪初,慕道期长达三年之久。在慕道期间,慕道友要接受关于基督教教义方面的教导,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他们的虔诚信仰。随着洗礼的日益临近,他们要学习信经或洗礼信条的意义,且在洗礼时会被问及是否承认其内容。最后,他们在接受洗礼前不久还要接受测验,并被列入洗礼候选人的名单。

113

洗礼通常在每年的复活节举行一次。公元3世纪初,准备接受洗礼的基督徒通常会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禁食,然后在星期天清早接受洗礼,因为这是耶稣复活的时候。准备接受洗礼的基督徒全身赤裸,男女分开。新信徒一从水中出来,就会穿上白袍,以象征他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参西3:9—12;启3:4)。他们随后会被涂油,从而成为君尊的祭司。

在所有洗礼候选人接受了洗礼之后,新入教者会列队来到聚会的地方,与其他会众一同参加他们的第一次圣餐。已经接受洗礼的基督徒会得到水喝,以此象征他们从里到外都完全洁净。他们还会得到牛奶与蜜,

---

⑤ 圣灵降临节,又译为五旬节。——译者注

以象征他们现在正在进入的应许之地。

新信徒通常浸入水中接受洗礼，或跪在水中，将水从头顶浇下来接受洗礼。写作日期不详的《十二使徒遗训》更喜欢采用“活水”——流动的水——施行洗礼。但是，在一些缺水的地区，只能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将水从新信徒的头顶三次浇下来，为他们施行洗礼。

至于是否可以为婴儿施行洗礼的问题，学者们直到今天还依然争论不休。到了公元2世纪末或3世纪初，一些文献记载，至少有些基督徒父母会让他们的孩子在婴儿时接受洗礼。但是，所有更早的文献和后来的许多文献都很少提供婴儿洗礼方面的信息，因此就无法确定早期的教会是否为婴儿施行洗礼。

教会的组织

公元2世纪，教会显然有三个不同的领导职位：主教、长老（或长者）和执事。一些历史学家声称，这一等级制度源自使徒；但是，现存的文献似乎指向了相反的方向。尽管新约确实提到过主教、长老和执事，但这三个头衔并不是同时出现的，并不总是共存的、分工明确的职责或官职。实际上，新约似乎表明，地方教会的组织因地而异，“主教”和“长者”（或长老）这两个头衔一度可以互换。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某些教会——包括罗马教会——并不是由一位主教领导，而是有一批领袖，他们有时被称为“主教”，有时被称为“长老”。 114

我们已经解释过，为了回应公元2世纪末和3世纪初的异端所带来的挑战，教会开始强调主教的权威与使徒统绪。随着越来越多的外邦人加入教会，出现异端的危险也越来越大，这反过来又令教会更加强调主教的权威。

女基督徒在早期教会中的领袖地位也值得特别关注。到了公元2世纪末，教会的正式领袖显然全是男基督徒。但是，这种现象在更早的时候并不十分明显。尤其是在新约中，有迹象表明，女基督徒也拥有领导职

务。腓利有四个“说预言”的女儿——可以讲道的人。非比是坚革哩的女执事，犹尼亚被视为使徒之一。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在公元2世纪，教会在努力与异端斗争的过程中将教会权力集中，而集权化的一个副产品便是女基督徒被剥夺了领导权。但是，也同样在公元2世纪初，总督小普林尼告诉图拉真，他下令对基督教的两位“女执事”施以酷刑。

当说到早期教会中的女基督徒时，我们应当讲述寡妇的独特作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初期教会帮助供养教会中的寡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顺从旧约不断重申的命令：照顾寡妇、孤儿和寄居者。但是，这也是实际所需，因为没有生活来源的寡妇要么被迫再婚，要么必须带着她的孩子寻找避难所。无论是哪种情况，如果新丈夫或孩子不是基督徒，她的信仰生活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教会很快就有了一个习俗：供养教会的寡妇，赋予她们特定的职责。在前面一章中，我们已经讲过一个寡妇的故事：她的侍奉激怒了异教徒，从而让她成为了殉道士。还有一些寡妇致力于教导慕道友。最终，“寡妇”一词在教会中的意义改变了，它不仅是指一个死了丈夫的女性，还指所有由教会供养、并在教会中担任某种特定职务的未婚女性。一些女基督徒为了侍奉而选择独身。就是在这时，人们开始听到一些奇怪的说法，如“被称为寡妇的贞女”。最终，这产生了比男性修道主义更早的女修道主义。

115

教会也至少从公元2世纪开始举行婚礼——当时安提阿的伊格纳修写信给波利卡普称，主教知道当时举行的所有婚礼。可以理解的是，敬虔的夫妇希望将他们的婚姻神圣化。但是，教会婚礼显然还有另一个作用：认可并非严格合法的婚姻。根据当时的法律，一对夫妇的社会地位——和随之而来的权利——是由丈夫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在早期教会中，女基督徒往往拥有比男基督徒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信徒之间正式合法的婚姻会导致严重的民事后果，即剥夺妻子一些更高的权利与地位。解决的办法就是举行不受官方或民事制约的教会婚礼。

宣教方法

虽然我们不可能给出确切的统计数据，但不容否认的是，教会在其第一个百年中，信徒数量取得了巨大的增长。我们不禁会问：教会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取得这样的增长。答案或许会令一些当代的基督徒大吃一惊，因为古代的教会根本就没有"福音布道会"或"奋兴布道会"。相反，在早期教会中，崇拜的中心是圣餐，只有已经接受洗礼的基督徒才被允许参加圣餐。因此，"福音传道"并不是在教会的崇拜中进行的，而是像塞尔修斯所说，是在厨房、店铺和集市中进行的。少数著名的基督教教师，如查士丁和奥利金，在他们的学校举行辩论会，从而在知识分子中赢得了一些归信者。但事实上，大多数归信者都是由一些无名基督徒赢得的，他们的见证令其他人归信了他们的信仰。最激动人心的见证显然是受苦以至于死的见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意为"见证"的"殉道"(martyr)一词，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殉道"这个意思。最后，一些基督徒因他们所行的神迹而闻名于世，这也赢得了一些归信者。 *116*

在行神迹的基督徒中，最著名的是格列高利·托马都古斯(Gregory Thaumaturgus)——一个意为"行神迹者"(wonderworker)的名字。他来自黑海南岸的本都(Pontus)地区，因奥利金在学识方面所作的见证而归信了基督教。他一回到本都就成为新凯撒利亚(Neocaesarea)的主教，但是，他在福音传道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并不是因为他的神学论证，而是因为传说中他所行的神迹。他的神迹主要是医治的神迹，但我们也得知，他能够控制洪水中河流的走向，使徒与圣母亦曾向他显现、指导他的工作。他还用基督教节日取代了古老的异教节日，并使基督教的节日胜过异教节日。他所使用的这个宣教方法在后来不断出现，他也是最早使用这种方法来宣教的基督徒之一。

有关基督教早期扩张的另一个惊人事实是，在新约时代之后，很少再听说有宣教士像保罗和巴拿巴那样，四处旅行宣教。福音在最初几百年

的快速传播显然并不归功于全职宣教士，而是要归功于众多因其他原因而出行的基督徒——奴隶、商人、被流放到矿场服劳役的罪犯等。

最后我们应当注意，基督教主要是在城市中传播，在乡村地区渗透得很慢，而且遇到极大的困难。到了公元100年，罗马帝国百分之六十四的港口城市和百分之二十四的内陆城市拥有了教会。公元180年时，这两个数字分别增长到百分之八十六和百分之六十五。[6] 在君士坦丁之后很久，基督教才赢得了罗马帝国乡村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异教徒（pagan）一词最初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用来指称粗野无知的乡下人。只是在大多数城市居民成为基督徒之后，主要在乡村地区存在的古代宗教才被称为异教（paganism）。

117

基督教艺术的开端

基督徒最初在私人家中聚会，因此，他们的聚会场所不可能有很多寓指基督教信仰的装饰品或象征物。即便有，它们也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是，一旦基督徒拥有了自己的公墓（地下墓穴）和自己的教堂（如杜拉-欧罗波斯教堂），基督教艺术就开始发展起来。早期的基督教艺术主要是地下墓穴和教堂中的壁画，以及用于安葬那些富有基督徒的石棺上的雕刻。

圣餐是崇拜的中心，因此，展现圣餐的场景或象征物最为常见。它们所描绘的，有时是在内室举行的圣餐，有时只是装有鱼和饼的篮子。

鱼是基督教最早的象征物之一，因此在圣餐与其他场景中经常出现。除了与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有关，鱼的意义还在于鱼的希腊文“*ICHTHYS*”：它可以用作藏头词，包含了这些短语的首字母：“Jesus Christ, Son of God, Savior”（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7]因此，鱼不仅出现在表现性的艺术中，

---

⑥ Rodney Stark, *Cities of God* (San Francisco: Harper San Francisco, 2006), 225.

⑦ “鱼”的希腊文单词是ἰχθύς “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救主”的希腊文单词是Ἰησοῦς Χριστός, υἱὸς τοῦ Θεοῦ, σωτήρ。σ与ς发音相同，因此，ἰχθύς可被视为包含了Ἰησοῦς Χριστός, Θεοῦ υἱὸς, σωτήρ的首字母。——译者注

还出现在基督教最古老的一些碑文中。例如，公元2世纪末的希拉波利斯的主教阿伯西乌斯（Abercius the bishop of Hierapolis）的碑文是，"洁净无瑕的童贞女（马利亚或教会？）所钓的大而纯洁的鱼"喂养着阿伯西乌斯。其他类似的碑文是，"上帝的族类，属天的鱼"以及"和平之鱼"。

早期基督教艺术中的其他场景描述了各种圣经故事：亚当与夏娃、方舟中的挪亚、旷野中的磐石出水、狮坑中的但以理、烈火窑中的三个年轻人、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拉撒路的复活等。总的来说，我们所发现的早期基督教艺术都非常简单，它们更具寓意，而不是写实的作品。例如，挪亚通常被描绘成站在一个小小的盒子上，盒子小得几乎难以使挪亚漂浮起来。

总而言之，古代的基督教会主要是由一群出身卑微的人组成，对于他们来说，被接纳为万王之王的后裔这一事实，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喜乐。这在他们的崇拜、艺术、共同生活和英勇殉道中都得以体现。大多数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平淡日子，这是所有社会中的穷人都必须过的生活。但是，他们因对新光明的盼望而感到喜乐，因为新光明将消灭他们社会中的黑暗、不公与偶像崇拜。

第十二章

大逼迫与最终的胜利

我只关心我所学到的上帝的律法。那是我服从的法律，我将在其中得胜。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殉道者塞利卡

在德西乌斯和瓦莱里安的逼迫之后，教会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相对和平的生活。但到了公元4世纪初，最后一次，也是最残酷的一次逼迫爆发了。当时在位的皇帝是戴克里先（Diocletian），他重组了罗马帝国，为帝国带来了新的繁荣。戴克里先重组帝国的一项措施是四位皇帝共同统治帝国。其中两位皇帝的头衔是奥古斯都：戴克里先本人是东部的皇帝，西部的皇帝是马克西米安（Maximian）。这两位皇帝之下是副帝，他们的头衔是凯撒：戴克里先之下是加勒里乌（Galerius），马克西米安之下是君士坦提乌·克洛卢斯（Constantius Chlorus）。凭着戴克里先的政治与统治天赋，只要他拥有最高权力，这种分权制度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个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皇位的有序继承，因为戴克里先的计划是"凯撒"继承他为"奥古斯都"，随后，余下的三位皇帝将任命一位"凯撒"，填补由晋升为奥古斯都的凯撒所留下的空缺。戴克里先希望，这会防止因继承问题而频发的内战，这样的内战一直困扰着罗马帝国。我们将会看到，他的这个希望破灭了。

不管怎样，在戴克里先的统治之下，罗马帝国取得了相对的和平与繁

荣。除了在帝国边境频繁爆发的小冲突之外，只有加勒里乌被迫进行了两场重要的军事战争：一场在多瑙河沿岸，一场抗击波斯人。在这四位皇帝中，似乎只有加勒里乌对基督教怀有敌意。戴克里先的妻子普莉斯卡(Prisca)和他们的女儿瓦莱莉亚(Valeria)都是基督徒。教会的安全似乎有了保障。

120 基督徒最初可能是在军队中遇到了困难。关于服兵役，基督徒并没有达成广泛共识，因为当时的大多数教会领袖称基督徒不该成为军人，但在罗马军团中却有许多基督徒。不管怎样，大约在公元295年，许多基督徒被判处了死刑，一些是因为拒绝参军，另一些是因为试图离开军队。加勒里乌认为，基督徒对参军的这种态度极其危险，因为可以想象，军队中的基督徒在关键时刻可能拒绝服从命令。因此，作为一项鼓舞军队士气的必要措施，加勒里乌说服了戴克里先，将基督徒全部逐出了罗马军团。除了将基督徒逐出军队之外，戴克里先的法令并未要求进一步惩罚基督徒。但在一些地区，某些军官试图强迫基督徒士兵放弃信仰，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过度热情，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士兵减少。结果，许多基督徒被处死，他们都是多瑙河军队中的士兵，服从加勒里乌的指挥。

121 在这些事件之后，加勒里乌对基督徒的偏见似乎越来越大，公元303年，他最终说服戴克里先颁发了一项针对基督徒的新法令。至少历史学家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因为他竭力不将逼迫的罪名加给当时的其他三位皇帝——戴克里先就是其中之一。即使这样，新法令的目的也不是杀害基督徒，而是解除他们在罗马帝国担任的重要职务。当时的法令是，免除基督徒所担任的一切公职，毁掉基督教的所有建筑与书籍。起初并没有更加严厉的措施。但是，冲突很快就升级了，因为许多基督徒拒绝交出自己的圣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施以酷刑，并被判处死刑。

后来，皇宫中发生了两场火灾。加勒里乌指责是基督徒纵火，他们想要报复，因为他们的聚会场所和书籍被毁掉了。而当时的一些基督教作

家指出，是加勒里乌自己纵火，因为他想陷害基督徒。不管真相怎样，戴克里先很快就愤怒了，他命令宫廷中的所有基督徒必须向神祇献祭。普莉斯卡和瓦莱莉亚服从了命令，而宫廷大总管多罗西斯（Dorotheus）和其他一些基督徒则殉道了。在罗马帝国上下，基督徒的聚会场所与圣经被付之一炬，一些地区过度狂热的官员效法皇帝的榜样，将基督徒处死。逼迫似乎并不十分严重的唯一地区是君士坦提乌·克洛卢斯的领地，这里的逼迫只限于拆毁一些教会建筑——至少这是希望尽量美化君士坦提乌的优西比乌告诉我们的。

局势越来越糟。一些地区爆发了骚乱，戴克里先相信基督徒正在密谋反叛他。后来，他先是下令逮捕了教会的所有领袖，然后又命令所有基督徒必须向神祇献祭。

古代教会所遭受的最残酷的逼迫就这样开始了。同前面讲到的德西乌斯一样，戴克里先尽量促使基督徒放弃信仰。许多基督徒习惯了几十年相对安逸的生活，因而屈服了。其他基督徒受尽了极其残忍的酷刑折磨，最终被以各种方式杀害。许多基督徒藏了起来，其中一些还带着圣经。甚至还有一些基督徒跨过边境去到了波斯——这似乎证实了对他们最糟糕的怀疑：对罗马帝国不忠。

与此同时，加勒里乌决心成为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公元304年，戴克里先患病，虽然他大难不死，却已虚弱不堪。加勒里乌前来觐见戴克里先，显然是劝说他退位。他也迫使马克西米安退位，因为他威胁要率领自己明显更加强大的军队入侵他邻舍的领地。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都退位了，加勒里乌和君士坦提乌·克洛卢斯成为了奥古斯都。他们之下的两位凯撒是塞维鲁（Severus）和马克西米努·达伊亚（Maximinus Daia），可他们都是加勒里乌的无能傀儡。

123

然而，加勒里乌的这些安排并不受罗马军团中许多军人的欢迎。在罗马军团中，君士坦提乌的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和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森狄（Maxentius）深受喜爱。年少时的君士坦丁曾先后在戴克

里先与加勒里乌的宫廷中生活过一些年，明显是作为确保父亲君士坦提乌·克洛卢斯效忠的人质。但是，君士坦丁逃跑了——或如同一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他被释放了，并见到了父亲，他的父亲曾以健康欠佳为由而要求见他。在君士坦提乌去世之后，军队拒不服从加勒里乌的安排，并宣布君士坦丁才是他们的奥古斯都。与此同时，马克森狄攻取了罗马，统治这个古老帝都的塞维鲁被迫自杀。加勒里乌入侵了马克森狄的领地；但是，他的军队开始倒戈，投奔了他的对手，他被迫回到了有更多人支持他的帝国东部。最终，绝望中的加勒里乌请求戴克里先复位主持大局。但是，戴克里先宣称，他非常喜欢退休后种卷心菜的生活，并拒绝重新主持帝国的政务——但他愿意主持这几个政敌之间必要的谈判。谈判的最终结果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安排，其中就包括任命李锡尼（Licinius）为新的奥古斯都。到此时为止，帝国各地有许多人都声称他们是某个地区的统治者，这样的人多到难以在此一一列举，新的内战显然一触即发。与此同时，君士坦提乌·克洛卢斯的儿子君士坦丁却在巩固他在高卢与大不列颠的地位，他在等待时机。

在如此混乱的政治局势中，对基督徒的逼迫还在继续，但逼迫的程度取决于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位皇帝所制定的政策。在罗马帝国的西部，大部分领地处于君士坦丁和马克森狄的有效控制之下，这两位皇帝都没有强制实施逼迫基督徒的法令，他们认为，逼迫基督徒是他们的敌人加勒里乌的事情。加勒里乌和他的主要傀儡马克西米努·达伊亚继续逼迫基督徒。马克西米努试图完善加勒里乌的政策，他将基督徒逼迫致残，将他们发配到采石场做苦力。但在后来，许多被判刑的基督徒开始在服刑地建立新教会，于是马克西米努或是将他们杀害，或是将他们再次流放。殉道士的名单越来越长，似乎没有尽头。

然而，基督徒却意外地得到了帮助。加勒里乌患上了令他痛苦不堪的疾病，基督徒称那是上帝对他的惩罚，他可能相信了基督徒的话，从而勉强决定改变自己的政策。根据基督教历史学家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记

载，公元311年4月30日，加勒里乌宣布：

> 我们为国家的利益所颁布的一切法律，都是为了恢复罗马人的古老法律和传统纪律。我们尤其希望带领已经放弃祖先信仰的基督徒回归真理……在我们颁布法令，命令所有基督徒回归到古代的习俗之后，许多基督徒出于恐惧而遵行了，我们不得以才惩罚其他基督徒。可是，仍有许多基督徒坚持己意，我们知道，他们既不会崇拜与服侍神祇，甚至也不会崇拜和服侍他们自己的上帝。因此，在对所有人的仁慈的驱使之下，这样做似乎是公义的：宽恕他们，允许他们再次成为基督徒，再次在他们的聚会所中聚会，只要他们不妨碍公共秩序。
>
> 我们将在另一个法令中就此事再对地方官员做出指示。
>
> 作为对我们宽容的回报，我们将要求基督徒为我们、为我们的国家和他们自己向他们的上帝献上祷告，以便国家可以繁荣昌盛，他们可以安居乐业。

这项法令结束了罗马帝国对教会最残酷的逼迫。监狱的大门很快就被打开了，许多因逼迫而伤痕累累的基督徒走了出来，但是，他们依然感恩，因为他们认为，至高的上帝解救了他们。

加勒里乌在五天之后去世，基督教历史学家拉克唐修(Lactantius)特意向世人表明，逼迫基督徒的人会可怕地死去，他宣称，加勒里乌的忏悔来得太迟了。

罗马帝国随后被君士坦丁、李锡尼、马克西米努·达伊亚和马克森狄所瓜分。前三位皇帝彼此认可，共同宣布马克森狄为篡位者。至于他们对基督徒的政策，马克西米努·达伊亚是唯一一位很快就重启已被加勒里乌停止的逼迫的皇帝。

然而，一次结束逼迫的政治大变动即将发生。在之前的阴谋与内战



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教会在他的领导下进入一个新时代。

中。一味耍弄政治手腕的君士坦丁发动了一场战争，最终令他成为罗马帝国的主人。君士坦丁突然集结了他在高卢的军队，他们穿越阿尔卑斯山，向马克森狄的首都罗马进军，而这完全出人意料。惊慌失措的马克森狄未能守住他的要塞，君士坦丁的军队迅速将其占领。马克森狄只能集结他在罗马的军队，与高卢的入侵者进行战斗。罗马坚不可摧，如果马克森狄选择一个更加明智的战略，只守不攻，历史或许会被改写。但是，他咨询了他的占卜官，得到的建议是进行战斗。

根据两位认识君士坦丁的基督教编年史家记载，君士坦丁在大战前夕得到了一个启示。其中一位编年史家拉克唐修称，君士坦丁在梦中接到命令，将一个基督教的象征物放到他士兵的盾牌上。另一位编年史家优西比乌说，异象出现在天空中，同时出现了这几个字："你将靠此得

胜"。不管怎样，事实上君士坦丁命令他的士兵在盾牌和军旗或拉伯兰旗(*labarum*)上使用一个看似希腊字母 *Chi-Rho* 叠置在一起的标志。这两个希腊字母是"基督"的前两个字母，因此，这样的拉伯兰旗很可能是基督教的一个象征物。尽管基督徒认为，这是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的伟大时刻，但是，历史学家指出，即使在这件事之后，君士坦丁还在崇拜太阳神——不可征服的太阳。实际上，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将在下一章讲述。

126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马克森狄战败了，他在米尔汶桥(Milvian Bridge)作战时掉入河里，溺水而亡。君士坦丁就这样成为罗马帝国整个西部的主人。

君士坦丁的战斗一旦打响，他就迅速向前推进。在米尔汶桥战役之后，他在米兰会晤李锡尼，与李锡尼结成盟友。他们达成的一项协议是，停止逼迫基督徒，返还他们的建筑、公墓和其他财产。这项协议被称为《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它通常被认为是逼迫结束的标志(公元313年)，尽管加勒里乌的法令实际上更加重要，且马克西米努·达伊亚甚至在《米兰敕令》颁布之后还在推行他的逼迫政策。通过一系列措施——我们将在下一章讲述，君士坦丁最终成为了唯一一位皇帝，逼迫结束了。

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还是陷入新的、也许是更艰难困境的开始，将是我们在接下来的许多章节中讲述的主题。不管是哪种情况，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无疑对基督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基督教被迫要面对新的问题。基督徒自称是一位木匠的仆人，他们的伟大英雄是渔夫、奴隶和被国家处死的罪犯，当他们突然被罗马帝国的荣耀与权力包围时，他们会怎样？他们仍会坚守信仰吗？又或者是，曾在酷刑与野兽面前坚守信仰的基督徒，会屈服于安逸生活和社会威望的诱惑吗？这些都是基督教在它的下一个历史阶段中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建议阅读：

Lewis Ayres, Andrew Louth, and Frances M. Young,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Henry Bettenson, ed. *Document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London: Oxford, several editions.

E. C. Blackman. *Marcion and His Influence*. London: S. P. C. K., 1948.

Gillian Clark. *Christianity and Roman Socie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E. R. Dodds. *Pagan and Christian in an Age of Anx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W. H. C. Frend. *The Early Church*.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66.

Robin Lane Fox. *Pagans and Christians*. Now York: Knopf, 1987.

Justo L. González.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Vol. I. Nashville: Abingdon, 1970.

Edgar J. Goodspeed. *A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Robert M. Grant.

Christopher Hall. *Learning Theology with the Church Father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2002.

R. P. C. Hanson. *Tradition in the Early Church*. London: SCM, 1962.

Hans Jonas. *The Gnostic Relig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8.

Josef A. Jungman. *The Early Liturgy to the Time of Gregory the Great*.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59.

Hans Lietzmann. *The Beginning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London: Lutterworth, several editions.

Hans Lietzmann. *The Founding of the Church Universal*. London: Lutterworth, several editions.

Ramsay MacMullen. *Christianizing the Roman Empire (A. D. 100 – 4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Margaret M. Mitchell and Frances M. Young,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ume I: Origins to Constantin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Jaroslav Pelika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Vol. 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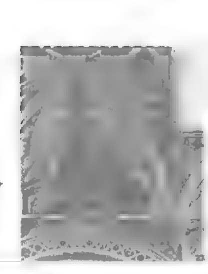
Rodney Stark.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A Sociologist Reconsiders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Gérard Vallée. *The Shaping of Christianity: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Its Formative Centuries (100 – 800)*. New York: Paulist, 2001.

Robert B. Workman. *Persecution in the Early Church*. London: Epworth Press, reprint, 1960.

第二部分

帝国教会



编年表

罗马帝国皇帝	罗马主教①	历史事件②
君士坦丁(306–337)	西尔维斯特一世(314–335)	《米兰敕令》(313)
		阿里乌之争爆发
		帕科米乌创建第一座修道院(324)
		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325)
		建立君士坦丁堡(330)
	马库斯(335–336)	
君士坦丁二世(337–340)	尤利乌斯一世(337–352)	
君士坦斯一世(337–361)		
君士坦斯(337–350)	利伯里乌(352–366)	阿里乌主义达到顶峰
朱利安(361–363)	※菲利克斯二世(353–365)	异教徒回应基督教
约维安(363–364)		
瓦伦提安一世(364–392)		
瓦伦斯(364–378)	达马苏一世(366–383)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与阿塔那修(373)
格拉提安(375–383)	※乌尔西努(366–367)	阿德里亚堡战役(378)
瓦伦提安二世(375–392)	西里西乌(384–399)	☆大巴西尔(379)
		☆玛格里娜(380)
狄奥多西一世(379–395)		☆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381)
马克西姆(383–388)		
		☆纳西盎的格列高利(389)
欧根尼乌(392–394)		☆尼撒的格列高利(395?)
阿卡狄乌(395–408)		☆图尔的马丁与安波罗修(397)
霍诺里乌(395–423)	阿纳斯塔修(399–401)	
狄奥多西二世(408–450)		
		罗马陷落(410)
	佐西莫(417–418)	
		☆哲罗姆(420)
		☆奥古斯丁(430)

① ※表示不被罗马天主教承认的主教。

② ☆表示人物去世的年份。

第十三章

君士坦丁

> 上帝的永恒、神圣、深不可测的良善，并不允许我们在黑暗中徘徊，而是指给我们救恩之路……我在别人身上看到，也在自己身上看到。
>
> ——君士坦丁

我们在上一章中讲到，在米尔汶桥击败马克森狄之后，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一同下令，停止逼迫基督徒。尽管我们已提到他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但是现在，我们要简要地讲述一下他实现这个目标的经过。此外，我们还要讨论他归信基督教的性质与诚意。但是，对于基督教的历史来说，至关重要的并不是君士坦丁的诚意，或是他如何理解基督教信仰，而是他的归信及其统治在他生前身后的影响。他对基督教的影响是深远的，以至于一些学者提出，教会大部分历史都生存在君士坦丁时代(Constantinian Era)，甚至在今天的21世纪，我们也在经历这一漫长时代的终结所导致的危机。是否果真如此，这是我们在讲述当今教会历史时将要讨论的问题。不管怎样，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对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本卷《基督教史》的整个第二部分都可以视为基督教为适应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而做出的一系列回应与调整。

从罗马到君士坦丁堡

早在米尔汶桥战役之前，君士坦丁就一直在为扩张他旗下的领地做

着准备。为了这个目的，他极其努力地在高卢与大不列颠建立强大的军事基地。他用五年多的时间加固了他在莱茵河畔的边界，因为这里的野蛮人始终是个威胁。他凭借公正和智慧的统治赢得了自己臣民的支持。但是，这并没有令他成为一位理想的统治者。他爱慕奢华与虚荣，在自己的首都特里尔（Trier）建造了宏伟华丽的宫殿，却忽视了公共建设，以至于附近田地的排水系统瘫痪，作为地区经济支柱的葡萄园被洪水淹没。然而，他似乎拥有这样一类统治者的罕见天赋：他们知道征税到何种程度才不会失去自己臣民的忠诚。他确保边境免于野蛮人的入侵，因而赢得了许多高卢人的感激。在竞技场中，频繁而放纵的表演赢得了喜爱暴力与血腥之人的支持——如此之多被掳的野蛮人就这样成为牺牲品，以至于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证实，表演令人乏味，因为就连野兽都厌倦了杀戮。

132

作为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君士坦丁每次只挑战一个敌人，在采取下一个行动之前总要保护好他的侧翼。因此，虽然他对马克森狄的进攻看似突然，但他多年来一直在军事与政治上为此做着准备。他的军事准备是，在与马克森狄的战争中只投入四分之一的资源，从而确保当他出师在外时，野蛮人不会大举入侵，他的领地不会爆发叛乱。在外交方面，他必须确保东临马克森狄的李锡尼不会乘虚而入，借君士坦丁战争之机入侵并攻取马克森狄的一些领地。为了预防此类事件发生，他将同父异母的妹妹康斯坦丝（Constance）许配给李锡尼，并与他未来的妹夫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这应当很好地保护了他的侧翼。但即使这样，他还是等到李锡尼卷入与马克西米努·达伊亚的冲突之后才入侵意大利。

133

米尔汶桥的胜利让君士坦丁控制了罗马帝国的西部，而帝国东部仍被李锡尼与马克西米努·达伊亚瓜分。君士坦丁在米兰与李锡尼的会晤似乎巩固了他们的联盟，这迫使李锡尼将矛头指向了他们共同的敌人马克西米努·达伊亚。李锡尼迅速采取了行动。当马克西米努还在附近的拜占庭——后来的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时，李锡尼率领比马克西米努人数更少的军队出现在他面前，击败了他。马克西米努被迫

逃跑，并在不久之后去世。

罗马帝国随后被李锡尼与君士坦丁瓜分：李锡尼统治着意大利的整个东部和埃及，君士坦丁则控制了意大利、西欧和北非的西部。这两位皇帝因联姻而成为亲戚，所以内战有望结束。但事实上，李锡尼和君士坦丁都希望统治整个帝国，帝国虽然庞大，可对这两位皇帝来说还是太小了。有一段时间，这两个对头都在致力于巩固各自的实力，都在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着准备。 134

战争最终爆发。谋杀君士坦丁的阴谋败露，随后的调查牵出李锡尼的一个亲戚，但他已经逃到李锡尼的领地。李锡尼拒绝将他的亲戚交给君士坦丁处决，并最终向君士坦丁宣战。虽然基督教历史学家通常将引发这场战争的全部责任都归咎于李锡尼，但事实上，希望与妹夫开战的君士坦丁让他的敌人成为挑衅者。君士坦丁的军事策略胜过了李锡尼，李锡尼被迫寻求和解。君士坦丁再次证明，他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他对夺取了李锡尼在欧洲的大部分领地十分满意。

随后是一段和平时期。君士坦丁再次利用这段时间巩固他在新领地的权力。他并没有住在罗马帝国的西部，而是将总部先后设在塞尔曼（Sirmium）和撒尔底迦（Sardica）——现在的索非亚（Sofia）。这两座城市都位于君士坦丁新近征服的领地，因此，他可以密切注视李锡尼的一举一动，并加强他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休战持续到公元322年，但两位皇帝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冲突的主要原因还是两位皇帝的野心，这在授予他们儿子头衔与荣誉的问题上显露无疑。但到了战争最终爆发时，宗教政策问题也成为冲突的原因。

我们需要澄清李锡尼的宗教政策，因为在君士坦丁胜利之后，为了证明君士坦丁对李锡尼发动的战争是合理的，一些基督教作家并没有公正地对待李锡尼。在颁布《米兰敕令》许多年之后，李锡尼并没有采取任何针对基督徒的行动。实际上，在讲述李锡尼战胜马克西米努·达伊亚的那段历史时，当时一位基督教作家的记载读起来非常像君士坦丁战胜马 135

克森狄的那次胜利，其中也包括一个异象。但是，李锡尼领地中的基督教因许多问题发生了分裂，这些分裂扰乱了公共秩序。当李锡尼动用皇帝的权力维护和平时，一些基督徒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开始将君士坦丁视为真信仰的捍卫者，是“上帝所爱的皇帝”。李锡尼并不是基督徒，但有迹象表明，他惧怕基督教上帝的能力；因此，当他得知自己的臣民在为他的敌人祷告时，他将这种行为视为叛国。就是在这个时候，李锡尼开始采取针对基督徒的措施，这反而给了君士坦丁一次良机，让他得以成为对抗逼迫者李锡尼的基督教捍卫者。

公元 322 年，君士坦丁入侵了李锡尼的领地，借口是他在追击一伙跨过了多瑙河的野蛮人。不管是对是错，李锡尼将其解释为故意挑衅，他在阿德里亚堡（Adrianople）集结了军队，准备与君士坦丁开战。在阿德里亚堡，他等待着君士坦丁相对较少的军队。

当时的编年史家证实，李锡尼惧怕君士坦丁拉伯兰旗的魔力，他命令自己的士兵不要看基督教的这个象征物，避免正面攻击它。如果这是事实，那一定会削弱李锡尼军队的士气。不管怎样，在一场漫长血腥的战斗之后，君士坦丁的军队以少胜多，赢得了当天的战斗，李锡尼逃到了拜占庭。也许是在尼哥米底亚的主教优西比乌（Bishop Eusebius of Nicomedia）——随着我们的讲述，他将起到重要的作用——的陪同下，李锡尼的妻子康斯坦丝以她丈夫的名义去见哥哥君士坦丁，君士坦丁许诺不杀李锡尼，但条件是李锡尼退位。随后不久，李锡尼被人谋杀。此时，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主人。

君士坦丁统治了十三年，直到他于公元 337 年去世。同之前的内战相比，这是一段重建与繁荣的时期。但是，政治始终动荡不安，许多人因或真或假的密谋反叛皇帝而被处死，其中就有君士坦丁的长子克里斯普斯（Crispus），他曾指挥父亲的舰队与李锡尼作战，而君士坦丁后来却下令将他处死。

君士坦丁并不因单纯迷恋权力而追求绝对权力。他同之前的德西乌

斯和戴克里先一样，也梦想着复兴罗马帝国的古老荣耀。他们的主要不同在于，德西乌斯和戴克里先试图通过复兴异教实现这一目的，而君士坦丁相信以基督教为基础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个目标。这个政策最坚定的一些反对者是在罗马，尤其是在元老院中，一些老牌贵族因他们古代神祇与特权的衰落而痛心疾首。在与李锡尼决战的若干年前，君士坦丁因利益问题而与元老院产生了冲突。现在，作为罗马帝国无可争议的主人，他开始着手启动一个更大胆的计划：他将修建一座"新罗马"，一座坚不可摧、永垂青史的城市，他要将它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之城"。 136

君士坦丁很可能是在与李锡尼的战争中意识到拜占庭的战略价值。拜占庭位于欧洲的最边缘，几乎与小亚细亚接壤。因此，它可以成为罗马帝国的欧洲领土与亚洲领土之间的桥梁。此外，如果防御工事设置得当，拜占庭还可以控制博斯普鲁斯（Bosporus）海峡，而博斯普鲁斯海峡是所有船只从地中海通往黑海的必经之路。几十年前与波斯帝国签署的和平条约即将到期，君士坦丁觉得必须将自己的首都设在帝国东部边境附近。与此同时，莱茵河畔的日耳曼部落却始终是个威胁，因此，对于君士坦丁来说，将首都设在距帝国西部太远并不是明智之举。基于这些原因，拜占庭似乎成为新首都的理想地点。实际上，君士坦丁的选择是最明智的，因为他所建立的城市将在未来几百年中发挥战略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将做出这一决定的功劳归于自己，而是声称他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

然而，对于这位伟大皇帝的宏大梦想来说，古代的拜占庭太小了。它的城墙是在塞普蒂默·塞维鲁统治时期修建的，还不足两英里。君士坦丁模仿了罗慕路斯（Romulus）与雷穆斯（Remus）建造罗马的古老传说。他来到古城墙之外很远的地方，用他的长矛标出了修建新城墙的界线。这次行动伴随着盛大的仪式，基督徒和异教司祭都参加了。陪同君士坦丁的一些朝臣看到他走进深远的乡村，这表明他心目中的"新罗马"已经相当阔大，便问皇帝还打算走多远，据说，君士坦丁的回答是："远到走在我之前的那一位"。毫无疑问，随行的基督徒会认为，这句话是在说他们

的上帝，而异教徒则会认为，那是指他们的神祇，或可能是指“不可征服的太阳”。到了仪式结束时，君士坦丁的足下已经踏出一片广阔的区域，足以容纳众多的群众。

新城墙的修建立即开始。现有的原材料与熟练技工并不足以兑现君士坦丁的时间表，因此，雕像和廊柱等材料被从各个城市运来。君士坦丁的代表在帝国上下搜寻一切可以用来装饰新首都的东西。哲罗姆（Jerome）在几年之后说，君士坦丁堡穿上了从帝国其他城市身上夺来的盛装。许多

137

异教神祇的雕像被从它们的古老神庙中搬出，并安放在一些公共场所，如竞技场、公共浴场或广场。古代神祇只是被用作装饰物，似乎失去了它们以往的能力。

被这样运到君士坦丁堡的那些雕像中，最著名的可能要算是阿波罗神像——据说它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雕刻家之一菲迪亚斯（Phidias）的作品。它被放在城市中央，立在一块从埃及运来的巨大石柱之上，而这个石柱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石。为了令石柱更高，它被立在一个高度超过二十英尺的大理石底座上。整座雕像从底到顶大约高一百二十五英尺。但是，雕像已经不再代表阿波罗，因为他的头像被换成了新头像——君士坦丁的头像。

其他大型公共建筑还有圣伊琳娜大教堂（Saint Irene Church）——神圣的和平女神，还有竞技场和公共浴场。此外，还为君士坦丁建起了一座巨大的皇宫，也为少数同意从古罗马迁来的贵族仿造了他们祖先的官邸。

然而，这一切仍不足以令人们移居到君士坦丁堡。为了让君士坦丁堡住满人口，君士坦丁给与到这里居住的人各种特权，如免税与免服兵役。为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免费提供油、面粉和酒很快就成为惯例。结果，君士坦丁堡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起来，以至于在一百多年之后的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必须再次修建新城墙，因为城中的人口已经远远超过在君士坦丁时代看似奢望的数目。

我们将在《基督教史》上卷的后面几章中讲到，君士坦丁修建新首都

的决定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在西罗马帝国——包括古罗马——被野蛮人推翻后不久，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中心，让古罗马帝国的政治与文化遗产又存活了一千年。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位于古代的拜占庭，因此，东罗马帝国也被称为拜占庭帝国。

从不可征服的太阳到耶稣基督

长久以来，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的性质始终是个有争议的主题。就在本章所讲述的事件过后不久，就有基督教作家——我们在下一章就会遇到一位——试图说明，君士坦丁的归信正是教会史与罗马帝国史所努力的目标。其他基督教作家则声称，君士坦丁只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意识到将从“归信”中得到好处。

这两种解释都是夸大其词。阅读当时的文献就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君士坦丁的归信与其他基督徒的归信极为不同。当时，归信的人被要求进行长期的操练与学习，以确保他们能够理解与活出新的信仰，之后他们才能接受洗礼。当他们努力学习自己的信仰在不同生活环境中的意义时，他们的主教就是导师与牧者。

138

君士坦丁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即使在米尔汶桥战役之后，以及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接受过基督教的教师或主教的指导。拉克唐修这样的基督徒——他儿子克里斯普斯的私人教师——只是他的一个侍从。而科尔多瓦的主教霍修斯（Hosius of Cordova）则是他与其他教会领袖的联络员。但是，君士坦丁保留了决定自己信仰实践的权利，甚至会干涉教会的生活，因为他自认为是“主教的主教”。即使在归信之后，他也经常参加基督徒绝不会参加的异教祭典，而主教也从未谴责过他。

这不仅因为君士坦丁的权力与暴躁，也因为他并不是正式的基督徒，他还没有接受洗礼，尽管他的政策支持基督教，他一直承认基督的能力。实际上，他在临终之时才接受洗礼。因此，教会认为，这些支持基督教的政策或法令都是一位对基督教友好、甚至是倾向于成为基督徒的皇帝所

颁发的，而不是一位已经接受洗礼的基督徒皇帝的作为。此外，君士坦丁的所有信仰或道德过失也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一位倾向于成为基督徒、但还不是基督徒之人的不幸行为。这样的人可以接受教会的建议，甚至是教会的支持，却绝不会接受教会的命令。这种不明确一直持续到君士坦丁临终的那一刻。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原因，让我们不能将君士坦丁完全视作一位为了博得基督徒的好感而自称支持基督教的机会主义者。首先，这种观点犯了一个严重的时代错误，因为它往往将君士坦丁视为现代政治家的先驱。当时，即使是最不信宗教的政治人物，也没有以如此精明算计的态度来处理宗教问题。其次，如果君士坦丁是机会主义者，他选择寻求基督徒支持的时机也不是很好。当他将 *Chi-Rho* 放到他的拉伯兰旗上时，正准备攻打异教传统的中心罗马，而他在罗马的主要支持者是那些自认为被马克森狄压迫的老牌贵族。基督徒群体在战争即将打响的帝国西部并不强大，而是在君士坦丁几年之后所主宰的帝国东部更加强大。最后，我们还应当指出，不管基督徒给予君士坦丁怎样的支持，这些支持的价值到底有多大都是值得怀疑的。由于教会对军役的矛盾态度，军队中的基督徒士兵相对较少，尤其是在帝国西部。在普通人中，大多数基督徒来自社会底层，因此难以给予君士坦丁经济上的支持。在与罗马帝国近三百年的紧张关系之后，很难想象基督徒面对君士坦丁这样一位始料未及的基督徒皇帝时会持怎样一种态度。

139

实际上，君士坦丁可能真的相信基督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一能力的理解与基督教殉道士的完全相同。对于他来说，基督徒的上帝是一位能力非凡的神祇，只要他支持基督徒，他就会得到上帝的支持。因此，当君士坦丁颁布支持基督教的法律时，当他兴建教堂时，他希望得到的并不是基督徒的善意，而是他们的上帝的善意。正是这位上帝，赐给他在米尔汶桥和随后的多次胜利。从某种程度上讲，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理解很像李锡尼的理解，因为李锡尼惧怕其敌人拉伯兰旗的超自然威

力。他们的不同只在于，君士坦丁试图通过支持基督徒的事业来获得这种能力。对君士坦丁信仰的这种诠释可以被他自己的言论所证实。他的话表明，他是个真诚的人，但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并不充分。

这并不妨碍君士坦丁侍奉其他神祇。他自己的父亲信奉"不可征服的太阳"。在并不否定其他神祇存在的同时，崇拜"不可征服的太阳"就是崇拜其象征物为太阳的至高之神。君士坦丁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似乎始终认为，"不可征服的太阳"与基督徒的上帝并不矛盾——或许是对同一位至高之神的两种观念。虽然其他神祇处于从属地位，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也拥有相对的能力。君士坦丁有时会考虑阿波罗的神谕，接受作为皇帝传统特权的大祭司这一头衔，参加各种异教庆典，可他却并不认为他这样做是在背叛或遗弃曾经赐予他胜利与能力的上帝。

君士坦丁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拥有极大的权力，以至于他可以支持基督徒，兴建教堂，甚至可以将一些神像运到君士坦丁堡来装饰他梦想中的城市。但是，如果他想要禁止异教崇拜，难以招架的反抗很快就会向他袭来。古代神祇绝没有被遗忘。基督教在老牌贵族与乡村群众中传播得缓慢。在军队中，许多士兵信奉密特拉(Mithras)和其他神祇。当时的两大学术中心——雅典学院与亚历山大图书馆——致力于研究古代异教徒的智慧。君士坦丁的法令并没有禁止这一切——至少到此时还没有。不管怎样，他并不想颁布这样的法令，因为他并没有看出"不可征服的太阳"与"上帝道成肉身的儿子"之间存在任何矛盾。

140

出于对当时这些情况的考虑，君士坦丁缓慢但却坚决地推行着他的宗教政策。这样的过程可能既符合政治的实际需要，也符合君士坦丁自己内心的发展，因为他逐渐抛弃了古代宗教，对新信仰有了更好的理解。起初，他只是结束了逼迫，下令返还基督徒被没收的财产。随后不久，他又有了支持基督教的新表现，例如，他将妻子在罗马的拉特兰宫赠给了教会，还命令帝国的军营为参加于公元314年召开的阿尔勒宗教会议(Synod of Arles)的主教随时提供服务。与此同时，他还努力与信奉古代

宗教的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尤其是与罗马元老院。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是异教。作为帝国的元首，君士坦丁拥有罗马教宗或大祭司的头衔，并履行与之相关的职责。在公元320年之前的铸币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神祇的名字、象征物以及基督这个名字的交织字母——君士坦丁在米尔汶桥第一次使用的☧。

同李锡尼的战争让君士坦丁有机会以基督教捍卫者的姿态出现。现在，他正在进入教会长久以来拥有信徒最多的地区。在击败李锡尼之后，君士坦丁任命许多基督徒担任政府的高职。他与罗马元老院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罗马元老院仍在倡导异教复兴，因此，君士坦丁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基督教。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的一项法令规定，所有士兵必须在每周的第一天崇拜至高的上帝。这一天是基督徒聚会庆祝主复活的日子。可是，异教徒也在这一天崇拜"不可征服的太阳"，因此，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反对皇帝的法令。一年之后（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召开了一次主教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First Ecumenical Council of Nicea）。[1] 此次大公会议是由君士坦丁召集的，他再次命令罗马帝国的军营随时为远道而来的主教提供服务。

兴建君士坦丁堡是君士坦丁推行自己宗教政策的又一举措。兴建"新罗马"是为了削弱主要是异教徒的老牌贵族的权力。为获得用于装饰新首都的雕像与其他物品而掠夺异教神庙，是对异教的一次打击，许多异教的古代神殿因此失去了当地人崇拜的对象。甚至基督教作家也承

141

认，这是通过无理的暴力实现的，人们通常因为害怕受罚而屈服。与此同时，兴建崭新奢华的教堂与洗劫古老的神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这样，君士坦丁几乎到了临终的那一天，都还在履行他异教大祭司的职责。在他去世之后，继承他皇位的三个儿子并没有反对元老院将

---

1 参见上卷附录：普世大公会议表，该表列出了全部普世大公会议召开的时间及其主要决议。

他奉为神明的举动。于是，一位具有讽刺意味的奇特人物出现了：给异教带来极大损害的君士坦丁成为了异教的一位神祇；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东方教会还将他视为圣徒，这样就出现了一位身为异教神祇的基督教圣徒！

从受逼迫到占据统治地位

君士坦丁无疑是教会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至于我们可以将从他的时代直到20世纪初恰当地称为"君士坦丁时代"——但是，他并没有令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君士坦丁本人还是一位异教祭司，这与他的皇帝身份很相称，他到临终之际才接受洗礼。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君士坦提乌(Constantius)和君士坦斯(Constance)都接受了洗礼，他们的一些法令必然支持基督教。但是，在他们的统治时期也是纷争不断，这主要是因为教会在阿里乌主义(Arianism)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裂——阿里乌主义是关于基督与上帝的理论，我们将在第十七章讨论——而皇帝的宗教政策正是以这场争辩为中心。公元356年，当时的独一皇帝君士坦提乌宣布，偶像崇拜是死罪；但是，这项法令并没有被普遍执行。后来，君士坦丁的侄子朱利安(Julian)——他已经接受了洗礼——领导了一次异教复兴，因此他被普遍称为"背教者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在朱利安的统治之后，约维安(Jovian)和瓦伦提安二世(Valentinian II)继续采取先前支持基督教的政策，但是，他们所支持的基督教基本上是阿里乌派的基督教。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采取针对异教的严厉措施。基督教与异教在罗马帝国拥有相同的地位，都被国家所承认和支持。直到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375—383)统治末年——他邀请狄奥多西(Theodosius，379—395)与他共治——他们才采取了令异教陷入不利境况的决定性措施。公元382年，格拉提安下令，政府不再给予异教及其司祭经济支持，胜利女神的祭坛也被搬出了元老院议事厅。公元391年，狄奥多西宣布异教献祭违法，异教神庙也随之或被关闭，或被改为公用。公元392年，所有异教崇拜都

被禁止了,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公共的。

然而,古代宗教受到的最大威胁在于,一些过度狂热的主教以及暴徒将上述法令视为以暴力对付异教的特许。早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前,一些狂热的基督徒就使用暴力破坏异教崇拜,这有公元305年在西班牙召开的埃尔维拉会议(Council of Elvira)为证,此次会议的第十六条教规规定:"如果任何基督徒因捣毁偶像而被杀,他们不应当被算作殉道士。"现在,随着基督教得到罗马帝国的支持,异教失去了罗马帝国的保护,对异教徒——犹太人——使用暴力很少受到惩罚。著名的主教,甚至是像图尔的马丁(Martin of Tours)这种圣徒般的主教,也曾去捣毁异教徒的神庙和其他崇拜处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基督徒对异教徒使用了暴力,异教徒对新秩序进行了反抗。在亚历山大,主教提阿非罗(Theophilus)——我们还会遇到他,他是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最厚颜无耻的敌人之一——声称,他拥有所有异教神庙;他洗劫了异教神庙,还炫耀他的战利品。他的异教敌人聚在萨拉匹斯(Serapis)神庙,捉住并钉死了许多基督徒以泄愤。于是提阿非罗向当局申诉,当局包围并最终占领了神庙。后来,提阿非罗还召来了沙漠修士,将萨拉匹斯神庙摧毁。类似的事件在迦太基、巴勒斯坦和其他地区不断上演。

"异教"(paganism)一词也许最能说明当时的变化。古代宗教并没有名字,只有不同神祇的名字。在公元4世纪的这些事件之后,异教被赶到了罗马帝国最偏远的地区,我们已经讲过,一些基督徒用来轻蔑地称呼敌人的乡巴佬(*paganus*)一词,转变成是对那些信奉古代宗教、但现在是乡村宗教的异教徒的称呼。

新秩序的影响

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最直接的结果是逼迫停止了。在此之前,甚至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基督徒也一直生活在逼迫的威胁之下,许多基督徒的盼望就是殉道。在君士坦丁归信之后,逼迫的危险与殉道的盼望都没有

了。君士坦丁之后统治罗马帝国的异教皇帝很少会大肆逼迫基督徒，而是试图通过其他方式复兴异教。但是，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对教会生活的直接影响远非显而易见的停止逼迫。就这一点而言，皇帝的一系列法令赋予了教会及其领袖各样特权，而这些特权的影响在21世纪的一些地区仍然存在。其中一项特权是免除教会的财产税，以及使教会的财产遗赠合法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教会将逐渐拥有广阔的土地及其他财富。主教——当时大约有一千八百位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也得以免税、免服兵役，其他公民为公共工程必须付出的多日劳动也因此豁免。主教可以自由出入罗马帝国的军营，这在公元314年的阿尔勒宗教会议和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上先后获得通过，最后成为帝国的一项普遍政策。君士坦丁还试图为个人行为立法，尤其在性道德方面，他似乎受到基督教教导的影响。但是，他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类似的情况在整个教会史上也并不罕见。与此同时，教会领袖现在得到了新的特权、威望和权力，这很快就令他们变得傲慢，甚至是腐败。历史学家狄奥多勒（Theodoret）提到过某个叫卢西乌斯（Lucius）的人，他买来亚历山大的主教职，"仿佛它只是个世俗的高职"——这种行为后来被称为"买卖圣职"，另有古代作家也证实了其他地区的类似行为。随着主教拥有了审判权，便有人向他们行贿，他们通常也会收受贿赂。虽然这绝对不是普遍行为，但这暴露出教会此时所面临的新危险——即教会在拥有权力与威望时所经常遇到的危险。

至于平信徒，他们归信基督教的经验与以往相比无疑不再那么激动人心，也不再那么性命攸关。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当时的调和主义和迷信色彩越来越浓。考古学家在罗马帝国各地的墓穴发现了这样一些证据，人们用基督教和异教的象征物与宗教工艺品作为陪葬。当人们生病时，他们经常求助于古代巫术，这令许多基督教传道人大为苦恼。角斗士的格斗表演还在继续，一些基督徒现在也参与其中——他们也会参加一些以前曾被禁止参加的表演。

罗马帝国规定，每周的第一天被用来崇拜——显然，这既是崇拜基督，也是崇拜“不可征服的太阳”。这个法令使基督徒可以更容易地聚会，而不必在工作开始之前的凌晨聚会。这与国家的庆典及其虚华一同影响到基督徒的崇拜，大多数普通基督徒也许在实际信仰生活的崇拜中最能感受到新秩序的影响。

在君士坦丁之前，基督徒的崇拜相对简单。最初，基督徒在私人家中聚会。后来，他们开始在公墓聚会，如罗马的地下墓穴。到了公元3世纪，基督徒有了专门用来崇拜的建筑，如我们在第十一章中讲过的杜拉-欧罗波斯教堂。

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罗马帝国的礼仪开始影响基督徒的崇拜。用来向皇帝表示尊敬的焚香，开始在基督教会中出现。此前一直身着便装的司祭人员，开始穿着更为华丽的服饰——他们很快就被称为“司祭”(priests)，这是在模仿他们的异教同行；与此同时，圣餐桌变成了“圣坛”(altar)——这并不符合此前《十二使徒遗训》中的教导。同样，通常在皇帝面前表示尊敬的许多肢体语言，现在也成为基督徒崇拜的一部分。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与星期日的祷告有关。此前，基督徒在星期日并不是跪着祷告，因为这一天是我们被接纳的日子，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来到至高的宝座前，成为大君王的后裔。现在，在君士坦丁之后，基督徒总是跪着祷告，像是在皇帝面前请愿。以列队歌唱赞美诗进入教堂开始崇拜的习俗也被引进了基督徒的崇拜。唱诗班随之发展起来，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给这个唱诗队伍赋予一个形体。最终，会众对崇拜的参与变得越来越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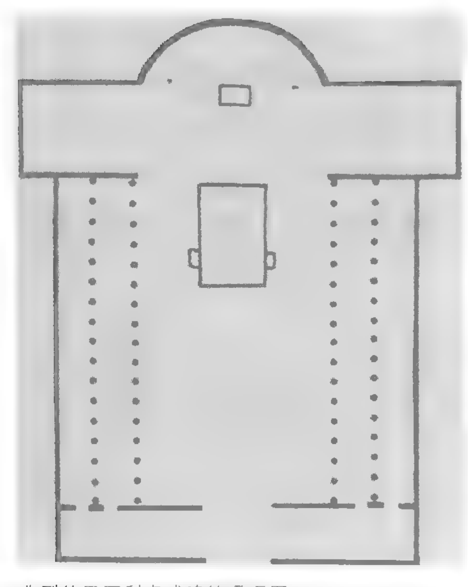
144

早在公元2世纪，在殉道士的墓地举行圣餐，来纪念他们的殉道周年，就已经成为基督教的一个习俗。现在，许多这样的地方建起教堂。后来，一些基督徒认为，在伴有殉道士遗物的圣地举行圣餐特别有效。结果，一些基督徒开始挖掘殉道士的遗物或部分遗骨，目的是将它们放到正在修建的教堂的圣坛之下。还有一些基督徒开始宣称，他们得到无名殉

道上或几乎已经被遗忘的殉道士的启示。一些基督徒甚至还声称，他们得到告知他们某位殉道士埋葬地的异象——就像是安波罗修（Ambrose）和圣盖尔瓦修（Gervasius）与圣普罗他修（Protasius）的所谓遗物那样。最终，圣徒与新约时代的圣徒遗物据称拥有神奇的力量。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Helena）皇后尤其促进了圣徒遗物的发展，因为她声称，她在去圣地耶路撒冷朝圣的途中发现了基督的十字架。很快，人们就开始传说这个十字架具有神奇的力量，于是罗马帝国各地开始找到号称源自这个十字架上的木块。

与此同时，教会的许多领袖对这一切却是另眼相看，他们努力阻止极端的迷信。因此，他们讲道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要想成为一个好基督徒，不一定要到圣地崇拜，也不应当夸大对殉道士的崇敬。但是，这样的讲道却难以胜任，因为人们蜂拥进入教会，以至于教会几乎没有时间预备他们的洗礼，洗礼之后更没有时间指导他们的信仰生活。与以前教会对新信徒长期进行全面的教导和培训不同，教会现在对于要求洗礼的新信徒无能为力，难以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培训与监督。在接受洗礼之前的培训与教导被大大缩短了，很快就有许多新信徒来到洗礼池前，却不知道洗礼的意义。伴随许多新信徒一同到来的还有一些教会以前难以接受的信念与习俗——许多抨击基督徒中流行迷信的讲道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君士坦丁及其继任者的时代所兴建的教堂，与杜拉-欧罗波斯这样简朴的教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君士坦丁亲自下令，在君士坦丁堡修建圣伊琳娜教堂。他的母亲海伦娜在圣地修建了伯利恒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 in Bethlehem），在橄榄山也修建了一座教堂。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都修建了类似的教堂，这或者是出于皇帝的命令，或者只是效法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榜样。有时，地方居民被命令为修建教堂捐赠物资并献上劳动。这项政策在君士坦丁的继任者统治时期还在施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希望凭借建造雄伟的教堂而留名青史。尽管君士坦丁及其第一代继任者修建的大多数教堂已经被毁，但仍有足够的物证可以让我



典型的巴西利卡式建筑平面图

们大体上了解它们的基本设计。不管怎样，后世仍然屹立的许多教堂都模仿了它们的基本设计。

其中一些教堂在中央有一个圣坛，其建筑平面是多边形或近乎圆形。但是大多数教堂都采用了“巴西利卡”(basilica)式建筑的长方形基本设计。“巴西利卡”是一个古代用语，是指大型的公共建筑——有时也是私人的——它的主体是一个被两排或多排柱廊纵向分成若干中殿的大厅。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的最初几百年，“巴西利卡”式建筑为教堂建造提供了基本模型，因此，这样的教堂被称为“巴西利卡式基督教堂”。

总的来说，巴西利卡式教堂有三个主要部分：中庭、中堂和圣殿。中庭是入口，通常是一个由墙壁围绕起来的长方形区域。中庭的中央有一个喷水池，信徒在进入教堂的中堂之前，可以在这里举行沐浴的仪式——洁净的仪式。中庭的侧面邻接教堂的其他部分，这一区域被称为前廊，前廊有一扇或多扇通往中堂的门。

中堂是巴西利卡式教堂面积最大的部分。中堂的中央是主中堂，数排柱廊将它与数个侧中堂分开。主中堂的堂顶通常高于教堂的其他部分，因此，在将主中堂与侧中堂隔开的两排柱廊上，有能够提供充足光线的窗户。侧中堂比主中堂低，通常也较窄。柱廊一般有两排或四排，因此，一些巴西利卡式教堂共有三个或五个中堂。尽管有的巴西利卡式教堂的中堂多达九个，但是中堂超过五个的并不多见。

在主中堂的尽头，靠近圣殿的地方，有一个区域专门留给了唱诗班，

而这部分通常由栅栏围起。在这个部分的两侧，各有一个讲坛，在诵读圣经与解释圣经时使用，也在歌唱《诗篇》时供主要的领唱者使用。

圣殿位于中堂的尽头，它的基底更高。圣殿与中堂垂直相交，它的宽度要比教堂其他部分的更大一些，这就令巴西利卡式教堂的整个建筑平面呈一个十字形或"T"字形。圣坛摆放在靠近圣殿中央的地方，举行圣餐时所使用的饼与酒摆放在圣坛上面。

圣殿的后墙位于主中堂的正后方，是一面半圆形的墙壁，这就形成了一个环形殿——圣坛后一个凹入的空间。司祭人员的长椅正对着环形殿的墙。如果是某位主教的主要教堂，那么长椅中会有一把留给主教的椅子，即"主教座"（cathedra）——"主教座堂"（cathedral）就源于这个词。有时，主教会坐在主教座上讲道。

巴西利卡式教堂内部装饰华丽，有磨光的大理石、精致的灯和做工精细的挂毯。但是，基督教艺术在当时的典型表现手法是镶嵌画，而东方教会此后一直如此。教堂的墙壁上装饰着由精致的彩色小石块、玻璃片或瓷片镶嵌而成的图画。这些镶嵌画通常表现的是圣经与基督教传统中的故事。有时也会表现出资修建教堂的人，这个人通常会被描绘成手持教堂小复制品的形象。当然，圣坛后的环形殿的墙壁是重点装饰的对象。这通常是一幅巨大的镶嵌画，画中所表现的内容或是膝上抱着圣子的圣母，或是坐在荣耀中的宇宙的至高统治者基督。将基督描绘成宇宙的统治者（*pantokrator*）表明了新的政治局势对基督教艺术的影响，因为基督被描绘成坐在宝座之上，非常像罗马帝国的皇帝。

教堂附近还有其他建筑。其中最重要的是足以容纳数十人的洗礼堂。洗礼堂通常是圆形或多边形的，中央是洗礼池，信徒可以沿着台阶进入池中。洗礼池的形状通常具有象征意义——圆形或子宫形象征新生，棺材形象征旧人已死、成为新人，八角形是提醒信徒一个新时代、"创造的第八天"在基督里已经到来。洗礼是在洗礼池中进行，通常采取的是浸水或泼水或合并使用这两种。准备接受洗礼的信徒跪在水中，然后奉圣父、

圣子和圣灵的名将水从他们头顶浇下。(事实上,这至少是在公元9世纪之前施行洗礼的通常方法。很久以前教会一直在以头上点水施行洗礼,但点水礼通常只是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比如体弱、临终或缺水。公元9世纪时,选择这种洗礼方法在西欧一些比较寒冷的地区更为普遍。在意大利,浸水洗礼一直沿用到13世纪,而东方教会至今仍然采用浸水洗礼,如希腊和俄罗斯等国的教会。)

在洗礼堂的中央,一张巨大的帐幕将洗礼堂一分为二,一边供男性使用,一边供女性使用,因为基督徒在公元4世纪时仍然是赤裸进入水中接受洗礼,他们从水中出来时会被披上一件洁白的袍子。

这一切足以说明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所带来的影响。古代教会延续着自己的传统习俗。圣餐仍是崇拜的中心,在每个星期天举行。基督徒仍普遍浸入水中接受洗礼,洗礼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它的古老象征意义。但是,新环境带来的变化也随处可见。因此,教会当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来适应新环境。

回应新秩序

新秩序的一个结果是,一种所谓的"官方神学"发展起来。君士坦丁恩待基督教,许多深受影响的基督徒试图证明,上帝拣选君士坦丁带领教会史和罗马帝国史走向两者最终合一的顶峰。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是教会历史学家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

其他基督徒则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皇帝现在自称是基督徒、人们因此而涌入教会这一事实并不是上帝的祝福,而是巨大的损失。一些基督徒倾向于这种看法,但并不希望脱离与教会其他信徒的团契,他们退隐到沙漠,在沙漠中过着默想与苦修的生活。殉道不再可能,因此,这些基督徒相信,基督的真正精兵必须继续操练,如果不再是为了殉道,那也是为了修道。因此,公元4世纪,大批最敬虔的基督徒退隐到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中。这一早期修道主义运动将是第十五章的

148

主题。

还有一些消极看待新秩序的基督徒，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便是脱离教会的团契，因为教会现在成了帝国教会，是有罪的，违背信仰的。我们将在第十六章讲述他们。

还有许多基督徒既没有退隐到沙漠，也没有制造分裂，而是留在教会，进行了大量的智力活动。正如每一个这样的时代，一些基督徒所提出的理论与教义，在另一些基督徒看来却必须予以否定。其中最重要的是阿里乌主义，它引发了关于三位一体教义的激烈争辩。在第十七章中，我们将讨论公元361年之前的阿里乌之争，而朱利安在这一年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皇帝。

朱利安的统治标志着对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的另一种态度达到了顶峰：异教徒的回应。第十八章将讲述朱利安的统治与复兴异教的尝试。

然而，大多数基督徒对新秩序的回应是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否定。教会的领袖大多认为，新环境既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因此，正如大多数基督徒始终在做的那样，他们在肯定效忠皇帝的同时也坚持认为他们最终效忠于上帝。这就是教会里一些伟大教父的态度——用词不当，因为其中还有"教母"。巨大的危险与机遇并存，因此，这些领袖肩负着一项艰巨使命。也许，他们的所有决定与态度并不都正确；但即使这样，这仍然是一个伟人辈出的时代，他们塑造了未来几百年的教会以及教会的神学。

第十四章

官方神学: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

向西望去,向东望去,环顾整个世界,甚至是仰望天空,我总能在各处看到,蒙上帝祝福的君士坦丁带领着同样蒙上帝祝福的罗马帝国。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很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学识的基督徒。我们可以从上面引用的话中看出,他是对君士坦丁及其成就最为狂热的崇拜者之一。因此,他有时被描述成没有骨气的人,倾倒于君士坦丁的权力光辉之下。但是,如果我们思考优西比乌的职业生涯,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优西比乌大约生于公元260年。他最可能生于巴勒斯坦,并在这里度过早年的大量时光。他以“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这个称谓闻名于世,因为他是凯撒利亚的主教,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里,尽管我们难以断定他是否生于凯撒利亚。我们对他的父母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就无法确定他是成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还是在他年轻时归信了基督教。

不管怎样,深刻影响优西比乌的是凯撒利亚的潘菲鲁斯(Pamphilus)。潘菲鲁斯生于贝里图斯(Berytus)——今天黎巴嫩的贝鲁特,他在亚历山大受教于一位著名的基督教教师比埃里乌(Pierius),而比埃里乌正在亚历山大继续着奥利金的工作。在贝里图斯担任过一些重要的职务之后,潘菲鲁斯可能是应贝里图斯主教的邀请来到了凯撒利亚。凯撒利亚的教

会拥有奥利金的图书馆，潘菲鲁斯在图书馆的管理与扩充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在这项工作中，他得到了另一些基督徒的帮助，他们被他的求知欲与敬虔的信仰所感动。年轻的优西比乌就是其中之一，他被贝里图斯的这位学者深深吸引。为了表示对潘菲鲁斯的感激，他自称为"潘菲鲁斯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Pamphilus）或者优西比乌·潘菲列（Eusebius Pamphili）——潘菲鲁斯之子或童仆。

150

潘菲鲁斯、优西比乌和其他一些基督徒共事了多年，他们可能生活在一起，钱财共用。学生最终胜过了老师，优西比乌开始四处走访，寻找关于基督教起源的文献。在共事的这段时间里，潘菲鲁斯和优西比乌完成了几部著作，但其中的大部分著作现已遗失。

然而，他们平静的学术生活行将结束。当时仍然是逼迫的年代，始终潜伏在地平线的危险现在变成了戴克里先逼迫的大风暴。公元 303 年 6 月，凯撒利亚发生了逼迫，多年以来，凯撒利亚第一次有基督徒殉道。从此以后，逼迫的风暴愈演愈烈。公元 305 年，基督教的死敌马克西米努·达伊亚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皇帝。两年之后，潘菲鲁斯被捕。但是，当时的逼迫风暴已有所缓解，这位伟大的基督教学者在被监禁了两年多之后才被处死。在被监禁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潘菲鲁斯和优西比乌合作完成了一部五卷本的《为奥利金辩》（*Defense of Origen*），优西比乌在自己的老师殉道之后又增补了第六卷。

优西比乌并没有被捕，我们并不清楚他为什么没有被捕。他至少离开凯撒利亚两次，有人认为，他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为了逃避被捕。当时，大多数基督徒认为，在逼迫期间躲藏起来并不可耻，因为谁能殉道是上帝的拣选。不管怎样，优西比乌在逼迫期间并没有受到逼迫，尽管他的老师与许多同工都为主殉道。

在如此邪恶的年代，优西比乌还在撰写将成为他最重要著作的《教会史》（*Church History*）。他后来修订了《教会史》，此书对于后世的教会历史学家来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他的《教会史》，就没有我们现在正在



位于罗马斗兽场附近的君士坦丁凯旋门是少数保存下来的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的历史遗迹

讲述的许多历史。优西比乌收集、整理和出版了几乎所有我们现在已知的早期教会史的人物与事件。如果没有他，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教早期历史将会减少一半。

公元311年，情况最终发生了改变。先是加勒里乌颁布了宽容基督徒的法令，后是君士坦丁击败马克森狄，与李锡尼在米兰会晤，共同结束了对基督徒的逼迫。在优西比乌及其幸存的同工看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直接干预，就像是《出埃及记》中的那些事件。从此以后，优西比乌开始将君士坦丁与李锡尼视为实现上帝计划的工具。其他许多基督徒可能也是这样认为，只不过他们的观点并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君士坦丁最终与李锡尼爆发战争之后，优西比乌相信，李锡尼疯了，他开始逼迫基督徒。只有君士坦丁才是上帝所拣选的工具。

151

在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皇帝的几年之前，优西比乌已被选为

凯撒利亚的主教。这一职务责任重大，因为逼迫驱散了他所牧养的基督徒，他现在必须重新召聚与组织他们。此外，凯撒利亚的主教不仅管辖凯撒利亚的教会，还管辖巴勒斯坦的其他教会。现在，身为牧师与管理者的优西比乌很少有时间去从事写作与学术了。

优西比乌担任凯撒利亚的主教多年，直到新的风暴再次打破教会的平静。这次不是政府的逼迫，而是一场威胁到教会合一的激烈的神学争论：关于耶稣神性的阿里乌之争。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因此不必在此赘述。我们只需说，优西比乌在这场神学争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无可指摘。但这绝不是因为他是伪君子或机会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没有完全理解争论的实质。在他看来，教会的和平与合一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虽然他最初倾向于阿里乌主义，但在尼西亚大公会议时他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随即在此次大公会议结束时又再次动摇。他是著名的主教和学者，因此，许多人去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混乱立场——许多智力天赋不及他的人可能更是如此——并没有帮助阿里乌之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152

优西比乌在几年前就见过君士坦丁，当时，这位未来的皇帝与戴克里先的朝臣正一同访问巴勒斯坦。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优西比乌看到君士坦丁正努力寻求教会的合一与福祉。在其他很多时候，他与君士坦丁也有过会面与通信。当君士坦丁和他的朝臣为庆祝新建的圣墓大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的献堂而来到耶路撒冷时，优西比乌对这位皇帝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次庆典是庆祝君士坦丁统治十三周年的一部分。当时，阿里乌之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为这次隆重的献堂庆典而欢聚一堂的主教们——先在提尔，后在耶路撒冷——十分关注这场神学争辩，君士坦丁也不例外。作为该地区主要城市的主教，优西比乌在庆典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做了一场颂赞君士坦丁的演讲。这篇讲稿被保存下来，它成为许多人指责优西比乌纯粹谄媚的理由之一。但是，按照当时在这种场合的惯例来看，优西比乌颂赞君士坦丁的演讲还是相当适度的。

但不管怎样，优西比乌既不是君士坦丁的密友，也不是君士坦丁的谄媚者。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凯撒利亚及其附近地区，忙于教会事务，而君士坦丁则生活在君士坦丁堡或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他们的接触都是短暂的，时断时续。优西比乌的许多同工都很钦佩他，因此君士坦丁也争取获得他的支持。优西比乌相信，在此前多年的巨大试炼之后，君士坦丁已被上帝兴起，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支持君士坦丁。此外，当君士坦丁于公元337年去世之后，优西比乌才将最高的赞词献给这位为教会带来和平的统治者。因此，他并不是阿谀奉承的人，而是不加批判的感恩之人。即使在这一方面，他也比一些同时代人更有分寸，因为当时的编年史家告诉我们，有些基督徒竟然向君士坦丁的雕像献祭！

然而，优西比乌的感激远远超过了可见的赞美之词。他对发生在君士坦丁身上的事情的理解影响到他的全部工作，尤其是他对之前的教会史的理解。他最终定稿的《教会史》并不只是试图重述之前教会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他的《教会史》实际上是一篇护教文，试图证明基督教是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尤其是在罗马帝国这一背景中来看。类似的观念此

153

前就已经出现，公元2世纪的一些基督教作家宣称，所有真理都源自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肉身的逻各斯。一些基督教作家如查士丁和亚历山大的克莱门认为，哲学和希伯来圣经都被作为福音的预备而赐下。此外，当时还流行这样一种观念：罗马帝国及其为地中海盆地带来的相对和平是上帝所命定的促进基督教信仰传播的一种手段。还有一些基督教作家——如爱任纽——认为，从亚当和夏娃开始的整个人类历史是一个上帝不断操练人类与上帝融合的漫长过程。优西比乌当时所做的，只是集合了这些不同的思想，证明它们在教会史与罗马帝国史的可证事实中发挥着作用。这样的历史并不只是如古文物研究者般地收集材料，而是进一步证明基督教的真理：基督教是人类历史的顶峰。

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是证明上述命题的关键。优西比乌认为，逼迫的主要原因是罗马当局并没有看到基督教在罗马最优秀传统上锦上添

花。同信仰与哲学一样，信仰与罗马帝国其实并不矛盾。相反，基督教信仰是哲学和罗马帝国的顶峰。因此，优西比乌对历史的理解是：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们对基督教有利，而是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新局势是鲜活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它证明了人类全部历史所指向的福音真理。

这种神学观令优西比乌很难对他那个时代的事件采取一种批判性的立场。他似乎意识到君士坦丁的一些缺点，尤其是他的暴躁，有时甚至是嗜血的禀性。但是，优西比乌对这样的缺点保持了沉默，他显然不想削弱自己的论点。

这一切的重要性并不只是在于，优西比乌是对君士坦丁保持沉默，还是对他品头论足。更重要的是，优西比乌的工作还告诉我们，新环境在多大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塑造着基督教神学，甚至到了让基督教神学丢弃一些传统主题的程度。

有三个例子足以说明，基督教神学在如何调整和适应新的环境。首先可以明确肯定的是，在新约时代与早期教会中，福音首先是穷人的福音，富人很难听到与接受福音。实际上，富人怎样才能得救，正是早期基督徒所关注的神学问题之一。但是现在，从君士坦丁开始，财富与荣华被视为上帝恩惠的标志。下一章就会表明，修道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抗议——抗议这种认为基督徒生活要迁就环境的观念。但是，优西比乌——和他可能代言的成千上万基督徒——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当受逼迫的教会成为掌权者的教会时正在发生的巨变，以及潜藏在这一巨变中的危险。

同样，优西比乌还以极大的喜乐与自豪描述了当时正在修建的华丽教堂。但是，这些华丽的教堂和为与之相配而发展起来的崇拜礼仪，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了类似于罗马帝国贵族的神职人员贵族。同帝国的达官显贵一样，他们经常远离普通百姓。教会在自己的崇拜礼仪与社会结构中都模仿了帝国的习俗。

最后，优西比乌所提出的历史计划令他抛弃了——至少在重要性上

贬低了——早期基督徒所宣讲的一个基本主题：对上帝绝对掌权之国的盼望。尽管优西比乌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达，但阅读他的著作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现在，因着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上帝的计划已经实现。基督徒不再需要选择服侍上帝之国或现世之国，因为现世之国已经成为上帝之国的代表与工具。在现世的政治制度之外，基督徒的所有盼望只是进入天国。基督徒的盼望被降低到来世或遥远的未来，似乎与今生没有多大关系。信仰往往成为一种进入天国的方法，而不是在今生与来世的生活中服侍上帝。基督徒放弃了之前的观念：新时代已经在基督的复活中来临，基督徒通过洗礼与圣餐参与其中。现在，基督徒的盼望被局限在个人对来世生活的盼望。自从君士坦丁时代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优西比乌与其他许多有着类似神学倾向的基督徒的工作，出现了一种抛弃或在重要性上贬低早期教会盼望——即主会驾云再来，建立和平与公义的国度——的倾向。后来，只要"君士坦丁时代"还在继续，大多数重燃末世盼望的基督徒个人与基督徒运动都会被贴上异端与颠覆分子的标签，并受到这样的谴责。只是随着"君士坦丁时代"的结束，尤其是在 20 和 21 世纪，末世论才再次成为基督教神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虽然优西比乌的生活说明了正在发生的变化，但这并不是说，只有他一人应对这些变化负责。相反，那段时期的整个历史似乎表明，虽然优西比乌比大多数基督徒更善于表达，但他只是表达了许多基督徒所共有的情感，对于他们来说，君士坦丁的出现和他所带来的和平，是基督教对仇敌的最终胜利。这些基督徒并不能用优西比乌那样的博学与文采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们一步一步地塑造了未来的教会。优西比乌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官方神学"的缔造者，而是成千上万基督徒——他们同优西比乌一样，对上帝最终将教会从逼迫中拯救出来的怜悯存有敬畏——的代言人。然而，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以同样的热情看待新环境，随后的几章将对这点予以充分的证明。

155

第十五章

修士的回应：修道主义

离开修道之所或去找他人陪伴的修士，失去了他们的宁静，犹如离开水的鱼儿，失去了它的生命。

——安东尼

教会在君士坦丁带来的和平之后有了新地位，但是，并不是所有基督徒对此都同样认可。一些基督徒相信，最近发生的事实现了上帝的计划，如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另一些基督徒与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认为基督徒的生活标准降低了，并因此而感到悲伤。耶稣曾说的那扇窄门已经变宽，无数人从中匆匆而过——许多人似乎只是为了追求特权与地位，并不注重探究基督徒的洗礼和背负十字架生活的深刻含义。主教为了声名显赫的教职而相互竞争。富人和掌权者似乎主导了教会的生活。稗子迅速生长，威胁到麦子的生存。

大约三百年来，教会始终生存在持续逼迫的威胁之下。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他们某一天可能会被带到罗马帝国的官员面前，在殉道与叛教之间做出可怕的选择。在公元 2 世纪与 3 世纪这两个漫长世纪的平静日子里，有些基督徒忘记了这些；当逼迫真的来临时，他们表现得过于软弱，难以经受住试炼。这反而令其他基督徒相信，安全与安逸的生活是坚守信仰的最大敌人，在相对和平的年代这些敌人其实更加强大。现在，当教会的安全似乎有了保障时，许多基督徒相信，这种保障正是撒但的网罗

如何在这种环境中做真基督徒？当教会与世俗的权力联合在一起时，当奢侈和炫耀占据基督教的圣坛时，当整个社会决心将那条狭窄的小路变为宽阔的大道时，基督徒将如何抵御时代的巨大诱惑？当教会的众158多领袖住在奢华的家中时，当殉道这一最后的见证不再可能时，基督徒将如何为那位无处枕头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作出见证？基督徒将如何战胜以世俗的新荣耀不断诱惑他们的撒但？

许多基督徒在修道生活中找到了答案：逃离人群社会，撇弃一切，战胜屈服于诱惑的肉体及其情欲。因此，正当成千上万要求洗礼的人涌入大城市的教会时，成千上万基督徒真的离开了城市，在独处中寻求上帝的祝福。

修道主义的起源

早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前，始终有基督徒出于各种原因而相信他们得到了呼召，要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我们已经讲过“寡妇和贞女”——她们选择不结婚或不再嫁人，将全部时间与精力投入教会的侍奉。后来，奥利金过着柏拉图式的理想的智慧生活，他还准备去过那种仅能维持生命的生活，那种极端禁欲的生活。基督曾论过“为天国阉割”的人，据说，奥利金以字面意义解释了这段话。此外，虽然教会已经否定了诺斯替主义，但它的影响仍然存在，这体现在当时广泛流行的一个观念中：肉体与159精神生活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为了过完全的精神生活，必须克制与苦待肉体。

因此，修道主义在教会内外都有其根源。从教会内部来看，修道主义从保罗的话中获得了灵感，他说过，选择独身的基督徒可以更自由地服侍主。对主再来的盼望，往往增强了守独身的动力。如果末世近了，那么结婚并开始规划未来的安定生活就没有任何意义。有时，守独身还有另一个原因：基督徒要为即将到来的国度作出见证，耶稣说过，这个国中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此，在今生选择守独身的基督徒，是即将到来之国

的鲜活见证。

在基督教修道主义的发展中，教会之外的许多因素也起到了作用。古代的一些哲学学派认为，肉体是灵魂的监狱或坟墓，只要灵魂未能战胜肉体的束缚，灵魂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当时广为流传的斯多葛派的教导是，情感是真智慧的大敌，智者致力于完善他们的灵魂，克制他们的情感。地中海盆地有一些宗教传统，包括神圣的贞女、独身的司祭、阉人和其他一些专门服侍神祇的人。有种观念认为，肉体——尤其是性行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邪恶的，与追求圣洁的人不相称。这种观念十分普遍，为了抑制这种极端的思想，公元 325 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决定，罢免所有已经阉割的神职人员，任何已经阉割的基督徒都不能成为 160 神职人员。但是，根据古代编年史家的记载，甚至当时出席此次大公会议的一些主教也希望下令神职人员守独身——这一动议终因帕弗努提乌(Paphnutius)主教的强烈反对而被否决，帕弗努提乌主教以在逼迫中的坚定信仰与独身生活而广受敬重。因此，早期基督教修道主义的思想不仅 161 源于圣经，也有同基督教极其对立的其他来源。

早期沙漠修士

尽管早期的修士遍布于罗马帝国各地，但是，沙漠——尤其是埃及的沙漠——为修道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最为肥沃的土壤。修士(monk)一词源于希腊词 *monachos*，意为独居者(solitary)。早期修士的动力之一是寻找幽静独居的地方。喧嚣的社会被视为一种诱惑，会搅扰修道的目标。“隐居者”(anchorite)一词的原意是“离群索居者”(withdrawn)，甚至是“逃亡者”(fugitive)，但它很快就开始用于指称隐居的修士。对于修士来说，沙漠具有吸引力，这并不是因为沙漠中的艰苦条件，而是因为沙漠地处偏远。他们所寻找的并不是滚烫的沙地，而是一片绿洲，一个隐蔽的山谷，或一片荒废的墓地，在这里，他们才不会被人搅扰。

有迹象表明，早期的基督教修道运动经常与一场类似的个人运动有

关：为了逃避政府强加的苦难，尤其是税收，一些人离开了他们的村庄。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早期的基督教修道主义蓬勃发展，埃及乡村的人口逐渐减少，因为人们发现难以履行政府强加给他们的各种义务，于是逃到了更加偏远的地区。因此，他们也是逃亡者或隐居者，我们并不是总能分清他们与逃到沙漠寻求更加圣洁生活的修士。

我们无法说出，谁是沙漠中的第一个修士或修女。这一殊荣通常被赋予了保罗和安东尼（Anthony），这要归功于两位伟大的基督教作家：哲罗姆和阿塔那修（Athanasius），他们分别为保罗和安东尼立传，都声称自己的传主才是埃及修道主义的创建者。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知道——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谁才是这场运动的创建者。修道主义并不是一个人的发明，而是一大批人的离去，好像是一场传染病，突然传染了成千上万人。不管怎样，保罗和安东尼的生活是重要的，如果他们并非早期修道主义的创建者，那他们也是早期修道主义的典型代表。

哲罗姆对保罗的记载非常简短，几乎完全是个传奇故事。但是，故事的核心内容仍可能是真实的。公元3世纪中期，一个名叫保罗的年轻人为了逃避逼迫而来到了沙漠，他在沙漠中发现了一个造假币者遗弃的藏身地。他在这里度过了余生，专心祷告，几乎完全依靠枣子度日。根据哲罗姆的记载，保罗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近一百年，在此期间，他的访客只有沙漠中的野兽和年迈的修士安东尼。这可能有些夸张，但这的确告诉我们，隐修的理想对早期的修士非常重要。

根据阿塔那修的记载，安东尼生于尼罗河西岸的一座小村庄，他的父母较为富有。他很可能是科普特人——古代埃及人的后裔，但现在受到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压迫与歧视。安东尼在父母去世时还很小，但他所继承的财产足以令他和他当时所照顾的妹妹过上安逸的生活。他本打算依靠财产度日，但教会有一次诵读的福音书经文深深触动了他，使他觉得必须要改变自己的生活。那一天诵读的经文是青年财主的故事，对于相对富裕的安东尼来说，耶稣的话清晰响亮：“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

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太 19:21） 安东尼听从了耶稣的教导，他变卖了财产，将收益分给穷人，只留下用来照顾妹妹的那一份。但是，他后来被耶稣在《马太福音》6:34 的话所感动：“不要为明天忧虑。”随后，他将自己为妹妹存留的那一小份财产也卖了，将妹妹交给教会的贞女照顾，然后自己来到了沙漠。

在最初几年修道生活中，安东尼向生活在附近的一位老者学习——这一事实说明，安东尼并不是第一个基督教修士。这些年对这位年轻的修士来说是一段艰苦的岁月，因为他经常思念他所放弃的快乐，他开始后悔，不该卖掉所有财产，退隐到沙漠。当安东尼受到这种试探时，他求助于更加严格的操练。他有时一连禁食数天；有时会只在日落之后吃一餐。

若干年后，安东尼决定离开他年迈的老师和身边的修士，他已经从他们那里学会了修道生活。后来，他来到一片荒废的墓地，生活在一个墓穴中，一些好心人每隔几天给他送些饼，他就依靠这些食物度日。根据阿塔那修的记载，安东尼这时开始看见几乎在不断诱惑他的魔鬼的异象。有时，他与这些魔鬼的遭遇会导致一场令他的身体疼痛数天的肉搏战。

安东尼最终在三十五岁时得到了异象，上帝要他不要惧怕，因为他总能指望上帝的帮助。安东尼此时认为，他居住的墓穴还不够远离社会，于是他搬到沙漠中更远的地方。他找到一座荒废的堡垒，在那里住了下来。即使是在那里，魔鬼还在纠缠他，异象与诱惑仍然不断出现。但是，安东尼现在相信，他得到了上帝的帮助，争战更能忍受了。

163

然而，并不只有魔鬼跟随着这位修道健将。其他修士也尾随着他，他们渴望从安东尼这里学到修道戒律和祷告默想的智慧。此外，一群好奇的人和病人也跟随着他，因为他当时已被誉为圣徒，能行神迹。这位年迈的隐修士一次次退隐到更加偏僻的地方，但是，他一次次被寻找他的人找到。最终，他不再躲藏，同意住在一群门徒附近，条件是他们不可以太频繁地拜访他。作为回报，安东尼会定期探望他们，与他们讨论修道戒律、上帝的爱和默想的奇妙。

可是，安东尼的确有两次到过大城市亚历山大。第一次是在戴克里先大肆逼迫基督徒时，安东尼和他的一些门徒决定去亚历山大殉道。但是，罗马帝国的高官对这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修士不屑一顾，这些想要成为殉道士的修士只能对其他基督徒说些鼓励的话。

多年以后，有关圣子神性的阿里乌之争爆发时，安东尼第二次来到亚历山大。因为阿里乌派声称，这位圣洁的隐士支持他们，反对阿塔那修。安东尼认为，揭穿这些虚假传言的唯一方法，就是亲自出现在聚在亚历山大的主教们面前。根据阿塔那修的记载，这位因不懂希腊语而不得不讲科普特语的年迈修士——他可能还是个文盲——所说的话充满智慧，且极具说服力，他挫败了阿里乌派。

到了晚年，安东尼终于同意让两个年轻的修士与他同住，照顾他。他于公元356年去世，在临终之前，他叮嘱他的两位同道不要说出他的埋葬地，并托付他们将他的唯一财产——一件披肩，送给亚历山大的主教阿塔那修。

保罗和安东尼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前就已来到沙漠，而在此之前，沙漠中就已经有了修士。当君士坦丁掌权时，修士的生活越来越受欢迎。一些到过沙漠的旅行者声称，在沙漠中居住的修士比一些城市中的居民还多——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另有人宣称，埃及的一个地区就有两万女基督徒和一万男基督徒过着修道生活。此外，还有人声称，在今天位于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贫瘠地区，也生活着同样数量的修士，他们在这里松软的岩石中开凿洞穴。不论这些数字有多么夸张，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数量众多的人为寻求修士的隐居生活而逃离了社会。

164

修士的生活极其简单。一些修士种植菜园，但是，大多数修士依靠编织篮子和席子维生，用它们换来饼和油。除了随手可得的芦苇之外，这个副业的优势还在于，修士可以在编织时祷告、吟诵《诗篇》或背诵某段经文。沙漠修士的主要食物是饼，有时还会加上水果、蔬菜和油。他们的财产被严格限制在必需的衣服和睡觉用的席子。大多数修士并不赞成拥有



卡帕多西亚地区条件艰苦的山丘上有许多岩洞，修士就住在里面。

那些会导致人骄傲的书籍。他们相互教导，可以背诵整卷圣经，尤其是《诗篇》与新约。他们还分享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轶事与训导，而这些都是源自最受尊敬的修士。

沙漠修道主义的精神与建制教会格格不入，因为教会的主教生活在大城市，享有权力与威望。许多修士认为，降临在他们身上最糟糕的命运是被按立为司祭或主教——正是在这时，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所带来的变化，基督教的执事开始被称为“司祭”。尽管有些修士接受了圣职，但这几乎总是违背他们的意愿，或者只是为了回应某位著名的圣洁主教——如阿塔那修——的不断恳求。这也意味着，许多修士多年没有领过圣餐，而圣餐最初就是基督教崇拜的中心。一些地方建起了教会，附近的修士星期六和星期天在这里聚会。星期天，他们在圣餐之后经常一同进餐，然后到下一周再一同聚会。



另一方面，修道生活并非没有诱惑。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修士逐渐相信，他们的生活比大多数主教与教会其他领袖的更加圣洁，因此应当由

他们决定基督教的正确教导，而不是由教会的主教和领袖来决定。许多这样的修士其实相当无知，近乎狂热，因此他们成为了更有文化、更具权势和更加狡猾之人的爪牙，他们利用这些沙漠主人的狂热，实现自己的目的。在公元5世纪，这种情况发展到了极点：一些暴动的修士试图通过武力强制推行他们所认为的正统教义。

帕科米乌与集体修道主义

退隐到沙漠的基督徒越来越多，其中大多数希望受教于经验丰富的教师，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修道生活。安东尼经常被迫逃离寻求他帮助与指导的修士。集体修道生活逐渐取代了隐居修道生活。集体修道的基督徒仍自称为"修士"——独居者，但是，他们的意思并不是完全离群独居，而是生活在远离俗世的隐居处。这种修道主义被称为"修院式修道主义"（coenobitism），得名于意为"集体生活"的两个希腊词

同隐居修道主义的情况一样，我们也无法说出，谁是修院式修道主义的真正创建者。修院式修道主义很可能同时出现在许多地方，它并不是一个人天才般的创造，而是迫于形势的压力。早期修士完全隐居的生活并不适合许多来到沙漠的基督徒。此外，如果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是爱，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完全独居、很少与他人接触的修士，如何实践他对邻舍的爱。于是，修院式修道主义诞生了，这既是因为很多修士聚集在某些圣徒般领袖身边的自然趋势，也是因为福音的本质。

帕科米乌（Pachomius）虽然不是修院式修道主义的创建者，但他配被誉为这场运动的组织者，他为修院式修道主义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公元286年左右，帕科米乌生于埃及南部的一座小村庄。他的父母都是异教徒，在他从家中被带走、被迫参军之前，他对基督教似乎一无所知

在军队中，当他因自己的命运而深感悲伤时，一群基督徒来安慰他、陪伴他。这个年轻的新兵被这种爱的行为深深感动，他发誓，如果可以离开军队，他也要全心服侍他人。在十分意外地被获准离开军队之后，他四处寻

找可以教授他基督教信仰以及为他施行洗礼的人。若干年后，他决定退隐到沙漠，在沙漠中，他请一位年迈的隐修士教他修道生活。

年轻的帕科米乌与这位隐修士共同生活了七年，直到他听到一个声音命令他离开。他那位年迈的老师帮他修建了一个栖身之所，帕科米乌独自生活在那里，直到他的弟弟约翰前来与他同住。兄弟俩一同过着祷告与默想的生活。

但是，帕科米乌并不满意，他不断祈求上帝启示给他一条更好的服侍之路。最终，他得到一个异象，天使告诉他应当服侍人。帕科米乌不相信这个异象，声称他是到沙漠中服侍上帝，不是服侍人。但是，服侍人的异象不断出现，帕科米乌或许还记得他当初做军人时立下的誓言，于是他决定改变自己的修道生活。

帕科米乌在他弟弟的帮助下建起了一座能容纳许多修士的大修道院，并招募了这座新修道院的第一批修士。他希望教授他们他所学到的祷告与默想，也希望建立一个人人互助的修道院。但是，他的招募不当，新成员违反了修道戒规，帕科米乌最终开除了这批修士。

帕科米乌随后开始了集体修道主义的第二次尝试。他的第一次尝试之所以失败，据他招募的新成员说是因为他的修道戒规过于苛刻。他在第二次尝试中非但没有放宽他的修道戒规，反而更加严厉。他从一开始就要求，所有希望加入修道院的人必须放弃全部财产，承诺绝对服从他们的修道院院长。此外，所有修士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任何修士都不许将劳动视为卑贱的工作。修道院的基本戒规是彼此服侍，因此，虽然所有修士都发誓绝对服从他们的修道院院长，但修道院院长也必须服侍他手下的修士。

帕科米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修道院发展迅速，在他有生之年，就有九座这样的修道院建立起来，每一座都有数百名修士。与此同时，帕科米乌的妹妹玛丽(Mary)还为女基督徒建立了类似的女修道院。当时，一些城市的教会认为寡妇与贞女制度已经不再必要，结果，许多寡妇和贞女离开

城市，加入了通常位于沙漠的女修道院。一些到过沙漠的见证人说，在埃及的一些地区，修女的数量是修士的两倍。

167 帕科米乌修道院四周环墙，只有一个入口。修道院内部有一些共用的建筑，如教堂、仓库、食堂和会客厅。其余的建筑是住宅，修士根据他们的不同职责分住在里面。例如，有供看门人居住的房屋，他负责留宿需要住宿的客人，审核和培训要求加入修道院的人。在其他房屋中，住着纺织工、厨师和鞋匠等。在每一所房屋中，都有一个公共房间和一些供两名修士居住的小房间。

帕科米乌修道院的日常生活包括劳动和灵修，帕科米乌本人也为其他修士做出了榜样，因为他承担起最卑微的工作。对于灵修生活来说，帕科米乌修道院的模式是保罗的教导："不住地祷告"。因此，当修士做饼或修鞋时，他们都唱赞美诗，背诵和默想经文，或是高声、或是默默地祷告。在帕科米乌修道院中，每天都有两次集体祷告。每天清晨，全体修士聚在一起祷告，唱赞美诗，恭听经文朗读。每天晚上，他们也会进行类似的灵修，但却是在各自住处的公共房间举行规模更小的聚会。

帕科米乌修道院的经济生活各式各样。尽管所有修士都过着贫穷的生活，但帕科米乌并不主张一些隐修士过度贫穷的生活。在帕科米乌修道院的餐桌上，有饼、水果、蔬菜和鱼——但从没有肉。修士生产的物品在附近的市场上销售，这不仅是为了购买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也是为了周济穷人和所有过路的旅居者。每一座修道院都有一位院长和副院长，他们必须定期向帕科米乌所在的总院汇报工作。

每个修士必须服从他的修道院院长，因此，帕科米乌修道院等级制度分明。每座修道院都有一位负责人，他要服从上一级修道院院长及其代表。各个修道院院长的上级是帕科米乌和他的继任者，他们被称为"修道院院长"或"大修道院院长"。在帕科米乌临终之际，他的修士发誓，无论他选定谁为继任者，他们都会服从这位继任者。这就确立了如下传统：每位修道院院长亲自任命自己的继任者，他对同一修院系统的所有修道院

拥有绝对的支配权。这位新任修道院院长拥有最终权威，他可以任命、调动和罢免同一修院系统中的所有修道院院长。

帕科米乌修道院的全体修士每年两次聚在一起祷告和崇拜，同时处理为维持修道院的良好秩序所必须处理的所有问题。在同一修院系统中的所有修道院之间，修道院院长和他的代表经常互访，以保持修道院之间的联系。帕科米乌和他的追随者从未接受教职，因此，他们当中并没有被按立圣职的司祭。星期天会有司祭来到修道院，为他们举行圣餐。

168

女修道院中的生活也大致如此。每座女修道院都由一位女修道院院长领导，总修道院——帕科米乌及其继任者的修道院——的男修道院院长领导女修道院院长，就像他们领导帕科米乌男修道院那样。

希望加入帕科米乌修道院的人来到修道院的大门口。大门并不会轻易向他们敞开，因为在被允许进入看门人的屋子之前，候选修士必须在大门口等待数个日夜，恳求修道院让他加入。要求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证明他们的坚定决心、谦卑和心甘情愿的顺服。当修道院的大门最终向他们敞开时，看门人负责这些候选修士的生活，他们会共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修道院认为，可以在祷告中接纳他们加入。随后，修道院将开会审查他们，为他们在院中找到一个住所和分配一个工作之前，他们一直住在一个特别准备的地方。

在帕科米乌修道院审核候选修士的整个过程中有个惊人的事实，许多出现在修道院大门口并最终被修道院接收的人，必须学习基本教理和接受洗礼，因为他们还不是基督徒。这种情况说明，公元4世纪的沙漠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即使异教徒也认为，修道生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我们无法知道，这种吸引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宗教性的，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了埃及乡村穷苦人民艰苦的生活条件。但重要的是，逃到沙漠的绝大多数都是科普特人，他们是当时埃及社会最底层的古埃及人的后裔。

修道主义思想的传播

尽管修道主义并不只是起源于埃及，但这场运动于公元4世纪在埃及获得了最大的发展动力。各地敬虔的基督徒来到埃及，有的就留在这里，有的带着在沙漠中学到的修道主义思想与实践回到祖国。朝圣者从叙利亚、小亚细亚、意大利甚至美索不达米亚，来到尼罗河的这片土地，他们在回国途中传播了保罗、安东尼、帕科米乌以及其他无数修士的传奇故事。在整个罗马帝国东部，哪里有适合的地方，修士就在那里安家。一些修士通过卖弄的行为夸大了修道生活，如生活在一个荒废神庙的柱廊顶上。但是，另一些修士则为教会带来了一种自律感与绝对委身的精神，这在君士坦丁之后看似安逸的时代是十分必要的。

169

然而，就修道主义思想的传播而言，贡献最大的并不是那些仿效埃及沙漠生活方式和寻找僻静之所专心祷告与默想的修士，而是许多主教和学者，他们认识到修士的见证对教会日常生活的价值。因此，虽然埃及修道主义最初是孤立存在的，甚至遇到了教会领袖的反对，但是，修道主义最终通过一些教会领袖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些为修道主义的传播做出贡献的主教和学者非常重要，我们将在以后的几章中讲述他们。但是，我们在此不妨先指出他们对修道主义历史的意义。除了写过《圣安东尼传》(*Life of Saint Anthony*)之外，阿塔那修还经常拜访沙漠修士，当他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时，他在他们那里避难。虽然他自己并不是修士，而是主教，但他的生活方式却反映出修道主义戒律与克己的思想。他被流放到罗马帝国西部时，使得说拉丁语的教会知道了正在埃及沙漠所发生的一切。哲罗姆撰写了《隐士保罗传》(*Life of Paul the Hermit*)，此外，他还将帕科米乌的《修道戒规》(*Rules*)翻译成拉丁文，他自己也成为了修士——尽管他是一位罕见的博学的修士。他是当时最受人敬仰、最具影响力的基督徒之一，因此，他的著作和榜样对西方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教会也因此对修道精神更感兴趣。在进行

各种神学争辩之余，凯撒利亚的巴西尔(Basil of Caesarea)——被称为大巴西尔(Basil the Great)——还建立了致力于灵修与照顾穷人的修道院。为了回答修士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撰写了大量论文，虽然这些论文最初并不是为修道戒规而写，但它们最终被作为修道戒规来使用和引用。在他的家乡卡帕多西亚——今天的土耳其中部，荒芜人烟的地区很快就有修士居住。希波的伟大主教奥古斯丁读过阿塔那修的《圣安东尼传》，这是他归信基督教的原因之一。他始终过着修道生活，直到他被迫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教会生活。即使这样，他还组织与他同工的神父建起一座半修道式的修道院，由此为他的《圣奥古斯丁修道规章》(Canons of St Augustine)带来了灵感。



马丁与乞丐分享斗篷，这个故事很快便成为基督教艺术主题。

过着修道生活的圣徒般的主教促进了修道主义思想的普及，其中最显著的是图尔的马丁。苏尔皮提乌·塞维卢（Sulpitius Severus）的《圣马丁传》（*Life of Saint Martin*）是西欧几百年来最受欢迎的著作之一，也是塑造了西方修道主义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170

公元335年左右，马丁生于潘诺尼亚（Pannonia）——位于今天的匈牙利。他的父亲是异教徒士兵，年轻的马丁在罗马帝国的许多地方生活过，不过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Pavia）似乎是他生活最久的城市。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决定成为基督徒，并在违背父母意愿的情况下成为了慕道友。为了迫使他与基督徒断绝来往，他的父亲将他送到了军队。皇帝朱利安——后世所称的"背教者朱利安"——当时正在进行他的第一次军事战争。马丁在他的麾下效力了几年。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从此以后这件事就与马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当马丁和他的朋友进入今天法国的亚眠城（Amiens）时，一个几乎赤身裸体、瑟瑟发抖的乞丐向他们行乞。马丁根本就没钱给他，于是他脱下自己的披肩，撕成两半，将其中一半给了乞丐。据说，马丁后来在梦中看见耶稣披着士兵的半个披肩向他走来，说："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这件事非常著名，从此以后，马丁经常被描述成与乞丐分享披肩的形象。这也是"小礼拜堂"（chapel）一词的由来，因为几百年之后，在一座小教堂中出现了一块据说是马丁披肩上的布。因为这一小片布——*capella*，这座小教堂被称为"小礼拜堂"，在其中服侍的神职人员被称为"牧师"（chaplain）——小教堂的牧师。

171

苏尔皮提乌·塞维卢告诉我们，在亚眠城的这件事之后不久马丁便接受了洗礼，并终于在两年后离开了军队。后来，他拜访了博学、圣洁的主教普瓦蒂埃的希拉利（Hilary of Poitiers），与他成为了密友。由于各种工作与变故，马丁在罗马帝国的许多地方生活过，并最终定居在普瓦蒂埃附近的图尔城外。他在这里过着修道生活，圣洁的美名在这一地区家喻户晓。据说，上帝通过马丁行了许多大事，但他始终声称自己只不过是基

督徒生活的初学者。

当图尔的主教职空缺时，人们想将马丁选为主教。据说，参加选举的一些主教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马丁总是脏兮兮的，他衣衫不整，蓬头垢面，他的当选会有损主教这一职务的威望。到了诵读圣经时，还没有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后来，在场的一个基督徒拿出圣经，读出了他所看到的经文：“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诗 8:2）人们认为，这是直接来自上帝的启示。上帝拣选了肮脏不雅、被一些主教所蔑视的马丁，让主教们哑口无言。无需多说，马丁被选为图尔的主教。

然而，这位新任主教并不打算放弃他的修道生活。他挨着主教座堂盖起了一间小屋，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在这里修道。当他的声望令他难以在这间小屋里安静地修道时，他搬回图尔的郊区，在这里继续他的教牧工作。

当马丁去世时，许多基督徒相信马丁是位圣徒。他的名望和榜样令许多基督徒认为，真正的主教应当像他那样。因此，最初主要是用于抗议世俗化与主教虚荣的修道运动，最终影响到人们对主教教职的理解。几百年来（在某些地区直到今天）人们认为，真正的主教应当尽可能实现修道主义理想。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修道主义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最初加入这场运动的基督徒只是为了寻求个人救恩才逃到沙漠，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修道主义将成为——尤其是在西方——教会的慈惠与宣教事业的一个工具。

172

修道运动早在初期就已经表现出朝不同方向发展的巨大能力。大修道院从早期隐修士的独居修道生活中发展起来，有的大修道院拥有数百名修士。最初戒绝书籍与知识的修道运动很快就有学者加入进来，如哲罗姆、奥古斯丁和大巴西尔。最初，修道运动只是一场否定建制教会各种生活的平信徒运动，但是，它很快就得到了主教的认可，并最终为所有主教设定了理想的生活标准。这样的调整适应持续了数百年。在随后的几

百年中，修士将成为宣教士、学者、教师、古代文化传统的保护者、新大陆的殖民者，甚至是军人。

在这一切中，贯穿着一个共同信念：基督徒的理想生活是自身贫穷与凡物公用的生活。基督教会以前的普通生活——基督徒之间凡物公用——现在成为修道主义的特点，这是对修士修女们的希望，不是针对教会的其他成员。既然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了基督徒，多数基督徒就不必凡物公用，而修士还在继续以前的这个传统。这就产生了两种层次的基督徒，这种差别将成为教会大部分历史的特点——而只有修士才发愿过独身与顺服的生活，这又加大了这种差别。

第十六章

分裂者的回应：多纳徒主义

> 多纳徒派与我们争辩的是，在哪里可以找到基督的身体——教会？我们是在自己的话中，还是在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话中寻找答案？
>
> ——希波的奥古斯丁

修士通过退隐到沙漠来表达他们对新秩序的不满，但是，另一些基督徒宣称教会已经普遍受到腐蚀，他们才代表真正的教会。在持有类似观点的分裂派中，多纳徒派（Donatists）是数量最多的。

多纳徒主义争辩是教会因背教者与如何重新接纳他们而产生分裂的又一个例子。在每一次猛烈的逼迫之后，教会不得不应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那些曾放弃了信仰、但现在又希望重新进入基督徒团契的信徒。虽然在东方教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与分裂，但是，这样的分裂在强调教规与秩序的说拉丁语的西方教会更为普遍，更为持久。公元3世纪，背教者的问题就已经在罗马导致了诺瓦替安派分裂；在北非，迦太基的主教西普里安必须捍卫自己的主教权威，对抗那些认为应当由认信者来决定如何重新接纳背教的基督徒。现在，到了公元4世纪，关于如何重新接纳背教者的争辩在北非尤其成为一个致命的问题。

一直以来，北非的逼迫都非常猛烈，这里的许多基督徒都曾经屈服。同其他地区逼迫中的情形一样，北非基督徒的屈服程度也不同。为了避免再次受到逼迫，一些主教向帝国官员交出了异端书籍，并让官员们相

信，这些书籍就是基督教的圣经。有些主教真的交出了圣经，并声称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伤亡，这是他们身为牧者的责任。许多基督徒——既有神职人员，也有平信徒——屈服于皇帝的巨大压力，曾崇拜异教神祇。的确，崇拜异教神祇的基督徒非常多，一些编年史家记载，异教神庙有时容纳不下前来崇拜的基督徒。

174

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基督徒坚守信仰，结果遭受了监禁、酷刑，甚至是殉道。同以前一样，那些在监禁和酷刑中幸存下来的基督徒被称为"认信者"，他们因坚定的信仰而备受尊重。在西普里安时代，一些认信者过于简单地重新接纳了背教者，并没有征求教会当局的意见。现在，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许多认信者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他们坚持采取比教会更加严厉的措施。这些有着更加严格要求的认信者声称，背教者不仅是指那些真正崇拜了异教神祇的基督徒，还包括那些向当局交出圣经的基督徒。这些认信者认为，如果说改动圣经的一字一句都是大罪，那么将圣经交出来毁掉岂不是更大的罪吗？因此，一些主教和其他领袖被赋予一个可憎的称谓：背教者或以经换命者（*traditores*），用于称呼那些交出圣经或背教的基督徒，而这种称谓通常是用来称呼犹大。

这就是逼迫结束后不久迦太基主教教职空缺时的事态，而这一职位非常重要。凯希里安（Caecilian）当选为迦太基的主教。但是，他并不受严格派的欢迎，严格派选出了与他敌对的主教马约里努斯（Majorinus）。在选举过程中，双方都搞了一些阴谋，使用了一些卑劣的伎俩，因此，双方都有充足的理由声称自己对手的当选并不合法。马约里努斯被任命为迦太基的敌对派主教不久后就去世了，他的同党选出了多纳徒（Donatus of Casae Nigrae），他领导了他们大约五十年，"多纳徒主义"（Donatism）也最终得名于他。

其他教会自然会对北非的这次分裂深感不安，因为只能承认迦太基的一位主教。罗马和其他一些重要城市的主教宣布，凯希里安才是迦太基的真正主教，马约里努斯和多纳徒是篡位者。君士坦丁听从了这些主

教的意见，命令他的北非官员只承认凯希里安和与凯希里安保持合一的基督徒，因为他十分关心教会的合一，这有助于他帝国的统一。这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因为君士坦丁正在颁布支持基督教的法律，如对神职人员免税。基于他对北非官员的命令，只有与凯希里安保持合一的基督徒才可以享受君士坦丁给予教会的一切恩惠。

175 那么，造成多纳徒派分裂的原因是什么？之前讲述的只是多纳徒派分裂开始的客观历史。实际上，这次分裂还有神学、政治与经济上的原因。神学是造成多纳徒派分裂的直接原因，这与如何处理在逼迫期间放弃信仰的基督徒有关。多纳徒派认为，在三位为凯希里安按立圣职的主教中，有一位是以经换命者——他曾将圣经交给了当局，因此，这次按立圣职是无效的。凯希里安和他的支持者对此的回应则是，首先，这位主教并不是以经换命者；其次，即使他曾经是，他为凯希里安按立圣职仍然有效。因此，除了这位主教——和与凯希里安保持合一的其他基督徒——是否放弃过信仰这个实际问题之外，还出现了另一个问题：由不称职的主教按立圣职是否有效。多纳徒派声称，按立圣职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施行者是否称职。凯希里安和他的追随者回应称，圣礼和其他类似行为的有效性并不能取决于其施行者是否称职，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么所有的基督徒都会怀疑他们的洗礼或圣餐礼的有效性。我们无法知道圣礼施行者内在的属灵状态，因此就无法消除对圣礼有效性的怀疑。

176 多纳徒派坚持认为，凯希里安接受的圣职按立因以经换命者的参与而无效，因此他实际上并不是主教，进而由凯希里安按立圣职的所有神父都是假神父，他们施行的圣礼都是无效的。此外，为凯希里安按立圣职的另外两位有资格的主教也犯罪了，因为他们与凯希里安及其追随者保持合一。结果，他们施行的圣礼和按立的圣职也不再有效。

因为这两种观点，如果凯希里安的一位追随者决定加入多纳徒派，多纳徒派就会要求他重新接受洗礼，因为多纳徒派宣称他们的对手施行的洗礼是无效的。但是，另一方面，凯希里安和他的追随者则不会为多纳徒

派重新施行洗礼，因为他们认为，无论施行洗礼者是否称职，由他施行的洗礼仍是有效的。

除了由不称职的施行者所施行的圣礼是否有效这一问题，多纳徒主义争辩还与两种不同的教会观有关。多纳徒派认为，教会是基督的新妇，必须是纯净圣洁的，而他们的对手提出了麦子与稗子的比喻，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基督徒最好不要论断是否称职的问题，应当将这个问题留给主来评断。对于多纳徒派来说，教会的圣洁在于教会成员的圣洁；在凯希里安和他的追随者看来，圣洁的基础是教会之主的圣洁。多纳徒派认为，牧师或主教的圣洁赋予了他们权威；他们的对手则相信，这样的权威源自圣职——这是罗马法的一个普遍原则。

这些就是多纳徒主义争辩所涉及的主要神学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当时的文献就会意识到，神学争辩经常掩盖着造成冲突的其他原因。一些多纳徒派曾将圣经交给当局，还有一些多纳徒派甚至列出了一份清单，上面完整地记录了教会在崇拜中使用的物品，并将这份清单交给当局。然而，多纳徒派还是重新接纳了他们。此外，普尔普里乌斯(Purpurius)是多纳徒主义运动最早的领袖之一，他谋杀了自己的两个侄子。因此，我们难以相信，多纳徒派敌视其他基督徒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关心教会的纯洁。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两派基督徒很快就按地理位置与社会阶级划清了界限。在迦太基及其附近地区——罗马地方总督辖区内的非洲(Proconsular Africa)，凯希里安和他的追随者势力强大。但是，在更西面的努米底亚(Numidia)和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多纳徒派十分受欢迎。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都是农业地区。这两地的大量农作物都是通过迦

177

太基出口到意大利。最终的结果是，作为贸易中间人、劳动少、风险小的迦太基人比实际种植庄稼的努米底亚人和毛里塔尼亚人赚钱更多。此外，同迦太基及其周边地区相比，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的罗马化程度较低。在罗马化程度更低的地区，许多居民仍保留着祖先的语言与风俗，他

们将罗马和与罗马相关的一切视为外国的压迫势力。另一方面，在迦太基，生活着高度罗马化的地主、商人和军官，他们在与意大利的贸易和其他往来中获益最大。对于这些人来说，与罗马和罗马帝国其他地区保持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但是，在迦太基及其边远地区，许多下层人有着类似于努米底亚人和毛里塔尼亚人的情感。

早在君士坦丁之前，基督教就已经在努米底亚和罗马地方总督辖区内非洲的底层人中赢得了大量信徒，也在毛里塔尼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些归信者的新信仰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即使是罗马帝国也难以征服。与此同时，数量相对较少的罗马化迦太基人也信奉了基督教。这将社会上其他一些紧张关系带进了教会。但是，当时归信基督教的人——尤其是上层人——必须断绝他们的许多社会关系，因此，教会内的紧张关系并不如以前那么严重。 178

这种情况因君士坦丁的出现和教会获得了安宁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现在，人们既可以是好的基督徒，也可以是好的罗马公民。在君士坦丁的带领之下，罗马化阶层中的人涌进了教会。之前归信基督教的罗马化人将这种变化视为一种进步，因为其他重要人物现在证实了他们以前的决定。但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基督徒倾向于将新进展视为教会的腐败。他们一直憎恨的罗马帝国的一些东西，现在成为了教会的一部分。很快，有权势者——掌控政治与经济的人——就掌控了教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基督徒似乎必须抵制教会的腐败，提醒最近归信基督教的有权势者，当他们还在崇拜异教神祇时，那些所谓的“无知的”努米底亚人、毛里塔尼亚人和其他一些人就已经认识了真理。

这一切都可以在多纳徒主义争辩的各个阶段看出。凯希里安在迦太基的罗马化基督徒的支持下被选为主教。他的当选遭到罗马地方总督辖区内非洲的底层基督徒和几乎所有努米底亚人与努米底亚神职人员的反对。君士坦丁在还没有花时间去研究争辩问题之前，就做出了凯希里安一派代表合法教会的决定。在一些说拉丁语的大城市，主教也做出了认

可凯希里安一派的决定——最终，说希腊语的城市的主教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多纳徒派十分愿意接受曾在逼迫期间软弱过的努米底亚神职人员的支持。

这并不意味着，多纳徒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场自觉的政治运动。早期的多纳徒派并不反对罗马帝国，而是反对“世俗的世界”——尽管罗马帝国的许多习俗在他们看来是世俗的。他们不断劝说君士坦丁，希望说服他相信，他支持凯希里安及其追随者的决定是错误的。即使到了朱利安于公元4世纪后半叶执政时，一些多纳徒派仍然希望罗马当局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而支持他们。

公元340年左右，出现了一群被称为圣墓派（*circumcellions*）的多纳徒派。“圣墓派”这个名字的起源尚存争议，可能是指他们将总部设在了殉道士的坟墓。他们主要是那些使用了暴力的努米底亚与毛里塔尼亚的多纳徒派农民。尽管他们有时会被描述成一群打着信仰幌子的强盗，但他们实际上是宗教狂热分子。他们相信，殉道是最光荣的，既然以往那样的逼迫已经结束，那么在与歪曲信仰者的斗争中死去的基督徒也是殉道士。有时，为了追求殉道，他们选择集体跳崖自杀。他们很可能是宗教狂热分子，却绝不是伪善的机会主义者。

179

圣墓派成为分裂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时，城镇中的多纳徒派领袖也希望远离这个激进的派系。但在其他一些时候，当他们需要这支激进的军队时，他们又会求助于圣墓派。最终的结果是，许多人被迫放弃自己在偏远地区的房产和地产，因为如果没有大量的护卫，富人和代表罗马帝国的人不敢在乡村地区走动。圣墓派不只一次出现在设有防御工事的城镇的城门口。罗马帝国因此蒙羞，贸易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罗马帝国做出了回应，只能诉诸武力。逼迫、劝说、屠杀和军事占领都无济于事。圣墓派表达出群众深深的不满，帝国难以彻底消灭这场运动。我们将在以后讲到，汪达尔人（Vandals）随后不久入侵了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因此结束了罗马帝国在这里的统治。但是，即使在汪达尔人

的统治之下，这场运动还在继续。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首都建在君士坦丁堡——征服了北非。但是，圣墓派仍然存在。直到穆斯林于公元7世纪末征服北非之后，多纳徒主义和圣墓派才最终消失。

总而言之，多纳徒主义——尤其是其中激进的圣墓派——是对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所带来的新形势的一种回应。一些基督徒张开双臂欢迎新秩序，另一些退隐到沙漠，而多纳徒派则脱离了现已成为罗马帝国盟友的教会。即使这样，他们所提出的关于教会的本质与圣礼的有效性这些重要的神学问题，还是迫使其他基督徒——如著名的圣徒奥古斯丁——必须予以解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回应多纳徒派，奥古斯丁和其他神学家才提出了他们的教会论、他们对圣礼有效性的看法以及正义战争论。因此，就如经常所发生的那样，最后被教会作为异端与分裂者而被抛弃的基督徒，也影响到为了驳斥他们而发展起来的神学。

第十七章

阿里乌之争与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

（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出于父的实质，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

——《尼西亚信经》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不断卷入各种神学争论。在保罗时代，极为迫切的问题是犹太基督徒与外邦归信者之间的关系。后来，围绕着诺斯替派的思辨，爆发了至关重要的争论。公元3世纪，当西普里安担任迦太基的主教时，争论的焦点是重新接纳背教者的问题。所有这些争论都非常重要，通常也非常激烈。但是，在最初几百年，赢得争论的唯一方法是缜密的论证和圣洁的生活。世俗的政府很少关注教会内的神学争论，因此，争论中的各方通常不会落入这样的试探：为了缩短争论进程或赢回在神学争论中输掉的某个论点而求助于世俗的政府。

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教会可以借助国家来解决某个神学问题。罗马帝国在教会的合一中有着既得利益，君士坦丁希望，教会的合一可以成为“维系帝国统一的纽带”。因此，国家很快就开始利用自己的权力强迫基督徒在神学问题上达成一致。许多不同观点就这样被压制了，这可能真的会威胁到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如果没有皇帝的干涉，问题可能要通过漫长的争论才得以解决，争论中的各方最终会达成一致，就像过去那样。但是，统治者们并

不希望看到教会中这些漫长、悬而未决的争论，因此，他们凭借皇帝的权威来判定谁是谁非。结果，争论中的许多基督徒并不是努力说服他们的对手或其他基督徒，而是试图说服皇帝。最终，政治阴谋变得比神学争论更重要。 182

这一过程可能早在阿里乌之争中就已经开始，最初，这场争论只是一位主教与一位牧师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后来却发展到君士坦丁必须出面干涉，争论双方最终都试图通过政治阴谋消灭他们的对手。乍一看，这并不是一段极有教益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研究这段历史，令人惊讶的并不是神学争论卷入了政治阴谋，而是教会在这种非常不利的环境中，还可以找到力量与智慧，去驳斥那些威胁到基督教核心教义的观点。

争论的爆发

在君士坦丁之前很久的神学发展中，我们就可以找到阿里乌之争的根源。由于查士丁、亚历山大的克莱门、奥利金和其他神学家的工作，基督徒开始思考上帝的本质，实际上，他们的思考方法是阿里乌之争的直接原因。当第一代基督徒开始在罗马帝国各地宣讲他们的信仰时，他们被视为无知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们并没有有形的神祇。作为回应，一些有学识的基督徒求助于古代极具智慧之人的权威——古代哲学家的权威。最优秀的异教哲学家曾经教导，在整个宇宙之上，有一位至高之神，还有异教哲学家甚至宣称，异教神祇是人类的创造。在求助于这些备受尊敬的哲学家的权威时，基督徒认为，他们相信异教哲学家所谓的至高之神，就是他们所说的上帝。这种论点极具说服力，它无疑有助于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

可是，这也是个危险的论点。渴望证明基督教信仰与古代哲学一致的基督徒可能会认为，众先知和其他圣经作者表述上帝的方法并不是最好的方法，柏拉图、普罗提诺（Plotinus）和其他哲学家的方法才是最好的。

这些哲学家想出永恒、不动情、不变的至善这些观念，许多基督徒认为，这就是圣经中的上帝。

为了将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与古代哲学家那位不动情、不变的至高之神相联系，基督徒找到了两种方法：寓意解经法和逻各斯的教义。寓意解经法应用起来非常简单。只要经文与上帝“不符”，即不符合哲学家的至高之神所拥有的至善，这些经文就不能按照字义加以解释。例如，如果圣经记载上帝在园中行走，或上帝说话，我们不要忘记，一位不变的存有不会真的行走或说话。这在理性上满足了许多人。但是，这在情感上却不尽人意，因为教会生活是以这样的信仰为基础：人类可能与一位有位格的上帝（personal God）直接建立联系。但是，哲学家的至高之神却没有位格。

183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哲学中至高之神的观念与圣经中上帝的矛盾。这就是查士丁、亚历山大的克莱门、奥利金和其他神学家所提出的逻各斯教义。这种观点认为，虽然至高之神“圣父”是永恒的、无情的，但还存在一个逻各斯、道或上帝的理性，它是有位格的，可以与世界和人类直接建立联系。因此，查士丁认为，当圣经说上帝向摩西说话时，它的意思是，上帝的逻各斯在向摩西说话。

184

由于奥利金及其学生的影响，这些观点在东方教会——也就是在说希腊语、而不是在说拉丁语的教会中广为流传。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在永恒不变的上帝与短暂易变的世界之间，有上帝的道或逻各斯。阿里乌之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的。

阿里乌之争始于亚历山大，当时，李锡尼统治着罗马帝国的东部，君士坦丁控制着西部。亚历山大的主教亚历山大因一些问题与阿里乌产生了冲突，而阿里乌（Arius）是亚历山大最有威望、最受欢迎的长老之一。虽然争论的问题很多，但生死攸关的问题主要是逻各斯、上帝的道是否与上帝永恒共存。最终成为阿里乌派箴言的“有一段时间还没有他（圣子）”（there was when He was not），恰当地指出了阿里乌之争的焦点。亚



现已成为废墟的尼西亚城门。

历山大认为，上帝的道与圣父永恒共存；阿里乌则相信，上帝的道并不与圣父永恒共存。尽管这似乎是个细节问题，但是，最终岌岌可危的问题在于，上帝的道是否具有神性。阿里乌声称，严格地讲，上帝的道并不是上帝，而是所有受造物中的第一个。就这一点而言，重要的是要理解，阿里乌并没有否定上帝的道先存于道成肉身。相反，阿里乌和亚历山大都认为，上帝的道先存于道成肉身。阿里乌的意思是，在其他一切受造物被创造出来之前，上帝就已经创造了上帝的道。亚历山大相信，上帝的道就是上帝，因此不是被造的，而是与圣父永恒共存的。换句话说，如果要在上帝与受造物之间画一条线，阿里乌会将上帝的道画入受造物，而亚历山大所画的线会将所有受造物与上帝和上帝的永恒之道分开。

除了圣经中有利的经文证据之外，阿里乌和亚历山大似乎都有令自己对手的观点站不住脚的逻辑论证。阿里乌一方认为，亚历山大的观点否定了基督教的一神信仰——因为按照亚历山大这位主教的教导，有两位具有神性的存有，因此就有两位神。亚历山大反驳称，阿里乌的观点否

定了上帝之道的神性,因此也否定了耶稣的神性。教会从一开始就崇拜耶稣基督,现在,阿里乌的观点迫使教会要么停止崇拜耶稣,要么宣布自己正在崇拜受造物。亚历山大认为,这两种选择都是难以接受的,阿里乌实际上是错误的。

虽然这些是在阿里乌之争过程中所呈现的问题,但问题的实质很可能是基督如何施行拯救。对于亚历山大,特别是后来为他的观点辩护的神学家——尤其是阿塔那修——而言,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因为上帝已经在基督里进入了人类的历史,为我们打开了重回上帝那里的道路。阿里乌和他的追随者显然认为,这样的观点威胁到基督作为救赎主的角色,因为通过自己对上帝的顺服,耶稣已经打开了救赎之路,如果耶稣是上帝,不是受造物,他的顺服就没有任何意义。

185

冲突终于公开爆发了,因为亚历山大声称,谴责阿里乌的教义,革除他在亚历山大的所有教职,是他作为主教的权力与职责。阿里乌并不接受这一判罚,而是求助于亚历山大的人民和罗马帝国东部各地的许多有名的主教,因为他们曾是他在安提阿的同窗。亚历山大很快就爆发了群众示威,人们走上大街游行,歌唱反映阿里乌神学观点的叠歌。阿里乌所求助的主教——他们为了向他们在安提阿的同一位老师表示敬意而自称卢西安派的伙伴们(fellow Lucianists)——纷纷写信表示,被革职的长老阿里乌是正确的,亚历山大在教导错误的教义。因此,亚历山大的地方性分歧威胁到了罗马帝国东部所有教会的合一。

这就是刚刚击败李锡尼的君士坦丁决定介入时的事态。他的第一个措施是,派他的教会事务顾问科尔多瓦的主教霍修斯去说服争辩的双方和解。霍修斯的反馈是,单凭友善的劝解并不足以解决争执,于是君士坦丁决定采取他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的举措:他将召开一次罗马帝国各地的主教都参加的大会或主教会议。除了解决为了制定通行的政策而必须解决的问题之外,此次大会——将在距君士坦丁堡很近的城市尼西亚(Nicea)召开——还将解决爆发在亚历山大的这场神学争论。

186

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

公元325年，主教们聚集在尼西亚，召开了后世所称的第一次普世大公会议。出席此次大公会议的主教的确切人数不详——一些古代编年史给出的数字“318”遭到了学者们的质疑，因为这个数字恰巧与在亚伯拉罕时代接受割礼的人数一致。不过，出席的主教大约有三百位，主要来自说希腊语的东方，还有一些来自西方。为了从出席会议的主教的角度来理解此次大公会议，我们一定要记得，其中一些主教最近刚刚遭受过监禁、逼迫或流放，一些主教的身上还留有忠于信仰的标记。现在，在经历了这些试探数年之后，正是这些主教受到了邀请，出席在尼西亚召开的大公会议，而且，是由皇帝支付他们参加会议的费用。出席此次大公会议的许多主教因着传闻或借助信件往来而彼此了解。但是现在，他们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第一次共同亲眼目睹了教会普世性的切实证据。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出席了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他在《君士坦丁传》（*Life of Constantine*）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 上帝最杰出的执事聚集在尼西亚，他们来自欧洲、利比亚——也就是非洲——和亚洲的许多教会。一间小小的祷告室仿佛被上帝变大，这里荫庇着叙利亚人、西利西亚人（Cilicians）、腓尼基人、阿拉伯人、底比斯人（Thebans）、利比亚人、美索不达米亚人，以及来自巴勒斯坦与埃及的代表。还有一位波斯的主教和一位西徐亚（Scythian）的主教。本都、加拉太（Galatia）、潘菲利亚（Pamphylia）、卡帕多西亚、亚细亚和弗里吉亚也派来了最杰出的主教。还有来自色雷斯（Thrace）、马其顿、亚该亚（Achaia）和伊庇鲁斯（Epirus）这些最遥远地区的主教。甚至西班牙科尔多瓦的著名主教霍修斯也出席了此次大公会议。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的主教因为高龄而没能出席。但是，作为他的代表，他的长老出席了会议。君士坦丁是有史以来第一

187 位和平召开这样一次盛会，并将其作为战胜所有仇敌的感恩之祭献给自己救主的统治者。[1]

在这样欢快的气氛中，主教们讨论了许多随着逼迫结束而必须解决的立法问题。他们通过了关于重新接纳背教者、选举和授予主教与长老圣职以及各主教辖区隶属关系的标准程序。他们也颁布教令，禁止主教、长老和执事从一座城市来到另一座城市，但这一教令很快就被忽视。

然而，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所面临最困难的问题是阿里乌之争。在这场神学争论中，我们必须考虑一些不同派别的观点与关注。

首先，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领导着一小群坚定的阿里乌派（这位主教在早期阿里乌之争中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请不要将这位优西比乌与亦出席此次会议的历史学家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混淆）。阿里乌并不是主教，因此，他没有资格出席此次大公会议，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成为了阿里乌及其观点的代言人。这一小群阿里乌派相信，阿里乌的教义完全正确，他们只需通过逻辑论证即可清楚地阐明他的教义，认为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将会支持阿里乌，并因亚历山大谴责过阿里乌的教义而谴责亚历山大。

另一小群完全反对阿里乌派的主教认为，阿里乌主义威胁到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因此，必须无条件地谴责阿里乌主义。不出所料，这群主教的领袖正是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在他的追随者中，有一个年轻人，他当188 时还只是一位执事，尚不能出席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但是，他最终得以闻名于世，因为他是尼西亚正统信仰的捍卫者：他就是亚历山大的阿塔那修。

大多数来自说拉丁语的西方教会的主教对阿里乌之争并不是那么关注，在他们看来，阿里乌之争只不过是奥利金的东方追随者之间的一场争

---

[1] Eusebius of Caesarea, *Life of Constantine* 3.7.

论。对于他们来说，正像德尔图良在很久以前所说的，只要宣信上帝有"三个位格和一个本质"就已经足够了。

另一小群主教——可能只有三到四位——持有的观点接近于圣父受难论，即圣父和圣子是同一位，因此，圣父也在十字架上受难。这些主教赞同阿里乌主义是错误的，但是，随着教会开始阐释三位一体教义的意义，他们自己的教义也在争论的过程中被否定了。

实际上，出席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绝大多数主教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派。当逼迫终于结束，教会必须应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时，他们对爆发了威胁到教会合一的争论而深感悲伤。从召开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那一刻起，这些主教似乎就希望能够达成一种令会议可以继续讨论其他问题的妥协。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这位因渊博的学识而赢得其他主教同工极大尊敬的历史学家——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

根据出席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主教的记录，令事态发生改变的是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对他教义的阐述——也是对阿里乌教义的阐述。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可能始终相信，只要清楚地阐明了他的教义，他就能说服出席此次大公会议的所有主教。但是，当主教们听到他的解释时，他们的反应与他所期待的正好相反。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断言，无论有多么崇高，上帝的道或圣子都只是一个受造物。他的断言激起了许多主教的愤怒："你说谎！亵渎上帝！异端！"主教们的愤怒咆哮令优西比乌沉默了，我们得知，主教们夺过了他手中的讲稿，将其撕成碎片，践踏在脚下。

此时，绝大多数主教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之前还希望通过谈判与妥协去解决那些危如累卵的问题，而不谴责任何教义。他们现在认为，必须尽可能以最清楚的方式否定阿里乌主义。

起初，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试图通过圣经中的经文驳斥阿里乌主义。但很快就显而易见，如果只通过经文，此次大公会议难以确凿无误地否定阿里乌主义。此时会议决定制定一份表达教会信仰、明确否定阿里

乌主义的信经。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制定这份信经的经过。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拿出了自己教会的信经，他为何这么做，学者们众说纷纭。君士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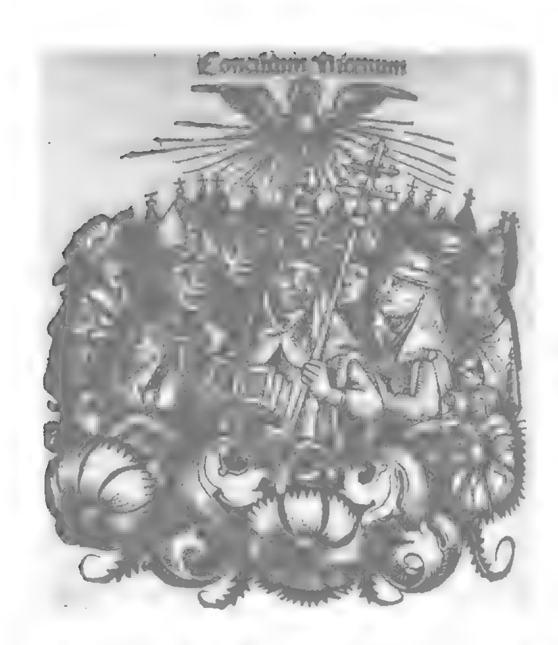
189 丁建议将同质（*homoousios*）一词——我们还会讲到——写进这份信经。（令一些学者心存疑虑的是，君士坦丁是真的完全清楚"同质"一词是阿里乌之争的关键才提出了这个词，还是他的教会事务顾问科尔多瓦的霍修斯建议他这样做？）最终，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通过了一份以凯撒利亚信经为基础的信经，但是，这份信经添加了大量清楚否定阿里乌主义的内容：

> 我们信独一的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
>
> 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出于父的实质，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同质，*homoousios*），天地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取得肉身而为人，受难，第三天再次复活，升天，将会来审判活人和死人。
>
> 我们信圣灵。
>
> 但是，凡曾说有一段时间还没有他（圣子），在被上帝所生之前他尚未存在，或说他出于无有，或说上帝的儿子所具有的是与上帝不同的实质（*hypostasis*）或本质（*ousia*），或是被造的，或是会改变或变化的，这些人都为大公教会所诅咒。[2]

后来，教会对这份信经做出了许多补充，并删除了最后一段诅咒文，这份信经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尼西亚信经》的底本，而《尼西亚信经》是最被普遍接受的基督教信经。（起源于罗马的《使徒信经》只被源自西方的教会——包括罗马天主教和源于新教改革的教会——所熟知和使用。

---

② Eusebius of Caesarea, *Epistle to the Caesarea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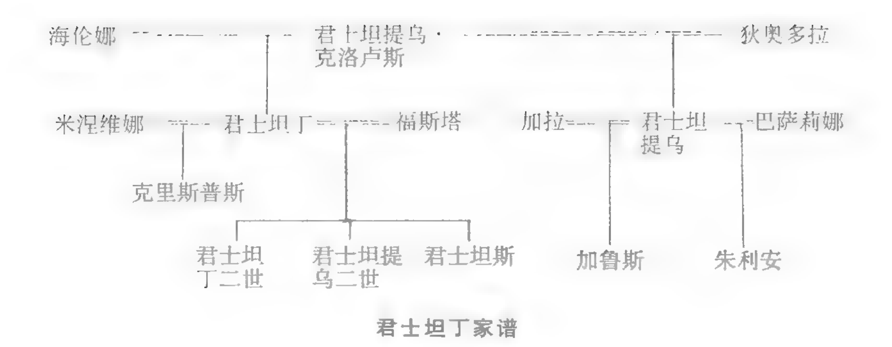
《纽伦堡编年史》所描绘的尼西亚大公会议。

另一方面，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包括希腊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等——都承认《尼西亚信经》。）

当我们阅读主教们在尼西亚通过的这份信经时，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主要关切在于否定圣子或上帝的道——逻各斯——是受造物，或它们与上帝不具有相同神性的观念。首先，这可以在一些肯定的陈述中看出，如"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这也是《尼西亚信经》宣布圣子"受生，而非被造"的原因。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尼西亚信经》开篇就宣告，圣父是"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因此，在宣布圣子是"受生，而非被造"的同时，圣子已经被排除在圣父所创造的"有形无形的万物"之外。此外，《尼西亚信经》的最后一段谴责了宣布圣子是与受造物一样"出自无有"——从无中受造——的人。最后，《尼西亚信经》告诉我们，圣子是为"父的实质"所生。

190

然而，关键词和许多争论的中心是 *homoousios* 一词，它通常被翻译成"同质"（of the same substance）。"同质"一词意在表达圣子与圣父具有相同的神性。但是，"同质"一词也成为后来抵制《尼西亚信经》的主要原



君士坦丁家谱

因，因为它似乎是在暗示，圣父与圣子没有任何区别，因此为"圣父受难论"敞开了一扇大门。

出席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主教们希望，他们通过的《尼西亚信经》——以及附在后面的措辞清晰的诅咒文——会结束阿里乌之争，他们逐一在《尼西亚信经》上签名。只有少数主教拒绝在信经上签名，其中就包括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最终，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宣布他们是异端，革除了他们的教籍。此外，君士坦丁对这些主教又做出了自己的判罚：他将被革职的主教逐出了他们的城市。也许，他只想避免再次爆发骚乱。但是，对教会神职人员所做的这一世俗判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它开创了世俗权力代表所谓的正统教义干涉教会事务的先例。

然而事与愿违，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并没有结束阿里乌之争。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是位能干的政治家，我们得知，他甚至还是君士坦丁的远亲。他的策略是设法博得君士坦丁的同意，重返尼哥米底亚。他很快就成功了。君士坦丁的夏季行宫位于尼哥米底亚，因此，优西比乌很快就得以将自己的案件再次向君士坦丁陈明。最终，君士坦丁认为，他对阿里乌派的惩罚过于严厉。阿里乌在流放中被召回，君士坦丁命令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恢复阿里乌的圣餐。正当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还在考虑是服从皇帝的命令，还是依照自己的良心来行事时，阿里乌突然去世。

191

公元328年，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去世，他的继任者是阿塔那修。阿塔那修作为执事参加过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现在，他成为了尼西亚事

业的捍卫者。他很快就与尼西亚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讲述阿塔那修的一生就可以最好地回顾阿里乌之争的后期历史。这将是第十九章的主题，我们不必在此赘述。我们只需说，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和他的追随者成功地让君士坦丁下令流放了阿塔那修。在阿塔那修被流放之后，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大多数领袖也被放逐。当君士坦丁在临终之际要求接受洗礼时，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为他施行了洗礼。

在短暂的空位期之后，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继承了皇位：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斯和君士坦提乌二世。君士坦丁二世统治着高卢、大不列颠、西班牙和摩洛哥。君士坦提乌二世的领地遍及罗马帝国东部的大部分领土。君士坦斯只分得了他两个兄弟领地之间一片狭长的土地，包括意大利和北非。最初，新局势有利于尼西亚一派，因为君士坦丁这三个儿子中最年长的一位支持他们，他召回了流放中的阿塔那修和其他人。但是，君士坦丁二世与君士坦斯之间后来爆发了战争，这为在罗马帝国东部统治的君士坦提乌二世提供了一次推行倾向阿里乌主义政策的良机。阿塔那修再次被流放，在君士坦丁二世去世之后，当君士坦斯统一了罗马帝国西部，以及君士坦提乌二世被迫采取更加温和的政策时，阿塔那修才得以从流放中归回。但是，君士坦提乌二世最终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唯一皇帝，正如哲罗姆所说，正是在这时，“整个世界才从沉睡中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为阿里乌派”。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领袖再次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城市，君士坦提乌二世对他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年迈的科尔多瓦主教霍修斯和罗马主教利贝里乌（Liberius）也最终在阿里乌派的信仰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92

但是，君士坦提乌二世的意外去世改变了事态的进展。他的堂弟朱利安继承了皇位，他被后世的基督教历史学家称为背教者。得益于基督徒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异教徒得以对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的新局势做出回应。

第十八章

异教徒的回应：背教者朱利安

这位非常仁慈的王子（君士坦提乌）就是这样收拾我们的，尽管我们还是至亲。根本不通过审判，他就杀害了我们共同的六个堂兄弟、我的父亲——他的叔叔、我父亲一脉的另一个叔叔和我的哥哥。

——背教者朱利安

因为许多原因，朱利安并不喜欢君士坦提乌和他所宣信的基督教。当君士坦丁去世时，这位已故皇帝的大多数至亲惨遭屠杀。幸免于难的只有继承皇位的三兄弟和他们的堂兄弟朱利安与加鲁斯（Gallus）——朱利安同父异母的哥哥。我们并不完全清楚犯下这些罪行的背景，因此，单单怪罪君士坦提乌可能并不公平。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君士坦丁去世之后，出现了关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后来，军队杀害了君士坦丁的大多数亲戚——这并不是为了建立另一个王朝，而是为了确保君士坦丁活下来的三个儿子可以毫无争议地继承皇位。在君士坦丁的这三个儿子中，只有君士坦提乌当时在发生屠杀的君士坦丁堡，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是他下令屠杀了自己的亲戚，至少是宽恕了这些罪行。

不管真相如何，朱利安都相信，他的堂兄是有罪的。朱利安的父亲是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兄弟，因此，朱利安是三位新皇帝的嫡堂兄弟。在朱利安的庞大家族中，只有他和同父异母的哥哥加鲁斯活了下来。他后来宣称，加鲁斯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加鲁斯当时已经病入膏肓，而他自

己被放过一马的原因是他只有六岁，对皇位构不成任何威胁。君士坦提乌可能下令放过这两个堂兄弟，因为他们太小了，还不足以带头谋反，如果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毫无争议地死去，这两位更加年轻的堂兄弟将依次继承皇位。 *194*

与此同时，加鲁斯和朱利安都被放逐到宫廷之外。加鲁斯一心强身健体，他的弟弟朱利安则对哲学越来越感兴趣。他们都接受了洗礼和基督教的教导，在被逐出宫廷期间，他们都成了教会的"读经师"(readers of the church)。

公元350年，君士坦提乌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统治者，但他没有可以辅佐他统治庞大帝国和继承他皇位的儿子，因此，他最终被迫召回了加鲁斯。公元351年，君士坦提乌授予加鲁斯"凯撒"的头衔，也就是副帝，并将广阔的领地交与加鲁斯统治。但是，加鲁斯实际上并不是一位能干的统治者，而且又出现了他在密谋造反的传言。在授予加鲁斯"凯撒"头衔几年之后，君士坦提乌将他逮捕斩首。

与此同时，朱利安继续在著名的古代哲学之都雅典学习哲学。他在雅典结识了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凯撒利亚的巴西尔——他最终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主教之一。也是在雅典，朱利安对古代的神秘宗教产生了兴趣。最终，他放弃了基督教，在古希腊的文学与宗教中寻找真理与美。

君士坦提乌决定抛弃前嫌，忘记他与加鲁斯共事的那段心酸往事，他召来了幸存的亲戚朱利安，与他一同统治罗马帝国。君士坦提乌将朱利安封为凯撒，任命他统治高卢。没有人会想到，每日与书籍和哲学家为伴的朱利安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不管怎样，君士坦提乌几乎没有给他一点帮助。但是，朱利安令他的同代人大吃一惊。他在高卢的统治成为了典范。当他有机会率军与野蛮人争战时，他向世人证明自己是一位能干的将军，并在军队中赢得了极大的爱戴。 *195*

君士坦提乌并不甘愿看到这一切，因为他担心，朱利安会谋求他的

皇位。这两个堂兄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当正准备与波斯开战的君士坦提乌将高卢的驻军调到罗马帝国的东部时，高卢的军队叛变了，他们宣布朱利安才是“奥古斯都”——至高无上的皇帝。君士坦提乌一旦消除了波斯人的威胁，便立即发兵，镇压朱利安及其叛军。当战争似乎不可避免、双方随时准备战斗时，君士坦提乌去世了。朱利安轻而易举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一年是公元361年。

朱利安登基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向那些最应当对他的不幸负责的人和想要阻止他登上权力宝座的人复仇。为此，他任命了一个理论上独立、但实际上听命于他的法庭。这个法庭处死了他最痛恨的几个敌人。

此外，朱利安还是一位能干的统治者，他成功地将广阔而混乱的领地带上了正轨。然而，最能令后人铭记他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的宗教政策，这为他赢得了传世的称谓：“背教者”。

朱利安的宗教政策

朱利安想要复兴异教失去的荣耀，希望阻止基督教的发展。自从君士坦丁时代以来，异教大大失去了其古代的光芒。君士坦丁并没有逼迫异教徒，也没有试图强迫他们归信基督教。但是，为了获得用来装饰新首都的艺术品，他将古老的异教神庙洗劫一空。在他儿子们的统治之下，通过了许多有利于基督教的法律。到了朱利安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皇帝时，古老的异教神庙已几乎空无一人，衣衫褴褛的异教司祭通过各种方法增补他们的微薄收入，几乎无暇顾及古老的异教崇拜。

朱利安希望彻底复兴与改革异教，为此他下令归还从异教神庙掠夺的一切。他仿效了基督教会的榜样，建立起类似于教会当时教阶体制的异教祭司等级制度。他将整个帝国分成若干地区，每个地区都有一位领导该地区所有祭司的大祭司。地区大祭司接受省大祭司的领导。省大祭司则听命于最高祭司，也就是朱利安本人。这一祭司等级制度中的所有祭司都应当做出表率，他们不应当只关注崇拜，还应当关爱穷人。在否定

基督教的同时，朱利安实际上也学效了基督教的许多东西。

实施这项庞大的宗教复兴计划的同时，朱利安采取了更加直接的措施，来复兴古代的神祇崇拜。他自认为是奉天命完成这一使命的人；因此，在等待全罗马帝国回归其古代信仰的同时，他向异教神祇献上了他人没有献上的崇拜与祭物。他下令举行大规模的献祭，在这样的献祭中，他一次向异教神祇献上数百头公牛和其他动物。但是，朱利安也是一位精明的统治者，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对异教的复兴并不像他原本希望的那样受人欢迎。人们甚至在参加时还在嘲笑他的新仪式。因此，他认为不仅必须推广异教，似乎也必须阻止异教的最大敌人——基督教。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朱利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公平地说，我们必须坚持一点，他从未下令逼迫基督徒。很多地方出现了殉道士，但这并不是因为朱利安的命令，而是因为暴徒的行为和一些过度狂热的地方官员。朱利安相信，逼迫基督徒对他的事业没有任何帮助。

朱利安并没有逼迫基督徒，而是采取了一个双管齐下的政策：抑制基督教的发展和嘲弄基督徒。就抑制基督教的发展而言，朱利安颁布法令，禁止基督徒教授古典文学。自公元2世纪的查士丁以来，基督徒一直在利用古代的经典著作传播他们的信仰，因此，朱利安在禁止被他视为亵渎神祇的行为时，也阻止了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其次，朱利安开始嘲弄基督徒，他将基督徒称为"加利利人"。为此，他还撰写了一部著作：《驳加利利人》(*Against the Galileans*)，他在其中表明，他通晓圣经，他既嘲弄圣经，也嘲弄耶稣的教导。尽管《驳加利利人》已经遗失，但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以至于亚历山大的主教西利尔(Cyril)在八年之后还认为，必须驳斥《驳加利利人》，西利尔在自己的驳斥文中承认，朱利安的论证之所以有一定的说服力，是因为他曾经是基督徒，他了解圣经和基督教的教义。显而易见，朱利安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加利利人"曲解和误解了旧约。这样的论点需要以政策来强化，因此，朱利安决定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这并不是因为他特别喜爱犹太人，而是为了用事实驳斥基督徒的共同论点：

圣殿被毁实现了旧约中先知的预言。

朱利安正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实施着这一切计划，但是他却十分意外地死了。当他率军与波斯人血战时，敌军的长矛夺去了他的生命。有这样一个缺乏史实根基的著名传说：朱利安的临终遗言是："你胜利了，加利利人！"

第十九章

亚历山大的阿塔那修

成为肉身之后，救主所成就的是如此之多，任何想要逐一列举的人，就好像是面向浩瀚的海洋数算浪花。

——亚历山大的阿塔那修

在参加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基督徒中，有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年轻人，后来，他的敌人将他称为“黑侏儒”(black dwarf)。他就是阿塔那修，亚历山大的秘书；很快，他就成为阿里乌之争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尼西亚正统信仰的捍卫者。他是公元4世纪伟大的教会领袖——“教父”之一。现在，我们就来讲述阿塔那修的生平，这是我们了解当时事件的最好方法。

早年生活

我们并不清楚阿塔那修的出生日期和地点，但是，他可能出身卑微，生于尼罗河畔一座小城镇或小村庄。他说科普特语，这是一种埃及原始居民的语言，这些居民曾先后被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征服。他肤色黝黑，就像科普特人一样，因此，他很可能就是科普特人，可见，他是埃及社会的下层人士。当然，他从未声称自己有高贵的出身，也从未说过自己精通希腊罗马文化。

阿塔那修在早年与沙漠修士交往密切。哲罗姆曾肯定地说，阿塔那

修曾给隐士保罗一件斗篷;阿塔那修本人在他的《圣安东尼传》中宣称,他经常拜访这位著名的修士,为这位老人洗手。这后一个细节令一些人大胆地设想,阿塔那修小时候服侍过安东尼。无论事实如何,毫无疑问的是,阿塔那修一生都与沙漠修士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不断给予他支持和保护。

200 阿塔那修从修士这里学到了严格的修道戒律,并将其用于己身;他的严格与苦修赢得了朋友的敬佩,甚至是许多敌人的敬重。在阿里乌主义的所有对手中,阿塔那修是最令人生畏的一位。这并不是因为他缜密的逻辑论证,也不是因为他风度优雅,更不是因为他政治敏锐。在所有这些方面,他的对手都胜过了他。令他远胜其他基督徒的是,他与周围人的关系密切,活出了自己的信仰,他没有阿里乌派的诡诈,也没有其他许多重要主教的虚荣。他的修道戒律,他在基督徒中的根基,他火一般的热情、虔诚的信仰和不可动摇的信念,都令他战无不胜。

早在阿里乌之争爆发之前,阿塔那修就已经完成了两部著作:《驳异教徒》(*Against the Gentiles*)和《论道成肉身》(*On the Incarnation of the Word*)。

这两部著作提供了阿塔那修神学本质的一些线索。在其中我们找不到像克莱门或奥利金那样的思辨。这两部著作表明了这一深刻的信念:基督教信仰和人类全部历史的核心事件,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道成肉身。上帝成为肉身,来到人间,这是阿塔那修所理解的基督教的核心。

有一个段落令人难忘:阿塔那修将道成肉身比作一位皇帝莅临一座城市。皇帝决定进行一次访问,他住在城里的某个房屋中。结果,不仅是这个房屋,整座城市都获得了殊荣和特殊的保护,强盗远离了这里。同样,宇宙君王(Monarch of the Universe)已经莅临我们人类这座城市,住在我

201 们的某个房屋里,得益于这样一次莅临,我们都受到了保护,免于魔鬼(Evil One)的攻击和诡计。现在,受益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次莅临,我们可以自由地成为上帝要我们成为的样式——能够与上帝相交的

存在。

显而易见，上帝进入历史是阿塔那修的信仰核心。因此，他当然会认为，阿里乌主义严重地威胁到基督教的核心信仰。阿里乌的教义是，在耶稣基督里来到我们中间的那位并不是真正的上帝，而是一个低一级的存有，是一个受造物。阿塔那修难以接受这样的教义，那些因成为肉身的上帝的爱而退隐到沙漠中的修士，以及在阿塔那修的带领之下进行崇拜的基督徒，同样也不能接受这样的教义。对于阿塔那修、修士和许多基督徒来说，阿里乌之争并不是毫无意义或意义不大的关于神学细节的争辩。在阿里乌之争中，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危如累卵。

在亚历山大的主教亚历山大弥留之际，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阿塔那修会继承亚历山大，成为主教。但是，年轻的阿塔那修逃到了沙漠，因为他只想平静地生活，为基督徒主持圣事，与基督徒一同崇拜。据说，亚历山大在临终前不久找来了他的这位年轻朋友，他可能是想告诉阿塔那修，他希望阿塔那修担任亚历山大的下一任主教。但是，阿塔那修还在躲藏。最终，在亚历山大去世数周之后，阿塔那修才极不情愿地被任命为亚历山大的主教。这一年是公元 328 年，君士坦丁在同一年撤销了流放阿里乌的判罚。阿里乌主义重新得势，战斗一触即发。

历经多次试炼

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和其他阿里乌派领袖知道，阿塔那修是他们最强大的敌人之一。他们很快就采取了确保阿塔那修垮台的行动，他们散布谣言称，阿塔那修行巫术，是埃及基督徒的暴君。尤其是他被指控杀害了一位名叫阿尔塞尼乌（Arsenius）的阿里乌派主教：他砍掉了阿尔塞尼乌的一只手，将其用在巫术仪式中。结果，君士坦丁命令阿塔那修出席在推罗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解答对他的严重指控。有一部充满戏剧性的编年史记载，阿塔那修奉命来到了推罗，在听过对他的指控之后，他进入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身披斗篷的蒙面人。确认在场的一些人认

识阿尔塞尼乌之后，阿塔那修揭开了此人掩面的兜帽，这让指控他的人大吃一惊，因为他们看到，此人正是阿塔那修的所谓受害者。随后，一些相信有关亚历山大这位主教不利谣言的人提出，阿塔那修可能并没有杀害阿尔塞尼乌，而是砍掉了他的一只手。阿塔那修并没有反驳，直到会议坚持要求阿塔那修出示阿尔塞尼乌的手并没有被砍掉的证据。随后，阿塔那修揭开了挡住阿尔塞尼乌一只手的斗篷。“这是另一只手!”一些相信谣言的人喊道。接着，阿塔那修揭开了挡住阿尔塞尼乌另一只手的斗篷，问道:“你们认为阿尔塞尼乌是什么样的怪物？三只手的怪物?”会场上笑声一片，但是有些人被激怒了，因为阿里乌欺骗了他们。

在澄清了推罗宗教会议(Synod of Tyre)的指控之后，阿塔那修决定再到君士坦丁堡，将他的案件上诉到君士坦丁。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在宫廷中的影响力很大，阿塔那修发现，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觐见君士坦丁。后来，阿塔那修采取了更加大胆的措施。一天，当君士坦丁骑马出游时，亚历山大这位矮小的主教跳到皇帝的马前，他紧握缰绳，拦住了皇帝的去路，直到君士坦丁同意接见他之后才善罢甘休。考虑到宫廷中的政治形势，这种方法可能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方法让君士坦丁相信，阿塔那修的确是个危险冲动的狂热分子。因此，当后来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告诉君士坦丁，阿塔那修曾夸口自己可以阻断从埃及向罗马运送小麦的船运时，君士坦丁听信了优西比乌的话。基于优西比乌的指控，君士坦丁将阿塔那修从亚历山大流放到罗马帝国的西部城市特里尔。

然而，在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为君士坦丁施行洗礼之后不久，君士坦丁就去世了，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斯和君士坦提乌——继承了皇位。这三位兄弟决定，所有被流放的主教——人数众多——都可以恢复原职。

但是，这并不是阿塔那修最后一次重返亚历山大，而是他漫长斗争和不断被流放的开始。亚历山大有一群阿里乌派，他们声称，曾经离开的阿塔那修并不是合法的主教。一个名叫格列高利的阿里乌派人士声称，他

202

才是亚历山大的合法主教，他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阿塔那修不愿意将教堂让给他，因此格列高利想要以暴力强夺，结果亚历山大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骚乱；为了避免再次爆发暴力冲突，阿塔那修认为，他最好还是离开亚历山大。有迹象表明，当局还指控他制造了骚乱。这也得到了证实，当他抵达港口时，他被禁止出港，因为这是总督的命令。最终，他说服一位船长，船长把他偷运出港，送到了罗马。

阿塔那修在罗马的流亡卓有成效。当时，阿里乌派和尼西亚派都要求罗马主教尤利乌斯(Julius)的支持。阿塔那修能够亲自陈述尼西亚派的观点，他因此很快就得到罗马神职人员的支持，他们接过了尼西亚的事业，反对阿里乌派。最终，在这座古老的首都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宣布阿塔那修是亚历山大的合法主教，格列高利是篡位者。尽管这并不意味着阿塔那修可以立即重返亚历山大，但这的确表明罗马帝国西部教会对尼西亚事业的支持，尤其是对阿塔那修的支持。

203

在君士坦丁二世去世之后，君士坦斯成为罗马帝国西部的唯一皇帝，后来，他要求统治罗马帝国东部的君士坦提乌允许阿塔那修回到亚历山大。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君士坦提乌需要他弟弟的支持，他同意了君士坦斯的要求，阿塔那修因此得以重返亚历山大。

格列高利在亚历山大牧养不善，这令亚历山大人民像欢迎英雄或解放者般迎接了阿塔那修。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格列高利和阿里乌派代表着希腊化程度更高的上层阶级，而阿塔那修则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不管怎样，人们在热烈与欢乐的气氛中欢迎阿塔那修再次归来。除了亚历山大的居民之外，许多来自沙漠的修士也加入庆祝的行列。在如此强大的支持之下，阿塔那修大约有十年没有受到敌人的攻击。在这段时间里，他通过大量的书信，加强了自己与其他正统信仰捍卫者的联系；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撰写了大量驳斥阿里乌主义的论文。

然而，皇帝君士坦提乌是坚定的阿里乌派，他觉得必须为自己除掉这位尼西亚信仰的捍卫者。但只要君士坦斯还活着，君士坦提乌就必须忍

受阿塔那修的存在，因为他还要指望罗马帝国西部皇帝君士坦斯的支持。后来，马格嫩提乌（Magnentius）试图篡权，君士坦提乌不得不全力对付这个新敌人。

公元353年，当时已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皇帝的君士坦提乌终于觉得，安全地实施亲阿里乌派政策的时机到了。在威胁与武力之下，越来越多的主教接受了阿里乌主义。据说，君士坦提乌下令召开一次谴责阿塔那修的宗教会议，但是，他被告知这并不可能，因为教会法规定，禁止在没有举行听证的情况下谴责任何基督徒，可是，君士坦提乌的回答是："我的旨意也是教会法。"在如此可怕的威胁之下，许多主教被迫在谴责阿塔那修的文书上签字，而拒绝签字的主教都遭到了流放。

如果当时的编年史家是可信的，那么当时的情况表明，君士坦提乌担心阿塔那修在亚历山大的势力，因此，他希望在不实际流放阿塔那修的情况下将他赶出亚历山大。阿塔那修收到了一封信，君士坦提乌在信中表示愿意接见阿塔那修，但是，阿塔那修从未提过这个请求。他礼貌地回答说，这一定是搞错了，因为他从未要求得到这一殊荣，不希望浪费皇帝的宝贵时间。随后，君士坦提乌命令军队在亚历山大集结。当军队集结待命、随时可以镇压一切反抗时，总督以皇帝的名义命令阿塔那修离开亚历山大。阿塔那修拿出了皇帝以前准许他重返亚历山大的凭证。他告诉总督，这一定又是搞错了，因为皇帝不会出尔反尔。

204

随后不久，当阿塔那修在一个教会主持圣餐时，总督命令军队包围了教会，带着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突然冲进了教堂。随后便是一阵骚乱，阿塔那修命令会众诵唱《诗篇》136篇的叠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士兵在会众中挤出了一条路，与此同时，一些基督徒继续唱诗，一些基督徒试图逃跑。在场的神职人员紧紧围住了拒绝逃跑的阿塔那修，因为他希望看到自己所牧养的基督徒安全之后再离开。但是，他这时昏倒了，神职人员设法将他抬到了安全的地方。

从此以后，阿塔那修仿佛变成了幽灵。罗马帝国的官员在四处找他，

但就是找不到他。他在自己的忠实盟友沙漠修士那里避难。沙漠修士有着自己的通讯方法，只要帝国官员一接近阿塔那修的藏身之处，他就会被转移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阿塔那修与沙漠修士共同生活了五年。在这五年时间里，尼西亚的事业遭到重创。君士坦提乌的政策公开支持阿里乌派。一些宗教会议被迫宣布支持阿里乌主义。最终，甚至年迈的科尔多瓦主教霍修斯和罗马主教利贝里乌也被迫在阿里乌派的信仰声明上签字。虽然许多主教和教会领袖相信，阿里乌主义不可接受，但是当国家非常强硬地支持阿里乌主义时，他们也难以反对。当在塞尔曼召开的一次会议公然否定了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决议时，阿里乌主义达到了顶峰。这就是正统教会领袖所说的“塞尔曼亵渎”(Blasphemy of Sirmium)。

205

随着君士坦提乌的意外去世，他的堂弟朱利安继承了皇位。新皇帝根本就无意支持阿里乌之争中的任何一方，因此，他只是撤销了流放主教的全部命令。他显然是希望在争辩双方彼此削弱力量的同时，他可以向着自己复兴异教的目标前进。该政策的一个结果是，阿塔那修得以再次重返亚历山大，在那里，他进行了一场急需的神学斡旋。

神学共识

在争辩的过程中，阿里乌主义变得越来越精深，越来越抽象。阿里乌主义的许多捍卫者都受过最好的希腊逻辑学训练，因此，他们能比以往更加缜密地论证自己的观点。就这样的论证而言，阿塔那修显然不是阿里乌派的对手。但是，他反对阿里乌主义的原因，以及他对阿里乌主义论点本质的驳斥，与逻辑思辨并没有多大关系。他所关注的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是堕落人类的修复者。虽然早期阿里乌主义的主要关切或许也是救恩教义，但他们很快就转向了思辨的论证。思辨的论证似乎是阿里乌派的优势，但其实是他们灭亡的原因，因为它令阿塔那修和他的支持者牢牢把握住救恩这一核心问题。阿塔那修围绕救恩展开



君士坦丁堡的圣伊琳娜大教堂，公元381年第二次大公会议在此召开，会议重申了三位一体教义。

了论证：人类因罪而堕落，因此需要一次新的创造，彻底改造与修复被罪所毁坏的一切。救恩之工就是创造之工。因此，再造我们的那位就是创造我们的那位。

阿塔那修不愿拘泥于教义式或成文的信经，而是希望阐明与调和岌岌可危的实际问题。他认为，许多基督徒之所以反对《尼西亚信经》，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肯定圣子与圣父同质，就会被理解为圣父与圣子没有任何差别。因此，一些基督徒不愿说同质（*homoousios*），而更愿说类质（*homoiousios*）。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已经宣布，圣子与圣父"同质"。但是，现在的许多基督徒却在说，他们宁愿肯定圣子与圣父"类质"。

阿塔那修此前一直坚守《尼西亚信经》，宣称那些说圣子与圣父"类质"的基督徒是同阿里乌派一样的异端。但是现在，亚历山大这位年迈的主教开始愿意接纳否定阿里乌主义、但坚持圣父与圣子之间存在差异的

基督徒。

通过一系列谈判，阿塔那修说服许多基督徒相信，以一种令坚持"类质"的基督徒满意的方法来解释《尼西亚信经》是有可能的。最终，在公元362年于亚历山大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上，阿塔那修和他的追随者宣布，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同质"是正统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他们之间的差异；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是"三个实质"也是正统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三个神祇。

同样，正如阿里乌的追随者曾利用赞美诗宣传他们的观点，现在，尼西亚派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他们谱写了肯定三位一体教义的赞美诗，其中最著名的是安波罗修（约339—397；参第二十一章）所作的《上帝的荣耀光辉明亮》（O Splendor of God's Glory Bright）和奥勒利乌斯·普鲁登修斯（Aurerius Prudentius，348—约413）所作的《圣父受生子之爱》（Of the Father's Love Begotten）。

基于上述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理解，大多数教会结成同盟，共同支持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最终于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第二次大公会议，批准通过了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教义。阿塔那修将一生献给了尼西亚事业，但他并未能活着看到尼西亚事业取得最后胜利。

207

再经考验

虽然朱利安并不希望逼迫基督徒，但从亚历山大传来的消息却令他不安。他复兴异教的努力遭到阿塔那修的坚决抵抗，而阿塔那修现在已经成为人民的英雄。如果皇帝的政策想在亚历山大取得成功，就必须再次流放亚历山大的这位主教。很快，阿塔那修就清楚地意识到，朱利安不仅想要将他逐出亚历山大，还希望将他赶出埃及。阿塔那修知道，他难以留在亚历山大，在亚历山大无处藏身，因此他决定再次去修士那里避难。

罗马帝国官员得知，阿塔那修正计划在沙漠中藏匿，因此他们想要提前将他逮捕。根据一些传记作家的记载，阿塔那修扮作一位旅客，乘船沿

尼罗河溯流而上，一艘速度更快的船追上了他。“你看到阿塔那修了吗？”快船上的士兵喊道。“看到了，”阿塔那修诚实地答道，“他就在你们前面，如果你们快一点，还可以追上他。”转眼间，这艘快船就消失在阿塔那修的前方。

我们已经讲过，朱利安的统治并不长久。约维安继承了他，而约维安是阿塔那修的崇拜者。于是，亚历山大的这位主教再次从流亡中回来，但他很快就被召到安提阿为皇帝出谋划策。当他最终回到亚历山大时，漫长的流亡生涯似乎已经结束。

然而，约维安在几个月之后就去世了，瓦伦斯（Valens）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皇帝，而他是阿里乌主义的坚定支持者。阿塔那修担心，如果他继续留在亚历山大，瓦伦斯会对亚历山大的正统教会采取行动，因此，阿塔那修决定再次离开亚历山大。但是他很快发现，瓦伦斯并不希望与这位战胜了君士坦提乌和朱利安的主教纠缠在一起。就这样，阿塔那修又回到了亚历山大，此后他始终留在那里，直到公元373年去世。

虽然阿塔那修没有看到自己终其一生奋斗的事业取得最终胜利，但他的著作清楚地表明，他相信阿里乌主义最终将被击败。随着他步入老年，他看到新一代神学家在自己周围成长起来，他们也投身于同一项事业。在这新一代神学家中，卡帕多西亚三杰是最杰出的，我们现在就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第二十章

卡帕多西亚三杰

并不是对每一个人,我的朋友们,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谈论上帝,因为这个题目并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那么平凡。不要对每一个人,不要在每一个人面前,不要就每一个问题都谈论,而是在一些人面前,在一些时候,在一定的范围内谈论。

——纳西盎的格列高利

卡帕多西亚地区位于罗马帝国东部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今天的土耳其境内。那里生活着三位教会领袖,他们被共同称为"卡帕多西亚三杰"(Great Cappadocians):凯撒利亚的巴西尔,他的弟弟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以及他们的朋友纳西盎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凯撒利亚的巴西尔被称为大巴西尔;尼撒的格列高利因自己的神秘默想著作而闻名于世;纳西盎的格列高利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演说家,他的许多赞美诗已经成为说希腊语教会的经典之作。但是为了公平起见,在讲述他们之前,我们先来讲述一下另一位同样值得讲述的基督徒,可是,她经常被倾向于忽视女基督徒工作的历史学家所遗忘。这位杰出的女基督徒就是玛格里娜(Macrina),大巴西尔和尼撒的格列高利的姐姐,她无疑应当被视为"卡帕多西亚第四杰"。

玛格里娜

玛格里娜、大巴西尔和尼撒的格列高利,他们成长在一个有着深厚基

督教渊源的家庭，他们的家族至少已有两代基督徒。在德西乌斯的逼迫期间，他们的祖父母曾在森林中藏匿了七年。在这次逃亡中，还有他们家族的其他一些成员，包括他们祖父母的两个儿子：格列高利和巴西尔。格列高利——后来成为了玛格里娜、大巴西尔和尼撒的格列高利的叔叔——是一位主教。他的兄弟巴西尔——玛格里娜、大巴西尔和尼撒的格列高利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和修辞学教师。他的妻子是一位基督教殉道士的女儿。因此，玛格里娜、大巴西尔和尼撒的格列高利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基督徒，他们的一个叔叔还是主教。

在玛格里娜十二岁那年，父母决定为她安排婚事，这是当时的习俗。他们选中了一个正准备成为律师的年轻亲戚，玛格里娜勉强同意了。当一切准备就绪时，新郎却非常意外地死去。从此以后，玛格里娜拒绝了一切的追求者，并最终发誓守独身与过默想的生活。

210

大约在玛格里娜订婚的两三年之前，大巴西尔出生了。大巴西尔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人们一度怀疑他是否能活下来。一直想要个儿子的老巴西尔提供给他当时最好的教育，因为他希望儿子可以像他一样，将来成为一名律师和演说家。年轻的大巴西尔先是在卡帕多西亚的主要城市凯撒利亚学习，后来又在安提阿和君士坦丁堡学习，最后在雅典学习。在这座古老的希腊城市，他结识了最终成为纳西盎主教的格列高利和后来被称为"背教者"的朱利安王子。

完成学业之后，才华横溢的大巴西尔回到了凯撒利亚。他的学识和家族的威望确保他能够在凯撒利亚得到一个重要的职务。很快就有人请他教授修辞学。

玛格里娜这时干涉了大巴西尔。她直率地告诉弟弟，他虽然看似凯撒利亚最杰出的人，但其实一事无成，如果他少引用一些异教作家的言论，多遵行一些基督教作家的教导，他会做得更好。大巴西尔对姐姐的话不屑一顾，他告诉自己，姐姐毕竟相当无知。

后来悲剧发生了。他们隐居乡下的兄弟瑙克拉提乌(Naucratius)

意外身故。大巴西尔被深深地触动。他与瑙克拉提乌一直亲密无间,只是最近才分道扬镳,因为瑙克拉提乌放弃了世俗的虚荣,而大巴西尔却全心追求世俗的荣华。大巴西尔深受打击,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他辞去了教职,抛弃了所有高位,他请玛格里娜教他信仰生活的奥秘。他们的父亲不久之前也刚刚去世,现在,玛格里娜为她痛失亲人的家庭带来了力量和安慰。

玛格里娜希望引导家人在信仰生活中寻找安慰。为什么不退隐到他们在附近的艾尼西(Annesi)的家,在那里过隐修与默想的生活?真正的幸福难以在世俗的辉煌中找到,而是在服侍上帝中得到的。完全脱离俗世时,人才可以最好地服侍上帝。衣服和食物必须尽可能简单,人应当全心祷告。因此,玛格里娜所提倡的生活,类似于沙漠禁欲者的生活。

于是,玛格里娜、她的母亲和其他一些女基督徒退隐到艾尼西,而大巴西尔遵从了姐姐的意愿,他来到埃及,学习更多的修道知识。大巴西尔最终成为说希腊语的教会中伟大的修道主义教师,正是玛格里娜唤起了他对修道主义的兴趣,因此,玛格里娜可以说是希腊修道主义的缔造者。

211

玛格里娜的余生都在艾尼西过着隐修生活。若干年后,在大巴西尔去世不久之后,他们的弟弟尼撒的格列高利前去看望她。她的声望很高,被称为"导师"。尼撒的格列高利在他与姐姐玛格里娜的对话录《论灵魂与复活》(*On the Soul and Resurrection*)中记载了这次探望,而该书中的主要论点和教导,很可能就是玛格里娜的。他在开篇就告诉我们:"大巴西尔,圣徒中的伟大圣徒,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到了上帝那里,所有教会都为他的离世深感悲痛。但是,他的导师姐姐仍然活着,因此我拜访了她。"但是,尼撒的格列高利并未轻易得到安慰,因为他看到,病床上的姐姐正忍受着严重哮喘的折磨。他写道:"见到导师又唤起了我的痛苦,因为她将不久于人世。"

玛格里娜任凭尼撒的格列高利流泪哀痛,随后又安慰了他,提醒他还有复活的盼望。她最终极为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尼撒的格列高利合上了

她的双眼，又为她主持了追思礼拜，之后继续进行姐姐和哥哥所交托给他的工作。

大巴西尔

若干年前，大巴西尔就从他学习修道生活的埃及、巴勒斯坦等地回来，定居在艾尼西附近。他和自己的朋友纳西盎的格列高利一起创建了一座男修道院，类似于玛格里娜所建立的女修道院。大巴西尔相信，集体生活必不可少，因为对于隐修士来说，根本就无人可去服侍，而修道生活的核心却是服侍他人。大巴西尔特别注意去做修道院中最不为人喜欢的工作。他还撰写了修道戒规。说希腊语教会的所有修道戒规都是以大巴西尔的教导为基础，因此，他通常被视为东方教会的修道主义之父。

然而，大巴西尔只过了六年多的修道生活，因为他迫不得已被按立为长老。很快，他就与凯撒利亚的主教产生了冲突，为了避免冲突升级，他决定回到自己的修道院。他一直留在那里，直到瓦伦斯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新皇帝是阿里乌派，因此，凯撒利亚的主教决定放下自己与大巴西尔的分歧，他召回这位圣洁的修士，帮助他一同对抗阿里乌主义。

当大巴西尔来到凯撒利亚时，环境非常艰难。恶劣的天气毁掉了庄稼，富人正在囤积食物。大巴西尔在讲道中抨击这种行为，为了喂饱穷人，他卖掉了自己的所有财产。他说，如果人人都只拿其所需，将所余分给他人，那么就既不会有富人，也不会有穷人：

> 如果拿走他人衣服的人被称为小偷，那么拒绝为衣不遮体的人提供衣服的人也可以被称为小偷。你们拒绝分享的食物属于穷人；你们藏在衣橱中的斗篷属于衣不遮体的人；你们家中正在腐烂的鞋子属于不得不赤脚走路的人。①

---

① *Homily on Luke's words*, "I'll tear down my barns . . ." 1.

大巴西尔将这些话付诸行动。在凯撒利亚郊区，他创建了朋友纳西盎的格列高利所说的"新城市"。在"新城市"中，饥饿的人得到了食物，病人得到了照顾，失业的人有了工作。为了维持这个新城市——巴西尔之城（Basiliad），大巴西尔从富人那里募集财物，并告诉他们，这是他们将财宝积攒在天上的良机，在那里，贼不能近、虫不能蛀。

当凯撒利亚的主教去世时，继任者的选举成为正统基督徒与阿里乌派斗争的焦点。大巴西尔德高望重，似乎最有可能当选。阿里乌派只在大巴西尔身上找到一个弱点：他令人怀疑的健康状况。正统基督徒的回应是，他们是在选举主教，不是选举角斗士。最终，大巴西尔当选为凯撒利亚的主教。

凯撒利亚的这位新主教知道，他的当选将产生与阿里乌派皇帝的冲突。瓦伦斯很快就宣布了他将访问凯撒利亚的计划。尼西亚派从其他城市的痛苦经验中得知，瓦伦斯想利用此次访问壮大阿里乌派。

为了准备瓦伦斯的访问，罗马帝国的许多官员来到了凯撒利亚。皇帝命令他们通过威逼利诱，制伏凯撒利亚的新任主教。但是，大巴西尔并没有轻易屈服。最终，在一次激烈的交锋中，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失去了耐心，他以没收财产、流放、酷刑甚至是死刑来威胁大巴西尔。但是，大巴西尔回答说："你们可以没收我的一切，只不过是这些破衣服和几本书。但你们无法流放我，因为无论将我流放到哪里，我都是上帝的客人。至于酷刑，你们应当知道，我的肉体已经在基督里死去。死亡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恩惠，会带我更快地到上帝那里去。"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大吃一惊，说从未有人向他说过这样的话。大巴西尔回答说："也许是因为你从未见过真正的主教。"

瓦伦斯终于来到了凯撒利亚。当他在祭坛献上慷慨的祭物，以示对凯撒利亚的恩惠时，没有人去领受皇帝的恩赐。皇帝不得不等待主教，大巴西尔最终接受了皇帝的祭物，但他明确表示，这是他在向皇帝施恩。

在这些事之后，大巴西尔可以全心进行他的主教工作了。他尤其关

注组织与推广修道生活，以及推动尼西亚的事业。通过大量的书信和一些神学论文，他为重申三位一体教义和最终否定阿里乌主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同阿塔那修一样，并没能亲眼看到尼西亚事业的最终胜利，因为他在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普世大公会议批准尼西亚教义之前几个月就去世了。

尼撒的格列高利

尼撒的格列高利是大巴西尔的弟弟，他的性情与大巴西尔迥然不同。大巴西尔脾气暴躁、不屈不挠，甚至有些傲慢，而尼撒的格列高利更喜欢安静、独居和隐姓埋名。尼撒的格列高利根本就无意成为任何事业的捍卫者。尽管他受过扎实的教育，但却难以与大巴西尔所受的教育相提并论。他一度想要成为律师和修辞学家，却没有为此付出多大热情。

214

大巴西尔和他的朋友纳西盎的格列高利热衷于修道生活，但是，尼撒的格列高利娶了一位年轻女子，他们似乎生活得非常幸福。几年之后，尼撒的格列高利的妻子去世了，他也开始过起了修道生活，还撰写了一篇题为《论贞洁》(*On Virginity*)的论文，而这篇论文的论点是他所特有的。他认为，没有娶妻的男子不必忍受亲眼目睹妻子的生产之苦，也不会经受失去妻子的更大痛苦。对于他来说，修道生活是一种避免喧嚣生活中痛苦与争斗的方法。他过着神秘生活，还撰写了论神秘生活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给予希望过神秘生活的人以重要指导。他因自己的神秘生活和此类著作而闻名于世。

可是，当时的斗争太激烈、太残酷了，即使像尼撒的格列高利这样的基督徒也难以逃脱。他的哥哥大巴西尔勉强他担任了小村尼撒的主教。瓦伦斯和阿里乌派继续尽其所能地镇压正统基督徒。对于尼撒的格列高利来说，这样的斗争太残酷了，他藏了起来。但即使是这样，在瓦伦斯和大巴西尔去世之后，尼撒的格列高利还是成为了尼西亚派的主要领袖之一。就这样，他被公元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所接纳。

虽然尼撒的格列高利非常安静、谦卑，但是，他的著作展现出他内心火一般的精神。他对尼西亚教义的详细解释，为这些教义在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之后，皇帝狄奥多西任命尼撒的格列高利为他的主要神学顾问之一，因此，他被迫游走于罗马帝国各地，甚至还去过阿拉伯和美索不达米亚。虽然这一工作有着极大价值，但是，他总是将其视为一种障碍，令他远离了默想的生活。

最终，在确保尼西亚的事业真正胜利之后，尼撒的格列高利重新过起了修道生活，希望俗世不要再打扰他。就这一点而言，他做得非常成功，因为他去世的日期和他去世时的详情，都不为世人所知。

纳西盎的格列高利

卡帕多西亚三杰中的另外一位是纳西盎的格列高利，他是大巴西尔的同学。他的父亲也叫格列高利，是纳西盎的主教，他的母亲叫诺娜（Nona）——当时的主教通常都会结婚。老格列高利曾是阿里乌派，但是，诺娜将他带回正统信仰。同大巴西尔一样，纳西盎的格列高利的家人都非常敬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被封为“圣徒”——格列高利本人、他的父亲老格列高利和母亲诺娜、他的兄弟凯撒里乌（Caesarius）、他的姐姐格格尼娅（Gorgonia）和他的堂兄安菲罗吉（Amphilochius）。

年轻的格列高利几乎一直在学习。他在凯撒利亚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来到雅典，在雅典大约生活了十四年，并结识了大巴西尔和朱利安王子。他在三十岁时回到了家乡，与大巴西勒一起过着修道生活。与此同时，他的兄弟凯撒里乌成为君士坦丁堡的著名医生，服务于君士坦提乌和朱利安，但是，他既没有被君士坦提乌的阿里乌主义所感动，也没有受到朱利安异教信仰的影响。

215

格列高利在回到纳西盎之后被按立为长老，但是，他并不希望成为长老。他逃到了大巴西尔的修道院，在那里躲藏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担



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方尖塔底座浮雕,皇帝狄奥多西手持花冠,准备奖赏比赛中的胜利者,两边是他的继承人霍诺里乌和阿卡狄乌。

任起他在纳西盎的教职。当时,他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论牧师职责的讲道。他一开始就说到:"我被战胜了,我承认自己的失败。"他曾坦言说,自己之所以不愿意成为牧师,部分原因是他喜欢默想生活,另一部分原因是他担心自己难以胜任这份工作,因为"顺服是困难的;但是,进行领导更加困难"。

从此以后,纳西盎的格列高利被迫卷入当时的争辩。当大巴西尔任命他为一座小村庄的主教时,纳西盎的格列高利认为,这是他的朋友强加给他的,他们的友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于纳西盎的格列高利来说,这是一段痛苦的日子,在这段时间凯撒里乌、格格尼娅、老格列高利和诺娜相继去世。失去亲人、备感孤独的格列高利离开了他被托付牧养的教会,目的是有时间静心默想。在他隐修期间,传来了大巴西尔去世的噩耗,而他此时尚未与大巴西尔和解。

纳西盎的格列高利感到震惊。但是,他最终还是被迫在与阿里乌主义的斗争中承担起领袖角色。大巴西尔曾经寻求他的帮助,可是,他很少

出手相助。公元379年,他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当时,阿里乌主义完全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在整个君士坦丁堡,已经没有了正统教会。纳西盎的格列高利开始在一个亲戚家举行正统崇拜。当他放胆在街上露面时,暴徒向他投掷杂物。阿里乌派修士经常打断他的崇拜,亵渎圣坛。但是,他并没有退缩,而是用他所谱写的赞美诗来坚固他的一小群会众。他的一些赞美诗成为希腊文赞美诗的经典。 216

最终,局势发生了变化。公元380年的年末,皇帝狄奥多西凯旋进驻君士坦丁堡。他是一位持有正统信仰的将军,很快他就解除了担任高职的阿里乌派的职务,而他们过去经常利用职务之便推动阿里乌派的事业。几天之后,新皇帝狄奥多西邀请纳西盎的格列高利与他一同访问圣索菲亚大教堂。那一天是阴天,但有一束阳光划破长空,照在格列高利身上。在场的一些基督徒相信,这是来自上帝的启示,他们开始高喊:"格列高利,主教,格列高利,主教!"纳西盎的格列高利担任主教符合狄奥多西的政策,因此,狄奥多西同意了。最终,并不希望成为主教的格列高利被说服了。现在,这位来自纳西盎的默默无闻的修士成为了君士坦丁堡牧首。

几个月之后,皇帝狄奥多西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次会议,作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纳西盎的格列高利主持了此次会议。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因为他说,主教们乱成了一窝蜂。当他的一些对手指出他已是另一个地区的主教,因此不可以再担任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时,他立即辞去了自己从不希望得到的职务。君士坦丁堡的行政长官内克塔里乌(Nectarius)随后被选为君士坦丁堡牧首,接替格列高利的教职。在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期间,内克塔里乌得到了一定的赞誉。他的继任者是约翰·克里索斯托,我们会在后面一章讲到他。 217

至于纳西盎的格列高利,他回到了家乡,继续谱写赞美诗,开展教牧工作。当他听说狄奥多西计划再召开一次会议并要求他来主持时,他断然拒绝了。他过着远离一切世俗与教会虚荣的生活,直至在六十岁左右时离开人世。

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重申了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关于圣子神性的教义，并补充说圣灵同样具有神性。因此，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明确颁布了三位一体的教义。此次大公会议的决议和它们所反映的神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卡帕多西亚三杰。在这个方面，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阐明了本质（*ousia*）与本体（*hypostasis*）的差异。*hypostasis* 的字义是“实质”（substance），但是，卡帕多西亚三杰将其定义为拉丁文位格（*persona*）的意译。因此，说拉丁语的西方教会与说希腊语的东方教会就同一个信式达成了共识：一个本质（*ousia*），三个位格（*hypostasis*）或三个实质（*hypostasis*）。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很难理解公元 4 世纪的基督徒会为了这些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因此，我们往往会低估这些争论的意义，认为它们只是一些过分热情的神学家充满学究气的迂腐之举。但是，我们不应当如此简单地看待问题。这些争论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纳西盎的格列高利的一番话，就可以表明这点：“如果不讨论圣子与圣父是同质，还是类质，人们甚至连鞋都修不成。”在社会的另一个终端阶层，自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之后五十年来，罗马帝国的大多数皇帝都支持阿里乌派的事业，坚决反对尼西亚派。迫在眉睫的问题绝非无聊的思辨。问题的实质是，上帝真的临在于一个被罗马帝国作为罪犯处死的木匠，还是上帝更像坐在宝座之上的皇帝？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大多数皇帝会更喜欢阿里乌派的观点。最终，教会达成了一种妥协：这个木匠——耶稣——被宣布为真神；但是现在，耶稣通常被描述得更像宇宙的至高统治者，坐在宝座之上、统治着整个世界的尊贵皇帝，而不是一个木匠。

第二十一章

米兰的安波罗修

上帝命定万物受造，因此会有所有人共享的食物，地球是所有人的共同财产。所以，自然产生了一种共有权利，但是，贪婪却令它成为少数人的权利。

——米兰的安波罗修

公元4世纪涌现出许多伟大的基督教领袖，但是，没有哪一位的信仰生涯比米兰的安波罗修更具戏剧性。

意外当选

公元373年，米兰主教的辞世威胁到这座重要城市的和平。已故主教奥克森提乌(Auxentius)是由一位流放了前任主教的阿里乌派皇帝任命。现在，米兰的主教职位空缺，新任主教的选举极易演变成一场骚乱，因为正统基督徒与阿里乌派都决心让自己的成员成为米兰的下一任主教。

为了避免可能爆发的骚乱，米兰的总督安波罗修决定出席主教选举。他高效与公正的管理令他很受欢迎，有希望得到一个效忠罗马帝国的更高职务。但是，他必须先妥善地解决米兰这场潜在的危机。因此，他来到了群情激奋的教会，开始向会众讲话。他受过最好的修辞学训练，随着讲话的进行，会众恢复了平静。

突然，会众中有一个孩子高喊："安波罗修，主教。"这正符合会众的心意，会众不断高喊："安波罗修，主教！安波罗修！安波罗修！"

当选为主教并不是安波罗修职业生涯计划的一部分，因此，他千方百计地说服人们，不要将他选为主教。当这一策略失败时，他多次尝试逃离米兰，但没有成功。最终他清楚地认识到，皇帝对自己总督的当选很满意，如果他继续坚持拒绝，皇帝会非常生气，因此他同意被任命为米兰的主教。他当时只是慕道友，因此还没有接受洗礼，他必须先接受洗礼，然后再履行教职晋升的一系列程序。所有这一切在八天之内就完成了，公元373年12月1日，安波罗修被授予主教圣职。

220

尽管安波罗修并不希望成为主教，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全力承担起这份职责。他召来了担任另一行省总督的兄弟乌拉尼乌·撒提洛斯(Uranius Satyrus)，帮助自己主持教会的日常工作。他们的姐姐玛希莉娜(Marcellina)也是敬虔的基督徒；她在罗马过着半修道式的生活。安波罗修开始在西姆普利齐亚努(Simplicianus)的指导之下学习神学。西姆普利齐亚努是一位司铎，他曾教授安波罗修学习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现在，安波罗修将他召来，担任他的神学教师。安波罗修思维敏捷，这有助于他学习神学。人们赞扬他一目十行的阅读能力，这在当时非常罕见。他很快便成为西方教会最优秀的神学家之一，但是，他的工作主要是讲道、解释圣经和向说拉丁语的西方教会介绍说希腊语的东方教会的神学。他极其胜任这份工作，因为早在开始学习神学很久之前，他就是希腊文学的崇拜者，精通希腊文。他为三位一体神学在西方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他普及了卡帕多西亚三杰的著作——尤其是大巴西尔的神学论文《论圣灵》(*On the Holy Ghost*)。他也以教牧而不是思辨的方法，强调道成肉身的中心地位：

221

> 他（基督）成为了婴孩，因此，你们得以长大成人；他被包裹在襁褓之中，因此，你们得以脱离死亡的捆绑；他降生在马槽之中，为的是将你们领向圣坛；他来到这个世界，因此，你们得以进入天堂。[1]

① *Commentary on Luke*, 2.41.



米兰大教堂下面的古代洗礼池废墟，安波罗修可能就是在这里为奥古斯丁施洗。

此外，安波罗修还十分关注与他同工的神职人员的构成，为此，他撰写了一篇题为《论神职人员的职责》(*Duties of the Clergy*)的神学论文。这篇论文在安波罗修去世很久之后仍对基督教的圣职观有着深远影响。

在安波罗修就任主教不久，一伙得到皇帝许可的哥特人(Goths)跨过了罗马帝国的边境，但是，他们后来暴动造反，洗劫了米兰附近地区。于是大量难民涌入米兰，进而传来许多人被俘、哥特人索要赎金的消息。安波罗修下令为难民和赎回俘虏筹集资金，为此，他熔掉了教会的一些金器和其他装饰品。这招来了暴风雨般的批评，批评尤其来自渴望看到他犯错、并伺机指控他亵渎圣物的阿里乌派。安波罗修回答说：

> 与为主积累财富相比，为主保存灵魂更为有益。差遣没有财富的使徒的主，也收聚没有财富的教会。教会拥有财富不是为了积攒，而是为了施舍，为了将其给予需要的人……同储存金器相比，储存有

生命的器皿更为有益。②

同样，在论述牧师的职责时，安波罗修告诉阿里乌派，真正的力量在于扶持弱者，反对强者，他们不应当盛筵款待可以回报他们的富人，而是应当款待那些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回报的穷人。

在众多前来听安波罗修讲道的人中，有一位年轻的修辞学教师，他在经历了漫长曲折的灵魂朝圣之旅后，非常着迷于这位主教的讲道，于是他重拾多年之前就已经放弃的得自母亲的信仰。这个年轻人就是奥古斯丁，最终由安波罗修给他施洗。安波罗修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位归信者的非凡恩赐，有一天他将成为自使徒保罗以来西方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

主教与皇帝

格拉提安与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瓦伦提安二世共同统治着罗马帝国的西部。瓦伦提安二世当时还是个孩子，因此，格拉提安也是瓦伦提安二世领地的摄政王。后来，格拉提安在一次谋反中被杀，篡权者马克西姆(Maximus)很可能会进而夺取瓦伦提安二世的领地。这位儿皇帝手无缚鸡之力，因此，他和自己的母亲查士丁娜(Justina)决心拼死一搏，他们任命安波罗修作为特使，去见马克西姆。这位主教成功了，他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入侵。

尽管如此，安波罗修与查士丁娜的关系并不融洽。皇后是阿里乌派，她坚持要有一座可以举行阿里乌派崇拜的大教堂。在这点上，安波罗修的态度十分强硬。他既不允许异端崇拜亵渎圣地，也不允许皇后的权力被用来推动阿里乌派在米兰的事业。因此，后来安波罗修与查士丁娜之间爆发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冲突。有一次，安波罗修和自己的追随者被帝国军队包围在一座爆发争辩的教堂里。教堂之外的士兵对他们以武力相

---

② *Duties of the Clergy*, 2.137.

威胁，但是，安波罗修以歌唱赞美诗与诗篇鼓舞他所牧养的基督徒。最后，查士丁娜希望能够体面地撤兵，她提出要求，如果不能将教堂献给皇帝，至少要将教堂中的圣瓶献上，毕竟安波罗修曾将教堂中的许多圣物给与了难民和俘虏，难道不是吗？对此，这位主教却再次拒绝，他回答说：

> 我不能从上帝的殿中拿走任何东西，也不能交出我所得到的东西，不是要交出，而是要保存。我这么做是在帮助皇帝，因为我没有权利交出这些东西，皇帝也没有权利将它们拿走。[3]

在与皇权的这种对抗中，安波罗修下令开挖了一座教堂下面的古老墓地。两具遗骨被发现，这可能是基督教时代之前很久的遗骨。但是，一些基督徒还记得小时候听说过的两位殉道士：普罗他修和盖尔瓦修，于是他们立即成为这两具遗骨的主人。很快，"圣徒遗物"能行神迹的传言开始出现，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他们主教的身边。

223

马克西姆最终入侵了瓦伦提安二世的领地，这显然是他与查士丁娜的共谋。他们的一个约定可能是，马克西姆替皇后除掉米兰这位讨厌的主教。但是，罗马帝国东部的皇帝狄奥多西出面干涉，他击败了马克西姆。在瓦伦提安二世被杀之后——可能是被一些篡权者所杀——狄奥多西再次出面干涉，因此，他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

狄奥多西是尼西亚派正统基督徒，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正是在他的支持下于公元381年召开，并重申了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决议。即使是这样，狄奥多西现在却由于其他一些原因而两次与安波罗修发生了冲突。他每一次都被迫屈服于安波罗修的坚定态度，但是我们必须公正地指出，狄奥多西在与安波罗修的第一次冲突中是无可指摘的。

安波罗修与狄奥多西的第一次冲突是这样的：在小镇卡利尼古姆

③ *Sermon Against Auxentius*, 5.

(Callinicum)，一些狂热的基督徒烧毁了一座犹太会堂。皇帝决定惩处纵火者，他们必须重建这个犹太会堂。安波罗修对此提出抗议，认为基督徒皇帝不应该强迫基督徒建造犹太会堂。在几次激烈的交锋之后，皇帝屈服了，犹太会堂没有重建，纵火犯也没有受到惩罚。这是一个糟糕的先例，因为这意味着，在一个自称是基督教国的帝国，信奉不同信仰的人难以受到法律保护。

安波罗修与狄奥多西的第二次冲突与第一次不同，在这一次，安波罗修并没有过错。当时帖撒罗尼迦爆发了一场暴乱，暴徒杀死了帖撒罗尼迦的司令官。安波罗修知道皇帝脾气暴躁，于是他去见狄奥多西，建议他温和地处理此事。狄奥多西似乎被说服了，但是，他的怒火后来被再次点燃，他决定严惩暴徒，杀一儆百，震慑其他那些目无法纪的城市。他先是宣称赦免暴乱，但随后却命令军队包围了那些正聚集在竞技场中庆祝皇帝仁慈的骚乱制造者，大约有七千人惨遭屠杀。

在听说这件事之后，安波罗修便决心要求皇帝明确表示忏悔。尽管我们并不清楚当中的细节，但是，安波罗修的一位传记作家告诉我们，当狄奥多西再到教堂崇拜时，主教在门口拦住他，说：

> 站住！像你这样满是罪污、双手沾满不义之血的人，不配进入神圣的教堂，领受圣餐，除非你能忏悔。[4]

224

这时，狄奥多西的一些侍臣以暴力相威胁。但是，皇帝承认安波罗修所说的属实，他当众忏悔。他还下令，从此以后，如果他再下令处死犯人，死刑将延迟三十天执行。

在这次冲突之后，狄奥多西与安波罗修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当皇帝最终意识到死期将近时，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谴责他的安波罗修是他唯

---

④ Sozomen, *Church History* 7.25.

一召到身边的人。

此时，安波罗修已经名声大噪，马可曼尼(Marcomanni)的日耳曼王后弗莉蒂吉尔(Fritigil)请安波罗修为她撰写了一篇简短的基督教信仰导论。读过这篇导论之后，弗莉蒂吉尔决定去拜访米兰的这位智者。但是，弗莉蒂吉尔在途中得知，安波罗修已经在公元 397 年 4 月 4 日复活节那天去世了。

第二十二章

约翰·克里索斯托

> 当你们忙于收缴利息、积累贷款、像购买牲畜一样购买奴隶以及拓展生意时，你们还怎能自认为遵守了基督的诫命？……这还不是全部。你们还在这一切之上囤积不公，你们侵占土地与房屋，催生贫穷与饥饿。
>
> ——约翰·克里索斯托

君士坦丁堡的约翰·克里索斯托在去世一百年之后，得到了传于后世的称谓："金口约翰"。他完全配得这个称谓，因为虽然教会在过去一百年间出现了一些伟大的布道家，如米兰的安波罗修和纳西盎的格列高利，但是，君士坦丁堡的约翰·克里索斯托仍屹立在其他所有人之上，他是那个时代巨人中的巨人。

然而，对于约翰·克里索斯托来说，讲坛不只让他讲出一篇篇卓越、雄辩之作，也让他讲出自己的一生，这里是他抵抗邪恶势力的战场，是他逃之不得、并最终让他遭到流放和走向死亡的呼召。

旷野呼声

克里索斯托首先是个修士。他在成为修士之前曾是一名律师，在家乡安提阿受教于一位著名的异教演说家利伯尼乌(Libanius)。据说，当有人问这位年迈的教师谁应当成为他的继承人时，利伯尼乌回答说："约翰，但是，他已经是基督徒了。"

克里索斯托的母亲安苏莎(Anthusa)是个极为敬虔的基督徒,她深爱自己的儿子,绝不允许任何人将儿子从她身边夺走。当她二十三岁的律师儿子想要成为慕道友时,她非常高兴。克里索斯托希望能接受基督教的学习,并准备接受洗礼。在他结束当时教会所要求的三年预备期之后,安提阿的主教梅勒提乌(Meletius)为他施行了洗礼。克里索斯托的母亲自然十分高兴。但是,当他告诉母亲他打算离开城市去过修道生活时,母亲坚决反对,她要求儿子许下承诺:只要母亲还活着,他就永远不离开她。 226

为了解决修道呼召与母亲占有欲之间的矛盾,克里索斯托采用的方法非常简单:他将自己的家变成了修道院。他与三个具有同样心志的朋友住在这里,直到母亲去世,随后,他加入叙利亚山区修士的行列。他用了四年时间学习修道生活,又在完全独居的情况下过了两年严格的修道生活。后来,他自己也承认,这样的生活并不是训练牧者的最好方法:

> 许多从退隐的修道生活中回到司铎或主教的繁忙生活中的修士,完全不能应对他们的新环境所带来的困难。[1]

不管怎样,当隐修了六年的克里索斯托回到安提阿之后,他被按立为执事,随后不久又被按立为长老。作为长老,他开始讲道,他的名声很快就在说希腊语的教会中传开了。 227

公元397年,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职空缺,皇帝下令将克里索斯托带到君士坦丁堡,担任这个显赫的教职。但是,他在安提阿太受欢迎了,帝国官员担心带走他会引发骚乱,因此,他们没有公开皇帝的命令,只是邀请这位著名的布道家访问安提阿郊区的一个小礼拜堂。当他到达这里之

① *On the Priesthood* 6.

后，他们命令他坐上马车，就这样，他被强行送到君士坦丁堡。公元398年初，他在君士坦丁堡被按立为主教。

君士坦丁堡是一座富裕的城市，这里充满了奢侈与阴谋。伟大的皇帝狄奥多西去世了，继承皇位的两个儿子霍诺里乌（Honorius）和阿卡狄乌（Arcadius）懒惰无能。阿卡狄乌据称在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统治罗马帝国的东部，但其实他听命于一个名叫尤特罗皮乌（Eutropius）的宫廷侍官，而尤特罗皮乌却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满足他和自己亲信的野心。皇后欧多嘉（Eudoxia）因这个宫廷侍官掌权而感到羞耻，尽管实际上是尤特罗皮乌安排了她与阿卡狄乌的婚姻。在克里索斯托晋升为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过程中，君士坦丁堡被各种阴谋笼罩着，因为当时亚历山大的大主教提阿非罗一直在为他的一个亚历山大同乡积极游说，而克里索斯托也是在尤特罗皮乌的干预之下才成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

这位新主教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切。以我们对克里索斯托的了解，即使他意识到了，他可能仍然会那么做。这位曾经的修士现在仍是修士，他绝不能容忍君士坦丁堡的富人用自己的奢侈与安逸玷污上帝的福音。

克里索斯托的第一项工作便是改革神职人员的生活。一些声称守独身的司铎在家中拥有他们所说的“灵里姐妹”，这是许多司铎犯下此类丑行的一个借口。其他神职人员变得非常富有，过着像君士坦丁堡的掌权者那样极其奢华的生活。教会的资金捉襟见肘，信徒几乎得不到牧养。克里索斯托将这一切都记在心中。他命令“灵里姐妹”搬出司铎的家，司铎必须过严格节制的生活。教会的资金要有一套严密的审查机制。为了让挨饿的人填饱肚子，装饰主教宫邸的奢侈品被卖掉；克里索斯托命令神职人员开放教堂的时间不仅要方便富人，也要方便必须工作的穷人。显而易见，这些措施既为他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也为他招来了许多人的怨恨。

但是，这样的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神职人员，他也呼吁平信徒必须过更符合福音要求的生活。因此，这位“金口”布道家在讲坛上发怒了： 228

> 你们马上的金嚼、你们奴隶手腕上的金环、你们鞋子上的镀金，意味着你们正在剥削孤儿，正在饿死鳏夫寡妇。在你们死掉之后，每一位见到你们豪宅的过路人都会说：“建起这样一座豪宅要让多少人流泪，要剥削多少孤儿，要伤害多少鳏夫寡妇，要剥夺多少工人应得的报酬？即便是死亡，也不会救你们脱离干系。”②

重返旷野

掌权者难以容忍从圣索菲亚大教堂——基督教王国最大的教堂——的讲坛上传来的质疑他们的声音。任命克里索斯托担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尤特罗皮乌，期待他作出特别的恩惠与妥协。但是，克里索斯托相信，尤特罗皮乌只是另一个希望上帝的福音得以明确宣讲的基督徒。结果，尤特罗皮乌悔改了，但并不是为他的罪，而是为他所犯下的错误——他将这个好管闲事的布道家从安提阿带到了君士坦丁堡。

最终，尤特罗皮乌与克里索斯托因庇护权问题而爆发了冲突。为了逃离尤特罗皮乌的暴政，一些人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避难。尤特罗皮乌派出几个士兵去捉拿他们。但是，克里索斯托并没有屈服，他不允许士兵进入圣所。尤特罗皮乌向皇帝阿卡狄乌提出了抗议，但是，克里索斯托在讲坛上进行了辩护，阿卡狄乌只有这一次没有在自己宠臣的要挟下让步。从此以后，尤特罗皮乌的影响力每况愈下，许多人将这归因于他与克里索斯托的冲突。

随后不久，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加速了尤特罗皮乌的倒台。人民一片

② *Homily* 2.4.

欢腾，很快就有群众要求，严惩这个曾经压迫与剥削他们的宫廷侍官。尤特罗皮乌的唯一出路就是去圣索菲亚大教堂，寻求教会的庇护。当人们追到教堂时，克里索斯托拦住了他们，使用了他曾经对付尤特罗皮乌时所使用的庇护权。因此，为了保住以前敌人的性命，克里索斯托先后与人民和军队发生了冲突，最后又与皇帝阿卡狄乌产生了冲突。尤特罗皮乌并不信任教会看似无力的保护，他逃出了庇护所。一些曾经受他压迫的人俘获了他，并将他处死。这次危机也随之结束。

229

然而，克里索斯托在掌权者中还有其他的敌人。皇后欧多嘉不愿意看到这位主教的权力越来越大。此外，她也不喜欢克里索斯托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讲道——他的讲道用在欧多嘉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当克里索斯托讲到掌权者的虚荣与愚蠢时，欧多嘉觉得人们的眼睛正在盯着自己。必须让这个来自旷野的声音、这个在高贵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中狂言乱语的布道家闭嘴。为此，欧多嘉给予教会特别的好处，克里索斯托感谢了她。但是，他的讲道还在继续。

后来，欧多嘉采取了更加直接的方法。当克里索斯托为处理以弗所的一些教务而不得不离开君士坦丁堡时，欧多嘉与亚历山大的大主教提阿非罗共谋，反对这位好管闲事的布道家。一回到君士坦丁堡，克里索斯托就受到了许多荒谬的指控，而受理这些指控的，正是提阿非罗所领导的一小群主教。克里索斯托对他们不屑一顾，继续讲道和牧养教会。提阿非罗和他的党羽判定克里索斯托有罪，要求阿卡狄乌将他流放。在欧多嘉的挑唆之下，这位软弱的皇帝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他命令克里索斯托离开君士坦丁堡。

局势变得紧张起来，人民义愤填膺。附近城镇的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聚集在首都君士坦丁堡，他们发誓要支持克里索斯托。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召开宗教会议，谴责提阿非罗和他的追随者。与此同时，还可能爆发威胁到罗马帝国存亡的人民起义。只要这位雄辩的主教说一句话，就将粉碎针对他的所有阴谋。阿卡狄乌和欧多嘉意识到了这一点，他

们随时准备战斗。但是，克里索斯托热爱和平，因此他为流放做好了准备。在接到皇帝阿卡狄乌命令的三天之后，他向自己的朋友和追随者道别，服从了皇帝的命令。

人民并不想不战斗就放弃。大街小巷被起义的传言闹得沸沸扬扬。阿卡狄乌、欧多嘉和军人都不敢在公共场合露面。一天夜里发生了地震，人们将地震视为上帝的愤怒。几天之后，应欧多嘉恐惧而迫切的请求，克里索斯托重返君士坦丁堡，他又走上自己的讲坛，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虽然主教回来了，但是，冲突的根源并没有解决。在几个月的阴谋、对抗和羞辱之后，克里索斯托再一次接到了被流放的命令。他再次拒绝了朋友们的建议，平静地向前来捉拿他的士兵投降，而不是煽动会给人民造成更大痛苦的骚乱。

但是，骚乱仍不可避免。暴徒涌向圣索菲亚大教堂及其附近地区。军队接到了镇压骚乱的命令，在随后的战斗中，圣索菲亚大教堂和附近的一些公共建筑起火，并被烧毁。起火原因从未查明。但是，克里索斯托的许多支持者在审讯中被施以酷刑，他最为人所知的朋友都被流放了——流放到距他很远的地方。

230

与此同时，这位“金口”布道家被流放到库库苏斯（Cucusus）这座偏远的小村庄。这里并没有讲坛，因此，他拿起了笔。他感动了整个世界。罗马的主教英诺森（Innocent）接过了克里索斯托的事业，许多人效法了英诺森的榜样。皇帝阿卡狄乌的行为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除了少数不敢挑战皇权的懦夫之外，没有人支持亚历山大的提阿非罗。随着争辩的蔓延，小镇库库苏斯似乎成了世界的中心。皇后欧多嘉已经去世，一些人希望，皇帝阿卡狄乌会废除自己的政策。但是，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政策，许多主教支持皇帝的政策，同意流放克里索斯托这位著名的布道家。但是，在罗马帝国的西部，教宗英诺森和其他许多人相信，帝国东部正在上演巨大的不公，他们向帝国西部的皇帝霍诺里乌请求帮助。霍诺里乌向东方派出一个罗马使团，他们带来了一封致阿卡狄乌的信，信中指

出，罗马使团应当受到充分的尊重，应当在萨洛尼卡（Salonika）召开一次宗教会议，讨论对克里索斯托的指控。如果罗马使团那时认为克里索斯托的确有罪，霍诺里乌将与他断绝关系。但是，如果情况恰恰相反，革除克里索斯托的教职则是不公正的，阿卡狄乌应当与克里索斯托和好——这意味着应当恢复克里索斯托曾经担任的君士坦丁堡牧首职务。这不仅威胁到阿卡狄乌的政策，也威胁到因支持皇帝政策而获得权力的一些重要主教，包括亚历山大和安提阿的大主教。因此，罗马使团收到了一份给英诺森的报告中所说的"巴比伦解决方案"（Babylonian Treatment）——我们并不清楚，这份解决方案是基于君士坦丁堡宫廷的命令，还是源自希望罗马使团失败的克里索斯托的教会敌人。罗马使团的成员遭到了监禁和严刑拷打。他们被给予三千金币的贿赂，但他们拒绝了。于是他们被送上一艘有洞的船，在回程途中，这艘船很快就开始下沉。他们在给英诺森的报告中称，士兵告诉他们，船长接到的命令是确保他们不能到家。但是，他们换了几艘船，最终回到了意大利。与此同时，克里索斯托许多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都失踪了，他们被秘密流放到许多偏远地区与要塞。

对于流放克里索斯托来说，库库苏斯似乎还是太近了，他最终被流放到更远的地方：黑海岸边一座寒冷的不为人知的小村庄。看守他的士兵知道，皇帝对这个囚犯并没有善意，所以，他们对他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不理不睬，还强迫他超负荷赶路。不久，这位被流放的主教就病入膏肓。当他意识到死期将近时，他要求被带到路旁的一座小教堂。他在这里领受了圣餐，向身边的人道别。这位"金口"布道家讲了他最短却最动人的一篇道："所有荣耀都归于上帝。阿们。"

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地区，人们认为这事极为不公，甚至亵渎了上帝。克里索斯托最坚定的支持者们不接受君士坦丁堡的新主教的权威，也不接受那些与他投合的主教的权威，尤其是亚历山大和安提阿的牧首们。教会发生了分裂。在克里索斯托去世三十一年之后，他被恢复了名誉，他的遗骨在隆重的欢迎仪式中被送回君士坦丁堡。此时，教会的分裂

231

已经结束。

当我们比较克里索斯托的一生与安波罗修的一生时，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教会在未来的不同走向。在与当时最强大的皇帝的对抗中，安波罗修胜利了。另一方面，克里索斯托却被软弱的皇帝阿卡狄乌革职流放。从此以后，随着填补支离破碎的罗马帝国所留下的权力真空，西方说拉丁语的教会越来越强大。另一方面，在说希腊语的东方，罗马帝国又存活了一千年。虽然时而弱小，时而强大，但古罗马帝国的这一东方支系——拜占庭帝国——还在极力维护自己对教会享有的特权。狄奥多西并不是最后一位被说拉丁语的主教羞辱的西罗马帝国皇帝；约翰·克里索斯托也不是最后一位被东罗马帝国皇帝流放的说希腊语的主教。

第二十三章

哲罗姆

> 我坦白地承认，我怒不可遏。我无法耐心地倾听这些亵渎上帝的话。
>
> ——哲罗姆

在公元4世纪的伟大基督徒中，没有哪一位比哲罗姆更有魅力。他没有安东尼那样的圣洁、阿塔那修那样敏锐的神学洞察力、安波罗修在帝国官员面前那样的坚定，更没有克里索斯托那样的口才。但是，哲罗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与这个世界和自己进行着永无休止的大战。尽管他被尊为"圣哲罗姆"，但与其他圣徒不同，他并没有在今生被赐予来自上帝的平安和喜乐。他的圣洁并不在于谦卑、和平或可爱，而是在于高傲、暴躁甚至是讥讽。他始终追求超越常人，因此对懒惰的人和胆敢批评他的人几乎没有一点耐心。遭到他尖锐批判的人不仅有他那个时代的异端、无知之辈和伪君子，还有约翰·克里索斯托、米兰的安波罗修、凯撒利亚的巴西尔和希波的奥古斯丁。这些与他存在分歧的人都被他称为"两条腿的驴"。可是，尽管有这样的态度——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态度，哲罗姆在公元4世纪的基督教伟人中还是占据了一席之地。即使这样，纵观整个基督教艺术史，他总是被描绘成忧郁的苦修者：他盯着人的头盖骨，仿佛从未忘记自己终将离开这个世界。

公元348年左右，哲罗姆生于意大利北部一个偏僻的角落。他比公

元4世纪的许多基督教伟人更年轻。但是，可以说他生来就显老气，因此，他很快就自认为比同代人年长。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也逐渐将他视为值得尊敬与年高德劭的著名人物。

哲罗姆是古代知识的狂热崇拜者，但他感到对异教传统的这种爱其实是有罪的。对此，他的内心躁动不安，这种罪咎感在一次病重期间达到了顶点。当时，他梦见了末日审判，他在审判中被问道："你是谁？"他回答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审判的主反驳说："你说谎。你是西塞罗的崇拜者。"在这次经历之后，哲罗姆决心全心研究圣经和基督教著作。但是，他从未停止阅读与模仿古代的异教作家。

234

哲罗姆还被性所困扰。他退隐去过修道生活，希望以此摆脱这个负担。但是，即使这样，他还是想入非非，忘不掉罗马的舞伴。他希望通过决罚身体与极端的禁欲生活来克制这些思想。他蓬头垢面，甚至宣称在被基督洁净之后，就永远不再需要清洗。然而，这还远远不够。为了抹去心灵中对罗马享乐的记忆，他决定学习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有着古怪的字母和语法，在他看来，希伯来文似乎是粗俗的语言。但是他告诉自己，既然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那么希伯来文一定是神圣的语言。

哲罗姆最终承认，他并不适合过隐修生活，他可能在三年多的隐修生活之后回到了俗世。在安提阿，他被按立为长老。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之前和期间，他都在君士坦丁堡。后来，他回到了罗马，慧眼识才的罗马主教达马苏（Damasus）任命他为自己的私人秘书，并鼓励他继续研究与写作。达马苏也是最先建议他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的人。这项工作占据了哲罗姆的大部分时间，并最终成为他的不朽之作：一部新的拉丁文圣经译本。虽然哲罗姆在罗马就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但是，大部分翻译工作是他在以后完成的。

与此同时，住在寡妇阿宾娜（Albina）豪宅中的一群富裕、敬虔的女基督徒给予了哲罗姆巨大的帮助。除了阿宾娜之外，其中最杰出的女基督徒还有阿宾娜的寡妇女儿马尔塞拉（Marcella）、安波罗修的姐姐玛希莉

娜、学识渊博的波拉（Paula）和她的女儿尤斯多琴（Eustochium）。在哲罗姆的余生，波拉和尤斯多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哲罗姆经常到她们那里，因为他在这群女基督徒中找到了专心学习的学生，她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为他优秀的希腊文与希伯来文学生。正是在这群伙伴当中，哲罗姆觉得最能够随心所欲地讨论自己心中的学术问题——尤其是与圣经经文相关的问题。

重要的是，从未有过男性亲密朋友并被性所困扰的哲罗姆，在一群女基督徒中得到了安慰。也许，他之所以觉得在她们当中感到轻松自在，是因为她们不敢与哲罗姆争竞。不管怎样，她们逐渐了解到哲罗姆极力向外界所隐藏的敏感的灵魂。

然而，哲罗姆并不是机智圆滑的人，他很快就在罗马教会的领袖中结下了仇敌。公元384年的年末，达马苏去世，哲罗姆失去了自己最坚定的保护者。新主教是西利西乌（Siricius），哲罗姆的学术造诣几乎对他没用。236 当波拉的一个女儿去世时，哲罗姆的仇敌——他们曾因安逸的生活而受到过哲罗姆的批评——声称，她的死是因为哲罗姆所倡导的严格生活。最终，哲罗姆决定离开罗马。他来到了圣地，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巴比伦来到了耶路撒冷"。

波拉和尤斯多琴追随着哲罗姆，她们从另一条路来到了耶路撒冷。237 哲罗姆又从耶路撒冷去了埃及，在埃及拜访了亚历山大的学者和沙漠修士。公元386年，他回到了巴勒斯坦，和波拉决定在巴勒斯坦定居，全心过修道生活。但是，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沙漠修士那种极端禁欲的生活，而是适度苦修、以学习为主的生活。波拉很富有，因此，哲罗姆并不用为生计发愁。他们在伯利恒建起了两座修道院，一座是波拉所领导的女修道院，一座是在哲罗姆监管之下的男修道院。为了翻译圣经，哲罗姆继续教希伯来文，与此同时，他还教附近的孩子拉丁文，教波拉女修道院的修女希腊文与希伯来文。

然而，哲罗姆全心投入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他的不朽之作：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当时已经有了其他圣经译本，但是，这些译本都是从七十士译

本翻译而来，而七十士译本是希伯来圣经的古希腊文译本。当时哲罗姆所做的，是直接翻译希伯来原文圣经。在多年之后——在此期间他被大量的通信与沉重打击罗马帝国的灾难所打断——哲罗姆最终完成了这项庞大的工作。

哲罗姆的译本通常被称为武加大译本，该译本最终成为所有说拉丁语教会的标准圣经。他尤其出色地将希伯来文《诗篇》翻译成优美的拉丁文《诗篇》。他所翻译的《诗篇》被用到格列高利圣咏中，这令他的《诗篇》得以更广泛地使用与流传，在武加大译本被更多的现代译本所取代很久之后，哲罗姆所翻译的拉丁文《诗篇》仍在基督教的崇拜中使用。

可是，武加大译本最初并不像哲罗姆所期望的那样受欢迎。武加大译本很自然会改译一些基督徒所喜爱的经文，许多基督徒要求知道，谁授权给哲罗姆篡改经文。此外，许多基督徒相信这个传说：七十士译本是七十二位译者的独立译作，他们在比较各自的译本之后，竟然发现他们的译作完全相同。长久以来，这个传说被用来论证七十士译本同希伯来圣经一样是上帝所默示的。因此，当哲罗姆发表一部与七十士译本不同的圣经时，许多基督徒认为，他并不尊重上帝所默示的圣经。

不仅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信徒，一些非常有学识的基督徒也提出了这样的批评。来自北非的希波的奥古斯丁写道：

> 我恳求您不要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翻译拉丁文圣经上面，除非您像先前翻译《约伯记》时所做的那样，为您翻译的圣经加上注释，清楚注明您的译本与权威无可匹敌的七十士译本的不同之处……此外，我难以想象，在这么久之后，某些人是怎样在希伯来文圣经的抄本中找到一些那么多译者以前都没有发现的东西，尤其是这些译者都非常精通希伯来文。[1]

238

① *Epistle* 28.2.

最初，哲罗姆并没有回复奥古斯丁的这封来信——也没有回复奥古斯丁的第二封信。奥古斯丁不肯罢休，他再次写信，指责哲罗姆令基督徒蒙羞。奥古斯丁列举了哲罗姆的译本所造成的众多危害之一，提到哲罗姆所翻译的为先知约拿遮荫的植物的名字。传统译本——根据希腊文圣经翻译——将这株植物的名字翻译成葫芦。但是，哲罗姆将它翻译成了常春藤。奥古斯丁说：

> 某位主教，我们的弟兄，命令在他所牧养的教会使用您的译本。信徒们感到惊讶，因为您翻译的《约拿书》中的一段经文与他们历代以来（在教会中）经常吟唱的经文极其不同。骚乱爆发了，尤其是在说希腊语的基督徒声称这段经文错误之后……那么，您看到了支持您的译本所造成的后果，因为您的译本并不能被大家熟悉的语言（即希腊文或拉丁文，而不是希伯来文）证实。②

当哲罗姆最终回复奥古斯丁的来信时，他暗示，奥古斯丁只是一个希望依靠批评长辈来出风头的毛头小子。但是，哲罗姆在一开始赞扬了奥古斯丁的学识，他巧妙地指出，他不与奥古斯丁争论是为了他好，因为他们之间的争论对奥古斯丁并不公平。在通信的过程中，他逐一驳斥了奥古斯丁的论点，最后他告诉奥古斯丁："你甚至都不明白自己在问些什么。"③ 哲罗姆将反对他的人称为葫芦人——奥古斯丁显然是其中之一。

虽然哲罗姆所卷入的大多数争论都以永久的伤痛收场，但是，他与奥古斯丁的争论却并不是这样。几年之后，哲罗姆觉得必须驳斥帕拉纠派（Pelagians）的教义——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为此，他还引用过奥古斯丁的著作。他致北非这位智慧主教的下一封书信，表达了他很少给予他

---

② *Epistle* 71.3.
③ *Epistle* 112.19.

人的敬佩。

乍一看，哲罗姆似乎极为麻木不仁，只关心自己的威望。但是，他实际上与他留给世人的印象极不相同，在他严厉的外表之下，潜藏着一个敏感的灵魂。没有人能够像波拉和尤斯多琴那样了解这一点。但是，波拉于公元404年去世，哲罗姆感到孤苦无依。他越来越痛苦，因为他相信，不仅自己的死期将到，一个时代也即将终结。在若干年后的公元410年8月24日，哥特人在阿拉里克(Alaric)的率领下攻占并洗劫了罗马。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哲罗姆在伯利恒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写信给尤斯多琴说：

239

> 谁能相信依靠征服世界所建立起来的罗马也会陷落？众国之母已经走向她的坟墓？……我的双眼昏花，因为我已老态龙钟……我不能再在夜晚点亮的油灯下阅读希伯来文著作，即使在白天，我也难以做到，因为书中的希伯来字母对我来说太小了。[4]

哲罗姆大约又活了十年，这十年他是在充满孤独、痛苦和争辩中度过的。在被他视为女儿的尤斯多琴去世几个月之后，这位疲倦的学者终享安息。

---

④ *Commentary on Ezequiel*, prefaces to book 2 and 7.

第二十四章

希波的奥古斯丁

当我想到将自己完全奉献给您，我的上帝……希望这样做的是我，不希望这样做的也是我。是我。我既不完全希望，也不完全拒绝，因此，我在与自己争斗，我痛苦不堪。

——希波的奥古斯丁

"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可能是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喊出的这些话，穿过米兰一座花园的围栏，进入一位沮丧的修辞学教授耳中。他正坐在一棵无花果树下高呼："多久，主啊，还要多久？是明天吗？永远是明天吗？为什么我的污秽不就在此刻洁净？"对于此刻的他来说，那个孩子的话仿佛来自天上。不久之前，他在花园的另一处刚刚放下他在阅读的圣经。现在，他回到原处，拿起圣经，读到了保罗的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这位修辞学教授的名字——回应了保罗的话，他做出了自己迟迟没有做出的决定：全心服侍上帝。他很快就放弃了自己的教授职业，开始了另一项事业，而这项事业最终令他成为整个基督教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基督徒之一。

为了理解米兰花园这次经历的深远意义，我们必须先讲述奥古斯丁在此之前的生活。

通往信仰的曲折之路

公元354年，奥古斯丁生于北非小镇塔加斯特（Tagaste）。他的父亲是罗马帝国的小官员，信奉传统异教。但是，他的母亲莫妮卡（Monica）是敬虔的基督徒，她为丈夫归信基督教不住地祷告，最终，上帝应允了她的祷告。奥古斯丁似乎与父亲并不是十分亲密，著作中很少提到他。但是，莫妮卡在她这个独生子的一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主导作用。 242

奥古斯丁的父母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拥有非凡天赋，因此希望他尽可能接受最好的教育。为此，他们将他送到附近的城镇马都拉（Madaura）直到他们用尽了资产，因此，奥古斯丁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到塔加斯特。奥古斯丁说："我在马都拉与伙伴们行走在巴比伦的广场上，我在污泥中打滚，仿佛进入了玉桂异香丛中。"[1]他和这些朋友吹嘘他那些或真或假的艳遇，和他们一同恶作剧。终有一天，他会从中看见自己的罪并为此而懊悔。

最终，多亏了罗马尼亚努（Romanianus）的资助，奥古斯丁得以来到迦太基继续学习。几百年来，迦太基始终是说拉丁语的非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奥古斯丁大约在十七岁时来到了这座大都市。虽然他并没有荒废学业，但是，他也开始享受这座大都市所能带来的种种快乐。很快，他就有了情妇，还为他生了孩子。他为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阿得奥达图斯（Adeodatus），意为上帝或某位神祇所赐。

同当时所有准备成为律师或公务员的年轻人一样，奥古斯丁也学习了修辞学。这一学科的目的是让人学习优雅且具有说服力的演讲与写作。真理并不是讲授的内容，这是哲学教授的事情。但是，修辞学的学生必须阅读大量的古代著作，包括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的著作。除了身为语言大师，西塞罗还是一位哲学家。因此，在阅读西塞罗的过程中，

① *Confessions*, 2.3.8.

奥古斯丁逐渐相信，只有华丽的辞藻与优美的文体远远不够。人还必须寻求真理。

追求真理让这位年轻的学生走向了摩尼教（Manichaeism）。摩尼教起源于波斯，是摩尼（Mani）于公元3世纪创立的。摩尼认为，人类的困境在于，每个人的体内都有两种天性。一种是精神的，他将其称为光明；另一种是物质的，他将其称为黑暗。在整个宇宙中，也永恒存在着光明与黑暗。摩尼教徒通过一系列神化对此做出了解释：光明与黑暗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人类现在的状态是它们结合的结果。因此，救赎在于将光明与黑暗割离，并预备我们的精神重返纯光明的国度，在纯光明的国度中变为纯粹的光明。光明与黑暗任何新的结合都是邪恶的，因此，真信徒必须避免它们再次结合。摩尼认为，这个教义已经以各种方式被启示给众先知，包括佛陀、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耶稣和摩尼自己。

在奥古斯丁时代，摩尼教已经传遍了地中海盆地。它的主要魅力在于它所宣称的极度合理性。同以前的诺斯替主义一样，摩尼教的许多教义基于观测天象。此外，摩尼教的一种宣教方法就是讥笑基督教的教义，尤其是讥笑圣经的“天真烂漫”与其中的原始语言。

摩尼教似乎解决了奥古斯丁在基督教这里遇到的难题。它们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圣经是一系列的不雅之作——一些书卷甚至相当粗俗，圣经很少遵循优美的写作规则，其中还包括许多粗鲁的事件，如暴力、强奸和欺骗等。第二个问题是恶的起源。莫妮卡曾经教导奥古斯丁，只存在唯一一位上帝。但是，奥古斯丁在自己周围和自身都看到了恶，他必须追问恶的起源。如果上帝至高无上，是绝对的善，恶就不可能是上帝所造。另一方面，如果万物都是上帝所造，上帝就不可能像莫妮卡和教会所宣讲的那样良善与智慧。摩尼教给了这两个问题答案。圣经——尤其是旧约——实际上并不是永恒光明的话语。恶也不是永恒的光明所造，而是与之对立的黑暗所造。

因此，奥古斯丁成为了摩尼教徒。但是，他总是心存疑虑，他做了九

年"听众"(hearer),没有加入"完人"(perfect)的行列。在一次摩尼教聚会中,他说出了自己的一些疑惑,有人告诉他,他的问题非常深奥,有一位名叫福斯图斯(Faustus)的伟大的摩尼教教师可以解答他的问题。备受期待的福斯图斯终于出现了,但是,他其实比其他摩尼教教师好不到哪里去。失望的奥古斯丁决定另辟蹊径,继续寻求真理。此后,他回到塔加斯特住了一段时间,又到迦太基重操旧业,担任修辞学教师;可是,他在迦太基的学生难以管教,到罗马发展似乎更有前途。然而,事与愿违,虽然罗马的学生更加规矩,但他们总是迟交学费。后来,他搬到了需要一位修辞学教师的城市——米兰。

在米兰,西姆普利齐亚努——安波罗修召来教自己神学的老师——将新柏拉图派著作介绍给奥古斯丁。西姆普利齐亚努这样做显然是希望——他的希望其实是有充分根据的——新柏拉图主义能够为奥古斯丁开辟一条重返母亲信仰的道路。由于阅读了新柏拉图主义著作,奥古斯丁成为了新柏拉图派。当时非常流行的新柏拉图主义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哲学。通过学习、自律和神秘默想,新柏拉图主义试图领会那位不可名状者:一切存在之源。新柏拉图派的目标是沉湎在神秘默想中经历忘我。同摩尼教的二元论不同,新柏拉图主义断言,只存在唯一的本体太一,所有实在都是源于太一的一系列流溢,就像石子击打水面时出现的同心圆。距离太一越近,实在就越高级,被隔离得越远,实在就越低级。那么,恶并不是另有起源,而只是远离了太一。道德的恶在于不仰望太一,却专注于流溢出的众多低级实在。这似乎回答了一直困扰着奥古斯丁的恶的起源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断定,一个唯一的存在——无限的善——是万物之源,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承认受造物中恶的存在。虽然恶是真实的,但它并不是一个物体(a thing),而是一种偏离善的太一的趋向。此外,同奥古斯丁先前在摩尼教中所学相比,新柏拉图主义帮助他将上帝与灵魂视为精神性的。

奥古斯丁还有另一个疑惑:我们怎能说有着粗俗语言且充满暴力与

虚假故事的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安波罗修为奥古斯丁解答了这个问题，而这就是安波罗修在奥古斯丁的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莫妮卡与奥古斯丁一同住在米兰，她一定要奥古斯丁去听安波罗修的讲道。作为一位修辞学教授，奥古斯丁同意参加米兰这位最著名的演说家所主持的崇拜。他的初衷并不是去听安波罗修的讲道，而是了解安波罗修讲道的技巧。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奥古斯丁发现，他在听安波罗修讲道的过程中并不像一位专业的修辞学教授，而更像是一位真理的渴慕者。安波罗修通过比喻讲解了许多曾为奥古斯丁带来难题的经文。按照修辞学的标准，寓意解经完全可以接受，因此，奥古斯丁认为，寓意解经完全正确。而且，寓意解经无疑令圣经显得并没有那么粗俗，因此也就令圣经更加可以接受。

直到此时，奥古斯丁在基督教这里所遇到的主要理性难题都已解决。但是，他还遇到了其他的难题。他并不想成为没有真正信仰的基督徒，如果他接受母亲的信仰，他就会全心信奉到底。此外，由于当时盛行的修道主义思想和他自己的新柏拉图主义观，奥古斯丁还相信，如果他成为基督徒，就必须放弃修辞学教授这个职业、放弃他的所有抱负以及一切肉体上的享受。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放弃一切肉体上的享受似乎是最困难的。他后来写到，他当时经常祷告说："赐予我贞节与自制；但是，不要赐予得太快。"

在这个战场上，奥古斯丁进行着激烈的内心争斗，这是愿意与不愿意之间的争斗。奥古斯丁已经决志成为基督徒，但是，他并不想成为得太快。他也不能再以理性难题为借口。此外，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也令他感到羞愧。在罗马，著名的哲学家马里乌·维克多利努(Marius Victorinus)——他曾经将新柏拉图主义著作翻译成拉丁文——来到教会，当众宣认了自己的信仰。奥古斯丁后来又听说，在读过阿塔那修的《圣安东尼传》之后，罗马帝国的两位高官效法安东尼这位隐修士的榜样，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与高位。就是在这个时候，难以容忍身边那些朋友——或许是他自己——的

246

奥古斯丁，逃到了他归信基督教的那个花园。

在归信基督教之后，奥古斯丁采取了开始新生活的必要措施。他要求接受洗礼，安波罗修为他和他的儿子阿得奥达图斯施行了洗礼。他辞去了自己的修辞学教职。后来，他与母亲莫妮卡——她在奥古斯丁的大半生中一直陪伴着他，她既希望儿子能成为基督徒，也希望儿子能拥有美满的婚姻和事业的成功——以及他的儿子阿得奥达图斯和一群朋友启程前往北非，他打算余生在那里过隐修生活。莫妮卡说服奥古斯丁离开了他交往多年的情妇——奥古斯丁甚至都没有提过她的名字。在港口城市奥斯蒂亚(Ostia)，莫妮卡患病去世，这打断了奥古斯丁重返非洲的行程。奥古斯丁悲痛欲绝，他和自己的朋友必须在罗马停留数月。

当奥古斯丁最终回到塔加斯特时，他卖掉了自己所继承的大部分遗产，将其中一部分钱分给了穷人，带着余下的钱与阿得奥达图斯——他在随后不久死去——和一些朋友定居在加西齐亚根(Cassiciacum)，他们的目的是神秘默想与研究哲学。他们并不想过沙漠修士极端严格的生活，而是一种井然有序的生活：没有不必要的安逸，全心进行灵修、研究和默想。

在加西齐亚根，奥古斯丁完成了他的早期基督教著作。它们仍然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但是，奥古斯丁已逐渐意识到，基督教的教义与新柏拉图主义之间存在差异。他希望自己在加西齐亚根撰写的少数对话录将成为他多年“哲学生活”的开始。

西方教会的牧者与神学家

然而，事与愿违，奥古斯丁的名气越来越大，因此，已经有人对他的生活另有安排。公元391年，他到希波城拜访一个朋友，希望邀请他加入加西齐亚根的小修道院。但是，当他在希波进行崇拜时，希波的主教瓦勒里乌(Valerius)在会众中认出了他，瓦勒里乌那天的讲道是上帝如何一如既往为自己的羊群差派牧者，随后，他要求会众为上帝的带领祷告，因为上

帝真的可能将他们的牧者差派到他们中间。会众的回应正如主教瓦勒里

247

乌所料，奥古斯丁极不情愿地被按立，开始与瓦勒里乌一同在希波服侍。四年之后，奥古斯丁与瓦勒里乌一同被任命为主教，因为瓦勒里乌担心，其他教会可能会偷走他的猎物。当时，主教被禁止离开自己的教会到另一个教会担任主教，因此，奥古斯丁被授予主教之职就可以确保他的余生都在希波度过（当时还有规定，一个教会只能拥有一位主教，但是，奥古斯丁和瓦勒里乌显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随后不久，瓦勒里乌去世，奥古斯丁成为希波的唯一主教。

作为牧者与主教，奥古斯丁希望尽可能保留他在加西齐亚根的生活方式。可是，他现在必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牧工作，因此，他用在默想上的时间越来越少。正是在思考教牧工作的过程中，他撰写了大部分著作，而这些著作令他成为自新约时代以来整个说拉丁语教会中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

奥古斯丁早期的许多著作旨在驳斥摩尼教徒。他曾帮助一些朋友信奉了摩尼教，因此，他现在觉得对驳斥自己曾经支持的教义负有特殊的责任。摩尼教是争论的主要问题，因此，奥古斯丁早期的大部分著作都涉及圣经的权威、恶的起源和自由意志。

就驳斥摩尼教徒而言，自由意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摩尼教徒认为，一切都已预定，人类根本就没有自由。奥古斯丁反对这样的观点，他成为自由意志的捍卫者。他认为，人类的自由是人类自身行为的动因。当我们自由行动时，我们并不是被某些外在事物或内在事物所驱使，如被某种必然力所驱使，而是被我们自己的意志所驱使。某个决定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它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意志本身的产物。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环境不会影响我们的决定，而是表明，只有出于我们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或受到内心必然力的驱使来做出决定的自由，才可以被恰当地称为“自由”。

这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解决关于恶的起源这一难题。奥古斯丁坚

持认为，只存在一位独一的上帝，他的良善是无限的。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恶的存在呢？只需做出如下肯定：上帝创造了意志，因此，意志是善的，但是，意志可以做出它自己的决定。意志是自由的，自由的意志是善的，尽管自由的意志可能会导致恶。那么，恶是源自人类、天使和魔鬼（堕落的天使）的意志所做的恶的决定。因此，奥古斯丁既能够肯定恶的存在，也可以肯定一位良善的上帝创造了万物。

248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恶是一个物体（a thing）。恶并不是一个实体，摩尼教徒提到恶时仿佛它是黑暗的原理。恶是一个决定、一种趋向，是善的对立面。

奥古斯丁必须驳斥的另一场运动是多纳徒主义。读者还会记得，这场运动的中心是在北非，而奥古斯丁现在正是北非的一位牧师。因此，奥古斯丁在担任牧师期间不得不解决多纳徒派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由不称职的主教所授予的圣职是否有效。奥古斯丁对此的答复是，教会所有仪式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其施行者的德操。否则，基督徒就总要怀疑自己洗礼的有效性。无论圣礼施行者是否称职，圣礼本身仍然有效，即使圣礼施行者有明显的过错。在这一点上，历代以来的大部分西方教会都赞同奥古斯丁的观点，他的教会观与圣礼有效性的观点成为西方教会的标准教义。

也是在处理多纳徒派所引发问题的过程中，奥古斯丁形成了他的正义战争论。我们已经讲过，一些多纳徒派——圣墓派——采取了暴力。这整场运动有着奥古斯丁可能没有意识到的社会与经济原因。但是，他相信必须制止圣墓派的暴行。因此他认为，战争可以是正义的，但是正义的战争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首先，战争的目的必须是正义的——以掠夺领地或只是以施展权力为目的的战争，绝不是正义的战争。其次，正义的战争必须是由一个体制合理的权力机构所发起。为了不给个人恩怨开辟战场，这个条件似乎必不可少。但在随后的几百年中，这个原则被强者用来宣称他们有权对弱者发动战争，而弱者却无权这样去做。实际

上，我们在圣墓派这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这点。奥古斯丁认为，圣墓派无权对国家发动战争，而国家有权对他们开战。最后，第三个原则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最为重要：虽然暴力在战争中必不可少，但是，爱的动机是首要的。

不过，奥古斯丁在驳斥帕拉纠派时撰写了他最重要的神学著作。帕拉纠是大不列颠的修士，他因自己的敬虔与苦修而闻名于世。他认为，基督徒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战胜自己的罪，获得救恩。帕拉纠赞同奥古斯丁：上帝创造的我们是自由的，罪源于意志。在帕拉纠看来，这意味着人类永远都有能力战胜自己的罪——否则，罪就是可以原谅的。

249

可是，奥古斯丁还同样记得，他有愿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也有不愿意的时候。这意味着，人类的意志并不像帕拉纠所概括的那么简单。有时，意志对束缚自己的罪无能为力。意志并不总是自己的主人，因为行使意志力的意志显然并不总是随心所欲，意志也不能做其堕落的状态不允许它去做，或它无法想象的事情。

奥古斯丁认为，罪的权势束缚了我们的意志，只要我们还在罪的权势之下，就不能行使意志来摆脱罪。我们最多只能在愿意与不愿意之间争斗，而这只能表明我们的意志对罪无能为力。罪人的意志只能选择罪。在这种条件下，当然有善的选择与恶的选择；但是，即便最好的选择也在罪的范畴之内。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由已经不存在了。罪人仍然可以在各种选择中自由地抉择。但是，所有这些选择都是罪，一个我们无法选择的选择就是停止犯罪。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说，我们在堕落之前可以自由地犯罪与不犯罪。但是，在堕落与救赎之间，留给我们的唯一自由是犯罪的自由。在我们被救赎之后，上帝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做工，拯救我们的意志脱离它的悲惨状态，进入重获自由的新状态，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地犯罪与不犯罪。最终，我们会在天家获得自由，但只是不犯罪的自由。这仍不意味着所有自由都已被毁。相反，我们在天堂中仍有自由的选择。但是，所

有选择都不会是罪。那时，我们的心灵将被上帝的良善充满，因此，罪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不会犯罪。

我们如何决定在归信基督教的那一刻接受恩典？奥古斯丁认为，只能凭借恩典自身的力量，因为在归信基督教之前，我们并不拥有不犯罪的自由，因此，我们不拥有决定接受恩典的自由。归信基督教的主动权掌握在上帝手中，人并不会主动归信基督教。此外，恩典是不可抗拒的，上帝将恩典赐予已经被预定获得恩典的人。

帕拉纠与奥古斯丁不同，他宣称，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完全有犯罪与不犯罪的自由。并不存在原罪和迫使我们犯罪的堕落本性。孩子没有罪，除非他们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犯罪。

帕拉纠之争持续了数年，帕拉纠主义最终被否定。帕拉纠主义并没有考虑到罪对人类意志的可怕束缚，也没有考虑到罪的共有性——这甚至显明在还没有机会独立犯罪的婴儿身上。但是，奥古斯丁的观点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他被指责为创新家。在反对奥古斯丁最强烈的法国南部，勒林的文森特（Vincent of Lerins）认为，我们只应当相信“在所有时代、在每个地方、被每个人”相信的信仰——奥古斯丁的批评者声称他的教义并不符合这个标准。奥古斯丁另一个遭到许多人质疑的观点是，信仰始于上帝的作为，而不是人类自己的决定。反对奥古斯丁预定论的这些人被称为“半帕拉纠派”（Semi-Pelagians），这个称呼并不完全正确——他们还可以被称为“半奥古斯丁派”（Semi-Augustinians）。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重新诠释奥古斯丁的神学家自称是“奥古斯丁派”，但是，他们却否定了他不可抗拒的恩典的教义与预定论。公元529年，奥兰治宗教会议（Synod of Orange）批准了奥古斯丁有关恩典在救赎中居首位的教义，却否定了这个教义所导致的其他一些更激进的教义。后世就是这样来解释希波这位伟大主教的教义——其中也有一些著名的例外。

奥古斯丁的两部著作尤其重要。第一部是《忏悔录》（*Confessions*）《忏悔录》是一部灵性自传，以献给上帝的祷告写成，它告诉我们上帝如

250



奥古斯丁1489年版《上帝之城》的木版画，画中的奥古斯丁正在写作、该木版画也描绘了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不同，请注意：世俗之城的魔鬼正在嘲笑天国的天使。

何带领奥古斯丁走过了漫长与痛苦的信仰朝圣之旅。在古代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忏悔录》的体裁是独特的,即使在今天,它也在见证着奥古斯丁深刻的心理与理性洞察力。

奥古斯丁另一部值得特别提及的著作是《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促使奥古斯丁写下《上帝之城》的直接动机是罗马于公元410年的陷落。当时,许多人仍然信奉古代异教,因此,一些异教徒很快就对基督教提出了指控:罗马之所以陷落,是因为罗马背弃了它的古代神祇而转向基督教。正是为了回应这样的指控,奥古斯丁撰写了《上帝之城》。

《上帝之城》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巨著。在其中,奥古斯丁声称存在两座城——两种社会制度,它们都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上帝之城的基础是上帝的爱;世俗之城的基础是世俗的爱。在人类历史中,这两座城总是交织在一起出现。尽管这样,在这两座城之间还是存在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走向死亡的战争。最终,只有上帝之城永存。与此同时,在人类历史中不断出现建立在世俗之爱基础上的王国与国家,它们只代表稍纵即逝的世俗之城。无论多么强大,所有世俗之城终将衰败灭亡,在历史终结之时,只有上帝之城永远屹立不倒。罗马尤其是这样,上帝允许罗马和罗马帝国繁荣昌盛,因为它们是传扬福音的一种手段。既然这一计划已经实现,上帝就让罗马走上了人类所有世俗之城的共同命运:上帝只是对它们的罪做出了公义的惩罚。即使这样,基督徒还是很好地学到了人类世俗之城的历史,因为正如奥古斯丁在另一篇论文中所说:"我们可能学到的关于过去的一切,都能帮助我们理解圣经。"[2]

252

奥古斯丁是罗马帝国西部教会最后一位伟大的领袖。当他去世时,汪达尔人就在希波城门之外,他们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奥古斯丁的工作是一个正在逝去的时代的最后一丝亮光。

然而,奥古斯丁的工作并没有被人们遗忘在破碎的文明废墟中。恰

② *On Christian Doctrine*, 28.

恰相反,通过自己的著作,他成为了新时代的导师。在整个中世纪,他是被引用最多的神学家,因此而成为罗马天主教的伟大圣师之一。但是,他也是16世纪新教伟大的改教家们最喜爱的神学家。因此,经过不同的诠释,奥古斯丁成为整个西方教会——无论是新教,还是罗马天主教——中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

第二十五章

罗马帝国之外

埃德萨的国王阿伯加鲁斯问候出现在耶路撒冷的良善救主耶稣：我已经听说了您，以及您在不借助任何良药的情况下所施行的医治……我也听说，犹太人预谋加害于您。请相信，我的城市虽小，却是高贵，足以容下您我二人。

——埃德萨国王阿伯加鲁斯（传说中阿伯加鲁斯致耶稣的信）

到目前为止，我们始终在集中讲述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史。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基督教诞生于罗马帝国，今天的大多数基督徒——天主教徒、新教徒和东正教徒——都将自己的传统追溯到罗马帝国的早期教会。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要忘记这并不是基督教的全部历史，因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在罗马帝国统治之外的地区深深扎根。在北方的日耳曼"野蛮人"中，基督教在他们入侵罗马帝国之前很久就已经站稳了脚跟。但是，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基督教向东方的扩张，在21世纪仍有基督徒相信，他们的教会起源于罗马帝国以东的早期教会。我们已经讲过，基督教很快就传到了遥远的印度。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及其东方，叙利亚语是在贸易与国际交流中最普遍使用的语言，它为基督教的扩张提供了一条渠道。叙利亚语与亚兰语同源，而亚兰语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散居东方的犹太人所使用的语言。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很久，大多数犹太人就已经不再说希伯来语，许多犹太人甚至都听不懂在犹太会堂中诵读的经文。因此，犹太人开始将圣经译成亚兰文，最初

254

是口头上的，后来是文字上的——被称为《塔古姆》（*Targums*）的文献。与此同时，基督教开始崛起，因此，《塔古姆》至少为早期说亚兰语的基督徒提供了一部分现成的希伯来文圣经，就像七十士译本为说希腊语的基督徒提供了希腊文圣经。大约在公元2世纪的某个时候，新约和旧约的叙利亚文译本出现了，它被称为柏示达圣经（*Peshitta*）——柏示达一词意为"简单"（simple），这就让我们想到了有着类似意思的武加大。至少旧约的一部分很可能是犹太译者翻译的，但是，基督徒——很可能是犹太基督徒——显然在翻译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塔提安——我们已经讲过的、早期护教士殉道者查士丁的学生——试图将四卷福音书调和成一部，他选取了各部福音书的一些经文，删掉了另一些经文。这部由四卷福音书汇编而成的文献被称为《四福音合参》（*Diatessaron*）——意为"四合一"（according to four），它可能于公元2世纪被翻译成叙利亚文，并在说叙利亚语的基督徒中引起了很大争议，因为一些基督徒更喜欢《四福音合参》，不喜欢四卷正典福音书，而另一些基督徒完全不接受《四福音合参》——这场争论并没有很快得以解决，因为《四福音合参》直到公元7世纪末还在一些说叙利亚语的教会中诵读。

从很早的时候起，基督教就沿着叙利亚的贸易与文化路线向东方传播。基督教在埃德萨（Edessa）——位于今天的土耳其东部——取得了早期基督教最显著的成功。埃德萨城成为基督教城市显然是在国王阿伯加鲁斯九世（Abgarus IX，179—216）统治时期，并远远早于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因此，埃德萨可能是最早的基督教国家。很快就出现了一个传说：埃德萨在很久之前耶稣在世时就归信了基督教，国王阿伯加鲁斯五世（Abgarus V）患了麻风病，他写信给耶稣，请求耶稣来为他治病。耶稣并没有亲自来，而是派他的门徒达太（Thaddeus）给阿伯加鲁斯五世送来了一封书信。阿伯加鲁斯五世的麻风病被治愈了，他信奉了基督教，还力劝他的臣民信奉基督教。这个传说可能始于阿伯加鲁斯九世统治时期，因为书信中所引用的耶稣的话引自塔提安的《四福音合参》。不管怎样，到

了公元4世纪，这个传说已经广为流传，因为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提到过这个传说，并引用过一些有争议的书信。传说中耶稣所写的书信很快就成为备受欢迎的护身符。它被翻译成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科普特文和斯拉夫文，人们在疾病蔓延时随身带着它，或带着它奔赴战场，作为能救他们免于伤病的护身符。不管怎样，早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前，埃德萨的国王和他的大多数臣民——可能是全部臣民——就已经成了基督徒。

在阿迪亚波纳（Adiabene）附近地区，早在公元2世纪初就出现了一个基督徒社群。在罗马帝国皇帝克劳狄统治时期（公元41—54年），统治阿迪亚波纳地区的皇室就信奉了犹太教，这里的大多数居民也信奉了犹太教。其中有许多犹太教徒显然归信了基督教，因为有证据表明，这里于公元2世纪初就出现了一个基督徒社群。

在埃德萨之后，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是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是波斯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缓冲国，因此有着一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亚美尼亚的命运常常取决于战事不断的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的政策。波斯帝国想要吞并亚美尼亚，而罗马帝国更愿意亚美尼亚成为一个可以保护它东部边境的独立缓冲国。结果，亚美尼亚人倾向于支持与波斯帝国敌对的罗马帝国。在亚美尼亚，基督教的奠基人是启蒙者（Illuminator）格列高利·卢萨沃里奇（Gregory Lusavorich），他在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归信了基督教，当时，他与他的亲戚国王梯里达底三世（Tradt III）正在罗马帝国逃亡。当局势改变，梯里达底三世重新登上王位时，格列高利和其他基督教归信者回到了亚美尼亚。在亚美尼亚经历了包括监禁在内的众多痛苦与艰难之后，格列高利将福音传给了梯里达底三世，并在公元303年1月6日主显节为他施行了洗礼。因此，亚美尼亚的统治者在君士坦丁之前就已经成了基督徒。最终，亚美尼亚的平民也归信了基督教，圣经被翻译成亚美尼亚文。此外，基督教还从亚美尼亚扩展到高加索河畔的格鲁吉亚王国（Kingdom of Georgia）——根据历史学家鲁菲纳斯（Rufinus）的

记载，格鲁吉亚王后的一个女奴为她的祷告带来了一系列医治的神迹，这令格鲁吉亚王国成为基督教国家。

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源自埃及，因此始终与埃及教会保持着紧密联系。公元4世纪，弗鲁孟提乌(Frumentius)和埃德修斯(Edessius)兄弟俩——将成为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奠基人——在埃塞俄比亚附近遭遇海难，他们被埃塞俄比亚人俘虏，最终又被释放。弗鲁孟提乌来到了亚历山大，在被阿塔那修按立为主教之后，他回到了阿克苏姆王国(Kingdom of Aksum)——此处后来成为埃塞俄比亚的核心地区。在近一百年的宣教之后——主要是来自埃及的基督徒所做的宣教工作——埃塞俄比亚的国王归信了基督教，他的臣民很快也信奉了基督教。在卡尔西顿普世大公会议上，狄奥斯库若(Dioscorus)和其他亚历山大派由于认为基督只有神性、没有人性而被谴责为异端(参第二十八章)，埃塞俄比亚基督徒追随大多数埃及基督徒，拒绝接受此次大公会议的决议。因此，他们成为基督一性论派(Monophysite)——认为基督只有一个本性，直到今天，埃塞俄比亚教会仍是最大的所谓基督一性论派教会。埃塞俄比亚教会最著名的历史遗址是拉利贝拉(Lalibela)岩石教堂。

基督教在很早时也跨过罗马帝国边界，传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可能是说叙利亚语的商人和其他旅行者将基督教传到了这里。最初，基督教尤其在普遍说叙利亚语的美索不达米亚发展迅速，因此，这里的基督徒可以充分利用安提阿和埃德萨的叙利亚文文献。在基督教时代早期统治波斯帝国的帕提亚王朝(Parthian Dynasty)施行了一定的宗教宽容政策，基督教似乎发展迅速，出现在波斯帝国的每一个省。后来，萨桑王朝(Sassanid Dynasty)于公元224年开始统治波斯帝国，该王朝的大多数统治者逼迫基督教，因为他们将基督教视为外国的宗教。在罗马帝国边缘，位于幼发拉底河畔的尼西比斯(Nisibis)——该城始终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直到波斯人在国王沙普尔(Sapor)的率领之下于公元363年将其征服——很快就出现了一所重要的神学学校。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最早的

256

基督教堂建于公元3世纪，位于今天叙利亚的杜拉-欧罗波斯。公元4世纪，随着罗马帝国成为基督教国家，波斯帝国当局越来越敌对基督教，因为基督徒现在通常被视为罗马帝国的支持者。在公元4世纪中叶，波斯的伟大基督教圣贤阿弗拉哈特（Aphrahat）在他的《逼迫见证》（*Demonstration on Persecution*）中，见证了波斯教会的生存环境。在《逼迫见证》中，列出新约和旧约中所有为信仰遭受逼迫的人物之后，阿弗拉阿蒂斯提出耶稣是古人预言和今人跟随的典范，他说戴克里先对"我们西方弟兄"的大逼迫和那里已经发生的巨变，预示着遭受逼迫的波斯教会的盼望。最终，在以弗所大公会议（公元431年）和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公元451年）之后，大多数波斯基督徒拒绝接受这两次大公会议中关于基督神人二性的决议，以此维护他们从罗马帝国获得的独立和一定的宽容。后来，他们加入了东方持不同信仰的教会。其中一些被称为"基督一性论派"，因为他们声称，基督只有一个本性，基督的神性同化了基督的人性。另一些则被称为"聂斯脱利派"（Nestorians），因为他们信奉聂斯脱利（Nestorius）的教义，强调基督神人二性的差异。我们会在第二十八章中更加详细地解释这些争辩。

基督教在公元2世纪之前就传到了阿拉伯半岛，因为我们知道，亚历山大的基督徒与阿拉伯半岛的基督徒有过接触，亚历山大的基督徒、主教和其他旅行者到过阿拉伯半岛。随着基督教在附近地区日益壮大，阿拉伯半岛成为了三种略微不同的基督教版本的接触点与冲突点：第一种是罗马帝国说希腊语地区且得到罗马帝国支持的基督教；第二种是波斯帝国的基督教；第三种是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此外，阿拉伯半岛至少还出现了一种古代的诺斯替派基督教——爱尔克赛派（Elkesaites）。这些混乱和易于混淆的基督教，就是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纪所知晓并抵制的基督教。

我们已经讲过，有一个传统称，使徒多马在印度建立了教会。我们难以确定基督教传到印度的确切时间，因为在一些古代文献中，阿拉伯半岛

257 被称为印度。例如，古代的一份文献告诉我们，大约在公元 180 年左右，亚历山大的著名基督教教师潘代努斯来到了“印度”，“全波斯和大印度的波斯人约翰”（John the Persian, of all Persia and great India）出席了公元 325 年的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不管怎样，一些文献清楚地表明，到了公元 5 世纪初基督教已经在印度牢固地建立起来

在西方，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之外最显著的扩张发生在爱尔兰。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基督教就已经在爱尔兰站稳了脚跟。虽然基督教在爱尔兰的传播可能是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的，但通常归功于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年轻的帕特里克在大不列颠被爱尔兰强盗俘获，成为奴隶。在险象环生的逃跑与其他许多变故之后，他得到了一个让他向先前俘虏他的爱尔兰人宣教的异象。他回到了爱尔兰，虽然历经了各种艰难险阻，但是，他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爱尔兰人成群结队地接受了他的洗礼。修道院很快就建立起来，学习古代知识成为修道院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后来席卷欧洲的蛮族入侵狂潮与爱尔兰擦肩而过，因此，爱尔兰的修道院成为古罗马帝国各领地重获在蛮族入侵中被毁掉的许多古代知识与文献的一个主要来源。

最后，我们必须讲述阿里乌主义在君士坦丁堡以北的日耳曼部落的传播。当阿里乌主义因君士坦提乌成为皇帝而得到罗马帝国的支持时，许多阿里乌派宣教士跨过多瑙河，开始在哥特人中宣教。其中最重要的宣教士是乌尔菲拉斯（Ulfilas），他的名字通常被拼成 Wulfila，意为“小狼”（little wolf）。就乌尔菲拉斯生平的许多细节而言，不同的文献有着不同的记载，他似乎并不是血统纯正的哥特人，至少父亲或母亲是卡帕多西亚人。他显然从小到大都是基督徒，但是，有的文献记载他是阿里乌派，有的文献记载他是正统的尼西亚派。他并没有在哥特人中宣教很久，因为他和他所牧养的基督徒在若干年后搬到了默西亚（Moesia，位于今天的保加利亚）——显然是为了逃避逼迫。他对哥特基督教的巨大贡献，是发明了一种哥特文字母表，以及后来将圣经翻译成哥特文。

与此同时，许多哥特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帝国卫队中服役，其中许多人在回国之前归信了基督教。大多数哥特人是在阿里乌主义得势时归信了基督教，因此，他们是阿里乌派。后来，他们的邻邦也归信了阿里乌派基督教。结果，到了蛮族大举入侵罗马帝国时，许多入侵者已经是基督徒，尽管他们是阿里乌派。这些日耳曼人似乎并不关注阿里乌主义与尼西亚正统基督教的细微差异，阿里乌主义的确为他们带来了独立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与教会领袖，因此，这促进了一种身份认同感，他们将这种身份认同感带进了所征服的领地。随着他们与罗马文化和传统的同化，大多数日耳曼人放弃了阿里乌主义，信奉了正统的尼西亚基督教。 258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取得了一些最著名的胜利，但是，到了西罗马帝国灭亡时，东至印度，南至埃塞俄比亚，北至爱尔兰，都已经有了基督徒。这些教会将继续在基督教的历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尽管今天它们常常被人们遗忘。

第二十六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 世界毁灭了。是的！但尽管如此，令我们羞愧的是，我们的罪仍然活着，甚至更有活力。这座伟大的城市，罗马帝国的首都，已被大火吞噬，罗马人流亡到世界各地。曾经备受敬畏的教会，现在只不过是一片尘灰。
>
> ——哲罗姆

当奥古斯丁去世时，汪达尔人正在围攻希波城。随后不久，他们征服了埃及以外的非洲北海岸。在几年之前的公元410年，阿拉里克（Alaric）和他的哥特将士攻陷并洗劫了罗马。此前，在公元378年的阿德里亚堡战役中，罗马帝国的一位皇帝被哥特人击败，并被杀死，哥特人的军队杀到了君士坦丁堡城外，之后又向更加脆弱的西罗马帝国发起了进攻。古罗马帝国，更确切地说是西罗马帝国，行将灭亡。数百年来，罗马军团从未让日耳曼人越过莱茵河与多瑙河的边界。在大不列颠，古罗马的长城将罗马化地区与仍由蛮族控制的地区隔开。但是，防洪闸门现在已经被打开。在看似无休止的入侵狂潮中，日耳曼游牧部族跨过了罗马帝国的边界——有时是被一些希望得到他们军事支持的罗马官员所怂恿——他们洗劫城镇，并最终定居在罗马帝国以前的一些领地。在这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其中许多王国看似仍臣服于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直到最后一位皇帝于公元476年被废），但它们实际上是独立的王国。日耳曼人定居在欧洲的许多地区，他们的影响今天仍可以从这些

地区的名字中看出：德国（日耳曼）因日耳曼人侵者而得名，法国（法兰西）因法兰克人（Franks）而得名，英国因盎格鲁人（Angles）而得名，伦巴第（Lombardy）因伦巴第人（Lombards）而得名——还有其他许多这样的地区。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尽管它的大多数征服者最终所说的语言派生于罗马帝国的拉丁语，尽管欧洲的许多统治者在未来的一千五百年间还 260 在声称他们是古代凯撒的真正继任者。

君士坦丁所开创的帝国教会在拜占庭帝国又存在了一千年。西方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西欧在很久以后才再次取得了古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政治统一与相对的和平。西欧也用了数百年时间来重建之前被毁掉的许多东西，这不仅包括道路、建筑和沟渠，还包括文学、艺术和科学。在所有这些领域，教会令过去的传统得以延续。教会成为文明与秩序的保护者。在许多方面，教会填补了罗马帝国灭亡所留下的真空。几百年后，当罗马帝国在西方再度崛起时，教会通过自己的行动达成这一点，而且是教宗在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加冕。

与此同时，基督教还将应对新的挑战。许多入侵者是异教徒，因此，被征服者觉得必须将自己的信仰传布给征服者。渐渐的，通过基督徒成千上万未被记载的见证，入侵者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最终，从征服者中间出现了新的教会领袖。

此外，许多入侵者此前已经接受了阿里乌派基督教，因此，几十年来被认为已经完全销声匿迹的阿里乌主义问题，再次在之前从未构成真正威胁的西方死灰复燃。最终，经过漫长艰苦的斗争，所有阿里乌派在被他们征服之人的影响之下，接受了正统的尼西亚信仰。

这一切孕育出新的文明，这新的文明承袭了古希腊罗马与基督教的 261 文明和日耳曼人的传统。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千年，而这一千年被称为中世纪（Middle Ages）。现在，我们就要讲述基督教在中世纪的历史。

建议阅读：

Douglas Burton-Christian. *The Word in the Dessert: Scripture and the Quest for Holiness in Early Christian Monastic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rysostomus Baur. *John Chrysostom and His Time*. 2 vols. Westminster, Maryland: Newman, 1959,1960.

Gerald Bonner. *St. Augustine of Hippo: Life and Controversies*. London: SCM, 1963.

Hans von Campenhausen. *The Fathers of the Greek Church*. New York: Pantheon, 1959.

Hans von Campenhausen. *Men Who Shaped the Western Churc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Augustine Casiday and Frederick W. Norrie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ume 2: Constantine to c. 60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Hermann Doerries. *Constantine the Grea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F. Homes Dudden. *The Life and Times of St. Ambrose*.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1935.

W. H. C. Frend. *The Donatist Church: A Movement of Protest in Roman North Africa*. Oxford: Clarendon, 1952.

Robert Payne. *The Fathers of the Western Church*. New York: Viking, 1951.

Robert Payne. *The Holy Fire: The Story of the Fathers of the Eastern Church*. London: Skeffington, 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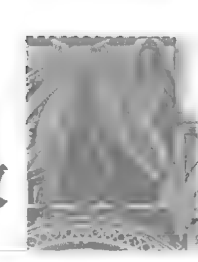
Marjorie Strachey. *Saints and Sinners of the Fourth Century*. London: William Kimber, 1958.

Laura Swan. *The Forgotten Desert Mothers: Sayings, Lives, and Stories of Early Christian Women*. 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01.

Helen Waddell. *The Desert Fath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第三部分

中世纪的基督教



编年表

西罗马帝国皇帝[1]	东罗马帝国皇帝	教宗[2]	历史事件[3]
霍诺里乌(395-423)	狄奥多西二世(408-450)	英诺森一世(401-417)	罗马陷落(410)
		西莱斯廷一世(422-432)	
			☆奥古斯丁(430)
			以弗所大公会议(431)
	马喜安(450-457)	利奥一世(440-461)	卡尔西顿大公会议(451)
			利奥一世会见阿提拉(453)
			汪达尔人洗劫罗马(455)
	利奥一世(457-474)		
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475-476)	芝诺(474-491)	菲利克斯二世(483-492)	奥多亚塞灭亡西罗马帝国(476)
			合一通谕(482)
	阿纳斯塔修斯一世(491-518)		克洛维接受洗礼(496)
		西马库斯(498-514)	
	查士丁(518-527)	何尔米斯达斯(514-523)	
		约翰一世(523-526)	☆波埃修(524)
			☆提奥多里克(526)
	查士丁尼(527-565)		贝利萨留攻占迦太基(533)

① 在此，只列出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最重要的皇帝，以及最重要的罗马教宗。

② ※表示不被罗马天主教承认的教宗。

③ ☆表示人物去世的年份。

西罗马帝国皇帝	东罗马帝国皇帝	教宗	历史事件
		维吉里 (537-555)	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553)
			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568)
		帕拉利二世 (579-590)	雷卡雷德归信基督教(589)
		格列高利一世 (590-604)	卡西诺山修道院被毁(589)
			奥古斯丁来到英格兰(597)
	赫拉克利乌 (610-641)		穆罕默德逃到麦地那(622)
		霍诺里乌 (625-638)	穆罕默德占领麦加(630)
			☆穆罕默德(632)
			☆塞维尔的依西多尔(636)
			惠特比宗教会议(663)
	君士坦丁四世 (668-685)		第三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680-681)
	查士丁尼二世 (685-695; 705-711)	塞尔吉乌一世 (687-701)	
			摩尔人来到西班牙(711)
		格列高利二世 (715-731)	
	利奥三世 (717-741)	格列高利三世 (731-741)	
			图尔战役(732)
	君士坦丁五世 (741-775)	扎迦利 (741-752)	
		司提反二世 (752-757)	
		阿德里安一世 (772-795)	查理曼进攻撒克逊人(772)
	利奥四世(775-780)		
	君士坦丁六世 (780-797)		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787)

西罗马帝国皇帝	东罗马帝国皇帝	教宗	历史事件
		利奥三世(795-816)	
	伊琳娜(797-802)		
查理曼(800-814)	尼基弗鲁斯一世(802-811)		
虔诚者路易(814-840)			
			挪威人攻占巴黎(845)
		尼古拉一世(858-867)	
			弗提乌斯成为牧首(857)
			西利尔和美多迪乌来到摩拉维亚(863)
秃头查理(875-877)			
胖子查理(881-887)			
			保加利亚国王成为“沙皇”(917)
			设立保加利亚牧首(927)
亨利一世(933-936)			
奥托一世(936-973)			俄罗斯的女王奥尔加归信基督教(950)
奥托二世(973-983)			
奥托三世(983-1002)			
亨利二世(1002-1024)			
康拉德二世(1024-1039)			
亨利三世(1039-1056)			
		利奥九世(1049-1054)	东西方教会大分裂(1054)
亨利四世(1056-1106)		维克托二世(1055-1057)	
		司提反九世(1057-1058)	
		尼古拉二世(1058-1061)	于格担任克吕尼修道院院长(1049-1109)

西罗马帝国皇帝	东罗马帝国皇帝	教宗	历史事件
		亚历山大二世(1061–1073)	黑斯廷斯战役(1066)
			卡诺萨(1077)
		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	安瑟伦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1093)
		乌尔班六世(1088–1099)	克莱蒙特会议(1095)
			☆埃尔熙德(1099)
		帕斯加尔二世(1099–1118)	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1099)
亨利五世(1106–1125)			
		卡里克斯图二世(1119–1124)	《沃尔姆斯协定》(1122)
			阿伯拉尔受到谴责(1141)
			埃德萨陷落(1144)
		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	☆明谷的伯尔纳(1153)
			☆彼得·隆巴德(1160)
			耶路撒冷陷落(1187)
		英诺森三世(1198–1216)	
	拉丁帝国(1204–1261)		
奥托四世(1208–1215)			
			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1212)
			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1215)
腓特烈二世(1215–1250)			
			☆圣多明我(1221)
			☆圣方济各(1226)
		格列高利九世(1227–1241)	
			☆波那文图拉与阿奎那(1274)
			十字军离开耶路撒冷(1291)
		西莱斯廷五世(1294)	
		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	

法国国王[4]	英格兰国王	教宗	历史事件
腓力四世 (1285－1314)	爱德华一世 (1272－1307)		《神职人员－平信徒》(1296)
			《唯一至圣》(1302)
			教宗在阿纳尼受辱 (1303)
		本笃十一世 (1303－1304)	
		克莱门五世 (1305－1314)	
	爱德华二世 (1307－1327)		“教会被掳巴比伦”开始 (1309)
			镇压圣殿骑士团(1312)
腓力五世 (1316－1322)		约翰二十二世 (1316－1334)	
查理四世 (1322－1328)	爱德华二世 (1327－1377)		☆埃克哈特(1327)
腓力六世 (1328－1350)		本笃十二世 (1334－1342)	百年战争(1337－1453)
		克莱门六世 (1342－1352)	
约翰二世 (1350－1364)			☆奥卡姆(1349)
		英诺森六世 (1352－1362)	
查理五世 (1364－1380)		乌尔班五世 (1362－1370)	
	理查二世 (1377－1399)	格列高利十一世 (1370－1378)	“教会被掳巴比伦” (1377)
		乌尔班六世 (1378－1389)	西方教会大分裂 (1378)
查理六世 (1380－1422)		※克莱门七世 (1378－1394)	威克里夫在牛津受到谴责(1380)
			☆吕斯布鲁克的约翰 (1381)

④ 此时，同西罗马帝国的皇帝相比，法国与英格兰的国王在基督教史中更加重要。

法国国王	英格兰国王	教宗	历史事件
			☆威克里夫(1384)
		卜尼法斯九世(1389 - 1404)	
		※本笃十三世(1394 - 1423)	
	亨利四世(1399 - 1413)		胡斯成为布拉格教区长(1402)
		英诺森七世(1404 - 1406)	
		格列高利十二世(1406 - 1415)	比萨会议(1409)
		※亚历山大五世(1409 - 1410)	胡斯被命令到罗马(1410)
		※约翰二十三世(1410 - 1415)	
	亨利五世(1413 - 1422)		罗拉德派起义(1413 - 1414)
			康斯坦茨大公会议(1414 - 1418)
			☆胡斯(1415)
		马丁五世(1417 - 1431)	与胡斯派第一次战争(1420)
查理七世(1422 - 1461)	亨利六世(1422 - 1461)		西方教会大分裂结束(1423)
		尤金四世(1431 - 1447)	☆圣女贞德(1431)
			巴塞尔大公会议(1431 - 1449)
			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1438 - 1445)
		尼古拉五世(1447 - 1455)	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
路易十一世(1461 - 1483)	爱德华四世(1461 - 1483)		
		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 - 1484)	

法国国王	英格兰国王	教宗	历史事件
			☆汉斯·博姆(1476)
查理八世 (1483－1498)			
		亚历山大六世 (1492－1503)	
	亨利七世 (1485－1509)		哥伦布抵达美洲(1492) ☆萨伏纳罗拉(1498)
		尤利乌斯二世 (1503－1513)	
	亨利八世 (1509－1547)		
		利奥十世(1513－1521)	

第二十七章

新秩序

> 如果蛮族只是为这个目的被上帝差派到罗马帝国境内……基督的教会可以充满匈奴人、斯维比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无数的各民族信徒，那么，我们要赞美上帝的仁慈……即使这是以我们自己的灭亡为代价。
>
> ——保罗·奥罗修斯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导致许多独立王国的建立，其中每个王国都对西罗马帝国领地内的教会此后的历史有着重大意义。这也将新的职能与权力赋予了此前就已经形成的两种制度：修院制度和教宗制度。最终，新的入侵——这一次来自东南方——为基督教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其中的每一次进展都值得分别讲述。

日耳曼列国

虽然“蛮族”在罗马人看来似乎是故意实施破坏的掠夺者，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渴望定居在罗马帝国，在这里享受迄今为止他们只是听说的远方文明所带来的益处。因此，在经历一段四处漂泊的生活之后，每一群主要的入侵者都在罗马帝国的某个地区定居下来——其中一些是因为那里是他们梦想的土地，另一些只是因为他们被其他入侵者驱赶到那里。

我们在此并不是为了讲述每一个日耳曼部落的游牧生活与最终的定

居。但是，为了让读者了解日耳曼部族的游牧生活和它们对前罗马帝国各地的影响，我们最好讲述一下其中一些大的、最具影响的日耳曼部族。

公元 407 年，汪达尔人越过了莱茵河，游荡在法国和西班牙。公元 429 年，他们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又于公元 439 年攻占了迦太基。到此时为止，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埃及边境的整个非洲北海岸的主人。后来，他们越过海洋，占领了西西里岛（Sicily）、科西嘉岛（Corsica）和撒丁岛（Sardinia）。公元 455 年，他们洗劫了罗马，同哥特人在四十五年之前给罗马带来的毁灭相比，他们造成的灾难更大。对于教会来说，他们在北非的统治是灾难性的。他们是阿里乌派——即否定耶稣的本质与永恒的神性，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不断爆发针对正统基督徒和多纳徒派的逼迫，正统基督徒和多纳徒派当时是在争论第十六章讨论的问题。

270

最终，在汪达尔人近一百年的统治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将军贝利萨留（Belisarius）征服了北非。在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的领导之下，首都位于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帝国取得了短暂的复兴，但是，查士丁尼的梦想是复兴古罗马帝国的荣耀。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方入侵者——北非人将他们称为"希腊人"——带来了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在教义上与西方的正统基督教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文化与日常信仰实践上却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最终的结果是，当穆斯林于公元 7 世纪末征服北非时，他们发现，北非的基督教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基督教最终在北非消失了。

271

在公元 378 年的阿德里亚堡战役中，西哥特人——另一支日耳曼民族，上述哥特人两个主要支派中的一支——击败了罗马人。后来，他们横扫巴尔干（Balkans），又于公元 410 年攻占了罗马。公元 415 年，他们开始统治西班牙，直到公元 8 世纪初被穆斯林推翻。他们的这一段王国政治史混乱不堪。在西哥特王国的三十四位国王中，只有十二位是正常死亡或战死在沙场。其他国王或是被谋杀，或是被废黜。他们也是阿里乌派，但是，他们逼迫自己领地内基督徒的程度不及汪达尔人逼迫他们领地

内的正统基督徒。很快就显而易见，作为被征服者的正统基督徒后裔成为古代文化的保护者，他们的参与对维护西哥特王国的稳定必不可少。这令西哥特王国的国王雷卡雷德（Recared，586—601）归信了正统的尼西亚信仰，在公元 589 年的托莱多（Toledo）会议上，他庄严地归信了基督教。在国王雷卡雷德之后，绝大多数贵族也成为正统基督徒，阿里乌主义很快就消失了。

在西哥特王国的整个历史上，最杰出的基督教领袖是塞维尔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他是一位希望尽可能保护古代文化的学者。他的著作《语源学》（*Etymologies*）简直就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该书向我们展现了当时的知识水平，不仅涉及宗教，还涉及天文学、医学、农业和几乎每一个知识领域。《语源学》是历代以来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也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著作，因为伊西多尔所做的，只是收集与分类过去的知识，书中几乎没有他的任何原创思想。然而，正是通过像伊西多尔这样一批学者的著作，中世纪才学到了古代的荣耀与智慧。

在雷卡雷德归信基督教之后，教会在西哥特王国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就这一点而言，教会为西哥特王国带来了一定的稳定，尽管当我们读到教会会议所颁布的教令时，充斥其中的不公正与不平等会令我们感到畏惧。例如，公元 633 年的托莱多会议规定，神父只能在得到主教允许的情况下结婚，违反规定的神父会受到“忏悔一段时间”的惩罚，而主教还要把他的妻子带走卖掉。

关于犹太人的立法也是如此。托莱多会议——由当时最有学识的人塞维尔的伊西多尔主持——还规定，不应当强迫犹太人归信基督教，但是也禁止以前被强迫归信基督教的犹太人重回他们祖先的信仰，因为这是在亵渎上帝。此外，这样的归信者还被禁止与继续信奉其古老信仰的犹太人有任何往来，即使他们是至亲。如果他们当中的任何人被发现还在遵守犹太人的一些传统习俗，尤其是“可恶的割礼”，他们的孩子将被带走。此外，任何被发现娶了基督徒为妻的犹太人必须在归信基督教与离

272

开妻儿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情况相反，妻子是犹太人，她拒绝归信基督教，那么她的婚姻便被视为无效，她必须将孩子交给孩子的父亲。

在雷卡雷德归信基督教之后，尽管教会做出了努力，西哥特王国的政治依然不稳定，暴力和独裁依然困扰着西哥特王国。例如，国王雷塞斯文斯（Recesvinth，649—672）处死了他的七百个敌人，并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分给了他的朋友。最终，在国王罗德里克（Roderick，710—711）的率领之下，穆斯林入侵了西班牙，结束了西哥特人的统治。但是，基督教此时已经在西班牙扎根，在从穆斯林摩尔人手中重新夺回伊比利亚半岛的漫长战争中，基督教成为西班牙人的凝聚力。

在公元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高卢被两群入侵者瓜分：勃艮第人（Burgundians）和法兰克人。勃艮第人是阿里乌派，法兰克人仍是异教徒。但是，勃艮第人并没有像汪达尔人在北非那样逼迫正统基督徒。相反，他们模仿正统基督徒的习俗，很快，许多勃艮第人就接受了他们正统基督徒臣民的尼西亚信仰。公元516年，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接受了正统的三位一体教义，很快，他的臣民也效法了他的榜样。

273

法兰克人（他们的国家被称为“法兰西”）最初结成了由独立的原始部落所组成的松散联盟。墨洛维（Meroveus）——墨洛温王朝的创建人——为法兰克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克洛维（Clovis）——墨洛维的孙子和墨洛温家族中最伟大的统治者——娶了勃艮第的一位基督徒公主，他在一次战争前夕许诺，如果他妻子的上帝给他一场胜利，他就归信基督教。结果，在公元496年的圣诞节，他与许多贵族一同接受了洗礼。随后不久，大多数法兰克人也接受了洗礼。

公元534年，法兰克人征服了勃艮第人，因此，法兰克人统一了整个高卢地区。但是，墨洛温王朝后来的国王软弱无能，到了公元7世纪，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一群“宫廷大臣”手中，他们才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铁锤”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 the Hammer）便是其中之一，他率领法兰克军队进攻已经征服了的西班牙，又越过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直

逼欧洲腹地的穆斯林。在公元732年的图尔战役(Battle of Tours)或普瓦蒂埃战役(Battle of Poitiers)中,查理·马特击败了穆斯林。他这时其实已经成为国王,但他并没有加冕。他的儿子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决定废黜被称为"蠢人"的无能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Childeric III the Stupid)。在教宗扎迦利(Zacharias)同意之下,丕平迫使希尔德里克三世退位,希尔德里克三世成为了修士。后来,依照教宗的命令,主教卜尼法斯(Boniface)膏立丕平为国王。这对基督教后来的历史至关重要,因为丕平的儿子查理曼(Charlemagne)将成为中世纪早期最伟大的统治者,他希望改革教会,并且他是由教宗加冕为皇帝。

在上述整个过程中,教会的态度通常是妥协。在像克洛维这样强大的国王统治之下,教会领袖似乎只能支持与服从统治者。主教很快就通常由国王来任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主教职就意味着拥有广阔的土地,因此,主教也是大地主。在膏立丕平之前不久,主教卜尼法斯就曾向教宗抱怨,法兰克人的教会实际上掌握在平信徒地主手中,许多主教是地主,而不是牧者;在法兰克人的王国中,他们并不知道通过召开主教会议来治理与改革教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查理曼时代。

大不列颠从未被罗马帝国完全控制。皇帝哈德良(Hadrian)修建的长城将大不列颠一分为二:南方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皮克特人(Picts)和苏格兰人则在北方保持独立。当灾难威胁到罗马帝国在欧洲大陆的领地时,罗马军团撤出了大不列颠,许多居民与他们一同离开了。留下来的居民很快就被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征服,他们最终建立了七个王国:肯特(Kent)、埃塞克斯(Essex)、苏塞克斯(Sussex)、东英吉利亚(East Anglia)、威塞克斯(Wessex)、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和麦西亚(Mercia)。这些入侵者都是异教徒,但是,始终有一部分留下来的居民信奉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

274

与此同时,随着日耳曼各族入侵罗马帝国,爱尔兰教会也在蓬勃发展。爱尔兰教会保留了许多以前的信仰与文化,因此很快就开始向其



宣教士从小岛艾奥纳来到苏格兰和其他地区。

他国家差派宣教士，最值得关注的是向苏格兰宣教。最著名的爱尔兰宣教士是科伦巴(Columba)，他和十二个同伴可能于公元563年定居在小岛艾奥纳(Iona)。他们在艾奥纳建立的修道院成为向苏格兰宣教的中心，在苏格兰，很快就模仿艾奥纳修道院建起了许多修道院。最终，宣教运动向南发展，到达了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所控制的领地。

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基督教来说，爱尔兰基督教一个重要与持久的影响，是神父亲自聆听的忏悔。这种忏悔形式起源于爱尔兰，与之配套的通常是供忏悔者使用的手册。有趣的是，流行的赞美诗《成为我异象》(Be Thou My Vision)就是译自"凯尔特祷文"(*lorica*)，而"凯尔特祷文"当时是被用来抵抗"德鲁伊教徒"(Druids)的"邪恶力量"(*Rob tu mo bhoile*)。

因为某些我们并不完全清楚的原因，苏格兰-爱尔兰基督教与之前在罗马帝国领地内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存在着许多差异。苏格兰-爱尔兰教

会并不由主教领导，而是服从修道院院长。它们的许多教会礼仪和复活节日期也与其他教会的不同。苏格兰-爱尔兰的修士与其他修士也不同，他们剃光前额，而不是头顶——这是他们反抗的一个标志。这种习俗最终被宣布违法。

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表现于因循欧洲其他传统的基督教——始终在大不列颠存在，仍然沿袭罗马帝国时代传统的那些基督徒信奉这种基督教，当欧洲大陆的基督徒开始关注大不列颠时，这种基督教获得了发展动力。年轻的格列高利——大格列高利——遇到了几个被卖到罗马为奴、长着金发碧眼的年轻人。大格列高利的一位传记作家记载了这件事。

“这些小伙子是哪个民族的？”格列高利问。

“他们是盎格鲁人。”有人告诉他。

“他们的确是天使，因为他们长着天使的脸庞。他们的国家在哪里？”

“在傣里。”

“他们确实来自上帝的愤怒，因为他们已经被从愤怒中召出，进入了上帝的仁慈。他们的国王是谁？”

“阿拉。”

“阿里路亚！必要在那地赞美上帝的名。”[1]

这场对话可能从未发生过。但是，大格列高利肯定对盎格鲁人的那片土地产生了兴趣，他可能考虑过到那里去宣教。他在公元590年成为教宗，九年之后，他派一个宣教团向盎格鲁人宣教，而该宣教团由他以前所属的修道院的修士奥古斯丁领导。当这些宣教士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困

---

① 盎格鲁人（Angle）与天使（angel），傣里（*Deiri*）与“来自上帝的愤怒”（*de ira*），阿拉（Aella）与阿里路亚（Alleluia）的发音相似，因此，格列高利根据自己听到的话回答说：“他们的确是天使”，“他们确实来自上帝的愤怒”和“阿里路亚！必要在那地赞美上帝的名”——译者注

难时，奥古斯丁和他的同伴想放弃宣教。但是，大格列高利坚决反对，于是他们被迫继续宣教。他们最终来到了肯特王国，肯特的国王埃塞尔伯特(Ethelbert)娶了一个基督徒为妻。他们最初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但是，埃塞尔伯特最终归信了基督教，他越来越多的臣民也归信了基督教。奥古斯丁后来成为坎特伯雷(肯特王国的首都)的第一任大主教。英格兰的诸王国接连成为基督教国家，坎特伯雷成为英格兰的宗教首都。

然而，英格兰的基督徒很快就与苏格兰-爱尔兰的基督徒产生了冲突。我们得知，他们的冲突在诺森布里亚愈演愈烈，因为诺森布里亚的国王追随苏格兰-爱尔兰的基督教传统，而王后却追随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传统。就复活节的日期而言，这两派并没有达成一致，当其中一派基督徒正在禁食时，另一派却在庆祝。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公元663年在惠特比(Whitby)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苏格兰-爱尔兰的基督徒坚守他们所说的源自科伦巴的传统，而罗马的宣教士和他们的支持者则反驳称，圣彼得的传统高于科伦巴的传统，因为使徒彼得已经得到了天国的钥匙。我们得知，当诺森布里亚的国王听到这些话时，他对那些为苏格兰-爱尔兰传统辩护的基督徒说：

276

> “你们的对手所说的属实吗？圣彼得真的握有天国的钥匙吗？”
>
> “当然。”他们回答说。
>
> “那么，根本就不需要再争辩下去。我服从彼得。否则，当我来到天堂时，他会将门关上，把我拒之门外。”

结果，惠特比宗教会议决定支持欧洲大陆的基督教传统，反对苏格兰-爱尔兰的基督教传统。不列颠群岛各地都做出了类似的决议。但是，这并不只是因为统治者的天真，如诺森布里亚的国王在惠特比宗教会议上似乎表现出的那样。实际上，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这是迫于希望统一所有教会的其他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压力和威望。

日耳曼人的入侵在意大利造成了混乱的局面。尽管从理论上讲罗马在公元476年之前都有皇帝，但他们实际上只是日耳曼将军们的傀儡。最终，赫鲁利人(Heruli)的领袖奥多亚塞(Odoacer)于公元476年废黜了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罗缪鲁斯·奥古斯图卢斯(Romulus Augustulus)，他写信给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芝诺(Zeno)，告诉芝诺罗马帝国现在已经重新统一。芝诺最初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甚至将奥多亚塞封为“贵族”。但是，冲突很快就爆发了，芝诺决定通过怂恿东哥特人入侵意大利来除掉这个赫鲁利人。芝诺这样做了，不久之后，意大利就处于东哥特人的统治之下。

东哥特人是阿里乌派，因此，意大利信奉尼西亚正统信仰的基督徒向君士坦丁堡请求帮助。这反而令东哥特的统治者怀疑他们的臣民阴谋叛国。因此，正统基督徒经常受到逼迫，但是，逼迫的罪名通常与宗教无关，而是阴谋叛国。当时最有学识的波埃修(Boethius)就是这样被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关进了监狱。波埃修在狱中完成了自己最著名的著作《哲学的慰藉》(*On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哲学的慰藉》论述了预定论、自由意志和罪人兴旺而善人灭亡的原因。公元524年，波埃修和他的岳父西马库斯(Symmachus)一同被处死。两年之后，教宗约翰死在狱中。从此以后，波埃修、西马库斯和教宗约翰就被视为罗马教会的殉道士，罗马人与东哥特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最终，当拜占庭帝国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之下取得了短暂的复兴时，查士丁尼的将军贝利萨留入侵了意大利，在长达二十年的战争之后，贝利萨留和其他罗马将军结束了东哥特人的统治。

277

但是，伦巴第人于公元568年从北方入侵了意大利。这再次威胁到亚平宁半岛的和平。现在，亚平宁半岛再次成为伦巴第人与拜占庭人不断上演战争的舞台。随着君士坦丁堡逐渐失去曾在查士丁尼统治之下重获的一些权力，伦巴第人可能会侵占亚平宁半岛。因此，到了公元8世纪中叶，教宗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从君士坦丁堡得到多少帮助，于是他们开

始向北方求援。就这样，教宗与法兰克王国结成了同盟，而这最终令教宗将查理曼加冕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

总而言之，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8世纪，蛮族的一系列入侵席卷了西欧，这令西欧这片土地陷入了混乱，也毁掉了西欧大量的古代文明。在宗教上，伴随入侵者的似乎还有已经成为历史的两个挑战：异教信仰与阿里乌主义。最终，异教徒和阿里乌派都接受了被他们征服之人的信仰。这就是尼西亚信仰，也被称为“正统信仰”或“大公信仰”。在蛮族归信正统信仰的过程中和保护古代文明的努力中，有两个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使信仰和文明得以巩固。这两个制度就是修院制度和教宗制度，我们现在就来讲述它们。

本笃修院制度

我们已经讲过，当教会与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而因此成为掌权者的教会时，许多基督徒在修道生活中找到了一条可以像以前那样完全活出信仰的道路。虽然修道主义运动在埃及和罗马帝国东部的一些地区尤其强大，但是，这场运动也在罗马帝国西部赢得了追随者。可是，西方的修道主义往往在三个方面与东方的修道主义存在差异。首先，西方的修道主义往往更加实际。它不仅为苦修这个单一的目的而责罚肉体，也为在俗世中的宣教操练肉体与灵魂。科伦巴和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就是西方修道主义这种倾向的实际例子。其次，西方的修道主义并不十分重视代表着东方修道主义的独居生活。从一开始，西方的修道主义就在探索集体修道生活的方法。最后，西方的修道主义并不总是与教会领袖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而这种紧张的关系却是东方修道主义的特点。除了在教会领袖极其腐败的年代，西方的修道主义始终是教宗、主教和其他教会领袖的左膀右臂。

278

在西方修道主义的形成期，一位重要的人物是本笃（Benedict），他在许多方面都是西方修道主义的创始人。本笃大约在公元480年生于意大

利的小镇努尔西亚(Nursia)。因此,他是在东哥特人的统治下长大的。他的家族是罗马帝国的老牌贵族,因此他十分了解正统基督徒与阿里乌派的紧张关系以及正统基督徒所遭受的逼迫。他在大约二十岁时决心成为隐修士,因而离家生活在洞穴之中。后来,他过了一段极端禁欲的生活,因为他希望战胜自己肉体的诱惑。最后,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就像埃及以前那些备受尊敬的修士一样,一群门徒聚集在他的身边。当他的洞穴已经不再能实现他的修道愿望时,他把这个小小的修道群体搬到了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十分偏僻,这里尚有一片用来祭祀的小树林,当地的居民还在这里进行古代的异教崇拜。本笃和他的追随者砍倒树林,捣毁了异教祭坛,就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修道院的地基。随后不久,他的妹妹斯科拉丝蒂卡(Scholastica)在附近定居,建起一座女修道院。最终,本笃的名气大到连东哥特的国王也来拜访他。但是,等待这位国王的只有这位修士的严厉批评和可怕预言,因为在本笃看来,他是一个暴君。

然而,本笃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为修道院制定的《会规》。虽然相当简短,但是,他的《会规》将决定未来几百年修道主义的形式。《会规》追求的并不是极端的禁欲生活,而是明智地安排修道生活:拥有严格的修道戒律,却不过分严厉。因此,当许多沙漠修士以饼、盐和水为生时,本笃规定他的修士一天两餐,每餐都有两种煮熟的菜肴,有时还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此外,每个修士每天还可以适量饮酒。除了一张床之外,每个修士还可以拥有一套铺盖和一个枕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得到的,因为在资源匮乏时,修士应该满足于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

但是,对于本笃来说,修道生活有两个关键要素:稳定和顺服。稳定意味着修士不可以随意从一座修道院去到另一座修道院。每个修士必须终生留在他最初加入的修道院,除非他被命令前往另一座修道院。本笃修会的修士对稳定修道的承诺,反倒显明该修院制度与那个混乱时代的相关性,而这种承诺正是产生这种关联的一个资源。

其次，本笃的《会规》坚持顺服。首先，这意味着顺服《会规》。但是，本笃修会的修士必须"立即"顺服修道院院长。这不仅意味着立即顺服，也意味着努力操练自愿的立即顺服。如果做不到立即服从接到的命令，修士必须向修道院院长做出解释。如果在做出解释之后，院长仍然坚持必须立即服从，修士就必须尽力服从。但是，院长一定不是暴君，他自己必须顺服上帝和《会规》。"修道院院长"一词意为"父亲"，因此，修道院院长也应当是像父亲那样行事为人。

279

犯错的修士会受到私下的规劝。如果他在两次私下规劝之后仍不悔改，他将在所有修士面前受到严厉的训斥。下一步是禁闭，他不仅被禁止领受圣餐，也不被允许与其他修士一同进餐以及有任何接触。如果他此时仍不悔改，他将受到鞭打。如果这还没有任何效果，他将被遗憾地逐出修道院。即使这样，如果他能够悔改，修道院还会再次接纳他。如果他被三次逐出修道院，修道院的大门将永远向他关闭。简而言之，本笃《会规》并不是为受人尊敬的圣徒而写，如沙漠中的英雄，而是为难免犯错的人所写。这可能是本笃《会规》成功的秘密。

本笃《会规》还坚持全体修士共同参加体力劳动。除了在特殊情况下，如生病或拥有独特的恩赐，全体修士将轮流承担每一项工作。例如，修士每周都要轮流做饭，以表明这样的工作并不卑微，每举行一次崇拜，做饭的修士就会轮流一次。此外，在分配工作时，病人、老人和幼小的孩子将得到特殊的照顾。另一方面，出身富人家的修士也绝不会在这方面受到特殊的待遇。如果出于一些原因而必须在修道院中建立优先制度，这也必须按照每个修士加入修道院的时间长短而定。贫穷本是以往修道主义中一种个人苦修方法，但是，本笃希望利用贫穷在修道院中建立一种新制度。修士的贫穷将他们与修道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修道院中的所有修士都同样贫穷，修士的所有需用必须依赖修道院。

280

本笃认为，祷告是修道生活的中心。每天都有留给个人祷告的时间，但是，大部分祷告是在小礼拜堂进行的。修士每天要聚在小礼拜堂祷告

八次：白天七次，半夜一次，因为《诗篇》记载："一天七次赞美你"（诗119:164），"半夜必起来称谢你"（诗119:62）。

一天的第一次集体祷告是在黎明时分进行的，随后还有七次这样的祷告。中世纪的大多数修道院采纳了这些祷告时刻，它们被称为晨经、晨祷、午前祈祷、午时祈祷、午后祈祷、晚祷和夜祷。在每次这样的祷告中，大部分时间被用来诵读《诗篇》和阅读其他经文。《诗篇》被分类成几个部分，以便于可以在一周之内诵读一遍。其他经文的阅读取决于每天的时刻、每周的节期和崇拜的节期。结果，大多数修士都可以逐渐记住整卷《诗篇》和其他经文。许多有一定闲暇时间的平信徒也采取类似的灵修方法，因此，他们也非常熟悉圣经中的许多经文，因为它们出现在《日课经》里，而《日课经》是在每个祷告时刻都要诵读的经文。这八个祷告时刻被称为"日课经时间"，进行这些祷告被称为"日课"。

虽然本笃自己很少谈到学习，但是，学习很快就成为本笃会修士的主要活动之一。举行日课需要书籍。修士可以熟练抄写圣经和其他书籍，以留给后来者使用。本笃修道院也成为教学中心，尤其是为教授许多想成为修士而被送到修道院接受训练的孩子。本笃修会的许多修道院还成为医院、药店和为疲倦的过客提供住宿的客栈。

最后，本笃修道院还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影响，因为许多修道院建立在偏远地区，修士的劳动带动了这些偏远地区的生产。因此，欧洲的大量土地成为耕地。此外，在一个富人认为体力劳动有失身份的社会里，本笃会的修士向世人证明，艰苦的体力劳动可以带来最高的理性与精神成就。

281

尽管修道主义运动在本笃时代之前就已经在西欧赢得了众多追随者，但是，本笃《会规》最终被广为接受。公元589年，本笃在卡西诺山建立的修道院被伦巴第人洗劫烧毁。大多数修士逃到了罗马，他们将本笃《会规》一同带到了罗马。在罗马，后来成为教宗的格列高利知道了本笃《会规》。罗马的许多基督徒很快就采用了这部《会规》。前去英格兰宣教的宣教士奥古斯丁还将《会规》带到了大不列颠。在教宗的支持下，本

笃《会规》传遍了西方的所有教会。虽然并没有形成一项正式的“制度”，但许多使用本笃《会规》的修道院终因共同的习俗与思想而统一起来。

教宗制度

与修院制度一起，令中世纪得以统一与延续的第二个制度是教宗制度。教宗（pope）一词意为“父亲”，在早期被用来指所有重要的、受人尊敬的主教。因此，一些文献提到了迦太基的西普里安教宗或亚历山大的阿塔那修教宗。教宗这个头衔在西方最终被专门用来称呼罗马的主教，但它在东方仍被更自由地使用。不管怎样，重要的并不是“教宗”这一头衔的起源，而是罗马的主教如何获得了他在中世纪与今天的罗马天主教中仍然享有的权力。

我们并不是完全清楚罗马主教制的起源。大多数学者同意，彼得的确到过罗马，他极有可能是在罗马去世。但是，早期不同的罗马主教名单——大部分始于公元2世纪末——不尽相同。一些主教名单记载克莱门是彼得的继任者，而另一些记载告诉我们，克莱门是在彼得去世之后的第三任主教。这令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罗马最初并非只有一位主教，而是一个“主教团”——一群共同领导教会的主教。但是，这个理论尚存争议，因为从基督徒的数量上讲，最初几百年的基督教显然在说希腊语的东方更加强大，东方的教会比罗马的教会更加重要，如亚历山大与安提阿的教会。即使是在西方，主导神学的教会也位于北非，北非的教会涌现出像德尔图良、西普里安和奥古斯丁这样伟大的神学家。

日耳曼人的入侵令教宗的权力急剧膨胀。罗马帝国在东方又存在了一千年。然而，教会在西方得以成为古代残存文明、制度和公义的保护者。日耳曼人的入侵令西方四分五裂。因此，西方最有威望的主教——罗马主教——成为西方重获统一的焦点。

这种情况的一个绝佳例子是大利奥（Leo the Great），他被称为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教宗。我们以后还会讲到，他参与了当时的神学争论——

关于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之间关系的最著名的争论。在这场神学争论中，大利奥的观点之所以没有被普遍接受，显然因为他是罗马的主教，但是，他却利用了一个有利的政治局势令他的观点获胜。当时的神学争辩主要发生在东罗马帝国，虽然大利奥的介入意义重大，但是，东方的许多主教——还有拜占庭的大多数皇帝——将他的介入视为罗马主教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无理企图。只是当更加支持他的皇帝掌权时，大利奥的观点才被更普遍地接受。这反而导致了教宗威望的增长。

然而，西方的情况却不同。公元452年，阿提拉（Attila）带领匈奴人入侵了意大利。这群来自东欧的异教徒最初想要征服君士坦丁堡，但是，拜占庭当局将他们引向了西方，其中一个原因是拜占庭当局给了他们金子。他们攻陷并洗劫了阿奎利亚（Aquileia）。罗马与阿奎利亚之间并没有驻防任何军队，他们通往罗马的大路畅通无阻。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既软弱无能，又缺乏资源，东罗马帝国又表示不愿意出手相助。正是在这时，大利奥离开罗马，去见绰号为“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的阿提拉。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在这次会晤中都说了什么。据说，阿提拉看见圣彼得和圣保罗与大利奥一同来到罗马，这让阿提拉感到害怕。不管他们说了什么，阿提拉决定不进攻罗马，他撤回北方，并在随后不久去世。

283

公元455年，当汪达尔人洗劫罗马时，大利奥仍是罗马的主教。当时，他无力阻止入侵者。但是，他领导了与汪达尔人首领盖塞里克（Genseric）的谈判，因此，他令罗马免遭汪达尔人的焚城。

无需多说，这些事件——和其他类似的事件——给了大利奥在罗马极大的权力。他之所以能够做这些事，不仅是因为他的个人天赋，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因为世俗政府无力履行它们的职责。但是，在大利奥心中，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相信，耶稣令彼得和他的继任者成为教会建基的磐石，因此，罗马的主教——彼得的直接继任者——是教会的“头”。因此，在大利奥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所有被不断收集整合以支持教宗权威的传统论点。

大利奥于公元461年去世，他的继任者是希拉里乌(Hilarius)。希拉里乌曾是大利奥的亲密同工，他继承了大利奥的政策。但是，在下一任教宗辛普里丘(Simplicius)的任期之内，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元476年，奥多亚塞废黜了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因此，意大利进入了一段漫长的政治混乱期。从理论上讲，意大利现在还是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是，教宗与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关系持续紧张，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即将讲到的神学争辩。最终，这导致了东西方教会的分裂，这次分裂用了许多年时间才得以弥合。东哥特人入侵意大利又令教会的分裂雪上加霜。他们是阿里乌派，因此，他们与先在此居住的意大利人的紧张关系在所难免。到了公元498年，他们的紧张关系导致了两位敌对教宗的出现：一位得到了东哥特人的支持，另一位得到了君士坦丁堡的支持。罗马街头发生了暴乱，因为这两位敌对教宗的支持者发生了冲突。在一系列宗教会议之后，这场冲突总算得到了解决。

新教宗是霍尔密斯达斯(Hormisdas，514—523)，在他的领导下，一系列谈判最终结束了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分裂。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在皇帝查士丁尼的领导下取得了短暂的复兴。正是在这时，贝利萨留入侵了意大利，结束了东哥特人的王国。但是，这并没有为意大利的教会带来有利的改变，因为皇帝查士丁尼和他的朝臣试图将类似于东罗马帝国的教会模式强加给意大利的教会：教会几乎完全臣服于国家。只要拜占庭帝国还占据统治地位，随后的几任教宗就只是皇帝查士丁尼和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的傀儡。胆敢采取独立政策的教宗很快就会尝到皇帝查士丁尼愤怒的严重后果。

284

作为拜占庭帝国复兴的一部分，查士丁尼重建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献给"神圣的智慧"基督。据说，当圣索菲亚大教堂完成重建时，他夸耀说："所罗门，我已经超过了你。"今天，圣索菲亚大教堂仍然矗立，但是，它现在被清真寺的尖塔所环绕，因为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四周修建了清真寺的尖塔，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建成



圣索菲亚大教堂中的这幅镶嵌画所描绘的是君士坦丁(右侧)将他的城市献给了耶稣和圣母马利亚,查士丁尼(左侧)同样将圣索菲亚大教堂献给了耶稣和圣母马利亚。

穆斯林的清真寺。

拜占庭帝国对意大利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多久。仅在东哥特人的最后一个要塞被攻陷六年之后,伦巴第人就入侵了意大利。如果他们能团结在一起,他们很快就可以征服整个意大利。但是,在取得最初几场胜利之后,他们分裂成若干个敌对的派系,这减缓了他们的进攻。公元 565 年查士丁尼去世之后,拜占庭帝国开始衰落,君士坦丁堡无法继续在意大利派驻强大的军队。因此,未被伦巴第人征服的意大利人虽然在理论上仍是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但是,他们必须自行保卫意大利。在罗马,教宗负责保卫罗马,抵抗伦巴第人的进攻。当本笃一世(Benedict I)于公元 579 年去世时,伦巴第人正在围攻罗马。他的继任者帕拉纠二世(Pelagius II)通过收买伦巴第人拯救了罗马。他当时无法得到君士坦丁堡的支援,因此,他求助于法兰克人,希望他们从北方进攻伦巴第人。虽然他与法兰克人的最初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是,这预示着未来,因为法兰克人将在未来成为教宗的主要支持者。

285

下一任教宗格列高利是有史以来最有才干的教宗之一。我们已经讲过，他派奥古斯丁及其同伴到英格兰宣教。大约于公元540年，他生于罗马的一个古老贵族家庭。查士丁尼当时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他的将军们正在意大利与东哥特人浴血奋战。查士丁尼将自己最能干的将军贝利萨留召回君士坦丁堡，战争陷入了僵局。东哥特人的国王托提拉(Totila)继续进攻了一小段时间。公元545年，他包围了罗马，第二年，罗马投降。当时，执事长帕拉纠(后来的教宗帕拉纠二世)出城迎接获胜的东哥特国王托提拉，因此从他那里得到了一定的宽容。格列高利当时可能就在罗马，他目睹了围城所带给人民的苦难以及帕拉纠二世代表罗马所进行的斡旋。不管怎样，格列高利所了解的罗马已与辉煌的古罗马不可同日而语。在托提拉攻陷罗马不久之后，贝利萨留和拜占庭人重新夺回了罗马，但是，他们随即又失去了罗马。在多年的忽视与不断的围攻之后，罗马陷入了严重的混乱与治理不善的状态。为了修补罗马的城墙，古罗马的许多纪念碑和建筑被拆毁。沟渠与排水系统年久失修，疾病肆虐。

我们几乎不知道格列高利在被围困的罗马城内的早年生活。他在成为修士之前可能一直担任罗马的要职——他的家人显然为此而训练他，因为他的家族是贵族。在成为本笃修会的修士之后，教宗本笃一世任命他为执事——行政理事会的一员。下一任教宗帕拉纠二世任命格列高利担任他驻君士坦丁堡宫廷的特使。格列高利在君士坦丁堡生活了六年，他经常被卷入君士坦丁堡愈演愈烈的神学争辩与政治阴谋。最终，帕拉纠二世于公元586年派来了另一位特使，格列高利得以重返他在罗马的修道院，并被任命为修道院院长。

罗马当时的局势非常严峻。伦巴第人最终统一起来，他们计划征服整个意大利。尽管君士坦丁堡为保卫罗马给予了一定的支援，伦巴第人偶尔也会受到后方法兰克人的攻击，但是罗马仍然极有可能沦陷。

286

罗马爆发了瘟疫，这令情况更加糟糕。不久之前，洪水毁掉了大量储备粮。病人经常产生幻觉，因此谣言四起。有人看见巨龙从台伯河(Tiber)

而出，大火从天而降。死亡笼罩着整座城市。后来，在格列高利和其他修士的帮助之下，教宗帕拉纠二世组织改善城市的卫生状况、埋葬死人、为挨饿的人提供食物。帕拉纠二世也病倒了，随后不久去世。

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多少人愿意担任教宗。格列高利本人根本就不想成为教宗，但是，神职人员和人民选择了他。他写信给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请求皇帝不要批准对他的任命——当时，在授任一个重要的主教圣职之前，通常要请求君士坦丁堡的批准。但是，他的信被中途拦截。最终，他不情愿地被任命为罗马的主教。

在成为教宗之后，格列高利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了他的新工作。他亲自组织给罗马的穷人分发食物，因为没有人做这项工作。他采取措施，保证从西西里岛驶向罗马的粮食船运不会中断。此外，他还监督重建罗马的沟渠与防御设施。他指挥卫戍部队训练，军队又恢复了士气。他几乎得不到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任何帮助，因此，他直接与伦巴第人谈判，并从伦巴第人那里争取了和平。因此，教宗格列高利阴差阳错地成为罗马及其周边地区的实际统治者，这片地区很快就被称为“圣彼得的教产”(Saint Peter's Patrimony)。在很久以后的公元8世纪，有人伪造了一份所谓的《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该文书宣称，伟大的皇帝君士坦丁已经将这片土地惠赠予圣彼得的继任者。

然而，格列高利首先自认为是一位宗教领袖。他始终在罗马各个教会讲道，呼吁基督徒重拾敬虔的信仰。他也采取措施，促进神职人员守独身。守独身逐渐成为意大利所有神职人员的生活标准，许多神职人员声称自己独身，但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此外，作为罗马的主教，格列高利还将自己视为西方的牧首。他与之前的大利奥不同，并没有声称拥有普世的权力。但是，他采取了更加实际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增强了他在西方的权力。在西班牙，他帮助西哥特人归信了尼西亚的正统信仰。他派遣以奥古斯丁为首的宣教团到不列颠宣教，这最终将罗马的权力拓展到不列颠。他写信给非洲的教会，希望解决多纳徒派的分裂。但是，他的

信并没有受到当地主教的欢迎，因为他们希望保护自己的独立。他也试图涉足法兰克人的领地，为那里的教会寻求更大的自主权。但是，他在这一方面并没有成功，因为法兰克人的统治者希望控制教会，他们没有理由听从教宗的要求。

可是，格列高利不仅是因为这些才被称为"大"格列高利——伟大的格列高利。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著作在整个中世纪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并没有表现出原创性或创造性。相反，令他最引以为傲的是他不会说出之前数百年来的伟大教父——尤其是圣奥古斯丁——没有说过的东西。对于大格列高利来说，成为希波这位伟大主教的学生就已经足够，奥古斯丁是大格列高利在教义上的一位导师。即使有着这样的愿望，大格列高利还是与他所敬爱的奥古斯丁产生了分歧。大格列高利生活在一个蒙昧、迷信和盲信的时代，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他那个时代。他选择奥古斯丁作为他一位绝对可靠的教师，但是，他却有悖于这位教师的精神。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讲，奥古斯丁的天赋在于他的钻研与敢于冒险的精神。在奥古斯丁看来尚是揣测的思想到了大格列高利这里就变成了真理。例如，希波的这位神学家提出，对于在罪中死去的人来说，可能还存在一个洁净罪的地方，他们在进入天堂之前可以在这里将罪洗净。基于奥古斯丁的这个揣测，大格列高利肯定了这样一个地方的存在，因此，他促进了炼狱教义的发展。

288

尤其是关于救恩的教义，大格列高利放宽，甚至是改变了奥古斯丁的教义。大格列高利抛弃了奥古斯丁关于预定与不可抗拒的恩典的教义，他更加关心我们如何赎罪的问题。赎罪是通过补赎实现的，补赎包括忏悔、认罪和实际的惩罚或赎罪。此外，还必须得到神父的赦罪，以此进一步确定上帝的赦免。对于在信仰和教会的团契中死去但没有为自己所有的罪进行补赎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在获得最终的救恩之前将进入炼狱。通过为死者举行弥撒，活着的人可以帮助他们摆脱炼狱。大格列高利相信，基督在弥撒或圣餐中被作为祭物再次献上（传说基督曾经在大格列高

利举行弥撒时向他显现)。这种弥撒即献祭的观念最终成为西方教会的标准教义——直到它被新教徒于16世纪否定。

大格列高利讲述了一个死在罪中的修士的故事。修道院院长——大格列高利本人——下令每天为死者举行弥撒,死者的灵魂在三十天之后向一个基督徒显现,告诉那个基督徒他已经摆脱炼狱,进入了天堂。诸如此类的故事并不是大格列高利的发明,而是当时的一种潮流和信仰。早期的基督教教师极力保护基督教信仰免于民间迷信的侵害,但大格列高利却欣然接受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故事,仿佛它们简单直接地证实了基督教的信仰。

在大格列高利继任者任期之内,教宗进入了黑暗的年代。君士坦丁堡控制了罗马。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到,东方教会因基督论之争而产生分裂,因此,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要求教宗支持他们的神学观点。拒绝皇帝要求的教宗遭到残酷的逼迫。这就出现了教宗霍诺里乌(Honorius,625—638)宣布自己是基督一志论派(monothelites)的情况。一志论派是基督论异端,他们宣称有两个本性的基督只有一个意志。若干年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下令禁止继续讨论基督论之争中的问题,但是,教宗马丁一世(Martin I)对皇帝的命令置若罔闻,后来,马丁一世被绑架到君士坦丁堡。按照皇帝的命令,马丁一世的主要支持者修士马克西姆(Maximus)被割掉了舌头和右手,与此同时,他被皇帝下令流放了。从此以后,所有神学争辩——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述——都在罗马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因为罗马无法摆脱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控制。在这一时期直到格列高利三世(Gregory III,731—741),选举产生的教宗必须在受任圣职之前得到君士坦丁堡的正式批准。

289

后来,随着拜占庭帝国的权力开始衰落,始终是个威胁的伦巴第人迫使教宗在其他地方寻找新的支持,他们选择了法兰克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教宗扎迦利同意废黜"蠢人"希尔德里克三世,并为丕平加冕。虽然扎迦利于加冕丕平的同一年(752)去世,但是,他的继任者司提反二世

(Stephen II)为丕平募集了他所要求的借款。当伦巴第人再次威胁到他时，司提反二世请求丕平的援助，丕平两次入侵意大利，并赠予司提反二世已经被伦巴第人夺取的几座城市。司提反二世不理睬君士坦丁堡的抗议，他成为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从此以后，法兰克人与教宗的联盟越来越紧密。最终，教宗利奥三世(Leo III)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将查理曼加冕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

阿拉伯人的征服

公元7世纪初，古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似乎即将复兴。大多数阿里乌派入侵者已经接受尼西亚的正统信仰。在高卢，最初就归信尼西亚正统信仰的法兰克人开始统一。在不列颠，奥古斯丁的宣教已经结出了最初的果实。拜占庭帝国仍然拥有查士丁尼收复的许多失地——尤其是在北非，汪达尔王国已经灭亡。

后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世界上一个被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遗忘的角落——阿拉伯半岛，涌现出潮水般的征服者，这股狂潮可能吞噬整个世界。在短短几年之内，波斯帝国就灭亡了，古罗马帝国的许多领地也落入阿拉伯人之手。

290

穆罕默德的教义是人类这场劫难背后的驱动力。穆罕默德是一位有着浓厚宗教兴趣的阿拉伯商人，他了解阿拉伯的犹太教和各种基督教——其中一些是相当严重的异端。十分敬虔的穆罕默德有过一系列异梦，在异梦中，他被呼召为先知，并得到了他将要宣讲的信息。他声称，这是天使加百列启示给他的信息：只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既公义，又仁慈，他统治万物，要求万物降服于他。他的信息被以格律的形式呈现出来，就像古代的希伯来先知所做的那样。实际上，穆罕默德从得到第一个异象开始就被建议，“以你的主——造物主——的名义吟诵……吟诵！”《古兰经》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吟诵”(recitation)。穆罕默德声称，他宣讲的并不是一个新宗教，而是上帝在希伯来众先知与耶稣里的终极启示，耶稣

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但是，他并不是基督徒所宣讲的上帝。

这种宗教有五个基本要点，它们在今天被称为“五功”（Five Pillars of Islam）。第一功是清真言，“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这是绝对的一神论，穆罕默德在上帝的指导之下宣讲：“只有一位上帝，穆罕默德是上帝的先知。”第二功是萨拉赫，即礼拜，它有着时间上的具体规定。第三功是天课（*zakat*），它通常被翻译成“施舍”，但是，它的完整意义包括征税，具体来说是穷人有权拥有富人的一部分财富。在这五功之中，这一功争议最大，不同的穆斯林教派对这一功都做出了修改。第四功是赖买丹月斋戒（Ramadan），这是庆祝《古兰经》最初被赐给穆罕默德的那一月。第五功是朝觐，即去麦加朝圣，所有体格健全的成年男子在一生中至少必须到麦加朝圣一次。

多神信仰与阿拉伯人的贸易密切相关。麦加的商人担心，穆罕默德的一神教会影响他们的贸易，因此，他们反对穆罕默德的教义。穆罕默德在附近的沙漠绿洲避难，这里的麦地那（Medina）最终成为一座大都市。这次迁徙的年份是公元622年，这一年成为穆斯林纪元的开始。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联邦，这里的崇拜、民众和政治生活都遵循他所制定的方针。后来，他和他的追随者进行了一场军事与政治运动，这最终令他们掌控了麦加。穆罕默德当时颁布法令，赦免了他以前的敌人，但是，他们必须捣毁所有偶像。到了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去世时，阿拉伯半岛的大片领土已经落入穆斯林之手。

后来，哈里发（*caliph*）成为穆斯林的领袖。“哈里发”是阿拉伯语，意为“继承者”。在阿布·巴克尔（Abu Bakr，632—634）的统治之下，穆斯林在阿拉伯半岛的权力得到了巩固，他们第一次战胜了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在奥马尔·伊本·哈塔卜（Umar ibn al-Khattab，634—644）统治时期，阿拉伯人入侵了叙利亚。公元635年，他们夺取了大马士革，公元638年，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两年之后，他们成为这整个地区的主人。与此同时，另一支穆斯林军队入侵了埃及，建立了后来的开罗。公元642年，

他们攻占了亚历山大。到了公元647年，在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伊本·阿凡(Uthman ibn Affan, 644—656)的率领之下，穆斯林再次沿非洲北岸向西踏上了征服之旅。与此同时，一支穆斯林军队入侵了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的最后一位国王于公元651年去世。在此之后，穆斯林只遇到了几次小小的挫折，他们席卷了波斯这一世界上曾最为强大的帝国。

在公元7世纪后半叶，最初就存在于穆斯林内部的斗争减缓了他们的进攻。在前四任哈里发中，就有三位被暗杀。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伊本·艾比·塔列卜(Ali ibn Abi Talib, 656—661)与他对手的斗争导致了一次延续至今的大分裂：什叶派支持阿里，逊尼派支持他的对手。他们的神学分歧很小，但是，他们在一些宗教仪式上产生了分歧，尤其是关于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是否是他唯一继承人这个问题——什叶派支持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是他的唯一继承人，而逊尼派却不这样认为。

292

然而，即使因内部斗争而产生了分裂，穆斯林还在继续进攻。公元695年，迦太基陷落，许多历经正统基督徒、多纳徒派、阿里乌派和拜占庭基督徒之间各样争斗的北非人很快就接受了伊斯兰教。到了公元711年，一小群穆斯林越过了直布罗陀海峡——直布罗陀这个名字源于这一小群穆斯林的领袖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k ibn Ziyad)，他们发现西哥特人的王国摇摇欲坠，于是推翻了西哥特人的统治。穆斯林很快就征服了极北地区以外的整个西班牙。他们从西班牙穿过比利牛斯山脉，直逼西欧的腹地。公元732年，他们最终在图尔战役中被查理·马特击败，穆斯林的第一波扩张浪潮就此结束。

穆斯林的这次大扩张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臣民的不满情绪。例如，在拜占庭帝国，这种不满情绪已经促成基督一性论在一些地区增长，如在叙利亚和埃及。现在，穆斯林的统治可以取代拜占庭帝国的压迫，他们向因宗教原因而产生不满情绪的人民许诺，他们的信仰与财产会受到尊重。在征服耶路撒冷时，穆斯林所颁布的通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始终是

个争论的问题,因此,这份通告特别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在这个通告中,穆斯林将军承诺,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财产与习俗将受到尊重,他们只需"像其他城市的居民那样"交纳贡税。至于基督徒,"他们的教会和十字架"也会受到尊重。此外,不会对"任何宗教事务施加任何压力和采取任何高压的政策"。只有"希腊人"——拜占庭人——必须离开耶路撒冷,但是,他们会得到离开耶路撒冷的安全通行证。

穆斯林的入侵对基督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许多古代的基督教中心——耶路撒冷、安提阿、大马士革、亚历山大和迦太基——现在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虽然很少受到逼迫,但是,这些地区的基督徒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归信基督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尽管在这些地区的教会中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护教士,但有时只要他们为基督教辩护,就会被认为是在攻击穆罕默德,就会被判处死刑。在迦太基及其周边地区,基督教则完全消失了。在其他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广阔地区,基督教虽得到了宽容,但却停滞不前,最终也只能安于现状。

以前在近东和非洲北海岸拥有广阔领地的拜占庭帝国,现在被赶回到今天的土耳其和它在欧洲的领地。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到,拜占庭帝国的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现在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因此,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认为无需再考虑他们的意见,拜占庭帝国的正统基督教现在也无需再考虑基督一性论派和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的反对。

此外,基督教的整个地理布局也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基督教始终沿着地中海盆地发展。现在,基督教沿着一条贯穿南北的轴线形成了新的中心,包括不列颠、法兰克王国和意大利。君士坦丁堡越来越远离这个轴心。因此,发生下面的事情绝非偶然:在阿拉伯人征服浪潮数年之后,教宗于公元800年将查理曼加冕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教宗和查理曼都不去理会君士坦丁堡的抗议。

在神学领域,伊斯兰教也影响到基督教,这不仅在于基督教涌现出许多护教士——他们在穆斯林控制的地区内外著述——也在于基督教领袖

回应穆斯林批评的方法，尤其是他们在回应关于使用圣像的争辩和阐释三位一体教义时所使用的方法。圣像之争在公元8世纪十分高涨，而穆斯林声称三位一体的教义否定了一神信仰。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穆斯林的入侵和基督教对此的回应继续并加速了长久以来始终在进行的基督教军事化。最早期的基督徒奉行耶稣的教导，他们是严格的和平主义者。但是，随着基督教在军队中结出了果实，基督徒逐渐开始妥协。早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前，一些基督教作家就认为，严格的和平主义只是对修士的要求。在君士坦丁之后，基督徒发现自己现在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与秩序的使命，于是他们发展出正义战争论，这令基督徒可以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使用暴力。后来，从北方来了日耳曼入侵者，从南方来了穆斯林入侵者。日耳曼人被同化了，教会在日耳曼人被同化的过程中也逐渐接纳了他们的战争传统。穆斯林不断威胁到教会，教会只能依靠武力阻止他们，结果，基督教被彻底军事化了，几百年后，基督教向穆斯林发动了战争——十字军东征，同穆斯林入侵者以前犯下的种种罪行相比，十字军的残暴毫不逊色。这就令那个时代充满了暴力与怀疑，以致在五百年之后，人们还在品尝那个时代所结出的恶果。

第二十八章

东方的基督教

当我无书可读时，当像荆棘一般折磨我的思想令我厌倦读书时，我便去教堂崇拜，这是唾手可得、治愈每一种灵魂疾病的良药。新颖生动的圣像引起了我的注意，吸引了我的目光……渐渐令我的灵魂赞美上帝。

——大马士革的约翰

我们在上一章集中讲述了西方的基督教，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与此同时还有东方的基督教。对于当时东西方的基督徒来说，他们自认为还是只有一个教会。但是，历史学家现在可以看出，中世纪早期的东西方教会已渐行渐远，最终于1054年发生的彻底分裂正在酝酿中。除了说拉丁语的西方与说希腊语的东方在文化上的明显差异之外，东西方的政治进程也令东西方教会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势之下。在西方，罗马帝国的灭亡留下一个权力真空，教会填补了这一空白，因此，教会领袖——尤其是教宗——逐渐拥有了政治权力。在东方，罗马帝国又存在了一千年。虽然经常受到外国入侵和国内动乱的搅扰，但是，拜占庭帝国还是存活下来。拜占庭帝国的独裁皇帝牢牢控制着教会领袖。这通常会导致世俗权力干涉教会事务，尤其是神学争论。为了打败依靠论证所难以驳斥的对手，神学争论中的各方可能会去争取皇帝的支持，因此，许多皇帝令政治因素成为神学争论的基础，这甚至导致了更加激烈的论辩，可是，这种情况却令神学争论有了污点。因此，在中世纪早期，神学争论成为东方

基督教的标志之一。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神学争论微不足道。当时面临的问题通常都对福音至关重要。此外，当时的基督徒自认为同属一个教会，因此，东方教会所规定的教义——有时西方教会很少或根本就没有参与其中——被视为东西方教会共同的标准教义。最终，因为这些神学争论，基督教出现了第一次永久性的分裂，并从中产生了今天仍然存在的彼此分立的教会。

296

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前的基督论之争

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325 年）和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381 年）解决了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圣子（和圣灵）的神性问题。虽然罗马帝国之外的一些日耳曼人归信了阿里乌主义，他们随后入侵西欧，导致阿里乌主义的短暂复兴，但是，阿里乌主义最终还是销声匿迹，基督徒就三位一体教义达成了基本共识。可是，仍然存在其他导致严重神学分歧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神性与人性如何在耶稣基督里联合在一起。这就是基督论的基本问题。

就这个问题而言，东方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神学思潮，历史学家出于方便而将它们称为安提阿学派和亚历山大学派——尽管并不是有亚历山大学派思想的神学家都来自亚历山大，也不是有安提阿学派思想的神学家都来自安提阿。这两个学派都同意，上帝是永恒不变的。可是，问题在于永恒不变的上帝如何与一个短暂易变的历史人物联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两个学派产生了分歧。亚历山大学派像几百年前的克莱门和奥利金那样，强调耶稣作为上帝真理教师的意义。为了成为上帝真理的教师，救主耶稣必须完全清晰地启示出上帝，他的神性必须得以肯定，即使这样做会牺牲他的人性。另一方面，安提阿学派认为，因为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所以他必须拥有完全的人性。毫无疑问，耶稣也同样具有神性；但是，这不能理解为耶稣的神性减损或超过了耶稣的人性。亚历山大学

派和安提阿学派都同意，耶稣既具有神性，又具有人性，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耶稣的神性与人性的联合。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似乎令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以前主要受到早期希腊哲学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家，通过对比人类的所有局限性来定义上帝。上帝是不变的，人类则不断变化；上帝是无限的，人类是有限的；上帝是全能的，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上帝是永恒全在的，人类只是在某个时间存在于某个地方。当人性与神性被这样定义时，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道成肉身——上帝临在于人类以及神性与人性的完全联合——就成了一个矛盾的命题。（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说过，这就像要求某人做出一个热的冰激凌。我们可以溶化冰激凌，我们可以混合各种成分，我们可以将冰淇淋与一些热的东西放在一个盘子中，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做出热的冰激凌。）当问题被这样提出时，解决这个困境的唯一方法是，要么肯定神性与人性并没有真的联合，要么肯定神性超越了人性，神性胜过了人性的自然局限性。前者是安提阿学派的观点，后者是亚历山大学派的观点。

297

这些问题在西方并没有引起像在东方那样的激烈争论。首先，在日耳曼人入侵之后，其他更为紧迫的问题亟待解决。其次，西方只是重新提出了德尔图良的老信式：在基督里，两个实质联合在一个位格之中。这样，在东方的亚历山大学派与安提阿学派之间，西方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因此，西方可以体面地退出基督论之争。

早在三位一体的问题得以解决之前，最早的基督论之争就已经开始了。老底嘉的阿波利拿里（Apollinaris of Laodicea）是尼西亚三位一体教义的捍卫者之一，他认为他可以通过解释上帝永恒的道如何在耶稣里成为肉身来帮助尼西亚事业。为此他声称，上帝的道，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在耶稣里取代了理性灵魂。耶稣同全人类一样，拥有物质的肉体，给予所有人生命的同一本质将肉体生命给予了耶稣。但是，他并不拥有人类的理性。上帝的道在耶稣里面所起到的作用，就是理性或“理性灵魂”

在所有人里面所起到的作用。

虽然阿波利拿里似乎对自己的解释感到满意，但是，许多神学家很快就看到了其中的缺陷。完全拥有上帝理性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人。从亚历山大学派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耶稣只需真的像上帝一样讲话，他只需有与我们相通所必需的肉体。但是，安提阿学派坚持认为这还不够。耶稣必须是真实的人。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耶稣必须取得人性才能拯救人类。只有耶稣成为真实的人，耶稣才能真正拯救我们。如果耶稣并没有完全取得人性，耶稣就不能完全拯救人类。纳西盎的格列高利（卡帕多西亚三杰之一）是这样说的：

> 如果有人相信，耶稣基督是没有人类理性的人，那么，他们才是没有一丝的理性，他们并不配得救恩。因为如果耶稣基督不取得人性，他便无法施行拯救。耶稣基督拯救他使之与自己神性联合的人性。如果只有半个亚当堕落，那么，耶稣基督可能只取得半个人性，拯救半个亚当。但是，如果人性完全堕落，那么，人性就必须完全与上帝的道联合，目的是人性能够完全获得拯救。[1]

298

在几次争辩之后，阿波利拿里的理论被否定了，最初是被许多主教和他们召开的地方宗教会议所否定，最后是被公元 381 年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所否定——此次大公会议重申了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针对阿里乌主义所做的决议。

后来的基督论之争是由聂斯脱利突然引发的。聂斯脱利代表着安提阿学派，他于公元 428 年成为君士坦丁堡牧首。政治阴谋始终伴随着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之职，因为这个圣职已经成为安提阿牧首与亚历山大牧首的冲突点。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已经宣布，君士坦丁堡主教在东方拥

---

① Gregory of Nazianzus, *Epistle*, 101.

有的地位类似于罗马主教在西方拥有的地位。这只是在承认政治事实，因为君士坦丁堡已经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但是，安提阿和亚历山大的教会更加古老，它们的主教不满自己被降到从属地位。他们将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职变成了奖赏他们支持者的奖品。在这场角逐中，安提阿比亚历山大更为成功——君士坦丁堡的大多数牧首都是安提阿人，因此，亚历山大牧首将他们视为敌人——我们在讲述约翰·克里索斯托的生平时就已经讲到了这种情况。因此，聂斯脱利的地位并不稳定，亚历山大人盼望找到他犯错的机会将他擒获。

299

聂斯脱利真的犯错了，因为他宣称，马利亚不应当被称为上帝之母（*theotokos*）——生上帝的人，他建议将马利亚称为基督之母（*Christotokos*）——生基督的人。新教徒难以理解这里争论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被教导要否定马利亚是“上帝之母”的观念，乍一看，马利亚似乎是争论的关键。但是，争论的问题其实不是马利亚，而是耶稣。问题也不是应当给予马利亚何等殊荣，而是我们应当如何定义耶稣的降生。当聂斯脱利宣称马利亚是基督之母，而不是上帝之母时，他所肯定的是，说到成为肉身的主时，我们可以、也必须区分耶稣的人性与神性，我们说到耶稣的事情，有些涉及他的人性，有些涉及他的神性。这是安提阿学派的典型观点，因为他们试图通过区分耶稣的人性与神性来保全耶稣的完整人性。聂斯脱利和其他安提阿学派神学家担心，如果耶稣的人性与神性被过于紧密地联合在一起，耶稣的神性会超越耶稣的人性，这样就不能再说耶稣是完全的人。

为了解释这个观点，聂斯脱利宣称，耶稣有“两个本性和两个位格”，一个是神的本性与位格，另一个是人的本性与位格。人的本性与位格是马利亚所生；神的本性与位格则不是。我们并不完全理解聂斯脱利所要表达的意思，因为“位格”与“本性”这两个术语能够以不同的意义来使用。但是，他的敌人立即就看出了将救主耶稣“分成”两个存在的危险，因为耶稣的神性与人性的统一在于一致，而不在于任何实际的联合。其他许多神学家很快就相信，聂斯脱利的教义确实是危险的。

不出所料，亚历山大成为反对聂斯脱利的中心，同聂斯脱利相比，亚历山大的领袖、主教西利尔是一位更有才干的政治家和神学家。他确信自己已经得到了西方教会和皇帝瓦伦提安三世与狄奥多西二世的支持，因为基督有两个位格的教义在西方教会看来应当受到咒诅。后来，两位皇帝于公元431年6月在以弗所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

聂斯脱利的主要支持者安提阿的约翰（John of Antioch）及其追随者被耽搁了。以弗所大公会议在等待两周之后召开，尽管这遭到罗马使节和一些主教的抗议。此次大公会议随后审理了聂斯脱利案，在禁止聂斯脱利为自己辩护的情况下判他为异端，并革除了他的教职。

300

安提阿的约翰和他的追随者几天后来到了以弗所，他们随后召开了一次敌对会议，但是，他们会议的规模远远小于西利尔的会议，他们的会议宣布西利尔是异端，并恢复了聂斯脱利的教职。作为报复，西利尔的会议重申了对聂斯脱利的谴责，同时也谴责了安提阿的约翰和所有参加其会议的主教。最终，狄奥多西二世出面干预，他逮捕了西利尔和约翰，并宣布他们召开的这两次会议无效。随后是一系列谈判，这些谈判产生了一份《联合信条》（formula of union），公元433年，西利尔和约翰都在这份信条上签了字。当时还规定，西利尔的会议对聂斯脱利所采取的行动仍然有效。至于聂斯脱利，他的余生都在流亡中度过，他先是流亡到安提阿的一座修道院，后来他在安提阿对于抛弃了他的朋友们很尴尬，于是他又流亡到偏远的佩特拉（Petra）。

就这样，基督论之争的第二个阶段以亚历山大的胜利告终。但是，随后的休战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444年，当狄奥斯库若继西利尔之后成为亚历山大的牧首时，第三次更加激烈的交锋即将上演，因为狄奥斯库若是亚历山大学派最极端观点的忠实捍卫者，他还是一位不择手段的阴谋家。

这场风暴的焦点是君士坦丁堡一个修士欧迪奇（Eutyches）的教义。欧迪奇缺乏神学上的敏锐，他认为，救主耶稣"与圣父同质，但是，他不与

我们同质”。他似乎是要说，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出于两个本性，但是，在道成肉身之后他只有一个本性”。我们并不完全理解欧迪奇这些话的意思。但不管怎样，由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弗拉维安（Flavian）的神学承袭了安提阿学派的传统，所以他认为欧迪奇的教义近似于幻影论，谴责了欧迪奇。狄奥斯库若通过各种伎俩令这场神学争论升级为一场波及整个教会的冲突，因此，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下令于公元 449 年在以弗所召开一次宗教会议。

当此次会议召开时，狄奥斯库若和他的支持者显然采取了所有必要的措施，以确保他们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狄奥斯库若本人被皇帝任命为此次会议的主席，他得到了决定谁可以发言的权力。此次会议采取了亚历山大学派的极端立场。罗马教宗利奥一世的特使希望向此次会议提交利奥就当前问题所撰写的一封信函——通常被称为《利奥大卷》（*Leo's Tome*），但是，他们遭到了拒绝。弗拉维安受到了残暴的对待，并在几天之后去世。基督有两个“本性”的教义被判为异端，所有支持安提阿学派观点的基督徒也被谴责为异端，即使是温和的安提阿学派。此外，会议还规定，所有拒不接受此次会议决议的基督徒都不得担任圣职。

301

在罗马的利奥一世愤怒了，他将此次会议称为“强盗会议”（Robber Synod）。但是，他的抗议无效。显然，狄奥多西二世和他的朝臣从亚历山大收受了大量金币，他们认为，基督论之争已经结束了。

后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狄奥多西二世的坐骑失足，他从马上跌落摔断了脖子。他的姐姐布尔开利亚（Pulcheria）和她的丈夫马喜安（Marcian）继承了他的皇位。布尔开利亚之前同意西方的观点，认为应当谴责聂斯脱利，因为他的教义威胁到耶稣的神性与人性的联合。但是，她不是极端的亚历山大派，她认为，公元 449 年的以弗所会议还留有很大的余地。因此，她应利奥一世的请求，于公元 451 年在卡尔西顿又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此次会议最终成为第四次普世大公会议。

此次大公会议谴责了狄奥斯库若和欧迪奇，但赦免了两年前参加以

弗所"强盗会议"的其他主教。利奥一世的信函最终被宣读，许多主教宣布，利奥的信函表达了他们的信仰。此次大公会议重申了德尔图良在几百年前提出的信式：在基督里，"两个本性联合在一个位格之中"。最终，此次大公会议发表了一份并不是信经的信仰声明：《信仰定义》（*Definition of faith*），或澄清教会所相信的真理。如果仔细阅读这份《信仰定义》，我们就会发现，在否定安提阿学派和亚历山大学派的极端教义，尤其是欧迪奇的教义的同时，《信仰定义》再次肯定了前三次大公会议所做的决议，即公元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公元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和公元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的决议：

> 因此，我们都追随众圣教父，异口同声地教导信徒们承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既是真神，又是真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与身体；就其神性而言，耶稣基督与圣父同质，就其人性而言，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质，除罪之外，完全与我们相像；按其神性，耶稣基督在万世之先由圣父所生，按其人性，耶稣基督后来由上帝之母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
> 这同一位基督、圣子、主、独生子具有二性，此二性不可混淆、不可改变、不可分割、不可离散。此二性的联合并没有破坏此二性之间的差异，各性的特点反得保留，并联合在一个位格和一个实质之中。此二性并没有被分割成两个位格，而是属于一位独生的圣子、上帝的道、主耶稣基督。古代众先知这样预言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自己和众教父传给我们的信经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这份《信仰定义》没有通过解释耶稣基督神人二性联合的方式来"定义"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而是界定了错误的神人二性教义的界限。因此，《信仰定义》否定了认为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联合破坏了"神人二性之间的差异"，以及救主耶稣基督被"分成两个位格"

的教义——因此否定了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最极端的教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被这样界定的救主耶稣基督，同福音书中的耶稣基督相距甚远，可见，这种界定深受经外思想的影响。但是，考虑到提出耶稣基督神人二性这一问题的方式，我们也的确难以想象，为了捍卫道成肉身的真实性，参加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主教还能做些什么。

在西方的所有教会和东方的大部分教会中，《信仰定义》很快就成为了正统基督论的标准——尽管还有一些东方教会拒绝接受《信仰定义》，并因此导致了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漫长的分裂。一些主要来自叙利亚和波斯帝国的基督徒坚持认为，必须明确区分基督的神人二性，他们最终被称为"聂斯脱利派"。还有许多基督徒则走上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们否定基督具有"神人二性"的教义，因此被称为"基督一性论派"——这个术语源自希腊文 *monos*（一个）和 *physis*（本性）。但是，他们当中也有一小部分基督徒接受了欧迪奇的教义。他们所关注的是，对于主耶稣的神性与人性不能过分区分，以至于让道成肉身失去意义。此外，政治与民族因素也助长了已激烈进行数百年的基督论之争。

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后的基督论之争

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制定的《信仰定义》并没有结束基督论之争，尤其是东方的基督论之争。埃及的许多基督徒认为，狄奥斯库若是殉道士，弗拉维安和利奥一世是异端。叙利亚的许多基督徒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埃及和叙利亚，基督徒憎恨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府，因为中央政府在埃及和叙利亚征税，但是并没有给予他们相应的回报，这也促使他们在神学上反对君士坦丁堡。此外，自从罗马帝国最初征服埃及和叙利亚以来，这里始终存在着从未解决的文化与民族矛盾。为了重获埃及人和叙利亚人的忠诚，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试图在神学上找到令埃及人、叙利亚人和信奉卡尔西顿信仰的基督徒都能满意的妥协。但是，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人民不满的原因并非只有神学。总而言之，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所采取的

一切做法，只是进一步疏远了信奉卡尔西顿信仰的基督徒和其他基督徒，他们迫使教会陷入无休止的神学争论之中。

第一位采取这种不明智政策的皇帝是巴西利斯库斯（Basiliscus）。他废黜了皇帝芝诺，又于公元 476 年废除了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决议。他希望再召开一次大公会议，但是，他的愿望并未实现，因为芝诺重新夺回皇位，巴西利斯库斯再次召开大公会议的计划破产了。后来，芝诺于公元 482 年颁布了《联合敕令》（*Henoticon*，或 Edict of Union），他在《联合敕令》中命令一切信仰必须回到基督论之争之前的普遍信仰。但这又导致了新的争论，因为许多基督徒，尤其是教宗菲利克斯三世（Felix III）声称，皇帝无权规定人们的信仰。芝诺得到了君士坦丁堡牧首阿卡西乌（Acacius）的支持，因此，这场争论导致了罗马主教与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公开决裂。“阿卡西乌分裂”（Schism of Acacius）导致了东西方教会的分裂，这次分裂一直持续到两位主教去世很久之后。到了公元 519 年，皇帝查士丁（Justin）与教宗霍尔密斯达斯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实际上就是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决议。

查士丁的继任者是他的侄子查士丁尼。查士丁尼是拜占庭帝国最有才能的一位皇帝，他夺回了北非和意大利，恢复了拜占庭帝国军队的声誉。他重建圣索菲亚大教堂，又编撰了一套完整的法典。他认为，持有卡尔西顿信仰的基督徒与基督一性论派的分歧，主要是因为措辞，双方可以通过一系列会议与对话和解。很久以后的基督教思想史家认为，查士丁尼在这一点上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看似纯粹的神学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更难以解决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冲突的结果。查士丁尼恢复了一些在查士丁统治时期被废黜的基督一性论派主教的教职，其中一些主教甚至还受到邀请，访问了查士丁尼和他妻子狄奥多拉的皇宫。查士丁尼在自己的皇宫中热情恭敬地接待了他们。

公元 532 年，在查士丁尼的敦促之下，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次神学会议。当时最杰出的卡尔西顿神学家——拜占庭的莱昂提乌（Leontius of

Byzantium）解释了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信仰定义》，他的解释令一些基督一性论派领袖宣布，和解之路已经畅通无阻。其中一位领袖甚至宣称，他愿意接受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信仰定义》。到了此次会议结束时，许多基督徒都希望教会的分裂尽快结束。

然而，查士丁尼错误地认为，他不用谴责卡尔西顿大公会议本身，而只是谴责令那些反对者特别讨厌的三位安提阿学派神学家的著作，即可重获那些依然否定该大公会议的臣民的效忠。这三位安提阿学派神学家是摩普绥提亚的西奥多（Theodore of Mopsuestia）、居鲁士的狄奥多勒（Theodoret of Cyrus）和埃德萨的伊巴斯（Ibas of Edessa）。随后爆发的基督论之争通常被称为“三章争论”（Three Chapters Controversy）。查士丁尼是正确的，因为基督一性论派的确最讨厌安提阿学派这三位神学家的基督论。但是，这场神学争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查士丁尼最终被迫于公元553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次会议。此次会议最终被称为第五次普世大公会议。该会议在查士丁尼的敦促下谴责了“三章”。（许多与会者反对谴责过世已久、且并没有被其同代人宣布为异端的那三位神学家——西奥多、狄奥多勒和伊巴斯。因此，此次大公会议没有直接谴责他们，而是谴责了他们著作中最令基督一性论派讨厌的内容。）但是，这并没有满足希望看到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决议被撤销的基督一性论派，因此，查士丁尼的所有努力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成效。

304

最后一位希望重获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反对者效忠的皇帝是公元7世纪初的赫拉克利乌（Heraclius）。君士坦丁堡牧首塞尔吉乌（Sergius）提出，基督的确有两个本性，但是，基督只有一个意志。虽然我们并不完全理解塞尔吉乌的观点——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似乎是，上帝的意志在基督里取代了人的意志——但不管怎样，他的观点是这样被解释的。因此，反对他观点的论点类似于之前反对阿波利拿里的论点：没有人类意志的人不是真正的人。塞尔吉乌的观点被称为基督一志论（*monothelism*）——源自希腊文 *monos*（一个）和 *thelema*（意志），他的观点得到了教宗霍诺

305

里乌的支持，随后又开始了漫长的基督论之争。但是，阿拉伯人后来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叙利亚和埃及是反对卡尔西顿大公会议最为强烈的地区，因此，拜占庭帝国的政策不再寻求与这里反对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基督徒和解。公元648年，君士坦斯二世禁止再对基督有一个或两个意志的问题进行任何讨论。第六次普世大公会议最终于公元680年至公元6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此次大公会议谴责了基督一志论，并宣布教宗霍诺里乌为异端。（直到很久以后的19世纪，在关于教宗无误[Papal Infallibility]的讨论中，是否应当将教宗判为异端成为了讨论的焦点。）后来又爆发了关于使用圣像的神学争论。从某种程度上讲，圣像争论是基督论之争的最后一个阶段。在早期教会中似乎没有基督徒反对使用圣像，因为很多地下墓穴和其他早期崇拜处都装饰着描绘圣餐、洗礼和各种圣经故事的壁画。后来，当罗马帝国归信基督教时，一些重要的主教担心，当时涌入教会的大量基督徒可能会被引向偶像崇拜，因此，他们讲道时反对基督徒将圣像误用为崇拜的对象，但他们并不反对圣像。公元8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几位皇帝针对圣像采取了一些措施。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 717—741）下令捣毁许多基督徒极为崇敬的耶稣雕像，此举导致圣像争论的公开爆发。公元754年，皇帝利奥三世的儿子兼继任者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召开了一次会议，此次会议禁止使用圣像，并谴责了为使用圣像辩护的基督徒。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做出这些决定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穆斯林的出现和他们强烈反对一切偶像的教义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此外，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可能希望抑制修士的权力，因为他们几乎一致支持圣像，他们的一部分收入也源自制造圣像或偶像。不管怎样，整个拜占庭帝国很快就因圣像而分裂了：一派是“反圣像崇拜者”（iconoclasts）——捣毁圣像者；另一派是“圣像崇拜者”（iconodules）。

在圣像崇拜者中，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是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约翰生活在穆斯林统治之下，他曾在哈里发的政府中担任高

职。后来,他辞去了职务,先后成为修士和神父。他的《阐释正统信仰》(*Exposition of the Orthodox Faith*)意义重大,因为该书系统阐释了东方正统教义,该书也是在回应穆斯林的背景下写成的第一部重要的基督教著作。约翰之所以闻名于世,还因为他在神学上区分了可知——肯定神学(kataphatic theology),与神秘——否定神学(apophatic theology)。

306

大马士革的约翰和其他圣像崇拜者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正统基督论的必然结果。如果耶稣是真实的人,我们可以在他里面看见上帝,那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表现上帝的圣像?此外,第一位肖像制造者就是上帝,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但君士坦丁五世召开的会议谴责了大马士革的约翰,对此,约翰论证说:

>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我们为什么要相互尊重……以某种有形的物体来描述上帝可能是最大的狂妄与亵渎……但是,既然上帝……成为了真实的人……教父们又看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读书,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读书,他们便因此赞同以圣像这一可能的简单注释来表现那些事实。[2]

圣像之争又激烈地进行了若干年。西方教会并不理睬皇帝的法令,而东方教会却分裂了。最终,第七次普世大公会议于公元787年在尼西亚召开。此次大公会议严格区分了最高崇拜(*latria*)与二等崇敬(*dulia*),前者是唯独向上帝献上的崇拜,后者是对圣像的崇敬。虽然反圣像崇拜者曾一度重新得势,但圣像最终于公元842年被明确恢复到原来的地位——东方的许多教会今天仍将这一事件作为"正统节"(Feast of Orthodoxy)来庆祝。在西方,第七次普世大公会议的决议并不受欢迎,因为最高崇拜与二等崇敬难以用拉丁文进行区分。但是,难题最终得以解

② *On the Orthodox Faith* 4.16.

决，大多数基督徒都同意在教会中使用圣像，也同意对圣像献上有限的崇敬。

持不同信仰的东方教会

尽管西方和拜占庭帝国的教会普遍认可各次普世大公会议的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并不总能受到罗马帝国之外的东方教会的欢迎，其中就包括波斯帝国的教会。波斯帝国是罗马帝国的传统敌人，因此，波斯帝国的基督徒极力证明，他们的信仰并没有令他们成为外国人的工具。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成功，因此，他们受到了残酷的逼迫。公元410年，在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的牧首领导之下，波斯帝国的基督徒成立了自治教会。当聂斯脱利随后不久受到谴责时，许多有安提阿学派思想的神学家担心他们会再次遭到报复，于是越过边境来到波斯，定居在尼西比斯，建立了一所最终成为波斯帝国重要神学教育中心的学校。结果，波斯帝国的教会信奉了其他基督徒所说的“聂斯脱利主义”。在最兴旺的时候，波斯帝国的聂斯脱利派教会在阿拉伯半岛、印度甚至中国的宣教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不利的政治局势最终削减了聂斯脱利派的数量，今天，仅存的数千名聂斯托利派分散在世界各地。

在拜占庭帝国境内，“基督一性论派”的主要据点是埃及和叙利亚。在埃及，除了反对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决议之外，科普特人——古埃及人的祖先——也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拜占庭帝国的压迫与剥削。在城市中，许多说希腊语的基督徒十分满意当前的社会制度，他们普遍接受了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信仰定义》。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之后，科普特教会成为埃及的主要教会。信奉卡尔西顿正统信仰的基督徒被称为麦基派（Melchites）——“帝国”基督徒。科普特教会和麦基教会一直共存到今天，但是，科普特教会是较大的教会。埃塞俄比亚教会始终与埃及教会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埃塞俄比亚教会很少与其他教会直接接触。因此，埃塞俄比亚教会随同科普特教会一同否认卡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公元 781 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说明聂斯脱利派基督教至少在之前一百五十年就传到了中国。

尔西顿大公会议，埃塞俄比亚教会也就成了“基督一性论派”教会。

叙利亚也有着类似的情况，但是，叙利亚的卡尔西顿正统基督徒与“基督一性论派”的数量基本持平。“基督一性论派”的伟大领袖是雅各·巴拉德乌斯（Jacob Baradaeus）——一位不知疲倦的旅行者和组织者，他们的教会也被称为“雅各派”（Jacobite）教会。

另一个重要的“基督一性论派”教会是亚美尼亚教会。到了公元450年，当波斯人试图将他们的宗教强加给亚美尼亚时，基督教通过启蒙者格列高利的努力传到了亚美尼亚，并成为亚美尼亚的民族凝聚点。这恰巧发生在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召开之前，亚美尼亚人希望，同为基督教国家的罗马帝国会出手相助。但是，当时已经许诺援助亚美尼亚的狄奥多西二世去世了，他的继任者布尔开利亚与马喜安任由波斯人入侵亚美尼亚。亚美尼亚的一千零三十六名士兵战斗到最后，他们守住了山口，希望这样能够拖延时间，等待罗马人援助他们。但是，一切都是徒劳，波斯人侵占了亚美尼亚。就是在这个时候，布尔开利亚和马喜安召开了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亚美尼亚人当然会拒绝接受此次大公会议所做的决议。因此，亚美尼亚基督徒被称为“基督一性论派”——信仰基督“一个本性”的基督徒。而亚美尼亚基督徒则宣称，参加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主教——他们宣称基督具有神人二性——不仅是背教者，也是异端。

309

在波斯人统治之下，亚美尼亚人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与传统，他们得到了一定的自主权。后来，阿拉伯人征服了亚美尼亚。在阿拉伯人统治之下，虽然偶尔会受到逼迫，但亚美尼亚基督教仍在兴旺发展。11世纪时，土耳其人占领了亚美尼亚，他们的残暴统治迫使许多亚美尼亚人迁移到小亚细亚。在那里，亚美尼亚人建立了小亚美尼亚。但是，小亚美尼亚最终也被土耳其人征服，并以铁腕政治统治着这个地区。20世纪初，土耳其人屠杀了数千名亚美尼亚人，所有村庄被夷为平地，幸存者散居在世界各地。与此同时，老亚美尼亚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先是在苏联的统治之下，后是作为独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

这些不同的教会一直存续到今天。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它们受到了普世教会运动的影响。在所有这些教会和坚持卡尔西顿《信仰定义》的教会中，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认识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分歧，他们的分歧更多是在于措辞不同。因此，他们走上了和解之路。

阿拉伯人征服后的东正教

虽然所有教会显然都自认为是正统教会，但是，正统教会这个称谓最终成为东方卡尔西顿基督教的标志之一。因此，信奉卡尔西顿信仰的东方基督教通常被称为东正教。

在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穆斯林在东方和南方阻碍了东正教的传播，因此，东正教只能向北方和西北方传播。在日耳曼人入侵之后，斯拉夫人入侵了东欧地区，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他们占据了今天波兰的大部分地区、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和希腊。越过多瑙河的斯拉夫人至少在名义上还是拜占庭帝国的臣民，其他斯拉夫人分裂成许多部落和国家。后来，一群新的入侵者保加利亚人征服了多瑙河盆地的广阔地区，他们在这里统治着混居在一起的斯拉夫人和拜占庭帝国的前臣民。

这就是公元 862 年的局势。在这一年，一个斯拉夫人王国——摩拉维亚——的国王罗斯季斯拉夫(Rostislav)的一封信送到了君士坦丁堡： *310*

> 许多基督徒来到我们中间，有意大利人，有希腊人，有日耳曼人，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讲述真理。但是，我们斯拉夫人是天真的民族，根本就无人教授我们真理……因此，我们恳求您，为我们派来能教授我们完备真理的人。[3]

---

③ Quoted in G. Zananiri, *Histoire de l'église byzantine* (Paris: Nouvelles éditions latines, 1954), p. 185.

罗斯季斯拉夫并不像他在信中表现的那样天真。他担心自己王国中的西方宣教士会充当征服者的先锋，这在其他地区已有先例，法兰克帝国的宣教士就充当了法兰克征服者的先锋。罗斯季斯拉夫已经意识到东西方基督徒之间的敌对情绪，他试图利用他们彼此的敌对情绪来保护自己的王国，所以写了这封信。

不管怎样，罗斯季斯拉夫的请求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欢迎，这被视为扩张拜占庭帝国势力的一次良机。应罗斯季斯拉夫的请求，西利尔和他的兄弟美多迪乌(Methodius)作为宣教士被派往摩拉维亚。他们二人在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中长大，因此对斯拉夫人的语言有所了解。他们此前在克里米亚(Crimea)的宣教也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在摩拉维亚，他们受到了欢迎。西利尔发明了一种书写斯拉夫文的方法，这即是如今仍被大部分斯拉夫语族所广泛采用的西利尔字母表；他还翻译了圣经、圣餐仪文和其他一些著作。但是，西利尔和美多迪乌很快就遭到了日耳曼宣教士的反对，日耳曼宣教士声称，只有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才可以在崇拜中使用。最终，西利尔和美多迪乌来到罗马，教宗决定支持他们，但他们必须接受教宗的管辖。因此，摩拉维亚教会多年来成了君士坦丁堡、罗马和日耳曼人三股势力争夺的对象。公元906年，匈牙利人入侵摩拉维亚，摩拉维亚王国灭亡了。但是，西利尔和美多迪乌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在所有斯拉夫民族中结出了果实。最终，一些斯拉夫人信奉了西方的基督教，还有一些斯拉夫人成为了东正教徒。

与此同时，保加利亚人在巴尔干半岛日渐强大。东西方的宣教士也在他们中间宣教，他们的国王鲍里斯(Boris)也成了基督徒。鲍里斯在接受洗礼后要求君士坦丁堡牧首弗提乌斯(Photius)为他的王国任命一位大主教。弗提乌斯提出了一些问题，并要求鲍里斯满足一定的要求，因此，鲍里斯转向了教宗尼古拉(Nicholas)。尼古拉派来了两位主教，但是，他拒绝为鲍里斯任命一位大主教。最终，弗提乌斯的继任者——君士坦丁堡牧首——为保加利亚教会祝圣了一位大主教和几位主教，由他们领导



女王奥尔加的孙子是基辅公国的大公，现被称为圣弗拉基米尔，他带领臣民归信了基督教信仰。画中表现的是庆祝这一盛事，弗拉基米尔站在中央，身旁是妻子君士坦丁堡的安娜和儿子智者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将继续弗拉基米尔的工作。左边的古代军团溃不成军。画家安德鲁希夫(Andrusiw)将自己描绘为站在洗礼的水中，就在圣弗拉基米尔的正下方。

新生的保加利亚东正教。在保加利亚异教徒的短暂抵抗之后，基督教在鲍里斯的儿子西美昂(Simeon)统治时期得以巩固。公元917年，西美昂坚持保加利亚独立于拜占庭帝国，他自封为“沙皇”——凯撒或皇帝。十年之后，保加利亚教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保加利亚的大主教被封为牧首。尽管拜占庭教廷最初将保加利亚教会的这种行为视为篡权，但是他们最终与保加利亚教会和解了。



然而，东正教在宣教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功是俄罗斯归信了基督教。公元950年左右，基辅公国的女王奥尔加(Olga)归信了基督教，日耳曼宣教士为她施行了洗礼。但是，在她的孙子弗拉基米尔(Vladimir，980—1015)统治时期，基督教才开始取得重大进展。因为一些我们并不完全清楚的原因，弗拉基米尔请求拜占庭帝国为他派来宣教士，而不是请求西方教会。他和他的许多臣民于公元988年接受了洗礼，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教会通常被认为是在这一年诞生的——因为基辅的王子最终在莫斯科施行统治，而莫斯科在弗拉基米尔归信基督教时还只是一座小村庄。弗拉

基米尔在劝导自己臣民归信基督教的过程中使用了武力，但是，关于他使用武力的程度尚存一些疑问。他的儿子智者雅罗斯拉夫（Yaroslav the Wise，1019—1054）加强了与君士坦丁堡的联系，并与罗马越走越远。公元1240年，蒙古人入侵了俄罗斯。在蒙古人统治俄罗斯的二百多年中，基督教成为维系俄罗斯民族统一的纽带，基督教使得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存活下来，并最终赶走了入侵者。16世纪初，在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之后，俄罗斯宣布，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莫斯科的统治者成为沙皇，莫斯科的主教成为牧首。

在阿拉伯人的征服之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不断恶化。查理曼复辟了西罗马帝国，这就意味着，教宗不再需要拜占庭帝国的支持。关于使用圣像的漫长争论令西方相信，东方教会只是皇帝手中的傀儡。所有这一切导致了西方所说的“弗提乌斯分裂”（Schism of Photius，867）。在一场废黜了牧首伊格纳修（Ignatius）的革命之后，弗提乌斯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牧首。弗提乌斯和伊格纳修都向教宗尼古拉求助，但是，尼古拉站在了伊格纳修一边。弗提乌斯随后宣布，西方的所有教会都是异端，因为它们篡改了《尼西亚信经》，指责它们在《尼西亚信经》中加入了和子（*Filioque*）一词——“和从圣子”，而以前的《尼西亚信经》说圣灵是“从圣父”而出。弗提乌斯认为，如果在《尼西亚信经》中加入“和子”一词，那么西方人不仅篡改了《尼西亚信经》，还篡改了古人对三位一体的理解——圣灵是“从圣父，通过圣子”而出。

对《尼西亚信经》的这个改动最早似乎出现在西班牙，又从西班牙传到了法国。到了查理曼时代，在亚琛（Aachen）皇家礼拜堂中背诵的《尼西亚信经》就有了“和子”一词。当一些来到东方的法兰克修士背诵加入了“和子”一词的《尼西亚信经》时，东正教徒将此举视为丑闻，他们要求知道，是谁授权法兰克人改动古代大公会议所制定的信经。此外，突然崛起的法兰克人是古老的拜占庭帝国的政敌，东西方之间始终缺乏相互信任，这些又令“和子之争”雪上加霜。

“和子之争”的一个副产品是《古罗马信经》被重新启用，现在，《古罗马信经》被称为《使徒信经》。教宗既不希望疏远拜占庭人，也不希望疏远法兰克人，于是他开始使用这个几乎已被人们遗忘的古代信经。最终，《使徒信经》凭借罗马的影响力取代了《尼西亚信经》，成为在西方基督徒中最被广泛使用的信经。

当君士坦丁堡的政局发生变化时，伊格纳修重新成为牧首，当时达成的一项协议是，弗提乌斯将成为下一任牧首。但是，分裂所造成的伤痛犹在，并最终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东西方教会于公元 11 世纪彻底分裂了。保加利亚大主教奥赫里德的利奥（Leo of Ochrid）指控西方教会犯了错，因为西方教会将神职人员的独身规定为东西方所有教会的教规，西方教会还在圣餐中使用了无酵饼。随着争辩的不断升级，教宗利奥九世（Leo IX）派出一位特使到君士坦丁堡处理此事。但是，他的这一选择是最不幸的。他的特使枢机主教洪贝尔（Humbert）根本就不懂希腊文，也不愿意学习希腊文。他是一位热情的改革家，他的改革计划包括神职人员独身以及教会独立于世俗统治者。在洪贝尔心中，东方教会已婚的神职人员和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对教会所拥有的权力，正是他发誓要消灭的敌人。他与君士坦丁堡牧首米歇尔·瑟如拉留（Michael Cerularius）相互咒骂。最终，在 1054 年 6 月 16 日，当牧首米歇尔·瑟如拉留准备举行圣餐时，枢机主教洪贝尔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他走上高高的圣坛，以教宗的名义——教宗实际上已在不久之前去世——当众将准备好的教宗绝罚谕放到圣坛之上，将“异端”米歇尔·瑟如拉留和所有胆敢追随他的基督徒全部革除教籍。随后，枢机主教洪贝尔愤然离开，启程返回罗马。东西方教会彻底分裂了。

313

第二十九章

罗马帝国的复兴与持续的衰落

掌权者们注意了……掠夺属于教会的财产是你们在为自己定罪……要知道，教会的财产是信徒的希望，是穷人的遗产，是为赎罪所付出的代价。

——兰斯的辛克马尔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克洛维接受洗礼304年之后，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教宗利奥三世手持皇冠走向了法兰克人的国王查理曼，他将皇冠戴到查理曼的头上后高呼："愿上帝将生命赐予这位伟大和平的皇帝！"而在324年之前，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被废黜。在查理曼被加冕的同时，教宗利奥三世复兴了古罗马帝国，现在，古罗马帝国在教会的庇护之下得以重生。

查理曼的统治

当教宗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时，这位皇帝统治着西方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一个重要的例外是不列颠。但是，早在被加冕为皇帝之前，查理曼在帝国东部边境与撒克逊人及其盟友弗里西亚人（Frisians）的数场战争，就已经让当时还只是法兰克人国王的他将领地扩张到了古罗马帝国之外。

与撒克逊人和弗里西亚人的战争漫长而又血腥。查理曼不断入侵他们的领地，迫使他们屈服，但是，他一旦离开，他们就再次起义。查理曼决

心以屠杀之血与洗礼之水镇压起义：顽固不化之人惨遭屠杀，其他人则被强迫接受了洗礼。到了公元784年，弗里西亚人放弃了抵抗；一年之后，撒克逊人的最后抵抗也被瓦解，数以千计的撒克逊人被迫接受了洗礼。316 这一变化意义重大，因为许多撒克逊人始终相信，接受洗礼就等于背弃他们的神祇，他们的神祇也会因此而遗弃他们。所以，一旦接受洗礼，他们就只能信靠基督教的上帝。不管怎样，强迫洗礼的结果是，在撒克逊人中很快就出现了基督教领袖，他们后来采取类似的方法，让他们的邻舍也归信了基督教。

查理曼也将自己的权力扩张到了西方。他对西班牙发动的第一场战争是一场灾难。他之所以会入侵伊比利亚半岛，是因为一些穆斯林领袖许诺支持他，但是，他们从未兑现自己的承诺。在率军回国途中，查理曼的后卫部队在伦塞斯瓦列斯（Roncesvalles）遭到伏击，也许是巴斯克人（Basques）伏击了他的部队——这一事件促成了现存最早的重要法文著作《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并影响到此后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后来，查理曼的军队在西班牙建立了一个据点，他们征服了远到埃布罗河 317（Ebro River）的广阔土地，又在那里建立了西班牙边地。此外，当阿斯图里亚斯的阿方索二世（Alfonso II of Asturias）为从摩尔人手中重夺伊比利亚半岛，开始了与他们的漫长战争时，他也得到了查理曼的支持。

作为皇帝的查理曼认为，他得到在世俗与教会事务中管理自己臣民的呼召。他像任命将军那样任命主教，不过，他总能找到称职的人选。他颁布的法律规定，要用普通百姓的语言讲道，星期天是休息和崇拜的日子。他征收什一税，仿佛什一税就是国家的正常税收。修道主义已经今非昔比，修士失去了他们最初的修道热情，许多修道院院长将他们的圣职视为谋取财富与权力的一种手段。查理曼决定，修道制度必须彻底改革。他将这项工作委托给本笃（不是写本笃《会规》的那个本笃）。本笃为成为修士而放弃了他在宫廷中的职务，他因自己的智慧与敬虔而深受敬重。现在，查理曼任命他为阿尼亚纳皇家修道院院长，查理曼希望，阿尼亚纳

的本笃能树立好的榜样，帮助他领地内的其他修道院走上正轨，遵守本笃会的《会规》。

虽然查理曼本人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支持教育。他恢复并改革了现存的学校，将自己在意大利结识的执事约克的阿尔昆（Alcuin of York）召到了宫廷，阿尔昆把在爱尔兰与不列颠修道院中保存下来的知识先后传授给法兰克人。查理曼还从西班牙带回了西奥多夫（Theodulf），任命他为奥尔良（Orleans）的主教，西奥多夫下令，他教区中的每个教会都必须有一所同时向穷人和富人开放的学校。其他主教很快就纷纷效法西奥多夫的做法。此外，大批学者涌入查理曼的领地，因此出现了一次重要的知识大复兴。

查理曼帝国的荣耀在这位伟大的皇帝去世之后并没有持续多久。他的儿子路易是一位尽责的统治者，但却不是一位优秀的伯乐。他致力于改革修道院，早在公元814年成为皇帝之前，他就要求阿尼亚纳的本笃改革阿基坦（Aquitaine）的修道院——他像国王一样统治着这里的修道院。在路易成为皇帝之后，公元817年的帝国会议按照他的意愿，下令所有修道院必须在阿尼亚纳的本笃的领导之下进行改革，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不得佩戴金银首饰和穿戴华丽的服饰。此次帝国会议还规定，交纳什一税是所有臣民的义务，要将什一税三分之二的收入分给穷人。最后，此次帝国会议希望给予教会更大的自主权，因为会议决定恢复由人民和神职人员选举主教的古老习俗。但是，包括一些主教在内的许多人利用了路易的好脾气，在路易统治的最后几年，内战爆发了，路易的儿子和他们的党羽相互开战，他们甚至还向皇帝路易发难。路易不断打败叛党，又不断赦免了他的敌人；但是，他的宽宏大量并没有让他更受拥戴，反而助长了更多的叛乱，甚至曾经被他赦免的敌人也再次造反。在他去世之后，帝国被他的三个儿子瓜分。在路易的孙子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 of France，公元881—887年在位）的统治之下，古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再次统一。但是，这些地区在胖子查理去世之后再次分裂。除了内部分裂和内战之

318

外，挪威人和其他人的掠夺与入侵也困扰着查理曼帝国。

阿拉伯人的征服也对西欧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阿拉伯人入侵之前，地中海沿岸贸易繁荣，西欧甚至与东方也有贸易往来。现在，阿拉伯人阻断了通往东方的道路，他们统治着地中海的南岸与东岸。虽然亚得里亚海（Adriatic）和欧洲北海岸的运输业仍然存在，但是，大规模的贸易被中断，每个地区必须自力更生。货币一度停止了流通，人们几乎看不到金币，西欧进入物物交换的经济时代。

在这样的环境中，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土地，而不是金钱。国王和其他封建领主通常用土地奖赏为他们效劳的人。封建制度就这样诞生了。封建制度是一种基于土地占有的等级制度；每一个封建领主都效忠于赐予他土地的更大领主，与此同时，赐予者也得到所赐之人的效忠。起初，赠予的土地是终身制的。但是，土地最终变成了世袭制。一位封臣通常会得到不同领主赏赐的土地，因此他就可以声称，如果他效忠一个领主，就不能同时效忠另一个领主，所以他总能以此逃避应尽的义务。这一切的结果是西欧的政治与经济产生分裂，所有集权都衰落了，包括国王的权力。

教会也受到了影响。主教辖区和修道院通常占有广阔的土地，因此，主教和男女修道院院长成为权贵，所有人都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谁有权任命他们，就成为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

神学活动

查理曼曾追求的知识复兴在整个公元9世纪结出了果实。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一定的和平环境，以及繁荣兴旺的学校和各种著作的抄本，那里就有一定规模的神学活动。但是，在整个9世纪，西欧只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系统思想家，而大部分神学活动都集中在围绕着教义或崇拜的某一点所爆发的争辩上。

319

在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s，即查理曼王朝），唯一一位伟大的系统思

想家是约翰·司各脱·埃里金纳(John Scotus Erigena)。埃里金纳是爱尔兰人,他继承了在爱尔兰修道院中得以保存下来的古代知识。将近公元9世纪中叶,他在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虔诚者路易的三位继承者之一——的宫廷中任职,他因自己的渊博学识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精通希腊文,将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Areopagite)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这些著作于公元5世纪写成,传说是在亚略巴古听过保罗讲道的那位狄奥尼修斯所著。当它们在秃头查理统治时期传入西欧时,并没有人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埃里金纳的译本几乎被人们当作同使徒具有同样权柄之人的著作来阅读。这些著作详细阐述了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而这种神秘主义很快就与保罗的神学混淆在一起,使徒保罗就这样被人们解读,仿佛他也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

埃里金纳的伟大著作是《论自然的区分》(*On the Division of Nature*)。《论自然的区分》也是新柏拉图派著作,埃里金纳的许多教义现在被认为是新柏拉图派的理论,而不是基督教的教义。但是,他非常博学,思辨十分抽象,以至于并没有太多人阅读他的著作,更没有多少人能读懂他的著作,他似乎根本就没有追随者。后来,少数继承埃里金纳某个教义的人,通常也都被谴责为异端。

在加洛林王朝时期,一个主要的神学争辩集中在西班牙两位主教的教义上:托莱多的埃里柏铎(Elipandus of Toledo)和乌赫尔的菲利克斯(Felix of Urgel)。在西班牙,有许多基督徒的祖先在被穆斯林征服时没有逃走,他们现在生活在摩尔人的统治之下。这些基督徒被称为莫扎拉布(Mozarabs),他们保留了被穆斯林征服之前的古老传统,包括他们自己的崇拜,被称为莫扎拉布崇拜(Mozarabic Liturgy)——今天仍在托莱多大教堂中举行。当查理曼开始重新夺回那些被穆斯林统治的地区时,莫扎拉布仍然坚守他们的传统,但法兰克人试图用法国与罗马的传统取代他们的传统。因此,法兰克人与莫扎拉布的关系早在这场神学争论爆发之前就已经非常紧张。

埃里柏铎基于莫扎拉布崇拜仪文的一些规定宣称，就其神性而言，耶稣是圣父永恒的儿子，但是，就其人性而言，耶稣只是被收养的儿子。当埃里柏铎说出这些话时，神学争论爆发了。这令许多基督徒将埃里柏铎和他的追随者称为"嗣子论派"（adoptionists）。但是，埃里柏铎的教义与真正的嗣子论有着巨大的差异。嗣子论派声称，耶稣只是上帝所收养的"纯粹的人"。与之不同，埃里柏铎肯定，耶稣始终具有神性。但是，他认为，必须坚持救主耶稣神人二性的差异，他以两种"儿子的身份"强调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上帝永恒的儿子与上帝收养的儿子。因此，埃里柏铎的教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嗣子论，而是以前安提阿学派神学家的一种基督论，而以弗所大公会议已经谴责了安提阿学派极端的基督论。

320

其他神学家反对这些教义，他们坚持认为，神性与人性在救主耶稣里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例如，利巴那的比亚图斯（Beatus of Liebana）写道：

> 非信徒只能在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中看到一个人。他们将上帝作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们将上帝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将上帝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的上帝为我受苦。我的上帝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①

埃里柏铎及其追随者乌赫尔的菲利克斯的教义很快就受到了法兰克神学家和教宗的谴责。菲利克斯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他被逐出了莫扎拉布势力强大的乌赫尔。但是，埃里柏铎生活在摩尔人的领地，他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直到埃里柏铎和菲利克斯都去世之后，这场神学争论才平息下来。

然而，与此同时，其他神学争论开始在西方形成。我们已经讨论过西方因在《尼西亚信经》中加入和子一词与君士坦丁堡所产生的冲突。在

---

① *Epistle to Elipandus*, 1.4.

西方神学家所争论的众多问题中，预定论与基督在圣餐中的临在是最重要的。

预定论之争中的主要人物是奥巴斯的戈茨沙尔克（Gottschalk of Orbais）。戈茨沙尔克是一名修士，他认真研究过奥古斯丁的著作，他认为，教会已经偏离了希波城这位伟大主教的教义，尤其是奥古斯丁的预定论。尽管他比自己的同代人更好地理解了奥古斯丁的预定论——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但是，极力阐释并捍卫奥古斯丁预定论的戈茨沙尔克却远离了奥古斯丁的精神。一些评论家认为，戈茨沙尔克似乎很愿意相信，他的敌人被上帝所遗弃，受到了永罚。他因许多原因与他的修道院院长结仇，当他将自己的教义公之于众时，立刻受到了攻击。攻击他的人有富尔达（Fulda）的修道院院长拉巴努斯·毛鲁斯（Rabanus Maurus），以及有权有势的主教——兰斯的辛克马尔（Hincmar of Reims）。在一场波及众多著名神学家——包括埃里金纳、拉巴努斯，尤其是辛克马尔——的神学争论之后，戈茨沙尔克被判为异端，被监禁在一座修道院中，据说去世前不久在修道院中疯掉了。

加洛林王朝时期另一场神学大争论是关于基督在圣餐中的临在。这场神学争论的起因是帕斯卡修·拉德柏尔图（Paschasius Radbertus）的一

321

篇题为《论主的身体与血》（*On the Body and the Blood of the Lord*）的神学论文。拉德柏尔图是科比（Corbie）的一个修士，他后来被追封为圣徒。拉德柏尔图在自己的论文中宣称，当饼与酒被祝圣时，它们转变成主的身体与血。它们不再是饼与酒，饼成为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的主的身体，血成为主在髑髅地所流的血。拉德柏尔图认为，虽然这种转变是秘密发生的，人类通常感知不到，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信徒可以看到主的身体与血，而不是饼与酒。

当国王秃头查理读到拉德柏尔图的论文时，他对这篇论文产生了疑惑，并要求科比的拉特拉姆斯（Ratramnus）阐明基督在圣餐中的临在。拉特拉姆斯的答复是，虽然基督的身体真实地临在于圣餐中，但这并不是其

他任何物质身体的临在，不管怎样，临在圣餐中的基督的身体并不是正坐在上帝右边的历史上那位耶稣的身体。

这场神学争论表明，到了加洛林王朝时期，一些神学家仍然认为，饼与酒在圣餐中不再是饼与酒，而是变成基督的身体与血。但是，这场神学争辩还表明，当时的许多神学家也相信，饼与酒变成基督的身体与血这一观点只是普通基督徒的夸张以及语言使用不准确所造成的结果。随后不久，一些神学家开始使用“实质改变”(a change in substance)，最终，13 世纪的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Fourth Lateran Council, 1215)颁布了变体说(transubstantiationism)的教义。

这些神学争论只是爆发在加洛林王朝知识复兴时期众多神学争论中的几个例子。但是，加洛林王朝的知识复兴是短暂的，它带给人们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因为查理曼的继任者出现了分裂，与此同时，新一波入侵狂潮再次令西方基督教陷入了恐怖与混乱。

新一波入侵狂潮

日耳曼人于公元 4 世纪和 5 世纪的入侵令西欧陷入了混乱，查理曼和他的继任者似曾一度将西欧带出混乱。但是实际上，一时平息下来的入侵并没有结束，新一波入侵狂潮恰巧发生在加洛林帝国日渐衰落的时候。

数百年来，斯堪的纳维亚人一直居住在欧洲的最北端。在公元 8 世纪这一百年间，此前一直定居在这里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造船技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成为附近海域的主人。他们的船只长六十或七十英尺，由帆和橹驱动，最多能承载八十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乘着自己所造的船开始远征欧洲的其他地区，在欧洲，他们被称为挪威人。随着加洛林帝国开始瓦解，法国的北海岸弱不禁风，难以抵御进攻，挪威人很快便发现，他们可以在这里登陆。他们洗劫了教堂、修道院和主教宅邸，然后带着战利品和奴隶回国。为了不断获取财富，他们经常袭击教堂和修道院， 322

因此，他们被视为上帝的敌人。

起初，挪威人只袭击附近的不列颠和法国北部海岸。但是，他们很快就越加大胆，开始深入内陆，作为征服者定居在新的土地上。在英格兰，只有韦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进行了有效的抵抗，但到了 11 世纪，丹麦人的国王卡努特（Canute）成为整个英格兰的主人——他也是丹麦、瑞典和挪威的国王。在法国，他们攻陷并洗劫了波尔多和南特，公元 845 年，他们甚至到达了巴黎。在西班牙，他们洗劫了圣地亚哥的孔波斯特拉教堂，更南方的穆斯林城市塞维利亚也惨遭不幸。他们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出现在地中海。最终，他们定居在从穆斯林手中夺来的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并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另一批挪威人定居在法国北部后来被称为诺曼底的地区。他们从诺曼底渡洋来到英格兰，征服了英格兰。

最终，挪威人成为基督徒。许多挪威人只是信奉了他们定居在其中 323 并被他们征服之人的信仰。其他主要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遥远的冰岛的挪威人，追随他们的领袖接受了洗礼——有时是被迫接受洗礼。到了卡努特时期，即 11 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都接受了洗礼。

大约就在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北方入侵西欧的同时，从东方来了另一批入侵者。他们是马扎尔人（Magyars），说拉丁语的西方将他们称为“匈牙利人”（Hungarians），因为他们让西欧人想起了古代的匈奴人（Huns）。当他们定居在今天的匈牙利后，他们不断入侵德国，并经常越过莱茵河。即使是遥远的勃艮第，也对他们的铁骑闻风丧胆。他们胜利攻入意大利南部，所到之处变成一片废墟。最终，捕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和他的儿子德意志的奥托一世（Otto I）于公元 933 年和 955 年两次击溃匈牙利人，他们的进攻基本上停止了。

匈牙利人吸收了他们邻居德国人的许多文化，也吸收了被他们征服的斯拉夫人的文化。德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宣教士来到了匈牙利，公元 10

世纪末，匈牙利的国王接受了洗礼。下一任国王取名为斯蒂芬——他通常被称为匈牙利的圣斯蒂芬(Saint Stephen of Hungary)，他强迫所有臣民归信了基督教。

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匈牙利人的入侵令一位历史学家将公元10世纪称为“黑暗与暴力的一个世纪”。虽然西罗马帝国于公元10世纪末在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和随后几位继任者的统治之下取得了一定的复兴，但西罗马帝国还是充满了血雨腥风，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教宗制度也衰落到其整个历史的最低谷。

教宗制度的衰落

查理曼加冕令教宗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教宗由于似乎拥有了为皇帝加冕的权利而在阿尔卑斯山以西享有巨大的威望。但另一方面，罗马帝国内部经常乱作一团。因此，有权主宰帝国命运的教宗似乎无力统治他们自己的城市。这反而令教宗成为野心家唾手可得的猎物，他们可以通过贿赂、欺诈甚至是武力来控制教宗。

教宗权力的衰弱速度并没有加洛林王朝那么快。随着皇权的衰弱，教宗曾被短暂地视为西欧绝对权力的唯一源头。结果，自从三百年前的大格列高利以来，教宗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从公元858年至867年的统治是最杰出的。据说是一组古代的、赋予教宗极大权力的文献，巩固了他的权力。这组文献就是《伪教令集》(*False Decretals*)，它们可能是德国教会中的底层教士所伪造的，他们支持教宗的权力高于直接管辖他们的修道院院长。不管怎样，尼古拉一世和欧洲的许多人相信，《伪教令集》是真实的，因此，他以史无前例的热情施行统治。他尤其积极地抑制着掌权者的好战情绪，他们对战争习以为常，仿佛战争就是一场游戏，但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痛的却是黎民百姓。 324

尼古拉一世的继任者阿德里安二世(Adrian II)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他与加洛林的国王洛泰尔二世(Lothair II)发生了冲突，他曾因洛泰尔二

世的淫乱婚姻斥责过他。在卡西诺山，当洛泰尔二世正准备领受圣餐时，阿德里安二世诅咒了他和他的宫廷。当一场可怕的瘟疫在洛泰尔二世的宫廷中爆发而导致他去世时，阿德里安二世的威望达到了顶峰。

然而，在下一任教宗约翰八世（John VIII）统治期间，出现了教宗衰落的端倪。为了应对穆斯林入侵的威胁，约翰八世试图寻求胖子查理和拜占庭人的支持，但是，他发现他们都不愿意帮助他。他在自己的教廷中被谋杀，据说下毒谋害他的侍从嫌他死得太慢，便用槌棒敲碎了他的脑袋。

从此以后，教宗的更迭就成了家常便饭。教宗史成为复杂的阴谋史，我们不必在此赘述；教宗之职成为罗马和阿尔卑斯山以西各个敌对派系争夺的战利品。有的教宗被掐死，有的教宗被自己的继任者扔到地牢中饿死。有时还会出现两位、甚至三位教宗，他们都声称自己才是圣彼得的真正继承人。

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公元897年，教宗司提反六世（Stephen VI）主持了"僵尸会议"。他的一位前任福尔摩苏斯（Formosus）的尸体被从坟墓中掘出，还被穿上教宗长袍沿街示众。他随后受到了审判，并被定下数项罪行。他被砍掉了曾主持圣事的手指，最后，他的遗骨被丢进台伯河。

公元904年，塞尔吉乌三世（Sergius III）将敌对的教宗利奥五世（Leo V）和克里斯托弗一世（Christopher I）关进监狱，并将他们杀害。在意大利最有权势的一个家族的支持下，塞尔吉乌三世成为了教宗。这个家族的领袖是狄奥菲拉特（Theophylact）和他的妻子狄奥多拉（Theodora），他们的女儿马罗齐亚（Marozia）是塞尔吉乌三世的情人。在塞尔吉乌三世去世不久之后，马罗齐亚和她的丈夫图西亚的圭多（Guido of Tuscia）占领了拉特兰宫，并囚禁了约翰十世。后来，他们用枕头将约翰十世闷死。在利奥六世和司提反七世短暂的任期之后，马罗齐亚将她与塞尔吉乌三世的私生子约翰十一世送上了教宗的宝座。在约翰十一世去世三十年之后，马罗齐亚的孙子成为了约翰十二世。后来，马罗齐亚的侄子成为了约

翰十三世。他的继任者是本笃六世，约翰十三世的兄弟克雷申蒂乌斯(Crescentius)——约翰十四世——废黜并掐死了本笃六世。继而，卜尼法斯七世废黜了约翰十四世，他或是被毒死，或是被卜尼法斯七世关进地牢饿死，而卜尼法斯七世自己也是被毒死的。

皇帝奥托三世一度可以决定教宗的人选。他的首选是他的侄子，他的侄子在二十三岁时成为教宗，取名为格列高利五世。后来，奥托三世提名著名的学者奥弗涅欧里亚克的热尔贝(Gerbert of Aurillac)，热尔贝成为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西尔维斯特二世是一位勇敢的教宗，但是，他改革教宗制度和整个教会的努力也最终化为泡影。

当奥托三世去世的时候，克雷申蒂乌斯家族——也是狄奥非拉特、狄奥多拉和乌罗齐亚的家族——再次控制了教宗之职，直到图斯库鲁姆(Tusculum)的伯爵们得势，任命了本笃八世、约翰十九世和本笃九世。本笃九世在十五岁时成为教宗。在十二年之后的1054年，他被收买退位。他的教父格列高利六世试图改革教会，但是，本笃九世后来撤消了退位，克雷申蒂乌斯家族推出了他们自己的教宗，他们将他称为西尔维斯特三世。

德意志的亨利三世最终出面干预。在与格列高利六世会晤之后，他召开了一次会议，将三位教宗全部废黜，并任命了克莱门二世。此次会议还针对教会的腐败颁布了一系列教令，尤其是针对买卖圣职颁布了教令。

克莱门二世将亨利加冕为皇帝，并在随后不久去世。后来，亨利三世决定将图勒的主教布鲁诺(Bruno of Toul)任命为教宗，而此时的布鲁诺已经因自己的改革热情而闻名于世。但是，布鲁诺拒绝接受亨利三世的任命，除非他是被罗马人民选为教宗。为了参加教宗选举，他起身前往罗马，陪伴他的是两位有类似改革思想的修士：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和洪贝尔。随着这一小群人一步步走近罗马，他们一同为教会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三十章

复兴运动

> 去年，主教们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必须这样生活吗？……每天一次盛宴，每天一次游行。餐桌上的各种美味佳肴并不是为穷人预备，而是为贪图享乐的宾客准备。与此同时，合法拥有这些美味的穷人却被禁止赴宴，他们在饥饿中死去。
>
> ——彼得·达米安

加洛林帝国的衰落所导致的暴力与腐败，唤醒了许多基督徒对新制度的迫切渴望。教宗之职成为卑劣对手们争夺的焦点，主教之职被买卖，整个教会服务于掌权者的利益，在许多敬虔的基督徒看来，这一切都是可耻的丑闻。考虑到当时的种种选择，大多数渴望改革的基督徒选择了修道生活。因此，从修道院中涌出了一波改革狂潮，这波狂潮吞没了教宗，冲击到掌权者，甚至涌到了遥远的圣地海岸。

修道主义的改革

修道主义本身就需要改革。许多修道院被挪威人和匈牙利人洗劫并摧毁。较为隐蔽地区的修道院成为修道院院长和主教的玩偶，用来实现自己的野心。本该保护修道院的贵族与主教也利用修道院为自己谋取利益。修道院院长之职同教宗和主教之职一样，也成为扩张个人权力的一种手段，大的修道院也是如此。一些修道院院长通过买卖、甚至谋杀获得了他们的教职，从而依靠院长的收入过上了安逸的生活。本笃《会规》基

本上无人遵守，真正得到修道呼召的修士和修女发现，他们的修道誓愿已遭亵渎。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 1098—1179)便是其中之一，她是德国本笃修会的一位女修道院院长，她的神秘主义著作深受渴望更高境界灵修生活之人的欢迎。尽管志在改革的许多修士和修女建立起新的修道院，但盛行于世的腐败之风最终也侵蚀了新建的修道院。 *328*

在希尔德加德时代二百年之前，也就是公元909年，阿基坦的威廉三世公爵(Duke William III of Aquitaine)建立了一座小修道院，他希望这座修道院会好于现有的修道院。这本身并不新奇，因为有权有势的贵族创建修道院在当时非常普遍。但是，上帝的旨意和一些明智的决策令这座小修道院变成了大规模改革的中心。

威廉为了管理他的新修道院而召来伯尔诺(Berno)。伯尔诺是修士，他坚定不移地服从本笃《会规》，努力改革修道主义，这令他闻名于世。应伯尔诺的要求，威廉为修道院放弃了他最喜爱的狩猎场克吕尼(Cluny)。克吕尼和修建修道院所必需的土地被立契转让给"圣彼得和圣保罗"，这就令克吕尼修道院处于教宗直接管辖与保护之下。教宗当时正处于权力低谷，因此，教宗的保护只是起到避免附近主教和封建领主干涉，包括威廉及其继任者干涉的作用。此外，为了保证克吕尼修道院不会成为腐败教宗的猎物，转让契约明确禁止教宗以任何方式侵占只属于圣彼得与圣保罗的财产。随着第一个千年即将结束，对修道院院长和修道院的这种捐赠与其他类似的捐赠可能是许多基督徒寻求与上帝和好的普遍努力，因为奥古斯丁和其他神学家曾提出，在上帝眼中，千年如一日，因此人类纪元第一个千年的结束将带来创造完满的终结。 *329*

在公元926年之前，伯尔诺一直担任克吕尼修道院院长。我们对早期克吕尼修道院的了解并不是很多，因为它只是伯尔诺着手建立或改革的众多修道院之一。但在他去世之后，一群能干且品德高尚的修道院院长相继领导克吕尼修道院，将之变成一场大规模修道主义改革的中心。

这些杰出的修道院院长是：奥多（Odo，926—944）、艾马尔（Aymard，944—965）、马耶尔（Mayeul，965—994）、奥迪洛（Odilo，994—1049）和于格（Hugh，1049—1109）。这六位异常无私且杰出的修道院院长领导克吕尼修道院历时二百年。在他们的领导之下，改革修道主义的思想越传越远。同前六任院长相比，第七位院长庞提乌斯（Pontius，1109—1122）的能力略逊一筹。但是，他的继任者——尊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1122—1157），弥补了庞提乌斯时期的许多不足。克吕尼修道院改革的特点之一是所有修道院对它们的财产有明确的所有权，这就令它们不会受到封建领主的任意摆布。

最初，克吕尼修士的目标只是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完全遵行本笃《会规》的地方。但是，他们的视野后来变得更加开阔，克吕尼的修道院院长开始效法伯尔诺，着手改革其他修道院。因此，一个完整的"二级克吕尼修道院"（Second Clunys）网络出现了，而二级克吕尼修道院接受主修道院院长的直接领导。这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制度"，而是一系列独立的修道院，它们都由同一位修道院院长领导，这位修道院院长通常会为每一所修道院任命院长。这种改革也在女修道院中进行，第一座克吕尼女修道院是于11世纪建立的马尔西尼（Marcigny）女修道院，当时，克吕尼修道院院长是于格。

克吕尼男女修士的主要活动是本笃《会规》所规定的日课——祷告和阅读本笃所规定的经文。克吕尼修士将他们的精力完全投入到日课上，以至于在克吕尼运动的高潮，他们每天会吟唱一百三十八首《诗篇》。日课是在各种仪式中进行的，年复一年，这些仪式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克吕尼修士几乎将全部时间都用在日课上，从而忽视了在本笃看来十分重要的体力劳动。对于偏离本笃《会规》的这种做法，他们为自己找到了恰当的理由：修士的职责是祷告与赞美上帝，如果他们不在田间耕种，就可以更加洁净地祷告与赞美上帝。

在克吕尼运动的高潮，克吕尼修士的改革热情达到了顶峰。在成功

改革了数以百计的修道院之后，他们又将目光转向改革整个教会。当时是教宗制度最黑暗的年代，教宗以惊人的速度更迭，教宗和主教成为封建地主，卷入到当时的每一桩阴谋。在这样的环境中，克吕尼修道院中所实践的修道主义理想带来了一线希望。除了克吕尼修士之外，许多人按照修道主义的模式来全面改革教会。同盛行在教会最高层的腐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克吕尼运动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一个神迹，是上帝在出面干涉，为教会带来了新的曙光。

331

因此，教会改革在11世纪被视为许多修道院改革的外延。在去罗马的路上，图勒的布鲁诺——他将成为教宗利奥九世——和他的同伴希尔德布兰德与洪贝尔就心怀这一异象。克吕尼修道院之所以能够进行伟大改革，是因为它们摆脱了所有世俗权力的控制，这也是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和洪贝尔这群改革者的梦想，他们也希望教会领袖可以不受世俗统治者——无论是国王，还是贵族——的任何束缚。因此，买卖圣职是必须被根除的最大罪恶之一。尽管贵族、国王和皇帝封任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买卖圣职，但是，这种做法非常危险，接近于买卖圣职，从而也必须被禁止，尤其是在其统治者并不热衷于教会改革的地区。

就修道主义而言，教会改革的另一大敌是神职人员结婚。数百年来，许多神职人员守独身，以前也有过促进神职人员守独身的种种努力，但这从未成为一条通行的教规。现在，在修士的激励之下，教会的改革者将神职人员守独身制定为他们改革计划的基础之一。最终，以前只对男女修士提出的要求也成为对神职人员的要求。

完成这项改革，并非没有出现痛苦、悲恸，甚至是暴力。在进行这项改革的某个时候，出现了帕塔里亚党（Patarines）——他们显然出现在米兰。他们狂热地倡导神职人员守独身，认为神父结婚实际上是一种非法同居，他们将神父的妻子称为妓女，并坚持必须将她们赶出丈夫的家。在佛罗伦萨，许多帕塔里亚党拒绝参加由已婚神父主持的圣礼。当佛罗伦萨的主教试图通过理性与传统解决这场争端时，帕塔里亚党指控他

买卖圣职。瓦隆布罗萨的约翰·加贝尔(John Gualbert of Vallombrosa)——他后来被追封为圣徒——在佛罗伦萨沿街游行,宣称佛罗伦萨的主教的确是买卖圣职者。对此,主教矢口否认。希尔德布兰德参与了这场争辩,他支持约翰·加贝尔。备受尊敬的改革派修士彼得·达米安(Peter Damian)呼吁双方保持冷静,要克制,要有耐心和爱心。最终,有人建议用火刑解决问题。在佛罗伦萨郊区,人们燃起熊熊烈火,一个支持帕塔里亚党的修士在大火中走过,这被视为证明佛罗伦萨主教犯罪的证据。主教不得不逃离佛罗伦萨,在那里,神职人员的家人被强行赶出家门,沦落街头。

332

顺服是本笃修道主义的另一个基础,它也成为11世纪这场改革的基础。就如修士宣誓顺服他们的修道院院长,所有教会(实际上是所有基督教国家)也必须顺服教宗,教宗将领导一次大复兴,在这次大复兴中,教宗的作用类似于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在修道主义改革中的作用。

最后,克吕尼修道主义及其激发的教会全面改革对贫穷的态度是矛盾的。好的修士应当无所拥有,他们必须过简朴的生活。但是,修道院则可以拥有财产和广阔的土地。修道院的财产与土地在不断增加,因为那些钦佩修道生活或是希望为自己的得救赚得善工的信徒会为修道院捐赠财物,修道院也会从他们那里继承财产和土地。这最终令修士难以过本笃《会规》所要求的简朴生活。以克吕尼男女修道院为例,他们变得非常

333

富有,以至于男女修士将他们的全部时间都用在日课上,从而忽视了体力劳动。此外,那些改革者批评许多主教的奢侈生活,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坚持认为,教会有权拥有自己的土地及其数百年来积累的一切财富。从理论上讲,这些财富不是用于高级教士享用,而是为了荣耀上帝,帮助穷人。但是,这实际上阻碍了计划中的改革,因为这导致了买卖圣职,身为封建领主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所拥有的权力令他们不断卷入政治阴谋。

克吕尼修道院所积累的财富是克吕尼运动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富人和穷人都被克吕尼修士的圣洁所感动,为修道院捐赠财物。克吕尼男

女修道院用金银珠宝装饰他们的小礼拜堂。最终，曾是本笃理想的简朴生活丢失了，新近兴起的其他运动更强调贫穷，它们逐渐取代了克吕尼运动。同样，11 世纪的教会改革最终彻底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教会所拥有的财富，因为教会的财富令教会难以摆脱掌权者的阴谋，难以站在穷人与受压迫者的一边。

对克吕尼修道院安逸修道生活的不满很快就引发了其他运动。例如，彼得·达米安试图超越本笃原则——修士只应满足于拥有他所需的，他倡导极端禁欲的修道生活。但是，下一场大的修道主义改革运动始于11世纪末，当时，莫莱姆的罗贝尔（Robert of Molesme）在西多（Citeaux）建立了一座新修道院。最终，这场运动得名"西多会运动"（Cistercian Movement）。后来，罗贝尔回到了他最早加入的修道院，但西多的那座修道院仍然存在，并最终带来一波类似于之前克吕尼修道院院长所领导的修道主义改革狂潮。

西多会运动的伟大人物是明谷的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二十三岁的伯尔纳在几个亲戚和朋友陪伴下来到西多（公元 1112 年或 1113 年），要求加入西多的修道院。他已经决定加入这所修道院，而且早在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就已经说服一些人同他一起加入。这是他极具说服力的早期迹象，整个欧洲终将感受到他的说服力，他甚至说服了众多的十字军战士来到圣地。西多的修士越来越多，他被要求在明谷再建一座修道院。明谷的修道院迅速发展壮大，很快就成为了改革的中心。

伯尔纳首先是位修士。他只希望默想上帝的爱，尤其是上帝在基督的人性里启示的爱，因为他相信，就如耶稣在伯大尼对马利亚和马大两姐妹所说，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但他很快便发现，他要被迫承担起马大的责任。他是一位著名的布道家，甚至以甜蜜博士（Doctor Mellifluous）闻名于世，因为他的讲道如蜜一样甘甜。例如有两首被认为是他创作的赞美诗就能说明这一点，今天，这两首赞美诗仍然非常流行，它们就是《至圣之主今受伤》（O Sacred Head, Now Wounded）和 334

《慕主歌》(Jesus, the Very Thought of Thee)。他的名望迫使他成为许多政治与教会争端的仲裁者。他的个性主宰了他那个时代,因为他是默想基督人性的神秘主义者、教宗背后与之上的掌权者(尤其是当他的一个修士成为教宗时)、教会改革的拥护者、倡导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布道家和所有神学创新的敌人。伯尔纳的声望极大地推动了西多会运动,该运动很快就发挥出一百多年前克吕尼运动所起到的作用。

我们简短地回顾了从公元10世纪到12世纪的两场重要的修道主义改革运动。现在,我们必须继续讲述我们的故事。因此,我们要回到上一章末尾停下来的地方,回到公元1048年,当时,奥迪洛仍是克吕尼修道院院长,现在,我们就与图勒的布鲁诺和他的同伴们一同踏上他们的罗马之旅。

教会法与教宗的改革

其他基督徒试图通过立法以及将权力集中在改革派教宗手中来改革整个教会。就立法而言,教会大约在1140年编撰了《教令集》(*Decretum*),它通常被称为"格拉提安的"(of Gratian)《教令集》——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它的真正作者是谁;《教令集》是编撰与整理许多所谓管理教会生活的教会法的一次努力。《教令集》与其他五部重要文献共同构成了《教会法大全》(*Corpus Juris Canonici*),而《教会法大全》在1917年之前都是罗马天主教教会法的基础。

然而,几位改革派教宗引领了他们所理解的改革之路。在那一小群于1084年赶往罗马的朝圣者中,为首的是布鲁诺。皇帝亨利三世希望任命他为教宗,但他更愿意以一位朝圣者的姿态进入罗马。到了罗马,如果是人民和神职人员选举他为教宗,他愿意接受。可是,从皇帝手中接过教宗之职则是危险的,这相当于买卖圣职——或像希尔德布兰德对布鲁诺所说的,这将意味着来到罗马的布鲁诺"并不是使徒,而是背教者"。

这一小群朝圣者中的另一位是洪贝尔,他在自己所在的洛陶林吉奥

(Lotharingia)的修道院中致力于研究,也与买卖圣职不断作斗争。他在论文《驳斥买卖圣职者》(*Against the Simoniacs*)中猛烈抨击当时的掌权者,对买卖圣职的攻击力度前所未有。洪贝尔脾气火爆,他在抨击买卖圣职时甚至声称,由买卖圣职者施行的圣礼是无效的——这正是奥古斯丁在数百年前与多纳徒派的争辩中所否定的。公元1054年,洪贝尔将教宗对君士坦丁堡牧首米歇尔·瑟如拉留的绝罚谕放到圣索菲亚大教堂高高的圣坛上,从而造成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

335

在这一小群朝圣者中,第三位、也是最著名的一位,是修士希尔德布兰德。他出身卑微,父亲是托斯卡纳(Tuscany)的木匠,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罗马的一座修道院。他在罗马当修士时结识了未来的教宗格列高利六世。我们已经在上一章末尾讲到,格列高利六世希望改革教会,为此,他将希尔德布兰德召到了身边。但是,后来的局势发展到出现了三位教宗,他们都自称是合法的教宗,为了教会的和平与合一,格列高利六世选择了退位。希尔德布兰德与他一同逃亡,据说希尔德布兰德在这位圣徒去世时合上了他的双眼。两年之后,布鲁诺在去罗马的途中请求希尔德布兰德与他一同肩负起摆在面前的教会改革重任。

希尔德布兰德经常被描述成几位教宗背后的野心家。但是,当时的文献似乎表明,他在准备担任教宗之前实际上只希望改革教会。显然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几位教宗的工作;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只有在他担任教宗才能最好地改革教会之际,他才接受了教宗之职,取名为格列高利七世。

但是,当时被召来担任教宗的是图勒的布鲁诺,他是光着脚的朝圣者,以个人灵修姿态来到罗马。当他去罗马途经意大利北部时,人们夹道欢呼,并很快开始谈论发生在这次朝圣之旅中的所谓神迹。在赤脚进入罗马之后,布鲁诺受到罗马人民和神职人员的欢迎,他接过了教宗的三重冕,取名为利奥九世。

刚刚坐上圣彼得的宝座,利奥九世就开始了他改革教会的工作,为

此，他将几位同样因改革思想而闻名于世的基督徒召到了身边，彼得·达米安就是其中之一。长久以来，他对教会的状况感到悲哀，他已经说服许多人相信，教会的确需要改革——尽管他没有洪贝尔和希尔德布兰德那火一般的激情，因为他坚持认为，必须用爱与宽容来改革教会。他们的改革计划基于促进神职人员守独身和消灭买卖圣职。神职人员守独身与买卖圣职有着某种联系，因为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教会仍是少数存在一定社会流动性的机构之一。例如，出身卑微的希尔德布兰德最终成为教宗。但是，这种社会流动性受到了买卖圣职的威胁，因为只有富人才能担任教会的高职。如果再加上神职人员结婚，那么，担任高职的神职人员会试图将教职传给他们的孩子，这样，教会将专门代表富人和掌权者的利益。因此，这场消灭买卖圣职与促进神职人员独身的改革运动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他们似乎明白，这场改革运动是一次从掌权者手中夺取教会控制权的良机。

336

在意大利进行了数项改革之后，利奥九世认为，在阿尔卑斯山以西推行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来到德国，德国皇帝亨利三世已经针对买卖圣职采取了一些措施，利奥九世重申了亨利三世的这些措施，但他同时也公开表明，这并不代表亨利三世可以主宰他领地内的教会。在德国，利奥九世将洛林的戈弗雷（Godfrey of Lorraine）革除教籍，因为他反叛了亨利三世。后来，利奥九世迫使戈弗雷投降，并为戈弗雷向亨利三世求情，终于保住了这个造反者的性命。

买卖圣职在法国十分猖獗，利奥九世希望结束这种状况。为此，他决定访问法国。虽然他从法国的国王和一些高级教士那里得知自己不会受欢迎，但他还是去了法国，并召开了一次会议，以买卖圣职罪革除了几位高级教士的教籍。此次会议还命令已婚的主教必须离开他们的妻子，但这项教令基本上无人遵守。

利奥九世在他任职期间犯下了两个严重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动用军队对付已经定居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挪威人。彼得·达米安力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但他还是率军向挪威人发动了进攻，结果被挪威人击败

了。他被自己希望征服的人俘获，成为囚徒，直到去世之前不久才被释放。他的第二个错误是将洪贝尔作为特使派往君士坦丁堡。洪贝尔的固执和他对拜占庭人关切之事的冷漠，导致东西方教会在利奥九世去世不久后的公元 1054 年分裂了。

选举新教宗是一件难事。让皇帝任命教宗就相当于国家控制了教会，这是改革者所痛恨的。让罗马的神职人员和人民选举教宗则会冒让意大利某个家族再次控制教宗的风险，他们希望令教宗成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最终的决定是由罗马人民选举新教宗，但新教宗必须是德国人，这就令罗马的任何一个家族都不可能操纵教宗。新教宗维克托二世继承了利奥九世的政策。当皇帝亨利三世陷入困境时，洛林的戈弗雷再次造反，维克托二世向亨利三世伸出援手，亨利三世在临终之际将自己年幼的儿子亨利四世委托给维克托二世照顾。因此，维克托二世曾一度统治着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他倡导的改革也得以迅速进行。

此后的历任教宗都是改革派，只有一位除外。这仅有的一次例外令改革者在尼古拉二世的领导之下召开了第二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此次大公会议决定了以后选举教宗的办法：选举权属于同时身为主教的枢机主教，他们随后必须征求其他枢机主教的同意，最后是罗马人民的同意。（我们并不清楚“枢机主教”的起源，也不必在此停下来赘述。到了 1059 年召开第二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时，枢机主教职已经成为一项历史悠久的职位。）枢机主教致力于改革教会，他们选出的教宗又任命新的枢机主教，因此，改革派的权力似乎有了保障。下一任教宗亚历山大二世被枢机主教适时地选出，他继续改革教会，尽管罗马一些有权势的家族在德国人的支持之下推出了一位敌对的教宗。

当亚历山大二世去世时，希尔德布兰德被选为教宗，但是，选举希尔德布兰德的程序与第二次拉特兰大公会议的规定正好相反，因为是罗马人民先要求选举希尔德布兰德，然后才是枢机主教批准。希尔德布兰德取名为格列高利七世，他继续推动自己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改革。他的梦

337

想是一个统一在教宗之下的世界，就如群羊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为此，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下令禁止将圣经翻译成各国的本国语，因为教导与释经的权力必须在罗马。他的这个合一的异象不仅包括西欧，还包括拜占庭的教会和穆斯林统治之下的世界。格列高利七世曾试图组织一场进攻穆斯林的大规模军事战争，一条战线在西方的西班牙，一条战线在东方，说拉丁语的基督徒可以去解救在东方被围困的君士坦丁堡——这项计划在二十年之后导致了数次十字军东征。但是，十字军东征均告失败，格列高利七世向东方扩展自己权力的努力也无果而终。

格列高利七世在西欧继续与买卖圣职和神职人员结婚进行斗争。公元1070年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谴责了买卖圣职，并命令神职人员必须守独身。格列高利七世巩固了此次会议的决议，因为他禁止平信徒参加由买卖圣职者主持的圣礼。他还任命了巡视各地的特使，以确保这些教令得以实施。对此，一些神职人员指控他是异端，因为奥古斯丁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宣布，由分裂者施行的圣礼仍是有效的——教会中的其他人也赞同奥古斯丁这个观点。实际上，格列高利七世并未宣布这样的圣礼无效；他只是命令人们不要参加这样的圣礼。在法国，国王腓力一世（Philip I）并不理会格列高利七世的劝诫。在腓力一世的支持之下，法国的神职人员拒绝服从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教令。有权有势的高级教士利用他们的教职获利，而不满买卖圣职的称职的已婚低级教士并不愿意抛弃他们的妻子，因此，同时向买卖圣职和神职人员结婚开战的确并不明智，因为这令高级教士与低级教士结成了一种同盟。格列高利七世和他的朋友将守独身的修道主义理想列入他们的改革之中，但是，这种做法令他们的改革更加难以成功。

338

在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当时统治的英格兰，格列高利七世是最成功的。希尔德布兰德在还是教宗的顾问时就支持威廉从诺曼底入侵英格兰的计划，因此，不管怎样都会支持教会改革的征服者威廉，当然也会支持格列高利七世与买卖圣职所进行的斗争

教宗与皇帝的正面冲突

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热情很快就与皇帝亨利四世的利益产生了冲突。亨利四世幼年时受到过一位改革派教宗的照顾，因此格列高利七世相信，在所有统治者中，亨利四世最应该支持改革教会的计划。但是，亨利四世觉得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的权力太大了，为了保存帝国的政治地位，皇帝必须可以自由地任命支持他的人。在米兰，帕塔里亚党的一些极端分子强迫神职人员守独身，制造了骚乱，因此，亨利四世废黜了米兰的主教，任命了一位新主教。这时，格列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的冲突终于爆发了。格列高利七世的回应是，命令亨利四世在特定的日期来到罗马，如果不来，他将被革除教籍，他的灵魂将被罚入地狱。在公元1057年的平安夜——离格列高利七世所规定最后的期限还有两个月，一支武装分遣队在他举行弥撒时袭击、殴打了他，并将他俘虏。面对这种局面，罗马人民起义了，他们围攻并夺取了关押格列高利七世的城堡。带头袭击格列高利七世的人不得不逃跑，他之所以能够成功逃脱，只是因为教宗命令追击他的人放他一马，条件是他必须到罗马朝圣。亨利四世当时刚刚取得几场重要的胜利，因此，他正处于自己权力的顶峰。他在格列高利七世所规定最后期限的几天之前召开了一次会议，以回应教宗的最后通牒。此次会议宣布废黜格列高利七世，理由是他犯有暴政罪、通奸罪和行巫术罪。随后，亨利四世以此次会议的名义将这些决议的通知单送给"并不是教宗，而是伪修士的希尔德布兰德"。

格列高利七世召开了一次由他的支持者参加的宗教会议，他们建议对亨利四世采取严厉的措施。第二天——正是格列高利七世命令亨利四世来到罗马的那一天，格列高利七世公布了他对亨利四世的绝罚：

>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凭借圣彼得的权柄与权威，为了维护和荣耀教会，我绝罚国王亨利……禁止他统治德国或意大利的任

何王国。我也免除所有已经宣誓或将要宣誓效忠于他之人的誓言。我禁止他还被作为国王来服从。[1]

起初，亨利四世决心抵抗到底。但是，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许多人因其他原因而不愿意服从他，现在，格列高利七世的绝罚成为他们的借口。那些迷信的人开始散布谣言，称接近亨利四世会为自己招来咒诅。亨利四世的一个最坚定的支持者意外身亡，这令关于他的传言更加可信。亨利四世最终认为，他的唯一出路是求得格列高利七世的宽恕。他希望尽可能在私下求得格列高利的宽恕，因此，他动身去见在意大利的格列高利七世。格列高利七世难以确定，亨利四世是和平地来，还是要动用武力。亨利四世在意大利北部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这加深了格列高利七世的怀疑。但是，亨利四世并不希望自己的皇冠成为战争未知结果的赌注，因此，他拒绝将自己的支持者集结成军队，他并不想与格列高利七世开战。

格列高利七世和亨利四世最终在卡诺萨（Canossa）城堡会面。格列高利七世住在卡诺萨城堡，因为这里戒备森严。亨利四世希望私下向格列高利七世忏悔。但是，格列高利七世坚持亨利四世必须当众忏悔，因此，亨利四世被迫一连三天以忏悔者的姿态祈求格列高利七世允许他进入卡诺萨城堡。最终，声称是基督众使徒领袖的格列高利七世无法再对亨利四世提出其他任何要求，只能给予亨利四世所祈求的宽恕，撤销了对亨利四世的绝罚。

340

亨利四世随后匆匆回到了德国，他在格列高利七世这里遇到的难题促使他在德国的敌人造反。虽然格列高利七世已经撤销了他对亨利四世的绝罚，但是这并没能阻止那些造反者，他们选出了自己的皇帝。格列高利七世的暧昧态度激发了内战，显然，亨利四世很快就会战胜他的敌人。

---

① Gregory VII, *Register* 3.10a.

可是，格列高利七世并不信任亨利四世，因此，他决定在篡位者身上碰碰运气。格列高利七世再次革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并预言亨利四世将在不久之后去世。但是，亨利四世的追随者这一次并没有理会格列高利七世的绝罚，他们选出了一位反对派教宗，他取名为克莱门三世。最终，篡权的皇帝在战争中被杀，亨利四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唯一的主人。

1081年的春天，阿尔卑斯山隘之间的冰雪刚一融化，亨利四世就开始向罗马进军。唯一可能支持格列高利七世的人是统治着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Normans），因为他们曾是格列高利七世的盟友。但是，格列高利七世也将他们革除教籍。他随后向拜占庭帝国求助，但一切都是徒劳。罗马人殊死保卫他们的城市。但是，在格列高利七世显然不会与入侵者谈判的情况下，他们打开了城门，格列高利七世被迫逃到了圣安吉洛城堡（Castle of Saint Angelo）。亨利四世胜利进入罗马，克莱门三世控制了罗马。后来，诺曼人出面干涉，亨利四世放弃了罗马。诺曼人成为罗马的主人，许多居民惨遭杀害，建筑物被烧毁，数以千计的罗马人被带走，卖为奴隶。

在连续数日的暴力与掠夺之后，罗马人民爆发了起义，随后是漫长的暴力冲突和混乱，这令克莱门三世和他的支持者得以控制罗马的部分地区。格列高利七世先后逃到了卡西诺山修道院和萨勒诺（Salerno），并继续谴责亨利四世和克莱门三世。但是，他的谴责起不到任何作用。据说当他于1085年去世时，他的临终遗言是："我始终热爱公正，憎恨不义。因此，我在流亡中死去。"

希尔德布兰德在去世之前就已经宣布，他的继任者是卡西诺山修道院的年迈院长。希尔德布兰德的愿望得到了满足，那位本无意担任教宗的老人被迫成为了教宗。他取名为维克托三世，他的支持者将他迎回罗马。但是他随即病倒了，便又回到了卡西诺山修道院，并在卡西诺山修道院安详地离世。

改革派随后选出了乌尔班二世，他重新夺回罗马，赶走了克莱门三

世。他最著名之处在于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述。但是，他也继承了格列高利七世的政策，这导致他再次与法国的腓力一世爆发冲突，他因腓力一世有婚外情而革除了他的教籍。在德国，他怂恿亨利四世的儿子康拉德（Conrad）造反，康拉德许诺，如果他被加冕为皇帝，他将放弃封任主教的所有权力。但是，亨利四世大肆镇压叛军，他击败了自己的儿子，并召开了一次帝国会议剥夺了他儿子的继承权。

341

乌尔班二世的继任者帕斯加尔二世（Paschal II，1099—1118）希望教会的分裂会在克莱门三世去世之际结束。但在克莱门三世去世之后，亨利四世又任命了一位敌对的教宗，因此，教会的分裂并没有结束。

亨利四世于1106年去世，他当时正准备与他造反的儿子亨利开战。教宗帕斯加尔二世准备从中调停，他宣布在亨利四世统治期间封任的所有圣职都是有效的，即使是平信徒封任的圣职。但是，他也清楚地表明，禁止所有平信徒以后再封任圣职，任何不服从这个命令的人都将被革除教籍。因此，在清理过去问题的同时，他也向新皇帝发起了挑战。

亨利五世等待了三年才回应教宗帕斯加尔二世的挑战。后来，他入侵了意大利，帕斯加尔二世被迫妥协。由亨利五世提出、帕斯加尔二世接受的是，只要教会放弃高级教士所拥有的一切封建特权——他们的封建特权令他们成为强大的掌权者——皇帝就会放弃主教封任权。帕斯加尔二世同意了，他的唯一条件是罗马教会继续拥有“圣彼得的教产”。亨利五世的提议正中要害，因为只要主教还是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世俗统治者就不会主动放弃封任主教的权利。此外，如果改革者始终以修道主义原则来改革教会，世俗统治者就愿意让教会走上贫穷之路。

虽然这个决定看似合理，但是，它在政治上却不可行。高级教士们很快就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世俗权力被剥夺了。一些高级教士迅速指出，帕斯加尔二世随意处理他们的财产，但他却保住了自己的财产。德国的达官显贵开始怀疑，亨利五世凭借剥夺主教的权力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也会转过头来对付他们，废除他们许多古老的特权



圣安吉洛城堡。教宗格列高利七世被迫在这里避难。

后来，罗马人民起义，亨利五世离开了罗马，并挟持走帕斯加尔二世以及几位枢机主教和主教。最终，亨利五世将帕斯加尔二世送回罗马，帕斯加尔二世在大门紧闭的圣彼得大教堂内将亨利五世加冕为皇帝，因为他们惧怕罗马人民。亨利五世随后返回德国，那里有一些紧急事务正等着他去亲自处理。

在德国，亨利五世遇到了新的困难。许多高级教士和贵族担心失去自己的权力，他们起义了。当帕斯加尔二世保持沉默时，德国的许多高级教士革除了亨利五世的教籍。后来，一些地方宗教会议也革除了亨利五世的教籍。当亨利五世抗议帕斯加尔二世的态度违反了他们的协议时，帕斯加尔二世建议亨利五世召开一次会议，解决这场争端。亨利五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绝大多数主教认为他们的财产与权力受到了皇帝政策的威胁，他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因此，他选择再次动用武力。一旦德国的局势允许，他就再次入侵意大利，帕斯加尔二世被迫逃到了圣安吉

洛城堡，并在那里去世。

枢机主教随后匆匆选出了新教宗，以免亨利五世干涉教宗选举。新教宗格拉修二世（Gelasius II）的任期虽然短暂（1118—1119），却充满了暴风骤雨。一位支持亨利五世的罗马权贵囚禁了他，并对他施以酷刑。后来，罗马人民起义，将他救出。但是，亨利五世带着他的军队再次来到罗马，格拉修二世逃到了加埃塔（Gaeta）。在他刚刚回到罗马之时，他又再次被之前那位罗马权贵俘获，但他这次又逃掉了，最后精疲力竭地倒在田地中。几个妇女发现了他，他几乎赤身露体，奄奄一息。后来，他逃到法国避难，不久之后在克吕尼修道院去世。

格拉修二世逃往法国的决定标志着教宗政策正在被迫转到新方向。神圣罗马帝国成为教宗的敌人，南方的诺曼人实际上也并不是值得信赖的盟友，因此，教宗开始希望法国能够成为支持他对抗德国皇帝的盟友。

下一任教宗卡里克斯图二世（Calixtus II，1119—1124）是亨利五世的亲戚，他们相信，结束争端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夹杂着威胁、甚至战争的漫长谈判之后，双方最终签订了《沃尔姆斯协定》（Concordat of Worms，1112）。该协定规定，按照古代传统自由地选举主教，但必须有皇帝或皇帝的代表莅临选举。从此以后，只有特定的教会当局才可以授予主教象征着教牧权威的权戒与权杖；但同时只有世俗统治者才可以授予封建权利、特权、财产和它们的象征物。亨利五世还同意返还教会的全部财产，并采取措施，迫使占有教会财产的封建领主也返还教会的财产。这结束了教宗与皇帝的一系列冲突，但是，类似的冲突将在未来的数百年中不断继续上演。

343

最终，改革派教宗的计划成功了。神职人员守独身成为西方教会的通行教规，并被普遍遵行。曾有一段时间，买卖圣职几乎完全消失。教宗的权力还在增长，直到13世纪达到了顶峰。

然而，关于封任主教的争论表明，在坚持守独身这一修道主义理想的同时，改革派教宗并没有坚持守贫的修道主义理想。任命与续任主教的



皇帝与教宗的冲突仍没有结束。在这幅反教宗的宣传画中，教宗在与女人打情骂俏（见右上方的窗户），而亨利在乞求教宗让他进入卡诺萨城堡。



问题对于世俗统治者——尤其是皇帝——非常重要，因为教会变得非常富有，势力极其强大，以至于一位敌对的主教可以成为一股令人惧怕的政治力量。主教可以供养大量侍从，甚至是军队。因此，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统治者必须确保占据如此重要职位的人忠于他们。亨利五世切中要害，他提出，如果主教不再拥有封建大领主的权力与财力，他愿意完全放弃在他的领地内封任主教的权力。在改革派教宗看来，教会的财产属于基督和穷人，因此不能交给世俗统治者。但是，实际上教会财产被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用来满足自己的利益和实现自己的野心，而他们理论上并非教会财产的拥有者，而是监护者。

第三十一章

进攻穆斯林

> 我对在场的人这样说。我命令将我的话转告那些不在场的人。这是基督的命令。所有去那里并丢掉性命之人的罪将立即得蒙赦免,无论他们死在陆上、海上,还是死在与异教徒的战争中。凭借上帝所赐予我的巨大恩赐,我赦免所有去参加战斗之人的罪。
>
> ——乌尔班二世

在中世纪,众多令西方基督教国家神魂颠倒的理想中,没有哪一个能像十字军精神那样具有戏剧性、矛盾性,令人难以抗拒。历史上,基督教会在自我热情的驱使下,做了很多与其本质相抵触的事情。其中因被人过于浪漫化而导致悲剧的十字军东征,显然是最突出的例子。在这一点上,唯有宗教裁判所可与之相提并论。数百年来,西欧将自己的热情与热血倾注在一系列远征中,但是,它们所带来的最好结果是短暂的胜利,最糟结果是一场场悲剧。西欧的基督徒希望击败威胁到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拯救拜占庭帝国,重新统一东西方教会,再次夺回圣地以及被穆斯林以前同样凭借武力夺去的领地(参第二十七章),总而言之,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进入天堂。他们能否进入天堂并不是我们所能判断的。他们的其他所有目标都实现了,但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没有一个能保持长久。最初,穆斯林之所以被击败,是因为他们并不团结,但是他们最终团结在同一阵线上,并赶走了十字军战士。君士坦丁堡和苟延残喘的拜占庭帝国

一直存活到15世纪，直到奥斯曼土耳其人横扫拜占庭帝国。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曾迫使东西方教会短暂地合一，但强迫合一的最终结果只是加深了东西方基督徒之间的猜疑和仇恨。十字军战士控制了圣地大约一百年，圣地随后再次落入穆斯林之手。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346

数百年来，基督徒始终对圣地耶路撒冷怀有崇高的敬意，到基督教的诸圣地朝圣已经成为最敬虔的灵修活动之一。早在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的母亲就认为，到巴勒斯坦的圣地朝圣是一种灵修活动。随后不久，一位名叫埃塞丽娅（Etheria）的西班牙修女——她被普遍称为埃吉里娅（Egeria）——来到圣地，留给我们她对圣地、圣地的习俗和圣地基督徒的仪式的详细记载。她的记载《埃吉里娅的朝圣》（*Peregrinatio Aetheriae*）在11世纪仍在流传，它让我们看到西方基督徒如何看待作为灵修对象的圣地。

几百年来，穆斯林始终控制着圣地。但是现在，刚刚崛起的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成为了穆斯林，他们对拜占庭帝国构成了威胁，并令许多西方人回忆起被阿拉伯人征服时的痛苦经历。如果西方前去解救处于穆斯林威胁之下的拜占庭人，那么自1054年分裂至今的东西方教会有望再次合一。因此，格列高利七世已经计划组建一支西方大军去拯救君士坦丁堡，夺回圣地，但是，时机尚未成熟。在1095年的克莱蒙特会议（Council of Clermont）上，乌尔班二世答应了拜占庭帝国的皇帝阿历克塞一世（Alexis I）提出进攻土耳其人的要求，当他宣布这项伟大的事业时，与会者的回应是高呼“上帝所愿”（*Deus vult*）。

那是一段艰难岁月，欧洲许多地区庄稼欠收，疾病肆虐。因此，作为基督的精兵到国外征战的呼召得到了许多人的热情响应，既有普通百姓，也有贵族。基督徒以前对新千年的盼望再次复活，被压抑数百年之久的启示之梦再次出现。有些基督徒看见了彗星、天使或圣城悬在东方地平

线上的异象。很快，一群无组织的乌合之众就在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松散的领导之下从科隆向耶路撒冷进发。他们一路上像蝗虫那样侵食田地里的庄稼，他们甚至与保护自己财产与庄稼的基督徒大打出手。他们也向异教徒开战，杀害了成百上千的犹太人。最终，这群乌合之众大多数人丢了性命，余下的少数人加入组织更加严密的十字军队伍。

正规十字军的统帅是勒皮的主教阿代马尔（Adhemar of Puy），乌尔班二世任命他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其他领袖是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圣吉尔的雷蒙（Raymond of Saint-Gilles）、博西蒙德（Bohemund）和塔克雷德（Tancred）。十字军战士经不同路线在君士坦丁堡集结，皇帝阿历克塞一世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隐士彼得和他的残余部队在君士坦丁堡加入正规的十字军。在拜占庭人的帮助之下，他们攻取了曾是土耳其人首都的尼西亚——拜占庭人率先进入了尼西亚，因为阿历克塞一世担心，十字军战士会洗劫尼西亚。他们随后向安提阿进军，在穿越小亚细亚时，他们遭受到严重的损伤。在塔尔苏斯城前，塔克雷德与戈弗雷的弟弟鲍德温（Baldwin）起了争执，鲍德温决定放弃此次东征，他接受了亚美尼亚人的请求，成为他们的领袖——埃德萨伯爵（Count of Edessa）。其余的十字军战士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安提阿，他们最终将安提阿包围，就像之前围攻尼西亚那样。

347

围攻安提阿并不是一件易事。安提阿守军比十字军的补给更加充足，十字军的食物即将用尽，一些战士纷纷逃走；这时，安提阿城内的亚美尼亚基督徒为他们打开了城门。在“上帝所愿”的欢呼声中，十字军战士进入了安提阿，而城中的土耳其守军逃到他们的大本营中避难。然而在四天之后，一支土耳其大军抵达了安提阿，十字军战士被包围了，而躲在大本营中的土耳其人也还在与他们对峙。饥饿不堪、士气低迷的十字军战士开始怀疑他们此次东征是否明智。

后来，有十字军战士声称得到一个异象，刺穿基督肋旁的圣矛就埋在安提阿。在这位“先知”的带领下，十字军战士在他预言的地方挖出了一

支长矛！十字军相信这就是圣矛，他们决心继续战斗。在禁食祷告了五天之后，按照这位预言圣矛的异象者的指示，十字军开始从数量远远胜过他们的土耳其军队中突围。他们的军旗就是圣矛。他们癫狂般地拼死突围，土耳其人四散逃跑，十字军尽情享用土耳其人留下的食物。他们还俘虏了被土耳其人遗弃在军营中的许多妇女。一位吹嘘基督徒军队圣洁的见证人说："我们并没有对她们作恶，只是用长矛将她们刺死。" 348

在围攻安提阿期间，被任命率领十字军的主教阿代马尔死于热病，十字军变得群龙无首。漫长的统帅之争延误了十字军进攻的时间；最终，布永的戈弗雷成为十字军的新统帅。1099 年 6 月 7 日，十字军战士第一次看见了圣城。

保卫耶路撒冷的人并不是土耳其人，而是来自埃及的法蒂玛王朝的阿拉伯人——因为他们自称是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Fatima）的后裔。的确，十字军之所以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是因为穆斯林并不团结——就如阿拉伯人以前能够征服广阔领地的原因也是他们的敌人并不团结。十字军在尼西亚和安提阿与之战斗的土耳其人是逊尼派，而占领耶路撒冷的法蒂玛阿拉伯人是什叶派。此外，根据阿拉伯编年史家伊本·阿尔·阿西尔（Ibn AL-Athir）所说，十字军应法蒂玛阿拉伯人的要求来到了叙利亚，因为法蒂玛阿拉伯人担心势力正在不断壮大的土耳其人。

耶路撒冷的卫戍部队做好了长期围城的准备。附近地区被夷为平地，井水被下了毒药，以便围军得不到任何供给。十字军也料想到漫长的围攻。但是，他们在 7 月初得到消息，一支法蒂玛阿拉伯大军正在向耶路撒冷挺进，他们认为，要么必须夺城，要么必须撤军。他们的事业是上帝的事业，因此，他们祈求上帝的帮助。他们赤脚绕城，歌唱忏悔诗。几天之后，他们开始攻城，遇到顽强的抵抗。但是，一个单枪匹马的骑士最终爬上了城墙，为十字军开辟了一条血路。城墙上的裂口越来越大，十字军战士纷纷涌上城墙，守军已无力抵抗。他们逃下城墙，十字军蜂拥入城。他们终于实现了长期战斗的目标。这一天是 1099 年 7 月 15 日。 349

当时的文献记载，随后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全部守军和大量平民惨遭杀害。妇女被强奸，婴儿被摔死在城墙上。城中许多犹太人逃到会堂中避难，而十字军放火点燃会堂，将他们活活烧死在里面。在所罗门廊(Porch of Solomon)，战马在血泊中前行。但是，当今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这样的记载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

随后，十字军以西欧的模式重建被他们征服的地区。布永的戈弗雷被任命为圣墓保护人，他的弟弟鲍德温于1100年继承了他，头衔是耶路撒冷国王。耶路撒冷王国的主要封臣有安提阿的王子(Prince of Antioch)博西蒙德、埃德萨伯爵鲍德温以及特里波利伯爵(Count of Tripoli)图卢兹的雷蒙德(Raymond of Toulouse)。

十字军东征后期历史

许多十字军战士觉得使命已经完成，他们准备返回祖国。布永的戈弗雷没有足够的骑士去迎战正在向耶路撒冷挺进的穆斯林军队。十字军在阿什凯隆(Ashkelon)击败了穆斯林，因此，拉丁耶路撒冷王国短暂存活了一段时间。但是，拉丁耶路撒冷王国急需增援，因此按照惯例，会有一小批军人离开欧洲，到圣地服役一段时间。其中许多人留了下来，其他人在一次近乎军事朝圣之旅的经历之后回到祖国。

十字军东征的狂热仍在群众中延续。不断有人得到启示异象，他们在进军耶路撒冷的途中召集了许多鱼龙混杂的追随者。还有一些人声称，既然上帝喜爱无罪的人，那么，儿童可以在十字军东征事业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这就出现了数支“儿童十字军”(Children's Crusades)，他们只是一群群东征的孩子和少年，或是死在东征途中，或是沿途被俘，成为奴隶。

十字军精神和十字军东征在数百年来始终独具特色，因此，将“数次十字军东征”视为一系列孤立的军事战争并不完全正确。但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整个过程中出现了一次次高潮，它们通常被称为“第二次十字军东

征”、“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等等。因此，概述这一次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将向我们展现后期十字军精神的一些特点。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起因是埃德萨的陷落。公元1114年，阿勒颇的苏丹(Sultan of Aleppo)攻取了埃德萨。民间布道家再次兴起，他们号召群众入侵圣地。一些人在沿途声称应当灭绝犹太人。明谷的伯尔纳的讲道极为不同，他既希望组建一支解救耶路撒冷王国的军队，也希望驳斥鼓吹疯狂进攻耶路撒冷那些讲道人的狂热。最终，在法国路易七世和德国康拉德三世(Conrad III)的率领之下，一支大约二十万人的军队向圣地挺进。他们屡次被土耳其人击败，战果寥寥。

耶路撒冷王国曾经一度强大，它在阿马里克一世(Amalric I)的统治之下甚至扩张到了开罗。但是后来穆斯林卷土重来，在埃及苏丹萨拉丁(Saladin)的领导之下于1187年攻取了耶路撒冷。

这个消息震惊了基督教国家，教宗克莱门三世重新召集十字军。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由三位君主领导：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英格兰的狮心查理(Richard the Lionhearted)和法国的奥古斯特·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Augustus)。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也以失败告终。腓特烈·巴巴罗萨溺水而亡，他的军队随之解散。在长达两年的围攻之后，查理和腓力二世只夺取了阿卡(Acre)。后来，腓力二世回到了欧洲，他希望利用查理不在的时机夺取他的部分领地。查理在回国途中被德国皇帝俘获，成为阶下囚，直到他许诺交出大笔赎金才被释放。

英诺森三世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此次东征的目标是进攻萨拉丁在埃及的总部。著名的布道家纳伊的福尔盖(Foulques of Neuilly)被委任为此次东征招募军人与募集资金。福尔盖极其反对高利贷和各种社会不公，正在形成的货币经济令富人更加富有，而穷人还生活在贫穷之中，这种经济制度激怒了福尔盖。他在倡导十字军东征的布道中宣称，上帝拣选穷人来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所有人都应当参与这项事业。不能亲自东征的人无论有多穷，都应当资助东征的战

士。富人也必须参与进来，因为这样做会令他们剥削穷人的罪得蒙赦免。十字军就这样被召集起来了，他们迫不及待地向在其首都的萨拉丁发起了进攻。

然而福尔盖并不知道，甚至教宗英诺森三世也不知道，还有其他计划正在酝酿之中。两个对手正在争夺君士坦丁堡的皇位，其中一位请求英诺森三世先将十字军派到君士坦丁堡帮他夺取皇位。作为报酬，他将支持十字军讨伐萨拉丁。英诺森三世拒绝了，但是，威尼斯人同意了——他们的舰队负责将十字军运送到埃及，为了换得大笔金钱，他们将十字军送到了君士坦丁堡。因此，十字军改变了航程，驶向了君士坦丁堡，并攻占该城。他们随后任命佛兰德的鲍德温（Baldwin of Flanders）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拉丁君士坦丁堡帝国（1204—1261 年）就这样诞生了。他们还任命了一位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牧首，因此，东西方教会至少在理论上合一了。最初，英诺森三世对十字军被如此滥用而感到愤怒，但他最终相信，这就是上帝令教会重新合一的方法。然而，拜占庭人并不这样简单地接受，他们继续进行漫长的抵抗，并建立了许多拒不承认拉丁皇帝权威的国家。最终，在这些分裂出来的国家中，尼西亚帝国（Empire of Nicea）于 1261 年重新夺回了君士坦丁堡，结束了拉丁君士坦丁堡帝国。整个事件的最终结果是，说希腊语的东方对说拉丁语的西方敌意更重了。

351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领袖是“耶路撒冷国王”——他声称是耶路撒冷国王，即使穆斯林已经控制耶路撒冷很久，即使他从未到过耶路撒冷。此次十字军东征向埃及发起了进攻，但收效甚微。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由被革除教籍的皇帝腓特烈二世领导，此次十字军东征比其他几次都更加成功，因为皇帝腓特烈二世与苏丹达成了一项协议，苏丹将耶路撒冷、拿撒勒、伯利恒和连接耶路撒冷与阿卡之间的道路给了腓特烈二世。腓特烈二世进入了耶路撒冷，以前从未有过十字军统帅进入耶路撒冷，因此，他将自己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曾将他革除教籍的教宗格列高利九世愤怒了，但是，欧洲人却欢欣雀跃，他们将腓特烈二世称为“耶路撒冷的解放

者”。法国的路易九世——圣路易(Saint Louis)——领导了第七次和第八次十字军东征,这两次东征是两场大灾难。路易九世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中被穆斯林俘虏,并被迫交出了大笔赎金。在第八次十字军东征中,他在突尼斯死于热病。这一年是1270年,十字军东征在这一年结束了。

西班牙复地运动

穆斯林于公元8世纪灭亡了西班牙的古西哥特王国,该王国只有一小部分残余不安定地生活在西班牙北部的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地区。后来,法兰克人进一步向东方扩张他们的势力。这两地成为与穆斯林进行漫长战争的中心,在西班牙,这场漫长的战争被称为西班牙复地运动(*Reconquista*)。虽然后来的传说将西班牙复地运动描述成基督徒与异教徒之间近乎持续不断的战争,但是事实却更加复杂,因为基督徒彼此之间的战争似乎与他们和穆斯林的战争同样激烈,跨宗教的联盟以及穆斯林与基督徒的通婚,也相当普遍。

在对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的统一过程中,“发现”圣雅各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了公元9世纪,圣雅各墓已经成为西欧各地基督徒的主要朝圣地之一,因此,通往圣地亚哥——圣雅各——的道路令西班牙北部与西欧其他基督教国家一直保持着联系。最终,圣雅各成为基督徒在与穆斯林战争中的主保圣徒,因此,他被称为圣地亚哥·马塔莫罗斯(*Santiago Matamoros*)——圣雅各,摩尔人的毁灭者。

352

西班牙的穆斯林始终没有统一。在科尔多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Amir Abd-al-Rahman)于公元929年成为哈里发之后,穆斯林最伟大的时代来到了。但是,内战最终断送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科尔多瓦的最后一位哈里发于1031年被他的对手废黜时,西班牙的穆斯林国家很快就分裂成众多小王国。西班牙复地运动正是在这时开始取得成功。到了1085年,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王国(Kingdom of Castile)夺取了西哥特人

随着西班牙复地运动神话的出现，维瓦（Vivar）的罗德里格·迪亚兹成为民族身份与统一的象征，他的阿拉伯名字是埃尔熙德（El Cid），并以这个名字为人所知。图为他的家乡维瓦村纪念他的雕像。



的古代首都托莱多。这招来摩尔人的反攻，他们从北非派来了援军。但是，1212年基督徒国王联手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Battle of Las Navas de Tolosa）中击败了摩尔人，从此以后，西班牙复地运动取得了飞速进展。到了1248年，伊比利亚半岛唯一尚存的一个摩尔人的王国是格兰纳达王国（Kingdom of Granada），它必须向卡斯蒂利亚国王称臣纳贡才能存活下来。这种局势一直持续到1492年，格兰纳达最终落入费迪南（Ferdinand）和伊萨贝拉（Isabella）之手。

只有在西班牙和西西里岛——诺曼人于11世纪征服了西西里岛——基督徒才对穆斯林取得了永久性的军事胜利。

进攻穆斯林的影响

进攻穆斯林最直接的后果是，基督徒与穆斯林、拉丁基督徒与拜占庭基督徒相互越来越不信任，越来越敌对。十字军东征和它所造成的杀戮并不能被轻易遗忘，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1世纪。在十字军东征时，伊拉克诗人阿尔·阿比瓦第（al-Abiwardi）所写下的诗篇，会让我们想起我们在自己时代听到的许多事情：

353

> 难道外国人一定要因我们的耻辱而洋洋自得，而你们，却在安逸中苟且偷生，仿佛你们的世界太平无事？

闪亮的刀尖何时被鲜血染红，暗褐的长矛何时布满血污？

这是战争，安息在麦地那坟墓中的穆罕默德，似乎扬声高喊：

"哦，哈希姆的子孙！

我看见我的人民迟迟不举起长矛对抗敌人；我看见信仰宁息在苍白的善功上"。[1]

在西欧，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复地运动增强了教宗的权力。教宗发动了十字军东征，并任命了他们的领袖，教宗还对西班牙特别关注，因此，教宗进一步获得了国际权力。当乌尔班二世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他的权力遭到了质疑，尤其是在德国。但是到了英诺森三世时期，当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夺取君士坦丁堡时，教宗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十字军东征也影响到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与圣地越来越多的接触使人们将目光转向了圣经中的历史故事，基督徒的灵修逐渐以耶稣的人性为中心。明谷的伯尔纳是宣扬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布道家，他也是全心默想耶稣人性的神秘主义者。描述耶稣受难每一个细节的一首首诗篇与一部部著作出现了。因为类似的原因，真十字架的残片、主教的遗物、圣经人物的牙齿等圣物在欧洲随处可见，这为有着古老渊源的圣徒遗物崇拜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

354

随着军事修会的建立，修道主义理想有了新的方向。军事修会的修士立下顺服、守贫和守独身的传统修道誓愿。但他们是战士，他们无法将他们的时间用来默想与研究。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Order of Saint John of Jerusalem，后将总部搬到马耳他）、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s）和其他骑士团纷纷在耶路撒冷成立。在西班牙也建立了类似的骑士团，如卡拉特拉瓦（Calatrava）骑士团、阿尔坎塔拉骑士团和圣地亚哥骑士团。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很久之后，这些骑士团仍然存在，其中一些拥有了极大

---

① Quoted in Francesco Gabrieli, *Arab Historians of the Crusades* (New York: Dorset, 1957), 12.

的权力。圣殿骑士团拥有巨大的财富与权力，以至于法国国王腓力四世（Philip IV）于1307年指控他们是异端、巫师且道德败坏，在教宗克莱门五世（1305—1314）的默许之下，腓力四世处死了圣殿骑士团在法国的领袖，没收了他们的巨额财产。1312年，克莱门五世镇压了所有基督教国家的骑士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圣殿骑士团的虚假指控，很快就有传言称，圣殿骑士团的确是信奉古代诺斯替主义的异端团体。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在西班牙的权力极大，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在努力统一他们所统治的地区时任命费迪南为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的团长。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则一直统治着马耳他，直到拿破仑于1798年将他们推翻。

十字军精神也被用来对付异端。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类似于古代摩尼教徒——他们相信在宇宙中进行着力量相当的善恶之争——的一些教义广为流传。这些教义似乎是从拜占庭帝国的保加利亚





长久以来，科尔多瓦都是穆斯林的权力与知识中心，并对十字军东征以后的基督教神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此过程中，两位最具影响力的科尔多瓦人是穆斯林阿威罗伊和犹太人迈蒙尼德。图为科尔多瓦城纪念他们的两尊雕像。

传来的，这里的“鲍格米勒派”（Bogomils）长久以来始终信奉一种摩尼教的二元论。他们也被称为清洁派（Cathars）——源于一个意为“清洁”（pure）的希腊词——或阿尔比派（Albigensians），因为他们在法国南部的城镇阿尔比（Albi）人数众多。为了对付他们，英诺森三世发动了一场圣战，1209年，法国北部野心勃勃的贵族入侵了法国南部。同十字军曾在穆斯林世界犯下的暴行相比，他们对阿尔比派和从附近赶来援助阿尔比派的正统基督徒所犯下的罪行毫不逊色。这表明，在未来的若干年，十字军理想被用在了不同环境中，远远偏离了它最初收复圣地的目标。

在神学领域，重新接触穆斯林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穆斯林的西班牙曾是学术中心，穆斯林的西西里岛虽然略逊一筹，但也是如此。在科尔多瓦，诞生了中世纪最伟大的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以及中世纪最伟大的穆斯林哲学家伊本·拉西德（Ibn Rushd）——西方文献中将他称为阿威罗伊（Averroes）。他们与其他哲学家共同复兴了大量的古代哲学，并将古代哲学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学问题联系在一起。尤 355
其是阿威罗伊，他撰写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注释，这些注释被广泛使用，以至于他被称为“评注大师”。这些哲学家和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著作从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传到了西欧，在13世纪，他们这些著作将在西欧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哲学与神学活动。

最后，十字军东征与几乎同时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经济、人口变化有着复杂的联系。虽然十字军东征明显促进了这些变化，但是其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历史学家并没有就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达成共识。不管怎样，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是城市与经济发展的时代，贸易在城市与经济中再次频繁起来。在此之前，贸易主要是物物交易，财富唯一的重要来源是土地。因此，经济权力掌握在控制土地的贵族和高级教士手中。但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起来，在其中，贸易越来越重要，货币与信用证是进行贸易 356
的基础。这种经济带来了新的财富来源，它促进了城市的增长，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开始在城市中形成。资产阶级这个名字的意思就

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他们主要是由经济与政治权力正在增长的商人构成。他们很快就成为君主的盟友，来一同对抗权力过度膨胀的大贵族；最终，他们将在法国大革命中战胜国王和贵族。

第三十二章

中世纪基督教的黄金时代

就如上帝在天空中设立了两个巨大的光体，大的管理白昼，小的管理黑夜，上帝也在普世教会的天空中设立了两个光体……大的像管理白昼那样管理灵魂，小的像管理黑夜那样管理肉体。这些就是教宗的权柄与君王的权力。

——英诺森三世

随着十字军东征的结束，中世纪的基督教发展到了顶峰。这主要可以从中世纪宗教生活两个重点的发展中看出：修道主义和教宗。这也在基督教的神学、传教和建筑上有所体现。因此，我们将以如下顺序来简述中世纪的基督教：托钵修会的发展、教宗权力的增长、神学活动、宣教事业和教会建筑。

托钵修会

城市、贸易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总是受到欢迎。例如，货币经济取代了实物交易，促进了更加专业的生产，从而增加了全民财富，但是，货币经济的一大弊端是令贸易变得更间接，更缺少人性，而且还加大了贫富差距。城市的发展及其导致的人口流动也令传统的教区式教牧工作难以满足涌入城镇的基督徒的需要。因此，数百年来始终表现出极大适应性的修道主义自然会有新的发展，而新的修道主义既质疑了货币经济的道德性，也满足了流动人口的需要。能

够做到这两点的修士是托钵修士——依靠乞讨为生的修士。

358 托钵修会的先驱之一是12世纪里昂的一位商人彼得·瓦尔多(Peter Waldo)。他听到一个过着极度贫穷生活的修士的故事,被这个故事所感动,因此决志过贫穷与布道的生活。他很快就召聚了一大批追随者,但是,里昂的大主教禁止了他们的活动,因为他们似乎在批评富人,削弱他的权威和他对信仰生活的控制。他们向罗马提起了上诉,但是被任命审理这起案件的神学家却嘲笑他们无知。尽管遭到嘲笑和不断的谴责,他们还是继续布道。后来,他们被迫隐退到阿尔卑斯山偏远的山谷,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新教改革时期。在宗教改革时,改革宗神学家去到他们中间,他们接受了改革宗神学家的教义,从而成为了新教徒。

早期的方济各运动与瓦尔多运动极其类似。方济各(Francis,约1181—1226)同彼得·瓦尔多一样来自商人阶层,他是意大利人,真名是吉奥瓦尼(Giovanni)。他的母亲是法国人,他的父亲与法国有贸易往来,方济各本人也喜欢法国行吟诗人的诗歌。因此,他在家乡阿西西(Assisi)的朋友很快就将他称为"法兰西斯科"(Francesco)——小法国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用这个名字称呼他。

方济各同彼得·瓦尔多一样,经历过一次深刻的宗教体验,这次经历让他接受了贫穷的生活。据说,他的朋友有一天看到方济各格外高兴,于是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高兴?"

"因为我结婚了。"

"你娶了谁?"

"贫穷女士!"

359 方济各随后将他的财产全都分给了穷人。如果他再从父母那里得到什么,他会立即施舍出去。他衣衫褴褛,向每一个愿意倾听他的人赞颂贫穷之美。他重建被废弃的小礼拜堂,享受自然的美与和谐。他的父亲将他关进了地下室,并向教会当局求助。主教最终决定,如果方济各不愿意

波提温克拉小礼拜堂。



明智地使用他的家产，他必须放弃它们。一接到判决，他就放弃了他的继承权，并且将身上的衣服也还给了他的父亲。他赤身露体去到森林，在那里过上了隐修士的生活，并用大量时间重建一座荒废的小礼拜堂——它被称为波提温克拉（Portiuncula）。

后来，在1209年年末，方济各听到了《马太福音》17:7—10的经文。在这段经文中，耶稣派他的门徒出去传道，并告诉他们不要带任何金银铜钱。在此之前，方济各几乎只关心自愿的贫穷和他在其中得到的喜乐。现在，他看到了将贫穷与布道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他的住所不再是偏僻的隐修处，而是喧嚣的城市。哪里有人居住，他就会在哪里讲道，帮助穷人和病人。现在，自愿的贫穷不仅是一种自我操练的方法，更是一种融入缺衣少食的穷人的方法。

在这个新异象的带领之下，方济各离开了他的隐修所，回到了阿西西。他在阿西西讲道，遭到了以前朋友的嘲笑。但是，一小群追随者逐渐聚集在他周围，他和这些少数追随者来到罗马，请求教宗批准他们建立新修会。当时的教宗是英诺森三世，他是有史以来最有权势的教宗，也是有史以来最明智的教宗。他并不想批准方济各的请求。据说，英诺森三世告诉方济各，他看起来像一头猪，应该到猪群中打滚。方济各真的去到猪圈中，他满身是泥，回到英诺森三世那里对他说："教父，我按照您的吩咐

360

做了；现在，您能按照我的请求做吗？”不管这个故事是否属实，英诺森三世实际上比他的前任们更加精明，他在试验了方济各的勇气之后同意了他的要求。

方济各带着教宗的许可回到阿西西继续自己的工作。人们很快就涌进了他的新修会——小兄弟会（Order of Lesser Brothers，或 *Friars Minor*）。圣克莱尔（Saint Clare）是方济各的属灵姐妹，她建立的女修会通常被称为克莱尔会（Clarisses）或贫穷克莱尔会（Poor Clare）。方济各修会的讲道、唱诗和乞讨成为全西欧一道亮丽的风景。

方济各担心，这场运动的成功也会造成这场运动的失败。当他的追随者开始受到尊重时，他开始为他们的谦卑担忧。据说，当一个新入会的修士问他拥有《诗篇》是否合法时，他回答说：“当你有了《诗篇》时，你就会要《祈祷书》。当你有了《祈祷书》时，你就会像主教那样爬上讲坛。”

这个故事还讲到，一个托钵修士欢欢喜喜地回到了修道院，因为有人给了他一枚金币。方济各命令他交出这枚金币，将金币埋到麦堆之中，并告诉他那才是金币的最好归宿。

方济各充分意识到，成功会给他的修会带来诱惑。他立下遗嘱，禁止他的追随者拥有任何财物，或向教宗和其他任何人请求放宽他所制定的《会规》。

在1220年举行的全体修士大会上，方济各放弃了他的修会领导权，他顺服地跪在了继任者的面前。1226年10月3日，他在自己年轻时重建的波提温克拉去世。据说，他的临终遗言是：“我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现在，愿基督让你们知道你们的职责。欢迎你，死亡姐妹！”

另一位重要的托钵修会创建者是多明我（Dominic）。他大约比方济各大十二岁，但是他创建托钵修会的工作开始得稍晚一些。他生于卡斯蒂利亚的卡莱鲁埃加（Caleruega）一个贵族家庭，今天，他们家族的城堡仍在西班牙北部独占风光。

在帕伦西亚（Palencia）学习大约十年之后，多明我成为奥斯玛（Osma）



圣多明我在家乡卡莱鲁埃加的雕像。

教堂的一位教士。四年之后，在他二十九岁时，奥斯玛教堂的全体教士大会决定采纳《圣奥古斯丁修道规章》。这就意味着，奥斯玛教堂的全体教士必须过修道生活，但是，他们并不远离尘世，也不停止牧养信徒。

1203 年，多明我和他的主教奥斯玛的迪戈（Diego of Osma）访问了法国南部。阿尔比派的成功以及阿尔比派迫使他们归信正统信仰的努力感动了多明我。阿尔比派将世界分成恶的物质世界和善的精神世界，这种二元论非常容易理解，但却是神学异端。多明我还注意到，阿尔比派的主要吸引力在于他们领袖的苦修生活，这与许多正统神父和高级教士的安逸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多明我相信，讲授正统信仰是与异端作斗争更好的方法。为了能最好地驳斥异端，他将他的教导与严格的修道生活、刻苦的学习结合在一起。在比利牛斯山麓上，他为从阿尔比派归信正统信仰的贵妇建立了一所学校。他的成功激励了图卢兹的大主教，他给了多明我一座供他讲道的教堂和一处房产，多明我用这处房产创建了一座修道院。

随后不久，多明我在图卢兹大主教的支持下来到罗马，请求英诺森三世准许他建立拥有自己会规的新修会。英诺森三世拒绝了，因为他担心这会迅速衍生出不同的修道会规。但是，他鼓励多明我继续自己的工作，并采用一个现有的修道会规。一回到图卢兹，多明我和他的追随者就采用了《圣奥古斯丁修道规章》。后来，通过进一步立法，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修改了《圣奥古斯丁修道规章》。他们也采纳了贫穷与行乞的修道会

规，这也许是效法方济各修会之前的做法，但是，这肯定是驳斥阿尔比派论点的一种方法，因为阿尔比派声称，正统基督徒太世俗化了。

布道兄弟会（Order of Preachers）——多明我修会的官方名称——从一开始就强调学习。就这一点而言，多明我不同于圣方济各，因为方济各甚至都不希望他的托钵修士拥有《诗篇》，他对学习也产生了怀疑。在驳斥异端时，多明我修会的修士必须要有良好的知识装备，因此，多明我修会所招募的新会员都受到扎实的知识训练。他们很快就为教会输送了最杰出的神学家——尽管进入神学领域稍晚一些的方济各修会并没有落后太远。

362

这两个托钵修会遍布于欧洲大部分地区。他们还拥有女修会，甚至是"第三修会"，加入"第三修会"的基督徒过着方济各修会或多明我修会的敬虔生活，并采取其中某个修会的习俗，但是，这些基督徒并不会成为修士，也不会放弃他们在社会中的世俗职分。"第三修会"既帮助传播方济各修会和多明我修会的敬虔生活，也为托钵修士提供支持。很快其他类似的运动就出现了，或一些古代修会采取了方济各修会和多明我修会的做法。总的来说，同布道兄弟会相比，方济各修会的后期历史更加动荡。

起初，多明我修会将贫穷视为加强与帮助他们驳斥异端的一个论点。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讲道、教导和学习，贫穷被视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种方法。因此，当新环境似乎令多明我修会拥有财产变得明智时，这并没有为多明我修会造成太大的困难，依靠行乞为生的修道理想因此被放弃了。同样，放弃行乞生活与多明我修会的最初动机并不相矛盾，因此，多明我修会很快就在同一时期兴旺发展的大学里建立了据点。

当时两个主要的神学研究中心是刚刚创立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在巴黎和牛津，多明我修会都建立了自己的修道院，并很快就有自己的教授在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授课。不久以后，多明我修会的修士——如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和托马斯·阿奎那——就在知识领域为该修

会带来了巨大的威望。

方济各修会也在大学里建立了据点。1236年，巴黎大学的一位教授哈勒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Hales）加入了方济各修会，小兄弟会就这样有了第一位大学教授。不久以后，西欧的所有重要大学都有了方济各修会的教师。

虽然早期的方济各修会取得了成功，但是，方济各所建立的修会有着动荡的历史——这也许正是因为早期方济各修会的成功。方济各本人始终担心，他的托钵修士会变得安逸富有。因此，他规定了绝对的贫穷，这不仅是给每个修士的命令，也是给整个修会的命令。他在自己的遗嘱中重申了这个命令，因为他禁止追随者对他所制定的《会规》做出任何修改。

在方济各去世不久后，方济各修会内部出现了两个派别。严格派坚持谨守方济各的命令。温和派认为环境的改变要求人不要拘泥于《会规》的字面解释，方济各修会应当可以接受为推动宣教所赠与的财产。1230年，格列高利九世宣布，方济各的遗嘱不再具有约束力，因此，方济各修会请求罗马修改贫穷这一会规。1245年，方济各修会开始拥有财产，但是罗马教廷对此具有所有权，修会只具有使用权。最终，甚至这个会规也被废除，方济各修会逐渐拥有了巨额财产。

与此同时，严格派越来越远离教会的统治集团。他们将发生的一切视为对圣方济各的严重背叛。很快，一些严格派就开始宣称，费奥雷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的预言正在实现。约阿希姆是方济各的前一代人，他将历史分成三个相继的时代：圣父时代、圣子时代和圣灵时代。圣父时代从亚当到耶稣持续四十二代。约阿希姆认为，上帝喜爱和谐有序，因此，圣子时代也将持续四十二代。每一代是三十年，约阿希姆得出结论，圣子时代将在1260年结束，圣灵时代随之开始。在圣子时代，修士比其他信徒更加属灵，他们是圣灵时代的先锋。

1260年即将到来，因此，许多疏远教会统治集团的方济各修会严格

派自然会认同约阿希姆的历史观。他们相信，当前的困难只是圣灵时代来临之前的最后斗争，圣灵时代将会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与此同时，教宗和教会的其他领袖最多只是下等信徒，教会很快就不再需要他们。

方济各修会的严格派自称是“属灵人”，他们开始宣讲约阿希姆的理论。他们的一个支持者是方济各修会的总会长帕尔马的约翰（John of Parma），他非常支持他们，以至于他必须为自己的思想不是异端而辩护。因此，在一段时期之内，方济各修会似乎将走上瓦尔多派以前所走过的路线：脱离建制教会。但是，方济各修会的下一任总会长波那文图拉（Bonaventure）——他也是巴黎大学的教授——将深刻的敬虔与对教会领袖的严格顺服结合在一起，“属灵人”发展壮大的势头开始减弱。同样的思想再次出现在14世纪的小兄弟会（*Fraticelli*）中[1]，他们受到了残酷的逼迫，直到最终消失。

群羊归一牧

公元1122年的《沃尔姆斯协定》赋予皇帝选任主教的世俗权力，而不是宗教权力，但是《沃尔姆斯协定》并没有帮助教宗摆脱困境。在罗马，一些有权有势的家族仍然希望控制教宗，利用教宗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很快就再次有两个人声称是合法的教宗。如果不是明谷的伯尔纳决定性地支持英诺森二世，欧洲将再次因效忠两位教宗而产生分裂。英诺森二世的对手夺取了罗马，他随后逃到支持他的法国避难。英格兰和德国是法国的传统敌人，就是否效忠英诺森二世而言，这两国犹豫不决。但是，伯尔纳说服了英格兰和德国的君主支持英诺森二世。最终，在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帮助之下，英诺森二世得以重返罗马。

364

然而，皇帝后来去世，英诺森二世与新皇帝的关系开始恶化。共和主义思想正在意大利传播，为了颠覆当局，英诺森二世支持意大利北部帝国

---

① *Fraticelli* 是意大利语，意为小兄弟（little brothers）。

城市的共和党，而皇帝支持罗马的共和党。神圣罗马帝国的许多城市爆发了起义，它们自称共和国。罗马人民也爆发了起义，他们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还选出了罗马元老院。他们宣布顺服英诺森二世的属灵权威，不服从他的世俗统治。随后几任教宗很少能住在罗马。在下一任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统治期间（1152—1190），教宗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更加紧张，最终，巴巴罗萨选出了数位反对派教宗。但是，他并没能在意大利强制推行他的政策，意大利的起义城市组成了伦巴第联盟（Lombard League），击败了巴巴罗萨。在多年的战争之后，巴巴罗萨与教宗和解了，当时的教宗是亚历山大三世。1178 年，反对派教宗卡里克斯图三世宣布退位。亚历山大三世大度地接受了他的退位，甚至还任命他担任高级教职。

巴巴罗萨为他的儿子亨利娶来了西西里岛的皇位继承人，西西里岛的国王是教宗的传统盟友，因此，巴巴罗萨加强了他的权力。后来，巴巴罗萨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溺水而亡，他的儿子亨利继承了皇位，取名为亨利六世。亨利六世成为德国的皇帝和西西里岛的国王。他控制教宗的意图很快就被识破，教宗西莱斯廷三世（Celestine III）革除了他的教籍。当亨利六世和西莱斯廷三世都去世后，公开的战争似乎在所难免。

神圣罗马帝国还没有从亨利六世的意外去世中恢复过来，因此，枢机主教能够在没有过度压力的情况下选出新教宗。他们选择了三十七岁的罗他里奥·德·康提·迪·塞格尼（Lotario de' Conti di Segni），他取名为英诺森三世。基督教历史上，教宗权力在他身上达到顶峰。

亨利六世的遗孀担心她襁褓中的儿子腓特烈会被德国一些争权的人杀害，因此她宣布，西西里王国是教宗的领地，并将自己的儿子交与英诺森三世保护，把危险转嫁到教宗身上，因为当时西西里王国还在亨利六世的统治之下。

亨利六世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是，皇帝并不是世袭的，而是从贵族中选出。小腓特烈显然还年幼，不能成为皇帝，尤其是在这个皇帝肯定不好当的时候。支持亨利六世以及他的霍亨斯陶芬家族（House of

Hohenstaufen)的贵族选出了他的兄弟菲利普。但是，敌对派选出了奥托四世，他很快就得到了英诺森三世的支持。菲利普当选为皇帝显然更加

365

合情合理。但是，英诺森三世宣布，他被他兄弟的罪行玷污了，不管怎样，教宗有权决定皇帝的合法人选。他宣称，世俗权力与属灵权柄都是上帝所设立，它们就像月亮和太阳。但是，就如月亮从太阳那里接受光芒，皇帝也从教宗那里获得他的权力。英诺森三世以此为基础宣布，奥托四世是合法的统治者。随后爆发的内战持续了十年，直到菲利普被谋杀才宣告结束。

在毫无争议地控制了神圣罗马帝国之后，奥托四世与曾经支持他夺取皇位的英诺森三世决裂了。冲突的主要原因还是皇帝试图在意大利扩张他的权力，而教宗不允许他这样做。奥托四世的代表同前几代人一样，支持罗马的共和党，与此同时，奥托四世准备入侵西西里王国，而西西里王国至少在理论上还属于英诺森三世，因为年轻的腓特烈是英诺森三世的封臣。

为了报复奥托四世，英诺森三世革除了他的教籍。英诺森三世宣布废黜奥托四世，并承认年轻的腓特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合法皇帝。在英诺森三世的支持下，现已成年的腓特烈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到德国，从他叔叔的手中夺过了皇位。对于腓特烈和英诺森三世来说，这是一次奇怪的胜利。通过支持腓特烈，英诺森三世为教宗的传统敌人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复苏做出了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新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之所以能够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因为教宗声称他的权力高于皇帝和国王的权力。因此，在英诺森三世承认腓特烈二世为合法皇帝的同时，新皇帝实际上已经默认教宗有权决定统治者的合法人选。

德国并不是英诺森三世出面干涉的唯一国家。实际上，欧洲的几乎每一位君主都感受到教宗英诺森三世的威力。

在法国，英诺森三世干涉了国王腓力·奥古斯特的婚姻生活。腓力·奥古斯特在丧妻之后娶了一位丹麦公主，但是，他后来抛弃了第二任

妻子，又娶了第三任妻子。英诺森三世规劝他回到他合法妻子的身边，当他拒绝时，英诺森三世禁止整个法国举行圣礼。腓力·奥古斯特召开了一次由贵族和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希望他们帮助他对付教宗。但是，他们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腓力·奥古斯特被迫离开了他的第三任妻子，回到了第二任妻子的身边。随后不久，被废的王后郁郁而终。复位的王后一直都在抱怨，所谓的复位实际上为她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不管怎样，教宗的权力都超过了当时最有权力的这位君主。

366 在英格兰，统治者是约翰·拉克兰(John Lackland)，他是伟大的军事领袖、十字军战士和国王狮心查理的弟弟兼继任者。虽然约翰·拉克兰的婚姻生活比腓力·奥古斯特的还要糟糕，但英诺森三世却没有干涉，因为他当时急需英格兰支持他将奥托送上德国皇位。但是后来在事关坎特伯雷合法大主教人选时，英诺森三世与约翰·拉克兰产生了冲突。当时，有两位竞争者想要成为英格兰这个最重要的主教，他们都向英诺森三世请求帮助。英诺森三世的答复是，他们都不是坎特伯雷的合法大主教，他任命斯蒂芬·兰顿(Stephen Langton)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拉克兰拒绝接受英诺森三世的这一任命，英诺森三世将他革除了教籍。当这一招仍不奏效时，英诺森三世宣布废黜约翰·拉克兰的王位，免除他的所有臣民宣誓向他效忠的誓言，并向他发动了一场宗教战争。这场战争将由法国的腓力·奥古斯特领导，在这件事上，腓力·奥古斯特非常愿意服从英诺森三世的命令。约翰·拉克兰担心，他的大多数臣民不会效忠于他，他难以保住自己的王位，因此，他放弃了抵抗，将整个王国献给了英诺森三世。就这样，整个英格兰成为了教宗的领地，就像以前的西西里王国一样。

英诺森三世接受了约翰·拉克兰的投降，并取消了腓力·奥古斯特正在筹备的宗教战争，他随后成为了他新盟友的坚定支持者。因此，当英格兰的贵族在斯蒂芬·兰顿的支持之下迫使约翰·拉克兰在《大宪章》(Magna Carta)上签字，以此限制国王对贵族的权力时，英诺森三世宣布，这是在篡夺国王的权力。但是，他的所有抗议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英诺森三世还不断干涉西班牙的事务。阿拉贡的佩德罗二世(Pedro II of Aragon)被迫将他的国家变成了教宗的领地，这就令英诺森三世相信，从异教徒——他是指穆斯林——手中征服而来的所有领地都属于教宗。在基督教历史上，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幕上演了：在对异端阿尔比派的宗教战争中，被称为“公教徒”(Catholic)的国王佩德罗二世去世了，但他在世时却支持阿尔比派对抗英诺森三世对他们发动的宗教战争。莱昂王国(Kingdom of Leon)和卡斯蒂利亚王国也受到了英诺森三世的影响，因为英诺森三世并不同意莱昂的国王迎娶他堂兄卡斯蒂利亚国王的女儿。基督教历史上又一幕讽刺剧上演了：一对被教会禁止结婚的夫妻生下的儿子——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的费迪南三世(Ferdinand III)——竟然成为了教会的圣徒。

这些只是英诺森三世众多影响深远的国际政策中的几个例子。他的权力还扩张到葡萄牙、波希米亚、匈牙利、丹麦、冰岛甚至保加利亚和亚美尼亚，他亲自干涉这些国家的事务。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夺取了君士坦丁堡，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虽然并不是他的本意，但这进一步拓展了英诺森三世的势力范围。

367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在英诺森三世担任教宗期间，方济各修会和多明我修会这两大托钵修会成立了，西班牙的基督教王国联手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中击败了摩尔人，此外还爆发了进攻阿尔比派的大规模宗教战争。在这些事件中，英诺森三世都起到了主要作用。

在1215年召开的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所颁发的教令中，我们可以看出英诺森三世改革教会的纲领。此次大公会议颁布了变体说的教义——基督的身体与血的本质在圣餐中取代了饼与酒的实质。经过了短暂的三个会期，此次大公会议就批准了英诺森三世所规定的全部改革。该会议谴责了瓦尔多派、阿尔比派和费奥雷的约阿希姆的教义，创立了主教裁判所，这就意味着，每一位主教都必须调查出现在他教区内的异端，并消灭他们。此次大公会议还规定：禁止创建任何有新会规的新修会，每

一个主教座堂都必须有一所向穷人开放的学校,禁止神职人员进入剧院,进行比赛、赌博、打猎和其他所有类似的娱乐活动,所有信徒每年必须至少忏悔与领受圣餐一次,禁止在没有教宗批准的情况下提出新的圣徒遗物,基督教国家中的所有犹太人和穆斯林都必须穿着有别于基督徒的独特服装,神父施行圣礼收费是违法的。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只有三个会期,而且每个会期只有一天,所以此次大公会议在短短三天之内就完成了这一切甚至更多,因此大多数决议显然并不是与会者共同商议的结果,而是英诺森三世自己所制定的改革纲领的一部分,他只是命令大公会议批准了他的改革。

因此,在英诺森三世统治之下,基督教国家最接近"群羊归一牧"——教宗——的理想。英诺森三世的同代人渐渐相信教宗不仅仅是个凡人,这就不足为奇了;教宗凭借他所得到的权利将权力扩展到人类的每一个领域。

英诺森三世于1216年去世,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他的继任者们沐浴在他的威望所带来的光芒之中。从1254年到1273年,德国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最终是教宗格列高利十世恢复了德国的和平,因为德国是在他的支持之下才将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Rudolf of Hapsburg)选为皇帝。作为回报,新皇帝宣布,罗马和教宗国独立于神圣罗马帝国。

与此同时,法国的权力正在增长,教宗不断在法国得到支持。此外,托钵修会享有巨大的威望,以至于许多人希望,教宗会在他们中间产生。多明我修会的第一位教宗是1276年任期极短的英诺森五世。方济各修会的第一位教宗是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他的任期是从1288年到1292年。 368

当尼古拉四世去世时,枢机主教就教宗的人选问题产生了分歧。一些枢机主教坚持认为,教宗应当在世俗事务中受过锤炼,应当懂得俗世中的阴谋与野心;但是,另一些枢机主教坚守方济各修会的理想,他们希望选出一位能够体现方济各修会理想的教宗。后一派枢机主教最终获胜,

西莱斯廷五世被选为教宗。他来自方济各修会中的“属灵人”一派。当他赤脚骑驴出现时，许多人认为，费奥雷的约阿希姆的预言正在实现。现在，圣灵时代开始了，教会将由谦卑的人和穷人来领导。有二十万满怀希望的信徒去朝见他。在当选为教宗不久之后，他准许方济各修会中的“属灵人”脱离修会，因为以前的教宗已经放宽了方济各修会贫穷的会规，而他自己也过着隐修士般的生活。著名诗人亚科波内·达·托迪（Jacopone da Todi）是方济各修会中的“属灵人”，他同意费奥雷的约阿希姆以前的观点，宣称西莱斯廷五世肩负着世界的希望，如果他失败了，随后将是巨大的灾难。他真的失败了。他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一无所知——他什么也不想知道，因此，他很快就成为那不勒斯的查理二世（Charles II of Naples）的工具，查理二世利用西莱斯廷五世推动自己的政治计划。最终，在当选为教宗不到一年之后，西莱斯廷五世决定退位。他来到枢机主教面前，脱下教宗的紫色长袍，发誓他不会改变主意。他后来再次过起了严格的修道生活，直到四年多之后去世。

西莱斯廷五世的继任者是一个性情迥然不同的人，他取名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1294—1303）。他的通谕《唯一至圣》（*Unam Sanctam*）标志着教宗对世俗权力的要求达到了顶峰：

> 一把剑必须服从另一把剑，世俗权力必须臣服于属灵权力……因此，如果世俗权力偏离了正路，它将受到属灵权力的审判……但是，如果至高的属灵权力偏离了正路，它只能由上帝来审判，而不是接受人的审判……我们进一步宣告、确认并规定，为了获得救恩，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要顺服罗马教宗，这是绝对必要的。[1]

然而，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这样的豪言壮语与当时的局势并不相

---

① *Corpus of Canon Law* 2. 1245.

符，因为正是在卜尼法斯八世担任教宗期间，教宗的权力开始明显减弱。

神学活动：经院神学

教宗的权力在 13 世纪达到了顶峰，托钵修会于 13 世纪诞生，与此同时，中世纪的经院神学也在 13 世纪达到了顶点。经院神学是在"学院"里发展起来的，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它最初在修道院中扎根，但到了 12 世纪，教会学校成为神学活动的中心，直到 13 世纪初它们被大学所取代。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又是城市发展的一个结果。神学从通常远离人口中心的修道院迁移到教会学校，即与有主教的教会联系在一起的学校，因此，神学活动通常是在城市中进行的。后来，神学以大学为中心，因为大学云集了大城市中彼此关系紧密的大批学者。

坎特伯雷的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是经院神学最重要的先驱。他生于意大利，1060 年加入了诺曼底的贝克（Bec）修道院。贝克修道院的院长是兰弗朗克（Lanfranc），他的名望吸引安瑟伦来到了贝克修道院。1078 年，兰弗朗克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离开了贝克修道院。1066 年，诺曼底的威廉征服了英格兰，当时，他从诺曼底既带来了教会领袖，也带来了世俗领袖。1093 年，安瑟伦被召到英格兰，继承了兰弗朗克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之职。他不情愿地来到了坎特伯雷，因为他知道，他很快就会与国王就教会与国家相对权力的问题产生冲突。（七十年之后，时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因类似的原因被谋杀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确，安瑟伦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坎特伯雷之外逃亡，先是在威廉统治时期，后是在威廉的儿子亨利统治时期。同他在贝克修道院时所做的一样，他利用逃亡时间来思索神学问题，并撰写了大量的神学著作。

就经院神学的发展而言，安瑟伦的重要性在于他希望将理性应用到信仰问题之上。他努力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证明一些如果没有理性的证据他就不会相信的东西，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他的信仰。我们可以

在安瑟伦的《论证》(*Proslogion*)第一章的祷告中看出这一点:

> 主啊,我并不希望达到您的高度,因为与您的崇高相比,我的智力微不足道。但是,我希望以某种方法来理解您的真理,这是我心所信与所爱的。因为,我并不是为了相信而寻求理解,而是我相信,以便理解我所信的。[2]

安瑟伦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他希望更加深刻地理解上帝存在的意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在《论证》中逐步阐明了后世所说的"证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简单地说,安瑟伦的论点是:当我们思想上帝时,我们正在思想无法想象比之更伟大的那一位。那么,问题是,可能想象这个无法想象比之更伟大的那一位不存在吗?当然不能,因为如果可能,就存在一个比它更伟大的存在。因此,按其定义,无法想象比之更伟大的那一位这一概念包括其自身的存在。说上帝并不存在,就像说一个有四条边的三角形。历代以来,学者和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这个论证的意义、正确性和对它的正确解释,而且,这些今天还在被讨论。但是,对于教会的历史来说,重要的是安瑟伦的神学方法:为了更好地理解信仰上的真理,他将理性应用到信仰的真理之上。

370

371

安瑟伦在他的《上帝何以化身为人》(*Why Did God Became Man*)中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这篇论文中探究了道成肉身是否符合理性这一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的答案最终成为西方神学的标准答案。罪行的大小是按照罪行的被施与者衡量的,封建制度对罪与罚的看法显然影响到这个观点。因此,就其重要性而言,对上帝犯下的罪行(罪)是无限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人类自己才可以补赎自己的罪。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是有限的,根本就不可能做出上帝的威严所要求的无限的补赎。

---

② *Proslogion*, 1.

因此需要一个神人，上帝必须与人类建立某种关系，上帝化身为人，化身为人的上帝通过他的受苦和死亡补赎了所有人的罪。此前几百年，这种基督论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但是，西方的大多数基督徒很快就接受了这个观点，仿佛它就是唯一符合圣经的基督论。同样，对于教会的历史来说，重要的还是安瑟伦希望使用理性更加充分地理解他已经相信的道成肉身。

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是经院神学另一位重要先驱。他于1079年出生在布列塔尼（Brittany），年轻时受教于当时最著名的一些学者。他发现他们还不够资格，并将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们，因此结下了众多仇敌，他们将他的一生变成一部《苦难史》（*History of Calamities*）——他自传的名字。后来，他去到巴黎，巴黎圣母院的主教委任他教授主教才华横溢的侄女埃罗依斯（Heloise）。老师与学生成为了恋人，他们还生下一个孩子。埃罗依斯的叔叔愤怒了，他找来一伙暴徒，他们闯进阿伯拉尔家将他阉割。阿伯拉尔随后过上了修道生活，但是，他的许多仇敌和那些相信他大胆使用理性就是异端的人却不肯放过他。其中最著名的是圣徒明谷的伯尔纳，他使阿伯拉尔于1141年被谴责为异端。当阿伯拉尔向罗马上诉时，他发现，伯尔纳已经将这扇门紧紧关闭。因此，阿伯拉尔在晚年将自己的一生视为一场场灾难。当他于1142年去世时，已经与教会和解（也与埃罗依斯和好，她继续与他通信），她将他的遗体从克吕尼迁到了他曾经建立并被迫离开的修道院：圣灵礼拜堂（Oratory of the Paraclete）。

阿伯拉尔对经院神学的发展所做出的主要贡献，是他的《是与否》（*Yes and No*）一书。在《是与否》中，他提出了一百五十八个神学问题，然后作出证明，不同的权威，包括圣经和古代的基督教作家，并没有为这些问题给出一致的答案。

这样一部著作自然会招来巨大的反对，尤其因它是一位最有异端嫌疑之人的著作。但是，阿伯拉尔的意图似乎并不是羞辱他所对比列举出的一组组权威，而只是希望证明，神学一定不能只满足于引用权威。在阿

372

伯拉尔看来，必须找到调和明显相互矛盾的权威的方法。最终，经院神学采取了这种方法。典型的经院神学著作以提出一个问题开始，然后再引用似乎支持某一答案的权威。与阿伯拉尔不同的是，经院神学家会再给出一个答案和“解决方案”，证明所有被引用的权威为什么都可能是正确的。

经院神学的第二位重要先驱是彼得·伦巴德（Peter Lombard）。他撰写了《四部语录》（*Four Books of Sentences*）。《四部语录》系统地论述了基督教神学的重要主题，从上帝论到末世论（“最后的事情”）。起初，一些人并不同意《四部语录》中的许多观点，并试图谴责它。但是，它最终成为大学里教授神学的基础教科书。在大学里，学者们通常被要求注释彼得·伦巴德的《四部语录》。因此，重要的经院神学家的著作通常包括他们在教书初期所撰写的一部《四部语录》的注释。



中世纪萨拉曼卡大学教室。学生的桌椅，教授的讲台，当教授讲解文章时，讲师会坐在教授下面一个特殊的位置介绍文章。

彼得·伦巴德对神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是，他确定有七个圣礼：洗礼、坚振礼、圣餐礼、忏悔礼、膏油礼、神职授任礼和婚礼。基督教的圣礼在他之前并不是十分明确，但因为他的影响，这七个圣礼直到今天还是罗马天主教的正式圣礼。

除了经院神学的这些先驱之外，还有两种事物的发展对经院神学的早期历史意义重大：大学的发展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被再次引入西欧。

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学是城市发展的结果。学生聚集在市中心，他们先后在教会学校和其他地方学习，这些课程最终被整合在一起，统称为“普通学科”（general studies）。欧洲的重要大学就是从这些普通学科中发展而来的。但是，中世纪的大学并不是我们现代大学这样的机构，而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学者行会，它们成立的目的是维护会员的权利以及为每个会员颁发水平等级证书。

西欧最古老的大学始于12世纪末，但是直到13世纪，大学才发展成重要的学术中心。虽然学生在每一所大学中都可以接受基础教育，但一些大学很快就因对某一特定领域的研究而闻名于世。例如，希望学习医学的学生会努力进入蒙彼利埃（Montpelier）大学或萨勒诺（Salerno）大学，而拉文纳（Ravenna）大学、帕维亚（Pavia）大学和博洛尼亚（Bologna）大学则因它们的法学而闻名于世。对于神学生来说，学习神学的主要大学是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

373

立志成为神学家的学生必须先在文科系学习若干年哲学和人文学科，然后才可以进入神学系。在神学系里，他们先是作为“旁听生”开始学习，然后渐次成为“圣经学士”、“四部语录学士”、“合格学士”、“持证硕士”和“博士”。到了14世纪，在完成文科系的学习之后，完成神学系的学习还需要十四年。

神学学术训练包括注释圣经或《四部语录》、讲道和“辩论”。辩论是最高水平的学术训练。在辩论中，一个问题被提出，在场有资格参加辩论的人以某种方法为这个问题进行论证，他们论证的基础通常是圣经或某

374

位古代作家。因此,他们看似彼此矛盾的观点就会被汇编成册,就像是阿伯拉尔的《是与否》。然后,老师会花时间准备答案,他必须在下一次辩论中陈述自己的观点,并证明他的观点与支持对立观点的所有权威引证都不矛盾。最终,这个方法得到了普及,以至于后来出现了各种《四部语录》的注释,如托马斯·阿奎那的《驳异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和《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

对经院神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进展,是亚里士多德被再次介绍到西欧。从公元2世纪的查士丁时代开始,大多数基督教神学家,尤其是西方的神学家,习惯于一种基本上是柏拉图主义或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可是,柏拉图主义或新柏拉图主义往往不相信感觉是知识的来源。虽然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著作还在被阅读与使用,但是,这些著作主要是关于逻辑学的,它们与中世纪早期神学的柏拉图主义世界观基本上不相矛盾。但是后来的十字军东征,尤其是与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穆斯林重新接触,让人们更加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显然在很多方面与已被普遍接受的哲学不同——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将感觉视为获得真理的一个步骤。此外,亚里士多德最著名的评注者是阿威罗伊,因此,阿威罗伊的许多观点进入了西欧。尤其是在巴黎大学的文科系,师生们对这种"新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巴黎大学文科系的几位教授热情地接受了新的哲学思想。他们普遍通过穆斯林评注者阿威罗伊的双眼来解读亚里士多德,因此,他们被称为"拉丁阿威罗伊派"。他们的一些基本哲学原理令神学家深感不安。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坚持认为,理性与哲学不受信仰与神学的任何约束。拉丁阿威罗伊派坚持认为,人类应当在理性之路上走到最后,如果理性的结论与神学的结论有所不同,那也是神学家而不是哲学家要去解决的问题。后来,这种观点令他们接受了与基督教传统教义相悖的亚里士多德和阿威罗伊的许多教导。例如,他们认为按照理性物质是永恒的,所有人的灵魂最终是一个灵魂。前者与基督教从无有中创世的教义相矛盾,后

者与基督教个人死后复活的教义相悖。

一些神学家对这一挑战做出了回应，他们重申了传统的柏拉图主义和奥古斯丁的教义。例如，13世纪最杰出的方济各修会神学家圣波那文图拉坚持认为，对于获得正确的理解来说，信仰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创世的教义告诉我们该如何来理解这个世界，而不从创世教义出发的人会轻易得出这一错误的结论：物质是永恒的。此外，所有知识都源于在基督里成为肉身的上帝的道，有人声称离开基督可以获得知识，但他们这是在否定其所自称获得的知识的本质与来源。

375

然而，在拉丁阿威罗伊派的教导与传统的奥古斯丁神学之间，还有另一种选择。这种方法是去探究新哲学是否可能被用于更好地理解基督教信仰。这是两位多明我修会的伟大教师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走上的道路。

大阿尔伯特在巴黎和科隆的学术生涯经常被分配给他的许多其他工作打断，他在哲学与神学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哲学基于一套独立的原理，它们能够不通过启示获得，哲学试图以严谨的理性方法来发现真理。真哲学家不会去尝试证明心灵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即使他们面对的是信仰的教义。另一方面，神学家从启示的真理出发，这是单靠理性所难以获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学的教义更加不确定。相反，启示的真理永远比理性的真理可靠，因为理性可能出错。但是，这也的确意味着，只要哲学家停留在理性真理的范围之内，他们就可以自由地探求理性真理，而不必每一步都去寻求神学的引导。

例如，就世界是永恒的这个问题而言，大阿尔伯特坦白地承认，作为哲学家，他不能证明从无有中创世的教义，他最多只能给出几种可能的论证。但是，作为神学家，他知道世界是从无有中被造的，世界并不是永恒的。这就是理性不能获得真理的一个例子，因为探究的对象超越了人类理性的范围。有的哲学家声称，他们可以证明世界是永恒的或是从无有中被造的，但是，他们都是蹩脚的哲学家，因为他们忽视了理性的局限性。



罗卡塞卡城堡废墟，托马斯·阿奎那出生在这里。

大阿尔伯特最著名的学生是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约于1224年出生在那不勒斯郊区的罗卡塞卡(Roccasecca)城堡。他成长在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所有弟兄姐妹最终都在意大利担任显赫的职务。他的父母原本希望他可以担任位高权重的教职。五岁时，阿奎那被送到了卡西诺山的本笃修道院，开始在那里接受教育。十四岁时他去到那不勒斯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这一切都是他父母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他于1244年决定加入多明我修会。当时，多明我修会正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富人都对这个新修会另眼相看。因此，阿奎那的母亲和兄弟——他的父亲这时已经去世——都试图劝服他改变主意。他们没能说服阿奎那。于是，他们将他锁在自家的城堡中，他被关了一年多，其间，家人对他威逼利诱，试图让他改变主意。但他最终逃跑了，在多明我修会完成了见习期，随后去到科隆，受教于大阿尔伯特。

与年轻的阿奎那相识的许多人都没能看到他的才华。他体胖又沉默寡言，被同学称为“笨牛”。但是，沉默寡言的阿奎那渐渐显露出才华，多

明我修会认可了他的智力天赋。因此，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术圈中度过的，尤其是在巴黎，他成为一位著名教授。

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多得惊人。他最著名的两部著作是《驳异教大全》——这可能是他为在穆斯林中宣教的宣教士撰写的一部神学指南——和神学巨著《神学大全》。他还撰写了《四部语录》的注释、圣经的注释、亚里士多德的数卷注释以及大量的哲学与神学论文。当他于1247年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他在去世之前一段时间有过一系列神秘经验，写作越来越少。大约在去世前一年，他在作弥撒时有过一次经验，此后，他对一个朋友说：“我不能再写作了。我看到了一些东西，它们令我的全部著作像草木禾秸一样没有价值。”他的老师大阿尔伯特比他长寿，大阿尔伯特成为他观点最坚实的捍卫者之一。

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被称为托马斯主义，在此，我们不可能回顾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即使是其中最显著的要点。我们只能讲述托马斯主义中有关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以及阿奎那对上帝存在的论证。前者是托马斯主义的核心，后者向我们展示了阿奎那的神学与他前辈神学的差异。最后，我们还要讲述阿奎那的意义。 377

就信仰与理性的关系而言，阿奎那走上了大阿尔伯特所概述的路线，但是，他更加清晰地阐释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一些真理可以通过理性获得，另一些真理则超越了理性。哲学只研究第一种真理；但是，神学并不局限于第二种真理，因为有一些真理可以被理性证明，且对于获得救恩是必不可少的。上帝并没有将救恩只给予有理性天赋的人，因此，所有为获得救恩而必须认识的真理都已被启示出来，包括凭借理性可以认识的真理。所以，这些真理是哲学和神学都可以探究的一个特定领域。 378

应用这个观点的一个例子，是阿奎那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如果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就不可能获得救恩。因此，上帝的存在是一个启示的真理，教会的权威足以让人相信上帝的存在。没有人能以缺乏理性为借口，因为上帝的存在是一个信条，即使最无知的人也可以凭借信仰相信上帝

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帝的存在是一个超越理性的真理。就上帝的存在而言，理性可以证明信仰。因此，对于哲学和神学来说，上帝的存在是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尽管哲学和神学都采取各自的方法来获得这个真理。此外，理性的探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信仰。

这便是阿奎那的“五法”(Five Ways)或他对上帝存在的论证的目的。这五种论证上帝存在的方法非常相似，我们不必在此赘述。我们只需要指出，其中每一种方法都是从感觉所认知的世界出发，然后再证明这样一个世界需要上帝的存在。例如，第一种方法以思考运动开始了如下论证：运动必然需要一个原动力，因此，必定存在一个最初的原动力，这就是上帝。

就论证上帝的存在而言，如果将阿奎那的论证与安瑟伦的论证做一番比较，结果会非常有趣。安瑟伦不相信感觉，因此，他不是以思考世界开始他的论证，而是以思考上帝这个理念开始。阿奎那走的是截然相反的道路，因为他以感觉可以认知的论据开始论证，并继续论证上帝的存在。这清楚地向我们表明，阿奎那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倾向与安瑟伦的柏拉图哲学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瑟伦相信，可以在纯理念的范围内认识真理，但阿奎那认为感觉是知识的开端。

阿奎那对神学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阿奎那思想的系统性，但最重要的在于他将传统的教义与当时的新哲学结合在一起。

至于阿奎那著作的系统性，他的《神学大全》始终被比作一座巨大的哥特式教堂——《神学大全》同许多哥特式教堂一样，从未完工。我们将在本章最后一个部分中看到，这座巨大的哥特式教堂是一部部气势恢宏的不朽之作，创世与救恩历史每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都在其中得以体现；每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都被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同样，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也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智力之作。即使是不赞同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所表述观点的人也无法否认，《神学大全》具有建筑式的

379

结构与和谐，每一个部分都被安置在最恰当的位置，都与其他部分和谐一致。

但是，阿奎那的意义更在于他将被许多神学家视为威胁的哲学，变成信仰手中的一个工具。数百年来，西方的神学——以及东方的许多神学——始终由柏拉图哲学所主导。这是在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中形成的，与基督教的许多著名人物息息相关，如殉道者查士丁、奥古斯丁、伪迪奥尼修斯和其他许多神学家。柏拉图哲学在许多方面帮助了基督教，尤其是在早期的基督教与异教的斗争中，因为柏拉图哲学提出了一位无形的至高之神、一个感觉所无法感知的更高的世界和不朽的灵魂。可是，柏拉图哲学也有它自身的危险。基督徒根据柏拉图哲学来解释基督教信仰，他们的这种做法可能会越来越贬低现世的价值，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现世是上帝的创造。基督徒也可能贬低道成肉身以及上帝临在一个人的物质肉体中的重要性，因为柏拉图哲学并不关注现世的实在——出现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的实在，而是更加关注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就存在这样一种危险：神学家会更少关注作为历史人物的耶稣基督，而更多关注上帝的永恒的道——这也是根据柏拉图哲学来理解的。

新哲学的出现威胁到基督教的许多传统神学。因此，许多神学家反对新哲学，教会通常禁止阅读与教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谴责经常包括对阿奎那所提出一些命题的谴责，因此，在托马斯主义被视为一种可接受的神学体系之前，还经过了一场关于是否接受托马斯主义的斗争。但是，托马斯主义的价值最终得到了认可，圣托马斯——后世对他的称呼——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

阿奎那及其工作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他不仅帮助教会成功地解决了源自亚里士多德哲学复兴的新思想，同时也为现代科学与观察开辟了道路。传统的柏拉图哲学不相信感觉，因而并不特别赞同观察和实验。这在基督徒中导致了一种对物质世界和自然界的消极态度，如奥古斯丁。他因自己在本该默想上帝真理时去耗时观察蜥蜴而痛悔不已；又

如具有同样心思的安瑟伦，他断言灵魂是为默想上帝而造，如果它有一瞬间不去默想上帝，哪怕默想的是最高级的受造物，这也是罪。奥古斯丁与安瑟伦的这种态度是基督徒消极看待物质世界和自然界的典型代表。相反，阿奎那的老师大阿尔伯特撰写过论动物、植物、天体和地球上物体的著作。阿奎那则令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更合乎基督教神学家的心意，从而使其他神学家可能继续跟随大阿尔伯特的带领，这最终促成了科学的观察、实验和验证的方法。基于这一切，我们甚至可以说，阿奎那为西方的现代性开辟了道路。

380

宣教

方济各对引领穆斯林归信基督教兴趣盎然，1219 年，他来到了埃及的达米埃塔（Damietta），苏丹阿尤布·阿尔·卡米勒（Ayyubid al-Kamil）接见了他，他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可能是因为这次经历，他的《会规》的最后一部分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一些追随者将成为宣教士；这一部分《会规》还规定，"在上帝的启示之下希望到撒拉森人（Saracens）——穆斯林——和其他异教徒中宣教的修士，必须得到他们所在修会院长的批准。"

在方济各的鼓励之下，他的追随者不仅向基督徒讲道，也向其他人宣教。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很快就去到了北非和西班牙的穆斯林地区，甚至去到了远东的北京。其中，最著名的方济各修会宣教士孟德高维诺的约翰（John of Monte Corvino）去到波斯、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宣教，1294 年，他在三年的旅行之后抵达了汗八里（Cambaluc）——今天的北京。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他就带领数千人归信了基督教。教宗后来任命他为北京的大主教，并派七位方济各修会的修士为主教，协助他的工作。在这七位主教中，只有三位抵达了目的地。

同样，在十字军东征失败之后，方济各修会的修士成为留在圣地的主要宣教团体——宣教事工在数百年来导致两千多名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

殉道。

其他宣教士不是来自方济各修会，但他们也是在方济各和小兄弟会的鼓舞下开始宣教的。其中最著名的是雷蒙德·勒尔（Raymond Lull），他花费大量时间，说服了欧洲的教会领袖创建起教授阿拉伯语和东方语言的学校，他在向马略卡（Majorca）的穆斯林宣教时被石头打伤，并最终死于这次伤病。

多明我修会的修士也向穆斯林和犹太人宣教。早期在穆斯林中宣教的最著名的宣教士是的黎波里的威廉（William of Tripoli）。文森特·菲雷（Vincent Ferrer）在西班牙的犹太人中宣教。但是，他们的宣教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使用了暴力——基督徒在的黎波里对穆斯林发动了宗教战争，对西班牙的犹太人也使用了暴力。

遗憾的是，当方济各修会、多明我修会的宣教士和其他宣教士试图说服人们归信基督教时，其他基督徒却认为，令非基督徒归信基督教的最好方法是延续十字军的理想，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尤其这样认为。条顿骑士团是一个军事修会，它强迫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许多人归信了基督教。同样，瑞典国王领导了一场对芬兰人的宗教战争。

381

在东方的教会中，基督教最显著的扩张发生在俄罗斯。当俄罗斯于13世纪被蒙古人征服时，基督教成为俄罗斯的民族凝聚力。因此，虽然蒙古人的统治为教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当蒙古人被最终推翻时，俄罗斯的基督教不仅更深地扎根于俄罗斯，还发展到芬兰、拉普兰（Lapland）和白海（White Sea）。

石头的见证：教堂

中世纪的教堂有两种用途：教育与崇拜。它们的教育用途是为了回应时代的需要，因为书籍在中世纪非常罕见，并没有多少人可以阅读。因此，教堂成了文盲的书籍，基督徒试图通过教堂呈现出圣经的整个历史、伟大的圣徒与殉道者的生活、善与恶、天堂的应许与地狱的惩罚。今天，

我们难以读懂这些教堂上的书籍。但是，在中世纪的教堂中进行崇拜的基督徒熟知其中最微小的细节；他们的父母与祖父母将自己在教堂中从一代代先辈那里所听来的故事与教导讲给了他们。

中世纪教堂的崇拜用途集中体现在中世纪基督徒的圣餐观。在中世纪，圣餐被理解为饼与酒奇迹般地转变成主的身体与血，圣餐也被视为将基督作为祭物再次献上。只要可能，教堂必须与饼和酒这一奇迹般的转变以及基督的身体相称，因为中世纪的基督徒认为，即使在圣餐之后，基督的身体仍留在教堂之中。教堂并不主要被视为聚会和崇拜的场所，而是被视为圣餐这一大神迹上演的背景。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基督徒在建造教堂时的理想是，为他们最宝贵的耶稣基督建造一个这样的背景。

以前的巴西利卡式教堂发展成一种被称为罗马式的教堂。巴西利卡式教堂与罗马式教堂的主要差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圣殿被加长了，以前的巴西利卡式教堂是一个"T"形，即"T"形十字架，而罗马式教堂的形状往往像我们更加熟悉的"拉丁十字架"。加长圣殿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强调参加崇拜的基督徒与在崇拜中司仪和唱诗的司铎及修士的差异。随着这些司铎和修士数量的增长，尤其是他们的数量在修道院小礼拜堂中的增长，圣殿必须被加长。其次，以前的巴西利卡式教堂是木制堂顶，而罗马式教堂是石制堂顶。这是通过修建许多半圆形拱门实现的。拱门（或由多个拱门汇合而成的拱顶）会导致石制堂顶的重量产生一个侧向的压力，因此，必须修建窗户更少、厚度更大的墙壁，由在墙壁外部重量较大的扶壁支撑，扶壁都是石柱，它们会为墙壁增加重量，平衡拱顶向外的压力。因此，罗马式教堂里光线昏暗，窗户通常只修建在教堂的正面和后殿。最后，中世纪的教堂通常会加上一个钟楼，钟楼可以是教堂主体建筑的一部分，也可以是一个独立于教堂的建筑。

3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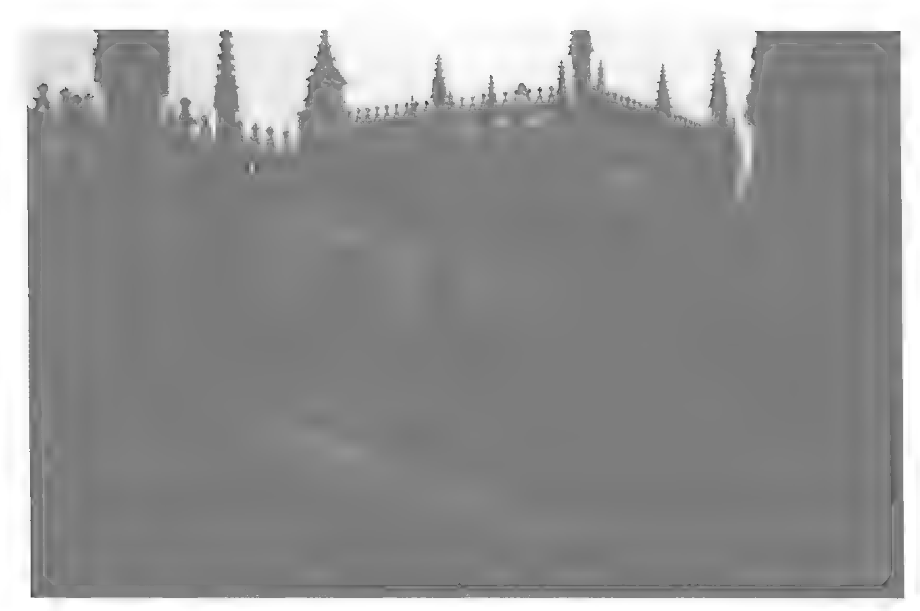
然而，到了12世纪中期，哥特式建筑开始取代罗马式建筑。很久以后，评论家才以"哥特式"称呼这种建筑，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建筑是粗野的，只配得上哥特人。但是，作为一种值得欣赏的建筑的名称，"哥特式"



西班牙阿维拉圣文森特巴西利卡式教堂的半圆形后殿，是很典型的罗马式建筑。请注意厚重的墙体和半圆形的拱门。

这个名字被保留下来。尽管哥特式建筑与罗马式建筑有着巨大差异，但前者是从后者发展而来。因此，哥特式教堂与罗马式教堂的基本设计是一样的，堂顶仍是拱顶，由拱门支撑。但哥特式教堂更喜欢用尖顶，而不是半圆形拱顶。哥特式教堂的堂顶也不是由罗马式教堂所使用的"桶形拱"支撑，而是由"交叉拱"和"肋拱"支撑，它们的一大优点是，堂顶的重量集中在四角的支柱上，而不是落在整面墙壁上。通过不断重复这道工序，长而高的堂顶可以不必建在厚重的墙壁上。但这种堂顶的侧向压力非常大，因此，必须增加扶壁向内的压力。这并不是通过简单地修建重量较大的扶壁实现的，而是使用了"飞拱"。这还是利用了拱门支撑的原理：在墙壁的一段距离之外修建支柱，支柱施加一个侧向的拉力，拉力平衡了堂顶的重量。因此，哥特式教堂的主体是垂直的，教堂看起来像要冲入云霄。加上塔楼、尖塔以及突出并顺着支柱一直延伸到地面的肋状拱

384



塞维利亚大教堂的飞拱。

顶，哥特式教堂的这种效果得到了加强。

整座哥特式教堂不再需要罗马式教堂的厚重墙壁，这反而为色彩斑斓的玻璃窗腾出了巨大的空间，彩色玻璃窗令哥特式教堂的内部通透明亮，它们产生了各种神秘的效果，也有助于用绘画和雕刻来表现圣经中的故事、圣徒的生活和诸如此类的信仰题材。

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这些发展的最终结果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石头仿佛插上了翅膀，直冲云霄。整座教堂的内外是一部反映信仰奥秘与全部创造的著作。在教堂内部，长长的正殿、纤细的石柱、色彩斑斓的玻璃窗和变幻莫测的光线，为圣餐这一神迹营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背景。

今天，哥特式教堂仍是许多城市地平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它们是中世纪留给后世的一份遗产。有时，一些建筑师试图强加给教堂一个自身难以承受的理想高度，以至于堂顶坍塌，如博韦大教堂（Cathedral of Beauvais）。或许，这也象征着一个时代，当怀有崇高理想的希尔德布兰德、方济各和其他基督徒试图战胜人性的抵抗时，他们通常都以失败告终。

385

第三十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的衰落

远离罪比逃离死亡更为有益。如果你们今天没有做好准备，明天会做好准备吗？明天是未知的。你们怎能知道你们会活到明天呢？

——肯培

中世纪文明于13世纪达到了顶峰。随着英诺森三世的出现，教宗的权力达到了顶点。与此同时，托钵修会开始带领世界归向基督，在大学里发展出令人惊叹的神学体系，在哥特式的艺术中，石头的重量似乎也已被战胜。从理论上讲，欧洲统一在一位属灵领袖教宗和一位世俗领袖皇帝之下。十字军已经夺取了君士坦丁堡，因此，东西方教会的分裂似乎已被弥合。

然而，在所有这些统一的因素中，还有紧张的局势和弱点，它们最终摧毁了中世纪基督教这座气势恢宏的大厦。1261年，拉丁君士坦丁堡帝国灭亡，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为东西方教会带来的假合一不复存在。在14和15世纪，新的经济与政治局势为教宗带来了挑战，并导致教宗丧失了许多权力。民族主义、战争、瘟疫、腐败和侵略击碎了13世纪的梦想，它们为现代的新秩序开辟了道路。

新局势

在过去两百年中不断发展的货币经济成为中世纪晚期一个重要因

素。信用制度、贸易和生产——按照今天标准来看规模显然还很小——令资产阶级的权力日益强大。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封建领主的利益产生了冲突。贵族之间经常爆发小规模战争，贵族对他们领地之外的商品强行征税，大贵族渴望独立，这一切阻碍了贸易，降低了贸易利润。资产阶级强烈渴望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因为这会保护贸易、镇压盗贼、规范货币制度和结束小规模战争。因此，资产阶级通常会支持国王剥夺大贵族的权力。

388

国王也从他们与资产阶级的结盟中获益。只要君主没有资源供养用于镇压强大贵族的军队，贵族就不会听命于他们的君主。国王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供养军队的资源。因此，在中世纪晚期，银行家与商人的权力不断增长的同时，君主集权制也随之发展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现代国家形成了。法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最早统一在一位相对强大的君主之下的国家。西班牙分裂成几个基督教国家和一个在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国家，直到中世纪末才获得统一。德国和意大利统一得更晚。

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以前，大多数欧洲人自认为是一个城镇的居民。但是，人们现在更多地谈到国家，例如，法国的居民开始有了一种有别于欧洲其他居民的共识。即使在一些还没有统一在一位强大君主之下的地区，人们也有了这种共识。13 世纪末阿尔卑斯山一些村落起义，建立了瑞士联邦(Helvetic Confederation)。14 世纪，瑞士联邦继续发展壮大，数次击败了前来镇压它们的帝国军队。最终，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被迫于 1499 年承认瑞士独立。德国还没有统一，但有许多迹象表明，各个选帝侯领地、公爵领地、自由城市和此类地区的居民开始自认为是德国人，令他们悲哀与愤恨的是，国家的分裂令德国对国外的干涉束手无策。

民族主义又削弱了教宗的普世权力。如果教宗支持法国——他们在阿维尼翁(Avignon)居住时的确是这样做的——英国人就不会听命于教

宗，甚至会反对他们。另一方面，如果教宗不愿意乖乖服务于法国人的利益，法国人就会选出一位敌对教宗，全欧洲就会因效忠两位教宗而产生分裂。最终的结果是，教宗制度大大丧失了它的声望与权威，许多人开始希望由教宗之外的其他人来改革教会。

在14和15世纪，主要的政治与军事事件是百年战争（1337—1475）。虽然百年战争主要是法国与英国的战争，但是还牵涉到欧洲的许多国家；一些历史学家提出，百年战争可以被称为“第一次欧洲大战”。英国的爱德华三世自称是法国国王，但是，当时的法国国王是他的表哥腓力六世，英国入侵了苏格兰，法国支持苏格兰国王戴维（David），这一切导致了战争。通过一系列联盟，皇帝巴伐利亚人路易（Louis of Bavaria）、纳瓦拉（Navarre）国王、波希米亚国王、卡斯蒂利亚国王和其他不计其数的参与者很快就被卷入战争。英国人不断入侵法国，他们在克雷西战役（Battle of Crecy）和阿让库尔战役（Battle of Agincourt）中取得了重要胜利，但最终因缺少军费而被迫撤军。当英国与法国签署和平条约时，西班牙爆发了战争，英国与法国很快就再次开战，两国因它们与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双方的结盟而被拖入了战争。当查理六世成为法国国王时，英国人在战争中占据了上风。法国的新国王出现了发疯的迹象；当必须任命一位摄政王时，出现了两派，这最终导致了内战。英国人支持其中一派，他们再次入侵了法国。当查理六世去世时，英国人和他们的法国盟友正在取胜。查理六世的儿子——法国王太子（Dauphin）——一派在战争中失利，法国王太子宣布，他现在是国王，并取名为查理七世。他被围困在奥尔良，成为法国真正统治者的希望变得渺茫，但是他以前的许多敌人认为，既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们现在应当支持他。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听说了圣女贞德（Joan of Arc）——一个来自栋雷米乡村（Domrémy）的年轻少女。

389

圣女贞德声称，她得到了圣凯瑟琳（Saint Catherine）、圣玛格丽特（Saint Margaret）和天使长米迦勒（Michael）的异象，他们命令她率领王太子的军队从奥尔良突围，然后在兰斯（Rheims）——加冕法国国王的传统

地点——将王太子加冕为法国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查理七世召来了贞德，但是他明显不相信贞德，他也许只是在为自己找乐子。但贞德说服了他，他命令贞德将急需的补给从储存地布卢瓦(Blois)运进奥尔良。贞德成功了，她穿越了敌军的防线。后来，她被获准率军突围，她再次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关于这位身披铠甲的年轻少女的传言开始在敌营中传播：贞德每天都出城作战，她每天都能夺取敌军的一个要塞。贞德最终率军突围，敌军撤退。这位“奥尔良少女”——人们当时这样称呼贞德——禁止王太子的军队追击撤退的敌军，她指出那一天是星期天，是祷告的日子，不是战斗的日子。从此以后，战争的进程改变了。疲于内战的法国人涌到王太子麾下，贞德陪伴他胜利进军到兰斯。长久以来反对王太子的兰斯和其他城市向他敞开了城门，最终，他在兰斯大教堂被加冕为法国国王，而那位“奥尔良少女”就站在圣坛旁。

390

贞德希望回到栋雷米，但是查理七世没有允许，她不得不继续浴血奋战，直到被俘。她被卖给了英国人，以前的盟友抛弃了她，查理七世似乎都不愿意为赎回她而尝试谈判。英国人将贞德以一万法郎的价格卖给博韦的主教，这位主教希望以异端罪和女巫罪审判贞德。

审判在鲁昂(Rouen)进行。贞德被指控为异端，罪名是她声称得到了天上的命令，并坚称这些命令是用法语下达给她，以及她像男子一样着装。她同意收回自己的言论，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是她后来声称，圣凯瑟琳和圣玛格丽特再次向她说话，她们斥责她收回了言论。结果，她在鲁昂的老集市广场(Old Market Square)被活活烧死。她对陪伴她的神父提出的最后要求是，高举十字架，高声宣讲救恩的信息，以便她可以在咆哮的烈火中听到这些话。二十年之后，查理七世来到鲁昂，他下令调查对贞德的审判，不出所料，贞德蒙冤昭雪。1920年，本笃十五世追封贞德为罗马天主教的圣徒，但是在此之前，她早已成为法国的民族英雄。

贞德于1431年去世时，查理七世已经在内战中占据上风。法国的内战很快就结束了，到了1453年，英国与法国的战争已经降至一些小规模

的冲突。当两国于1475年最终签订和平条约时，除了加来(Calais)之外，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所有领地都落入法国人之手(加来于1558年成为法国的领土)。

漫长的百年战争对教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将在本章余下部分中讲述。在百年战争的一段时期之内，教宗住在阿维尼翁，生活在法国人的操纵之下，因此，英国人将教宗视为敌人。后来，在西方教会大分裂(Great Schism)时期，西方所有教会因效忠于两位敌对教宗而产生了分裂，在西方国家选择它们想要效忠的教宗时，百年战争所造成的盟友与敌人，成为每个国家选择教宗的一个因素——百年战争本身就令西方教会的大分裂更难以弥合。最终，在法国、英国和苏格兰，持续不断的国际战争增强了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削弱了教宗的普世权力。

在中世纪晚期，另一个影响教会的事件是1347年爆发的大瘟疫。现在，历史学家将当时的气候变化称为“小冰川期”。气候变化降低了农作物产量，导致饥荒，让人们更容易生病。我们现在知道，黑死病是由寄生在黑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贸易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热那亚人(Genovese)击败摩尔人之后，他们为基督徒的船运打开了直布罗陀海峡。因此，北欧与地中海接触不断，当大瘟疫在黑海爆发，并传播到意大利时，瘟疫很快就传到了北欧。在毫无明显病因的情况下，人们突然开始出现奇怪的症状：通常是以热病开始，随后，热病会导致丧失身体平衡和巨大的淋巴肿瘤，通常还伴有痴呆。到了第五天，出现这些症状的大多数人都会死去。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大瘟疫就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且从1348年持续到1350年。根据一些学者的估算，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于这场瘟疫和这场瘟疫所引发的相关疾病。三年之后，大瘟疫开始减退，尽管这样的瘟疫每隔十年或十二年会重新爆发一次。在后来的瘟疫中，受难者主要是年轻人，这显然是因为老人已经对这种疾病有了一定的免疫能力。

大瘟疫有着深远的影响。从经济上讲，整个欧洲陷入了瘫痪，集市全

部消失，失业人口在死亡率较低的地区急剧增长。这造成了政治动荡、暴乱和进一步的经济停滞，令欧洲在几百年之后才找到保障人口与经济稳定的措施。

大瘟疫也对宗教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后来爆发的瘟疫中，大多数受害者是免疫力尚未发育成熟的年轻人，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死神似乎更钟爱年轻人。受到瘟疫袭击的似乎是完全健康的人，这令许多人开始怀疑，先人们的宇宙是否真是理性有序。这也令知识分子开始怀疑，理性是否真有理解生存奥秘的能力。这还在普通人中助长了迷信。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因此，生命就是为死亡做准备的。许多基督徒踏上前往圣地、罗马和圣地亚哥的朝圣之旅。穷人难以负担长途跋涉的朝圣费用，他们就到当地的圣地朝圣。虽然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明令禁止，但是，对所谓的圣徒遗物的崇拜和买卖都在迅速发展。恐惧无处不在：对瘟疫的恐惧、对地狱的恐惧、对至高审判者的恐惧，许多人要比预想的时间更早来接受审判。

对于犹太人来说，不仅是大瘟疫带来了死亡，暴力更是导致他们死亡的原因。很多基督徒无法理解，为什么瘟疫似乎在他们周围的犹太人中传播得更慢。今天一些学者提出，犹太人中养猫的更多、老鼠更少，但基督徒始终将猫与巫术联系在一起。不管怎样，基督徒当时对瘟疫的解释非常简单：犹太人向基督徒的饮水井中投毒。结果便是暴力和屠杀。那是一个恐怖的时代，有恐怖，就有恐怖的牺牲品。

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也是前途未卜。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和随后的拉丁帝国削弱了君士坦丁堡。当拜占庭帝国复生时，一些在与拉丁入侵者斗争中从君士坦丁堡独立出来的地区仍保持着独立。虽然拜占庭帝国这个名字仍然响亮，其实只不过是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的一小部分地区。土耳其人对拜占庭帝国的威胁有增无减，阻止他们入侵的，是他们更紧迫的敌人——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和东方的蒙古人。1422 年，土耳其人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但当他们受到其他敌人的攻击时，他们被迫放弃了

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到了 15 世纪中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伟大梦想显然是夺取君士坦丁堡,并将他帝国的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别无选择,只能向西方求助。教宗提出的条件是教会和解,这在 1439 年的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Council of Ferrara-Florence)上实现了。但是,这并没有帮助到拜占庭帝国,因为教宗没能说服西方的基督徒去解救被围困的君士坦丁堡,可是,此次大公会议的表现却令拜占庭帝国的许多臣民相信,他们的领袖在异端面前屈服了,不应当再保护他们。1443 年,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和安提阿的牧首拒绝接受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决议,因此,他们与君士坦丁堡决裂了。俄罗斯人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因此,君士坦丁堡成为孤家寡人,当时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只能继续他与罗马和好的计划,他希望西欧会对他有所帮助。1452 年年末,在相互革除教籍四百多年之后,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罗马天主教的弥撒。

君士坦丁堡的末日即将来临。1453 年 4 月 7 日,穆罕默德二世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古老的城墙再也抵挡不住穆罕默德二世的大炮,而这些大炮曾经是基督教的工程师为谋求利益而造的。被围攻的臣民奋勇抵抗,但是,君士坦丁堡的古老城墙却坍塌在他们周围。5 月 28 日,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庄严的崇拜。5 月 29 日,君士坦丁堡陷落。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帕莱奥洛古斯(Paleologus)战死沙场。土耳其人破城而入,君士坦丁堡被洗劫了三天三夜,这正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对他将士们的承诺。随后,穆罕默德二世正式占领了君士坦丁堡。现在,东方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中回荡着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新罗马的梦想破灭了,最终,这座以君士坦丁命名的城市被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受控于法国的教宗

我们刚刚讲述的是发生在 13 和 14 世纪的一系列事件,教会就是在这些艰难时代中前行。现在,我们要回到 13 世纪末的 1294 年,这一年,

卜尼法斯八世被选为教宗，上一章中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贝尼狄托·加埃塔尼(Benedetto Gaetani)成为教宗，取名为卜尼法斯八世；他与前任教宗西莱斯廷五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莱斯廷五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极其单纯的他并不懂得必须应对之人的奸诈与诡计。卜尼法斯八世却能够自如地应对国王和权贵，他在外交生涯中深刻地了解到欧洲的宫廷中无时无刻不在酝酿的阴谋。西莱斯廷五世和卜尼法斯八世都真诚地希望改革教会。但是，西莱斯廷五世想通过方济各修会的简朴来改革教会，而卜尼法斯八世却试图通过强权政治做到这一点。在历任教宗中，西莱斯廷五世是最谦卑的一位，而卜尼法斯八世是最傲慢的一位。

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卜尼法斯八世被选为教宗。希望控制教宗的除了强大的意大利科隆纳(Colonna)家族之外，还有极端的方济各修会的修士——“小兄弟会”，许多基督徒团结在他们周围，共同支持西莱斯廷五世。许多小兄弟会相信，西莱斯廷五世的当选是费奥雷的约阿希姆所预言的“圣灵时代”的开始，一些社会底层的基督徒也是这样认为的，开始一个新时代，是他们的唯一希望。对于他们来说，西莱斯廷五世的退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许多人难以接受，他们声称，是卜尼法斯八世强迫西莱斯廷五世退位。其他基督徒声称，即便西莱斯廷五世自愿退位，教宗也无权退位，因此，西莱斯廷五世还是教宗，即使这有悖于他自己的意愿。当西莱斯廷五世去世时，这些基督徒传言称，卜尼法斯八世虐待西莱斯廷五世，并导致了他的死亡——这些话或许并不可信，至少是严重夸大了事实。

尽管遭到这样的反对，卜尼法斯八世在早年任期内还是相当成功的。他认为自己得到了平定意大利的呼召，在这一方面，他取得了很大成功。在意大利，他最强大的对手是科隆纳家族，他向该家族发动了一场宗教战争，夺取了该家族的领地和城堡，并迫使他们逃亡。在德国，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Hapsburg)造反，杀死了拿骚的阿道夫(Adolf of

Nassau)。卜尼法斯八世将阿尔伯特称为反叛者和弑君者,阿尔伯特被迫与卜尼法斯八世和解,和解的条件提升了卜尼法斯八世的威望。英国与法国可能开战(这其实是百年战争的序幕),卜尼法斯八世决心令两国言归于好。当法国的腓力四世和英国的爱德华一世拒不听从卜尼法斯八世的劝解时,卜尼法斯八世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1296 年,他颁布了通谕《神职人员-平信徒》(*Clericis laicos*),禁止神职人员在没有得到教宗批准的情况下向世俗统治者交纳任何赋税。他希望以此给英法两国的国王施加经济压力,但是,他们采取了针对神职人员和教宗的措施,并想继续进行战争。然而他们的对抗没有任何效果,因为他们都不能在战争中取得绝对的优势,最终被迫接受了卜尼法斯八世的调停——尽管腓力四世清楚地表明,他接受的是贝尼狄托·加埃塔尼的个人调停,而不是教宗的调停。与此同时,面临被英国人入侵的苏格兰则宣布,苏格兰是教宗的领地。虽然英国基本上没有理睬这项举措为苏格兰带来的所谓保护,但是卜尼法斯八世认为,这进一步确立了教宗的普世权力。

1300 年,卜尼法斯八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他宣布了一个大赦年,许诺完全赦免所有到圣彼得墓朝圣之人的罪——这就意味着,朝圣者不必再花时间洗净他们以往必须在炼狱中洗净的罪。罗马挤满了朝圣者,他们不仅来朝拜圣彼得,也来朝拜他的继任者,卜尼法斯八世似乎成为了欧洲最重要的人。

然而,卜尼法斯八世与法国的关系却不断恶化。斯洽拉·科隆纳(Sciarra Colonna)是卜尼法斯八世最痛恨的一位仇敌,但腓力四世却支持斯洽拉·科隆纳,并给予他庇护。腓力四世向卜尼法斯八世再次发起了挑战,他没收了教会的土地,并将他的妹妹嫁给了已被卜尼法斯八世谴责为篡位者与弑君者的德国皇帝阿尔伯特。法国与罗马的通信近乎相互辱骂。卜尼法斯八世痛恨法国派驻罗马教廷的大使,腓力四世也在抱怨卜尼法斯八世的代表同样令人讨厌。1302 年年初,卜尼法斯八世的一份通谕当着腓力四世的面被烧毁,同一年,腓力四世召开了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即法国议会),目的是寻求议会支持他对罗马所采取的政策。此次会议的召开意义重大,因为除了贵族和神职人员这两个传统的“阶级”之外,“第三个阶级”——资产阶级——第一次出席了议会。此次会议向罗马发出了多份支持腓力四世政策的公报。

卜尼法斯八世的回应是通谕《唯一至圣》,我们在上一章中引用过这份通谕,它标志着教宗对普世权力——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的要求达到了顶点。他随后召集法国的主教到罗马开会,讨论如何来处置腓力四世。腓力四世颁发禁令,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主教不准离开法国,否则将受到没收全部财产的处罚。同时,他也匆忙与英国爱德华一世签署了和平条约。卜尼法斯八世为避免麻烦,忘记了德国皇帝阿尔伯特作为篡位者与弑君者的身份,他与阿尔伯特结成同盟,并命令德国的所有贵族必须承认阿尔伯特是皇帝。在法国的三级会议上,腓力四世最亲密的顾问威廉·诺加雷(William Nogaret)指控卜尼法斯八世是异端、鸡奸者和假教宗。三级会议按照国王的意愿,要求身为“信仰捍卫者”的腓力四世召开一次会议,审判“假教宗”。为了确保自己能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得到神职人员的支持,腓力四世颁发了“改革法令”(Ordinances of Reform),再次肯定了法国神职人员所有的古老特权。

卜尼法斯八世的最后武器是他的前任们在对付其他顽固统治者时使用的革除教籍。他将自己最亲密的顾问召到了家乡阿纳尼(Anagni),他们在阿纳尼起草了一份革除腓力四世教籍的通谕,并准备在9月8日发出。但是,法国人意识到战争一触即发。在意大利,斯治拉·科隆纳和威廉·诺加雷正在为战争做准备,他们从意大利的银行中取出了腓力四世的存款,并组建了一支武装小分队。9月7日,就在革除腓力四世教籍的通谕发出的前一天,他们进入阿纳尼,绑架了卜尼法斯八世,与此同时,这伙暴徒也将他与他亲戚的家洗劫一空。

诺加雷的目的是迫使卜尼法斯八世退位。但是,这位年迈的教宗态度坚定,他声明,如果他们想要杀死他,“我的脖子和脑袋就在这里”。诺

加雷殴打、羞辱了他，强迫他倒骑着马在阿纳尼游街示众。

只有两位在阿纳尼的枢机主教坚决支持这位受到羞辱的教宗，即西班牙的彼得(Peter of Spain)和尼古拉斯·博卡西尼(Nicholas Boccasini)。最终，博卡西尼感动了一些人，他们抗议对教宗的羞辱，救出了卜尼法斯八世，并将法国人和他们的党羽赶出了阿纳尼。

396 然而，伤害已经造成。回到罗马后，卜尼法斯八世不再能像以前那样受人尊重。他在阿纳尼的这次事件不久之后去世。他的敌人散布谣言称他是自杀，但他似乎是在自己那些最亲密顾问的陪伴之下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枢机主教们匆忙地将博卡西尼选为下一任教宗，他取名为本笃十一世。他是出身卑微的本笃修会的敬虔修士，希望采取和解的政策。他将卜尼法斯八世所没收的科隆纳家族的土地归还给他们，除了诺加雷和斯洽拉·科隆纳之外，他赦免了卜尼法斯八世的所有敌人，此外还主动向腓力四世求和。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腓力四世坚持召开一次会议，审判已故的教宗卜尼法斯八世。这是本笃十一世所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将沉重打击教宗的权威。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基督徒指责本笃十一世对攻击过教宗的人做出了太多妥协。任期极短的本笃十一世(1303—1304)去世之时腹背受敌，受到敌我双方的指责。很快就出现他被毒死的传言，双方都指责对方是凶手。但是，我们并没有本笃十一世被毒死的真实证据。

选举下一任教宗并非易事，因为双方都决心将他们当中的一员选为教宗。最终，亲法派找到了一个借口，他们得到枢机主教的同意，选出了克莱门五世。克莱门五世之所以能被选为教宗，是因为他表面上维护卜尼法斯八世的名誉，实际上却与法国人保持着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选出的教宗不可能是坚定刚毅的典范。在他的整个任期(1305—1314)之内，他从未到过罗马。尽管罗马人坚决要求他住在罗马，但腓力四世始终令他住在法国，以便牢牢地控制他。在克莱门五世担任教宗期间，他任命了

二十四位枢机主教，其中只有一位不是法国人。此外，其中几位枢机主教还是他的亲戚，这导致并助长了任人唯亲，而任人唯亲在16世纪之前一直是教会的一大罪恶。

克莱门五世不再尽力地维护卜尼法斯八世的名誉。他也拒绝召开法国人所希望的会议。其实，这样的会议是不必召开的，因为克莱门五世一点一点地毁掉了卜尼法斯八世所做的一切，他赦免了诺加雷和他的同伙，甚至宣称，腓力四世在整个事件中都表现出"令人钦佩的热诚"。

然而，软弱的克莱门五世做出的最可耻的事是逮捕与审判圣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建立起来的军事修会之一，因此，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障碍。但是，它有钱有势。当腓力四世有一次确认他对古老贵族的权力时，圣殿骑士团的权势与财产成为他实施集权政策的一个障碍。圣殿骑士团是修会，因此，他们并不受世俗统治者的直接统治，于是腓力四世决心指控他们是异端，并强迫软弱的克莱门五世镇压圣殿骑士团，以便其大部分财产可以流入法国国库。

397

在法国的所有圣殿骑士都意外被捕。一些圣殿骑士在严刑拷打之下被迫承认，圣殿骑士团实际上是一个反基督教信仰的秘密修会，他们在崇拜中拜偶像、咒诅基督、亵渎十字架，他们是鸡奸者。虽然仍有许多圣殿骑士在酷刑中坚守信仰，但那些软弱的圣殿骑士承认了他们被要求承认的罪行，这足以令继续审判整个圣殿骑士团有充足的借口。圣殿骑士团的团长雅克·德·莫莱(Jacques de Molay)也屈服了，他可能相信，对圣殿骑士的指控荒谬透顶到没有人会相信。

圣殿骑士希望克莱门五世会保护他们，抗议他们正在遭受的不公正。但是，教宗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当他收到腓力四世的官员给他的圣殿骑士的认罪报告时，他下令逮捕所有不在法国的圣殿骑士，从而避免了这些圣殿骑士可能采取的一切反对他们被关押在狱中兄弟的行动。当他得知圣殿骑士的认罪是严刑逼供的结果时，他下令停止刑讯逼供，并宣布他将亲自审判圣殿骑士，世俗权力无权审判他们。但是，受到指控的圣殿骑



教宗住在法国边界的阿维尼翁长达数十年之久。

士仍被关在狱中，克莱门五世没有做出任何释放他们的努力。后来，腓力四世指控克莱门五世是圣殿骑士所谓恶行的煽动者，这一次，软弱的克莱门五世再次屈服，他同意召开会议，审理此案。

腓力四世和诺加雷希望，此次会议会顺从他们的意愿，但是事实证明此次会议的立场比克莱门五世更要坚定。也许，主教们对其领袖的软弱无能感到羞耻。他们坚持重新审理，给予受控骑士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最终，在此次会议处理其他事务的同时，腓力四世与克莱门五世达成了一项协议。此次会议并没有因圣殿骑士的所谓罪行而审判他们，克莱门五世的行政决议解散了圣殿骑士团，它的财产被移交给另一个军事修会。会议因不再有权审理这起案件，也就随之解散。至于圣殿骑士团的财产，腓力四世夺取了大多数，他开给克莱门五世一张此次审理花销的巨额账单，并坚持要求他必须先支付这笔巨款，然后才能考虑对圣殿骑士团财产的其他处理。

许多圣殿骑士的余生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雅克·德·莫莱和他的一个同伴被带到巴黎圣母院当众认罪，以此平息一些人的谴责，因为他们

398 声称，有人对圣殿骑士犯下了滔天大罪。雅克·德·莫莱和他的同伴后来收回了以前的认罪，他们宣布，对圣殿骑士团的所有指控都是谎言。就在这一天，他们被活活烧死。

1314 年，克莱门五世去世；他在任期内的作为预示着教宗的未来。1309 年，他开始住在阿维尼翁——法国边境的教宗城。近七十年的时间里，虽然教宗仍自称是罗马主教，但是，他们普遍住在阿维尼翁。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阿维尼翁教廷"（Avignon Papacy）或"教会被掳巴比伦"（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教宗不住在罗马，而且甘愿成为服务于法国政策的工具。

在克莱门五世去世之后，枢机主教并没有就下一任教宗的人选达成一致。他们最终选择了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他们希望，这位高龄教宗的任期是短暂的，他们可以在他短暂的任期内达成一致。但是，这位年迈的教宗——他取名为约翰二十二世——却因为他的生命力和长久的任期（1316—1334）震惊了世界。在法国人的帮助之下，他试图在意大利维护教宗的权力，因此，意大利卷入了持久的战争。为了支付战争和他自己在阿维尼翁教廷的开销，他推出了一套详尽的教会税收制度，这激起了普遍的憎恨，尤其是反对他亲法政策之人的憎恨。

本笃十二世（1334—1342）向罗马人许诺，他会回到罗马，但是，他却下令在阿维尼翁修建一座巨大的宫邸。他还违背了曾向罗马人许下的诺言，因为他将教宗档案馆迁到了阿维尼翁。他将教宗的全部资源都提供给法国国王使用，当时正值英法百年战争，因此他的政策疏远了英国及其主要盟友——当时以德国为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克莱门六世（1342—1352）试图调和英法两国的关系，但是，英国人显然将他视为法国人的同399 伙，因此，他的努力并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在他担任教宗期间，任人唯亲盛行，阿维尼翁教廷的虚华与奢侈可以与世俗大领主相媲美。当时爆发了大瘟疫，因此许多基督徒相信，这是上帝对教宗不住在罗马的惩罚。下一任教宗英诺森六世（1352—1362）开始准备重返罗马，但他在实现这个

理想之前就去世了。乌尔班五世(1362—1370)是一位有着改革精神的教宗,他过着严格律己的生活。他对阿维尼翁教廷进行了改革,并赶走了不效法他简朴生活榜样的教士。1365 年,他回到了罗马,罗马人举行盛大游行,欢迎教宗的回归。但是,他最后并没能保住罗马臣民的忠诚,整个意大利再次陷入混乱,他决定重返阿维尼翁。下一任教宗格列高利十一世(1370—1378)在十七岁时就被他的叔叔克莱门六世任命为枢机主教。就是在他被选为教宗之际,锡耶纳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Siena)出现了,她呼吁教宗重返罗马。

卡特丽娜·德·依卡波·迪·贝尼卡萨(Caterina de Icopo di Benicasa),现在被称为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她小时候就喜欢修道生活。她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人并不希望她成为修女,想说服她放弃这个念头。但是,尽管面临恳求、威胁和惩罚,她还是坚持自己的喜好,并拒绝考虑结婚。她的姐姐波那文图拉(Bonaventura)——她的父母生下了二十五个孩子——的去世最终改变了凯瑟琳的生活。她的一个亲戚是多明我修会的神父,她在这个亲戚的指导之下进入了"圣多明我苦修姐妹会"(Sisters of the Penance of St. Dominic)或者多明我第三修会(Third Order of the Dominicans)。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组织,它的成员可以继续在家里生活,但却必须过全心忏悔与默想的生活。两年之后,她得到了一个异象,耶稣与她缔结了"神秘的婚姻",并命令她去服侍别人。随后,她开始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个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她花大量时间去帮助穷人和病人。她成为一位教授神秘主义的著名教师,在她周围聚集了一群男女,其中许多人比她受过更多教育,她教授他们默想的方法与原则。在这些学生中,一些是精通神学的多明我修会的修士,她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足够的神学,这足以令她避免其他受到教会谴责的神秘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1370 年,格列高利十一世被选为教宗,同一年,凯瑟琳又有过一次神秘经验。她有四个小时静止不动,她的朋友认为她已经去世。但是,她后来醒了,宣称她得到了一个异象,并开始了一场令教宗重返罗马的运动,

为了让格列高利十一世重返罗马，必须扫清意大利的障碍。意大利的战争不断，这会令教宗在意大利的生活不安全。为了扫清这个障碍，凯瑟琳开始逐个城市地游走，每到一个城市，都会有大量群众涌来见她，在他们当中流传着关于她的许多神迹故事。她一直在给格列高利十一世写信，态度谦卑却很坚定，称其为“我们可爱的父亲”，但是，她也向他抱怨，教宗长期住在阿维尼翁“得罪了上帝”。我们无法知道，这对格列高利十一世的决定产生了多大影响。但是不管怎样，1377 年 1 月 17 日，格列高利十一世在罗马人的欢呼声中进入了罗马。教宗在阿维尼翁的漫长逃亡结束了——但是，还将发生更糟糕的事。

400

格列高利十一世回到罗马三年之后，凯瑟琳去世。一百年之后，她被追封为罗马天主教的圣徒，1970 年，保罗六世将“教会博士”的头衔授予了她——她是得享这一殊荣的两位女基督徒之一。

401

总而言之，教宗长期住在阿维尼翁，对教会生活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当时爆发了百年战争，教宗是服务于法国政策的工具，因此，与法国开战的国家习惯于将教宗视为外国势力，在这些国家中，民族主义很快就与对教宗的憎恨联系在一起。阿维尼翁教廷及其不断卷入的战争与阴谋需要大笔资金，因此，约翰二十二世和他的继承者们想出了各种获取金钱的方法。当某个教职空缺时，这个教职一年的收入就归入阿维尼翁教廷。如果这个教职空缺得更久，这笔收入仍属于阿维尼翁教廷。因此，在频繁出现的教职空缺中，教宗有着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损害了教会的牧养工作，教职经常长期无人担任，这令教会的牧养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此外，教会中还出现了买卖圣职的行为——这正是格列高利七世和其他教会改革的倡导者所痛恨的。教职实际上是一种获得收入的好方法，所以，一些神职人员同时拥有数个教职，因此，他们经常失职。这些罪恶通常被称为买卖圣职、身兼数职和擅离职守，更加糟糕的还有教宗带头发起的任人唯亲——任命他们的亲戚担任重要的教职。到了“教会被掳巴比伦”结束时，许多基督徒强烈要求改革教会。教宗制度本身就需要改革，因此，在

改革教会的呼声中，经常会听到要求限制教宗的权力，或将教宗的权力完全限制在属灵事务方面的声音。 402

西方教会大分裂

当格列高利十一世将教廷带回罗马时，锡耶纳的凯瑟琳的梦想似乎实现了。但是，导致“教会被掳巴比伦”的政治局势却依然存在。难题很快就出现了，以至于格列高利十一世开始考虑是否可能重返阿维尼翁，要不是他的去世打断了这个计划，他很可能就回到了阿维尼翁。就是在这时，一种比“教会被掳巴比伦”还要糟糕的局势正在缓缓形成。

面对教宗之职空缺，罗马人担心，枢机主教会选出一位愿意回到阿维尼翁或至少愿意再服务于法国利益的教宗，就如以前的多任教宗所做的那样。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法国籍枢机主教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意大利籍枢机主教，其中一些枢机主教已经表示，同罗马相比，他们更喜欢阿维尼翁。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枢机主教可能在法国人的保护之下离开罗马，在其他地方选出一位愿意住在阿维尼翁的法国籍教宗。关于枢机主教可能逃走的传言导致了骚乱。一伙暴徒闯进了枢机主教秘密选举教宗的会场，他们彻底搜查了整个会场，在确保枢机主教无路可逃之后才肯离开。在选举教宗的整个过程中，会场内外的暴徒始终在高呼选出罗马籍教宗，至少是选出一位意大利籍教宗。

在这种情况之下，枢机主教不敢选出一位法国籍教宗。他们在漫长的商议之后选择了巴里（Bari）的大主教，他是意大利人，取名为乌尔班六世。全部枢机主教——包括法国籍与意大利籍枢机主教——出席了乌尔班六世盛大的加冕仪式。在 1378 年的复活节，乌尔班六世被加冕为教宗。

乌尔班六世的加冕似乎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出身卑微，生活简朴，显然会承担起许多基督徒正在呼求的改革。但是，在改革教会的过程中，他明显会与许多过惯奢华生活的枢机主教产生冲突，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的教职是谋取财富和扩张家族势力的一种手段。在实施急需的改革过程中，即使是最谨慎、头脑最清醒的教宗，也会遇到巨大的困难。

然而，乌尔班六世既不谨慎，头脑也不清醒。他渴望结束神职人员的擅离职守，他宣布，在他的教廷中，不在自己教区的主教就是背叛基督，犯有违背誓言罪。他在讲坛上严厉斥责枢机主教的铺张，他后来规定，只要主教收受礼物，他就犯有买卖圣职罪，因此必须被革除教籍。为了从法国籍枢机主教手中夺回权力，他决定任命大量的意大利籍枢机主教，使他们在枢机主教团中占据绝大多数席位。后来，他在实际实施这个计划之前就草率地向法国人宣布了这个计划。

403

这一切正是许多基督徒所希望的改革。但是，乌尔班六世针对枢机主教的行动令许多人相信，他的确疯了，而他对这些传言的反驳令他们更加确信。同样，在他宣称自己希望改革教会的同时，他还在任命他的亲戚担任重要的教职，这就让他很容易受到任人唯亲的指控。

越来越多的枢机主教反对乌尔班六世。法国籍枢机主教和许多意大利籍枢机主教先后从罗马逃到了阿纳尼，他们在阿纳尼共同宣布，他们是被迫选出了乌尔班六世，这样的选举是无效的。此时，他们适时地忘记了，他们在选举之后都参加了乌尔班六世的加冕仪式，对其当选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此外，他们也忘记了，他们数个月来始终属于乌尔班六世的教廷，从未怀疑过乌尔班六世被选为教宗的合法性。

乌尔班六世的回应是，在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中任命了二十六位新的枢机主教。这令他的支持者在枢机主教团中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因此，叛逃的枢机主教宣布，一位假教宗任命的枢机主教并不是合法的枢机主教，选举合法教宗的时候来到了。

还是那群当初选出乌尔班六世并曾效忠于他的枢机主教——除了其中一位，他们召开教宗秘密选举会议，选出了一位新教宗。他们声称，这次选出的教宗是圣彼得的合法继任者。出席选举的意大利籍枢机主教退出了选举，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抗议。

这就形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局面。以往不只有一个人声称自己是合法的教宗。但是现在，第一次出现了由同一个枢机主教团所选出的两位教宗：一位是乌尔班六世，一位是克莱门七世。乌尔班六世被选出他的枢机主教废黜，他随后又建立了自己的枢机主教团。另一位，即被称为克莱门七世的，得到了那些延续了传统的主教们的支持。因此，西方所有的基督教国家必须在这两位教宗之间做出选择。

这样的选择并不容易。乌尔班六世已被适时地选出，尽管他后来遭到了选出他的枢机主教的反对。他的对手取名为克莱门七世，他正是以此宣告，他愿意继续阿维尼翁教宗的政策。但是，乌尔班六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在如此艰难的时代领导教会所必备的智慧，而克莱门七世则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尽管正如他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他肯定不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

404

克莱门七世刚被选为教宗，就向乌尔班六世开战，向罗马发起了进攻。在被击退之后，他住在了阿维尼翁。结果，出现了两位教宗，一位住在罗马，一位住在阿维尼翁，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教廷和枢机主教团，每一位都希望被欧洲各个宫廷所承认。

不出所料，法国选择了阿维尼翁教宗，法国在百年战争中对抗英国的老盟友苏格兰也支持阿维尼翁教宗。这意味着英国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因为阿维尼翁教廷威胁到英国的利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佛兰德地区、匈牙利和波兰也支持乌尔班六世。在德国，皇帝是英国对抗法国的盟友，他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但是许多反对皇帝的贵族和主教公开支持克莱门七世。葡萄牙在乌尔班六世与克莱门七世之间摇摆不定。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最初支持乌尔班六世，但最终决定支持克莱门七世。在意大利，每个城市和每位统治者都各自为政，有势力的那不勒斯王国更是一再改变自己的效忠立场。

锡耶纳的凯瑟琳将她余生仅有的几年献给了乌尔班六世的事业。但是，支持他的事业并不容易，尤其是在乌尔班六世决定为他的侄子建立一



西班牙位于地中海海岸的潘尼斯科拉城堡，本笃十三世最后的堡垒，随着他的去世，阿维尼翁教宗成为历史。

个公国，并因此卷入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战争之后。当他的几位枢机主教建议他改变这项政策时，他将他们逮捕；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死因。

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导致了西方教会的大分裂，因此，教会的分裂并不取决于乌尔班六世和克莱门七世是否还活着，当这两位教宗去世时，他们各自的继任者又被选出，欧洲仍有两位教宗。当乌尔班六世于1389年去世时，他的枢机主教选出了卜尼法斯九世。新教宗取这个名字表明他将继续法国国王大敌卜尼法斯八世的政策。但是，卜尼法斯九世放弃了乌尔班六世改革教会的计划，他在任时买卖圣职的做法重新抬头。的确，分裂本身就助长了买卖圣职，因为两位相互敌对的教宗都需要与对手相抗衡的资金，为了获得资金，出售教职是一个便利的方法。

1394 年，巴黎大学的神学家向法国国王呈交了一份提案，该提案概述了弥合教会分裂的三个方法：第一，两位教宗都辞职，重新选出一位教宗；第二，通过谈判与仲裁来解决问题；第三，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来解决教会的分裂。在这三个解决方案中，神学家更喜欢第一个，因为其他两个都会遇到难题：谁是仲裁者，或谁有权召开会议。国王查理六世采纳了神学家的建议，当克莱门七世去世时，他要求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不要选出新教宗，因为他希望罗马的教宗会被劝服退位。

405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因法国的利益所造成的教会分裂，现在有了它自身的生命力。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担心，如果没有新教宗，他们的处境会很不利，于是匆忙选出西班牙籍枢机主教佩德罗 · 德 · 卢纳（Pedro de Luna），他取名为本笃十三世（罗马天主教将这位本笃十三世视为敌对教宗，请不要将他与 18 世纪的另一位教宗本笃十三世混淆）。如果查理六世坚持自己的解决方案，强迫两位教宗都退位，他必须面对两个拥有各自教宗的枢机主教团，而不只是一位群龙无首的阿维尼翁枢机主教团所反对的罗马教宗。查理六世采取了他所制定的新措施。他的大使试图说服欧洲各个宫廷向两位教宗施压，迫使他们退位。在法国，一次全国会议撤销了法国对本笃十三世的效忠。法国军队随后包围了阿维尼翁。但是，本笃十三世挺住了，直到不断变化的政治局势迫使查理六世放弃了他的计划，他再次宣布支持阿维尼翁教宗。

406

这些事件表明，基督教国家正在衰落，如果两位敌对教宗不结束教会分裂，其他人则会。因此，本笃十三世和罗马的教宗——先是卜尼法斯九世，后是英诺森七世，最后是格列高利十二世——开始使用各种伎俩，以表明他们正在努力结束教会分裂，是其他人拒绝谈判。这些伎俩达到如此程度：本笃十三世和格列高利十二世同意于 1407 年 9 月会晤，但是，他们到了第二年的 5 月还没有见面。这两位敌对的教宗只有数里之遥，本笃十三世最终来到事先约定的会晤地点，但是格列高利十二世却拒不前往。

看到格列高利十二世拒绝与本笃十三世会晤的罗马枢机主教意识到，欧洲越来越厌烦存在两位敌对教宗的局面，他们与自己的教宗决裂，开始与阿维尼翁教廷谈判。法国随后不再支持本笃十三世和他的教廷，并再次开始了结束教会分裂的努力。已经发展了多年的大公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第三十四章

探索改革

> 因此，教宗并不是圣洁的、大公的和普世的教会这一整个身体的头，枢机主教也不是。只有基督是头，他所预定的人是身体，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
>
> ——约翰·胡斯

教会在14和15世纪所处的悲惨境地促进了各种改革运动，都有其各自的改革计划。其中之一是大公会议运动，它既希望弥合教会分裂，也希望在不对公认的基督教教义提出实质性质疑的情况下，结束买卖圣职和任人唯亲这样的教会腐败。其他基督徒——如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和约翰·胡斯(John Huss)——认为，不仅是教会生活，教会的教义也必须改革。还有些基督徒表达对末世的期待，这些期待往往成了穷人和受压迫者的盼望。现在，我们就来讲述这些不同的改革运动。但是，读者们应当知道，为了将故事讲述得更加清楚，我们并不会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来进行。因此，让我们讲完我们在上一章所没有讲完的故事——欧洲正在寻找解决教会大分裂的办法，然后再回过头来讲述约翰·威克里夫，他生活在大公会议运动达到高潮之前。

大公会议运动

早在公元4世纪，当君士坦丁看到教会可能因阿里乌之争而产生分裂时，他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在基督教历史上，其他危机也通过类似的

方法得以解决。后来,随着教宗获得了权力,大公会议成为服务于他们的政策与计划的工具,如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批准了英诺森三世所提出的许多教令。现在,在"教会被掳巴比伦"和随后教会大分裂的漫长的数十年间,教宗的道德权威衰弱了,因此许多基督徒希望,一次大公会议可以恢复教会的合一,改革教会,从而消灭当时的罪恶。随着大公会议理论的发展,它的支持者认为,大公会议代表整个教会,比教宗更有权威。如果是这样,大公会议就可以最好地解决合法教宗的人选问题,教宗们自己无法解决,因为他们明显难以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阻碍这个简单的解决办法的一大难题是谁有权召开大公会议。如果由敌对教宗中的某一位来召开大公会议,会议的结果始终可能存在偏见,会议的决议总有可能得不到普遍接受,结果教会的分裂就无法得以弥合。

408

这个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因为两派敌对的枢机主教团都厌倦了拒绝谈判的教宗,他们于 1409 年共同在比萨(Pisa)召开了一次会议。随后,两位敌对的教宗又各自召开了会议,以取代比萨会议,但是,他们都失败了。两位教宗仍声称自己是合法的教宗,他们都撤到了戒备森严的堡垒中。

当比萨会议最终召开时,它得到了相互敌对的枢机主教团的支持,也得到了欧洲大多数宫廷的支持。此次会议并没有努力解决合法教宗的人选问题,而是宣布本笃十三世和格列高利十二世都不称职,因此,合法的教宗——不管是谁——和他的敌对者都将被废黜。随后,比萨会议还采取了针对买卖圣职和其他罪恶的措施,而枢机主教最终选出了亚历山大五世,以取代被废的教宗和他的敌对者。随后不久,比萨会议认为,它已经结束了教会分裂,因此休会。

然而,局势现在变得更糟,因为本笃十三世和格列高利十二世都拒绝接受比萨会议的决定,结果现在出现了三位教宗。虽然亚历山大五世被欧洲的大多数国家所承认,但是,他的两位敌对者也得到了足够的支持,他们继续坚称自己是合法的教宗。亚历山大五世在被选为教宗不到半年

就去世了，枢机主教选出了他的继任者约翰二十三世。亚历山大五世和约翰二十三世都没能结束教会分裂，动荡的政治局势迫使约翰二十三世逃出了意大利，向德国皇帝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寻求庇护。当时有三个人声称是德国皇帝，他们三个人分别得到了三位教宗的支持，而西吉斯蒙德只是其中之一；西吉斯蒙德认为，召开大公会议结束教会分裂的时机已经成熟。（读者们这时可能会问，15 世纪有一位教宗约翰二十三世，为什么 20 世纪也有一位教宗约翰二十三世？因为罗马天主教认为，与住在罗马的教宗一脉相承的教宗——即乌尔班六世及其继任者——才是合法的教宗。阿维尼翁的敌对教宗以及两位“比萨教宗”——亚历山大五世和约翰二十三世——都被视为反对派教宗。）

百年战争当时对法国不利，因此，教宗约翰二十三世寻求德国皇帝西吉斯蒙德的庇护，因为他是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他主动为逃亡的教宗提供保护，条件是约翰二十三世同意再召开一次大公会议。约翰二十三世同意了，当此次会议于 1414 年在康斯坦茨（Constance）召开时，约翰二十三世希望，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会支持他。但是很快就显明，他的野心和生活方式并不符合此次大公会议的改革精神，他并不能对此次大公会议抱有指望。当大公会议要求他退位时，他逃跑了，逃亡了几个月。后来他的所有支持者都抛弃了他，他被逮捕，并被带到康斯坦茨，被迫退位。随后，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以防他再次谋求教宗之职。随后不久，罗马的教宗格列高利十二世退位，这是他的承诺：如果他的敌对者退位，他也会退位。在通过了几项改革教会的教令之后，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继续采取措施，选举新教宗。出席此次大公会议的枢机主教和大公会议所任命的委员会选出了马丁五世。至于本笃十三世——阿维尼翁的最后一位教宗，他在西班牙海岸的潘尼斯科拉（Peñíscola）的一座城堡中避难，还在宣称自己是合法的教宗。但是，没有人过多地理会他，当他于 1423 年去世时，再没有选出继任者。

409

出席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的主教不仅希望结束教会分裂，也希望开始

清除教会内的异端与腐败，而这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是为了清除教会内的异端，他们才以异端罪烧死了约翰·胡斯——我们将在本章后一个部分中讲到他。但是，当触及买卖圣职、身兼数职和擅离职守这样的罪恶时，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只是颁发了几个相当笼统的教令。因此，此次大公会议决心采取措施，继续推进它已经发起的改革，并规定定期召开类似的会议，以确保康斯坦茨大公会议所发起的改革能够继续下去。

根据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的教令，马丁五世于1423年在帕维亚（Pavia）召开了下一次会议；后来为了躲避瘟疫，此次会议迁到了锡耶纳。出席会议的主教寥寥无几，在通过了几个微不足道的教令之后，马丁五世轻松地中止了此次会议。

随着下一次会议（1430年）日期的日益临近，马丁五世似乎不愿意召开会议。但是他也意识到，大公会议至高论仍然强大，如果他不召开会议，将会引发一场危机。此次会议在巴塞尔召开，不久之后马丁五世去世，他的继任者尤金四世（Eugene IV）宣布解散巴塞尔会议。但是，巴塞尔会议拒绝休会，与会者甚至提到要审判教宗。这时，皇帝西吉斯蒙德出面干涉，尤金四世撤销了解散会议的命令。直到此时，之前很少有人关注的大公会议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大公会议的权威甚至超过了教宗的权威。甚至还有一些基督徒提出，应当无限期地召开大公会议，由大公会议来直接管理教会。

后来，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君士坦丁堡请求西方援助。为了确保得到西方的帮助，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宣布，东方教会愿意重新加入西方教会，并参加西方教会的大公会议，条件是会议地点迁到距离君士坦丁堡更近的地方。尤金四世抓住这次机会，将此次大公会议迁到了费拉拉（Ferrara）。大多数与会者拒不服从，但是希望结束东西方教会数百年分裂的那些主教却参加了尤金四世在费拉拉召开的会议。因此，为了解决教宗制的分裂而兴起的大公会议运动本身也分裂了，现在出现了一位教宗和两个大公会议。

后来，费拉拉大公会议迁到佛罗伦萨召开，此次大公会议得到了普遍认可，因为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迫于形势接受了此次大公会议所颁发的合一宣言，包括教宗至上的宣言。

与此同时，巴塞尔大公会议越来越激进。此次大公会议的大多数杰出领袖逐一退出了会议，加入到尤金四世的会议。剩余的与会者则宣布废黜尤金四世，他们任命了菲利克斯五世（Felix V），以取代尤金四世。因此，现在出现了两个大公会议、两位教宗，而曾经结束了教宗分裂的大公会议运动则再次让分裂复现。但是，这部分与会者和他们所任命的教宗对教会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最后，仅剩的与会者迁到了洛桑，并最终在那里解散。1449 年，菲利克斯五世也不再声称自己是教宗。此时，教宗显然已经获胜，从此以后，大公会议听命于教宗，而不是教宗臣服于大公会议。

约翰·威克里夫

为了不打断我们的故事，我们一直在讲述 15 世纪中期之前的教宗和大公会议运动。在大公会议运动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主要立足于解决道德问题与教牧问题的改革计划，如解决买卖圣职和擅离职守。但是，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其他一些试图改革教会的运动，它们不仅希望改革教会生活，也试图改革教会的教义。在这类改革运动中，最杰出的两位领袖是约翰·威克里夫和约翰·胡斯。威克里夫生活在阿维尼翁教宗时期，他于 1384 年去世，也就是在西方教会大分裂开始不久之后。而我们将在本章下一个部分中讲到的胡斯则死于三十多年之后的康斯坦茨大公会议。

412

我们对威克里夫的早年生活知之甚少。他生于约克郡提兹河畔的威克里夫（Wycliffe-on-Tees）农庄，他的父亲是这个农庄的主人，他的名字就源于提兹河畔的威克里夫农庄。大约十二岁时，他所生活的村庄成为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所管辖的领地。冈特的约翰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的二儿子，威克里夫的生活与他纠缠在一起。威克里夫的大部分职



威克里夫成为教会改革运动的焦点。

业生涯都是在牛津度过的。他于1345年开始在牛津大学学习，当时大约十五岁；他最终因博学与缜密的逻辑而闻名于世——并非以他的幽默，这是他完全缺乏的。他在牛津大学得到了同事们的大力支持，但他最终还是于1371年离开了那里，去效忠国王；他先是担任外交官，后来成为了辩士。

当时英国正处于关键而混乱的时期，英国正在确立自己的国家身份。威克里夫出生时，诺曼法语(Norman French)仍是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所使用的语言；但在1362年，当威克里夫还是牛津大学的学生时，英语成为了宫廷语言；在他去世不久之后，英语成为小学的第一语言，但在牛津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中心，拉丁语仍是授课时所使用的语言。当时正值阿维尼翁教宗时期，因此，服务于法国利益的教宗在英国激起了怨恨与反抗。英国的一系列法令(1351年、1353年和1363年)试图限制教宗在英国的势力，英国先是规定教职的选举独立于教宗，后来又禁止人们向英国以外的宫廷上诉。因此，英国当局欢迎威克里夫对"主权"(lordship)或"统治权"(dominion)的本质与界限的论述，这是他在两部重要的著作《论

神权》(*On Divine Dominion*)和《论政权》(*On Civil Dominion*)中所详细阐述的。他认为，所有合法的统治权都来自于上帝。但是，基督所做的榜样，是这种统治权的特点：基督是来服侍人，而不是被人服侍。任何用来谋求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被统治者利益的统治权都不是真统治权，而是篡权。所有试图超越自身的权限来扩张权力的统治权也是这样，不管它有多么合法。因此，任何为自身的利益而收税、或试图将其权力扩张到属灵范围之外的所谓的教会权力，都不是合法的权力。

威克里夫的这些观点当然会受到英国世俗当局的欢迎，因为英国当局正是因税收与教宗世俗权力的问题而卷入了与教廷的不断冲突。这些冲突导致了1374年的布鲁日(Bruges)会议，作为英国的代表之一，威克里夫被派往了布鲁日。也许是为了奖赏他的效劳，英国当局将拉特沃思(Lutterworth)教区赠予他；他一直拥有拉特沃思教区，也一直在那里讲道，直到他于1382年和1384年两次中风，而后一次的中风夺去了他的生命。

413

然而，威克里夫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他的逻辑很快就令他指出，他的教会统治权权限观也是他的世俗统治权权限观。世俗统治权也必须按照世俗政府为其臣民所提供的服务来衡量。结果，威克里夫很快就失去了以前喜欢看到他直言不讳之人的支持。

此时，威克里夫的观点也更加激进。西方教会大分裂的丑闻促进了他的转变，他开始教导，基督的真教会并不是教宗及其可见的教士团，而是被预定得救之人的不可见的身体，这是他得自希波的圣奥古斯丁的一个观点。虽然不可能确切知道谁被预定得救，但还是可以在每个人所结的果子中看到是否得救的证据，这似乎表明，教会的许多领袖实际上可能是被上帝摒弃而永世受罚的人。到了晚年，威克里夫宣称，教宗也可能是一个被上帝摒弃的人。

威克里夫认为，圣经是教会所拥有的，只有教会才能正确解释圣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拥有圣经的教会是所有被预定得救之人的身体，

因此，应当把圣经还给他们，也应当把圣经译成他们自己的语言。正是因为这个观点，威克里夫才开始将武加大译本译成英文，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追随者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一百年之后，卡斯蒂利亚的国王智者阿方索[King Alfonso the Wise of Castile]下令将圣经译成西班牙文，这个命令促成了阿方索圣经[*Biblia alfonsina*]——西欧最早的方言圣经之一。）威克里夫将圣经译成英文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因为我们已经讲过，英语在威克里夫生前就已经成为宫廷语言；也是在威克里夫生前，约克的大主教约翰·托雷斯比（John Toresby）就已经下令将供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所使用的教理手册译成英文。

然而，在威克里夫的教义中引发最大争议的是他的圣餐观，即他对基督临在于圣餐中的理解。1215 年，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已经正式公布了变体说的教义。威克里夫在他的论文《论圣餐》（*On the Eucharist*）中否定了变体说，因为他认为，变体说否定了体现在道成肉身中的原理。当上帝与人性联合在一起时，神性的临在并没有摧毁人性。同样，在圣餐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基督的身体的确临在于饼中，但是，基督的临在并没有毁坏饼的实质。通过一种“圣礼的”和“神秘的”方式，基督的身体临在于圣餐中。但是，饼也仍然存在，它并没有被毁坏，也没有消失，它仍是饼，但是，它也是基督的身体。

414

到了 1377 年，威克里夫不断受到攻击，一个原因是他的神学，另一个原因是冈特的约翰不再像以前那样坚定地支持他。1377 年，教宗格列高利十一世针对他颁发了五份通谕：一份发给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一份发给了牛津大学，另外三份同时发给了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和伦敦的主教。威克里夫的教义与教会当时的官方教义相悖，因此，他被牛津大学的许多教授宣告为异端。他回到了牛津大学，但是，世俗当局越来越不喜欢他。虽然他被监禁了一段时间，但他的威望足以令他继续研究与写作。

1381 年，威克里夫最终回到了他的拉特沃思教区。他拥有一个教区，是国王为奖赏他的效劳而赠予他的，这一事实表明了改革家们所极其

1381 年，威克里夫最终回到自己的拉特沃思教区。



痛恨的罪恶在整个教会蔓延的程度。即使是威克里夫——教会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也是用他教职的收益负担他在牛津的生活费。后来，当他需要现金时，他用他的教职换取了一个报酬少一些的教职和一笔现金。

1381 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瓦特·泰勒(Wat Tyler)领导了这次起义。威克里夫支持农民的一些要求，因此，他被指控煽动叛乱，显然他并没有这样做。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威廉·考特奈(William Courtenay)长久以来一直反对威克里夫，他于 1382 年召开了一次会议，审查威克里夫的著作与教义。在此次会议期间发生了一次地震，与会双方都声称，这是上帝不喜悦对方的表现。最终，威克里夫的十个教义被宣告为异端，他的著作被禁，威廉·考特奈开始向威克里夫的追随者施压，他的许多追随者放弃了信仰——尽管威克里夫此时已经赢得了后世所说的“罗拉德派”(Lollards)的普遍支持。(“罗拉德派”是一个轻蔑的称呼，起源不详，也许是指他们喃喃地祷告。)但是，威克里夫仍有极大的威望，以至于他可以继续保留他的教区，而没有被革除教籍。

415

威克里夫于 1384 年死于中风。他在教会举行圣餐时去世，因此，他被安葬在教会。但是，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后来谴责了他，他的骸骨随后被掘出焚烧，骨灰也被扔进了斯威夫特河。

威克里夫在世时，他的一些追随者就开始传讲他的教义。我们并不

清楚这是否出于威克里夫的鼓动，也并不清楚最终被称为罗拉德派的人是否真的都是威克里夫的追随者。但是不管怎样，很快就出现了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所持有的信仰类似于威克里夫的信仰，他们开始将圣经译成英文，并传讲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他们相信圣经属于人民，圣经应当被还给人民，牧师不应当担任世俗职务，崇拜圣像、强迫神职人员守独身、朝圣和其他类似的陋习都是上帝所憎恨的。他们还否定变质论的教义和为死人祷告。就其中许多教义而言，他们是新教改革的先驱。

起初，罗拉德主义在贵族中拥有大量信徒，但很快就成为一场平民运动。他们曾努力令议会修改关于异端的法律，但是失败了，他们自身的处境也并不安全。贵族中的大多数罗拉德派放弃了信仰，回到了国家教会。少数罗拉德派仍坚守信仰，1413 年，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Sir John Oldcastle）领导了一次失败的起义，结果他被俘并被处死。随后，罗拉德运动失去了大多数贵族的支持。但是，这场运动继续在社会底层发展，在底层民众中变得更加激进。罗拉德派的一个阴谋是希望改革教会与颠覆政府，但是这个阴谋于 1431 年败露。尽管罗拉德主义不断受到逼迫，但始终没有消失。到了 16 世纪初，罗拉德主义有过一次复兴，许多罗拉德主义者被处死。最终，剩余的罗拉德派成为英国的新教徒。但是，威克里夫的教义在此前很久就已经影响到遥远的波希米亚。

约翰·胡斯

波希米亚位于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它成为了另一场教会当局所没能镇压的改革运动的发源地。这场运动的领袖是约翰·胡斯（1362—1415）。胡斯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1393 年，就在赎罪券之争爆发之前不久，他用大部分积蓄为他的罪购买了一张赎罪券。他当时还是布拉格大学的学生，可是他并不突出。但作为勤奋的工作者和雄辩的传道人，他于 1401 年成为布拉格大学的哲学系主任，1402 年被任命为伯利恒礼拜堂的传道人。伯利恒礼拜堂于 1391 年建成，它是供牧师用方言讲道的中心。

416

当时，捷克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他们认为德国在他们国家的势力过于强大，并普遍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他们的国王是文策斯劳斯(Wenceslaus)或称瓦茨拉夫(Václav)，是西吉斯蒙德同父异母的哥哥，他并不是颂歌中所称赞的好国王文策斯劳斯。(Good King Wenceslaus，好国王文策斯劳斯其实只是波希米亚的一位公爵，生活在三百年前。)西吉斯蒙德已经废黜了文策斯劳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但他仍然声称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当时正值西方教会大分裂，罗马和阿维尼翁的两位敌对者都声称是教宗。罗马的教宗本笃九世支持废黜文策斯劳斯，因此，文策斯劳斯支持阿维尼翁教廷。他煽动捷克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只是他的一个手段，目的是为他的政治赌博增加筹码。

当时，布拉格大学的捷克教授和学生与牛津大学的捷克教授和学生联系紧密，英国国王理查二世娶了一位波希米亚公主。由于这些关系，许多在英国学习的捷克学生将威克里夫的著作带到了波希米亚。威克里夫的著作在布拉格大学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尽管最初争辩的焦点是威克里夫哲学的理论问题。布拉格大学分裂成德国派和捷克派，分裂很快就反映在每位教师对威克里夫哲学的观点上，因为捷克教师接受威克里夫的哲学，而德国教师否定威克里夫的哲学，大多数德国教师声称，威克里夫的哲学已经过时了。后来，一些德国学者将这场哲学争辩扩大到威克里夫信仰正统性的问题上，这令捷克教师陷入一种艰难的境地：他们在为一个神学受到质疑之人的著作辩护，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并不完全赞同威克里夫的神学。尤其是胡斯，当他维护学者有权阅读与讨论威克里夫的著作时，他就基督临在于圣餐中的问题与威克里夫产生了分歧，他支持传统的变体说教义。最终，在波希米亚国王的支持下，捷克教师占了上风，德国教师离开了布拉格，目的是在莱比锡创建自己的大学。他们在离开布拉格时宣布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布拉格已经成为异端——尤其是威克里夫那些异端教义——的温床。因此，关于威克里夫著作的争辩促使世人有了这样一种印象：捷克人是异端。

与此同时，在附近的伯利恒礼拜堂的讲坛上，胡斯正在倡导类似于当时大公会议主义者正在提倡的改革。起初，他无意改变教会的传统教义，只想按照基督徒生活的最高理想来重建基督徒的生活，尤其是神职人员的生活。他言辞激昂的讲道尤其针对神职人员的腐败，他将神职人员称为"耶和华的肥羊"，指责他们通奸、擅离职守和以人民为代价来谋取自己的财富。他对买卖圣职的抨击直指教会的最高层，因为众所周知，1402年，大主教兹比涅克(Zbynek)在二十五岁时买来了他的教职。在这场运动中，胡斯所做的一切是在继续一场深深植根于捷克人中的运动，因为大约在三十年之前，主教杨·米利奇(Jan Milic)领导了一场运动，将民族主义与对教会改革的要求结合在一起。米利奇是一位富裕的主教，他为所提倡的教会改革而放弃了自己的财产。胡斯在伯利恒礼拜堂讲道，实际上，伯利恒礼拜堂是米利奇的一些追随者创建的，牧师在伯利恒礼拜堂中用本国语讲道的惯例，反映出这场运动的特点：民族主义。

417

当争论在波希米亚如火如荼地进行时，西方教会的大分裂也愈演愈烈。比萨会议试图结束西方教会的大分裂，但结果出人意料，现在出现了三位教宗，而不是两位。国王文策斯劳斯现在支持比萨教宗——先是亚历山大五世，后是约翰二十三世。兹比涅克最初抵制文策斯劳斯的命令，但最终缓和了他的立场，他也支持比萨教宗。后来，他请求比萨教宗亚历山大五世帮助他对付胡斯。应兹比涅克的请求，亚历山大五世下令调查威克里夫的教义在波希米亚的传播，还下令神父讲道只能在主教座堂、教区教堂和修道院中进行。伯利恒礼拜堂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因此，亚历山大五世的教令实际上相当于让胡斯闭嘴。胡斯在深思熟虑之后认为，他不能服从命令，要继续讲道。兹比涅克的回应是焚烧了威克里夫的著作；但是，捷克人反应强烈，他不得不逃出布拉格，在一座城堡中避难。1410年，教宗命令胡斯去罗马，对他不服从命令及随后的其他行为做出解释。胡斯拒绝去罗马，1411年，他被革除了教籍。但是，他得到了波希米亚国王和人民的支持，因此，教宗的绝罚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兹比涅克

向布拉格发出了禁令，他希望禁止布拉格举行圣礼，会迫使他的对手屈服。但是，王后索菲亚始终支持胡斯，她力劝她的丈夫不要动摇，还写信给比萨教宗约翰二十三世，敦促他允许胡斯继续讲道，实际上胡斯一直在讲道。

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胡斯与比萨教宗的冲突令他有了更激进的观点。他先是宣称不应当顺服不称职的教宗。他并没有质疑比萨教宗的合法性。他所质疑的是他们的权威，因为他们显然是在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教会的福祉。因此，胡斯认为，圣经是评判教宗和所有基督徒的最终权威。不应当顺服不遵守圣经的教宗。 *418*

到目前为止，较为激进的大公会议主义者还可接受胡斯所说的一切。但是，约翰二十三世后来对那不勒斯发动了一场宗教战争，他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与意大利的政策有关，他决定通过发售赎罪券来为战争筹款（购买赎罪券可以减少在炼狱中洗净罪与因罪而受罚的时间）。胡斯在二十年之前买过一张赎罪券，但是他现在认为，只有上帝才能赦罪，兜售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是在篡夺上帝的权力。这一次，胡斯还被流传在基督徒中的一种战争观激怒了：战争之所以是圣战，是因为它满足了教宗的野心。

国王文策斯劳斯需要教宗约翰二十三世的支持，他命令胡斯停止抗议。但是，胡斯的观点此时已经家喻户晓，群众爆发了示威，抗议约翰二十三世对捷克人的剥削。约翰二十三世再次革除胡斯的教籍，这一次，这位改革家离开了布拉格和他的讲坛，他不希望让整个波希米亚卷入争论。他退隐到乡下，继续撰写论改革必要性的著述。他在乡下得知，一次大公会议将在康斯坦茨召开，文策斯劳斯同父异母的弟弟西吉斯蒙德——他也是匈牙利的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邀请他出席会议为自己辩护，并给予他一张参加会议的安全通行证。

康斯坦茨大公会议有望为教会带来一个新时代，因此，胡斯并没有拒绝西吉斯蒙德的邀请。也许，他可以为此次大公会议将要进行的重大改

革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胡斯一抵达康斯坦茨就清楚地意识到，约翰二十三世希望绕过大公会议来直接审判他。胡斯被带到约翰二十三世的教会法庭，并被命令放弃他的异端邪说。他的回答是，如果有人能证明他是异端，他非常愿意放弃他的信仰。在这次激烈的对峙之后，他被囚禁了，先是在他的寓所，后是在主教官邸，最后是在各修道院的小牢房中。皇帝西吉斯蒙德抗议这些行径干犯了他给予胡斯的安全通行证。但是，当他意识到胡斯的事业并不受欢迎，而他自己将成为异端的捍卫者时，他精明地从整个事件中脱身。据说，当约翰二十三世从康斯坦茨逃走时，他将胡斯牢房的钥匙交给了西吉斯蒙德，因此胡斯可以被释放出来；但是西吉斯蒙德认为，释放胡斯将妨碍他的政治野心，实际上，他将胡斯转移到一间更安全的牢房。在去世之前不久，胡斯写信给一个朋友，指责西吉斯蒙德的软弱与谎言让他面临死亡，他祈求上帝赦免西吉斯蒙德。

1415 年 6 月 5 日，胡斯被带到了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上。几天之前，已经逃离康斯坦茨的约翰二十三世被作为囚徒押解回康斯坦茨。人们有理由希望，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会将胡斯视为约翰二十三世的敌人，并撤销对他的指控。但是，此次大公会议同西吉斯蒙德一样，希望成为正统信仰的坚定捍卫者。因此，当胡斯出现在会场时，他被囚禁起来。会议领袖希望胡斯屈服，他们宣布，他只需放弃他的异端邪说。他坚持认为自己从未信奉他们指控的教义。他们反驳称，胡斯必须放弃他的异端邪说。但胡斯并没有放弃他的信仰，因为如果他放弃信仰，就是在承认他自己、他的捷克朋友和追随者都是异端。他最终相信自己不会在与会者那里得到公正的听证，他宣称："我向全能、完全公义的耶稣基督上诉，他是唯一的审判者。我将我的事业交在他的手中，因为他会按照真理与公义审判每一个人，而不是按照虚假的见证和错误的会议。"随后，他被押回监狱，许多人去那里请求他放弃信仰，因为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的领袖希望他放弃信仰，这可以确认大会的权威，而不是定他的罪，这会让许多人质疑大会是否明智。

419

1415年7月6日，胡斯最终被带到了主教座堂。他穿上圣衣，随后又被扒掉。他被剃成光头，戴上了一个装饰着魔鬼的纸王冠。在赴刑场的途中，押解人员领他路过了他的著作被焚烧的柴堆。当他被绑在火刑柱上时，他得到了最后一次放弃信仰的机会，他再次拒绝。随后，他高声祷告说："主耶稣，为了你，我平静地忍受这样残酷的死亡。我祈求你宽恕我的敌人。"在他被烧死的过程中，人们听到他在背诵诗篇。几天之后，他的同事、布拉格的哲罗姆（Jerome of Prague）也被烧死。布拉格的哲罗姆是威克里夫的观点在波希米亚的主要支持者，他决定在康斯坦茨与胡斯站在一起。行刑者将他们的骨灰收集起来，扔进了康斯坦茨湖，好让这两位异端头子什么都不会留下。但是，一些捷克人带回了胡斯被烧死之地的几撮泥土，以纪念教会当局在康斯坦茨所犯下的罪行。

波希米亚人义愤填膺，他们几乎一致否认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四百五十二位贵族举行庄严的会议，宣布他们支持胡斯，不应当顺服不称职的教宗。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的回击是，下令解散布拉格大学，命令造反的贵族去康斯坦茨，并宣布波希米亚国王怂恿异端。

在波希米亚，一些不同派系共同反对康斯坦茨大公会议。最初的胡斯派（Hussites）主要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但他们很快接受了源自社会底层的更加激进运动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塔波尔派（Taborites），这是一场带有末世色彩的运动，早在胡斯之前就已经在农民中开展。塔波尔派否定一切在圣经中找不到依据的东西，而真正的胡斯派愿意保留一切圣经所没有明确否定的东西。另一场类似于塔波尔派的运动是何烈派（Horebites），但是，他们的末世论较为温和。 420

武装干涉的威胁令这些不同派系接受了《布拉格四条》（*Four Articles of Prague*），而《布拉格四条》很快就成为波希米亚人抵抗的基础。第一条是上帝的道要在整个波希米亚被自由地宣讲。第二条是平信徒可以领受"两种"圣餐——即平信徒不仅领受饼，也领受酒。这是胡斯在他晚年得出的一个结论，并很快就成为了所有胡斯派的主要吁求之一。第三条是

所有胡斯派都同意剥夺神职人员的财产，他们应当“像使徒那样贫穷”地生活。最后，第四条规定，重罪与公开的罪——尤其是买卖圣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

后来，波希米亚国王文策斯劳斯去世了（1419年），他在波希米亚的合法继任者是西吉斯蒙德——那个在康斯坦茨辜负了胡斯的德国皇帝。421 波希米亚人要求他同意《布拉格四条》，给予崇拜自由，并承诺不任命德国人担任公职。西吉斯蒙德难以接受这些条件，应他的请求，教宗向胡斯派发动了一场宗教战争。西吉斯蒙德和他的军队向布拉格附近进军，但他们被作为主力的塔波尔派的波希米亚军队击败。小贵族约翰·杰士卡（John Zizka）已经加入塔波尔派，并将塔波尔派组建成一支武装力量。他的主要武器是装上刀片的农用小车，以此作为令人望而生畏的战车。在第二场战争中，西吉斯蒙德的十字军残余被彻底消灭。一年之后的1421年，一支由十万十字军战士所组成的军队在杰士卡的战车前望风而逃。第三支十字军于1422年解散，他们甚至还没有与敌人交战。随后不久，在1421年的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的杰士卡离开了塔波尔派，加入了何烈派，因为他极不喜欢塔波尔派的末世论。他于1424年死于瘟疫。但是，波希米亚人继续战斗，并于1427年和1431年两次击败了另外两支十字军。

此时，巴塞尔大公会议已经认为，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对波希米亚问题的处理并不明智，并邀请胡斯派参加新召开的巴塞尔大公会议，解决他们与大公教会的分歧。但是胡斯派担心类似于审判与处死胡斯的事件会再次上演，他们要求巴塞尔大公会议作出保证，但这令大公会议感到被冒犯。大公教会再次向波希米亚发动了宗教战争。但是，他们又被击败了。

这最后一次战败最终令大公教会相信，他们必须与波希米亚人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波希米亚的教会重新加入了西方基督教王国的教会，但是，波希米亚的教会被允许保留“两种”圣餐和《布拉格四条》。对此，许多胡斯派，尤其是贵族中的胡斯派表示同意，最终，西吉斯蒙德成为

波希米亚国王，尽管他在十六个月之后去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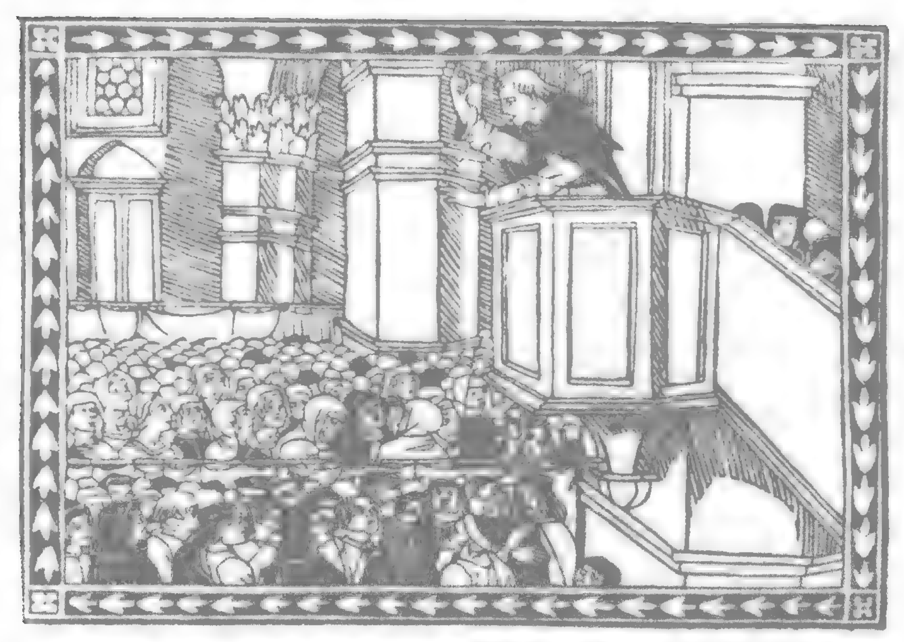
然而并不是所有波希米亚人都接受这项协议。许多人离开了波希米亚教会，并最终成立了联合弟兄会（Union of Brethren，或 *Unitas Fratrum*）。在波希米亚和附近的摩拉维亚（Moravia），联合弟兄会的信徒数量迅速增长。16 世纪新教改革期间，他们与新教建立了紧密联系，并一度可能成为路德宗信徒。随后不久，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罗马天主教的坚定支持者——开始逼迫他们。他们被驱散了，联合弟兄会几乎彻底消失。他们的领袖约翰·阿莫斯·夸美纽斯（John Amos Comenius，1592—1670）主教在逃亡中鼓励他们，替他们辩护，希望被残酷砍断的树木有一天会再次开花结果。这些希望在他去世很久之后实现了，我们将在以后的故事中看到联合弟兄会的残余——当时被称为摩拉维亚弟兄会（Moravians）——的影响。联合弟兄会的另一部分残余成为接受加尔文神学的众多教会之一。

422

吉罗拉默·萨伏那罗拉

1490 年春末，一位多明我修会的托钵修士站在佛罗伦萨的城门之外。他就是费拉拉人吉罗拉默·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在三十三年的生命中，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习和灵修中度过的。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到佛罗伦萨，因为他曾在这里居住过。佛罗伦萨人敬佩他的圣经造诣，但并不喜欢他激烈的讲道和他的费拉拉“外国”腔。著名的哲学家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将他推荐给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伟大的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 the Magnificent），现在，他应洛伦佐的邀请重返佛罗伦萨。

萨伏那罗拉在他所在的圣马可修道院（Convent of San Marco）开始向修士同伴讲解圣经。其他许多基督徒很快就来听他的讲座，他们从花园搬到了教堂，讲座变成了讲道。到了 1491 年的大斋节，他已经非常著名，因此，他被邀请到佛罗伦萨最重要的教堂讲道。当他讲到当时的罪恶以



萨伏那罗拉是一位雄辩的、充满激情的传道人。

及真基督徒的生活与迷恋奢华的差异时，他激怒了许多掌权者。尤其是洛伦佐·德·美第奇，他特别生气，雇了另一位传道人来攻击萨伏那罗拉。他们失败了，因为佛罗伦萨人支持萨伏那罗拉，那位传道人决定到罗马策划针对萨伏那罗拉的阴谋。

423

当萨伏那罗拉被选为圣马可修道院院长时，一些修士告诉他，新院长通常会借此机会拜访洛伦佐，感谢他对修道院的支持。新院长的回答是，他应当感谢上帝让他担任了院长，而不是感谢洛伦佐，因此，他会在祷告中感谢上帝。随后不久，他卖掉了修道院的大量财产，并将其收益分给了穷人。他也改革了修道院的内部生活，以至于人们开始谈论托钵修士的圣洁与服务精神。后来，其他修道院要求加入他所发起的这些改革。甚至洛伦佐在临终之际也将这位圣徒般的托钵修士召到了他的病榻前。

洛伦佐的继任者彼尔特罗·德·美第奇（Pietro de Medici）失去了佛罗伦萨人的尊敬。法国的查理八世正向南进军，想要夺取那不勒斯的王

位。查理八世进军途中要经过佛罗伦萨，彼尔特罗不愿意、也无法领导人民保卫佛罗伦萨，他想收买查理八世。佛罗伦萨人被激怒了，他们派出了自己的使团，由萨伏那罗拉领导。与此同时，他们将彼尔特罗逐出了佛罗伦萨。当查理八世进入佛罗伦萨并提出无理要求时，萨伏那罗拉再次出面斡旋，他与查理八世达成了更合理的协议，结果佛罗伦萨成为了法国的盟友。

当查理八世和他的军队离开时，萨伏那罗拉的威望令佛罗伦萨人向他请教组建哪种政府。按照他的建议，他们建立了共和国，并采取措施，恢复佛罗伦萨已被中断的经济生活。与此同时，为了给穷人提供食物，他还建议卖掉教会的金银。

就是在这时，萨伏那罗拉的改革达到了高潮。虽然他经常被描述成狂热无知的修士，但是他相信，学习应当成为教会改革的中心。因此，在他的带领之下，圣马可修道院的托钵修士开始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和迦勒底文。但是他也相信，当时的奢华和富人所极其看重的一切都是浮华之物，贪求浮华之物是他所痛恨的罪恶之源。因此，在他的领导之下，人们会定期焚烧浮华之物。大广场上搭建起一座巨大的木制金字塔，在它的下面堆满了带有火药导线的稻草和木柴。在这座木制金字塔的台阶上，人们放上了他们的"浮华之物"——服装、珠宝、假发、华丽的家具和其他类似的东西。然后，在以列队高歌等各样方式庆祝的人群中，整座木制金字塔被点燃。就在大斋节开始禁食之前，这巨大的篝火取代了传统的庆祝活动，因为传统的庆祝活动已被萨伏那罗拉和他的追随者所禁止。

萨伏那罗拉的改革呼声也在附近的城市得到了响应。锡耶纳共和国是佛罗伦萨的敌人，它请求萨伏那罗拉的帮助。他带着二十位托钵修士来到锡耶纳，他所提倡的改革一度很兴旺。但很快就出现了抵抗，抵抗者的领袖是一些曾被萨伏那罗拉逐出修道院的修士。最终，萨伏那罗拉愤然离开了锡耶纳。他在当时处于佛罗伦萨统治之下的比萨更加成功，他 424

将一些修士逐出了圣卡特里娜修道院(Santa Caterina),因为他们反对他的严格要求。萨伏那罗拉的改革从圣卡特里娜修道院发展到附近的其他修道院。

政治局势导致了萨伏那罗拉的垮台。教宗亚历山大六世——有史以来最差的一位教宗——结成了一个包括意大利许多地区、德国和西班牙在内的反法同盟。如果加入亚历山大六世的同盟,局势会对佛罗伦萨有利。但是,萨伏那罗拉坚守他对查理八世的承诺。亚历山大六世的回应是一系列先后针对萨伏那罗拉和整个佛罗伦萨的严厉措施。许多佛罗伦萨人很快就清楚地看到,由于他们的传道人坚守诺言,他们失去了大量生意。富人越来越反对萨伏那罗拉和他的政策。支持他的人越来越相信他是先知,他们要求他行出神迹。当他的一些预言实现时,他们更加狂热了。但是,当他没能行出他们所要求的神迹时,他们也开始反对他。

最终,一伙暴徒闯入了圣马可修道院。萨伏那罗拉拒绝保护自己,也不愿意让朋友为救他而以武力对抗他们的佛罗伦萨同胞。他被这伙暴徒带走、审讯和殴打,他们将他交给了当局,而当局的一些人正是这起阴谋的策划者。

现在必须证实对萨伏那罗拉的一些指控。他被酷刑折磨了几天,但他的行刑者最多只能令他承认,他并不能预言未来——不管怎样,他从未声称他可以预言未来。亚历山大六世派特使参加了对萨伏那罗拉的审判,他们也对他施以酷刑。然而,他们也只能得到他计划向大公会议上诉的"认罪"。萨伏那罗拉自己也承认,他要求改革的做法可能太骄傲了,他说:"主啊,如果被你施与许多恩赐与恩典的彼得都彻底失败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法官不再希望对他提出更多、更具体的指控,他们最终决定将萨伏那罗拉和他两位最亲密的同工斥为"异端和分裂者",但是并没有说明他们具体是哪种异端。他们随后被交给"世俗权力"处死,因为教会不可以杀人。他们得到的唯一宽恕是,先吊死他们,再焚烧尸体。他们三人都英勇殉道。他们的骨灰随后被扔进了亚诺河(Arno),以消除人们对他

们的所有记忆。但即使这样，还是有许多人保留了这位圣洁的托钵修士的遗物。当罗马于若干年后被日耳曼人洗劫时，一些人认为，这实现了萨伏那罗拉的预言。从那以后直到今天，始终有罗马天主教徒认为，这位多明我修会的托钵修士是圣徒，他应当被正式追封为罗马天主教的圣徒。

神秘主义者

虽然充满了众多罪恶，但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罪恶，在14和15世纪出现了许多神秘主义者。许多杰出的神秘主义者来自西班牙、英格兰和意大利，他们的著作激励了未来的几代基督徒。在德国和莱茵河畔的低地国家，神秘主义最为兴盛。

德国神秘主义的伟大教师是霍赫海姆的埃克哈特（Eckhart Von Hochheim），他通常被称为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他生活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他的神秘主义教义基本上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因为其教义的目标是默想上帝，那位不可名状者。埃克哈特认为，关于上帝的所有语言都是不准确的，因此严格地讲都是错误的。“如果我说：‘上帝是良善的’，这并不正确。我是良善的，上帝并不是。”此类言论容易产生误解，给人留下埃克哈特不敬重上帝的印象。实际上，他的目的恰恰相反。他当然不是要表达上帝是邪恶的，而是关于上帝的所有语言都只能是类比的，因此都是不准确的。不管怎样，他的话表明了他神秘主义思想的特点，他希望说明人类的所有概念都不能描述上帝，因此，对上帝的真正认识是非理性的，是直觉的。他希望以此荣耀上帝。上帝并不能通过研究或理性的论证来认识，但可以通过神秘的默想来认识；人在神秘的默想中最终会与上帝合一。

426

一切受造物永恒存在于上帝里面。在创世之前，上帝这位伟大的设计师的思想里就已经有了万有的理念。这也是所有柏拉图哲学传统和埃克哈特所信奉的新柏拉图神秘主义所特有的思想。他基于这些思想指出：

> 上帝的真本质高于万有，无法用“特性”来界定，在上帝的真本质中，我已经存在。在那里，我决定我自己，我认识我自己，我愿意创造我自己。因此，就我的永恒“存在”——不是暂时的“成为”——而言，我是我自己的起因。①

这和其他类似的言论令许多人将埃克哈特视为异端。他们说，他教导世界和一切受造物都是永恒的，将上帝与世界混为一谈，从而成为了泛神论者——相信一切受造物都是神祇之一部分的人。他尤其被指责相信灵魂或灵魂的一部分不是受造物，而是永恒的。埃克哈特不断抗议，这些指责是基于对他教义的误解，他的确努力避免泛神论和灵魂具有神性的教义。但是，他的表达经常让人对他产生更多的误解。他在职业生涯的晚年被正式指控并被定为异端。他随后向罗马上诉，但是，案件还没审理完他就去世了。

虽然对埃克哈特教义的许多解释或是过于简单，或是过于夸大，但是，在他的新柏拉图神秘主义与明谷的伯尔纳及阿西西的方济各以基督为中心的神秘主义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差异。伯尔纳和方济各在默想历史的耶稣——在某段时间与某个地点成为肉身的上帝——的过程中获得了灵感。另一方面，埃克哈特并不特别关心圣经事件的历史时间与地理位置。他说：“耶路撒冷距离我灵魂的距离，与我此时所站的地方距离我灵魂的距离是一样的。”他这些话的意思是，人可以通过内心的默想来直接认识上帝，“让自己被上帝抓住”，从而“不需要媒介”就认识了上帝。

427

虽然埃克哈特生前被指控为异端，但是，他在死后却赢得了许多追随者，尤其是在他所在的多明我修会。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陶勒（John Tauler）和亨利·苏索（Henry Suso）。尽管他们不像自己的老师那般博学，但是，他们能以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人更能理解的方式来阐述埃克哈

① *Sermon on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特的观点。通过他们的著作,埃克哈特的神秘主义被普遍接受。

在莱茵河的下游,生活着佛兰德神秘主义者吕斯布鲁克的约翰(John of Ruysbroeck)。虽然他可能读过埃克哈特的著作,并接受了德国这位大师的一些观点,但是,他的神秘主义却更加实际,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种神秘主义被另一位佛兰德神秘主义者格哈德·格鲁特(Gerhard Groote)进一步发展,他深受吕斯布鲁克的约翰的影响。

吕斯布鲁克的约翰和格鲁特共同塑造并普及了所谓的"现代灵修"(Modern Devotion,或 *devotio moderna*)。"现代灵修"主要在于训练一种以默想基督的生活与效法基督为中心的灵修生活。这一学派最著名的著作是托马斯·厄·肯培(Thomas à Kempis)的《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历代以来,《效法基督》是最被普遍阅读的灵修著作。

吕斯布鲁克的约翰、格鲁特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也认为必须否定"自由之灵弟兄会"(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的教义。自由之灵弟兄会也是由神秘主义者组成的,他们声称自己可以直接经验上帝,因此,他们不需要像教会和圣经这样的媒介。一些自由之灵弟兄会的成员甚至声称他们是属灵的,因此可以自由地放纵他们的私欲。

也许,格鲁特的最大贡献是创建了共同生活弟兄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他放弃了挂名领薪的神父职位。他与当时的许多神职人员一样,曾依靠这样的职位获取收入。他开始抨击教会的腐败,号召他的追随者重拾圣洁与敬虔的生活。但是,格鲁特同其他许多倡导类似改革的基督徒不同,他并没有号召追随者过修道生活,而是坚持认为,他的追随者必须坚持他们的呼召——"共同生活",并在共同生活中遵守现代灵修的原则,除非他们真的得到了修道呼召。即使这样,他的许多追随者最终还是过上了修道生活,并采纳了《圣奥古斯丁修道规章》。但是,他们始终关注并没有得到修道呼召的基督徒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生活弟兄会建立了出色的学校,不仅要过修道生活的人在这里接受训练,许多生活另有安排的人也在这里接受训练。共同生活弟兄会的学校既强调学

428

术,也强调灵修,它们成为教会复兴的中心,因为大多数毕业生都具有批判与改革精神。其中最著名的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他是16世纪的一位领军人物。

德国和佛兰德的神秘主义者都避免过度狂热,很少有例外。在他们看来,神秘默想并不会导致难以控制的情感,而是会带来内心的平静。这并不是通过波动的情感刺激得到的,而是通过内心坚定的理性默想。

在致力于信仰和默想的众多基督徒中,诺威奇的朱利安夫人(Dame Julian Norwich, 1342—约1417)值得我们特别关注。1373年,在三十岁左右时,她在一场重病中得到了十五个关于基督和圣母的异象。第二天夜里,当她开始怀疑自己此前的经历是否属实时,她又得到了一个异象,这证实了她此前的那些异象。与其他神秘主义者不同,她只得到了这些异象,再没有其他异象;但是,她的余生始终在默想它们,探究它们最深奥的意义。她住在与教堂毗邻的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度过了余生。这个小房间只有一扇通往一座封闭花园的门,通过小房间的窗户,她可以与她的一个仆人和众多来访者交谈,在教会举行圣餐时,她也可以通过这扇窗户仰望教会的圣坛。虽然有许多基督徒来征求她的建议,寻求她的安慰,但她还是特别因她的《启示》(*Showings*)而闻名于世。《启示》有两个版本,一个较长,一个较短,她在其中探究了那一系列异象的意义。她大胆使用比喻,她的比喻和神学智慧令她的著作成为中世纪最受赞扬、讨论最多的灵修著作之一。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 1290—1349)和马格丽·肯普(Margery Kempe, 1373—1438)也是英国著名的神秘主义者

神秘主义运动本身并不抵制教会与教会领袖。尽管一些神秘主义领袖批评高级教士滥用权力,尤其是他们的铺张浮华,但是,大多数神秘主义者满足于灵修带给他们内心的平静,认为没有必要反对教会当局。但是,另一方面,神秘主义往往会削弱腐败的高级教士和建制教会的权威。的确,如果我们直接通过默想就可以与上帝合一,一些传统的恩典管道就失去了其自身的意义,如圣餐、讲道,甚至圣经。14和15世纪的神秘主

义者很少得出这样激进的结论，而一些激进的神秘主义者则被大多数神秘主义领袖和教会所否定，如自由之灵弟兄会。但是，神秘主义者的教导播下了一粒怀疑的种子，它将在未来越来越削弱教会领袖的权威。

429

平民运动

我们此前讲述的，主要是爆发在富人与知识分子中的改革运动。因为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现存的大部分文献都是关于这些运动的。穷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能写书论述他们的梦想，当他们与掌权者爆发激烈的冲突时，他们只能在史书中寻找他们的梦想。不过，到了中世纪晚期，许多普通人都有这样的梦想。

威克里夫的教导得以在牛津大学的学者、赞成他教导的贵族和走村串巷宣讲福音的罗拉德派中流传下来，但是，罗拉德派所宣讲的福音与村民从教会当局那里听到的极为不同。的确，如果牛津大学教授的教义能表达普通人的许多梦想，罗拉德派就不太可能在普通人中赢得追随者。起初，胡斯派主要是贵族和学者，他们得到了塔波尔派的最大支持，但是，塔波尔派可能早于胡斯派，他们的许多教义并不是源于胡斯，而是源于穷人普通的敬虔与末世的盼望。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女基督徒中。对于她们来说，修道生活其实是令她们能够完全独立于父亲、丈夫或儿子的唯一方法。因此，很多女基督徒涌进了修会，如方济各修会和多明我修会。很快，这些修会的男领袖就开始限制女基督徒进入其女分会的人数。但是，这并不能抑制女基督徒的修道动力，一些女基督徒开始组成小团体，一同过着祷告、灵修和较为贫穷的生活。这些女基督徒被称为贝居安会女修士（Beguines），她们的修会被称为贝居安会（Beguinages）。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名字的起源，但是，它们显然是贬义词，可能与她们被怀疑信奉的异端邪说有着某种联系。虽然少数主教支持这场运动，但它却被其他教会领袖所禁止。在13世纪末和随后的一些年，教会明令禁止这种修道生活，因为它并不



鞭笞者遵循规定的鞭笞与其他苦修仪式。

属于正规修会，也经常令正规修会感到蒙羞。当男基督徒过上类似的生活时，他们被称为“贝格哈德男修士”（Beghards），他们也受到了怀疑。

另一场平民运动是鞭笞者（Flagellants）的运动。他们最早出现在1260年，但其人数在14世纪开始增长。为赎罪而自笞并不新奇，因为这在许多修道院中非常普遍。但是，自笞现在变成了一种平民狂热，它几乎与建制教会没有任何关系。各行各业成百上千的基督徒相信末世近了，如果人类再不悔改，上帝将毁灭这个世界，因此他们鞭笞自己，直到鲜血涌流。

430

这并不是一时或毫无组织的歇斯底里。相反，这场运动有着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仪式主义的纪律。希望加入这场运动的人先尝试加入三十三天半，在此期间，他们绝对服从他们的上级。在最初这段时间之后，虽然

他们可以回家，但是鞭笞者每年都要在耶稣受难日鞭笞自己。

在成为鞭笞者的最初三十三天里，他们必须遵守特定的仪式。他们每天两次列队向当地教堂行进，站成两排，一边行进，一边歌唱赞美诗。在教堂中向圣母献上祷告之后，他们还要歌唱赞美诗回到公共广场。在公共广场上，他们脱掉上衣，围成一圈，跪下来祷告。在祷告之后，他们跪着重新唱起赞美诗，并用力鞭笞自己，直到后背鲜血淋漓。有时，他们的某位领袖会向他们讲道，信息通常是关于耶稣的受难。在鞭笞之后，他们起来穿上衣服，再列队离开。除了每天两次的公共鞭笞之外，他们还有一次私下鞭笞。

431

起初，教会领袖并没有在这场运动中看出任何的危险。但是，当鞭笞者开始宣称他们的仪式是“第二次洗礼”——就如初期教会对殉道的态度——和一种赎罪的方法时，他们被指控试图篡夺只给予圣彼得及其继任者的“权利钥匙”。他们在一些国家受到了逼迫，最终放弃了公共鞭笞。但是，这场运动继续秘密进行了许多年。（即使到了21世纪，我们仍可以在美洲看到中世纪鞭笞者的仿效者，例如，活跃在新墨西哥州的苦修会修士[Penitentes]。）

汉斯·博姆（Hans Böhm）所领导的另一场运动说明了时代的气息。在维尔茨堡（Wurzburg）教区的尼克劳斯豪森（Nicklashausen），一尊圣母像成为朝圣的中心。在1476年的大斋节，一个名叫汉斯·博姆的年轻牧羊人开始在朝圣者中讲道。那几年并不是好年头，因为庄稼欠收，维尔茨堡的主教在用高额赋税压迫穷人。起初，博姆的讲道主要是关于悔罪。但是，他很快就被听众的贫穷感动，他的信息变得更加激进。他抨击神职人员的贪婪与腐败，指明这些恶习有悖于福音的诫命。他后来宣称，人人平等和没有剥削的一天终将到来。最终，他敦促他的追随者——当时已经超过了五万——为那伟大一天的到来提前行动起来：拒绝交纳赋税和什一税。他定下了所有人共同武力夺取他们权利的日期。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博姆打算如何夺取主教的权利，因为在预定日期

的前夕，主教的士兵逮捕了他，他们用大炮驱散了群众。博姆被当作异端烧死。但是，他的追随者继续在尼克劳斯豪森聚集。主教宣布，禁止整座村庄举行圣事。但是，他们还是来了。最终，美因兹（Mainz）大主教出面干涉，他下令毁掉了村里的教堂。博姆的追随者没有了领袖和集结中心，他们解散了。但是，他们极有可能促成了16世纪另一场激进的运动：再洗礼派运动。

这只是众多类似事件中的一例。中世纪的最后几年动荡不安，社会运动与宗教不满和盼望结合在一起。教会当局从现存的秩序中获益，他们通常支持掌权者，镇压每一场抵抗运动。在这样的氛围中，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兴旺发展，它的灵感基本上来自古代对公义的盼望，而不是源于现代的世俗化潮流。

第三十五章

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

哦，圣父上帝最大的慷慨！哦，受造物人类最大、最惊人的快乐！上帝已经赐予受造物人类选择与决定的自由！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在中世纪最后一百年，思想与哲学分道扬镳。一方面，一些神学家继续经院神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回顾过去，在古代智慧中寻求指引与启示，他们促成了文艺复兴。

经院神学的后期历史

经院神学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达到顶峰之后便有了三个特点。第一，它不断提出更细致的问题，并为回答它们而不断做出更细致的区分，例如，上帝能造出一个他不能移动的石头吗？上帝始终行善吗？或是，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善的，这只是因为它们是上帝做的？此外，经院神学还发展出一种没有神学知识的人所难以理解的缜密风格和专业词汇。第二，神学与哲学的分歧越来越大，通过理性所认识的真理与只通过上帝的启示所认识的真理越来越难以调和。第三，西方的神学倾向于将救恩视为通过人的行为就能实现的一个目标——这种倾向在中世纪晚期达到了顶峰，在中世纪晚期的神学中，参加圣餐甚至也变成了一种配得救恩的敬虔行为。我们将会看到，16 世纪的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回应中

世纪晚期神学的这些倾向。

阿奎那和他的同时代人认为，信仰与理性基本上是有连贯性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正确运用理性，我们可以认识某些启示的真理，如上帝的存在。但是，在这位伟大的多明我修会神学家去世不久之后，其他神学家就开始质疑信仰与理性有一种连贯性的基本假设。

434

约翰·邓·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是波那文图拉时代之后最著名的方济各修会神学家，他被恰当地称为"精微博士"（Subtle Doctor）。这个称呼意在表示尊敬。但是，它也指明了中世纪晚期经院神学的一个特点，而正是这个特点很快就令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反对当时的经院神学。司各脱的著作晦涩难懂，其中的细致区分精密繁复，只有研习当时哲学与神学多年的人才能读懂。即使是这样，他也明显不赞同他前一代的神学家，他们相信，单单凭借正确地使用理性就可以证明信仰的教义，如灵魂的不朽和上帝的全能。至于上帝的存在，司各脱既否定了安瑟伦的不证自明的本体论论证，也否定了托马斯·阿奎那基于其他存在物的存在而展开证明的宇宙论论证。司各脱并不否定这些教义，也不否认它们的合理性。他所否定的是理性可以证明这些教义。理性最多可以证明，信仰的教义是可能的。

这种神学倾向在 14 和 15 世纪变得更加明显。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约 1280—1349；Occam 经常被拼写为 Ockham）和他的追随者。奥卡姆主要因所谓的"奥卡姆的剃刀"（Occam's razor）或"俭省法则"（Law of Parsimony）而闻名于世。简单地说，奥卡姆的"俭省法则"是指，对于回答一个问题或解释一件事来说，我们不应当假设任何不必要事物的存在；或者换句话说，最简单的解释通常是最好的。尽管这一法则在奥卡姆时代之后被用来论证上帝并不存在，但这并不是奥卡姆的初衷，因为他相信，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即使上帝的存在只能凭借信仰来接受，而不能被理性论证所证明。信仰不仅承认上帝的存在，也承认上帝的全能。奥卡姆和他的追随者从上帝的全能出发得出结

论,人的自然理性绝对无法证明上帝和上帝的计划。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区分了上帝的"绝对能力"(absolute power)和"命定能力"(ordered power)。上帝是全能的,因此,上帝的绝对能力是无限的。只要上帝愿意,凡事都有可能。没有什么是在上帝的绝对能力之外,理性不是,善恶之分也不是。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必须承认,上帝的绝对能力受到了理性或善恶之分的限制。但上帝只根据"命定能力"合理地行事,并做出良善的事。严格地说,我们不应当说,上帝总能做出良善的事,而是说,无论做出什么,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良善的。是上帝决定了什么是良善,而不是良善决定了什么是上帝。同样,称上帝必须合理地行事也是错误的。理性并不能决定上帝的行为。相反,决定什么是合理的,恰恰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意志,而按照那些指令行事的,则是靠着上帝的"命定能力"。

435

这就意味着,神学家用来证明教义合理、甚至"合适"的所有传统论证都不再有效了。以道成肉身这个教义为例,安瑟伦和在他之后的几乎所有神学家都声称,上帝在某个人里面成为肉身是合理的,人在上帝面前的罪是无限的,人的罪只能由成为肉身的上帝来补赎。但是,14 和 15 世纪的神学家却指出,无论道成肉身从我们的角度看来有多么合理,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上帝的绝对能力,道成肉身就是不合理的。上帝可以凭借他的绝对能力免除我们的罪,或宣告人并不是罪人,或将除了基督的功绩以外的其他一些行为算作替人赎罪的功绩。我们被基督的功绩所救赎,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我们必须靠基督得救,也不是因为基督的道成肉身与受难是救赎我们的最好方法,而只是因为由基督救赎我们,完全是上帝自己的决定。

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要骗自己相信,在人这一受造物中有某些特别适于上帝道成肉身的东西。上帝临在于某种受造物永远是个神迹,这与我们是否有能力承受上帝无关。因此,奥卡姆的一些追随者甚至宣称,上帝可以在一头驴中成为肉身。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这些神学家是不信派,喜欢专为取乐而提出一些

刁钻的问题。相反，我们对他们生活的所有了解似乎表明，他们是敬虔、真诚的真基督徒。他们的目的是赞美上帝的荣耀。造物主无限地高于受造物，人的心灵无法测透上帝的奥秘。上帝是全能的，在上帝的全能面前，我们必须停止一切理解上帝之全能的努力。

这并不是一种怀疑的神学，只愿意相信理性可以证明的东西。这种神学是，在证明理性并不能理解上帝的深奥之后，将一切交在上帝的手中，并愿意相信上帝所启示出来的一切。我们去相信它们，并不是因为它们有意义，而是因为它们是上帝的启示。

这反而意味着，对于14和15世纪的神学家来说，权威的问题至关重要。理性并不能证明教义是否正确，因此，我们必须基于无误的权威来评判教义的对错。奥卡姆本人相信，教宗和大公会议都可能犯错，只有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在后来，随着西方教会大分裂进一步推动了大公会议运动，许多人相信，大公会议是所有持反对意见的人都必须服从的最终权威。因此，在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上，著名的神学家让·德·热尔格（Jean de Gerson）和皮埃尔·德埃利（Pierre d'Ailly）要求约翰·胡斯屈服于此次大公会议的权威。如果胡斯被给予了申辩的机会，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的权威将受到损害。吉尔森和德埃利声称，理性几乎一无是处，因此，再没有什么其他权威可以结束教会分裂、改革教会或规定正确的教义。

436

中世纪晚期的这些神学家强调信仰的重要性，他们所强调的信仰不仅是相信，还是信靠。上帝为了我们的益处而设立了他权能的秩序。因此，我们必须信靠上帝的所有应许，即使理性可能令我们怀疑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全能高于我们的所有仇敌。信靠上帝全能的人不会蒙羞。这种思想是中世纪晚期的典型思想，它将在后来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那里再次出现。

然而，无论这些神学家有多么敬虔，他们的细致入微和他们对精确定义与细致区分的坚持，还是激起了许多基督徒的回应，他们讨厌复杂的学

术神学，痛惜神学已经脱离了质朴的福音。“现代灵修”便是其中的一种回应。受此启发而写成的最有名的著作是《效法基督》，它表达出当时的一个普遍观点：

> 如果你缺少谦卑，从而不被三位一体的上帝所喜悦，那么，你能深奥地讨论三位一体的道理，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
>
> 高谈阔论并不能使人变得圣洁与公义。但是，道德的生活一定会使人被上帝所喜悦。
>
> 如果你能背诵整部圣经和哲学家的所有言论，却没有上帝的仁慈和爱，这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
>
> 虚空的虚空。一切皆是虚空，除了爱上帝与服侍独一的上帝。①

总而言之，在中世纪最后一百年，经院神学走上了一条只能激起许多敬虔的基督徒作出消极回应的道路，他们认为，这种神学非但对敬虔无益，反而会妨碍敬虔。人们听到了回归质朴福音的呼声，这一呼声越来越迫切。

古代知识的复兴

当经院神学沿着越来越复杂的道路前行时，其他人试图复兴古代知识的荣耀。这就产生了文艺复兴和它在文学领域中的对应物：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术语以不同的方式被广泛使用，因此，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一些解释。 437

用于某一历史时期的“文艺复兴”或“重生”这个名词，意指对此前一个时代的负面评价。最早使用“文艺复兴”一词的学者，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他们将罗马陷落之后的一千年称为“中世纪”，因为他们看到，古

---

① *Imitation of Christ* I. I. 3.

代知识在中世纪这一千年中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他们将中世纪最优秀的艺术称为“哥特式”艺术，这样做同样表现出他们的偏见，因为“哥特式”一词本身就意味着那是野蛮的哥特人的艺术。同样，他们将于14和15世纪在意大利爆发并传到欧洲其他地区的知识与艺术运动称为“文艺复兴”，这样做也表现出他们对过去一千年的偏见，他们声称，正在进行的这场运动是此前被遗忘的古代知识的一次光荣重生。实际上，文艺复兴在从古代智慧那里吸取营养的同时，也在从过去的那一千年中获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深深植根于哥特式艺术；圣方济各和西塞罗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巨大；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深受中世纪行吟诗人的诗歌所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将这场运动称为“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相信，同古代相比，过去的一千年是一段颓废期——也许现在仍是，因此，他们尽其所能地促进古代文明的复兴。

“人文主义”这一术语使用得更含糊不清。它通常是指这样一种倾向：将人置于宇宙的中心，让人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但是，“人文主义”也研究人文科学——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科”。中世纪末和16世纪的许多学者使用“人文主义”的这种含义，他们自称是“人文主义者”，因为他们致力于文科研究。他们当中的许多学者的确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因为对古代知识的研究使他们心中产生了一种对人类创造力的敬畏感。但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因为许多人文主义者深刻地感受到罪和人类成就的局限性。因此，当我们在本章中提到“人文主义”时，它只是一场试图重返古代文学源泉并模仿其风格的文学运动

许多人先后在意大利和全西欧倡导复兴古代知识。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年轻时就用意大利文创作出十四行诗，但是，他后来更喜欢模仿西塞罗的风格，用拉丁文写作。他很快就赢得了许多追随者，他们也模仿古代文学。许多人开始抄写与传播古代拉丁作家的手稿。还有人来到君士坦丁堡，并带回了希腊作家著作的抄本。

当土耳其人于 1453 年攻取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庭的逃亡者带着他们的古希腊文学知识涌进了意大利。结果,一次文学大觉醒始于意大利,后来又传入了西欧。

对古代的兴趣也体现在艺术中。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在古代的异教艺术中寻找灵感,而不是在刚刚过去的数百年的基督教艺术中寻找灵感。当然,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因此,哥特式艺术的确影响到他们的作品。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意大利艺术家的理想是重新发现古代的审美标准,并将其应用到他们的作品中。

在人们重新对古代知识产生兴趣的同时,约翰·古腾堡(Johan Gutenberg)于 1439 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长久以来,印刷一直是通过木刻印版进行的:将木刻印版涂上墨,然后再在纸张上印刷。古腾堡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他用可移动、可被不断使用的字模来印刷,因此,用于印刷某版面的活字也可以用来印刷其他版面。古腾堡的发明对人文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起初,印刷术并不被视为普及文学作品的一种方法。相反,早期被印刷出来的大多数书籍都很难阅读,它们是拉丁文或希腊文书籍。此外,印刷排版努力模仿手写的书籍,包括抄写员当时经常使用的缩写。(古腾堡本人并没有公布他的发明,因为他的目的是印刷大量书籍,然后再将它们作为昂贵的抄本出售。为此,他并没有简化印刷版面,而是让它与所有的传统手稿一样复杂。)对于早期的人文主义者来说,印刷术是学者用来交流或复制古代著作的好工具,却不是用来普及他们思想的好工具。学者的思想仍是知识精英的专有财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印刷术并不用来向大众传递信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之后的宗教改革。

即使这样,印刷术还是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书籍现在更容易得到,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同一部著作的不同抄本存在差异。虽然前人已经意识到这些差异,但是,他们只能做到更加仔细地抄写抄本。但是,人们现在可以通过印刷术将一本书印刷出几百本,在印刷过程中也不会

出现新的错误。如果一位学者通过比对不同的抄本，从而得出一部古代著作一个可靠的文本，他可以监督这部著作的印刷，这部著作将具有永久性的价值，因为不必再交给在抄写过程中可能犯下新错误的抄写员。因此，“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这一学科应运而生，它的目的是比对现存的抄本，运用一切历史研究资源来恢复古代著作的原貌。很快就出现了一批学者，他们致力于西塞罗、哲罗姆和新约的勘校工作。 439

发现古代文本中的错误令人们开始怀疑一些文本的真实性。抄本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因此，一些所谓的非常古老的著作难道不可能是后人所作吗？中世纪最重要的一些文献在经过历史研究方法的检验之后被证明是伪造的。《君士坦丁赠礼》就是这样的文献。人们当时相信，伟大的皇帝君士坦丁在《君士坦丁赠礼》中将西方的管辖权赠予了教宗。学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研究了这份文献，他得出结论，这份文献的风格和词汇都表明，它是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后很久才写成的。同样，瓦拉也给出强有力的论证，驳斥了这个传说：《使徒信经》是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各写一条而成的。 440

这些研究对教会生活的影响，可能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直接和彻底。瓦拉是教宗的秘书，教宗似乎并不在意瓦拉的研究和结论。其中的原因是，这些研究的结论只在知识精英中传播，他们并不重视用他们新发现的知识来影响大众。当时的基督教不再是从前的基督教，返回其本源是必要的，但是这个思想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普及。这个思想是促成新教改革的因素之一。

新的实在观

意大利正经历一段繁荣时期。意大利的主要城市都有用于修建雄伟建筑且饰以艺术品的资金。雕塑家、画家和建筑师涌入这样的城市。贵族和富裕的资产阶级是艺术的赞助人，因此，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大多数艺术品并不是赞美上帝的荣耀，而是赞扬艺术赞助人。因此，此前几乎专门

用于基督教教导和荣耀上帝的艺术，开始将目光转向人类的光辉。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品中，有一些是赞美人类这个受造物的，而在中世纪艺术中，这一受造物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和雕刻家开始用颜料和石料来赞美人类。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大教堂中所画的亚当，从上帝的手指间领受了统治受造物的能力，这个亚当与中世纪抄本中那个软弱的亚当大相径庭。他体现出文艺复兴对成为完全人的理解：生来就要创造，就要被世界所铭记。

莱昂纳多·达·芬奇成为了这一观念的化身。很少有哪种人类活动不曾被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天才所刻苦钻研。虽然他今天主要作为画家和雕刻家而闻名于世，但是他在工程学、珠宝制造、弹道学和解剖学领域也进行了重要的研究与工作。他的目标是成为"全才"（universal man）——这也符合他那个时代的理想。他计划开凿河道、制造新式武器、潜艇和飞行器，但是这些宏大计划从未实现。他的许多绘画未能完成，甚至才刚刚勾勒出草稿——它们现在被视为伟大的艺术珍宝。尽管他的一些工作和作品均未完成，但是莱昂纳多·达·芬奇却成为了文艺复兴的目标"全才"的化身和象征。

441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对人类的观念是，人类既有向善、也有向恶的无限能力，这是他的重要主题。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他认为，上帝赐予我们各种各样的种子，因此，我们可以决定在自己的里面种下哪粒种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选择"植物性"种子或"动物性"种子的人，只能成为一株植物或一头野兽。然而，所有选择了"理性"种子并在其自身予以培养的人，"将成为上帝的天使和孩子"。如果不满足于仅仅成为受造物，这样的人可以转向他们灵魂的最深处，"他们的灵魂将与处在他们灵魂幽静之处的上帝一同超越这一切。"这一切令米兰多拉惊呼道："有什么办法？只能赞美我们这只奇怪的变色龙！"这句古怪的赞美之词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的潜能观。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

虽然文艺复兴对意大利来说是一段极为繁荣的时期，但这也是一段动荡不安的岁月。教宗在阿维尼翁的“巴比伦之囚”和随后的西方教会大分裂对意大利的影响，比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更直接。意大利几乎一直都是相互敌对的教宗和分别支持他们的贵族与共和国的战场。在文艺复兴时期，老贵族与共和精神冲突不断，因此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样的城市中不断爆发动乱，动乱经常在这些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引发武装冲突。此外，尤其是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外势力，始终在阴谋争夺各自在意大利的影响力。

442

正是在繁荣、阴谋、动荡和文艺复兴理想这种背景之下，生活着宗教改革之前的最后几任教宗。我们上次讲到教宗时，尤金四世最终维护了他对巴塞尔大公会议的权威。他热衷于装饰罗马，并为此召来了许多艺术家，如弗拉·安吉里柯（Fra Angelico）和多那太罗（Donatello）。这是教宗拥有文艺复兴精神的一个早期迹象。从此以后，直到新教改革之后的一段时间，大多数教宗都有着与文艺复兴同样的目标与理想。他们热衷于艺术，利用自己的权力将最优秀的艺术家吸引到罗马，并用与作为基督教国家的首都罗马相称的宫殿、教堂和纪念碑来装饰罗马。一些教宗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在扩充教宗图书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所有艺术事业中，尤其是在修建圣彼得大教堂这项庞大的工程中，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投入了教会的大量资金。许多教宗对此还不满意，又想出了获取钱财的新方法，以便继续扩充罗马和罗马的艺术。

然而，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教宗都热衷于艺术。一些教宗更像是军阀，他们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军事战争中。还有一些教宗试图通过阴谋和外交来扩张他们的权力。总而言之，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教宗都被当时的时代精神冲昏了头，这可以在他们对铺张、专权和肉体享乐的狂热中看出。

尤金四世的继任者是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 1447—1455),他在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努力为罗马获取统治意大利其他国家的政治权力。他的目标是将罗马建设成欧洲的知识首都,为此,他试图将最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吸引到罗马。他的私人图书馆被誉为欧洲最好的图书馆。他对胆敢挑战他权力的人残酷无情,处死了一些反对他的人。君士坦丁堡在他的任期内沦陷,他希望借此机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以提升他在整个欧洲的威望。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他的号召无人响应。

尼古拉五世的继任者是卡里克斯图三世(Calixtus III, 1455—1458),他是西班牙博尔哈家族(Borja)——在意大利被称为博尔贾(Borgia)家族——的第一位教宗。文艺复兴的理想对他的影响,只是让他梦想成为一位伟大的世俗王子。同他的教牧职责相比,他更关心军事战争,他的借口是这对抵抗土耳其人可能发起的进攻和统一意大利是必要的。在他担任教宗期间,任人唯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被他推上高位的众多亲戚中,他将自己的孙子罗得里格(Rodrigo)任命为枢机主教,后来,罗得里格成为了臭名昭著的亚历山大六世。

443

下一任教宗庇护二世(Pius II, 1458—1464)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位尽忠职守的教宗。他委任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拟定改革教会的计划,但是,对教会的改革最终失败,这主要是因为枢机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的反对。庇护二世的成就并不是很大,但是,他至少没有将教宗之职变成扩张他个人及其家族权力的工具。作为一位学者,他开始编辑篇幅浩大的《宇宙学》(*Cosmography*),但未完成这项工作。后来,《宇宙学》中的世界观令克里斯托夫·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试着向西航行,并抵达了印度群岛。

保罗二世(1464—1471)是个机会主义者,他一得知自己的叔叔(尤金四世)被选为教宗,就认定担任教职比他目前的贸易工作更有前途。他的主要兴趣是收集艺术品,尤其是珠宝和银器。他对奢侈品的贪恋家喻户晓,他和情妇的交往在教廷中众所周知。他的主要事业是修复罗马的

异教建筑和纪念碑，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财力和精力。根据一些编年史家的记载，他因缺乏节制而死于中风。

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1484）通过向枢机主教许诺礼物和特权而买来了教宗之职。在他担任教宗期间，腐败和任人唯亲更加严重。他的主要政策是为他的家族增添财富，尤其是为他的五个侄子。在他的五个侄子中，朱利亚诺·德拉·罗维尔（Giuliano della Rovere）成为了后来的教宗尤利乌斯二世。在西克斯图斯四世的统治之下，教会成为了家族企业，整个意大利被卷入一系列战争和阴谋，而这一切的唯一目的是增添教宗侄子们的财富。他最喜爱的侄子彼尔特罗·里亚里奥（Pietro Riario）在二十六岁时被任命为枢机主教、君士坦丁堡牧首和佛罗伦萨大主教。西克斯图斯四世的另一个侄子吉罗拉默·里亚里奥（Girolamo Riario）策划了对美第奇家族一员的谋杀，在后者作弥撒时将他杀死在圣坛之前。当死者的亲属进行报复，并吊死了谋杀他们亲戚的神父时，西克斯图斯四世将整个佛罗伦萨革除了教籍，并向佛罗伦萨宣战。为了资助他的阴谋以及支付他侄子和其支持者的巨大开销，他开始对小麦征收重税。他为填满他的金库而卖掉了最优良的谷物，而罗马人只能食用品质最差的面包。即使这样，后人还是忘记了西克斯图斯四世的大部分罪行，而主要因以他命名的西斯廷大教堂而记住了他。

444

在被选为教宗之前，英诺森八世（1484—1492）许下了庄严的誓言：任命他家族成员担任高级教职不超过一人，并恢复罗马教廷的秩序。但是，他一被选为教宗，就立即宣布教宗的权力至高无上，因此他并不受自己誓言的约束，尤其是被迫许下的誓言。他是第一位承认他几个私生子的教宗，并给予他们极高的地位和巨额的财富。在他一个儿子的管理之下，销售赎罪券变成一种无耻的生意。1484年，他下令在基督教国家清剿女巫，结果，数以百计的无辜女性在清剿中丧生。

在英诺森八世去世之后，罗得里格·博尔贾（Rodrigo Borgia）买来了枢机主教的选票，成为了教宗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在他任职期

间，教宗的腐败达到了顶点。他是一位强横无情的教宗，据说，他当众犯下了全部七宗罪(Capital Sins)，除了暴食——因为他消化不良。一位编年史家声称，这位教宗经常说："亚历山大情愿卖掉教权、圣坛甚至是基督。这是他的权利，因为这些都是他买来的。"当欧洲在土耳其人的威胁面前恐惧战兢时，他却与苏丹秘密地进行交易。他的情妇都是他教廷中其他教士的合法妻子，她们为他生下了几个孩子，而他公开承认了这些孩子。其中最著名的是恺撒·博尔贾(Cesare Borgia)和卢克雷齐娅·博尔贾(Lucrezia Borgia)。即使关于这个家族最坏的传说可能并不属实，但那些无可否认的事实仍足以定亚历山大六世的罪：腐败和对权力的无限贪恋。由于他的阴谋和战争，意大利生灵涂炭，意大利人愿意相信关于他的最坏传言，教宗的威望因此蒙受了损失。

亚历山大六世意外去世——有人说他误服了自己为别人准备的毒药。他的儿子恺撒希望自己可以在父亲去世之后成为教宗，但是，他不得不卧床，忍受与他父亲同样的疾病折磨，无法将他的计划付诸实践。因此，庇护三世(Pius III)被选为教宗，他是一位具有改革精神的教宗，肩负起平定意大利的艰巨使命。但是，他在被选为教宗二十六天之后去世，新教宗是亚历山大六世一位称职的继任者。

尤利乌斯二世(1503—1513)被他的叔叔西克斯图斯四世任命为枢机主教，他取这个名字是要表明，他的榜样并不是基督教的圣徒，而是尤利乌斯·凯撒。他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教宗一样，也赞助艺术。就在他担任教宗期间，米开朗基罗完成了西斯廷大教堂的壁画，拉斐尔(Raphael)用他著名的壁画装饰了梵蒂冈教廷。但是，尤利乌斯二世最喜爱的娱乐活动是战争。他重建教宗卫队，他们身穿华美的军装奔赴战场——据说他们的军装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他的军事与外交才能异常出色，以至于一些人认为他可能最终统一意大利，成为意大利的领袖。法国和德国反对这些计划，但是，尤利乌斯二世在外交中和战场上都击败了它们。1513年，死亡终结了尤利乌斯二世的事业，他的同代人将他称为"可怕的

尤利乌斯二世”。

尤利乌斯二世的继任者是伟大的洛伦佐的儿子吉奥瓦尼·德·美第奇(Giovanni de Medici),他取名为利奥十世(1513—1521)。他同自己的父亲一样,也赞助艺术。他还希望巩固尤利乌斯二世所取得的政治与军事成果。但他失败了,1516 年,他被迫与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签署了协议,而这份协议令弗朗索瓦一世在法国的教会事务中拥有了巨大权力。同对基督教或教牧工作的热爱相比,他更喜爱艺术,他的伟大梦想是建成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为这项工程筹款是发售赎罪券的目的之一,而发售赎罪券激起了路德的抗议。因此,当新教改革开始时,教宗利奥十世难以招架摆在他面前的挑战。

建议阅读：

Aziz S. Atiya. *History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Renate Blumenfeld-Kisinski. *Poets, Saints and Visionaries of the Great Schism*, 1378–1417.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Henry Chadwick. *East and West: The Making of a Rift in the Church from Apostolic Times until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Oxford Univasity press, 2003.

G. R. Evans. *John Wyclif: Myth and Reality*.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2005.

Justo L. González.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Vol. 2. Nashville: Abingdon, 1971.

Carole Hildebrand. *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David Knowles. *From Pachomius to Ignatius: A Study of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Religious Ord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Gordon Leff. *Heres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2 vol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7.

Gordon Leff. *Medieval Thought: St. Augustine to Ockham*.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58.

Christine Meek and Catherine Lawless. *Pawns or Players? Studies o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men*. Dublin: Four Corners, 2003.

H. St. L. B. Moss. *The Birth of the Middle Ages: 395–8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Thomas F. X. Noble and Julia M. H.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ume 3: Early Medieval Christianities, c. 600–c. 110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George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7.

Roberto Ridolfi. *The Life of Girolamo Savonarol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9.

Miri Rubin and Walter Simon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 4: *Christianity in Western Europe, c. 1100 – c. 150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R. V. Sellers.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A Historical and Doctrinal Survey*. London: S. P. C. K., 1953.

Desmond Seward. *The Hundred Years War*. New York: Atheneum, 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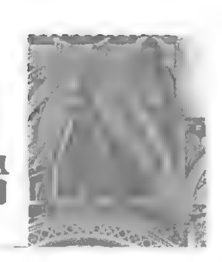
Barbara W. Tuchman. *A Distant Mirror: The Calamitous 14th Centu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Herbert B. Workman. *The Evolution of the Monastic Ideal*. London: Charles H. Kelly, 1913.



第四部分

殖民基督教的开端



编年表

历史事件[1]	日期[2]
☆航海者亨利	1460
格拉纳达投降;哥伦布第一次航海	1492
瓦斯科·达·伽马驶向印度	1497 – 1498
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发现巴西	1500
葡萄牙人殖民果阿	1510
巴尔博亚抵达北美洲的太平洋国家	1513
庞斯·德·莱昂抵达佛罗里达;攻陷特诺奇蒂特兰	1521
阿塔瓦尔帕被俘	1532
德·索托抵达密西西比	1541
☆弗朗西斯·沙勿略	1552
维叶加农殖民巴西	1555
葡萄牙人殖民澳门	1557
让·里博殖民佛罗里达	1562
☆拉斯·卡萨斯	1566
☆路易斯·贝尔特兰	1581
利玛窦抵达北京	1601
☆托里比奥·阿方索·德·莫格罗韦霍	1606
☆彼得罗·克雷沃	1654
耶稣会被逐出西班牙的殖民地	1767
图帕克·阿马鲁起义	1780

① ☆表示人物去世的年份。

② 从时间上看,这些事件同我们将在《基督教史》下卷中讲述的其他一些事件是同期发生的,因此,读者可以查阅下卷欧洲教宗、统治者及历史事件的年表。

第三十六章

西班牙与新大陆

> 由于你们对这些无辜之人的残酷和压迫，你们犯下了不赦之罪。你们活在罪中，死在罪中。谁授权给你们残忍可怕地奴役这些印第安人？谁授权给你们向平静安详地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人发动战争？……难道他们就不是人吗？
>
> ——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

在中世纪晚期和新教改革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向海外扩张，这对基督教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注欧洲当时重大事件的新教历史学家经常忘记，天主教扩张最迅速的时期正是这个时期。许多天主教历史学家也是如此，天主教改革——通常被称为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是他们最关注的。这样的疏忽在当时可能还情有可原，但是，这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的20世纪则不可原谅，在21世纪更是如此。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和随后的教会生活中，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罗马天主教徒一直发挥着主要作用。因此，为了理解罗马天主教现今的历史，我们必须了解在这些地区中影响罗马天主教的各种因素。

西班牙殖民事业的性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他的同伴于1492年12月12日踏上新大陆时，他和所有欧洲人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但是，在费

迪南和伊莎贝拉对这片广阔的土地和它可能蕴藏的巨大财富略有所知之后，他们就立即采取措施，限制哥伦布的权力。他们这样做并不单纯是出于贪婪，也是出于他们多年维护自己在西班牙的权力的斗争经验。在西班牙，他们借资产阶级的帮助最终成功地限制了权贵的权力，在这些权贵中，既有平信徒，也有神职人员，他们曾经推翻了伊莎贝拉的哥哥卡斯蒂利亚的亨利四世(Henry IV)的统治。因此，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担心在新大陆会兴起类似的权贵，所以制定政策抑制他们。作为海洋舰队司令和殖民总督，哥伦布可以获得与新大陆全部贸易收益的十分之一，更可以拒绝效忠国王，因此，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绝不能给予他这样的财富和权力。

450

在新大陆，这通常会导致西班牙国王颁布法律，保护被哥伦布所误认为的“印第安人”。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担心，如果不控制西班牙征服者对印第安人的剥削，他们将成为与西班牙大公同样具有独立精神的强大封建领主。这导致国王与西班牙殖民者冲突不断。西班牙所制定的法律，新大陆通常不遵守。最终的结果是，印第安人惨遭剥削与屠杀，而大西洋两岸的西班牙人却在商讨最佳的政策。

新大陆的宗教政策遵循了在中世纪所建立的模式。在西班牙基督徒与西班牙摩尔人的战争中，他们采用了十字军的范例和模式，现在，他们采取同样的方法来征服印第安“异教徒”。此外，在发现新大陆不久之前，卡斯蒂利亚已经征服了加纳利群岛(Canary Islands)和格拉纳达，教宗给予卡斯蒂利亚国王极大的权力，来统治新征服地区的教会。现在，这些先例被用到了新大陆。在从1493年到1510年的一系列通谕中，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和尤利乌斯二世给予了西班牙国王极大的权力。西班牙国王被授予新大陆教会的“皇家庇护权”(*patronato real*)。随着皇家庇护权的发展，西班牙国王有权为新大陆的教会提名——实际上是任命——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西班牙国王也管理什一税和教会的其他奉献款，并负责教会的全部开支。结果，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教会



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在格拉纳达接见哥伦布，给予他极大的权力与特权，但他们后来又将其全部收回。

几乎与罗马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实际上，这里的教会成为西班牙国王和被他们任命的人所领导的国家教会。尽管西班牙国王所选出的一些主教忠实地牧养着他们教会的基督徒，但是大多数主教——尤其是后期被任命的主教——都成为西班牙国王的政治代理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也不关心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人民的疾苦。

然而，新大陆的教会还有另一面。进行宣教工作的宣教士——通常是方济各修会、多明我修会或耶稣会的宣教士——生活在普通人中，他们了解普通人的悲惨处境。这些宣教士的守贫誓愿和他们的简朴生活，令他们能够生活在印第安人中，并亲眼目睹了殖民政策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因此，许多托钵修士开始保护印第安人，抵抗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掠夺。在这项事业的早期，多明我修会的宣教士带头保护印第安人。在18世纪，保护印第安人成为导致耶稣会遭受镇压的原因之一，镇压先是由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统治者、最后甚至由教宗本人亲自实行（参下卷第十九章）。长久以来，在关心穷人的教会之上，是等级森严的教会，它们领袖的教职得自于他们与西班牙宫廷的密切联系。因此，在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罗马天主教中，一开始就存在两种局面：一方面，大多数教会统治者、教区主教、平信徒神职人员和一些托钵修士因殖民者的利益而支持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剥削；另一方面，许多托钵修士批评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剥削，他们保护受压迫的印第安人。

在19世纪，当老的殖民地爆发独立战争时，教会也因其对独立战争的态度而产生了分裂，因此，大多数主教是保皇派，而许多教区神父和托钵修士则将他们的命运押在了反抗者身上。在20世纪后半叶和进入21世纪后，罗马天主教在拉丁美洲取得了复兴，并在许多社会斗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许多穷人成为了教会领袖 因此，在殖民初期就开始形成的“教会的两种局面”将继续共存数百年。

抗议

452

对于剥削印第安人的第一次公开抗议，是多明我修会的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Antonio de Montesinos）于1511年在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的讲道，我们已经在本章开头引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他在这篇讲章中得出结论，殖民者并不比“摩尔人和土耳其人”更容易得到救恩。这次讲道所表达的不仅是蒙特西诺斯自己的观点，因为他在多明我修会的同伴委托他进行抗议，警告殖民者停止剥削印第安人。地方当局试图让蒙特西诺斯闭嘴，但是，他得到了多明我修会同伴的一致支持，最终，这场争论上达西班牙宫廷。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就在听蒙特西诺斯讲道的人群中。他大约在十年之前殖民到圣多明各，并被按立为神父——他可能是第一位在新大陆被按立为神父的人，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被按立的确切时间。但是，剥削印第安人的问题并没有令他过于烦心。实际上，他自己就托管着一批印第安人。

托管制度(encomienda system)[1]是多明我修会的修士所抗议的主要弊病。虽然禁止奴役印第安人,但为了所谓的教化他们和教给他们基督教教义,一群群印第安人被"托管"给殖民者。印第安人要为殖民者劳动,以回报殖民者对他们的教导。这导致的后果比直截了当的奴隶制更坏,因为托管人根本就没有在印第安人身上投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关心他们的死活。

当蒙特西诺斯开始讲道抨击托管制度时,拉斯·卡萨斯正托管着印第安人。关于托管印第安人的争论爆发时,他选择了沉默。后来,在1514年的圣灵降临节,他的心彻底改变了。他不再托管印第安人,从此以后,他公开宣讲,基督教信仰与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剥削水火不容。他与蒙特西诺斯一起来到西班牙,并说服西班牙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托管印第安人一事。当拉斯·卡萨斯发现该委员会的委员只听信托管人时,他与他们决裂了,并回到了西班牙。他就这样开始了在大西洋两岸不断往返的漫长生涯:他在西班牙得到保护印第安人的法律,却在新大陆发现地方当局并不愿意或并不能实施这些法律。有一次,他试图在委内瑞拉树立一个和平传播福音的榜样。但是附近的殖民者引发了暴力冲突,印第安人最终爆发了起义。他后来回到了圣多明各,并最终在那里加入了多明我修会。此后,他到过中美洲和墨西哥,又重返西班牙。他在西班牙宫廷中赢得了众多支持者,并被任命为墨西哥南部恰帕斯(Chiapas)的主教。在他所牧养的基督徒中,有许多印第安人的托管人,他多次与他们发生冲突;因此,他后来辞职回到了西班牙。在西班牙,他通过上诉和写作为印第安人辩护了二十九年。他于1566年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453

拉斯·卡萨斯的著作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人开始怀疑西班牙殖民者在新大陆的整个殖民事业的道德性。但是,在殖民事业中有着既得

---

① 托管制度,也译为"监护征赋制"。——译者注

利益的人最终胜利了。1552年,拉斯·卡萨斯的著作在他还活着时就在秘鲁被禁。到了17世纪中叶,他的著作被宗教裁判所列入禁书名单。

另一位质疑西班牙殖民者在新大陆殖民事业的多明我修会修士是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的神学教授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他对西班牙殖民者占领秘鲁和他们对当地印第安人及其土地与矿藏的残酷剥削深感不安,他发表了一系列演讲,质疑西班牙殖民者夺取印第安人领地的权利。

作为对拉斯·卡萨斯、维多利亚和其他人抗议的回应,查理五世于1542年颁布了《印度群岛新法》(*New Laws of Indies*)。这些法律限制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所拥有的权力,并规定向愿意与西班牙殖民者和平共处的印第安人发动战争违法。可是,这些法律在新大陆基本无人遵守。在秘鲁,殖民者公然违抗它们。最终,《印度群岛新法》被人遗忘。但是在整个殖民时期,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始终有基督徒抗议对印第安人的剥削,他们致力于改善印第安人的命运。

加勒比海地区

1493年,哥伦布在第二次航海中带了七名宣教士,他们的任务是向印第安人宣教。但是,当他们抵达哥伦布第一次航海中在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建立的寨堡时,他们听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西班牙殖民者的虐待、剥削和强奸导致印第安人起义,他们摧毁了寨堡,并杀死了全部驻军。哥伦布下令"平定"伊斯帕尼奥拉岛,他命令他的上尉割掉所有拒不投降之人的耳朵和鼻子。但是,西班牙殖民者中也有造反者。伊莎贝拉得到了关于殖民地管理不善和暴政的报告,于是采取了行动。哥伦布被免职,并被押解回西班牙。

在哥伦布继任者们的统治之下,印第安人的处境并没有任何好转。西班牙殖民者命令印第安人每个季度都要向他们交税,税金是金子和棉花。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交税的印第安人变成了奴隶。印第安人后来逃到

了山区，西班牙殖民者在山中用猎狗搜捕他们。至于宣教士，他们似乎对这一切置之不理，只是将一些印第安酋长的儿子带回家，在家中将他们作为基督徒来教育。1503 年，西班牙下令印第安人必须住在自己的村子里，每座村庄必须有一位西班牙政府所派驻的代表和一位神父。这个命令偶尔会被执行。但是在后来，有劳动能力的印第安人被带到矿上采金，他们被迫要离家数月之久。最终，强制劳动、西班牙殖民者所带来的疾病以及大规模自杀夺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的生命。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波多黎各、古巴、牙买加和其他一些小岛。

454

印第安劳动力的缺失令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引进黑奴。第一批黑奴于 1502 年从西班牙到达了加勒比海地区，但是在此后一些年，印第安劳动力仍然廉价，因此这并没有加剧对黑人的奴役。1516 年，热衷于改善印第安人处境的拉斯·卡萨斯建议从非洲引进奴隶。但是他很快就收回了这个主张，并成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捍卫者。然而到了 1553 年，数万名非洲人被作为奴隶引进了加勒比海地区。少数神学家反对奴役黑人，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不是反对奴隶制度，而是不确定该如何分配利润。不管怎样，加勒比海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在西班牙所有殖民地中不断上演。无论在哪里，只要印第安人数量稀少，非洲的黑奴就会取代他们。直到今天，那些在 16 世纪时印第安人稀少的地区，还生活着数量较多的黑人。

墨西哥

在进军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途中，科特兹（Cortez）捣毁了他所到之处各个部落的偶像。但是，在特拉斯喀兰人（Tlascalans）的部落中，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需要强大的特拉斯喀兰人帮助他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因此，政治的权宜之计和狂热的盲信奇怪地结合在一起，这为西班牙殖民者在墨西哥的宗教政策定下了基调。

虽然有两位神父加入了最初到墨西哥的探险队，但是两位显然还是

不够。尽管科特兹贪婪暴虐，但他仍是真诚的天主教徒，他请求查理五世向墨西哥派来托钵修士，而不是平信徒神父或主教。他的理由是，托钵修士可以过贫穷的生活，他们可以为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树立良好的榜样，而平信徒神父或主教生活奢华，令人反感，他们不会积极地向印第安人传播福音。查理五世答应了科特兹的请求，十二位方济各修会的托钵修士来到了墨西哥。他们一到墨西哥就受到科特兹正式而庄重的接待，他跪下来亲吻了他们的双手。但是，他们的工作并不轻松，因为印第安人极其憎恨西班牙殖民者和他们的宗教。另一方面，印第安人似乎清楚地认识到，基督教的上帝打败了他们的神祇，因此，许多印第安人虽未忘记自己正在遭受虐待，仍跑去要求洗礼，因为他们希望基督教强大的上帝会帮助他们。

十二位最初来到墨西哥的托钵修士和在他们之后前来的许多基督徒，一点点地赢得了他们所牧养的印第安基督徒的尊重，甚至赢得了他们的爱。有时，当印第安基督徒听说他们的神父要被派到其他地区时，他们会爆发骚乱，强迫当局改变他们的计划。

455

初生的墨西哥教会中爆发了许多冲突与争论。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为所有愿意接受洗礼的人施行洗礼，只是要求他们知道：只有一位独一的上帝，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以及会背诵主祷文与圣母经。有时，甚至这些最低的要求也被取消了。据说，一些宣教士一天会为数百人施行洗礼，有时甚至同时为几个人施行洒水洗礼。因此，在俗神父——修道院外的神父——有理由嫉妒托钵修士所取得的成功，尽管他们大多数人很少牧养印第安人。不管怎样，他们指责托钵修士过度简化洗礼。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并没有指责托钵修士降低洗礼的要求，而是指责他们在施行洗礼的过程中遗漏了某些要素。最终，教宗保罗三世解决了这场争论，他宣布，从前被简化的洗礼无罪，但是从此以后，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施行洗礼。即使是在教宗出面干涉之后，托钵修士与平信徒神父的争论还是持续了许多年。

墨西哥的第一位主教是方济各修会的胡安·德·祖玛拉嘉(Juan de Zumárraga),他后来成为墨西哥的大主教。他相信,教会需要改革,必须通过教育基督徒和培养有文化的神父来改革教会。为此,他将一台印刷机引进了墨西哥,这是西半球第一台印刷机,他用这台印刷机印出了许多用来教育印第安人的书籍。其中包括一部祖玛拉嘉没有指明作者的著作,但是,这位作者后来被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定罪,罪名是,他是一名新教徒。祖玛拉嘉也采取措施,创建了墨西哥大学;他热衷于保护印第安人,对抗一切剥削他们的人,无论剥削者有多么尊贵。

然而,同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基督徒一样,这位在其他方面非常开明的主教却难以宽容他眼中的异端。1536 年,祖玛拉嘉被任命为新西班牙(New Spain,墨西哥当时的名字)的"使徒检察官"(apostolic inquisitor)。从 1536 年到 1543 年,一百三十一人因异端罪而受到了审判。其中大多数被告都是西班牙殖民者,只有十三位被告是印第安人。最著名的印第安被告是酋长卡洛斯·奇奇梅克泰克托尔(Carlos Chichimectecotl),他与方济各修会的修士一同学习,他被指控崇拜偶像、非法同居和藐视神父。他承认他与自己的侄女生活在一起。从他家中搜出一些偶像,他说这些偶像只是他所收藏的历史珍品。从没有人见过他崇拜偶像。此案本该以他受到一些轻微的惩罚而结束,但是一位证人声称,他曾听到奇奇梅克泰克托尔宣称,基督徒的信仰令人怀疑,因为许多基督徒是令他们的神父难以管教的形形色色的醉鬼。基于这项指控,他被判处火刑并活活烧死。

456

奇奇梅克泰克托尔接受过教育,因此,对他的审判令反对教育印第安人的声音死灰复燃。他们的理由通常不是印第安人没有能力学习。相反,他们的理由是,如果印第安人学会了读和写,就可以彼此沟通,这会令他们变得很危险。这一担忧是几代印第安人接受低水平教育的真正原因,也是最开明的西班牙人对授予印第安人圣职心存顾虑的主要原因。1539 年,教会领袖在祖玛拉嘉的主持之下召开会议,他们批准可以授予印第安人四个最低级别的圣职,但这四个圣职并不包括施行圣礼的权限。

多明我修会的修士比方济各修会的修士更保守，他们宣称，不应当授予印第安人圣职，印第安人根本就不应该接受教育。同样的思想也在修道院中大行其道。在这些方面最开明的方济各修会的修士，允许印第安人生活在他们的修道院中，但他们必须穿着特殊的褐色教士袍，并被禁止立下修道誓愿，也不被允许成为平信徒修士。如果方济各修会的西班牙修士认为某个印第安修士不合格，他们会将他开除，不管他已经加入了修道院多久。1588 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下令，印第安人可以加入修会和立下修道誓愿。但是，到了 1636 年，国王腓力四世开始痛惜有太多的“杂种人、私生子和其他劣等人”被授予了圣职。

我们必须在此背景下理解关于瓜达卢佩圣母（Virgin of Guadalupe）的传说和对她的信仰。据说，圣母带着她给祖玛拉嘉的信息向印第安人胡安·迭戈（Juan Diego）显现。祖玛拉嘉并不相信迭戈对他所说的话，但是一系列神迹迫使他不得不相信。结果，在圣母的直接命令下，一座小礼拜堂在圣母显现的地方建立起来。历史学家查阅了祖玛拉嘉及其同代人的文献，并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明这个传说属实的记载。此外，早期的一位基督教编年史家声称，传说中圣母显现的地方是一座非常小的山，印第安人在那里崇拜一位被称为托南津（Tonantzin）的“众神之母”，现在，印第安人只是在以一个新名字崇拜这位古老的女神。但是，不管在这个传说背后隐藏着什么真相，它本身就是在西班牙主教祖玛拉嘉面前为受压迫的印第安人迭戈辩护。最终，祖玛拉嘉不得不听从迭戈的话。从此以后，瓜达卢佩圣母不仅是一个信仰对象，它也成为墨西哥民族的精神象征和墨西哥人反抗一切外国侵略的凝聚力。

阿兹特克帝国并不包括今天的整个墨西哥。但是，它的灭亡令周围的许多国家臣服于西班牙。在南方，还生活着古代玛雅文明的后裔。西班牙人用了多年时间才征服他们，这主要是因为南方崎岖的地形和茂密的植被。直到 1560 年，西班牙殖民者才完全征服了尤卡坦（Yucatan）半岛，并为这一地区任命了主教。

457

在最初的征服之后，西班牙殖民者继续向北探寻两个幻想中的目标。第一个是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海道，这令他们开始探索加利福尼亚湾，因为人们长久以来相信，巴亚加利福尼亚（Baja California）是一座岛屿，加利福尼亚湾可能与大西洋相连。第二个是一些印第安人曾告诉西班牙殖民者的“七座金城”，这将他们吸引到几乎位于正北方的新墨西哥。后来，法国殖民者从路易斯安那进军，俄国殖民者沿着太平洋海岸南下，他们的威胁迫使西班牙殖民者定居在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

在巴亚加利福尼亚，宣教士比殖民者和探险家更为成功。第一批在这里定居的宣教士是耶稣会会士，他们先后在加利福尼亚湾的东海岸和加利福尼亚半岛殖民。在这批耶稣会宣教士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尤西比奥·弗朗西斯科·基诺（Eusebio Francisco Kino），他所创建的许多宣教区远远超过了西班牙的势力范围，直到今天的亚利桑那（Arizona）。他于 1711 年去世时，正计划向阿帕契人（Apaches）宣教。但是，耶稣会会士于 1767 年被逐出西班牙的所有领地。他们的一些宣教区被移交给方济各修会、多明我修会和其他一些机构，而其他许多宣教区只能被放弃。

在加利福尼亚，方济各修会的传教士将精力集中在阿尔塔加利福尼亚（Alta California）——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在 18 世纪，当西班牙当局组织了一支对阿尔塔加利福尼亚进行考察与殖民的探险队时，方济各修会的胡宁佩罗·塞拉（Junípero Serra）加入了这支探险队。他后来建立了许多宣教区，其中许多超过了西班牙的保护范围。在印第安人必须接受西班牙殖民者统治的地区，塞拉热衷于维护印第安人在殖民者面前的权利。但是，这并没有消除他的偏见、家长式作风，甚至偶尔的残酷。这些都是他大多数同胞的劣性。结果，当今天的许多人颂赞塞拉的工作时，一些人只是将他看作为种族屠杀进行宗教辩护的又一个例子。

然而，方济各修会修士的主要目的地是正北方，因为西班牙征服者想在这里寻找传说中的七座金城。他们穿过墨西哥中部进入新墨西哥，他们有时是与西班牙征服者一起，有时是在他们之后，但大多数时候是在他

们之前。1610年,西班牙殖民者在新墨西哥建立了“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神圣信仰的皇家城市”(The Royal City of the Holy Faith of Saint Francis of Assisi),现在被简称为圣菲(Santa Fe)。二十年之后,五十位宣教士牧养着新墨西哥六万已经接受洗礼的印第安人。1680年,印第安人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在起义中杀死了大约四百名西班牙殖民者,其中有三十二位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当西班牙殖民者再次征服新墨西哥时,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又与他们一同回到了这里。

458

西班牙殖民者也从墨西哥跨过太平洋向西方扩张。1521年,麦哲伦(Magellan)抵达菲律宾群岛,命丧于当地人之手。后来,许多探险队从墨西哥派出。最终,在米格尔·洛佩兹·德·黎牙实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的率领之下,西班牙殖民者于1565年征服了菲律宾群岛。殖民者在菲律宾群岛发现了许多穆斯林,他们将其称为摩洛人(*moros*),这个名字源自统治西班牙数百年之久的摩尔人。摩洛人和一些岛屿上的中国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征服了整个群岛。他们在菲律宾群岛所采取的政策仍是他们在新大陆所采取的政策,这在群岛上激起了当地人的极大怨恨。西班牙殖民者原本希望菲律宾群岛会成为向远东宣教的跳板;但他们却不愿意教育菲律宾人,因此这个计划失败了。

黄金卡斯蒂利亚

西班牙当局很早就注意到位于今天中美洲和巴拿马的这片地区。哥伦布曾沿着这里的海岸航行,希望找到一条通往西方的道路。到了1509年,西班牙当局第一次尝试征服这里,并在这里建立殖民地。最初的尝试失败了,直到一位名叫瓦斯克·努涅斯德·德·巴尔博亚(Vasco Núñez de Balboa)的探险家废掉指派的领袖,并肩负起征服与建立殖民地的使命。巴尔博亚与其他大多数西班牙征服者不同,他知道如何与印第安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尽管他也能使用暴力。他友善对待印第安人的主要原

459

因似乎在于他相信，这是从印第安人那里获得黄金和女人的最好方法。多亏了印第安人的帮助，他才能将黄金运往西班牙，因为他希望西班牙当局会因此使他的统治合法化。他也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来到了太平洋，他将太平洋称为“南海”，因为在巴拿马地区，太平洋位于加勒比海以南。

巴尔博亚向西班牙运送黄金的举动取得了与预期相反的结果。西班牙当局发现，这片地区太宝贵了，不能将这里交给巴尔博亚；西班牙当局将这块殖民地命名为黄金卡斯蒂利亚（Golden Castile），并为这里任命了新总督。巴尔博亚与新总督爆发了冲突，新总督最终将他处死。新总督的政策是强迫印第安人生产黄金。许多印第安人被分配给殖民者托管，而其他印第安人惨遭杀害，因为他们不愿意或不能生产出西班牙殖民者所要求的黄金数量。最终，大多数印第安人逃跑，组成抗击西班牙征服者的游击队。由于没有庄稼，食物稀少，五百多名西班牙殖民者丧生，其中许多人是被饿死的。被任命监管殖民地的教会和方济各修会宣教士的主教回到西班牙，抗议殖民者对殖民地管理不善。数十年之后，黄金卡斯蒂利亚才渐渐恢复了秩序。

在中美洲教会的早期历史中，神父胡安·德·埃斯特拉达·拉瓦哥（Juan de Estrada Rávago）可能是最有趣的人物。他是变节的方济各修会的修士、野心勃勃的西班牙征服者、失败的朝臣和乐善好施的宣教士。西班牙国王下令，所有变节的托钵修士必须离开殖民地，当他准备返回西班牙时，他听说一支计划前往哥斯达黎加的探险队缺少资金。他提供了这笔资金，并加入探险队，最终成为这支探险队的领袖。他学会了印第安语，并克制自己不要对印第安人动用武力——只有一次例外。他四处游走，教授基督教信仰。他为新信徒施行洗礼，并建立教会。他用自己的钱为印第安人和殖民者购买衣服、食物和种子。来自墨西哥的十二名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加入进来，教会得以迅猛发展。

到了16世纪末，中美洲的大多数印第安人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中美洲仍有西班牙殖民者不曾探险的广阔地区，这里的印第安人保留着他

们的古老宗教和统治。所谓的基督化地区缺少神父，西班牙征服者所激起的憎恨极大地阻碍了神父的工作。黄金卡斯蒂利亚从未产出过大量的贵重金属，因此，西班牙当局很少关注这里。

460 ## 佛罗里达

西班牙殖民者很早就知道了古巴以北的地区。1513 年，波多黎各总督胡安·庞斯·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得到西班牙国王授权，开始对比米尼岛（Bimini）进行探险和殖民。传说，比米尼岛有一个"不老泉"，它的泉水可以令人重获青春，至少有神奇的疗效。莱昂的探险队在佛罗里达登陆，佛罗里达之所以被命名为佛罗里达，是因为西班牙殖民者在复活节时以国王帕斯夸·佛罗里达（Pascua Florida）的名义占领了这里。莱昂的探险队沿着大西洋与墨西哥湾沿岸进行探险，他们与印第安人爆发了一些冲突，后来回到了波多黎各。若干年后，庞斯·德·莱昂组建了第二支探险队。但他被印第安人打伤，随后撤回古巴，并死在了那里。

其他探险队也好不到哪里。一支探险队于 1528 年被印第安人消灭。八年之后，四名幸存者徒步走过半个美洲，到了墨西哥。1539 年和 1540 年，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对佛罗里达进行了两次探险，但并没有尝试在那里殖民。另一次殖民事业在二十年之后进行，但是经过两年的艰辛，这次殖民探险的成效仍是微乎其微，殖民事业最后也无果而终。

法国殖民者在佛罗里达的出现，最终迫使西班牙殖民者投入了占领佛罗里达所必需的资源。1562 年，法国殖民者在让·里博（Jean Ribaut）的领导之下开始在佛罗里达和南卡罗来纳殖民。在西班牙殖民者看来，更糟的是大多数法国殖民者是新教徒。为了反击法国殖民者入侵教宗赠予西班牙的所谓领地，西班牙政府委派彼得罗·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Pedro Menéndez de Avilés）铲除法国殖民者的定居点。他率领强大的骑兵中队袭击了法国殖民者。许多法国殖民者逃到了内陆，最终被印第

安人杀害。西班牙殖民者俘获了其他法国殖民者，并处死了一百三十二个法国男人，女性和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幸免于难。当时并不在场的里博遭遇海难，他向西班牙殖民者投降，和其他七十多名海难幸存者被处死。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随后建立了圣奥古斯丁城，该城成为他的大本营。

有人为里博和他的同伴报仇。里博的一个法国好友秘密组建了一支远征军，他们就在先前发生大屠杀的地方登陆，俘获了许多西班牙殖民者，并将他们全部吊死。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曾宣称，他将里博和他的同伴“作为路德宗基督徒，而不是法国殖民者”处死。现在，法国殖民者所留下的标牌称，他们的受害者“并不是西班牙殖民者，而是卖国贼、小偷和谋杀犯”。随后，他们在西班牙援军从圣奥古斯丁城赶来之前起航返回法国。

461

现在，英国殖民者对新大陆越来越感兴趣，这威胁到了西班牙殖民者，因此，西班牙殖民者从佛罗里达迁到了瓜莱（Guale），即佐治亚、圣埃伦娜（Santa Elena），亦即南北卡罗来纳；和阿哈坎（Ajacán），即弗吉尼亚。

在这些地区，大多数西班牙殖民者是军人或宣教士。这些宣教士主要是耶稣会会士，还有一些是方济各修会和多明我修会的修士，他们必须顶着巨大的困难宣教。西班牙殖民者已经激起印第安人的敌意，因此，只要没有西班牙军队的保护，许多宣教士就会惨遭杀害。西班牙殖民者在佛罗里达北部的殖民和宣教是短暂的。1763 年，西班牙殖民者用佛罗里达换来了英国殖民者已经占领的哈瓦那（Havana）。二十年之后，西班牙殖民者又得到了佛罗里达。1819 年，佛罗里达最终被正式割让给已经入侵那里的美国。

在这片广阔土地之上的古老西班牙宣教区中，只留下了人们的记忆、几处零散的废墟和宣教士的尸骨，而在这些宣教士的同胞看来，他们将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业。

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

哥伦布在第二次航海中来到了南美洲海岸。对今天哥伦比亚海岸的征服始于1508年,但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新一次的征服于1525年开始,这一次,罗德里格·德·巴斯蒂达斯(Rodrigo de Bastidas)建立了圣玛尔塔(Santa Marta)。巴斯蒂达斯认为应当仁慈地对待印第安人,因此,其他殖民者迫使他回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随后,印第安人进入了一段恐怖时期,殖民者试图强迫他们说出埃尔多拉多(El Dorado)的神秘地点——这又是西班牙征服者所相信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之一。据说,埃尔多拉多是蕴藏着大量黄金珠宝的宝山。西班牙殖民者以圣玛尔塔为大本营向西和向南挺进,他们在西方建立了喀他赫纳(Cartagena),在南方击败了酋长波哥大(Bogotá),并建立了圣·菲·德·波哥大城(Santa Fe de Bogotá)。

在建立第一批城市不久之后,随着一系列主教区的建立和宗教裁判所的引入,西班牙教会的"移民"也宣告完成。起初,宗教裁判所几乎被专门用来对付西班牙殖民者,但是,受压迫的印第安人和黑奴——他们很早就被引入——很快便发现,如果主人想惩罚他们,他们只需喊出"我不信上帝"就可以受到宗教裁判所相对仁慈的审判。最终,西班牙殖民者与宗教裁判所达成了默契:宗教裁判所只审判印第安人和黑奴所犯下的极端案件。英国殖民者当时也来到了加勒比海,因此,宗教裁判所也被用来对付他们,许多英国殖民者因他们的新教信仰而惨遭杀害。

哥伦比亚两位伟大的基督徒是路易斯·贝尔特兰(Luis Beltrán)和彼得罗·克雷沃(Pedro Claver)。路易斯·贝尔特兰是数百位宣教士之一,他们希望将基督教传给印第安人,并终止西班牙征服者与殖民者的罪行。贝尔特兰是多明我修会的宣教士,生于瓦伦西亚,早年是在他家乡的多明我修院中度过的,他当时是修道院的见习修士教师。从新大陆传来的数百万基督徒需要牧养的消息打动了他,他决定必须弄清楚上帝是否真呼

462

召他成为宣教士。1562年，他在三十六岁时到达喀他赫纳。他经常与新大陆的托管人爆发冲突，并像旧约中的先知那样宣讲公义。但是，他还是不能确定自己的呼召，最终回到了西班牙，他的敬虔和圣洁为他在西班牙赢得了许多仰慕者。路易斯·贝尔特兰于1581年去世。1671年，教宗克莱门十世正式追封他为罗马天主教的圣徒——他是第一位与新大陆有关的基督教圣徒。

彼得罗·克雷沃是另一位伟大的哥伦比亚圣徒，他是西班牙人，他的生活与路易斯·贝尔特兰极为不同。克雷沃生于1580年，就在路易斯·贝尔特兰去世之前不久；他在很小时就决定加入耶稣会，到新大陆宣教。他的修道院院长认为他缺乏智慧，当他于1610年抵达喀他赫纳时，他还是见习修士。克雷沃多次亲眼目睹黑奴所遭受的苦难，因此，1622年当他最终被允许立下终身修道誓愿时，他在签名旁又写下了另一个誓愿：彼得罗·克雷沃，黑人永远的仆人(*Petrus Claver, aethiopum semper servus*)。

黑奴有很多语言，克雷沃难以学会，因此，他试图借一些黑奴充当他的翻译。但是，奴隶主并不愿意失去这些黑奴翻译的劳动力，克雷沃说服了他的修道院，修道院买下许多黑奴充当翻译。这令他与耶稣会同伴产生了矛盾，因为一些同伴坚持认为，奴隶就是奴隶。但是克雷沃坚信，奴隶也是在基督里的兄弟，必须平等对待他们。最终，在他的坚持下，其他耶稣会会士同意了他的做法，至少是在理论上同意了。

运送黑奴的船只一抵达港口，克雷沃和他的翻译就急忙迎上前去。他们有时被允许进入船舱，但大多数时候必须等到黑奴被转运到为他们临时搭建的棚屋，在黑奴被卖掉之前，那里就是他们暂时的家。棚屋并不像船只那样拥挤，黑奴现在被喂得相对饱一些，以便准备将他们拍卖出去。还有许多黑奴死于航行途中的各种疾病，一些黑奴拒绝进食，因为他们担心被喂肥之后会被吃掉。无论是生病的黑奴还是健康的黑奴，他们都赤身裸体，与死去的黑奴一同挤在碎砖地上，直到克雷沃和他的同伴进来将死尸运走。随后，他们会带着新鲜的水果和干净的衣服回来，并挑出

身体最弱的黑奴。如果这些黑奴看起来病得很重，克雷沃会将他们送往他在附近建起的小医院。随后，他还会回来，试着向那些足够健康、可以听他讲道的黑奴传讲福音。

463

克雷沃的宣教方法生动活泼。他为黑奴提供他们在船上所缺乏的水，然后再向他们解释洗礼之水能够满足他们灵魂的饥渴。他将说相同语言的黑奴聚在一起，让他们围坐成一圈，他与黑奴同坐，将唯一一把椅子留给翻译，翻译坐在这一圈人中间，向这群迷惑不解的黑奴解释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克雷沃有时会告诉黑奴，人必须在接受洗礼时改变他的生命，就像蛇在生长过程中蜕去它的皮。他随后会扭作一团，好像是在蜕皮的样子；他向黑奴解释旧生命的特征，并告诉他们必须舍弃旧的生命。有时，黑奴也会扭作一团，以示赞同。当克雷沃解释三位一体时，他会将手帕叠在一起，让手帕只露出三个角，然后向黑奴说明，手帕实际上是一块布。这一切都是在真诚、友好甚至幽默的氛围中进行的。

克雷沃最初在奴隶船只到达时对黑奴所表现出的关心，也明确表现在其他方面。麻风病是黑奴普遍患上的疾病，奴隶主会轻易将患有麻风病的黑奴赶走。克雷沃建立了一所麻风病院，当港口没有奴隶船只或临时棚屋中没有准备出售的黑奴时，他就主要留在麻风病院中。人们经常在医院中看到他的身影，他拥抱并安慰那些可怜的麻风病人，而他们正在溃烂的身体会让其他人退避三舍。此外，在他服侍的那些年，喀他赫纳爆发了三次天花，每当天花爆发时，他都会为受感染并被奴隶主赶出等死的黑奴清洗伤口。

464

虽然克雷沃的修道院院长总是认为他做事鲁莽，缺少智慧，但是，他完全知道应当如何开展工作，才不会让喀他赫纳的白人毁掉他的服侍。他从不攻击或批评白人，但是，喀他赫纳的人都知道，他在路上只向黑人和少数支持他工作的白人问好。他很快就让人们知道，他聆听人们忏悔的顺序正好与当时的社会等级相反：先是奴隶，后是穷人，最后是孩子，而其他人最好还是去找其他神父忏悔。

克雷沃得到了喀他赫纳黑奴的大力支持。在教会的重大节日里，有些黑奴帮他预备为城里的麻风病人、奴隶和乞丐所准备的盛宴，有些黑奴帮忙为死去的奴隶举行体面的葬礼，还有些黑奴探访病人，为饥饿的和新来的奴隶采摘水果、搜集衣物、缝补衣服，通过其他许多方法去服侍他们的奴隶兄弟。

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喀他赫纳的白人社会很少关注这位与黑奴打成一片的古怪的耶稣会会士。同克雷沃交往密切的人希望说服他放弃他的工作，因为他们担心，给奴隶尊严是一件危险的事。他的修道院院长不断向西班牙呈交报告，称克雷沃神父既不谨慎，也不聪明。

克雷沃在晚年瘫痪不起，几乎难以离开他的小房间。他在最后一次外出时去到了码头，痛哭流涕，因为他无法减轻自己正在承受的巨大痛苦。他的耶稣会同伴将他交给一个黑奴照顾，他不得不遭受巨大的肉体痛苦，因为照顾他的黑奴对他非常残忍，任凭他躺在自己的粪便之中。那个黑奴还用其他许多方法折磨他，让他遭受到黑奴在横渡大西洋时所遭受的种种折磨。克雷沃的同胞让黑人饱受折磨，他不得不亲身忍受因同胞的罪行所导致的恶果。

喀他赫纳人直到最后一刻才意识到，一位伟大的圣徒即将逝去。社会精英来到克雷沃的小房间拜访他，他们都希望拿走他的一件遗物。这位贫穷的耶稣会会士甚至连他的十字架也没能留下，因为当一位侯爵说想要他的十字架时，修道院院长命令他交出十字架。他于1654年去世，在他生前嘲笑过他的许多人为之悲痛不已。两百多年之后，他被正式追封为罗马天主教的圣徒。

世界的尽头：印加帝国

465

印加人（Incas）统治着南美洲的西部。虽然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将这里的核心地带称为秘鲁（Perú），但印加人将他们的帝国称为世界的尽头（four corners of the world），它的意思是印加人的权力遍布全地，不受他们

统治的地区实际上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难以确定印加帝国的边境,它包括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以及秘鲁的部分地区或整个秘鲁,总面积在三十五万到四十四万平方英里之间。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凭借着勇气、运气和背信弃义征服了辽阔的印加帝国。当他率领一支有一百六十八人的军队去征服印加帝国时,帝国正因内战而分裂。前一任萨帕印加(Sapa Inca)——印加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死于天花,他的两个儿子正在争夺帝国的皇位继承权。(有趣的是,同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的速度相比,欧洲殖民者所带到美洲的天花传播得更快。)

1532年,皮萨罗俘虏了印加阿塔瓦尔帕(Inca Atahualpa),阿塔瓦尔帕是当时占上风的僭君。这个事件被称为"卡哈马卡事件"(Incident of Cajamarca),它可以很好地说明在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印加帝国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皮萨罗正在卡哈马卡等待阿塔瓦尔帕和他的朝臣,他们主要是出于好奇才来见西班牙人。当皮萨罗得知阿塔瓦尔帕正赶来时,他命令自己的人藏在城市的大广场边。阿塔瓦尔帕带着数千侍从来到了卡哈马卡,根本没有料到会遭遇暴行,自信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他曾夸口说,在整个印加帝国,如果没有他的许可,连只鸟也不能飞走。皮萨罗骑马冲向阿塔瓦尔帕,希望可以吓住他;但是,阿塔瓦尔帕并没有退缩。随后,皮萨罗命令随行的一位神父——他也是这次殖民事业的主要投资者之一——诵读《请求》(*Requerimiento*)。《请求》是一份奇怪的文献,它向我们表明,西班牙征服者认为必须为他们的殖民事业辩护,他们为此进行了多么荒谬的努力。战争、侵占和奴役都需要正当的理由,因此,从1514年开始就有这样的命令:在对印第安人开战之前,必须邀请他们接受西班牙的统治和基督教,因为教宗——上帝在世界上的代表——已经将这片土地赠与西班牙人,诵读《请求》便是发出这一邀请。但《请求》通常是用西班牙语诵读的,在诵读时也没有人进行翻译。现在,《请求》被读给阿塔瓦尔帕听,但是阿塔瓦尔帕对此不屑一顾,这时,皮萨罗向他的

人发出了开火的信号，并下令活捉阿塔瓦尔帕。在随后的慌乱中，数千名印加人被打死，阿塔瓦尔帕被俘。后来，皮萨罗向阿塔瓦尔帕开出了他的条件，要求阿塔瓦尔帕用满满一屋子黄金赎回他的自由。在筹集赎金期间，阿塔瓦尔帕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发生在他周围的这些事件的重要性，他的拥护者俘虏了与他竞争皇位的敌人——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并下令处死了他的兄弟。在得到赎金之后，皮萨罗又以弑兄罪绞死了阿塔瓦尔帕。 466

阿塔瓦尔帕的死并没有结束印加帝国的动乱和内战。当印第安人继续士气高昂地英勇抵抗时，西班牙殖民者却起了内讧。当西班牙国王查理派来总督时，他们拒绝服从国王的总督；为了平息叛乱，查理必须向他的殖民地增兵。印第安人的抵抗一直持续到1780年年末。当时，自称印加最后一位后裔的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领导了一次起义，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包括一些贫苦的白人，因为他们自认为受到了西班牙贵族的剥削。

在这些事件和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整个殖民事业中，教会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教会支持征服和剥削。另一方面，一些教会人士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皮萨罗背信弃义，导致阿塔瓦尔帕被掳。在这一背信弃义事件中诵读《请求》的神父因此得到奖赏，被任命为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Cuzco）的主教。秘鲁的巨大财富似乎腐蚀了许多托钵修士，其他地区的托钵修士因在印第安人中举行祭祀而远近闻名。他们不守规矩和贪婪的传言促使西班牙派来一位特使调查此事，但他在到达秘鲁之前就神秘死去。当教会当局决定为白人和印第安人分别建立教会时，基本上无人抗议。在印第安人中，一些酋长处死了接受洗礼的人，因为洗礼现已成为屈服于侵略者的象征。在许多年之后，已经接受洗礼的印第安人才基本上能理解基督教信仰。即使是这样，由印第安人托管人供养的神父也必须确保教给印第安人的信仰必须有利于托管人统治印第安人。 467

1581年，托里比奥·阿方索·德·莫格罗韦霍（Toribio Alfonso de Mogrovejo）被任命为利马大主教。利马教区是一个大主教区，包括今天的

尼加拉瓜、巴拿马、哥伦比亚的部分地区、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巴拉圭、智利的部分地区和阿根廷的部分地区。为了应对新教改革，特伦托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我们将在本书第二卷中讨论——制定了许多改革措施，莫格罗韦霍相信，这些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在新大陆推行特伦托大公会议所倡导的改革并不容易。为了改革教会，新任大主教莫格罗韦霍召开了一次省级宗教会议，其中一个议程是库斯科主教的腐败案，而这已经有了充足的证据。但是，当此次会议召开时，库斯科主教的朋友图库曼(Tucumán)主教从莫格罗韦霍手中抢去这些证据，扔进烤炉中烧掉了。即使是面对着这样的环境，莫格罗韦霍还是进行了一些改革。他还编写了一本教义问答，被译成许多种印第安语，二百年来它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广大地区中一直是教导基督徒的主要材料。莫格罗韦霍经常与世俗当局爆发冲突，尤其是因为改善印第安人的待遇这一问题。但是，他从未批评过西班牙制度中所固有的不公。直到1726年莫格罗韦霍去世一百二十年之后，他被正式追封为罗马天主教的圣徒。

秘鲁的教会还出现过三位圣徒。利马的圣罗莎(Saint Rosa of Lima，1586—1617)走上了禁欲神秘主义的道路，她曾有过与上帝相交的出神经验。圣马丁·德·波雷斯(Saint Martín de Porres，1579—1639)进入了一所多明我修道院，但他始终没有被允许成为多明我修会的正式修士，因为他是黑白混血儿。他多年在乡下照顾生病的人和动物，种植果树，希望他的果树有朝一日会喂饱挨饿的人。秘鲁教会的第三位圣徒是祥和谦卑的圣弗朗西斯科·索拉诺(Saint Francisco Solano，1549—1610)。1604年他突然得到一个异象，因此他走街串巷，宣讲利马已经成为新尼尼微，如果利马人还不悔改，上帝将在地震中毁掉利马。这位新约拿的信息受到了重视，利马人涌进教会认罪悔改。

468

然而，在早期的秘鲁教会中，最著名的基督徒可能是多明我修会的吉尔·冈萨雷斯·德·圣·尼古拉斯(Gil González de San Nicolás)。他在智利的印第安人中宣教多年，他最终认为，正在对印第安人进行的战争是

不义的，以占有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为唯一目的而发动战争是不赦之罪，因此，参加这种战争的人应当被禁止补赎。他的讲道在多明我修会和方济各修会的修士中产生了共鸣，他们拒绝为所有参加不义战争或从中获利的基督徒赦罪，也禁止他们领受圣餐。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试图找到一个让尼古拉斯闭嘴的借口。最终，他们指控他是异端，因为他曾宣称，未来的西班牙人会因西班牙殖民者现在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这无异于是在肯定，实际的罪——不仅是原罪——也会被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这样，尼古拉斯的口被堵住了，曾经支持他的人被迫放弃了对他的支持。

拉普拉塔

今天的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是西班牙殖民者最后征服的地区。在几次失败的殖民之后，他们于 1537 年在今天巴拉圭的亚松森(Asunción)建立了一个贸易站。这里的西班牙殖民者孤立无援，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存依赖于印第安人，因此十分友好地对待印第安人。许多印第安人聚集在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所建立的小镇，他们在这里教授印第安人欧洲人的农业技术和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其中一位宣教士还将圣托里比奥(即托里比奥·阿方索·德·莫格罗韦霍)的教义问答译成了当地印第安人的语言瓜拉尼语(Guarani)。

然而，耶稣会会士最成功地应用了这种宣教方法。在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其他许多地区，宣教士建立起印第安人生活在他们指导之下的宣教站，最著名的是他们在墨西哥北部建立的宣教站。但普遍的实际情况是，附近的西班牙殖民者通常会妨碍宣教士的工作，有时甚至会毁掉宣教士的工作。因此，耶稣会会士与方济各修会的修士不同，他们并没有在亚松森附近建立印第安人宣教站，而是决定冒险进入欧洲殖民者罕至的地区。罗克·冈萨雷斯(Roque González)促进了这些传教站的建立。他是在亚松森长大的耶稣会会士，因此可以说一口流利的瓜拉尼语。他懂得印第安人的语言与习俗，这可以极大地消除印第安人的敌意，从而能够建立印

第安人自愿居住的宣教站，而不是西班牙殖民者强迫他们居住的宣教站。

469

实际上，这些印第安人宣教站是小的神权国家。虽然印第安人自己选出自己的领袖，但是，宣教士是他们的最高权威，宣教士的话不仅是宗教与道德事务的最高权威，也是一切实际事务的最高权威。因此，耶稣会的这些宣教站在为保护印第安人、引进农作物新品种和发展畜牧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家长式统治也成为它们的标志，这令西班牙殖民者在拉普拉塔的整个殖民事业都依赖于宣教士的存在与指导。

这些印第安人宣教站的基本布局几乎完全相同。在宣教站的中央，是一个大的露天广场，集会、节日庆典和游行都在这里举行。露天广场对面是教堂，教堂建有宣教士的公寓。在宣教站中，还有一排排居民住宅和专供寡妇鳏夫与孤儿居住的独立房屋。一间巨大的仓库存储着食物、种子和其他公共财产。其余房屋是各种不同的工厂。

虽然允许拥有小型的私人花园，但是大部分财产是公有的，包括绝大多数土地、牲口、工具和种子等等。所有人必须在公共田地里劳动一定的时间，但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照料自家花园，或练习与应用其他技能。在一些印第安人宣教站中，一些技艺高超的工匠可以制造质量很好的管风琴。

然而，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也有困难。在印第安人宣教站附近的每一座城镇，都有拒绝加入宣教站的印第安人，他们不断鼓动宣教站里的印第安人离开或起义。印第安人宣教站的创建者罗克·冈萨雷斯就是在这样一次起义中惨遭杀害。他于1934年被追封为圣徒。但是，这些宣教站的最大敌人是白人：西班牙殖民者和葡萄牙殖民者。葡萄牙殖民者在巴西殖民，他们担心耶稣会宣教站会成为西班牙殖民者向葡萄牙殖民地渗透的先锋。但是，引起葡萄牙殖民者憎恨耶稣会宣教站的主要原因是耶稣会会士阻止他们奴役印第安人。西班牙殖民者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反对耶稣会宣教站。他们认为，如果不是耶稣会会士，所有印第安人都会在托管制度下成为他们有效的劳动力。



耶稣会宣教站是名符其实的城镇，巴拉圭的耶稣会宣教站废墟即可证明。

1628 年，一些来自圣保罗（São Paulo）的葡萄牙殖民者开始袭击耶稣会宣教站。他们将宣教站夷为平地，掠走印第安人，卖为奴隶。有时，耶稣会会士会与他们所牧养的印第安人一同踏上不幸的艰难跋涉之旅，直到奴隶贩子强迫他们离开。后来，耶稣会会士将他们的宣教站迁到了距巴西更远的地方。但是，奴隶贩子很快就尾随而至，结果他们只能迁到更远的内陆。

考虑到这种情况，耶稣会会士决定将印第安人武装起来。印第安人的店铺被改成了兵工厂，一支常备军在一名耶稣会会士的领导下建立起来。教宗乌尔班八世将所有胆敢进入耶稣会宣教站抓捕印第安人的基督徒都革除了教籍，国王腓力四世宣布，印第安人是自由的，他们并不是奴隶。但是，葡萄牙殖民者还是来了，他们通常会得到希望毁掉所有耶稣会宣教站的西班牙殖民者的帮助。1641 年，印第安人和耶稣会会士在一次激战中击败了入侵者。耶稣会会士不断受到非法武装印第安人的指控，但是，这样的指控在罗马和马德里都得不到任何支持，罗马和马德里都认为，耶稣会会士有权武装自己和他们所牧养的印第安人，因为他们是在自卫。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会宣教站欣欣向荣，到了 1731 年，已经有超过十四万印第安人住在耶稣会宣教站。



然而，反对之声始终没有平息。有传言称，耶稣会藏匿了合法属于国王的大量黄金。不断的调查证实，这样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后来又有传言称，耶稣会决心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甚至已经选出了国王——“巴拉圭的尼古拉斯一世国王”（King Nicholas I of Paraguay）。当时，在欧洲流传着对耶稣会不利的类似指控，当时统治西班牙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波旁家族（House of Bourbon）采取了反耶稣会的政策——原因之一是耶稣会始终支持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psburg）——因此，西班牙国王于 1767 年下令，所有耶稣会会士必须离开西班牙的全部殖民地。西班牙总督一接到这些命令，就开始担心印第安人会爆发起义。但是，耶稣会会士鼓励印第安人接受新局势，他们和平地离开了。

原计划是，方济各修会和多明我修会的修士接替耶稣会会士。但是在西班牙殖民帝国上下都有耶稣会会士所留下的空缺，多明我修会和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人手不足，难以补足这些空缺。由于缺少领袖，许多宣教站消失了。世俗当局开始剥削印第安人，而且，新来的宣教士几乎没有保护印第安人，因此，印第安人渐渐失去了对宣教士的信任。葡萄牙殖民者很快便再次入侵拉普拉塔，抓捕印第安人。一些西班牙殖民者也这样去做。到了 1813 年，宣教站的数量降至以前的三分之一，而且数量还在继续下降。在基督教常常压迫与剥削印第安人的年代，巴拉圭宣教站这个不和谐的见证，没能抵挡住贪婪的诱惑。

471

第三十七章

葡萄牙的殖民事业

如果印第安人有属灵的生命，承认他们的造物主，如果他们承认他们是陛下的封臣，有顺服基督徒的义务……殖民者就会拥有在正义的战争中被俘获的合法奴隶，也会得到宣教区中印第安人的服侍与效忠。

——曼努埃尔·达·诺比雷加

非洲

早在卡斯蒂利亚之前，葡萄牙已于13世纪从摩尔人手中夺回了领地。葡萄牙被卡斯蒂利亚所环绕，因此，葡萄牙殖民者扩张的唯一路线是海路。在15世纪上半叶，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鼓励探险家去非洲西海岸进行探险。在航海家亨利的赞助之下，葡萄牙航海者在十四次失败的尝试之后，冒着恶劣的天气航行过博亚尔多海角(Cape Bojador)，抵达了塞拉利昂(Sierra Leone)。这次探险有几个目标，其中之一是绕过非洲或穿越非洲大陆去到盛产丝绸与香料的东方，因为这样可以避开当时正控制着欧洲与远东之间陆上最短路线的穆斯林。此外，在当时的欧洲宫廷中还流传着关于埃塞俄比亚的模糊传言，基督徒希望找到这个基督教国家，与它建立联盟，从而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圣战，同时从两个方向进攻穆斯林。最终，奴隶贸易迅速成为探险与殖民非洲的一个重要因素。

1487年，葡萄牙探险家最终绕过了好望角。十年之后，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沿非洲东海岸航行，穿过印度洋回到了欧洲，这一事实证明，避开穆斯林，直接与印度进行贸易是可能的。

与此同时，葡萄牙殖民者正忙于在非洲海岸建立同盟和殖民地。1483年，一支葡萄牙探险队在刚果河口登陆，葡萄牙殖民者得知，一位名叫恩济加·恩库乌（Nzinga a Nkuwu）的统治者是这里的曼尼刚果（*Mani Kongo*）——国王，他统治着刚果和非洲内陆的广阔土地。葡萄牙殖民者希望沿刚果河而上，来到埃塞俄比亚，因此，他们对曼尼刚果的臣民恭敬有加。四名葡萄牙殖民者留了下来，四名非洲人被带到里斯本宫廷作客。当这四名非洲人回来，讲述了欧洲文明所创造的奇迹和他们在里斯本受到的款待时，国王恩济加·恩库乌决定与葡萄牙结盟，葡萄牙向刚果派来了宣教士和工匠。在听了一个月的基督教讲道之后，恩济加·恩库乌接受了洗礼，并取了教名若昂（João）——这是以葡萄牙国王命名的。（他的儿子也接受了洗礼，成为阿方索一世姆文巴·恩济加［Afonso I Mvemba a Nzinga］。）在后来与周围部落的战争中，国王若昂一世恩济加·恩库乌（João I Nzinga a Nkuwu）得到了葡萄牙殖民者的军事支持，这令他相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474

下一任曼尼刚果是阿方索一世，他对葡萄牙殖民者和他们的宣教士更加有利。1520年，教宗利奥十世在漫长的谈判之后任命阿方索一世的兄弟亨里克（Henrique）为刚果的主教。但是，这位新主教回到刚果之后发现，欧洲的许多教士并不听从他的命令。他于1530年去世，两年之后，附近圣多美岛（São Tomé）的葡萄牙主教接管了刚果的教会。这个以友好关系为起点而建立起来的宣教区里的冲突越来越多。在阿方索一世去世之后，刚果爆发了内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许多刚果人憎恨葡萄牙殖民者和他们的势力。葡萄牙殖民者对刚果的内战进行了军事干预，1572年，曼尼刚果阿尔瓦罗（Alvaro）宣布他是葡萄牙的封臣。于是，从前的友好关系现在变成了憎恨和猜疑。

475

被称为“恩戈玛”(Ngola)的统治者控制着刚果南部。这片土地(现在的安哥拉)最初就被视为奴隶的来源地。在刚果,曼尼刚果控制着奴隶贸易。在安哥拉,葡萄牙的奴隶贩子通过暴力获得了更多利益。最终,安哥拉海岸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虽然葡萄牙殖民者自称是非洲内陆广阔土地的主人,但是他们很少去到那里,非洲内陆通常被视为奴隶的一大来源地,这里的奴隶是由非洲的奴隶贩子带到非洲海岸的。虽然教会也在安哥拉得以建立,但是,安哥拉的教会主要是葡萄牙殖民者和非洲海岸少数非洲人的教会。在葡萄牙殖民者看来,其他一些地区似乎更加重要,因此,安哥拉的教会通常被交给葡萄牙一些最差的神职人员来牧养。

葡萄牙殖民者在非洲东海岸的殖民更加暴力。当瓦斯科·达·伽马抵达莫桑比克(Mozambique)的一个城镇,发现这里的许多居民是穆斯林时,他炮轰了这个城镇。他后来又炮轰了蒙巴萨(Mombasa)。他最终与马林迪(Malindi)结成了同盟,因为马林迪是莫桑比克和蒙巴萨的敌人。1505年,葡萄牙向印度派出一支二十三艘船的船队,该船队的任务是沿途在东非建立葡萄牙殖民地。五年之后,整个东非海岸都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1528年,蒙巴萨出现了起义的迹象,它再次遭到炮轰。

第一批葡萄牙神父于1506年抵达莫桑比克。他们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带领非洲人归信基督教,而是去充当葡萄牙驻军的随军牧师。当印度的果阿(Goa)教区于1534年建立时,整个非洲东海岸都隶属于这个教区。

在非洲东海岸的葡萄牙驻军基地,大多数葡萄牙神父都在葡萄牙炮火的庇护之下尽忠职守,但是,的确有许多耶稣会会士和多明我修会的修士来到非洲内陆宣教。其中最著名的是耶稣会的冈萨罗·德·西尔韦拉(Gonzalo de Silveira)。他来到津巴布韦,带领津巴布韦国王归信了基督教,并为他施行了洗礼。一些非洲商人担心,宣教士的成功会为葡萄牙商人开辟道路,他们说服自己的国王相信,耶稣会会士是间谍和行邪术者。当西尔韦拉得知国王已经下决心杀他时,他并没有逃跑,依然尽忠职守,

476 结果他在睡梦中被掐死。在随后的五十年中，许多宣教士同西尔韦拉一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牺牲赢得了许多非洲人的赞扬。尽管出现了这些殉道士，但绝大多数神职人员却很少关心非洲人，这只是真实地反映出葡萄牙本身的态度：它现在对远东更有兴趣，也就很少关注其非洲殖民地。

驶向正在升起的太阳

哥伦布首次发现新大陆之后，教宗将整个非基督教世界分配给西班牙和葡萄牙，葡萄牙不仅得到了葡萄牙探险家早已进入的非洲，也得到了整个东方，而葡萄牙探险非洲的目的之所在，一直就是东方。在达·伽马回来之后，葡萄牙殖民者清楚地意识到，葡萄牙并不能征服印度、日本和中国这片广阔的领土和住在那里的居民。不过，来自东方的丝绸和香料却可以在欧洲市场上卖高价，因此，葡萄牙所制定的政策是贸易，而不是征服。

为了确保在与东方的贸易中获利，葡萄牙殖民者必须控制贸易。这就是建立巨大军事基地网络的目的，这些军事基地不仅是葡萄牙商船的整修站，也能保护海上航道。非洲的东西海岸已经有了葡萄牙殖民者，现在他们又控制了红海，因为他们夺取了索科特拉岛（Socotra）及其附近地区。在印度，他们占领了果阿，并在那里修建了防御工事。他们在锡兰（Ceylon）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从而控制了往来于印度南端的船只。在 477 更远的东方，他们到达了马六甲，封锁了所有胆敢前往中国去冒险的欧洲殖民者的道路。在中国，澳门最终成为葡萄牙殖民者与这个庞大帝国进行所有贸易的通道。上述的许多地区都是葡萄牙殖民者通过武力占领的。在有些地区（如澳门），葡萄牙殖民者之所以被允许定居，是因为地方当局或国家当局希望与他们进行贸易。但即使是在葡萄牙殖民者最初利用武力占领的地区，他们的目的也不是征服，而是贸易，因此他们尽力避免一切可能导致冲突并因此妨碍贸易的宣教活动。

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João III)已经听说,刚成立的耶稣会热衷于宣教,他要求耶稣会派出六位宣教士前往他的东方殖民地。耶稣会的创建者罗耀拉(Loyola)只能派出两位宣教士,其中一位就是弗朗西斯·沙勿略(Francis Xavier)。他一接到命令就立即收拾行囊赶往里斯本。这两位耶稣会会士在里斯本深深感动了国王和他的朝臣,以至于他们坚持其中一位留在葡萄牙,于是弗朗西斯·沙勿略作为唯一的宣教士被派往了东方。

1542 年 5 月,沙勿略在一年多的航行之后抵达了葡萄牙殖民者在东方的中心基地果阿。他为葡萄牙殖民者的生活感到羞愧,但很快便发现,他对他们的斥责没有任何效果。他后来想出了一个独特的方法。他手持铃铛沿街游走,邀请孩子同他一起到教会礼拜,在教会里教授他们基本教义和道德训导。然后,他会让孩子回家与父母分享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他渐渐赢得了成年人的尊重,他们最终涌进教会听他讲道。后来便是大批群众认罪悔改,这让人们回想起萨伏那罗拉时代的佛罗伦萨。

然而,沙勿略并不是为了向葡萄牙殖民者宣教才去到印度。他在果阿的短暂逗留只是一个插曲,他正在为更大的使命做着准备:向没有听过基督之名的人宣教。因此,他在果阿逗留五个月之后便启程前往采珠海岸(Pearl Fishery Coast)——这个名字源于这里的采珠业。这里是葡萄牙商人经常到访的地方,这里的许多印度人之所以接受基督教,只是因为基督教是强大的葡萄牙殖民者所信奉的宗教。沙勿略带着两位懂得印度语的年轻神父,他们作为翻译与沙勿略一同讲道与教导了一段时间。附近一些村庄的村民也邀请他去讲道。但是,他不可能答应所有邀请,于是训练了一些在他的带领之下归信基督教的信徒,由他们四处讲道,为新信徒施行洗礼。

在沙勿略手下归信基督教的信徒,以及宣教士在印度其他地区所赢得的信徒,都来自社会底层。种姓制度深深植根于印度社会,印度人无法摆脱。不同阶级的印度人被禁止共同进餐。看到基督徒聚在一起领受圣

478

餐，这让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印度人相信，如果他们成为基督徒，这就意味着他们加入了葡萄牙殖民者的阶层。因此，对于印度基督徒来说，归信基督教和接受洗礼就有了社会解放的意义。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印度上层阶级中许多人反对基督教的讲道，他们将基督教视为具有颠覆性的宗教。在印度的许多地区出现了殉道士，他们类似于早期教会的殉道者。沙勿略多次受到攻击，他曾被利剑刺伤。他曾试图利用葡萄牙军队来保护他所牧养的信徒，但葡萄牙当局禁止这样的军事行动，这并不是出于和平主义理想，而是因为军事行动会阻碍贸易。

1546年，沙勿略将他在印度所开展的工作交给了其他人负责，他驶向了更远的东方。他在这次旅行中结识了三个日本人，他们邀请他到日本宣教。他回到果阿住了一段时间，随后便肩负起这一新的使命。1549年，他同那三个日本基督徒和两个耶稣会同伴一起驶向了日本。他在日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许多日本人在他的带领之下归信了基督教，这令他相信，他已经为不久之后就会兴旺发展的教会打下了基础。他没有料到，在他去世不久之后就爆发了一场大逼迫，他刚刚建立的教会几乎完全消失。（当时，日本的教会似乎真的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新教宣教士在三百年之后发现，在长崎及其附近地区还生活着大约十万名基督徒。）

479

沙勿略回到马六甲之后得知，耶稣会已经决定建立一个大主教区，包括好望角以东的所有教区，他被任命为该教区的大主教。新教务迫使他回到果阿，他被迫推迟了到中国宣教的梦想。

沙勿略于1552年终于驶向了中国。他在离开果阿之前写信给葡萄牙国王说："激励我们的是，上帝已经将这个想法启示给我们……我们不要疑惑，上帝的能力无限地高于中国皇帝的能力。"尽管他是这样自信，但是，他始终没能进入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厌恶一切外国势力。他在为庞大的中国向他敞开大门的那一天做着准备，他定居在中国附近的一座小岛上，并最终死在那里。

沙勿略和他的宣教士同伴并没有在欧洲文化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做出

明确的区分。当他们的新信徒接受洗礼时，他们会给新信徒起一个“基督徒”名字——葡萄牙人的名字，并鼓励新信徒穿着西方人的服装。许多新信徒实际上相信，当他们接受洗礼时，他们就成为葡萄牙国王的臣民。出于类似的原因，在宣教士到过的许多国家，知识分子和掌权者都将基督教视为外国势力，认为它损害了传统文化与现行的社会制度。

新一代耶稣会会士得到了葡萄牙当局的全力资助，但是，其中许多会士是意大利人，他们并不赞同将基督教等同于葡萄牙和葡萄牙文化，他们试图找到让福音的宣讲适应或“迎合”东方古老文化的方法。在这新一代耶稣会会士中，最著名的是罗伯托·迪·诺比利（Roberto di Nobil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迪·诺比利前往印度去宣教，而利玛窦则前往中国去宣教。

迪·诺比利在采珠海岸开始了宣教生涯，他在那里意识到，社会底层的人之所以信奉基督教，是因为他们将基督教视为一种摆脱低下身份的方法，但是这也意味着，社会上层的人并不愿意聆听一种与他们眼中的社会糟粕联系在一起的信息。因此，当他被调到另一个地区时，他决定采取另一种方法。在他证明自己在祖国的高贵出身之后，他像婆罗门那样着装，并取名为“教师”。他也像所有好印度教徒那样吃素，并学会了梵文。凭借这些方法，他赢得了社会上层许多人的尊重。当他们中的一些人归信基督教时，他为他们建立了独立的教会，禁止所有社会底层的人与他这些有特权的信徒一同崇拜。

迪·诺比利对他这些行为的解释是，虽然种姓制度是邪恶的，但是，它并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必须尊重印度人的文化，按照阶级来传讲福音。迪·诺比利认为，如果尊重印度人的文化，并按照阶级来传讲福音，社会底层的人便会以社会上层的人为榜样，所有人就都会归信基督教。这样的论点遭到了其他基督徒的驳斥，他们指出，公义和爱是福音的一部分，如果否定这些，那就不是在传讲真基督教。最终，迪·诺比利最为极端的主张被否定了。但是长久以来，印度一直存在着专属不同阶级 480

的独立教会——或为不同阶级单独预留独立坐席的教会。

利玛窦在中国所采取的政策类似于迪·诺比利在印度的政策，但是没有迪·诺比利那么极端。中国与一切外国势力隔绝，除了澳门这扇小小的贸易窗口。在沙勿略去世不久之后，一位来自菲律宾群岛的曾试图进入中国的西班牙宣教士说："不管有没有军队，想要进入中国，就像要登上月球。"尽管面对着这些困难，但耶稣会会士并没有放弃沙勿略的梦想。他们看到，中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中国人将世界其他民族都视为蛮夷，因此耶稣会会士认为，影响这个庞大帝国的唯一方法是学习，不仅要学中国的语言，还要学中国的文化。为此，一群耶稣会会士定居在中国边境，潜心研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化。附近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渐渐看到，这些欧洲人是值得尊敬的，他们并不像其他许多来中国寻求财富的冒险家。最终，他们在漫长的谈判之后被允许住在省会城市肇庆，但却被禁止到其他地区。

利玛窦就是定居在肇庆的耶稣会宣教士之一。他精通汉语和中国文化，也是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钟表匠。他了解到，友谊是中国人很看重的一个美德，他撰写了一篇论友谊的论文，根据中国的古典文献，将中国人的智慧与西方哲学结合在一起。中国人很快便开始谈论这位"来自西方的智者"，学者们来拜访他，与他一同讨论天文、哲学和宗教。他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其中包括不为中国人所知的广阔地区，这引起了北京宫廷的重视。他根据复杂的数学原理来解释天体运动，这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尊重。1601 年，他终于被邀请到北京紫禁城，并得到修建一座巨大天文台所必需的资金。此后他一直住在北京，直到于 1610 年去世。

利玛窦向中国宣教的策略是，不一定非要赢得大量信徒。他担心，如果他引发大的宗教骚乱，他和其他宣教士会被逐出中国，他们的工作将无果而终。因此，他从未建立教堂或小礼拜堂，也从未向群众讲道。他在家中召聚了一群朋友和仰慕者，他们在一起讨论钟表制造、天文和宗教，他就是在这个小小的交际圈中带领一些中国人归信了基督教，他们也是他

481

在中国所赢得的唯一一群信徒。当他去世时，留下了一批核心基督徒，他们都是知识精英。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又带领其他中国人归信了基督教，于是中国最终有了数量可观的基督徒——他们依然由耶稣会会士领导。这些耶稣会宣教士一直在北京宫廷中担任钦天监（即官方天文学家）。

同迪·诺比利一样，利玛窦的宣教方法也遭到了其他天主教徒的反对。在利玛窦这里，争论的焦点并不是种姓制度，而是祖先崇拜和儒家学说。耶稣会宣教士认为，儒家学说并不是宗教，孔子的许多教导可以成为接受福音的切入点。至于祖先崇拜，他们声称，这并不是真正的崇拜，而是一种社会习俗，中国人借此表达他们对祖先的崇敬。耶稣会宣教士的反对者主要是多明我修会与方济各修会的修士，他们认为，祖先崇拜实际上是偶像崇拜。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应当用汉语中的哪一个词来称呼基督教的上帝，因为在汉语中，有两个词可以用于称呼上帝。当中国皇帝得知这个争论已经上达罗马，将由教宗来解决争端时，他被激怒了：根本就不识中国字的野蛮人，竟敢教中国人如何说自己的语言。 482

在中国，“迎合”的问题主要与文化有关，而在印度的问题是，如果所传讲的福音根本就没有任何有关审判不公与压迫的信息，那么，是否还可以说这是在传讲真福音？接受种姓制度的基督教信仰，还是基督教真信仰吗？这个问题或类似的问题在随后几百年中将变得至关重要。

巴西

当哥伦布带着他的航海消息回到欧洲时，葡萄牙探险家早已在非洲海岸进行探险，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路线。为了避免冲突，教宗画了一条分界线，西班牙殖民者可以在分界线以西探险与殖民，而葡萄牙殖民者在分界线以东享有同样的权利。但是盛行风向经常迫使沿非洲海岸向南航行的葡萄牙航海者向西偏离那条分界线很远，因此，那条分界线也相应地被向西移动。当时并没有人知道，南美洲的东端正横跨那条分界线。公元

1500年，一支驶向东方的葡萄牙舰队为躲避逆风而停泊在非洲海岸，他们偶然发现了今天的巴西。这支舰队在对巴西探险之后继续向东航行，但派了一艘船回里斯本，去报告他们所发现的似乎位于大西洋中部的那块陆地。经过几次初步的探险，他们发现在那里能找到的唯一资源是可以用来制造染料的巴西木。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oel I）将巴西木的专营权授予一群葡萄牙商人，他们的代表在巴西沿岸建立了贸易中心。他们用刀具、剪子、缝衣针等此类工具来交易巴西木，印第安人砍伐巴西木，并用手推车将它们送到沿海岸边的仓库。当巴西木变得稀少时，葡萄牙殖民者将目光转向了甘蔗，因为甘蔗易于在巴西种植。当时，糖可以在欧洲卖得高价，有利可图。葡萄牙国王任命他的十五位宠臣为船长，并赠予他们每一位五十里格长的海岸，船长辖区延伸到内陆，直到西班牙殖民地。在这十五位船长中，只有十位尝试过殖民，但其中八位以失败告终。成功的两位成为永久殖民巴西的先锋。

483

种植与加工甘蔗需要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葡萄牙殖民者试图通过奴役印第安人来获得。从理论上讲，只能奴役已经成为其他印第安人奴隶的印第安人以及那些在“正义战争”中被俘获的印第安人。但是，葡萄牙殖民者很快就为所谓的正义战争找到了种种借口，最终，只要印第安人公开露面，就会被葡萄牙殖民者俘获为奴。一些奴隶贩子沿海岸航行，俘获并奴役每一个疏忽大意的印第安人。此外，葡萄牙殖民者还煽动各印第安部落之间的战争，因为印第安人会在开战后将他们的战俘卖掉，换来诸如刀之类的工具。

然而，这些方法并没有为葡萄牙殖民者带来足够的奴隶，许多被俘获的印第安人一有机会就会逃进丛林。就是在这时，葡萄牙殖民者开始从靠近大西洋对岸的非洲引进黑奴。随着印第安人不断向内陆迁移、死亡和被其他民族同化，黑奴和葡萄牙殖民者构成了巴西东部的绝大多数人口。

巴西呈送里斯本的报告令人气馁。葡萄牙殖民者的残忍和放肆激起

了强烈的反应。1548年，为了建立秩序和充实国库，葡萄牙国王废除了船长辖区制，他买回了船长继任者的土地，并宣布巴西是他的殖民地。耶稣会宣教士同巴西的第一任殖民总督一同抵达巴西。他们的领袖是曼努埃尔·达·诺比雷加(Manoel de Nóbrega)，我们已经在本章开头引用过他的话，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自己宣教事业的理解。1551年，巴西有了第一位主教，但他并不出色。他与葡萄牙殖民者不和，也不关心印第安人和非洲黑奴的悲惨遭遇。他想回到葡萄牙投诉殖民者，但在返回葡萄牙的途中遭遇海难，他和他的同伴全部被印第安人杀害后吃掉。

耶稣会宣教士按照葡萄牙国王的要求来到了巴西，他们所建立的宣教站类似于巴拉圭的宣教站，只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巴拉圭的宣教站被建在尽可能远离殖民者的地区，而巴西的宣教站被建在印第安人在种植园中劳动的地区。耶稣会宣教士感激葡萄牙殖民者的支持，并以向他们提供印第安人劳动力作为回报，这实际上相当于奴役印第安人。正如一位耶稣会宣教士所说：“他们(印第安人)因恐惧而在总督面前瑟瑟发抖，他们的恐惧……足以让我们去教导他们，也有助于他们聆听上帝的道。”

然而，随着耶稣会宣教士在巴西的地位越来越稳固，一些宣教士开始以一种更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殖民者的陋习。其中最著名的是安东尼奥·维埃拉(António Vieira, 1608—1697)。他在巴伊亚(Bahia)长大，曾在耶稣会宣教士所创办的学校里学习，耶稣会的大多数学校都是为葡萄牙殖民者和他们的孩子创办的。他来到葡萄牙学习，并准备成为神父。在葡萄牙，他因保护犹太人而家喻户晓。在作为宣教士回到巴西之后，他也积极地保护印第安人。他在讲道时问道：“难道你们以为，因为你们生来就离太阳更远，这就让你们有权支配那些生来离太阳更近的人？”随后，维埃拉缅怀了一百五十年前的蒙特西诺斯，并告诉葡萄牙殖民者，他们在以印第安人的鲜血为生，“你们都在径直走向地狱，你们将成为众多落入地狱者之一员。”葡萄牙殖民者被激怒了，结果维埃拉不得不回到葡萄牙。在随后的三十年中，他一直在葡萄牙倡导保护印第安人，就像拉斯·卡萨斯

484

在上个世纪所做的那样。在去世前几年，维埃拉最终回到了巴西。

虽然出现了维埃拉和像他这样的宣教士，但在巴西传讲与教导基督教主要还是用德·诺比雷加16世纪时所采取的方法：努力为葡萄牙的殖民事业辩护，让印第安人更加顺服。印第安人以弥赛亚崇拜作为反抗，这种信仰将基督教因素与来自古代信仰的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当一次天花夺去数千名印第安人的生命时，他们便开始谈论一位被他们称为“桑托”（Santo）的救世主：桑托会来将他们从葡萄牙殖民者的奴役中拯救出来。这种新宗教被称为圣洁教（*santidade*），它不仅在被葡萄牙殖民者所奴役的印第安人当中，也在那些仍在丛林中自由生活的印第安人当中发展壮大，并成为连接这两群印第安人的桥梁。黑奴同样发展出许多将基督教与他们祖先的宗教结合在一起的组合体。这两场运动都让受压迫的黑人和印第安人有了尊严感，而这是官方的基督教所拒绝给予的。

法国殖民者很早就与葡萄牙殖民者在巴西木的贸易中展开了竞争，一些法国殖民者希望在巴西建立永久性殖民地。尼古拉斯·杜兰德·德·维叶加农（Nicholas Durand de Villegagnon）于1555年进行了一次尝试，他在瓜纳巴拉（Guanabara）海湾的一座小岛上（今天的里约热内卢附近）建立了一块殖民地。他与塔马约印第安人（Tamayo Indians）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些印第安人帮助他在海岛上建筑防御工事。他给加尔文（Calvin）写信，并得到了回应，几位新教牧师被派来服侍这里的新教徒殖民者。这件事和其他许多争议给这块殖民地带来了艰巨的问题，葡萄牙殖民者最终将这块殖民地铲除。塔马约印第安人和生活在他们当中的法国难民继续抵抗了一段时间。后来，为了逃避葡萄牙殖民者，塔马约印第安人将他们的部落迁到内陆。当一位英国冒险家于16世纪末说服他们回到瓜纳巴拉海湾为他们的权利战斗时，他们以失败告终，塔马约印第安人当中有一万人因此丧生，两万人被俘，并被卖为奴隶。

485

总之，基督教在葡萄牙殖民地的早期历史，就如在该殖民时期的其他许多殖民地一样，并不是鼓舞人心的故事。殖民者为务农与采矿而来到

巴西，非洲黑奴在巴西从事着大部分苦力工作。非洲主要被视为奴隶的来源地和通往东方巨大财富之路的障碍。在东方，葡萄牙殖民者只能建立像印度的果阿和中国的澳门这样的贸易站和一系列保护他们船运和势力的军事要塞。在整个殖民事业中，宣教至多只是次要关切，常常被用来服务于殖民者、商人和奴隶贩子的利益。许多年之后，如此不幸的开端所造成的负面后果才被一点点消除。

第三十八章

新旧大陆

他们并不要求有任何私人财产，只是凡物公用。他们和睦相处，没有统治者或权力机构，因为他们都像是领主。

——阿梅莉格·韦斯普奇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在西半球的殖民事业对西半球的影响极其重大，而且充满悲剧，致使很多人看不到西半球同样对欧洲及欧洲各种事件的重大影响。不仅宗教领域如此，欧洲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新大陆急剧地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实际上，“发现”和殖民美洲，令欧洲可以在未来的几百年中继续养活它的人口。在此之前，就播种与收成的比率而言，欧洲人所种植谷物的产量相当有限。这就意味着，欧洲人通常必须至少预留每年收成的五分之一，以备来年播种所需，庄稼欠收会严重影响到未来的许多年，直到足够的种子得以生产出来并存留备用。同欧洲的谷物不同，美洲谷物玉米的产量要高得多。一粒玉米可以产出一穗、甚至几穗玉米，每穗玉米又可以产出数百粒种子。因此，玉米可以养活更多人，如果庄稼欠收，只需为来年的播种预留出一小部分种子即可

马铃薯比玉米对欧洲人的生活和饮食影响更大。马铃薯最早种在安第斯山脉的高地上。当西班牙殖民者到达时，那里已经种植了数百种马铃薯；尽管印加帝国地貌崎岖，耕地有限，但那里的马铃薯还是可以养活帝国中的大量人口。被引入欧洲的马铃薯——现在被讽刺性地称为“爱

尔兰豆薯"——成了令欧洲人口得以迅速增长的主食之一,后来,马铃薯的欠收还导致了新一轮的移民浪潮。虽然玉米和马铃薯是最重要的食物,但对欧洲人饮食和生活产生影响的并非只是这两种,其他产生影响的美洲农作物还包括影响意大利的番茄、影响瑞士的可可豆以及影响全世界的烟草。

488

并非只有新大陆的食物影响到旧大陆。从美洲滚滚而来的黄金和其他财富令最近才统一成一个国家的西班牙在16世纪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查理五世用美洲的黄金还清了他在竞选皇帝时所欠下的巨额债务。西班牙的黄金——实际上是美洲的黄金——为较为贫穷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如佛兰德地区和英国,因为刚刚富裕起来的西班牙人更愿意从这些地区购买(而不是自己生产)纺织品和其他产品。结果到了16世纪末,作为西欧霸权国家的西班牙渐渐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英国和其他北欧国家开始崛起。这些国家很快就开始在加勒比海公然对抗西班牙殖民者,并从他们手中夺走了一些岛屿,如牙买加和小安的列斯群岛(Lesser Antilles),而这些地区的甘蔗又为新兴的殖民国家带来了更多财富。后来,新兴的殖民国家开始进入北美洲一些较为贫穷落后的地区,尤其是在大西洋海岸的英国殖民者和在密西西比河的法国殖民者。这一切不仅极大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也形成了新的宣教中心——现在主要是新教的宣教中心。

旧大陆对新大陆的影响在宗教领域最为明显。古代的神祇令人失望,古代的宗教也或是消失,或是被彻底改变,因此,基督教逐渐取代了它们的位置——尽管在新大陆基督教通常与古代宗教混杂在一起。但即便如此,新大陆也在宗教领域开始影响到旧大陆。正是因为此前不为人所知的大陆被"发现",许多传统的世界观开始受到质疑,进而许多包含与支持这些传统世界观的神学传统也受到质疑。几百年来,神学家始终在宣称,所有受造物都有三位一体的标记或痕迹,世界一分为三,便是三位一体的标记之一,因为世界是由欧洲、非洲和亚洲组成的。但是,世界的

第四个部分现在突然冒了出来，而且这个部分还远远大于欧洲。世界并不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如果神学家会在这一点上犯错，那么在其他方面他们是否也会犯错？几百年来，基督徒始终认为，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已经将福音传遍天下。甚至还出现这样的传说：耶稣的某个使徒曾在某个地区传讲福音，现在住在这些地区的异教徒的祖先在使徒时代就得到了信仰基督教的机会，但是他们没有相信基督教，因此这些地区的异教徒现在因他们祖先的顽固而受到了惩罚。如今，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从未去过的大陆出现在世人面前。难道这里的人会无缘无故地受到永罚吗？难道他们的灵魂就不配得救吗？难道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将福音传遍天下的传说是假的吗？

489

其他人以更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新大陆。哥伦布在遇到美洲的原始居民之后就立即宣布，他发现了人类失去的伊甸园，因为人们在这里几乎完全赤身裸体，并不感到羞耻地在生活。虽然哥伦布本人在发现印第安人不愿听命于他时看法发生改变，但是人们仍在传说，在一片宁静富饶的土地上，悠闲地生活着爱好和平的原始居民。“高尚的野蛮人”这一观念就源于这些栩栩如生的传说，他们并没有被文明社会及其贪婪所玷污，他们并不知道何为我的和你的，爱与率真主宰着他们。“高尚的野蛮人”似乎实现了古老的千禧年之梦，甚至是有着奇迹般产量的美洲玉米，也实现了土地的千禧年之梦——土地极其富饶，它能以一比一百的比率产出农作物。因此，新大陆孕育着旧大陆的乌托邦之梦——包括托马斯·莫尔著名的《乌托邦》（*Utopia*）之梦。到了 17 世纪，新大陆还提供了一个以各种方法试验乌托邦之梦的场所：给人类一个新起点，建立一个没有被旧大陆的贪婪、不平等和猜疑所玷污的新社会。

当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起广阔的海外帝国，并在遥远的土地上播撒罗马天主教的种子时，新教改革正在欧洲进行。1521 年，路德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Diet of Worms）上勇敢地站在了查理五世面前，也是在这一年，科特兹占领了特诺奇蒂特兰。这两件事的结果将在很多方面联系在

一起——尽管路德不知道,查理五世也不知道,蒙提祖马二世(Montezuma II)更不知道！例如,特诺奇蒂特兰的黄金让查理五世可以继续推行他扩张哈布斯堡家族和镇压新教的政策。几年之前,许多渴望改革教会的基督徒还希望西班牙会率先发起改革,但是,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家族在新教改革面前成为传统基督教最坚定的捍卫者。

新教改革和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扩张仅仅过去了五百年,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就其中哪一事件最终对基督教进程产生更大影响作出评判,可能还为时尚早。新教改革产生了延续至今的各大宗派,也复兴了圣经研究和神学。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扩张让基督教在人口与地域上都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进展。在16世纪的新教改革造成分裂的一些地区,基督教正在普遍衰落,但是,在16世纪的殖民地中,基督教正表现出生命力与创造力这些重要的迹象,因此,"发现"和殖民美洲深刻地影响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一些事件的走向。 *490*

在这部《基督教史》的下卷,我们将回到欧洲,继续讲述人们对复兴与改革教会的探索——还有那些为这项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再次穿越大西洋,先后讲述基督教在英国和西班牙、葡萄牙以前的美洲殖民地中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对于理解基督教其后的进程和今天的基督教来说,那些进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建议阅读：

Germán Arciniegas. *America in Europe: A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in Reverse.*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5.

Stephen Clissold. *The Saints of South America.* London: Charles Knight, 1972.

Vincent Cronin. *The Wise Man from the West.* New York: Dutton, 1955.

George H. 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Generations of the Ming Dynasty.* London: Burns & Oates, 1962.

John Hemming. *Red Gold: The Conquest of the Brazilian India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Ondina W. González and Justo L. González. *Christianity in Latin America: A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Southern Vogages, A. D. 1492–161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Stephen Neill. *Colonialism and Christian Missions.* London: Lutterworth, 1966.

J. H. Parry. *The Discovery of South America.* New York: Taplinger, 1979.

John Frederick Schwaller. *The Church in Colonial Latin America.*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 Books, 2000.

附录:普世大公会议①

次数	日期	名称	主要决议
1	325	第一次尼西亚会议	谴责阿里乌 圣子与圣父同质 《尼西亚信经》
2	381	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	重申第一次尼西亚会议的决议 圣灵具有神性 谴责阿波利拿里
3	431	以弗所会议	谴责聂斯脱利 马利亚是"上帝之母"——"生上帝的人"
4	451	卡尔西顿会议	谴责欧迪奇 基督具有二性:神性和人性
5	553	第二次君士坦丁堡会议	谴责"三章":摩普绥提亚的西奥多 昔尔的狄奥多勒 埃德萨的伊巴斯
6	680-681	第三次君士坦丁堡会议	谴责基督一志论 谴责教宗霍诺里乌
7	787	第二次尼西亚会议	谴责反圣像崇拜者 可以崇敬圣像(二等崇敬) 禁止崇拜圣像(最高崇拜)
8	869-870	第四次君士坦丁堡会议	结束弗提乌斯分裂
9	1123	第一次拉特兰会议	批准《沃尔姆斯协定》
10	1139	第二次拉特兰会议	强制神职人员独身
11	1179	第三次拉特兰会议	确定教宗选举办法
12	1215	第四次拉特兰会议	颁布变体说的教义 每年至少认罪并领受圣餐一次 谴责费奥雷的约阿希姆、瓦尔多派和阿尔比派 规范宗教裁判所

① 1054 年,东西方教会分裂了。1054 年之后,只列出西方教会的普世大公会议。

次数	日期	名称	主要决议
13	1245	第一次里昂会议	废黜皇帝腓特烈二世
14	1274	第二次里昂会议	制定教宗选举的新办法
			罗马名义上与君士坦丁堡合一
15	1311－1312	维埃纳会议	镇压圣殿骑士团
16	1414－1418	康斯坦茨会议	结束西方教会大分裂
			谴责约翰·胡斯
			大公会议的权威高于教宗
			计划改革教会和召开其他大公会议
17	1431－1445	巴塞尔/费拉拉 佛罗伦萨会议	名义上与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和雅各派再次合一
18	1512－1517	第五次拉特兰会议	谴责造成教会分裂的比萨会议
19	1545－1563	特伦托会议	谴责新教徒
			圣经与传统都具有权威
			强化天主教的改革
20	1869－1870	第一次梵蒂冈会议	颁布教宗无误的教义
21	1962－1965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	改革崇拜礼仪（在崇拜中使用本国语）
			教会开始回应现代世界：
			国际经济不平等、核战争、宗教自由、对其他基督徒持有开放的态度

索　引*

* 本索引页码为英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斜体数字表示原书中的插图页码。由于本书中文版部分图片未得到授权，故有些图片阙如。——编者注

基督教史 | 上卷 | 初期教会到宗教改革前夕

本书资料丰富，笔触生动，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可读性极强，堪称当今最受青睐的教会史入门教材。作者摆脱了“西方中心”的倾向，站在普世的高度，对历史上的基督教做了整体的回顾。修订版中，作者在思想时代变化和参考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将叙述时限延伸到21世纪最初十年，增加了许多重要的内容和议题，如妇女在基督教会史上的重要作用、基督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最新发展以及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等等。




上架建议：基督教史
ISBN 978-7-5426-4412-1
9 787542 644121 >
定价：120.00元（上、下卷）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基督教史　上
作者=胡斯托·L·冈萨雷斯著
页数=530
SS号=13964009
DX号=
出版日期=2016.03
出版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